НЕИЗВЕСТНЫЕ АРХИВЫ СССР

СТАЛИН

ТАЙНЫ ВЛАСТИ

ЮРИЙ ЖУКОВ

ТАЙНЫ И

Век XX

Ю.Н.Жуков

ТАЙНЫ КРЕМЛЯ

СТАЛИН, МОЛОТОВ, БЕРИЯ, МАЛЕНКОВ

ИСТОРИИ

в романах, повестях и документах

克里姆林宫的秘密：斯大林、莫洛托夫、贝利亚、马林科夫

又名 斯大林：权力的秘密

尤里 朱可夫

Тайны Кремля: Сталин, Молотов, Берия, Маленков

Сталин. Тайны власти

Жуков Ю. Н.

目录

前言.....5
第一部分、1938—1940 年的路线转变.....8
第一章.....10
第二章.....19
第三章.....30
第四章.....47
第五章.....58
第六章.....68
第七章.....81
第二部分、1941—1944 年的“三巨头”时期.....88
第八章.....90
第九章.....99
第十章.....108
第十一章.....117
第十二章.....128
第十三章.....139
第十四章.....147
第十五章.....156
第三部分、1945－1948 年全球战略.....164
第十六章.....166
第十七章.....179
第十八章.....189
第十九章.....202
第二十章.....212
第二十一章.....223
第二十二章.....237
第四部分、1949—1954 年的权力之争.....245
第二十三章.....248
第二十四章.....259
第二十五章.....271
第二十六章.....281
第二十七章.....291
第二十八章.....304
第二十九章.....316
第三十章.....327

前言

在漫长的岁月里，确定苏联权力的真实面貌几乎是不可能的。克里姆林宫中的人对与此相关的一切都进行了周密而可靠的保密。他们隐藏了那些以党的名义、以中央委员会、最高苏维埃和苏联部长会议的名义，做出影响国家命运、决定苏联及其人民命运的重大决策的人；隐藏了这些决策的制定过程，甚至许多（如果不是大多数）决策本身。

这种状况的解释非常简单。一旦出现错误、计算失误，尤其是制定计划失败时，没有人愿意承担所做事情的责任，自愿或被迫退休，从而失去来之不易的权力和不受约束行动的权利。而要达到这一点却非常容易。真正的权力始终是“封闭”的，以非公开的方式存在，不透露其真实构成。此外，那些记录了制定和采纳某项决策的文件，不考虑其真实内容，都被宣布为“绝密”，属于国家机密，不仅不能立即或至少在经过世界实践规定的期限——30年后公布，而且永远不能公布。这样一来，它们就永远无法被未来的研究者获取。

这种状况的解释非常简单。一旦出现错误、计算失误，尤其是制定计划失败时，没有人愿意承担所做事情的责任，自愿或被迫退休，从而失去来之不易的权力和不受约束行动的权利。而要达到这一点却非常容易。真正的权力始终是“封闭”的，以非公开的方式存在，不透露其真实构成。此外，那些记录了制定和采纳某项决策的文件，不考虑其真实内容，都被宣布为“绝密”，属于国家机密，不仅不能立即或至少在经过世界实践规定的期限——30年后公布，而且永远不能公布。这样一来，它们就永远无法被未来的研究者获取。

从这里就产生了缺乏科学著作的问题，这些著作本应基于文件分析权力的形成、其真实构成、决策机制以及决策本身，但必须是在当时国内和国际形势的背景下进行分析。替代这些著作的是，存在一个得到批准并由上级（即权力本身，一个明显感兴趣且带有偏见的、主观的方面）认可和确立的官方版本的历史。

最初，她以著名的《简明教程》为服务对象。随后，它的修改版反映了国家领导人的更迭，既抬高了新领袖，又贬低了前任——即《苏联共产党历史》。这本书成为权力自我评价的更稳定版本，在四分之一世纪内经历了七次出版，每次都变得更加无特色，几乎到了抽象的地步，因为不同版本之间唯一的不同就是依次删除了越来越多的名字。在其诞生之初，就避开了几乎所有党和国家的领导人的提及——斯大林、莫洛托夫、马林科夫，以及像贝利亚、卡冈诺维奇、布尔加宁这样在国家的管理体系中占据要职的大人物。即使他们的名字出现在书页上，也只会受到贬低。就像《简明教程》中对那些受到负面评价的人一样——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布哈林、李可夫，他们仍然是“党的敌人”，因此也是国家的敌人，人民的敌人。

在20世纪60至70年代之交出现的多卷本著作——《苏联共产党历史》、第二版《苏联历史》（共五卷，涵盖了“从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到我们的时代”这一时期），并没有改变这种状况，也没有带来任何新的、根本性的东西。它们使官方概念变得更加僵化。问题的关键根本不在于单卷本和多卷本都是在一个人——B.H.波诺马廖夫的编辑和严格控制下编写的。在方法和结论上令人沮丧的千篇一律的真正原因甚至也不在于“苏联的权力”这一主题像以前一样不被视为研究对象。真正的原因在于这个主题仍然是一种政治工具。它只应该被用来让人民无条件地接受权力本身，让人民相信权力的不可战胜性，相信它在任何时候、任何事情上的绝对正确性。要让人民产生“对权力本身、对现存的政治制度毫无保留的忠诚感”。

而这个概念，最初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得到了最坦率的表达，后来在本质上几乎没有改变（只是在一些与对过去领导人的评价有关的细节上做了一些小的修正），归

结为一个坚定不移的信条。在国家的领导核心，无论在任何情况下，无论发生什么变化，始终是党。党通过其中央委员会、一直运作的政治局来体现。据称，正是他们（以对此一无所知的党的名义）集体做出了所有决策。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嗯，如果偶尔有人犯了个别错误，据说这是违背党的意愿、中央委员会的意愿，有时甚至是政治局的意愿的。

但在每次对那些曾经多年被奉为党和国家杰出领导人的人进行重新评价时，有一个根本性的、从未受到丝毫怀疑的情况始终不变。党通过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始终是执政的。并且是权力的象征。然而，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年复一年，这种不切实际的权力越来越失去其实际内容，变成了一个抽象的、没有个性的概念。而这种情况的结果就是权力不可避免地被神话化。人们开始认为权力是某种难以理解的结合体，它将某个具体领导人明显的专制、独裁权力与体现人民希望和期待的民主社会权利结合在一起。关于神圣权力的神话诞生并存在着，这种权力自我封闭，不断地从自身产生新的权力。

权力的神话化催生了诸如对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的个人崇拜等现象。它将社会，更确切地说是社会中政治上活跃的极小一部分人，分裂为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它不仅保留了，而且还强化了几个世纪以来形成的关于权力的传统观念，即权力是一种不受任何人控制的权利，可以主宰国家和人民的命运。

过去的十年并没有像人们所希望的那样，使人们摒弃这种观点。这些观点依然未受触动。成百上千的书籍，大多不是由学者撰写，而是由记者或曾经的党内官员所写，其特点是对从列宁到戈尔巴乔夫的整个苏联历史进行了极其恶劣的否定。它们遵循着一个既定的规则：要抬高当前的权力，就只能通过对先前权力的负面评价来实现。

处于这种状况的不仅有本国的学者，也有外国的学者。那些没有受到意识形态压力、不完全依赖于审查制度的学者。那些无论如何都试图弄清楚苏联政治的所有错综复杂之处、想明白究竟是谁在掌权、做出了决定命运的决策的学者。他们所有人，同样由于无法依据文件进行研究，不得不构建自己的、纯粹基于推测的理论。只能根据现有的材料，根据故意操纵的、明显歪曲的官方或非官方数据，以及故意传播的谣言来构建这些理论。

直到 1993 年末，历史科学才终于有了坚实的基础。虽然没有得到所谓的“特别档案”（其中包含有关国防、国家安全、国防工业、财政问题的决策，以及政治局的会议记录——但仅限于 1952 年 10 月之前的记录），但还是得到了组织局和书记处的材料。正是这些材料，使得我们能够客观地了解苏联的权力究竟是什么样的。它是否真的等同于政治局，斯大林在世时是否真的总是亲自做出所有最重要的决策，政治局是否也总是与他保持一致。

当然，即使现在，拥有了如此珍贵的资料来源（这里不得不提一个非常遗憾的事实——在经过一段相对较短的可以使用这些资料的时期后，其中大部分又被重新列为机密，再次无法获取），我们仍然远未找到所有早已存在的问题的最终答案。问题在于，科学所获得的这些文件在很大程度上是“沉默的”。它们只是记录了已做出的决策，却往往不揭示讨论的过程，不说明为什么有人支持或反对。很遗憾，关于这些我们永远也无法知晓。既没有会议记录，更没有对高层领导会议的速记记录。领导人也没有给我们留下坦诚的回忆录、日记，甚至连信件都没有，而这些本可以帮助我们揭开重大政治的秘密，填补现有的空白。

然而，即使是那些可供历史学家研究的文件，也能让我们有很多收获。可以确定究竟是谁真正进入了以政治局名义掩护的高层领导核心，他们试图推行什么样的政策以及为什么。最终，还能让我们明白其他一些事情。从 20 世纪 30 年代末开始，就有人坚持不懈地尝试将党与国家分离，大幅限制党在国家生活中的作用。试图摆脱已经完全耗尽的革命精神，回归到正常的生活状态，不再让一切都被意识形态所累。随着苏联人民文化水平的提高，至少在社会的一小部分人中出现了政治自我意识，试图逐步向民主的管理和自治形式过渡。

本书并不奢望全面揭示苏联的权力问题。它仅限于相对较短的一个时期：1938 年至 1954 年。也就是在这个时期，人们进行了，而且是非常坚持不懈地进行了限制党的权力的尝试。其他研究人员未来的著作，若能基于对保存在国内各个档案馆中的、现已可供查阅的文件的深入分析而写成，无疑将能够重新探讨权力问题。对本书的某些观点进行修正、补充或重新审视。

第一部分、1938—1940 年的路线转变

1938 年，世界走到了命运的危急关头。此时，它还有最后一次机会来阻止即将降临的灾难。避免人类历史上一场空前的战争——这场战争无论从其全球规模、即将造成的破坏程度，还是从受害者的数量来看，都是史无前例的。但世界，更确切地说，西方的民主国家——首先是英国和法国——没有利用这一延迟的机会，错过了最后的时机。它们继续无所作为，每一天都在丧失极为重要的主动权。它们向所有人展示了自己的轻率、勇气和决心的丧失。它们仍然天真地希望，德国的侵略会绕过自己，希望能够将德国的侵略引向东方，迫使德国国防军将全部力量不是用于进攻自己，而是用于进攻苏联。与此同时，它们认为日本不会觊觎它们在亚洲的属地，因为日本会在长期陷入中国战场。它们还认为意大利只会满足于对“无主”的埃塞俄比亚的占领。

西方民主国家，自己承担起了维护凡尔赛体系的沉重责任，同时也承担着欧洲稳定与安全的责任，却以完全的冷漠和无动于衷的态度看着德国的重新武装。它们对希特勒那些提前且公开地警告所有人其意图破坏凡尔赛世界秩序的言论毫无反应。对希特勒恢复第三帝国军事力量、恢复其旧边界的计划毫无反应。而且，希特勒并不满足于此，他还要走得更远——要先在欧洲大陆实现全面和绝对的统治，然后在全世界实现统治。在这五年里，他一步一步地朝着这个目标前进。而在这整整五年里，英国和法国，尽管有时有机会遏制刚刚兴起的侵略，避免这场巨大的悲剧，而且无需发动战争，无需牺牲一名士兵，但它们却无所作为。

希特勒上台仅仅一年后，就宣布要重建德国的陆军和海军，称德国已经拥有了一支强大的空军，并且开始建造潜艇。又过了十五个月，这位元首实行了普遍兵役制。西方民主国家对如此公然违反《凡尔赛和约》条款的唯一反应，是在 1935 年 6 月签署了《英德海军协定》，该协定只是规定将纳粹德国海军的总吨位限制在英国皇家海军总吨位的 35%对 100%的比例。受到这种明显纵容的鼓舞，1936 年 3 月 7 日，希特勒迈出了走向战争的决定性一步。他宣布废除 1925 年的《洛迦诺公约》，该公约规定了比利时和法国边界的不可侵犯性。他下令德国国防军占领非军事化的莱茵兰地区。而西方民主国家再次没有行使自己的权利。那些规定英国、法国、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联合起来重新占领德国以恢复现状的权利。它们甚至没有提出抗议，尽管德国军队出现在与法国的边界上，已经对欧洲大陆的安全构成了实实在在的威胁。

同年，即 1936 年，西方民主国家再次表现出了政治上的短视。它们允许德国和意大利积极干涉西班牙内战。向佛朗哥的叛军提供援助，同时在实战条件下试验新的军事技术，试用新的“战争手段”。比如对平民城市进行轰炸，甚至将其完全摧毁，这在格尔尼卡就得到了体现。

西方民主国家对待西班牙内战的立场，最明显地体现在伦敦不干涉委员会的故意不作为上，这是当时形成的对侵略者纵容政策的两种形式之一。这种刻意置身事外的态度，无论事件可能带来何种后果，都能让英国和法国政府达到自己的目的。它们不对那些不断破坏现有安全体系、有目的地削弱该体系的国家采取适当的果断措施，而且在它们看来，这些国家似乎并没有针对自己。与此同时，它们还在本国人民眼中塑造出自己是和平缔造者的形象。这种不干涉的另一个例子是对东京方面行动的反应。

早在 1931 年 9 月，日本军队就以明显捏造的借口入侵中国东北并占领了那里，试图通过在那里建立一个公认的傀儡国家——“满洲国”来掩盖其公然的侵略行为。几乎与此同时，日本军队还占领了上海，使英法在华的半殖民地势力范围（租界）的继续存在受到了威胁。然而，在这两种情况下，西方民主国家和国际联盟都只是发表了毫无意义的声明，仅仅是形式上的谴责，并拒绝承认“满洲国”。甚至在 1937 年夏天，当日本的南北两路部队都

开始对中国正规军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两路军队相向推进并不断扩大占领区时，英国、法国和美国仍然只是无动于衷的旁观者，丝毫没有考虑到这种纵容行为可能带来的后果。

对侵略者纵容的另一种形式同样危险。这种形式在世界大战前夕成为了欧洲的典型特征——“绥靖”。即不惜一切代价，而且必然是以牺牲小国的利益为代价，以牺牲小国的领土完整甚至独立为代价，哪怕只是暂时地满足柏林和罗马的无尽贪欲，推迟那场不可避免的可怕冲突的爆发。意大利军队入侵埃塞俄比亚仅仅两个月后，伦敦和巴黎就首次表现出了这种让步的态度。1935 年 12 月，英国外交大臣塞缪尔·霍尔和法国外交部长皮埃尔·赖伐尔急忙主动向墨索里尼提议，让他吞并埃塞俄比亚的两个省份——欧加登和提格雷。然而，对于罗马来说，这种让步显得太微不足道了，于是这个和平而毫无防御能力的非洲国家被完全占领了。而这种公然违反国际法的行为的后果是，国际联盟取消了对意大利实施的所有制裁。

这种对毫不掩饰的侵略行为采取的政策，让德国、意大利和日本产生了一种可以为所欲为、不会受到惩罚的感觉，让它们坚信自己的任何行为，无论多么过分，都不会遭到谴责和阻碍。这种政策成为了纳粹和法西斯政权为尽快实现共同目标而积极靠拢的契机。1936 年 10 月 22 日，纽赖特和齐亚诺签署了一项议定书，规定德国和意大利将实施共同的、协调一致的外交政策。这项议定书实际上是建立军事侵略集团的条约（一周后，墨索里尼将其称为“柏林—罗马轴心”，声称从那时起，无论愿意与否，所有欧洲国家都将被迫围绕这个轴心运转）。

就这样，仅仅五年时间，由于英国和法国的纵容，对世界的潜在威胁进入了下一个不可避免的阶段——缓慢而不可阻挡地滑向灾难，滑向第二次世界大战，而且已经明确了战争的第一批受害者。希特勒不再掩饰，他认为这三个欧洲国家必然会成为受害者——它们是他如此痛恨的凡尔赛体系的产物。奥地利，其居民以德国人为主，因此应该与第三帝国合并（德奥合并）。波兰，它必须将上西里西亚、波兹南、西普鲁士和自由市但泽归还给德国。捷克斯洛伐克，纳粹分子坚信，在苏台德地区的北部和南部，德国少数民族受到了捷克人的迫害和压迫。

这些本应是纳粹德国为废除凡尔赛体系、重塑世界而采取的首要行动。至于希特勒接下来的目标是什么，他那数量不断增加、装备着最现代化技术的军队的目标是什么，这支军队一心想要洗刷 1918 年失败的“耻辱”，伦敦和巴黎的政治家们只能靠猜测了。

第一章

从希特勒掌权的第一天起，苏联领导层就不可能不明白，从那时起，战争威胁已远不止是一种可能性，而是一个切实的现实。在克里姆林宫，人们清楚地意识到，第三帝国迟早肯定会向苏联发起进攻。作出这样的形势判断，有着充足的理由。首先，与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共产主义以及共产主义的拥护者——共产党人的斗争，已成为德国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其次，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清晰明确阐述的纳粹长期纲领中，包含着新的“向东扩张”计划：肢解苏联，占领并“殖民”其欧洲部分，将其变为德国的粮仓和原料供应地。

与此同时，还必须考虑到其他因素。在长达十五年的时间里，苏联在政治上处于孤立状态，完全被排除在国际社会的生活之外，没有任何条约能保障其安全，也没有盟友在遭受攻击时提供支持。正是这一情况，使苏联成为最具吸引力的侵略目标。因此，尤其要铭记1927 年苏英关系的严重危机，甚至在“绥靖”政策出现之前，就不能排除最危险的情况，即伦敦、巴黎和柏林之间达成协议的可能性，英国试图将纳粹的侵略野心仅仅引向东方，指向苏联。

诚然，在作出这些预测时，必须考虑到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苏联和德国没有共同边界，它们之间隔着波兰。因此，事态的进一步发展完全取决于华沙所采取的立场，取决于它将推行的政策。因为一旦西方民主国家与纳粹政权达成协议，波兰人将被迫允许德国军队通过其领土。但这样的决定对波兰本身也构成了直接威胁，根据《凡尔赛和约》，波兰的西部和北部土地从德国分离出去。

最后，克里姆林宫非常清楚，苏联还没有为战争做好准备，更不用说与像德国这样强大的对手作战了，而且很可能是独自作战。由于军事技术力量薄弱，苏联在未来几年内也不太可能做好准备，而这是由于缺乏足够强大的国防工业，尤其是坦克和航空制造业，这些行业刚刚因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而终于获得了必要的基础。

所有这些情况促使克里姆林宫坚持不懈地寻求摆脱对其极为不利的局面的出路。最终得出唯一可行、最明智的办法——尽可能迅速地发起建立一个涵盖整个欧洲的集体安全体系，而不是像 1925 年《洛迦诺公约》所设想的那样，只涵盖欧洲西部。这样一个体系，一方面应包括法国和比利时，另一方面应包括波兰、捷克斯洛伐克、苏联，可能还包括波罗的海国家。因为只有这样一个遏制体系的存在，才意味着如果德国发动侵略，无论在西方还是东方，它都必然要面临两线作战，而这是德国最想避免的。这个体系也消除了波兰对苏联的潜在威胁。

1933 年 12 月 19 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采取了一项极端的、本质上是激进的措施：面对不再是想象中的，而是完全真实、可怕的国家生存威胁，终于不再寄希望于已经明显成为乌托邦的世界革命，并放弃了惯用的“阶级”外交政策路线。自 1926 年《拉帕洛条约》和《柏林条约》以来，首次不再以对所有共产主义和反殖民运动、示威和起义的无条件、全方位且几乎公开的支持为导向。摒弃了一切导致苏联自我孤立、使其长期与国际社会对抗（有时甚至接近对抗）的因素。那天政治局作出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决定，将“在已知条件下”加入国际联盟作为新道路上的第一步，以便日后能够采取后续行动。在这个国际组织的官方框架内“缔结一项关于共同防御来自德国侵略的地区性协定”。

事实证明，这一决定非常及时，因为 1934 年 1 月 28 日发生了一件具有象征意义的事件，这一事件可能从根本上改变欧洲大陆的力量对比，并预示着本已极其紧张的局势将进一步恶化。德国和波兰签署了为期五年的互不侵犯条约，这对莫斯科来说意味着侵略的直接威胁加剧。因为柏林和华沙之间密切合作的可能性，对德国来说，提供了避免两线作战的绝佳

机会，而对波兰来说，则提供了实现其长期野心的机会。恢复“从海到海”的波兰立陶宛联邦（1772 年的边界范围），即吞并立陶宛、白俄罗斯和乌克兰以及拉脱维亚东南部。因此，苏联外交不得不做出绝望的努力，以实现那些之前看似很容易实现的计划；同意扩大拟建体系的参与国：根据法国的提议，将英国纳入其中，而根据波兰的坚持要求，将德国也纳入其中，这无疑会拖延并使本已十分艰难的谈判更加复杂。

然而，起初一切进展颇为顺利。1934 年 9 月 18 日，苏联被接纳加入国际联盟，三个月后，终于为欧洲安全体系奠定了第一块基石。经过九个月艰苦、多次中断的谈判，12 月 5 日签署了苏法议定书，12 月 7 日签署了苏捷议定书。这些议定书规定，各方有相互义务“不参与可能损害《东方地区公约》的筹备和缔结的谈判”。随后，1935 年 5 月 2 日，苏联和法国在巴黎签署了为期五年的条约。该条约规定，在一方受到“任何欧洲国家”攻击威胁的情况下立即进行磋商，并向成为第三国无端攻击对象的一方提供援助和支持。5 月 16 日，苏联在布拉格与捷克斯洛伐克签署了内容类似的条约。不过，后者有一个重要的附加条件：只有在法国提供援助的情况下，该条约才生效。

当时，莫斯科试图为另一个地区性条约——太平洋地区条约奠定基础的努力完全没有结果。1933 年 11 月，苏联向美国提出建议，提议美国、中国、日本及其他相关国家签署互不侵犯条约，但这一建议甚至未经事先讨论或磋商就被华盛顿拒绝了。

在分析那些成为实现世界安全道路上难以逾越的障碍的困难产生的原因时，苏联领导层不可能不认识到最主要的一点。所有的失败首先源于苏联不被国际社会视为一个值得尊重和平等的伙伴。它即使没有引起恐惧，也引发了担忧，被视为某种“恐怖的化身”，游离于其他所有欧洲国家之外。它因其不断强调的阶级革命立场而显得声名狼藉。这种立场并非体现在个别外交官、国家领导人的言论中，也不是体现在某些最终可以被否认、在政府换届引发外交政策路线常规调整时可以被放弃的宣言中，而是体现在 1924 年的《苏联宪法》中。

正是在这部宪法中，在第一部分的第一句话里就宣称：“自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以来，世界各国分成了两个阵营，即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国际形势的不稳定以及新的侵略威胁，使得苏维埃共和国在资本主义包围面前建立统一战线成为必然。”这样，直接而明确地表达了其核心内容——苏联不仅要与整个世界保持距离，而且预示着它们之间未来的冲突。在此之后，在对革命运动给予直接支持之后——尽管是通过共产国际，但实际上没人会认真地将共产国际与苏联的首都莫斯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所在地、联共（布）、共产国际的支部以及当时的执政党区分开来，与兼任苏联政府首脑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的莫洛托夫区分开来——西方民主国家从它们的角度来看，完全有理由拒绝与克里姆林宫建立密切的政治合作，不与苏联共同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

因此，对于苏联领导层来说，至少在其计划中的努力能够建立起足够强大的国防工业、以最现代化的水平装备好陆军和海军之前的这段时间里，有很多事情要做。要让西方民主国家相信，作为伙伴和潜在的军事盟友，苏联是可靠的。要证明，鉴于苏联的地缘政治地位和经济潜力，应该以其应得的方式对待它。而要做到这一点，就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而要在实际行动中摒弃在其外交政策的两个层面——共产国际层面和国家层面上的以往那种声名狼藉的立场。与此同时，在政治制度方面尽可能地接近民主标准。

首先最明显、最引人注目的变化出现在共产国际方面。最初的表现是，1935 年初，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取代莫洛托夫担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一职。季米特洛夫是一位以勇敢坚定的反法西斯主义者形象赢得广泛声誉和好感的人。他在莱比锡审判中不仅能够对抗纳粹的“司法”，还迫使对方承认他的无罪，从而也证明了整个指控是捏造的，事实是被歪曲的，审判的借口——国会大厦纵火案是一场挑衅。

但共产国际路线、策略和战略的根本性转变，是在稍晚些时候，即 1935 年 7 月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发生的，这次大会绝非偶然地成为了它的最后一次代表大会。正是在那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被宣布了最主要的任务，即防止新的全球战争威胁。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摒弃工人运动的分裂，摒弃其政党和工会组织的分裂，与社会民主党、社会党国际采取一致行动。与“中产阶级”联合起来，在此基础上建立人民阵线。目标是：维护世界和平，不仅要保护苏联的安全，还要保护所有国家的安全及其国家利益，防止德国、意大利、日本的侵略。总之，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要求广泛采用一种斗争形式，并将其作为主要形式，而这种形式在 1934 年秋天还曾被它自己所拒绝，甚至是明令禁止的。它曾谴责这种形式，因为认为这是放弃国际主义原则，滑向民族主义。

几乎与此同时，克里姆林宫的领导层也开始对苏联的政治制度进行改革。然而，这里有一个非常值得密切关注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外部的、具有国际性质的因素并非决定性因素，而只是起到了一种特殊的催化作用，只是加速了原本自然发展的进程，推动了那些已经深入发展的进程。

20 世纪 30 年代中期，苏联进入了其发展的一个全新阶段。尽管第一个五年计划远未完全完成，但苏联已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一个正在发展的工农业国家。然而，就在那个时候，曾作为推动苏联实现巨大飞跃的主要动力——革命浪漫主义精神，那种真诚而纯洁的信念，即相信能够“建设”社会主义，而且还能在短短四五年内完成，紧接着就开始“建造光辉的共产主义大厦”——已经消耗殆尽。这种热情的冲动不可能持续更久，它已经消逝了。

取代那种狂热的是逐渐清醒地认识到并不那么乐观的现实。人们意识到，美好的未来不仅没有到来，而且仍然遥不可及。前方是漫长而同样艰难的岁月，需要进行艰苦、执着且平凡、日常的劳动。这种劳动确实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改变苏联，使它能够成为一个强大的现代化工业国家，但这还需要很长时间，而且在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方面，它将丝毫不逊色于世界上的主要工业国家，如美国、德国、英国。就像经常发生的那样，希望破灭了，留下的是未实现的梦想，并不可避免地引发了失望情绪。这种失望情绪之强烈，或许甚至超过了部分共产党人在转向新经济政策时的感受。只不过这一次，失望情绪不仅笼罩了共产党人，还波及了更广泛的民众群体。所有那些相信领导人及宣传鼓动的人，他们曾被反复坚定地告知：只需再忍耐一小段时间。领导人曾承诺：一旦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生活就会立刻变得更好。

工人阶级有理由为自己的成就感到自豪，为自己亲手创造的成果——冶金和化工联合企业、机床制造、汽车、拖拉机工厂、现代化的纺织厂以及许多其他成果而自豪。他们非常清楚所取得成就的重要性，但不能仅仅满足于此。因为当时仍然存在着极其严重的住房危机。人们日常生活中所必需的最基本的东西——食物、衣物、家具和练习本，仍然十分短缺。出现的物资短缺问题，政府试图以某种方式加以调控。通过保留下来的配给制来平衡物资供应，试图在一定程度上缓解问题的尖锐程度。但政府必须做出解释，回答那些令人困扰的问题。为什么在党的代表大会上官方宣布完成了五年计划，而承诺的、以可见和可感知的形式出现的社会主义却仍未到来？为什么那些制定五年计划并对其必然成果进行解读的人的预测和计算会如此错误？是否有人会为所发生的事情承担责任？

对于那些未被提出但却悬而未决的问题，唯一的、尽管非常特殊的答案就是“大清洗”。大规模的镇压主要降临到了共产党身上，更确切地说，降临到了党的各级干部身上，无论他们担任何种职务。在民众眼中，这些人应该为联共（布）和政府政策的失败、为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所遭受且仍在经历的困难承担责任。当然，“猎巫行动”——试图将工人阶级合理的不满情绪升华——不可能持续太久。为了国家的基本生存，它必须有一定的限

度。这只是在尚未找到真正最佳、唯一明智的摆脱当前困境的办法之前的一种手段。这种办法应该既能让国家的民众满意，也能让自苏联政权建立初期、转向新经济政策时就已形成的、完整的国家管理体系满意，尤其是让迅速扩张并成为国家经济垄断部门的体系满意。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前夕，甚至在计划实施初期，对于管理旧企业、正在进行现代化改造的企业以及大型建设项目来说，仅仅有一个中央机构——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ВСНХ）就足够了。除此之外，还有交通人民委员部（НКПС）。然而，到了五年计划实施中期，随着新投产企业数量的增加，原有的管理体系迫切需要进行重组。

例如，1929 年 12 月的集体化导致了国家经济中一个独立部门——农业部门的形成，并设立了相应的管理机构——农业人民委员部。几乎与此同时，由于对完善国民经济协调和长期规划的需求不断增加，苏联人民委员会（СНК）中负责此项工作的中央统计局（ЦСУ）被撤销，取而代之的是国家计划委员会（Госплан），该委员会虽然早在 1923 年就已成立，但此前所起的作用非常小。同样在 1930 年 1 月，从交通人民委员部中分离出了一个独立的水运人民委员部。最后，1932 年 1 月，轮到了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它被拆分为三个独立的人民委员部——重工业、轻工业和森林工业人民委员部。十个月后，农业人民委员部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从其中又分离出了另一个执行机构——谷物和畜牧国营农场人民委员部。

贸易管理体系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之前，贸易在很大程度上是私营的。1930 年 11 月，内外贸易人民委员部经历了第一次重大重组——被拆分为两个部门。一个是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继续从事原来单一贸易人民委员部的主要、首要任务。另一个部门得到了一个非常形象、直白的名称——供应人民委员部，其职责是通过配给制来分配国家所拥有的为数不多的、已经出现短缺的食品和日用品。

供应人民委员部的出现及其存在，非常直观地表明国家进入了一个极其危险的危机状态，而这种状态只是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后才得以部分克服。因此，1934 年 7 月底，对供应人民委员部进行了改组。在其基础上成立了两个在职能上完全不同的新部门：国内贸易人民委员部（1934 年 12 月 7 日取消面包、面粉和谷物的配给证，这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国内贸易的部分恢复）和食品工业人民委员部，这是另一个纯粹的生产、经济人民委员部。

这些结构性改革的结果是，苏联政府的组成发生了彻底变化，相应地，其所要解决的任务也发生了变化。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苏联人民委员会由七个部门的负责人组成，这些部门对于所有政治体制的国家来说都是常见和传统的：外交部、国防部（负责军事和海军事务）、交通部（负责邮政和电报）、交通部（НКПС）、财政部、内外贸易部、经济部（ВСНХ），以及仅属于苏联政权的三个部门——劳动部、工农检查院（РКИ）、中央统计局（ЦСУ）。但在相对较短的历史时期内，仅仅五年时间，苏联人民委员会就完全变了样。

到 1935 年初，苏联人民委员会的成员已不再是十个，而是十八个人民委员及其同等级别的负责人。不仅如此，主要的变化并非涉及传统部门，而是涉及，更确切地说，导致了那些仅属于苏联的部门的撤销。劳动部被撤销，其职能转交给了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ВЦСПС），这实际上意味着该理事会的主席进入了苏联人民委员会。1934 年 2 月，工农检查院正式改组为苏联人民委员会下属的苏维埃监察委员会（КСК），然而，原检查院的权力并非平均分配给了苏维埃监察委员会和 1933 年 6 月成立的苏联检察院。

但更为重要、甚至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另一件事。成立了十一个（包括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和两个交通人民委员部）纯粹经济性质的部门。由于它们的数量和重要性，这些部门坚持

不懈且并非毫无根据地要求参与确定国家政策。目前——还只是国内政策，它们试图将苏联的利益与自身部门的利益等同起来，使前者服从于后者。

与此同时，另一个进程也同样不可阻挡地在推进——地方政权机构的建立，地方自治的出现，尽管还处于初始阶段。1928 年 2 月，恢复了城市苏维埃，“作为城市和工人聚居区领土上的最高权力机关”。两年后，建立了与之类似的机构——农村苏维埃。1930 年 10 月，由于进行行政区划改革和撤销曾经取代县的州，开始组建区苏维埃。这些区苏维埃与边疆区苏维埃及其执行机构——执行委员会一起，构成了一个明确的自治体系的基础。

地方政权机构的变革不仅仅局限于它们的组建，还伴随着为其未来的独立性奠定基础。在这方面的首批行动是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 1929 年 1 月 9 日和 1930 年 12 月 15 日的决议。根据其中第一项决议《关于地方苏维埃财产权利的基本规定》，规定将部分具有全联盟和共和国意义的财产——土地、企业，以立法的形式转交给地方苏维埃，并固定下来，允许它们在“按照预算方式以及基于商业（经济）核算原则”的基础上获取收益。不久之后，这一相当笼统的规定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具体化，确定了以下内容：通过统一的农业税获得收入，从其他税收中获得提成，从属于全联盟、共和国和州管辖的企业、机构和组织获得收入；有权将所获得的资金用于维持其执行机构、警察、社会文化和经济机构的运转，用于建设学校和医院。

第二项决议《关于撤销联盟和自治共和国的内务人民委员部》，在更大程度上扩大了地方苏维埃的权力和权限，使它们重新获得了自国内战争结束后被遗忘的独立性。这体现在，首先将公用事业、警察、民事登记事务，以及对地方工业活动的直接控制权交给了边疆区和州苏维埃，在较小程度上交给了区和城市苏维埃。

最后，还有一项决议，这次是由苏联人民委员会和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于 1934 年 3 月 15 日共同颁布的《关于苏维埃和经济建设领域的组织措施》，为这一方向的发展指明了前景。这项新的国家法令要求进一步划分中央和地方政权的权限。它要求联盟的重工业、轻工业和森林工业人民委员部只保留“对真正具有联盟意义的企业的领导权”，并将“部分属于联盟和共和国机关管辖的企业移交给地方机关管理”。并且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在两个月内制定并提交给苏联苏维埃人民委员会审议属于苏联苏维埃人民委员会管辖的企业清单，以及从苏联苏维埃人民委员会管辖范围内移交给共和国、边疆区和州机关直接管辖的企业清单”。

所有这些都非常有说服力地表明，国家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份额逐年增加，已经达到了其可能的、可允许的最大值。这表明，如今即使是变得极其多样化且同时具有高度专业性的工业，也不能再仅仅由全联盟的机构来管理，这些机构不得不放弃部分权力。这还表明，原有的整个政权结构——“垂直的”、僵化的且无所不包的结构，已经无法全面领导和控制生活的各个领域。它需要将哪怕是一小部分权力下放给各地区。它迫使中央和地区的执行机构“横向”划分这些权力。所有这一切实际上意味着民主化，更确切地说，必然会导致民主化。

随着这种趋势的不断增强，越来越明显的是，以前通过的法令实际上只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措施。它们只是使日益庞大、分散的行政机构更加复杂，使其效率越来越低。这就迫使进行一场彻底的、全面的改革，这场改革旨在改变国家的政治制度。

1935 年 2 月初，就在与法国和捷克斯洛伐克签订条约的筹备工作进入最后阶段时，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例行全会上，莫洛托夫的讲话中阐述了即将进行的改革的主要原则以及一些不太明确的改革时间节点。几乎紧接着，2 月 6 日，这些内容就以立法形式呈现出来——成为苏联苏维埃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决议。

这些决议的核心是在两个方面进行根本性变革。首先，坚决摒弃已经过时的“无产阶级专政”，向人民政权过渡，起初这只是一种表面上的形式。这体现在“使选举制度民主化，用平等选举取代不完全平等的选举，用直接选举取代间接选举，用无记名选举取代公开选举”。但为了不让新的投票程序被视为完全放弃革命成果和社会主义理想，该决议还规定了第二个方向——“明确宪法的社会经济基础”。

显然，由于不可能仅通过对基本法的个别条款进行一系列修改来完成改革，该决议要求“选出一个宪法委员会，委托其制定修正后的宪法文本”。虽然为这项工作留出的时间没有具体确定，但也相当明确：“在新的选举制度基础上，尽快举行苏联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权力机构的下一次选举”。这样就杜绝了拖延解决问题、偏离既定目标的可能性。

为了让人们对即将到来的重大变革的必然性和方向毫不怀疑，在新宪法文本的起草和批准之前很久，就废除了一些在革命时期就已实施的重要阶级限制。1935 年 12 月 29 日，针对进入高等院校、中等专业学校的考生，废除了与社会出身相关的限制；1936 年 4 月 20 日，根据阶级状况，废除了对哥萨克人“在工农红军中服役方面”的限制。

克里姆林宫在宣布民主化并加以证实时，首先呼吁的对象不是苏联人民，而是西方民主国家。仿佛是在告诉它们，这个国家正在发生变化，从现在起应该将其视为一个值得尊重和平等的伙伴。现在，在所有事情上，包括在对国际社会来说极其重要的欧洲集体安全体系建设这一问题上，都可以而且应该信任苏联。在与德国和意大利等极权国家的斗争中，可以将苏联视为盟友。

而对于苏联人民来说，目前的改革并没有带来任何实质性的东西。它没有导致通货膨胀降低，也没有使食品和日用品的短缺现象消失。它也不意味着个人权利得到了保障，不过，当时还没有人想到这一点。更有甚者，非常具有象征意义的是，改革与一系列越来越严重的、接连不断的重大示范性政治审判同时发生，这些审判牵扯进了越来越多无辜的受害者。这些变化似乎在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第三层面的领域表现出来——在突然开始的对文学和艺术领域中“左派”思潮的斗争中，坚决予以根除。

1936 年初发表在《真理报》上的一系列社论，以前所未有的严厉态度谴责了芭蕾舞、音乐、绘画、建筑领域中的“形式主义”表现。与其说这是对 1932 年就已开始的进程的延续，不如说是对其的终结。1932 年，一些声名狼藉的极“左”作家、艺术家、建筑师、作曲家团体被解散，如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协会（ＲＡＰＰ）、俄罗斯革命艺术家协会（ＡＸＲＲ）、全苏无产阶级建筑师协会（ＢＯＰＲＡ）、俄罗斯无产阶级音乐家协会（ＲＡＰＭ），以及其他所有类似团体。同年（1932 年），“自上而下”地创建了新的、基于全新原则的单一联盟，将国内的创作知识分子——苏联作家、艺术家、建筑师、作曲家联合起来。这些联盟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实质上与仅仅三年后出现的法国和西班牙的人民阵线非常相似。

毫无疑问，这样的措施，就像当时还未提及的新宪法一样，应该反映出苏联向新的发展阶段的过渡。要为随后团结民众奠定基础，取代以往那种同样强制推行和鼓励的、基于“阶级”立场的分化，同时还要根除甚至在一些社会组织名称中仍然存在的、对某些（或许多）人来说带有怀旧色彩的词汇和概念——“无产阶级的”、“革命的”。而 1936 年初《真理报》的指示性文章只是完成了意识形态方面的改革。它们迫使创作者们甚至放弃“左派”（现在被称为“形式主义”）的纯粹外在特征，因为这种特征不可避免地会让人联想到“十月精神”，即破坏精神。

为了尽快实现预期目标，克里姆林宫于 1936 年 1 月 17 日成立了一个特殊的监督机构——苏联人民委员会下属的艺术事务委员会。这是一个行政权力机构，有责任每天、每时“领

导”，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监督“剧院和其他演艺企业、电影机构、音乐、美术、雕塑及其他机构”的活动，以及“培养剧院、电影、音乐和造型艺术工作人员的教育机构”的活动。

最后，苏联领导层的另一项决定，实际上是在稍早的 1934 年 5 月做出的，并以苏联人民委员会和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的联合决议《关于苏联学校中的公民历史教学》的形式公布，该决议也旨在让广大民众在意识中确认，革命阶段，即破坏一切的阶段，已经远远成为过去。国家由于其客观发展，已经回归到每个国家都具有的正常状态；与 1917 年因（为了克服经济和政治制度方面的巨大落后）而中断的状态重新接轨。因此，这份新的意识形态文件强调：“学校里教授公民历史时，不是以生动有趣的形式讲述最重要的事件和事实，并按时间顺序进行阐述，同时介绍历史人物的特点，而是向学生灌输社会经济形态的抽象定义。”并要求在 1935 年 7 月前编写新的世界史和本国史教材。

正是这样，在多个方面同时为整个社会接受即将迅速到来的变革做好了准备。而这个国家很快就非常接近这些变革了。

1936 年 7 月 11 日，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听取了宪法委员会主席斯大林同志的报告”，批准了提交审议的文本，并决定公布该草案以供全民讨论，11 月 25 日召开全联盟苏维埃代表大会对其进行正式批准。

在预定的日期，代表大会如期召开。斯大林首先作了报告，他竭尽全力，希望无论是在听他报告的人，还是后来阅读他讲话内容的人心中，都能对这部宪法以及这个国家即将确立的政治制度形成一种独特的认识。

首先，斯大林试图在讲话中，仅在他的报告里，重现 1924 年宪法第一部分《关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立的宣言》中所包含的那种明确的、毫不妥协的意识形态方向，而这部分内容已完全从新宪法中删除。他非常巧妙、专业地将苏联体制的本质从与其他资本主义世界进行武装对抗的绝对基础，转变为仅仅是“两种制度的竞争”层面。他极力想尽可能稳妥地掩盖这一创新的本质，因为如果愿意的话，很容易将其解读为一种退缩、右倾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他坚持围绕“社会主义”这一概念来构建报告。

斯大林宣称，国家十二年发展的最主要成果、主要成就在于：建立了拥有高度发达重工业的现代“社会主义”工业；建立了“世界上最大的”农业生产“以涵盖广泛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体系的形式”；消灭了剥削阶级；“列宁式”民族政策取得胜利。并且仅基于此，他得出了一个合乎逻辑但在理论上缺乏依据的结论：在苏联“基本上实现了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

然而，宪法文本本身与这类言辞上的构建大相径庭。其中一次都没有使用“社会主义”这个概念。取而代之的是，“社会主义的”这一表述被使用了五次——分别用于描述体制（第 126 条）、国家（第 1 条）、国民经济体系和所有制（第 4、5、118 条），还有一次使用了“社会主义原则”这一概念（第 12 条）。

斯大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其他核心概念——“无产阶级专政”、“联共（布）的领导作用”也同样随意处理：他毫不怀疑地宣称，新宪法“使工人阶级专政的制度继续有效，同样也使苏联共产党目前的领导地位保持不变”。但如果 1924 年宪法只是提到了无产阶级专政，却对政党在政治制度中的地位和作用只字未提，而新宪法草案中也完全没有这些内容，那还谈得上什么保持不变呢？专政，在第 2 条中出现的不是工人阶级专政，而是无产阶级专政，它被列为促成“工农代表苏维埃”的产生和巩固的因素之一，而工农代表苏维埃构成了国家政治制度的基础。此外，正是斯大林提出的宪法文本宣称：“苏联的全部权力属于城市和乡村的劳动者，由工农代表苏维埃行使。”至于联共（布），它仅在第 126 条中被提及，该条规定了公民的结社权利，但联共（布）的角色略有不同——“作为劳动者在为巩固和发

展社会主义制度而斗争中的先锋队”，“作为所有劳动者组织，包括社会团体和国家机构的领导核心”。仅仅是组织的领导核心，而不是政权体系、其行政和立法机构的领导核心。

斯大林深知，宪法中未纳入、未确定的政党领导作用问题至关重要，因此他不得不再次提及这一问题。他利用了与阶级相关的问题，用他自己的话说，阶级在这个国家仍然存在，尽管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据称，它们变成了工人和农民的“新”阶级，“他们的利益不仅不相互敌对，反而——是友好的”。正是这种情况，据说导致了“在苏联只能存在一个政党——共产党……”。但几乎紧接着，他又给出了另一个更接近事实的解释，说明了一党制体系的必然性。这一次，他抛开了那些虚构的抽象概念，解释说：在苏联社会中，目前只有那些表达、维护显然是反革命思想的人，才可能作为一种反对派政治力量表现出来。这些思想是恢复那个在全体人民眼中已经名誉扫地的旧制度的思想。

在介绍宪法草案时，斯大林即使想回避，也无法对宪法的一个重要特点只字不提，那就是刻意保留联邦制，各加盟共和国退出苏联的权利就体现了这一点。他坚持不懈地论证、说服所有人，这种国家体制是必要的。他宣称，他认为自己提出了非常有说服力的论据：“苏联各民族的面貌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他们之间的互不信任感已经消失，相互友好的感情得到了发展，这样，在统一的联盟（我强调的——Ю.Ж.）国家体系中，真正的兄弟合作得以实现。”他没有提及，实际上苏联是一个单一制国家。各加盟共和国通过政治结构、共同的行政权力机构紧密相连，最终在经济上也相互依存，这是出于非常实际的原因。为了能够有区别地解决问题，消除它们之间，尤其是在文化水平方面的巨大差距。为了证实报告的主要观点——社会主义建设，斯大林在列举苏联政权的其他成就时，没有提到，仅仅在 1930 年，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的原住民游牧民才开始向定居生活转变。没有提到在高加索地区和中亚地区，文盲现象仍然普遍存在。没有提到几乎一半的苏联人口不会说实际上作为国家通用语言的俄语。

斯大林只是简略地提到了宪法为国家生活带来的真正具有原则性的新内容，最重要的内容——公民的政治权利、自由，以及从现在起这些权利和自由毫无例外地给予所有人，消除了以往的“被剥夺权利者”这一类别。他将注意力集中在公民无论性别、教育程度、是否定居、民族或种族如何，都能获得这些权利上。这些权利包括：劳动权、休息权、因年老和丧失劳动能力而获得养老金的权利、人身不可侵犯权、住房权、通信秘密权。自由包括：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和示威自由、结社自由。斯大林说，在这样的表述中，这些权利和自由甚至比西方民主国家的权利和自由更进了一步。他完全清楚地回避了在这种情况下非常重要的一个“细节”——这些权利和自由缺乏任何明确表述的保障，而只有这些保障才能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他认为没有必要，如果他想的话，也没有对这一点进行解释：实际上，新宪法是“为未来成长而准备的衣服”，是为遥远的未来制定的。它首先假定要完成文化革命，然后，只有在全民识字的基础上，而且要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才会出现、确立公民社会。公民要认识到自己是权力的唯一来源和承载者，要学会行使自己的权利和自由，做出有意识的选择。

斯大林也没有引起人们对另一个方面的普遍关注——旧制度的延续。实际上，仍然存在着不受控制的行政机构，其结构是“垂直的”、无所不包的，建立在从下到上绝对无条件的服从基础上，从城市和地区、州和边疆区的执行委员会，经过自治共和国和加盟共和国的人民委员会，一直到苏联人民委员会。1924 年宪法在其第二部分（主要部分）的十一章中，有九章涉及到这个结构，1936 年宪法在十三章中有八章涉及到它。此外，如果最初只有十个人民委员部（包括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那么现在已经有二十三个了，还包括各种委员会。它们的数量增加完全是由于部门性人民委员部的增加，这是非常具有象征意义的。不过，斯大林欣然回应了再设立一个部门性人民委员部——国防工业人民委员部的提议。

正是这样，对 1936 年宪法的意义和评价就出现了两种解读方式。一种是那些根据斯大林的报告来理解宪法的人，包括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苏联广大半文盲民众，他们墨守成规，习惯性地把承诺当作现实，传统地把对遥远未来的想象移到当下。另一种是极少数人，那些直接研究基本法文本的人，他们批判性地将其与国家的现实生活进行对比；这些人根据自己的政治观点和信念，在新宪法中看到了革命政党蜕变的证据，看到了在斯大林的影响下它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忘记无产阶级和世界革命利益的表现。或者，恰恰相反，看到了厚颜无耻的欺骗和伪善，看到了利用自由宣言来掩盖可怕的专横、完全无视公民权利和自由的企图。

但无论如何，这部立即被官方宣传称为“斯大林式”的宪法，于 1936 年 12 月 5 日由苏联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通过，从根本上改变了国家的政治制度。它为真正的民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当时它只是宣布了民主的三个基本原则：人人权利平等；政权属于全体人民（从法律意义上讲是“劳动者”，而正如这部宪法和斯大林所宣称的，“不劳动者”已经不存在了）；所有政权机构和构成苏联政治基础的苏维埃的选举制。诚然，还缺少其他类似的原则：权力必须“横向”分立；对保障权利和自由的坚定保证。这些原则还需要催生出来。

与此同时，宪法的通过同样明确地预示、决定了另一件更令人担忧的事情。首先是，在公民社会出现之前，权力真空必然会被唯一实际存在、有能力且准备好填补这一真空的力量——官僚机构所填补。而在这个官僚机构内部，在国家所发生的各种进程的直接影响下，同样不可避免地会在其两个组成部分——旧的党官僚集团和在工业化进程中崛起的技术官僚集团之间展开争夺绝对主导地位的斗争。

第二章

广大的官员群体——包括党内官员和苏维埃官员——很可能并没有完全意识到，通过新宪法必然会带来的所有变革的严重性和彻底性。当然，没有人敢公开承认或表达这种不理解。但正是所有那些在立法和行政权力分支中担任关键职位的人如此平静的状态，让克里姆林宫感到担忧和警惕。这使它对事件可能的自然发展结果深感忧虑。因此，在苏联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仅仅过去三个月后，1937 年 2 月 23 日召开的联共（布）中央全会上，几乎只专注于一个问题，尽管这个问题以三种形式呈现——“布哈林和李可夫案”、“破坏活动的教训”、“与托洛茨基分子及其他两面派作斗争的措施”，政治局不得不重新回到为苏联最高苏维埃（ＢＣ）选举做准备的问题上。

联共（布）中央书记、组织局（ＯＢ）成员、政治局候补委员，同时也是列宁格勒州委和市委第一书记的安德烈·亚历山德罗维奇·日丹诺夫，被委托就这个主题作报告，他不得不完全摒弃在苏联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讲话中曾使用的思路。摒弃那种相当间接的论述结构，这种结构在当时来说不过是常见的党内修辞。也就是说，新宪法主要反映了社会主义的胜利。而社会主义胜利最鲜明地体现在劳动权和受教育权以及经济增长指标上。然而，日丹诺夫在不自觉地揭示政治局势的真正意义时，得出了一个看似意外的结论。“如果法西斯胆敢在苏联的西北边境寻找机会（他作为列宁格勒州的代表发言——Ю.Ж.），那么我们将把列宁格勒工业所拥有的所有技术用于防御，在我们国家钢铁般的元帅伏罗希洛夫同志的领导下给予敌人沉重打击，让敌人再也不敢觊觎列宁格勒。”

在这次全会上，日丹诺夫首次作为党的新领导人之一亮相，他吸引了与会者的注意，提出了一个截然不同的观点。他强调的不是作为决定性因素的外交政策因素，而是国内政治因素。首先是“新的选举制度意味着苏维埃组织的活动将更加公开透明”。“意味着群众对苏维埃机关的监督加强，苏维埃机关对群众的责任也随之增强”。而且在他看来更重要的是：“实行普遍、直接和平等选举权的结果”将是最难以预测的，因此从当权者的角度来看也是最危险的，即“群众政治积极性的提高”。由此引出了当天的总体任务。“我们的党组织必须……为选举斗争做好准备。在选举中，我们将不得不应对敌对的宣传和敌对的候选人。”

日丹诺夫和整个政治局认为，摆脱这种相当复杂局面的出路在于，党要积极为参与竞选体系做好准备。要掌握民主的基本原则，准备好服从多数，并且要事先尽一切可能，甚至是不可能的努力，去赢得多数，使多数服从自己的意志。因此，安德烈·亚历山德罗维奇提议，作为一项尚未确定的决议草案，在最短的时间内，即在接下来的两个月内，对各级党组织——从基层到共和国一级——进行重新选举。他提议回到早已被遗忘的党章规范：实行民主集中制，完全摒弃实际上意味着上级任命的指派制度。他要求坚决摒弃实际存在的权力替代品——所谓的“三角关系”，即由党委会书记、企业或机构负责人、地方工会组织主席组成的团体。他毫不含糊地强调，“三角关系”“存在于正常选举机关之外”，这是“任何党内和苏维埃法律都没有规定的组织形式”。他总结道，为了让所有人都毫不怀疑政治局实现既定目标的坚定决心：“我们必须在无条件、全面贯彻党内民主原则的基础上，对党的工作进行改革。”

这些讲话清楚地表明，党官僚们，即那些不是通过选举而是被任命的人，非常担心自己的职位不保。他们不愿意参加伴随着工作报告的竞选性重新选举，这种选举不仅被允许，而且上级要求、几乎是必须进行的，会有令人不快的批评，以及对提名候选人的讨论。哈萨克斯坦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Л.И.米尔佐扬、土库曼斯坦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Я．А.波波克、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С．В.科西奥尔、西西伯利亚边疆区党委书记——Р.И.艾希、远东边疆区党委书记——И.М.瓦列基斯、亚速海-黑海边疆区党委书记——

Е.Г.叶夫多基莫夫、基辅州委书记——П.П.波斯特舍夫、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委书记——М.М.哈塔耶维奇、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部长 А.И.斯捷茨基、无神论者战斗联盟主席 Е.М.雅罗斯拉夫斯基以及其他一些人，以极为谨慎的方式提出了他们自认为相当有说服力的论据，证明在党组织中如此仓促地进行重新选举为时尚早，并且明确表示不希望在苏联最高苏维埃选举中实行直接和无记名投票。他们谈到了神职人员、被流放的富农的敌对政治活动有所增加。（不知是巧合还是必然，除了雅罗斯拉夫斯基之外，他们所有人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都遭到了镇压。）然而，他们中没有人有勇气——公开地！——投票反对日丹诺夫提出的决议。和以往在类似情况下一样，他们一致通过了该决议。而且他们没有看错。

党官僚们的担忧，尤其是对党组织重新选举可能出现对他们不利结果的担忧，最终被证明是毫无根据的。事实证明，按照日丹诺夫的提议进行重新选举，并且还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几乎是不可能的，原因有两个。第一个原因，纯粹是形式上的，是原有的行政区划被打破，进行了重新划分，而重新选举本应在这些行政区划单位内进行。

斯大林在苏联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发言时，认为有必要特别提及行政区划的混乱状况，对其进行了谴责并予以否定。“在苏联，”他说，“有些人非常乐意且不知疲倦地重新划分边疆区和州，这样做给工作带来了混乱和不确定性。宪法草案对这些人来说是一种约束。”但到了 1937 年春天，他自己却批准了对国家地图的又一次调整。1930 年 12 月 5 日，苏联由 83 个主要的行政区划单位组成：11 个加盟共和国以及在地位上与它们相当的最大城市——莫斯科和列宁格勒；22 个自治共和国、9 个自治州、5 个边疆区和 34 个州。一年后，在最高苏维埃选举前夕，这类单位的数量增加到了 97 个（因为成立了一个边疆区和 13 个州），又过了一年半，由于同样的原因，数量已经增加到了 103 个。

随着新的行政区划单位的设立，自然而然地，在没有重新选举或选举的情况下，也建立了相应的管理机构：边疆区党委、州党委、执行委员会，与此同时，也为官员们提供了新的“工作岗位”。许多从基层提拔上来的人，首次担任重要职务，虽然权力不大，但毕竟有了权力，他们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接受严格的考验，在“自然选择”中生存下来。只有那些能够凭直觉理解并将不成文的游戏规则视为自己的规则的人，才能保住职位，维持地位，并获得在等级制度中向上晋升的机会。他们意识到，自己只是严格的垂直权力结构中的一个环节，而这种结构已经稳固地维持了不止一个世纪。因此，他们不是对党员负责，也不是对民众负责，而是对上级领导负责，他们的命运完全取决于上级。他们存在的意义是在自己的层面上监督上级指令的执行情况。尽可能地做到让“向上”的汇报都是胜利的消息。否则，他们就会被指责任务失败，最好还能加上一句，那些人已经受到了惩罚。

正是这个数量每月都在增加的官僚群体，在最后时刻意识到了威胁着他们的危险，并对日丹诺夫相当明显的暗示做出了反应。他们占据了所有的管理职位，包括党内和苏维埃的职位，充分利用了在 1937 年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在自己的队伍中不断寻找各种“敌人”——“托洛茨基分子”、“布哈林分子”、“破坏分子”、“两面派”、“外国间谍的奸细”。

2 月至 3 月中央全会的主要决议——将布哈林和李可夫交付审判——推动了大规模镇压的浪潮，实际上，大规模镇压在上一年秋天就已经开始，当时对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叶夫多基莫夫、巴卡耶夫进行了再次审判，并且联共（布）中央书记 Н.И.叶若夫取代亚戈达担任内务人民委员。就在中央全会召开的前夕，著名的关于“皮亚特科夫、谢列布里亚科夫、穆拉洛夫案”的“莫斯科审判”开始了。6 月，传来了对最著名的军事将领——图哈切夫斯基、雅基尔、乌博列维奇等人进行秘密审判的消息。叶努基泽和卡拉汉、布哈林、李可

夫、亚戈达、克列斯廷斯基、罗森戈尔茨、格林科、伊克拉莫夫、霍贾耶夫以及其他许多人的审判也在筹备中，即将开始。

在大约一年半的时间里，“老近卫军”几乎被完全摧毁。几乎所有那些创建布尔什维克党、领导十月革命、在内战和和平建设时期担任重要职务的人都遭到了清洗。就这样，以真正野蛮、纯粹亚洲式的手段，消灭了那个以世界革命、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为导向，庄严信奉无产阶级专政理想，试图（尽管缺乏现实的客观条件）“建设”社会主义，并紧接着以纯粹想象、公然乌托邦且因而教条的形式建设共产主义的政党。

与此同时，绝非偶然的是，在“大清洗”的浪潮中，1932 年暂停的加入联共（布）的程序得以恢复，这不仅导致了党的组成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而且使党得到了彻底的重生。在普遍怀疑、无耻告密（必然导致逮捕）、肆无忌惮的恫吓的氛围中，党内的气氛迅速发生变化。有思想、有信念的共产党员不得不退居幕后，尽量不引人注目。而那些新加入的人则越来越多地宣扬自己。那些昨天还是普通人的人，他们当然从未参与过任何反对派活动，总是谨慎地远离政治。他们从原则上对政治不感兴趣，因为他们只虔诚地崇拜一件事——自己的幸福。为了自己的幸福，他们愿意做任何事情，首先就是虚伪地热烈拥护任何政权。他们盲目地同意所提出的一切，只要是“上级”提出的，他们就会赞同一切。他们表现出恭敬的愿望，愿意执行任何命令、指示，甚至是暗示，只要这些来自上级。任何能让他们摆脱责任、使他们自己避免做出任何决定的事情，他们都愿意做。

在这样的条件下，在那些确实进行了党组织重新选举的地方，选举结果完全在意料之中。联共（布）党员没有利用出现的机会提名自己的候选人担任领导职务。他们毫无反抗地投票给了那些再次被“上级”强加给他们的人。确实，他们同样乐于并且几乎在第二天，如果有要求的话，会同样一致地高呼：“打倒他！”

这种由每周都在扩大的大规模镇压所引发和维持的普遍怀疑氛围，在另一方面也帮助了党官僚群体。它迫使极少数（事实证明是极少数）改革倡议者逐渐放弃了在苏联最高苏维埃选举中引入竞争的想法。而这本应成为民众接受民主的第一个实际课程。

对竞争的渴望——在新的苏维埃议会中一个职位有多个候选人——一直持续到 1937 年夏天。无论如何，在 6 月的中央全会上，人们还在非常明确和认真地讨论，如果在第一轮，然后在第二轮选举中，没有一个候选人获得必要的多数票，该怎么办。确实，在讨论中也不乏能体现政治局成员政治素养的情况。例如，М.И.加里宁毫不怀疑地提议“对（《选举条例》——Ю.Ж.）进行修正，规定在票数相等的情况下，问题将通过抽签来解决”。而К.Е.伏罗希洛夫则以军人的直率提出了最激进的方案——“用武力解决问题”。

但在寻找最公正的计票组织方式时，对国内政治局势出现了更出乎意料的评价。斯大林自言自语地思考着，他指出，在西方，由于多党制，不存在这样的问题。接着他又补充道：“我们没有多个政党。不管是幸运还是不幸（我强调的——Ю.Ж.），我们只有一个政党。”因此，他提议，作为一种权宜之计，至少让所有现存的社会组织的代表来监督选举。

在同一次 6 月的中央全会上，党官僚群体首次试图使自己免受因提出替代候选人而可能受到的冲击。他们开始公开与“苏维埃”官员划清界限，同时指责只有他们存在官僚主义，不愿意按照现行法律开展工作。表达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是 Я.А.雅科夫列夫，他是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的第一副主席，并且被委托作主要报告。

雅科夫列夫公然利用并同时歪曲了日丹诺夫 2 月讲话的主要观点，首先他故意强调：“如果根据我们一些执行委员会工作人员的表现来判断，如果根据我们一些苏维埃工作人员固执地对苏维埃工作中的不足保持沉默来判断，那么很难想象，在不久的将来，会在普遍、

平等和直接选举权以及无记名投票的基础上进行苏维埃选举。”然后他开始寻找必要的证据。

按理说，就雅科夫列夫所担任的职位而言，没人比他更应该清楚究竟是什么导致了苏维埃所存在的那些缺陷。所有这些缺陷无一例外，都是日丹诺夫所提及的党内结构中对所有党章规范的违反的体现。然而事实并非如此，雅科夫列夫对后者只字未提。他不承认正是这些问题才是一切弊病的根源，并且直接影响着两个实际权力结构的本质。他也没有谈及政治局（ПБ）和中央委员会（ЦК）之间关系的性质，反而固执地指责选举中的潜在对手存在此类问题。他仅仅指责对手犯下了主要过错——“用执行委员会取代苏维埃，用主席团取代执行委员会，并且主要将苏维埃全会用于在各种庆典场合夸夸其谈”。他还顺便提到，甚至连苏维埃的结构，似乎都不是由苏维埃自身依据法律来确定的，而是……由财政人民委员部的指令决定的。他以莫斯科为例具体说明，即使莫斯科的区苏维埃数量增加了四倍，这些区苏维埃也没有因此获得哪怕任何一点权利、义务或责任，甚至在城市建设方面也是如此。实际上，首都的所有权力几乎都掌握在莫斯科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主席 Н．А．布尔加宁手中，而非真正掌握在市苏维埃手中，更不用说掌握在 23 个区苏维埃手中了。

但无论雅科夫列夫多么努力地维护党内团体的利益，维护党的声誉，试图为苏维埃官僚机构那令人咋舌的不作为开脱责任，他还是不得不提及联共（布）在其中所扮演的负面角色。当然，他所指的并非党的所有机构，而仅仅是最基层的一个环节。“苏维埃中的党小组，”这位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主席不得不承认，“尤其是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中的党小组，常常变成了取代苏维埃工作的机构，变成了决定一切的机构，而苏维埃只剩下对预先拟定好的决议盖章批准的份儿。”并且他分享了自己认为从当前困境中摆脱出来的最理想方案。从形式上看，这只是他个人对于可能采取措施的看法，而且绝非在选举前夕实施，而是在一个非常不确定的未来。

“有必要，”雅科夫列夫说，“在党的下一次代表大会上提出建议，废除联共（布）党章中关于在苏维埃及其执行委员会中组建党小组的条款。”接着，他首次公开表达了一些观点，这些观点无疑表明了苏联现存政治体系的危机正在日益加深。他解释说，之所以要解散党小组，是为了“从今往后，苏维埃在经济、文化和政治领导方面的所有问题，以及人员任命问题，都由苏维埃及其执行委员会直接讨论并解决（此为我所强调部分——Ю．Ж．），而无需让共产党员承担通过并非党的机构的党小组、依据党的纪律为这样或那样的决议投票的义务”。他在论点的第二部分为选举产生的党的机构，即市委、州委、边疆区委、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留下了操作的空间。

如今已无法确定究竟是谁提出了这样一个建议，该建议意味着有必要赋予官方的苏维埃权力分支更大的自主性，同时相对削减党自身的权力。但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报告中的这一立场事先得到了政治局大多数成员的认可，尤其是斯大林的认可。В．М．莫洛托夫在全会上的简短发言也证实了这一点，他虽然措辞稍有缓和，但坚定地支持了雅科夫列夫的论点。“在一些同志的观念中，”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指出，“我们这里存在这样一种看法，即认为苏维埃机关是某种次要的组织，而苏维埃工作人员是二流的工作人员。”为了根除这种缺陷，莫洛托夫补充道，应该“让苏维埃、苏维埃机关以及苏维埃工作人员在工作中提升到更高的层次，提升一个档次”。换句话说，至少要使两个权力结构地位平等。

然而，无论是雅科夫列夫还是莫洛托夫，都不希望党失去权力。他们只是试图为党找到一种新的、更体面、更文明的活动形式，同时保留其原有的主导地位。其他领导成员则更直白地表达了他们未曾明言的想法。“候选人将由党和社会组织提名，”加里宁解释道。“……这意味着，这些社会组织在党的领导下参与选举，参与提名自己的候选人。”斯捷茨基也表现出同样不愿冒险、不愿真正接受民主的态度，他要求全会与会者：“我们需要提前

做好准备，确保不仅要推出我们的候选人，还要让我们的候选人在群众大会上得到讨论，要为他们进行宣传，等等，否则可能会出现相反的竞选局面。”

然而，即便这样一个解决选举问题的方案——从那时起，选举仅仅在纸面上还保留着民主、自由和竞争性——而且理应完全满足党官僚集团的利益，保障其未来，但这一方案绝非一蹴而就。领导层花了四个月的时间来思考，甚至可能还经历了激烈的意见冲突。直到 10 月 11 日，在当年的第三次中央全会上，才最终商定并明确了关于具体应如何提名和选举代表的总体意见，而且现在每个空缺职位只选出一名代表。这一意见的产生，一方面源于大规模镇压的氛围，另一方面也源于自革命和内战时期以来就存在的、那个时代对于政治斗争自然而然的看法，即政治斗争必然伴随着暴力。

莫洛托夫这次承担了主要报告人的角色，他代表政治局向各州委、边疆区委和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提出了三个相互关联、服务于同一个目标的任务。首先，“在整个苏联，最高苏维埃的成员中，平均而言，无党派人士应占比约 20%”，这样一来，就为党官僚集团预先确定了其在新成立的议会两院中的绝对多数地位。其次，“提名最高苏维埃代表候选人的所有工作，都必须真正置于党组织的监督和领导之下”，这使得代表团体的组建权依然掌握在党官僚集团手中。第三，“到 10 月 17 日，中央委员会必须收到经过审核的、真正的候选人，并且依据这些决定，我们将通过工人和集体农庄庄员大会来提名他们”。他以此方式警告所有人，最终决定权只掌握在领导层手中。

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还点名了那些被政治局委托从 10 月 17 日起开始审核候选人、组织提名和选举这两项活动的人，他们将领导中央选举委员会。委员会主席由 42 岁的彼得·格奥尔基耶维奇·莫斯科夫担任，他是一位资深的工会干部，自 5 月起担任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的书记之一。他的副手是 46 岁的奥托·尤里耶维奇·施密特，他曾是社会民主党国际主义者，此前曾在粮食人民委员部、合作社系统、教育人民委员部工作过，最近几年还参与了几次极地探险活动，因此被任命为北方海路管理局局长，自 1935 年起还是苏联科学院的正式成员。委员会秘书由 36 岁的格奥尔基·马克西米利安诺维奇·马林科夫担任，他毕业于莫斯科高等技术学校的两个课程，但一直在党的机关工作：自 1925 年起在中央委员会和莫斯科委员会任职，自 1934 年起担任联共（布）中央领导党的机关部门（ＯＰΠＯ）的负责人。

莫洛托夫的报告极为简短，极具信息性，且以公然的命令形式表述，报告中的任何一个观点都没有引发全会与会者的讨论。报告之后既没有进行讨论，也没有补充内容，甚至没有提出哪怕是微不足道的修正建议。这份报告被视为行动的战斗号召，因此与会者们表面上都表示完全一致地理解对他们的期望。发言者要么是汇报刚刚接到的命令的执行情况，要么是预先讲述他们所在地区存在的各种困难。但所有发言无一例外都透露出一种潜在的期望，即寄希望于新的镇压行动，认为这些行动将有助于克服重重困难。

例如，阿尔汉格尔斯克州委第一书记孔托林表示，在他负责的地区，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敌人太多了——“有被行政流放的人、特务，还有劳改营……各种各样的乌合之众。而现在，当‘三人小组’在开展行动，当我们开始处理这件事时，又额外揭露了 10 个反革命组织。我们请求并且还会继续请求中央委员会为我们增加第一类（即允许地方‘三人小组’超出预先规定的数量做出死刑判决。——Ю.Ж.）的限额，以便为选举做准备。”

Ю.М.卡冈诺维奇，Л.М.卡冈诺维奇的弟弟，下诺夫哥罗德州委第一书记，却汇报说同样的事情已经完成了。“自 5 月以来，”他自豪地汇报所做的“工作”，“已经逮捕了敌人——托洛茨基分子、布哈林分子、间谍、破坏分子、恐怖分子——1225 人，其中包括在汽车厂、第 21 工厂、第 92 工厂及其他工厂搞破坏的人。逮捕了 2860 名富农白卫军分子、叛乱分子……”Ａ．Ａ.沃尔科夫，白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同样清晰地向全会报告

了主要“敌人”——波兰侨民和波兰学校教师的清除情况。并且他还展示了在解决所提出的问题时罕见的灵活性。“我们这里有，”他分享自己的经验，“像雅库布·科拉斯、扬卡·库帕拉、亚历山德罗夫斯基这样的作家。说实话，前两位曾被敌人拉拢。但他们是白俄罗斯最知名的人物，所以我们必须把他们从敌人手中夺过来，让他们靠近我们，我们甚至认为有必要让他们进入民族苏维埃。”

只有库尔斯克州委第一书记佩斯卡尔的发言听起来格格不入。这一发言成为了未来对大规模镇压进行重新评估的先兆。它表明，太多的逮捕是没有根据的、凭空捏造的，是建立在虚假指控之上的。“……他们因一些琐事就进行审判，”佩斯卡尔说。“他们非法审判，当我们发现很多人是被非法审判后，我们向中央委员会提出了这个问题，斯大林同志和莫洛托夫同志大力帮助了我们，派了一个最高法院和检察院的工作组来复查这些年来的这些案件。结果发现，这个工作组在 16 个地区工作了三周后，最高法院和检察院的这个工作组取消了56%的判决，因为这些判决是非法做出的。此外，45%的判决被发现根本不存在犯罪事实。”

在 10 月的中央全会之后，从各州委、边疆区委第一书记及更高级别的广大领导层中，不应再有丝毫疑虑，即将到来的选举胜利已为他们所确保。这一胜利势在必得，不仅是因为所有候选人都是“自己人”。而且还因为要参与投票的是一个在政治和文化上近乎文盲的民众，这个国家昨天还是一个以农民为主的国家。在这些人的意识中，几个世纪以来根深蒂固的家长制观念、公社式的“团结”观念依然存在，这种观念绝不允许个人（如果有个人出现的话）通过做出自己的决定、表达自己的观点来展现自我。它迫使所有人必须绝对地一起做所有事情，像一个人一样，而不考虑后果。在任何情况下，哪怕是对自己极为不利的情况下，也要始终支持政权本身，而且只支持政权。

与此同时，也不能忘记另一个同样重要的、影响选举结果的因素。那就是党的领导层发表的声明，该声明明确表达了想要展示联共（布）在社会生活和国家管理中的作用有所降低的意图。也就是说，在新的形势下，苏联的政治舞台上似乎出现了类似人民阵线的东西——一种独特的、在宣言上存在的“共产党员和无党派人士联盟”。

1937 年 12 月 7 日，在选举前不到一周的时间里，全国所有报纸都刊登了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给所有选民的“呼吁书”，其中反复出现、略有变化，但本质上只有一个核心思想：“布尔什维克党在选举中以联盟的形式，与无党派的工人、农民、职员、知识分子一起参选……以联盟的形式、与无党派人士一起参加选举，与工人和职员的工会、共青团及其他组织和团体结成联盟参加选举。”在篇幅不长的文本中，不断地解释、说明、阐释，使这样的观念深入人心，即党不再像以前那样是统治党。党自愿将权力让给劳动者，也就是人民：“代表候选人将是共产党员和无党派人士共同的候选人，每一位无党派代表也将是共产党员的代表，就像每一位共产党员代表也将是无党派人士的代表一样。”

但即便这样一种极其简化的对新政治体系的解释，本应能让每个人都理解、被所有人完全明白，克里姆林宫仍认为不够。因此，就在选举的前夕，12 月 11 日，斯大林在大剧院发表了一篇总体上让人难以理解、极其模糊且几乎毫无实质内容的演讲，他利用宪法的一项基本原则——代表的罢免权，再次强调、突出了他当时认为最为重要的一点。“代表，”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说，“应该知道他是人民的公仆，是人民派往最高苏维埃的代表，他应该按照人民给他的指示行事。”

是的，确实如此：从现在起，代表不再是党的公仆，而是人民的公仆，是这个国家所有公民的公仆。斯大林正是以这种方式揭示了党和无党派人士联盟的本质，一个月前莫洛托夫曾将这个联盟称为“社会的道德政治统一体”。他以这种方式表达了苏联新政治体系的本质。

选举进行得完美无缺，“联盟”中所有候选人按计划全部获胜，这使得能够在规定的时间内，恰好一个月后（1938 年 1 月 12 日）召开新的苏联议会——苏联最高苏维埃第一届第一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选举出了立法权力分支的高级官员，并从法律上确认了在几天前政治局会议上组建的苏联人民委员会。当时的苏联人民委员会的组成仍然反映出尚未平息的镇压行动的结果。

在过去充满灾难的 1937 年里，绝大多数州委、边疆区委第一书记，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州和边疆区执行委员会主席，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即便不是多次更换，至少也都更换过一次。在这种背景下，高层权力机构的情况看起来几乎是祥和的，显得非常稳定。政治局的 17 名成员和候补委员中，只失去了两人：Г．К．奥尔忠尼启则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根据官方说法是死于心脏病发作），Я．Э．鲁祖塔克被捕，与此同时，Н．И．叶若夫加入了政治局。事实上，联盟一级的党官僚集团的实际受害人数应该扩大，还应包括 Н．К．安季波夫，他是组织局候补委员，但在被捕前担任着与奥尔忠尼启则类似的职位。

所有这一切，表明了权力高层的权力格局没有发生变化，这使得政治局能够加强自己的地位，将所有关键的国家职位都保留在自己手中。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依然是 В．М．莫洛托夫。他的副手是 В．Я．丘巴尔、А．И．米高扬，还有刚刚从基辅调来的 С．В．科西奥尔，他之前在基辅领导乌克兰的党组织。最重要部门的负责人、人民委员分别是：国防人民委员 К．Е．伏罗希洛夫，内务人民委员 Н．И．叶若夫，重工业人民委员 Л．М．卡冈诺维奇，农业人民委员 Р．И．艾希。М．И．加里宁被选为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Г．И．彼得罗夫斯基被选为副主席之一，А．А．安德烈耶夫被选为联盟院主席，А．А．日丹诺夫被选为联盟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这样一来，如今专门负责党务工作的只有 И．В．斯大林和 Н．С．赫鲁晓夫，赫鲁晓夫从 1 月 14 日起同时取代了 П．П．波斯特舍夫成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并取代了 С．В．科西奥尔成为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

实际上，政府的组建并未带来任何新的变化。尽管与 1924 年相比，政府规模确实整整扩大了一倍（除了主席和他的三名副手外，还包括 26 个部门的负责人：21 个人民委员部、国家计划委员会、中央监察委员会、国家银行以及艺术事务委员会、高等教育委员会），但这样的增长在宪法草案中就已经有所规划。而对苏联人民委员会宪法的最后一些细微修正，是在会议召开前不久做出的。1937 年 8 月底，成立了机器制造人民委员部。12 月底，从海军人民委员部中独立出了海军舰队人民委员部（НКВМФ），同时，物资储备委员会改组为人民委员部。

苏联人民委员会中的人事任命也没有带来根本性的新变化。其大多数成员保留了原来的职位，实际上只有五个候选人需要确认（但这是在政治局会议上，而非在会议上确认）。由于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 Г．И．斯米尔诺夫被捕，他的职位由其副手 Н．А．沃兹涅先斯基接任，沃兹涅先斯基不久前从列宁格勒调来，他曾在列宁格勒领导州计划委员会。实际上，出于同样的原因——Н．В．克雷连科虽尚未被捕但已被预定要被捕——司法人民委员由 Н．М．雷奇科夫担任，雷奇科夫此前长期担任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成员，并且担任了几个月的俄罗斯联邦检察长。同样，由于 Н．В．苏季因被捕而“空出”对外贸易人民委员的职位，Е．В．奇维利耶夫获得了晋升，他的职业生涯在那个时代颇具代表性。他曾是对外贸易学院教学部门的负责人，仅仅担任了三个月的对外贸易人民委员副手，而现在就坐上了令人向往的政府成员的位置。只有两个人因为在最后几天受到严厉批评而失去了职位：物资储备委员会主席科尔佐夫，由在高尔基州从事“农业相关工作”的 М．В．波波夫接替；艺术事务委员会主席 П．М．克尔任采夫，他的继任者是《真理报》艺术部门编辑 А．И．纳扎罗夫。

正因如此，对于那些了解会议进程的人来说，可能会产生一种一切照旧的印象。新宪法丝毫没有改变国内的政治氛围，也没有带来承诺的缓和，甚至没有对无所不能的党官僚集团的权力进行哪怕是轻微的限制。但就在莫洛托夫向代表们介绍政府组成的同一天，1938 年 1 月 19 日，《真理报》发表了关于中央全会结束的消息及其主要决议《关于党组织在开除共产党员出党方面的错误，关于对被开除出联共（布）者的上诉采取形式主义官僚态度以及消除这些缺陷的措施》。

即使只是粗略地浏览一下该决议的文本，也能明白：大规模决策的合理性受到了质疑。不仅如此，对于违法行为的责任，并非如决议标题所显示的那样归咎于党组织，而更像是归咎于其领导者，他们被指责为个人野心作祟。以下三句话被特意用粗体标出绝非偶然：

“……在共产党员中，存在一些尚未被揭露和曝光的个别野心勃勃的共产党员，他们试图通过开除党员、对党内成员进行镇压来凸显自己并获得晋升，试图通过对党内成员实施残酷镇压来保护自己，以免因缺乏警惕性而受到可能的指责。”

“是时候揭露这些所谓的共产党员，并谴责他们是野心家了，他们试图通过开除党员来谋取私利，试图通过对党内成员的镇压来过度自保。”

“……我们的许多党组织及其领导者至今仍未能识破和揭露那些巧妙伪装的敌人，这些敌人试图通过高喊警惕性来掩盖他们的敌意，并在党内保住自己的地位，——首先，其次，他们试图通过采取镇压措施来打击我们的布尔什维克干部，在我们的队伍中播下不信任和过度猜疑的种子。”

实际上，整个决议虽然使用了那个时代常见的术语：“敌人”“叛徒”“揭露”“清除干部”等概念，但应该让读者感到震惊。可惜的是，那些习惯了“敌人”一词背后标准定义（如“托洛茨基分子”“布哈林分子”“两面派”“间谍”）的人，首次没有看到这些熟悉的定义。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词汇组合——“有野心的共产党员”，结果表明，他们才是人民真正的敌人、叛徒和两面派。这样对所发生事件的评价，本应在人们心中引起困惑，颠覆所有已形成的观念，促使人们思考所发生的事情，并对所做的一切感到震惊。所有这一切都让人对党的领导层突然决定做出如此重大的转变感到惊讶：“坚决结束大规模、残酷的开除党员出党的行为”，“在三个月内完成对所有被开除出党者上诉的审查”，“追究那些诽谤党内成员的人的党内责任”，但尤其令人惊讶的是第 9 点——“禁止不正确、有害的做法，即一旦有人被开除出联共（布），就立即解除其职务”，因为正是这样的行为往往会导致自动逮捕。

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当然，只是对少数享有特殊荣誉的人而言），尽管会议记录是以“绝密”为标识、通过印刷方式发布的，但它无疑产生了影响。在会议记录中，有马林科夫 1 月 14 日所做的报告，而该报告正是上述决议的基础。因为其中包含了当时尚不为人知、真正令人恐惧的信息。

“1937 年，”格奥尔基·马克西米利安诺维奇报告说，“总共约有 10 万名共产党员被开除出党，而且如果说 1937 年上半年有 2.4 万名共产党员被开除出党，那么同年下半年就有 7.6 万名共产党员被开除出联共（布）的队伍。与此同时，党组织中至今仍有不少于 6.5 万份上诉未得到审理。这意味着，同志们，6.5 万名被开除出党的共产党员对被开除的正确性提出了异议。而联共（布）中央党的监察委员会的工作实践表明，许多提出上诉的人，对自己被开除出党是有正当理由表示反对的。在党的监察委员会已经由州委员会审理了被开除出党者上诉的大多数党组织中，恢复党籍的人数占被开除总人数的 40%至 75%。”

这样一来，马林科夫绝不仅仅是在表达自己的观点，他描述了党在 1937 年 2 月至 3 月中央全会之后所处的状况。他毫不含糊地承认，联共（布）受到了专横行为的冲击，由于这

种专横，产生了“一种虚假的、彻头彻尾的错误印象，即我们周围全是敌人，诚实的人很少”。并且他对到处存在的专横行为做出了解释：“在开除党员这件事上的歪曲事实的情况广泛传播，主要是因为党组织及其领导者未能揭露和曝光个别有野心的共产党员，这些人试图通过开除党员、对党内成员进行镇压来表现自己并获得晋升，他们试图保护自己，以免因警惕性不足而受到可能的指责。”总之，他毫不含糊地对斯大林在 2 月至 3 月中央全会上的讲话以及全会决议本身进行了重新审视。在那次讲话中，斯大林发出了强有力的呼吁，要求“加强警惕性”，全会决议也要求联共（布）的所有成员都这样做。

几乎所有参加 1 月全会的人，都非常清楚对他们的期望，他们想象着如果不服从、对已经讨论过、审定过并得到政治局批准的报告的主要内容表示异议会面临什么后果，所以他们像往常一样乐于赞同马林科夫的观点。他们总体上承认他无疑是正确的，同时又试图为自己开脱。当时的一段简短讨论，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报告人与阿塞拜疆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巴吉罗夫之间的对话，非常能体现当时的氛围。

“马林科夫：1937 年 12 月 5 日，阿塞拜疆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一次会议上确认开除 279 人出党，在巴库市开除了 142 人。

巴吉罗夫：也许他们中的一些人被捕了？

马林科夫：我会提供一份关于有多少人被关押的说明。你先提供一份说明，然后我再提供。

巴吉罗夫：你先说，你是报告人。

马林科夫：对于每一个事实，我都有相应的边疆区委员会的文件。如果您愿意，我可以说出这个数字——279 人中有 63 人在被开除出党一个月后被捕。我有来自阿塞拜疆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密码电报。

巴吉罗夫：这份密码电报不完整。我可以列举一些事实，有些现在应该被捕的人却还在逍遥法外。

马林科夫：巴吉罗夫同志，既然他们还在逍遥法外，那就说明他们没有被捕（笑声）。

巴吉罗夫：我花了六个月的时间争取，却没能争取到时间来讨论这个问题。

马林科夫：我想继续说，关于这 142 人，阿塞拜疆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甚至认为没有必要指出他们所决定处理的人的姓氏，而在会议记录中，只是按每个区列出开除的人数，然后像一个好会计一样，算出总数并指出——开除 142 人……”

唯一坚持己见，为进行大规模逮捕的正确性和必要性辩护的，是政治局候补委员 П.П.波斯特舍夫，他在 1937 年 3 月至 1938 年 1 月 9 日期间担任古比雪夫州委书记。他发言是为了解释解散 34 个区委以及批准开除该州两千名共产党员出党的原因。

“……我计算了一下，结果是，敌人潜伏了 12 年，”波斯特舍夫说，他指的是州党组织的领导。“在苏维埃这条战线上，同样是敌对的领导在掌权。他们一直潜伏着，培养自己的势力。例如，在我们的州执行委员会里，甚至包括技术人员，都是最顽固的敌人，他们承认自己的破坏行为，并且表现得很嚣张。从州执行委员会主席、他的副手、顾问、秘书——全都是敌人。执行委员会的所有部门都被敌人渗透了……现在看看区执行委员会主席，全都是敌人。66 个区执行委员会主席——全都是敌人。绝大多数的第二书记，我就不说第一书记了，都是敌人，而且不只是敌人，里面还有很多间谍：波兰人、拉脱维亚人，他们网罗了各种乌七八糟的败类……然后是党的监察委员会特派员——也是敌人，他的两个副手都是间谍敌人。再看看苏维埃监察机构——都是敌人。

布尔加宁：这么说，没有一个诚实的人了。

波斯特舍夫：我是说领导核心。在领导核心中——从区委书记、区执行委员会主席中几乎没有一个诚实的人。你们为什么要感到惊讶呢？”

波斯特舍夫不顾一切，继续到处寻找敌人并揭露他们，结果陷入了危险的孤立境地。因此，两个小时后，他成为了一种仪式性的牺牲品——他被公开羞辱并被从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候选人中除名。然而，实际上，并非只有波斯特舍夫不认为大规模开除党员和镇压行动有什么不寻常、有预兆性、可怕或违法的地方。在全会上有这种想法的人相当多。Л.М.卡冈诺维奇以一种独特的方式表达了他们的观点，仿佛是对所有发言进行了总结。他平静地说：“我认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过去的一年——这个清除党内敌人和人民敌人的一年里，对于诚实的布尔什维克来说，尽管他们在工作中表现出了天真和盲目，但这是一个接受布尔什维克教育和锻炼的一年，而这种教育和锻炼是我们在平常时期，即使十年也无法获得的。”

不久之后，另外两名政治局成员也公开支持卡冈诺维奇的立场。日丹诺夫在 1 月 21 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的报告中，在他称为“彻底清除人民的敌人”的部分特别强调了进一步“揭露”的必要性。而伏罗希洛夫在 2 月 22 日为纪念红军成立 20 周年的庆祝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到了“叛徒和间谍”，呼吁整个军队、红军战士和指挥人员提高“警惕性”。

这种公开表达的观点，与马林科夫报告的主要内容以及中央全会的决议明显相悖，这表明政治局成员之间缺乏统一的立场。然而，主张摒弃革命精神的人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果。他们不仅在 1 月的中央全会上对党官僚集团给予了沉重、明显且影响深远的打击。在此之前，他们还成功地从宪法文本中删除了对无产阶级专政的直接提及，坚持要求选举不再按照生产单位进行（这曾是苏维埃的主要特征），而是按照地区选区进行——这种做法以前曾被谴责为“资产阶级”民主的丑恶表现。

同样在 1938 年初，另一种新的趋势也非常明显地显现出来，这预示着未来政治体系的轮廓。1 月 4 日，《真理报》发表了联共（布）中央一份以前难以想象、不可思议的文件——《关于雅罗斯拉夫尔市联共（布）委员会的错误决定》。在这份文件中，以市委第一书记在任命“红色佩列科普”纺织联合企业和一家织布厂厂长时的干预为正式借口，明确指出：“联共（布）市委无权任命和解除隶属于联盟人民委员部的企业的厂长职务。”该报随后的报道不仅进一步阐述，而且明确了对人事变动态度的转变。在 1 月 6 日的头版报道中指出：“必须由一长制领导来做决定……一长制不可动摇。”1 月 27 日，列宁格勒市委书记 В.茨韦特科夫和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委书记 С.索博列夫在头版及随后的文章中公开呼吁提拔非党人士担任领导工作，其核心思想昭然若揭。

不久之后，在实施政治改革的道路上又迈出了可能是最重要的一步。斯大林不得不放弃他的一个主要理论观点，正是这个观点使他在 20 世纪 20 年代中期通过创造性地“发展”列宁主义，在党内领导权的争夺中获胜。这个观点诞生于 1924 年底与托洛茨基的激烈论战中，最初只是使苏联共产党产生了分歧，后来又使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分裂为两个势不两立的派别。这是一个纯粹的理论观点，它为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大跃进以及大规模镇压提供了意识形态上的依据。

斯大林完全不顾自己实际上否定了自己的大多数文章和讲话这一事实，表面上毫无缘由地重新回到了一个对整个党来说至关重要的问题上：在像苏联这样的一个国家单独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性问题。

1938 年 2 月 14 日，就在苏联最高苏维埃第一次会议开幕和 1 月中央全会召开仅仅一个月之后，《真理报》在通常用于刊登理论材料的第三版上，发表了《伊万诺夫同志的信和斯

大林同志的答复》。实际上，这是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以他非常喜爱的问答形式写成的文章，这种形式他很可能在第比利斯神学院学习期间就已经掌握了。在“答复”中，在发表了关于社会主义取得全面胜利的所有慷慨激昂的声明之后（既提到了新宪法的通过，也提到了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总结），斯大林突然又回到了那个关键问题：“在社会主义只在一个国家取得胜利，而资本主义包围仍然存在的情况下，能否认为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胜利是最终的，也就是说，能够免受军事进攻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呢？”

首先，他似乎不是在表达自己的观点，而是援引了党的第十四次代表会议（1925 年 4 月）的决议，他说：“列宁主义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列宁主义教导我们，从完全保证防止资产阶级关系复辟的意义上来说，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只有在国际范围内才有可能。”紧接着，他以惯有的毫不谦虚的态度，直接提到自己，斯大林补充道：“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是对干涉企图的完全保证，也就是说，也是对复辟的保证。”但他认为，对于证明这个被遗忘已久的新真理来说，仅仅两个明确的解释可能还不够，于是他第三次，这次没有引用任何依据，再次使用问答的修辞手法重复道：“如果一个国家周围存在资本主义包围，并且这个国家不能保证免受干涉和复辟的危险，那么能否认为这个国家的社会主义胜利是最终的呢？显然不能。”然后，他才试图对他认为在苏联已经建立的那种制度给出一个相当折中的定义，将承诺的乌托邦与明显的现实结合起来。“在我们这里，这被称为社会主义的胜利，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个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但由于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孤岛上，而是‘处于一个国家体系中’，所以我们公开而诚实地说，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胜利不是最终的（此为我所强调部分——Ю.Ж.）。”

在这样一个仅仅表面上模棱两可的定义中，掩盖了很多东西。其中有对过去十年间斯大林曾如此坚决捍卫的革命观点的痛苦失望。也有对在确定目标时所犯错误的坦诚承认，过去几年所做的一切——工业化、集体化、与昨天的同志、政治局的同事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以及导致大规模镇压的这些行动，本应朝着这个目标前进。还有来得太迟的认识，即国家再次像在革命时期、向新经济政策过渡时、接受第一个五年计划时一样，处于了十字路口。并且认识到除了让苏联回归正常、自然的发展道路之外，别无他法。而最重要的是，承认了世界上的这种局势直接威胁着苏联，会引发战争，也就是干涉，并且在战败的情况下可能导致资本主义复辟。

由于这一切，斯大林的这篇文章似乎立刻就被遗忘了。大众媒体、宣传人员以及党的领导人都对它保持着缄默，而在此之前，他们总是非常乐意利用领袖口中说出或笔下写出的一切，不仅将其视为取之不尽的引用源泉，而且还把它看作是一个绝佳的机会，不仅可以表现出完全的一致和忠诚，还能展现出个人的忠诚，以及无论“斯大林同志”指引何种方向都愿意追随的决心。

而一场喧闹的运动为这种令人咋舌的沉默的反对态度提供了可能，这场运动与一场政治审判的开始有关，后来证明这是最后一场政治审判——对 Н.И.布哈林、А.И.李可夫、Г.Г.亚戈达、Н.Н.克列斯廷斯基以及另外 18 名被告的审判。其中包括对三名医生，Л.Г.莱温、И.Н.卡扎科夫、Д.Д.普列特涅夫，以及维诺格拉多夫的审判，他们被指控直接“参与谋杀”了 В.В.古比雪夫、В.Р.明仁斯基和 А.М.高尔基。

围绕着这些及时出现的新一批“敌人”的喧嚣鼓噪从 2 月 28 日报纸上刊登《苏联检察院公告》开始，又在 3 月 16 日突然停止。只有 М.科尔佐夫 3 月 28 日发表在《真理报》上的文章《他们为什么杀害了高尔基》曾提及此事，但也仅有这一次。其他的问题、其他的担忧——那些完全真实而非虚构的危险，让政治局的所有成员最终放弃了“猎巫行动”。为了抵御战争，他们团结起来，而战争正迅速且不可避免地向苏联边境逼近。

第三章

1937 年 11 月底，在被任命为外交大臣的三个半月前，哈利法克斯勋爵受英国新首相内维尔·张伯伦的亲自委托，会见了希特勒，并向他阐述了一种独特的联盟构想。为了换取德国同意在不久的将来与伦敦就广泛的问题签订条约，他向德国提供了行动自由。起初，他非常露骨地暗示——“不应排除欧洲现有局势发生任何改变的可能性”，然后又直接说出了纳粹侵略的潜在目标，这些目标将得到“理解”——但泽、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与此同时，他只坚持一点：“英国只关心这些改变是通过和平演变的方式实现的，并且要避免使用可能会造成进一步动荡的手段，这是元首和其他国家都不希望看到的。”

希特勒没有让人多费口舌，急忙利用了这一机会。依据 1936 年 6 月 11 日的《德奥协定》，该协定允许奥地利当地纳粹党在这个阿尔卑斯山共和国恢复活动，希特勒要求奥地利加快政变的准备工作，从而实现吞并。为了推动事态发展，他把奥地利总理库尔特·冯·许士尼格召到贝希特斯加登，并在 1938 年 2 月 12 日与许士尼格的谈判中，以最后通牒的形式坚持要求在一周内将全部权力移交给纳粹分子赛斯-英夸特。否则，元首威胁说，他将不得不使用武力。

希特勒没有等到他自己设定的在维也纳更换总理的期限，于 2 月 20 日在德国国会发表讲话。他宣称，从现在起，第三帝国认为自己不受任何国际义务或条约的约束，并将立即着手把所有德国人，无论他们居住在哪里，都统一在一个国家之内。七百万在奥地利，三百万在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地区。伦敦如承诺的那样，反应非常温和。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以辞职表示抗议，而张伯伦在 2 月 28 日和 3 月 3 日两次表示，希特勒的意图中并不包含对国际体系的侵犯，也没有违反《圣日耳曼条约》，尽管该条约明确禁止德奥合并。

尽管局势日益恶化，且没有得到任何一方对他立场的认可，但许士尼格仍试图抵抗这种公然的压力。他拒绝了希特勒的最后通牒，并宣布将于 3 月 13 日举行公民投票，坚信会得到绝大多数奥地利人的支持。尽管在最后一刻，在墨索里尼的直接压力下，许士尼格放弃了公民投票，并向总统提出辞职，但希特勒还是按计划行事。3 月 11 日晚，德国国防军部队越过边境，第二天早上占领了维也纳。就这样，又一幕欧洲戏剧以绥靖政策注定的结局结束了。欧洲第一个被其保护者出卖的国家不复存在，从世界地图上被抹去，沦为了第三帝国的一个省份。

在那些日子里，波兰也表现出了同样的侵略意图。波兰以官方最后通牒的形式，要求立陶宛承认其对立陶宛维尔纽斯地区占领的合法性。甚至更早的时候，世界媒体突然开始传播有关柏林和华沙之间似乎存在秘密协议的传闻。据说他们有意瓜分独立的立陶宛领土。德国将收回梅梅尔（克莱佩达）地区，而波兰将得到其余所有土地。3 月 19 日，立陶宛总统安塔纳斯·斯梅托纳无条件接受了最后通牒，满足了雷兹-希米格维元帅独裁政权的大国野心。

在如此紧张、一触即发且充满不确定性的局势下，苏联外交人民委员 M. M. 李维诺夫于 3 月 17 日紧急召开了新闻发布会。他在讲话中特别指出：“如果说过去的侵略事件发生在离欧洲大陆或多或少有些遥远的地方，或者发生在欧洲的边缘……那么这次，暴力行为发生在欧洲的中心，这不仅给现在与侵略者接壤的 11 个国家带来了明显的危险，也给所有欧洲国家，甚至不仅仅是欧洲国家带来了危险……首先受到威胁的是捷克斯洛伐克……苏联政府深知自己的责任，也明白根据国际联盟章程、《白里安-凯洛格公约》以及苏联与法国和捷克斯洛伐克签订的互助条约所产生的各种情况，我可以代表苏联政府声明，苏联方面仍然准备参与那些与其他国家共同决定的集体行动，这些行动的目的是阻止侵略的进一步发展，并

消除新的世界大战日益加剧的危险。苏联政府准备立即与国际联盟内或联盟外的其他国家讨论根据实际情况所必需采取的具体措施。”

同一天，苏联驻伦敦大使 И.М.迈斯基、驻巴黎大使 Я.З.苏里茨和驻华盛顿大使 А.А.特罗亚诺夫斯基根据外交人民委员部的指示，将李维诺夫的声明转交给了他们所驻在国家的政府，并作了解释——这是苏联领导层官方观点的表达。英国政府在 3 月 24 日的回复中表示，它反对“只由某些欧洲国家参加、旨在……组织联合行动对抗侵略的会议”。随后又阐明了其不干涉和绥靖政策的实质。英国政府称，“在陛下政府看来，采取针对侵略的协调行动不一定会对欧洲和平的前景产生积极影响”。法国的回复与英国的几乎没有区别。而罗斯福政府仍然坚定地奉行孤立主义原则，对苏联的提议根本没有回应。

大国们给人一种感觉，他们似乎有意不想理解、冷静评估这种充满武装冲突危险的局势。没有看到，此时此刻，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果的凡尔赛体系的命运也正在被最终决定。因为德国的行动必然会促使所有战败国、失去部分领土的国家——匈牙利、保加利亚，也许还有土耳其采取类似行动。引发联盟战胜国成员——波兰、南斯拉夫、罗马尼亚的相应反应。与此同时，越来越明显的是，捷克斯洛伐克将成为下一个侵略目标。英国和法国出于自身的利益，将继续推动德国向东扩张，这意味着德国离苏联边境越来越近。这不仅体现在伦敦和巴黎甚至拒绝讨论集体安全问题上，在危机日益加剧的情况下，英国于 4 月 14 日与意大利签署的协议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根据该协议，英国政府承认罗马对埃塞俄比亚的占领，以及意大利有权公开支持西班牙的叛乱分子佛朗哥，以“换取”意大利不干涉欧洲事务。至于这种“不干涉”的代价是什么，墨索里尼对奥地利命运的态度已经非常清楚地表明了。

然而，苏联领导层仍在呼吁西方民主国家拯救捷克斯洛伐克。4 月底，政治局做出决定，要让布拉格清楚苏联坚定地打算向这个友好国家提供一切可能的帮助，包括军事援助。捷克斯洛伐克驻莫斯科大使菲尔林格立即得知了这一消息。此外，М.И.加里宁于 4 月 26 日公开宣布了苏联准备履行其条约义务。他还颇具深意地直接对布拉格领导层补充道：“当然，该条约并不禁止任何一方在不等待法国的情况下提供援助。”

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的这番讲话，碰巧在时间上与苏台德德国党傀儡“元首”亨莱因 4 月 24 日在卡罗维发利提出的要求相呼应，亨莱因要求给予苏台德地区完全自治权。阻碍苏联单方面采取行动援助布拉格的唯一障碍，也是使其坚持首先争取法国支持的因素，是地理因素。苏联与捷克斯洛伐克没有共同边界，它们之间横亘着波兰的大片领土。

5 月，欧洲局势发生了急剧变化。5 月 9 日，亨莱因宣布停止与布拉格政府就自治问题的谈判，随后他先飞往伦敦，接着又前往贝希特斯加登会见希特勒。5 月 19 日，莱比锡的一家报纸出人意料地向世界宣布，德国国防军部队正在捷克边境集结。第二天，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在紧急会议上决定进行部分动员。同一天，英国和法国驻柏林和布拉格的大使们不断劝说双方要极其谨慎，但也仅此而已。然而，德国驻伦敦大使冯·迪克森向其上级传达的信息却揭示了他们的真实立场。他报告说，在与他会面时，英国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措辞委婉、谨慎，但却意味深长地指出：“在欧洲冲突的情况下，很难说英国是否会卷入其中。”

而苏联的立场则完全相反。5 月 23 日，李维诺夫以在列宁格勒的一家工厂与选民会面为借口指出，苏联领导层坚定地保证履行其所有先前的义务，并不打算像英国和法国那样向布拉格施加压力。5 月 25 日，他建议巴黎立即召集三国总参谋部代表举行会议，以讨论向捷克斯洛伐克提供具体援助的问题。同一天，听从伦敦的建议，希特勒急忙发表了一份典型的、模棱两可的声明，称德国对捷克斯洛伐克没有任何侵略意图。

尽管 5 月的危机最终得到了圆满解决，但克里姆林宫此时才完全意识到，它基于所谓集体安全体系的所有盘算都是徒劳的，原本期望至少能与那些苏联与之签订了互助协议的国家协调行动，但这一切都落了空。这也正是迈斯基 8 月 17 日根据外交人民委员部的指示向哈利法克斯发表的声明中所透露出的那种对失去希望的痛苦。这位苏联大使强调说，“苏联对英法两国的政策越来越失望，它认为这种政策软弱且短视，只会鼓励侵略者进一步‘冒险’（这里指的是德国吞并奥地利——Ю.Ж.），因此，新战争的逼近和爆发的责任应由西方国家承担”。

最后，1938 年夏末发生的另一件相当重要的事件，这次发生在地球的另一端，在符拉迪沃斯托克东南偏南 130 公里处，这无疑加剧了苏联领导层完全合理的担忧和焦虑。这表明，在国际孤立的情况下，苏联可能同时面临来自西方和东方的侵略。

自本世纪初就与日本产生的紧张关系，在中日战争爆发后进一步加剧，突然演变成了武装冲突。7 月 29 日，毫无任何理由，甚至是捏造的理由，日本军队侵入了苏联境内。他们试图占领并吞并图们江附近边境与哈桑湖之间的一小块领土。边防部队在新成立的远东方面军第一（滨海）集团军部队的立即支援下，为控制扎奥泽尔纳亚（张鼓峰）和无名高地等战略要地，进行了两周的顽强战斗。在这期间，冲突规模不断扩大，双方已有几个师参与其中，而东京却保持沉默。日本公然装作没有发生任何需要进行磋商、解释或谈判的异常情况，当然，8 月 4 日、7 日和 10 日日本大使重光葵与李维诺夫的三次会面除外。日本完全无视国际法以及邻国之间的正常关系准则。直到 8 月 11 日中午，红军取得了极其明显、令人瞩目的胜利——彻底击溃了入侵苏联领土的侵略者军队，这才迫使日本人放弃继续冲突，将部队撤回满洲国。

所发生的这一切无可辩驳地证实了一个可怕的事实。在可预见的、非常近的未来，苏联很可能会在同时面对两个强大可怕的对手时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到那时，用斯大林的话说，“干涉和复辟”将不可避免。正因为如此，克里姆林宫不得不果断改变国内政治路线。尽管在最高领导层中，对于改革的方式，而非改革的必要性，仍然存在着非常明显且严重的分歧，但仍要加快实施所有那些本应确保国家防御能力的各种措施。为此，要结束大规模镇压的混乱局面，在全新的基础上团结不仅是正在更新的党，还有全体人民，从根本上改变国民经济管理结构。

在年初的 3 月 29 日，中央委员会批准了《关于举行党的领导机关选举的决议》文本，该决议最终规定所有党组织——从基层支部到加盟共和国共产党，都要恢复遵守党章规范。这样一来，终于打破了旧的正统党官僚集团的抵制，他们曾顽固地破坏 1937 年 2 月根据日丹诺夫的报告通过的中央全会决议的执行。同时，这些重新选举将作为当年夏秋举行的加盟共和国最高苏维埃选举的预演，也为计划于次年年初举行的联共（布）代表大会做准备。

无论是党内选举还是苏维埃选举，都是在不利于自由表达意愿的情况下进行的。自基洛夫遇刺以来，这场结果惨烈、类似内战的运动不断升级，并未平息。相反，它达到了高潮，不仅席卷了越来越多的党员，还波及了全国的全体人民。包括普通公民和高级官员。就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批准后的仅仅三个月，四名苏联政府成员被撤职、逮捕并很快被处决：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政治局成员 С.В.科西奥尔；农业人民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 Р.И.艾希；交通人民委员 А.В.巴库林和水运人民委员 Н.И.帕霍莫夫。

在这种情况下，尤其是在国家处于极度危险的时刻，再也无法继续忍受下去了。因此，部分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层（其中毫无疑问包括斯大林、莫洛托夫、马林科夫），他们最终认识到继续进行大规模镇压的巨大危害，试图限制自认为无所不能的 Н.И.叶若夫的权力。为此，在 4 月 8 日“共同决定”任命他为水运人民委员，这应该是一个严肃且明确的警告。但这还不够，他们还采取了更果断的措施。

几乎与此同时，М.П.弗里诺夫斯基被任命为内务人民委员部第一副人民委员。这个人在40年的人生中，有一半时间都在“机关”任职，并在那里达到了相当高的职位。1930年，他领导阿塞拜疆的国家政治保卫局，1933年3月担任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边防军和内卫部队管理局局长，1934年底，在保留对该机构控制权的同时，他成为了新成立的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副人民委员之一。而现在，1938年春天，弗里诺夫斯基不仅成为了叶若夫的第一副手，还担任了国家安全总局（ГУГБ）的局长。正是这个部门实施了大规模镇压行动。它毫无根据地逮捕了所有被开除出联共（布）的人，此外，还主动发起了“案件”。不断揭露新的“反革命”“恐怖”和“破坏”组织，这些组织迟早会牵连到处于权力高层的人。

可以认为，政治局任命弗里诺夫斯基担任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重要职位，他此前远离政治斗争最极端、最具惩罚性的形式，是希望实现局势的稳定。最终结束马林科夫在1月中央全会上所呼吁的大规模镇压的肆意泛滥。但如果存在这样的期望，那么很快就证明这些期望是落空的。此外，随后的新一轮逮捕表明，政权本身的地位极其脆弱，实际上在它自己创建并赋予其无限权力的内务人民委员部面前毫无防御能力。到了夏天，不仅又有一批人民委员被捕，如物资储备人民委员М.В.波波夫、机器制造人民委员А.Д.布鲁斯基、食品工业人民委员А.Л.吉林斯基，而且苏联人民委员会的另一位副主席、政治局成员В.Я.丘巴尔也被捕了，他也属于最近才形成的核心领导层成员。

由于迫切需要稳定，至少要稳定高层结构，建立一个绝非表面、幕后的，而是在当时的概念中完全合法的政权，拥有所有必要的官方权力，1937年4月14日，政治局组建了一个核心小组，该小组将负责解决所有实际问题并承担相应责任。秘密决议《关于为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准备问题的决议》明确规定：“为了为政治局准备问题，在特别紧急的情况下，也为了解决（此为我所强调部分——Ю.Ж.）秘密性质的问题，包括外交政策问题，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下设立一个常任委员会，成员包括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Л.卡冈诺维奇和叶若夫同志。2.为了成功地为政治局准备紧急的当前经济问题，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下设立一个常任委员会，成员包括莫洛托夫、斯大林、丘巴尔、米高扬和Л.卡冈诺维奇同志。”与此同时，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甚至故意无视至少通过“征询意见”这样的特殊方式让中央委员会成员批准的形式上的必要性，实际上将莫洛托夫和伏罗希洛夫纳入了书记处。

这样一来，在当时由15人组成的政治局内部，出现了一个由七人组成的常设小组，他们篡夺了党内和最高执行机关的所有权力，因为这个小组主要由政府成员组成：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他的两名副手以及三个最重要部门的负责人——国防人民委员、内务人民委员和重工业人民委员。他们承担了决定所有至关重要问题的权力——外交政策、国防、国家安全、经济等问题。并且这显示了权力中心明显从党的机关向苏维埃机关转移，同时也保持了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领导地位。

丘巴尔的被捕不仅仅破坏了已形成的体系和权力平衡。更严重的是，它触及了最为神圣的权力本身。触及了权力机关那独一无二的权力，即进行所有最重要的人事变动，同时对他人进行奖惩。它触及了那些自认为凌驾于生活的波涛之上、不可侵犯的人。但从6月丘巴尔被捕开始，核心领导层中由“七人小组”变成“六人小组”的任何人，都不再感到安全，都无法避免遭受类似的突然清除。就像达摩克利斯之剑一样，所有人都面临着被送上审判席的危险。但因为没有人希望自己有这样的未来，所以无论叶若夫在丘巴尔事件中是独自行动、出于自己的意愿，还是仅仅作为斯大林意志的执行者，他的命运都已注定。

但在当时，没有什么能够阻止大规模镇压的机器继续无情地吞噬包括高层领导在内的众多人。夏末，又有几位无辜的受害者倒下，他们是各人民委员：通信人民委员М.Д.贝尔

曼、贸易人民委员 М.П.斯米尔诺夫、卫生人民委员 М.Ф.博尔德列夫、轻工业人民委员 В.И.舍斯塔科夫。这样一来，就出现了整个国家机构无法正常运转的威胁，也无法保证经济最重要部门的活动，最终会影响国防工业的持续发展。由于战争经验（如在西班牙的战争）表明德国武器具有绝对优势，所以研制和生产符合最新要求的新型飞机、坦克、火炮、轻武器和弹药变得极为迫切。

生活的需求、处于生死存亡危险中的国家的需求，导致了一个早就该解决的问题的出现。这也是马林科夫曾以非常谨慎和委婉但又相当坚定的方式呼吁的事情。早在 1 月，他就向那些作为惩罚性“三人小组”中固定成员的边疆区委、州委和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们发出呼吁，这些人不仅签署了那些甚至没有列出姓名的被开除出党的死刑犯名单，而且实际上也签署了那些被归入“敌人”“间谍”行列、因此应被处决或关进劳改营多年（甚至数十年）的人的名单。他向那些以难以想象、无法理解的受虐狂般的热情进行自我毁灭的人发出呼吁，因为他们不可能不明白，当时刽子手和受害者之间的界限是多么的微妙。例如，他向高尔基州委第一书记 Ю.М.卡冈诺维奇发出呼吁，后者在 2 月再次要求批准“额外”判处 5000 个无人知晓的、抽象的人有罪。或者向 Н.С.赫鲁晓夫发出呼吁，赫鲁晓夫一到基辅并担任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就请求允许他的“自己的”内务人民委员 А.И.乌斯彭斯基（之前是莫斯科州内务人民委员部管理局局长）对……30000 人进行镇压。

但在国际局势恶化之前——在德奥合并和 5 月危机之前，所有这些还能勉强忍受的事情，在哈桑湖事件之后就变得完全不可接受了。

在远东的武装冲突结束后，几乎立刻就进行了第二次、这次更为果断的尝试，以限制叶若夫那变得过于危险的权力，这次冲突极有可能引发一场真实的战争，而非虚构的战争。毫无疑问，逮捕 В.Я.丘巴尔成为了对显然已脱离任何人控制的内务人民委员部采取积极行动加以遏制的直接契机。在当时的情况下，不能排除镇压的下一批受害者可能会是核心领导层的其他成员。但首先是 Г.М.马林科夫。因为按照事件发展的逻辑，作为组织分配部负责人的他早就应该因“将人民的敌人安插到党和国家机关的关键岗位上”而受到传统的指控。接着，被指控同样罪名的可能是 В.М.莫洛托夫，他“被人民的敌人包围”，正是从这些人中组建了苏联人民委员会。然后是 К.Е.伏罗希洛夫、Л.М.卡冈诺维奇，在他们的人民委员部中曾揭露过“错综复杂的阴谋”。最后，这种失控的反应迟早可能导致这一系列事件的最终受害者会是……斯大林本人。

如今有足够的理由做出另一种推测。当然，除了叶若夫，以及安德烈耶夫、日丹诺夫、马林科夫在内的核心领导层，当时应该更担心的不是内务人民委员部本身，而是内务人民委员部与地区层面的党官僚集团的紧密勾结。与边疆区委、州委第一书记们勾结，这些人构成了中央委员会的基础，并且在臭名昭著的“三人小组”中扮演着绝非次要的角色。与所有那些完全有理由不希望停止大规模镇压的人勾结，因为一旦停止镇压，他们就必然要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他们可能会重蹈 П.П.波斯特舍夫那众所周知的悲惨命运。

……8 月 20 日傍晚，斯大林与莫洛托夫和叶若夫进行了一次机密会面，这次会面持续了近四个小时。在这次会面中，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和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终于鼓起勇气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他们让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同意用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贝利亚取代 М.П.弗里诺夫斯基担任第一副人民委员兼国家安全总局局长的职位，对于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中央机构来说，贝利亚显然是“自己人”。这样，他们试图让国家安全总局受到整个核心领导层的严格控制。而且，显然是在那个晚上，在考虑了不止一个可能的候选人之后，才最终选定了贝利亚。以下情况可以证明这一点。

就在一周半之前，即 8 月 11 日，核心领导层摆脱了与哈桑湖战斗相关的沉重负担，其中包括批准了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名单。其人员组成无疑是在组织分配部及时协调好的，甚至在 1938 年 6 月 15 日格鲁吉亚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就已确定，成员包括 11 名正式成员和 4 名候补成员，其中有第一书记 Л.П.贝利亚、格鲁吉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兼食品工业人民委员 В.Г.杰卡诺佐夫、内务人民委员 С.А.戈格利泽，以及共和国中央委员会各部门负责人，工业交通部门负责人 В.Н.梅尔库洛夫、农业部门负责人 С.С.马穆洛娃、宣传鼓动部门负责人 П.А.沙里亚。总之，这样的人员组成中，三分之一的成员不得不在 9 月初辞去在第比利斯的职务，以便在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担任领导职务。

而现在，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公然无视之前的决定，这意味着必然会引发复杂的人事变动，但他们还是选定了贝利亚。起初，他们将政治局的主要决定、计划的核心内容记录下来：“批准拉夫连季·贝利亚同志为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第一副人民委员。”但随后他们放弃了对叶若夫和弗里诺夫斯基如此明显的不信任表述。他们在原本只有一条的决议中又增加了两条，给人一种印象，即重要的人事变动不仅涉及一个人民委员部，而是两个——内务人民委员部和海军人民委员部：“1.批准弗里诺夫斯基同志为海军人民委员，同时解除他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第一副人民委员的职务。3.在三天内解决格鲁吉亚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的问题，并要求贝利亚同志提出候选人供联共（布）中央批准。”然后，他们对文本进行了唯一一处修改。在仅涉及弗里诺夫斯基的第一条中，将“批准”一词改为“预先决定任命”。这种独特的、在政治局决议中几乎不再出现的表述方式，显然反映了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对其他核心领导层成员是否会批准他们的提议的不确定。这明显表达了他们希望给其他成员选择的机会，而且不是立即选择，而是稍后再做决定。然而，所有的担忧都是多余的。第二天，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叶若夫、加里宁、日丹诺夫和米高扬都对这一决定表示了支持。

叶若夫和其他人一起投了“赞成”票，他很可能没有意识到，或者不愿意意识到，自己已经收到了第二次警告，这对于任何一个熟悉官场游戏的官员来说都是明白无误的信号。更具象征意义的是叶若夫的秘书。他明白发生了什么，轻易地解读出了这个信号的含义——老板很快就会不可避免地重蹈 Г.Г.亚戈达的覆辙，于是他自杀了。

那些日子里，Л.П.贝利亚在莫斯科参加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甚至在 8 月 21 日发表了长篇演讲。正是这一情况再次让人相信，调他任内务人民委员部副人民委员的决定是冲动做出的。因为否则的话，批准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最初的人员组成的必要性以及给贝利亚时间寻找自己的替代者就都不存在了。如果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有哪怕两天时间，他不仅能提出所需的候选人，还能在组织分配部协调好此事。与此同时，贝利亚从第比利斯发出关于他计划的人事变动的密码电报时严重延迟——直到 8 月 29 日才发出，而且不是在早上，而是在下午 3 点 30 分。他提议批准的不是一个人，而是四个人，这些人将成为共和国新的权力结构的基础。第一书记是 К.Н.查尔基阿尼，之前是第三书记；К.Н.舍罗齐亚和 М.И.贾希，之前不在主席团，现在分别担任第二和第三书记。之前被提名担任第二书记的 И.Д.科奇拉马扎什维利担任第比利斯市苏维埃主席。他还通知说，如果这样的人员组成得到批准，格鲁吉亚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全会将在 8 月 31 日正式确定这一组成。

得到批准后，Л.П.贝利亚在预定的日子召开了中央委员会全会，然后才前往莫斯科就任新职。但他花了将近一周的时间来熟悉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组织架构以及国家安全总局各部门的职能，因为 М.П.弗里诺夫斯基正式被任命为海军人民委员，而他的前任 А.П.斯米尔诺夫仅被任命为该人民委员部的第一副人民委员，这一任命直到 9 月 7 日才下达。贝利亚似乎又花了一周时间来详细了解他“继承”下来的下属，思考首先应该用谁来取代谁。

最后，9 月 13 日，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被邀请到斯大林那里，在莫洛托夫、日丹诺夫和叶若夫在场的情况下，他阐述了自己的提议，这些提议随即得到了批准。罗斯托夫州内务人民委员部管理局局长 Б.З.科布卢洛夫被任命为最重要的、与大规模镇压关系最为密切的国家安全总局第四秘密政治部门的负责人，而 Д.Д.格雷丘欣被派往顿河畔罗斯托夫，他之前是基辅军区特别部门的负责人。从第四部门被撤职的 А.С.茹尔本科被任命为（后来很快就发现，只是任命了两个月）莫斯科州内务人民委员部管理局局长，而之前担任这一职务的策萨尔斯基仅被任命为乌赫托-伊热姆劳改营的负责人，也就是进入了古拉格系统。与此同时，В.Н.梅尔库洛夫和 В.Г.杰卡诺佐夫成为了贝利亚的副手。

与此同时，Г.М.马林科夫致力于为国内政治路线的根本性转变提供法律依据。首先，他准备了一份非常重要的文件，该文件应该为全面的人事清理创造条件，不仅包括在内务人民委员部和党的监察委员会中受叶若夫管辖的人员，还包括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李维诺夫领导的部门中的人员。要使这次行动不仅受到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书记处的控制，更重要的是受到组织分配部和乔治·马克西米利安诺维奇本人的控制。

《关于统计、审查和批准联共（布）中央内务人民委员部、国防人民委员部、海军人民委员部、外交人民委员部、国防工业人民委员部、党的监察委员会和苏维埃监察委员会的负责工作人员的决议草案》规定，政治局、中央委员会组织局和书记处必须无一例外地批准上述人民委员部和委员会的中央机构的所有负责工作人员。“从最高职位和部门负责人及其副手”到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部门负责人、党的监察委员会和苏维埃监察委员会的小组负责人及其副手。“对于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地方机构”——从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的内务人民委员及其副手、边疆区、州、专区管理局及其副手、部门负责人到市和区的部门负责人；对于海军人民委员部和海军舰队人民委员部——到旅、分舰队和巡洋舰的指挥官、学院院长、国防企业的军事代表；对于外交人民委员部——到大使、参赞、一等和二等秘书、总领事、加盟共和国和远东边疆区的外交人民委员部特派员；对于党的监察委员会和苏维埃监察委员会——到共和国、边疆区、州的特派员及其副手。

该决议草案还规定，组织分配部应该：“a)首先统计、审查、建立个人档案，并将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负责工作人员，首先是内务人民委员部中央机构、莫斯科州和列宁格勒州内务人民委员部管理局的工作人员，提交联共（布）中央批准，在三周内完成这项工作。在一个月内对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其他工作人员进行统计、审查和批准；b)到 1938 年 12 月 1 日完成对其他人民委员部负责工作人员的统计、审查和批准。”当然，还制定了进行预定的全面人事清理的具体机制。这应该由组织分配部的四个新部门来完成——内务人民委员部以及司法检察、海军舰队、国防工业、党的监察委员会和苏维埃监察委员会的工作人员。

该草案没有掩盖通过它要解决的总体任务：对内务人民委员部及其地方机构进行彻底清理。同时，在逻辑清晰、经过充分考虑的文本中，只有一点可能会让人感到困惑——没有在组织分配部设立负责国防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的部门。然而，这很可能与 К.Б.伏罗希洛夫在核心领导层中仍然保持的特殊角色有关，并没有引起政治局成员的注意。但他们一致决定扩大需要清理的部门范围。增加了国防委员会、苏联机器制造人民委员部和重工业人民委员部的军事部门、俄罗斯联邦地方工业人民委员部。正是以这样的形式，该草案于 9 月 20 日得到了政治局的批准。

这样，Г.М.马林科夫毫不畏惧地承担起了所有未来任命的全部责任——包括党内责任和法律责任。此外，正如几个月后所发现的那样，他还为所有那些在非法逮捕后被释放并完全恢复名誉的人恢复原职承担责任。最后，马林科夫大幅提升了自己的地位，获得了如此巨大的权力，这也为他不久后推行自己全新的人事政策创造了条件。

……希特勒在 5 月宣称德国无意侵略捷克斯洛伐克，他只是按照张伯伦给他设定的规则在玩游戏。英国首相 8 月 3 日派伦西曼勋爵前往布拉格，任务是为他和元首找到一个可接受的苏台德问题解决方案，他只是在拖延时间。因为解决方案早已确定，并且早在 8 月 6 日亨德森就已向德国外交部阐述：“英国不会为了捷克斯洛伐克而让哪怕一名水手或飞行员冒险。只要不使用暴力，一切都可以谈判解决。”

当伦西曼在寻找将苏台德地区甚至不通过公民投票就移交给德国的最便捷方式时，苏联领导层试图阻止这场尚未看似不可避免的侵略。根据苏联领导层的指示，李维诺夫 8 月 22 日邀请了德国大使舒伦堡，并以政府的名义告知他克里姆林宫对事件可能发展的看法：“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将团结一致为其独立而战，如果捷克斯洛伐克遭到攻击，法国将对德国采取行动，无论张伯伦是否愿意，英国都无法袖手旁观而不帮助法国，我们也将履行对捷克斯洛伐克的义务。”这位人民委员不知道、也无法想象一切都已注定。不到一周后，张伯伦召见亨德森，指示他紧急安排与希特勒会面，以进行幕后交易。李维诺夫对此一无所知，他试图推动保护这个欧洲小国的事情，但毫无进展。9 月 2 日，在与法国临时代办帕亚尔的谈话中，他不仅再次确认了苏联准备履行所承担的义务，还请求立即对波兰和罗马尼亚施加一切必要的影响，以便它们允许红军部队通过。

与此同时，捷克斯洛伐克总统爱德华·贝奈斯对英国和法国的真实立场相当了解，他试图以最大程度的让步为代价，使他的人民免受与德国国防军的不平等斗争。9 月 5 日，他通知苏台德德国人领袖昆塔和塞贝科夫斯基，他准备接受他们的任何要求。但元首不需要妥协，即使是对他最有利的妥协。他需要一个借口，而他很快就得到了。仅仅两天后，亨莱因禁止他的下属与布拉格政府进行任何谈判，并领导了一场政变，这立即使局势急剧恶化。导致了预定的结果——在苏台德地区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军队进驻并解除叛乱分子的武装。

德国立即做出了反应。9 月 10 日，戈林在纽伦堡发表讲话，对这个邻国发起了猛烈的公开愤怒攻击。他将捷克斯洛伐克的抵抗仅仅与苏联以及在这种情况下必然存在的世界犹太复国主义联系在一起。“可怜的捷克侏儒种族，”他粗暴地煽动纳粹党同志，“压迫着一个有文化的民族，而这一切背后是莫斯科和永恒的犹太恶魔的面具。”

此后，事态发展极为迅速。9 月 15 日，张伯伦在贝希特斯加登与希特勒会面。张伯伦事先就表示愿意满足希特勒的所有要求，同时请求稍作延迟——以便英国政府批准他的这些行动。9 月 18 日，他不仅得到了内阁成员的支持，还得到了专程飞往伦敦的法国外交部长博内的支持。9 月 19 日，英国和法国的大使们要求捷克斯洛伐克无条件接受希特勒提出的条件。然而，贝奈斯拒绝了这一毫不含糊的最后通牒。他仍然对巴黎的支持抱有希望，于是向苏联发出请求，询问在张伯伦立场如此明显的情况下，苏联是否会根据条约提供军事援助。他立即得到答复，称红军的 30 个师已集结在西部边境，正等待出动的命令。

9 月 21 日，为了对法国施加道义上的影响，李维诺夫在国际联盟发言称：“我们的军事领导层准备立即与法国和捷克斯洛伐克军事部门的代表举行会议，以采取当前形势所要求的措施。”然而，苏联的又一次外交努力毫无结果。就在当天，布拉格收到了来自伦敦和巴黎的新最后通牒，其动机完全是为了避免出现“法国和英国无法承担责任的局面”。9 月 21 日，波兰也急忙站到了德国一边。波兰宣布对捷克斯洛伐克的部分领土——切欣地区提出领土要求。这迫使苏联政府发表声明——苏联将把波兰军队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行为视为侵略行为。

与此同时，张伯伦再次与元首会面，最终与他商定了肢解一个主权国家的程序。他只提出了一个条件——不宣战，不采取军事行动。9 月 25 日，法国总理达拉第同意了这一决定，9 月 28 日，墨索里尼也表示同意。接下来的两天，四国领导人在慕尼黑会面，正式以文件形式确认了他们的秘密协定。9 月 30 日，贝奈斯不得不投降。但他不愿与这一可耻的

交易有牵连，于是在 10 月 5 日辞去了总统职务，将权力移交给了西罗维将军，西罗维曾在国内战争期间指挥在俄罗斯的捷克军团。

几年后，丘吉尔在评价《慕尼黑协定》时承认：“苏联的提议实际上被忽视了。这些提议没有被用来对希特勒施加影响，人们对它们态度冷漠，甚至可以说是带着轻蔑，而这种轻蔑给斯大林留下了深刻印象。事情的发展就好像苏维埃俄国不存在一样。后来我们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就在同一时期，苏联也发生了同样具有戏剧性的事件，只不过是在秘密的掩盖之下。

对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清理，更准确地说，起初只是按计划在规定时间，即到 10 月 20 日，更换其高层领导，这是中央委员会的决议所规定的，但最终未能实现。三个星期里，马林科夫和贝利亚只在政治局批准了三个人选：之前担任俄罗斯联邦地方工业人民委员的 В.Д.菲拉托夫——任主管经济的副人民委员，Н.Н.费多罗夫——任第二管理局局长，М.А.彼得罗夫——任人民委员部秘书处负责人。接下来的一个月里，又在国家安全总局（ГУГБ）批准了三个人选：В.Г.杰卡诺佐夫，同时兼任国外情报处（第五处，即对外情报部门）处长，М.М.格维希阿尼——任第三特别（行动）处处长，П.А.沙里亚——任秘书处负责人。

出现如此明显的延迟，是因为有必要仔细审查进入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的候选人。起初只是筛选那些没有参与过镇压、可以绝对信赖的人，当时还没有为他们确定具体职位，然后将名单提交政治局审议。例如，11 月 5 日，批准了将四名组织分配部的工作人员调往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干部处，以及 32 名年轻的人民委员部军官，他们大多是各类院校的应届毕业生，安排到中央机构和地方管理部门工作。11 月中旬，又批准了 32 人，11 月 26 日，政治局做出决定，在内务人民委员部为即将调往那里的党和共青团干部组织为期一个月的培训班。

几件突发事件突然打乱了原本有条不紊的人事工作，不得不采取非常措施。11 月 12 日，列宁格勒州内务人民委员部管理局局长 М.И.利特温意外开枪自杀。长期以来，他都是一位很有成就的党的干部。从 1930 年起，他领导中亚局的分配处（组织分配部的前身）；1931 年，他成为联共（布）中央分配处负责人的副手；1933 年 3 月起，他担任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干部处处长；1936 年，他获得了哈尔科夫州委第二书记的职位。直到 1937 年，他被调往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担任干部处处长，1938 年初又被调往列宁格勒。正是这样的履历本应引起警惕。毕竟，利特温作为老一代党的干部，过去与太多的领导人有联系，其中不仅有已经被认定为“人民的敌人”的人——如科西奥尔、丘巴尔、波斯特舍夫，还有那些仍然在位的人。比如，与日丹诺夫有联系。所有这些都造成了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这使得人们对他的自杀有多种解读：既可能是对自己所作所为的忏悔，对即将到来的惩罚的恐惧，也可能是一个正直的人，担心自己成为下一个无辜的受害者而做出的举动。

马林科夫和贝利亚可能不得不考虑其他理论上的可能性。其中，很可能包括这样一种：М.И.利特温的自杀、П.П.波斯特舍夫坚持镇压路线以及早在 6 月远东边疆区内务人民委员部管理局局长 Г.С.柳什科夫逃往满洲国投奔日本人这些事件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关联。就是这个柳什科夫，在 1938 年初被调往哈巴罗夫斯克之前，担任国家安全总局秘密政治处副处长的职务。柳什科夫不仅对大规模镇压了解得太多，还参与了镇压行动，并且参与组织了臭名昭著的“莫斯科审判”。

内务人民委员部领导层中一些被认为并非毫无根据的逮捕事件，更是让核心领导层原本就极为复杂的问题变得更加棘手。9 月，在内务人民委员叶若夫的批准下，逮捕了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 Б.Д.贝尔曼，他与古拉格管理局局长 М.Д.贝尔曼

是同姓。10 月底至 11 月初，在贝利亚的批准下，逮捕了国外情报处副处长帕索夫、交通管理局某部门负责人 А.П.拉德济维洛夫斯基，以及最重要的是，负责党和国家高级领导人安全的国家安全总局保卫处处长 И.Я.达金。因此，11 月 14 日，由于贝利亚的坚持要求，政治局批准了 С.А.戈格利泽担任利特温之前的职位，戈格利泽当天就前往了涅瓦河畔的这座城市（列宁格勒）。11 月 18 日，Н.С.弗拉西克被任命为国家安全总局第一处（保卫处）处长。而就在三天前，一份文件草案的制定工作终于完成，尽管再次出现了严重延迟。按照文件起草者的意图，这份文件将结束大规模镇压，同时为调入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人员设定全新的原则性要求。

早在 10 月 8 日，核心领导层就成立了一个“由叶若夫（主席）、贝利亚、维辛斯基、雷奇科夫和马林科夫同志组成的”委员会，该委员会需要在十天内制定出“联共（布）中央、苏联人民委员会和内务人民委员部关于逮捕、检察监督和侦查问题的新规定的决议草案”。这里需要指出两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细节。首先，政治局和核心领导层的惯例表明，他们在计划起草任何决议草案时，如果事先没有一个已被他们批准的初步版本，是不会进行这项工作的。因此，到 10 月 8 日时，应该已经有了一份说明“新规定”实质内容的备忘录，而此时只是对其进行编辑修改、完善细节，对拟定的决议措辞进行审核。其次，委员会的组成也很有意思。它首先包括那些其过往活动将被即将完成的文件所谴责和否定的人。因此，很难想象内务人民委员叶若夫、苏联总检察长维辛斯基和司法人民委员雷奇科夫会真正积极地参与这份决议的起草工作。更合理的推测是另外一种情况。是马林科夫起草了这份倡议备忘录——否则无法理解他在委员会中的作用。之后，他与贝利亚一起对文件文本进行了进一步的完善工作，贝利亚需要将“新规定”付诸实施，而且不能排除的是，维辛斯基和雷奇科夫也参与了进来。毕竟，与叶若夫不同，后两人后来并没有受到牵连，这意味着他们及时且相当有自我批评精神地为自己的过错忏悔，重新审视了检察院和法院过去的工作。

从各方面来看，核心领导层花了两天时间仔细研究了这份草案，并完全同意其中的内容，于 11 月 17 日批准了它。该草案作为苏联人民委员会和联共（布）中央的联合决议，未经修改或更正就被通过了，也就是说，由莫洛托夫和斯大林签署了《关于逮捕、检察监督和侦查》的决议，在这次会议上，政治局成员中只有斯大林、莫洛托夫和日丹诺夫出席，此外还有马林科夫、贝利亚，以及不知为何也在场的弗里诺夫斯基。

这项决议几乎立即就发布了，尽管标注了“机密”，但还是通过印刷的方式印制了数千份。该决议被分发到全国各地——分发给各区、市、专区、州、边疆区、加盟共和国的党组织，以及内务人民委员部相应的地方部门和管理机构、检察机关。

11 月 17 日的这项决议与马林科夫在 1 月中央全会上的讲话有很多相似之处。同样，仅在开头几段，简略地提到了在揭露各种“间谍”“破坏分子”以及纯粹苏联版本的“托洛茨基分子”“布哈林分子”方面的“成就”。同样，紧接着，突然而意外地，话题转到了这一现象的消极方面，并且此后完全聚焦于此。

“……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机关在 1937 至 1938 年间开展的大规模粉碎和铲除敌对分子的行动，”文件指出，“在侦查和审判工作简化的情况下，必然导致内务人民委员部和检察机关的工作出现一系列重大缺陷和歪曲。”接着列举了它们的主要过错：

“最近在内务人民委员部和检察机关的工作中发现的主要缺陷如下：

首先，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完全放弃了情报侦察工作，更喜欢采用更为简化的方式开展行动，即采取大规模逮捕的做法，而在此过程中并不关心侦查工作的全面性和高质量。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如此习惯于放弃耐心、系统的情报侦察工作，并且如此热衷

于简化办案程序，以至于直到最后他们还在提出给予他们所谓的‘限额’以便进行大规模逮捕的问题……

其次，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的最大缺陷是根深蒂固的简化侦查程序，在这种程序下，通常情况下，侦查员仅限于获取被指控者对自己罪行的供认，而完全不关心用必要的文件资料（证人证言、鉴定数据、物证等）来证实这一供认……常常是在被捕者不承认自己所犯罪行之前，都不会制作讯问笔录。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即讯问笔录中根本不记录被指控者对某些指控数据的反驳证言……案件中放入了草稿形式的、不知由谁修改和划掉的铅笔记录的证言，放入了未被被讯问者签字且未被侦查员完成的证言笔录，纳入了未签字且未被批准的起诉意见书等等……检察机关不仅没有纠正对革命法制的违反行为，实际上还使这些违法行为合法化……”

通过这样一种纯粹形式上的方法——仅仅评估侦查工作的专业性，而丝毫不质疑“敌人”的存在本身以及“揭露”他们的必要性，这项决议既解释了大规模镇压行为，同时又坚决地对其进行了谴责。只是在字里行间，以暗示的方式，将其视为一种大规模的负面现象。然而，即使通过这样的手段和独特的逻辑，它也得出了意义深远的结论：

“1.禁止内务人民委员部和检察机关开展任何大规模的逮捕和驱逐行动。根据苏联宪法第 127 条，只有根据法院的判决或经检察长批准才能进行逮捕。

2.废除根据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命令设立的司法三人小组，以及州、边疆区和共和国的工农（注：рабоче-крестьянской，Ю.Ж.）民兵管理部门的三人小组……

3.内务人民委员部和检察机关在进行逮捕时应遵循以下规定：……b）在要求检察长批准逮捕时，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有义务提交附有充分理由的决定以及所有证明逮捕必要性的材料……g）检察机关有义务不允许在没有充分理由的情况下进行逮捕。规定对于每一次错误的逮捕，除了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外，批准逮捕的检察长也应承担责任。

4.要求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在进行侦查时严格遵守所有刑事诉讼法典的要求……

5.要求检察机关严格遵守刑事诉讼法典中关于对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进行的侦查实施检察监督的要求。”

这项决议以一种独特且颇具威慑力的补充内容结尾——“苏联人民委员会和联共（布）中央提请内务人民委员部和检察机关的所有工作人员注意，必须坚决消除内务人民委员部和检察机关工作中上述提到的缺陷，以及重新组织所有侦查和检察工作的极其重要性。苏联人民委员会和联共（布）中央警告内务人民委员部和检察机关的所有工作人员，任何内务人民委员部和检察机关的工作人员，无论其职位高低，只要有丝毫违反苏联法律以及党和政府的指示的行为，都将被追究严厉的法律责任”。

因此，这项决议尽管是以一种相当独特、极为隐晦的形式，对国内正在发生的事情给出了完全官方的评价。它承认了继续放任“大规模逮捕和驱逐行动”的危险性，因此也认为这种行为是不可接受的。它宣布这些行动（尽管已经严重滞后）是非法的，侵犯了公民的宪法权利，违背了各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典的精神和文字规定。它要求废除法外机构——“三人小组”。然而，尽管前所未有地严厉谴责了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行为，但决议并未认定其领导人应对违法行为负责。但决议对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行为进行如此严厉谴责的同时，也没有认定在肆意妄为的混乱局面中同样负有很大责任的党的机关应承担责任。它试图完全回避查明那些以几何级数增长的残酷镇压行为的原因。它采取了一切措施，只是为了避免出现可能会加

剧不稳定、可能会引发两个有权势的团体及其背后势力公开对抗，并最终导致整个政权崩溃和覆灭的情况。

尽管这项决议存在诸多妥协和含糊之处，但它仍然发挥了重要作用——表达了核心领导层部分成员的坚定立场。其实这种立场在为十月革命周年纪念准备必要的节日“口号”（后来被称为“号召”）时就已几乎不为人察觉地显现出来了。11 月 1 日，在审查由安德烈耶夫和日丹诺夫提交的口号草案时，斯大林划掉了其中那些让人联想到“猎巫行动”、间谍活动，或者号召继续此类行动的内容：“28.我们要在国民经济的所有部门彻底消除右倾托洛茨基分子受外国情报机构雇佣进行破坏活动的后果。让苏联成为坚不可摧的社会主义堡垒！……52.彻底揭露所有的两面派！让我们的党成为坚不可摧的马克思主义堡垒”。与此同时，还有其他一些情况表明当时的局势极其复杂，甚至在当时还无法预测。首先，在 11 月 17 日的决议中，像这类文件中通常必不可少的“组织结论”却明显缺失，没有提及应负责任的人的名字以及对他们的惩罚措施。

与此同时，那一周极其复杂、紧张，甚至在当时还无法预测的局势还体现在其他方面。首先，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无论如何都下定决心，要立即采取一切手段阻止大规模镇压，结束国内盛行的肆意妄为的混乱局面。11 月 15 日，他们签署并发出了一份严格保密的 circulartelegram（通告电报），这份电报预示了，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替代了那份两天后才需要通过的决议！电报内容如下：

“特此严令：

1.从今年 11 月 16 日起，暂停对所有由三人小组、军事法庭以及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委员会审理的案件的审议，这些案件是按照特别命令或其他简化程序提交给它们审理的，直至另行通知。

2.要求各军区、边疆区、州、自治共和国和加盟共和国的检察长确保准确、立即执行此命令。执行情况需报告给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和苏联总检察长。”

很有可能，如此匆忙行事仅仅是因为斯大林和莫洛托夫都不太确定政治局成员是否会批准准备好的决议草案，甚至可能不排除会出现阻碍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另一种情况——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担心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地方机关和党的委员会进行破坏或直接抵制。做出这种推测的依据是这两份文件的文本有很大的相似性。如果电报直接要求将执行情况报告给中央——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和苏联总检察长，那么在决议中明显并非偶然地缺失了在类似情况下通常必须提及的应负责任的人以及对他们的组织结论。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在两天后才出现。

11 月 19 日，召开了一次在当时非常罕见的政治局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斯大林、莫洛托夫、日丹诺夫、伏罗希洛夫、安德烈耶夫、米高扬、卡冈诺维奇、叶若夫，作为受邀人员的有——来自组织分配部的马林科夫、来自党的监察委员会的什基里亚托夫、来自国家安全总局的贝利亚，以及弗里诺夫斯基——他要么是作为指控的证人，要么是作为潜在的被指控者。政治局成员们讨论的不是那份决议，也不是如何将其付诸实践，而是“声明”，或者简单地说，是伊万诺沃州内务人民委员部管理局局长 В.П.茹拉夫廖夫对已故的 М.И.利特温的检举。针对的是一个既无法为自己辩护，也无法反驳对他提出的指控的人。而且这些指控乍一看相当严重，因为其中直接指出利特温与波斯特舍夫存在某种关联，只要愿意，很容易将其解读为勾结甚至阴谋。无论如何，政治局成员中至少有一半人对这份“声明”态度冷淡。可能是因为他们不愿意促成又一个引人注目的“案件”的出现，因为这可能会引发新一轮的镇压浪潮，导致又一场“示范性审判”。也可能是因为害怕公开反对当时看起来仍然权

势极大的、以出席会议的叶若夫为代表的部门。但不管怎样，对于所提出的问题，没有做出任何决定。

这种事态的转变并没有让那些主张除掉叶若夫和清理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人灰心丧气。这迫使他们采取另一种迂回的方式。11 月 23 日，叶若夫被召到斯大林那里，当时莫洛托夫和伏罗希洛夫也在，他们让叶若夫当场以书面形式承担起与利特温自杀、柳什科夫逃亡、帕索夫、拉德济维洛夫斯基、达金被捕等一切相关事情的责任，以一种被迫忏悔的独特方式，请求辞职。

叶若夫在三张纸上用细小、工整、清晰的笔迹写下的认罪书，核心领导层的三名成员认为这完全足以作为做出决定的有力依据。然而，就像在处理弗里诺夫斯基的事情时一样，他们一开始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他们急于将文本限制在最主要的内容上："满足叶若夫同志辞去苏联内务人民委员职务的请求。"但这样的修改显然没有让叶若夫满意，这让他有充分的理由担心自己的命运。因此，不得不对草案进行补充，添加了本应看起来像是有力保障的内容："保留叶若夫同志联共（布）中央书记、党的监察委员会主席和水运人民委员的职务。"这个新的、扩充后的版本让双方都满意，文件连同含义丰富的"附言"一起被发送给了安德烈耶夫、日丹诺夫、卡冈诺维奇和米高扬，附言中明确指出了该如何行事："根据斯大林同志的指示，现将叶若夫同志 1938 年 11 月 23 日的声明发送给你们审阅，并将联共（布）中央关于免去叶若夫同志苏联内务人民委员职务的决议草案提交表决，斯大林、莫洛托夫和伏罗希洛夫同志已对该草案进行了表决。联共（布）中央特别部门负责人 А.波斯克列贝舍夫。"

很可能，找到的这个表述，再加上叶若夫亲自书写的声明副本，让没有参加那次会面的政治局成员们安心了下来。11 月 24 日，他们所有人都批准了这份文件，这样草案就成为了决议。第二天，出现了通常在这类文件中一开始就会包含或者同时批准的内容——任命 Л.П.贝利亚担任空缺的职位。而且一开始批准这一决定的同样只有斯大林和莫洛托夫，随后才通过"征询意见"的方式让政治局的其他成员表示同意。

随后，这场复杂、多阶段且几乎持续了一年的行动进入了最后阶段。12 月 1 日，政治局批准了第三份文件，和之前的文件一样，这份文件旨在最大限度地限制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自主行动能力。从而杜绝再次出现曾经席卷过核心领导层的那种镇压行为。政治局批准了苏联人民委员会和联共（布）中央的联合决议《关于逮捕审批程序》，内容如下：

"鉴于苏联人民委员会和联共（布）中央 1935 年 6 月 17 日的决议在某些部分已经过时，需要进行明确说明，苏联人民委员会和联共（布）中央决定：

1.废除 1935 年 6 月 17 日的决议。

2.用以下关于逮捕审批程序的决议取代苏联人民委员会和联共（布）中央 1935 年 6 月 17 日的《关于逮捕审批程序》决议，该决议用于规范逮捕审批相关问题：

1）只有在检察机关和内务人民委员部获得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或各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根据所属情况）的同意后，才能批准对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各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代表的逮捕。

对苏联各人民委员部和各加盟共和国人民委员部的领导工作人员以及与之相当的中央机构（管理局局长和部门负责人、信托公司经理及其副手、工业企业厂长及其副手、国营农场场长等）的逮捕，以及在各类机构任职的工程师、农艺师、教授、医生、科研和教育机构的领导人员的逮捕，需根据所属情况，与苏联相应的人民委员或各加盟共和国的人民委员协商后批准。

2）对联共（布）党员和候补党员的逮捕，需经相应的区、市、专区、边疆区、州的联共（布）委员会或各民族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第一书记同意，如第一书记不在，则需经第二书记同意；对于在苏联各人民委员部或与之相当的中央机构担任领导职务的共青团员，或对于在党、苏维埃和经济机构中担任负责工作的共产党员，需获得联共（布）中央书记处的同意后才能批准逮捕。

3）对苏联红军和海军的高级、中级和初级指挥人员的逮捕，需根据所属情况，与国防人民委员或海军人民委员协商后批准。

4）逮捕的批准权由地区的区检察长、城市的市检察长、专区的专区检察长、自治共和国的共和国检察长、边疆区（州）的边疆区（州）检察长行使。

对于铁路和水运方面的犯罪案件，逮捕的批准权由相应的地段检察长、铁路检察长、流域检察长行使；对于军事法庭审理的案件，由各军区的检察长批准逮捕。

各加盟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部直接（即除了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地方机构之外）进行的逮捕，其批准权由各加盟共和国的检察长行使。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直接（即除了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地方机构之外）进行的逮捕，其批准权由苏联总检察长行使。”

12 月 1 日的这份决议和 11 月 17 日的那份目标类似的决议一样，以“绝密”为标注发布，并且同样通过印刷的方式大量印制。这样做是为了在最短的时间内将其内容传达给所有相关人员——各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边疆区和州管理局局长、专区、市和区的部门负责人；各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的检察长、边疆区和州的检察长、专区、市和区的检察长；各民族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边疆区、州、专区、市和区的联共（布）委员会书记。

直到这时，核心领导层才完全恢复了对曾经失去控制的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掌控。做到这一点，既没有采取后果难以预料的根本性改革措施，甚至也没有发布在这种情况下常见的任何广泛的宣传性声明。仅仅通过惯用的、平凡的官僚程序，悄无声息地完成了所有必要的事情。

极其复杂的“批准和协商”体系，让核心领导层能够可靠地保护自己以及整个政权，使其免受命运的各种变幻无常的影响。这也让他们不仅成为了最高的，而且实际上是唯一的仲裁者，能够决定党和国家精英代表的罪责，以及对他们的惩罚程度。与此同时，为了分担可能因国民经济正常运转受到干扰、军队和海军战备状态下降而产生的责任，该决议引入了一种独特的连带责任制度。它要求各人民委员必须批准对其负责的部门或机构所属的工作人员的逮捕。

根据 12 月 1 日的决议，在过去四年里最容易受到伤害的那些人——担任重要职务的共产党员，现在得到了最大程度的保护。因为从现在起，逮捕他们不仅需要人民委员的同意，还需要相应级别党组织第一书记的同意。但是，也许文件中最值得注意、最引人关注的是另一个细节。事实上，拥有高等教育文凭的人，如工程师、农艺师、医生、教授等，被与高级官员同等对待。这表明在解决人事问题时，政权开始进行方向调整。它不再主要（如果不是唯一的话）依赖于以前的、文化程度不高的官僚阶层，当然，这个阶层的基础是党内官僚。也就是不再依赖于那个在国家经济现代化进程中辜负了期望，并且在试图抵制已经失控、每月都变得越来越自主的内务人民委员部时表现不佳的社会阶层。

这样，就奠定了基础，不仅能够实现人们如此渴望的，而且在战争即将来临的当下，是至关重要的苏联人民的团结。也创造了治愈人民因陷入可怕的集体精神错乱（这种精神错乱

伴随着不可避免的士气低落，而这种精神错乱是由突然变得普遍且似乎无穷无尽的在自己内部寻找神秘的“人民的敌人”的行为所导致的）的可能性。

然而，由于一些相当充分的原因，在 12 月 1 日的决议通过后，无法迅速更新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人员构成。起初，人事变动仅限于任命内务人民委员部四个最重要的地区管理局的局长。В.П.茹拉夫廖夫，那个及时“想到”写下检举声明，最终导致叶若夫被免职的人，被任命为莫斯科州的负责人。在罗斯托夫州，取代在那里任职时间不长的 Д.Д.格雷丘欣的是 В.С.阿巴库莫夫，他很快在首都取得了快速的职业发展；在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任命了 И.Ф.尼基舍夫。在滨海边疆区，任命了 М.М.格维希阿尼，他在国家安全总局第三特别部门的职位由 А.С.潘尤什金接替，一年后潘尤什金被派往中国担任苏联大使。

11 月底发生的一件神秘事件导致了进一步全面清理工作的推迟。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 А.И.乌斯彭斯基的失踪至今仍无法解释，这肯定会加深核心领导层的怀疑（如果他们确实有所怀疑的话），即内务人民委员部内部存在或正在滋生反政府阴谋。因此，政治局不得不推迟接下来的人事变动，紧急解决基辅的问题。派 А.З.科布卢洛夫和 Н.Д.戈尔林斯基前往乌克兰首都，12 月 4 日，他们分别被任命为缺席的内务人民委员的第一和第二副手。随后，12 月 5 日，核心领导层似乎得到了期待已久的理由，终于采取了纯粹的官僚规则在两周前就要求采取的行动。要求叶若夫向内务人民委员贝利亚移交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并规定了这一程序绝非形式上的，而是要极其仔细地进行——从 12 月 7 日开始，在一周的时间内完成，“联共（布）中央书记安德烈耶夫同志和组织分配部负责人马林科夫同志将参与其中”。同时，政治局放弃了之前给予叶若夫的保障，实际上将叶若夫排除出了书记处，并且在党的监察委员会中，也没有在会议记录中履行任何手续，就用什基里亚托夫取代了他的职位。

尽管基辅发生了紧急事件并因此采取了非常措施，但在 12 月上半月，内务人民委员部领导层的更换仍在缓慢但持续地进行着。批准了高尔基州、伊万诺沃州、雅罗斯拉夫尔州、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伏尔加德意志自治共和国的内务人民委员部管理局局长的任命，以及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格鲁吉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乌兹别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内务人民委员的任命。国家安全总局局长由 В.Н.梅尔库洛夫担任，他的副手是 Б.З.科布卢洛夫（保留了秘密政治部门）和 В.Г.杰卡诺佐夫（不仅继续兼任国外情报处负责人，还兼任反间谍部门负责人）。

在这个阶段，人员的全面清理不仅仅局限于内务人民委员部，党的机关也受到了影响。1938 年的最后两个月，根据马林科夫的提议，五名州委第一书记被撤职——来自高尔基州、堪察加州、新西伯利亚州、鄂木斯克州、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的州委第一书记。与此同时，政治局的决定一次又一次地更加明确了撤换党的干部的原因，阐明了真正的动机。例如，12 月 15 日，堪察加州党组织负责人 В.И.库捷伊绍夫被指责犯了一些模糊不清的错误——“政治警惕性降低”，“没有采取措施清除堪察加州的党、苏维埃和经济领导机关中潜藏的敌人”。而 12 月 30 日，对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委第一书记瓦卢欣的指责则非常明确。其中特别指出：“在瓦卢欣同志的领导下，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的党组织中仍然潜藏着伪装的敌人，而且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通过大规模、残酷的镇压手段（我已标注。——Ю.Ж.）殴打诚实的工作人员这种挑衅性的敌对行为尤为普遍。”

这一切似乎都表明核心领导层的地位已经相当稳固。因此，政治局的一项决定显得非常奇怪，让人不禁猜测他们即使没有恐惧，也会感到警惕和担忧。这项决定最终将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变成了一座被围困的堡垒。12 月 19 日，很可能是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两人，批准了贝利亚提出的建议。即把长期居住在克里姆林宫的两座建筑（旧军械库和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军事学校，现在这里是会议宫）里的 807 人迁走：其中包括 209 名指挥官和指挥人员、326

名他们的家属、272 名雇佣工人和职员。提出这一建议的理由是为了“加强保卫”，需要在这座首都的堡垒中额外部署两个营（1200-1500 人）和战斗装备，以加强驻扎在那里的特别任务团。同时也加强了克里姆林宫的实际驻军，其中还包括一个单独的指挥官营、军事消防队、化学排、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部门和一个装甲兵师，需要将这个装甲兵师从马涅什的汽车库调进克里姆林宫内部。

紧接着在第二天，即 12 月 20 日，政治局批准了克里姆林宫卫戍司令管理处（国家安全总局的一个独立结构部门）的新领导班子。任命 Н.К.西尼洛夫为卫戍司令，他曾在一段时间内担任内务人民委员部第三特别部门的负责人；任命 Ф.И.康金为军事委员，他之前是组织分配部某一部门负责人的副手；任命 И.А.加古亚为卫戍司令副手，他之前是国家安全总局第一部门负责人的副手；任命 Н.С.施皮戈夫为后勤副手，他是从莫斯科赫鲁晓夫工厂厂长的职位上调来的。

这些决定使得清理工作能够进入最后阶段，即撤换那些从叶若夫时期，甚至在某些情况下从亚戈达时期就留任的内务人民委员部地方机构的负责人。在这一过程中，乌克兰的情况最为独特。只有在乌克兰，根据 Н.С.赫鲁晓夫的提议，并得到马林科夫和贝利亚的批准，1939 年 1 月，各州管理局（包括摩尔达维亚自治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负责人全部被任命为党的工作人员——州委部门负责人、区委书记。

在将忠诚可靠的人安排在内务人民委员部中央机构和大多数地方机构的关键岗位上之后，核心领导层认为有必要且有可能亮出底牌。尽管非常克制，但还是要阐明国内政治路线改变的实质。要极其谨慎地，只是通过暗示表明放弃大规模镇压的做法。要在一定程度上让国内民众仍然未知的事情变得明显一些。但不是要公布那些媒体一直未报道的新任命，而是要公布更有意义、更重要的事情。即内务人民委员部以往活动的罪行，许多“案件”完全是编造的，而他们“揭露”的“反革命阴谋”实际上根本就不存在。

从基辅及时送来的内务人民委员部肆意妄为的又一受害者的申诉，为实现这一目的提供了绝佳的时机。这是极为罕见的情况！这份申诉不仅传出了监狱之外，而且（毫无疑问，在贝利亚的直接参与下）到了核心领导层的手中。他们拿到的这份文件证明出现了明显的造假行为——在摩尔达维亚“揭露”的一个庞大的“阴谋组织”。据称这个组织包括以申诉人萨达柳克为首的一群教师，以及由某个伦金纳创建的“锡安主义者”小组，并且根据被捕者的“供认”，该组织与……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第一书记 Н.С.赫鲁晓夫和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 Д.С.科罗琴科有关。就在同一天，12 月 1 日，政治局做出了一份语气和内容都极为强硬的决定，为后续事件的发展定下了基调。该决定规定：“……要求贝利亚同志审查萨达柳克同志的案件，追究侦查员奇奇卡洛及其幕后指使者的责任。如果萨达柳克同志的申诉得到证实，组织公开审判，枪决相关责任人，并在（中央和地方）媒体上公布。”

由 А.З.科布卢洛夫、国家安全总局第二部门工作人员 Н.Б.洛莫夫和苏联检察院侦查部门负责人 Л.Р.谢伊尼恩进行的调查，当然证实了所有被调查者的完全无辜。12 月 22 日，政治局就该问题做出了第二项决定——“在基辅对萨达柳克及其他教师以及伦金纳先生的虚假挑衅案件的相关责任人进行公开审判”。此后，一切都按照既定的剧本进行。基辅军区内卫和边防部队法庭认定摩尔达维亚自治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管理处第四部门的工作人员有罪，包括负责人 Г.Н.尤富、行动专员 И.В.沃尔科夫、他的助手 И.А.希察和 П.Г.奇奇卡洛以及秘密特工 С.П.库兹缅科。只有自治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 И.Т.希罗基躲过了审判和责任，他在调查开始后立即开枪自杀了。

另一个类似的行动，旨在同时诋毁旧的内务人民委员部，并为贝利亚领导的新的内务人民委员部塑造一个捍卫正义的形象，这就是同样通过公开审判揭露的又一起造假案件。这次

涉及的是列宁斯克-库兹涅茨克（当时属于新西伯利亚州，这也解释了该州委第一书记被撤职的原因）内务人民委员部市管理部门的犯罪冲动和肆意妄为的结果。经查明，“他们没有揭露那些利用（当地中学的。——Ю.Ж.）学生达到犯罪目的的犯罪分子和反苏分子，反而对学生进行了镇压，逮捕了 17 人，并编造了针对他们的案件，指控他们参与了反革命、法西斯恐怖组织”。为了加强 11 月 17 日和 12 月 1 日联合决议的影响力，使其被视为最重要的指令，政治局 1939 年 1 月 4 日的决定允许内务人民委员部和州检察院的基层党组织“讨论这起违反法律的事件”。后来，在 2 月底，一些报纸报道了在列宁斯克-库兹涅茨克进行的审判情况。

……11 月 17 日和 12 月 1 日如此重要、在字面意义上对许多人的命运有着重大影响的联合决议，始终没有公开宣布。对于绝大多数民众来说，这些决议仍然是被严格保密的。但尽管如此，国家几乎立刻就感受到了这些决议哪怕只是极小一部分的执行所带来的影响。人们感受到了朝着更好方向变化的现实和明显趋势，这要归功于虽然没有大肆宣扬但也没有刻意隐瞒的首次相对广泛的平反行动。那些完全无辜的人从监狱和劳改营被释放回家，在某些情况下，他们恢复了党籍、原有的职务和军衔，这些人曾一度认为自己的人生之路已经走到了尽头。在大众的意识中，这些事件与之前联共（布）党内对那些无端被开除者的恢复党籍的行动联系在一起，被视为党承认了所犯的错误并正在加以纠正。这些事件长久地被铭记为“叶若夫时代”的仁慈终结，同时人们对新任内务人民委员贝利亚几乎作为释放无辜者的发起人的个人作用给予了高度评价。

同样，那几千名因职位关系了解这些决议的人，如果愿意的话，能够注意到这些决议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特点。在这两份文件中，尽管似乎详细分析了诸如“大规模逮捕行为”“简化侦查程序”等令人发指的罪行的原因，但它们只将责任归咎于内务人民委员部和检察机关。对于党的机关应承担的更大责任却只字未提，这绝非偶然。

推动国内政治路线急剧转变、撤换叶若夫、全面清理内务人民委员部和党内所有与大规模镇压直接相关人员的发起者，以及巩固这一进程的三项决议的推动者，是核心领导层中的少数人——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和马林科夫，在最后一刻还得到了安德烈耶夫、日丹诺夫、卡冈诺维奇和米高扬的支持。也就是说，不仅是政治局的领导集团，还包括那些领导苏联人民委员会（1938 年夏天卡冈诺维奇成为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的副手）和红军的人。正是他们象征着并联合了政权的两大实际分支——党和苏维埃，因此他们绝不可能允许党和苏维埃同时受到指责。因为这样的举措必然意味着他们自己亲手动摇自己的地位。在面临严峻的选择时，他们倾向于只谴责国家机构。

他们这样做是因为他们作为职业革命家的时间太久了。他们无法放弃将自己首先视为布尔什维克党的创造者、党的利益捍卫者的观念。由于这种预先做出的选择，他们不可避免地成为了党内最正统、最保守阶层观点的表达者。这些人始终无法摆脱革命和国内战争时期的观念，未能获得建设性活动的经验。他们的行为方式仍然像是国家仍被分为两个相互对立的阵营，进行着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斗争。他们认为，权力仍然是政策的唯一手段，而且首先是这种权力。此外，还有狂热、盲目地忠诚于一种不仅被他们每个人以自己的方式理解，而且被庸俗化、歪曲了的共产主义思想。

因此，在那个年代，高层中相对进步和主张改革的一小部分人，由于党内统治阶层人员构成的迅速变化，暂时只能满足于取得一些小的成果。他们满足于这些决议本身以及这些决议尽可能广泛的实施——因为这为他们提供了切实的人身安全和不受侵犯的保障。与此同时，他们也对正在发生的事情感到满足——对联共（布）在管理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的不太引人注目的缓慢重新评估，以及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深刻转变。

第四章

如前所述，放弃革命路线的趋势最早在 1935 年就已初现端倪，并且很快就开始呈现出越来越连贯和稳定的特点。在四年的时间里，已经积累了足够多的证据来证明这一点，尽管对于那些关注此事的人来说，仍然很难将所有这些证据联系起来，看清其背后的最终目标。

与新宪法一样明显预示着即将到来的变革的，是共产主义学院的撤销，以及在其基础上成立的经济学院、苏联建设历史与法学院、世界经济与世界政治学院。这样一来，那些此前被坚决否定为所谓超阶级或资产阶级的学科，重新获得了应有的地位。将这些学科的基础研究转移到在法律上具有自主性、看似非政治性的苏联科学院体系并受其庇护。

还有许多其他方面的情况也表明了这种缓慢的意识形态转变。例如，1936 年苏联人民委员会的决议，将与马克思主义相去甚远的思想家——“革命民主主义者”Н．А．杜勃罗留波夫、Н．Г．车尔尼雪夫斯基、В．Г．别林斯基的记忆永久留存。这体现出对国家革命前历史的浓厚且真挚的兴趣重新得以复苏。这种对历史的尊重在 1937 年对普希金的庆祝活动中得以体现，普希金长期以来一直被党的宣传所忽视，而这次庆祝活动持续时间长且格外隆重。次年，又出现了类似的事件——对《伊戈尔远征记》问世 750 周年的纪念，这次纪念活动相对较为简朴。最后，对曾被一些马克思主义文学研究者视为神秘主义者的 Н．В．果戈理的关注——苏联人民委员会再次宣布在莫斯科为他设立新纪念碑的竞赛。

1936 年 11 月，对 А．Я．泰罗夫根据当时苏联革命诗歌经典作家杰米扬·别德内的新剧本在卡默尔剧院上演的鲍罗丁的喜剧歌剧《勇士们》的严厉批评，是对正统意识形态路线重新审视的一个更为明显的例子。尽管创作这部戏剧的想法来自艺术事务委员会主席 П．М．克尔任采夫，但根据一些资料显示，也是在莫洛托夫的直接指示下，克尔任采夫签署了将这部歌剧从剧目单中删除的命令，理由是“这部歌剧粗暴地抹黑了俄罗斯民间史诗中的勇士形象，而在民众的观念中，这些勇士是俄罗斯人民英雄品质的代表（我已标注。——Ю．Ж．）；它对罗斯受洗这一在俄罗斯人民历史上实际上是积极阶段的事件，给出了反历史且带有嘲讽意味的描绘，因为罗斯受洗促进了斯拉夫民族与文化水平更高的民族的融合”。

在坚持对过去采取新态度的这一系列行动中，还包括后来的其他意识形态活动。为小学编写新的苏联历史教科书的竞赛，以及 1937 年 8 月表达了传承和国家观念的 А．В．舍斯塔科夫教授在竞赛中获胜。1937 年，导演 В．彼得罗夫和编剧 А．托尔斯泰的第一部关于《彼得大帝》的系列电影在全国上映。在这部电影中，第一位俄罗斯皇帝不仅以威严的形象出现在观众面前，而且是一个毫无保留的正面英雄，是一位只关心国家福祉的伟大国务活动家。次年，С．爱森斯坦执导的在导向性上更具倾向性的电影《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上映。

1936 年春天开始举办的苏联足球杯赛和锦标赛，似乎是一些微不足道、与复杂的意识形态问题相距甚远的事情，但它们并没有因此而失去作为变革标志的重要性。此前，这些比赛由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在工厂球队之间较为低调地举办，这突出了比赛和球队的“阶级性、无产阶级性”。而现在，在新的形势下，这些比赛转变为俱乐部性质，因而也成为了职业比赛。由于比赛通过广播定期转播，这些比赛立即引起了前所未有的关注，产生了一批忠实的球迷，改变了相当一部分男性民众的业余生活。此外，这还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可以毫无顾忌、公开地为支持某一支球队而争论的机会，从而将民众身上存在但尚未消耗的精力升华，因为这些精力很容易且在任何时候都可能在政治领域找到发泄的途径。

苏联对自身孤立状态以及除了友好的兄弟国家蒙古和图瓦之外与其他所有国家对立的传统观念的转变，体现在苏联参加了此前难以想象的 1938 年巴黎世界博览会。这不仅明显表明了苏联试图摆脱政治孤立的愿望，试图通过任何方式，哪怕是这样的方式，重新回到国际

社会大家庭中。同时，苏联展馆的筹备以及随后的运营（媒体对这些情况进行了较为定期和全面的报道），有助于培养民众的爱国主义情感，让他们为自己的国家及其成就感到自豪，而正如宣传所宣扬的那样，这些成就使苏联与美国、德国、法国和英国等工业发达国家处于同一水平。

另一场更为重要、具有原则性的改革，却几乎完全没有被大多数人察觉，也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这场改革旨在创建一个共同的语言基础，以便在可预见的未来，将苏联众多（超过 100 个!）民族凝聚成一个统一的民族。这也有助于以最温和的方式将那些在宪法上形式上拥有某种类似主权的加盟共和国，最终转变为一个单一制国家。矛盾的是，该国人口中一直存在的识字率不高的情况，却成为了实现这一意图的有利因素。1939 年的人口普查显示，总体上约有 18%的人不识字，主要是 50 岁以上的人，而在中亚和高加索地区，这一比例约为 30%。

这种令人遗憾的状况使得改革的第一阶段变得相对容易。根据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民族事务委员会 1936 年 10 月 16 日的决议，卡巴尔达人的文字从之前为他们制定的拉丁字母表改为俄语字母表。随后，对于俄罗斯联邦内所有其他拥有行政-民族自治权的民族（自治共和国、边疆区、民族专区），也采取了类似的措施统一了他们的文字。在这些变革在俄罗斯联邦范围内基本完成前不久，从 1939 年 12 月 16 日开始，这些变革也扩展到了一些加盟共和国的“主体”民族的文字上，包括乌兹别克斯坦、阿塞拜疆、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摩尔多瓦。但这仅限于那些文化水平和识字状况不妨碍这些新举措实施的地区，没有触及大多数民众的利益，从而避免了引发他们自然的抵制。

当基础准备就绪后，改革进入了同样重要的第二阶段。斯大林在 1936 年 10 月的中央全会报告中谈到了这一阶段的必要性，并将其作为相应决议的基础。这一阶段，除了其他因素外，还受到新宪法第 132 条规定的普遍义务兵役制实施的必要性的推动。因为在红军中，对于命令、指令、条令和教导，只能有一种语言。在 1938 年 3 月 13 日苏联人民委员会和联共（布）中央通过《关于在各民族共和国和地区的学校中必须教授俄语》的决议后，第二阶段成为了现实。不久之后，所有加盟共和国的苏维埃执行委员会都重复了这一文件，因为国民教育问题在法律上属于它们的职权范围。就这样，俄语首次确立了其作为国语的地位。

所有这些表面上看似没有关联，但却一步步朝着特定目标推进的变革，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出现中得到了总结。该书最初于 1938 年 10 月 9 日至 19 日在《真理报》上发表，几乎立即又以单行本的形式出版，印数达数百万册。

《简明教程》自问世后的十七年里，一直是苏联所有共产党员的某种“圣书”，他们必须“系统、深入、全面”地学习这本书。这本书的目标读者群体非常明确，当时主要由文化程度不高的党员组成。在这些党员中，最好的情况也只是接受过初等教育的工人占 64.3%，农民占 24.8%，而职员仅占 10.9%，职员中有的接受过初等教育、有的是不完全中等教育、有的是不完全高等教育、有的是高等教育。这本书还考虑到了 1938-1939 年党员大规模吸纳新成员的情况，党员数量增长了一倍半。这本书对所有这些人来说都是通俗易懂的。由于其简洁明了和条理清晰，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简明教程》包含了一种独特的、极其主观的、实际上是虚构的、虚假的联共（布）党史版本，这种版本是从 1937 年 1 月至 2 月的中央全会的立场出发，以回顾的方式推导出来的。该书旨在为镇压行为辩护，而且不仅仅是大规模镇压，它试图用这些镇压行为来解释党内长达四分之一世纪的斗争，不是将其解释为意见的自然冲突，而是解释为未来“人民的敌人”的蓄意“背叛”，而且这种背叛早在革命之前就已存在。与此同时，这本书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给出了最基本、极其简化的解释。

但《简明教程》的目标并不局限于此。

通过其人为设计的戏剧性冲突，《简明教程》引出了最后一章，其中最后两段并非讨论党内问题的犯罪层面，而是涉及其他内容。书中热情洋溢地讲述了新宪法的筹备和通过，以及苏联最高苏维埃的选举。这些都是虽然已经过去但时间非常接近的事件。然而，在这本书出版的时候，苏联议会已经召开了两次会议，其中第二次会议通过了 1938 年的预算，这使得能够更有效地、以应有的气势继续推进工业化路线。从整个核心领导层，尤其是斯大林的角度来看，这是最重要、最核心的问题。从议会会议到《简明教程》开始出版的这两个月时间，完全可以在书中哪怕不专门写一页关于议会会议的内容，至少也可以写一两个段落，将其纳入书中以使其更具时效性，证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但书中并没有这样做。

《简明教程》在 1937 年 12 月的事件上画上了句号。甚至还解释了原因：“宪法巩固了这样一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事实，即苏联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我已标注。——Ю.Ж.）。虽然紧接着就阐述了新阶段的本质——“进入了完成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并逐步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阶段”，但实际上并没有把问题解释清楚。因为在整本书中，一直使用的是另一个术语——“时期”。这个术语清晰、合理、周全地将党的历史，以及与之相关的国家历史，划分为不同的时期：十月革命的筹备和进行时期、国内战争和外国干涉时期、恢复时期、社会主义工业化时期。但“阶段”这个术语从未被使用过——既没有用来替代这些时期，也没有用来合并或划分这些时期。此外，在引入“阶段”这个术语之后，接下来并不是对“完成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特点和特殊性的描述，而是反复强调（仅在两页纸上就重复了五次！）选举的主要特点，即“共产党员和无党派人士联盟的辉煌胜利”。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以一句含义极为丰富的话结尾：“以上就是布尔什维克党所走过的历史道路的主要教训。完。”[94]当然，人们原本可以单纯地理解这句话。把它当作对所描述内容的终结，当作在那个特定时间点上对具体文本创作结束的一种宣告。仅此而已。然而，当它与关于国家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这一明确且未作解释的论断结合起来时，不可避免地就会产生另一种对最后这句话的解读。从字面意义来讲就是：布尔什维主义的历史终结了；在 1937 年底之前存在的那个党的历史终结了。

的确，从 1938 年 10 月起，联共（布）的历史就画上了句号。这段历史没有再被续写，也没有被补充，尽管当时有足够的理由这么做。例如，党的十八大、第十八次代表会议，还有伟大的卫国战争。所有这些本可以成为修订、扩充像《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简短传记》这样在宣传导向和重要性上与《简明教程》相近的书籍的原因。《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简短传记》于 1939 年末首次出版，最初只有 5.5 个印刷页的篇幅，到了 1947 年，它经过了大幅、实质性的修订。内容得到了扩充，部分是通过讲述 1940 年至 1946 年间发生的事件实现的，因此篇幅增加到了原来的三倍——此时已经有 15.25 个印刷页了。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斯大林的另一本具有类似作用的著作《论伟大的卫国战争》上，该书从 1942 年起每年出版，多次补充了最高统帅的命令和讲话内容，直到 1946 年才确定了其经典的内容和篇幅。

但对于《简明教程》，人们却一次都没有再回过头去续写。无论是在 1939 年，还是在随后的几年里。从来没有过。甚至在 1949 年斯大林七十寿辰的时候也没有。对于这一奇怪的事实，可能只有一个解释。对于斯大林以及在《简明教程》出版时形成的那个核心领导层来说，联共（布）的历史确实在新宪法通过之时就已经结束了。更确切地说，它原有的意义、在国家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已经耗尽，而在党内斗争中曾经的重要性也很快被人们遗忘。所有这些都迅速退居次要地位，失去了现实意义和必要性。

1938 年 11 月 14 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决议《关于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出版后党的宣传工作安排》，就是对此相当有力的证明。仅从决议的标题就可以看出它

的独特之处——它说的不是对《简明教程》本身的宣传，而只是“鉴于”它的出版而进行的宣传。

这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整个党的宣传工作基础的文件，其内容也同样值得注意。与它所围绕的那本书不同，这份决议与其说是在谈论过去，无论是遥远的还是近期的过去（比如，仅仅一带而过地提到了一次“人民的敌人”“外国间谍”），不如说是在谈论极为现实的问题。它讨论的是那些即将要做的事情，同时按照优先顺序提出了当下和未来的任务。

该决议以如下方式确定了联共（布）中央在编写《简明教程》时所依据的任务：1.“为党提供关于党史的统一指导”；2.“消除在宣传领域中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之间有害的脱节现象”；3.“在阐述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思想的基础上讲述党的历史”；4.“使马克思主义文献摆脱简单化和庸俗化的倾向”；5.“展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力量和意义”；6.帮助宣传人员“消除他们在理论上的落后状态”。

在设定了如此高远的目标的同时，决议只是简略地提到了“对我国社会主义胜利问题的错误解读”，以及对“关于当代战争性质问题的观点”的歪曲，并且坚决否定了将布尔什维克与和平主义者等同起来的观点。但决议更着重地关注了国内的历史科学。关注了在过去两年半时间里已经非常明显，但却没有出现在《简明教程》书页上的问题：

“直到最近，历史科学中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歪曲和庸俗化现象都与所谓的‘波克罗夫斯基学派’有关。该学派歪曲地解读历史事实，违背历史唯物主义，从当下的角度而不是从历史事件发生时的实际情况出发来阐释这些事实，从而歪曲了真实的历史。

对真实历史的反历史的伪造，以及美化历史而非真实阐述历史的反历史的尝试，例如导致了这样的结果：在我们的宣传中，党的历史有时被描绘成一条充满胜利的道路，没有任何暂时的失败和挫折，这显然与历史真相相悖，从而也妨碍了对干部的正确培养。

反马克思主义的庸俗化混乱观点还体现在对苏维埃国家的错误看法的传播上，体现在贬低社会主义国家作为工人和农民手中为实现社会主义胜利以及保护劳动者的社会主义成果免受资本主义包围威胁的主要武器的作用和意义上。”

正是以这样的方式，没有进一步的阐释和展开，而是保留了一些内容留给未来，核心领导层通过这种严谨的态度界定了当时的形势。放弃了之前承诺的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完成社会主义建设的目标，对第三个五年计划也不抱希望；战争的直接威胁以及由此产生的其他因素，不可避免地不仅要求保留，而且要加强国家及其机构的作用，这使得党不得不让出其主导地位。

然后，在关注了决议的主要问题，即基于小组讨论的整个原有宣传体系进行全面改革的必要性，并赋予印刷宣传以首要地位（决议的决定性部分正是为此而制定，它导致了相应党组织机构的立即重组）之后，文件转向了一个似乎与《简明教程》以及宣传工作完全无关的问题。即干部问题：

“我们所有的干部构成了苏联知识分子的庞大队伍。苏联知识分子的根基与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紧密相连。这是一个全新的知识分子群体，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找不到类似的群体。

任何一个国家都离不开自己的知识分子，社会主义的工人和农民国家更是如此。在苏联政权建立后的这些年里成长起来的我们的知识分子，构成了国家机关的干部队伍，工人阶级借助他们来推行其内外政策。他们是昨天的工人和农民，以及工人和农民的子女，如今已经走上了领导岗位。在像我们这样的国家里，知识分子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在这个国家里，国家管理着经济和文化的各个领域（我已标注。——Ю.Ж.），包括农业，而且每个国

家工作人员，为了有意识且成功地完成自己的工作，都必须理解国家的政策，以及国家在国内外的任务……

联共（布）中央指出，尽管知识分子在苏维埃国家中具有如此重要的作用，但直到现在，对我们的知识分子仍然存在着轻视的态度，这是一种有害的现象，是把革命前时期对知识分子的那些观点和态度错误地移植到了我们苏联的知识分子身上，而在革命前，知识分子是为地主和资本家服务的……

这种对苏联知识分子的反布尔什维克态度是野蛮的、流氓式的，并且对苏维埃国家来说是危险的。”[95]

无论语气多么激烈，也无论由于过度使用“苏联知识分子”这个词而显得多么令人厌烦，都无法让读者忽略主要问题。无法忽略在这种情况下，“知识分子”所指的并非一般意义上的“脑力劳动者”，而仅仅是国家机关中经过专业培训的工作人员。首先是“领导干部”——“党内和党外的”。无法忽略正是他们被置于未来在经济、农业和文化领域所有建设性活动的首要位置。是他们，而不是党的职能人员，被不断敦促尽快“消除自己在意识形态准备方面的不足和缺陷”。

这种公开甚至带有炫耀性的对原有干部政策的重新审视，如今明确地优先倾向于那些拥有高等教育的人，而不仅仅是党员身份，对于相关人士来说不应该完全是出乎意料的。联共（布）中央在半年前通过的另一项决议也暗示了这一点，尽管只是暗示，但相当明显。该决议禁止州党委、边疆区党委、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调动”，换句话说，就是禁止随意决定高校、高等技术学校、科研机构的共产党员研究生的命运。禁止迫使他们放弃继续学业，将他们派往新的工作地点。[96]这样一来，政治局在一定程度上已经透露了其深远的计划，即把最高资质的专业人员推上国家机关的领导岗位——也就是那些很快要进行论文答辩的人。

11 月 14 日的决议同时也解释了在解决干部问题时的新优先事项。它承认，干部队伍的主体（“很大一部分”）——党员，是文化程度不高的人。对于他们来说，《简明教程》这本书在内容和形式、风格上都过于贫乏，难以理解和接受。因此，对于这类共产党员，应该按照简化的程序组织他们学习这本书，通过宣传员的口头讲解让他们了解这本书。但决议也承认了另一点。预先假定高级干部应该具备这样的知识，使他们能够独立学习的不仅是《简明教程》，还有“原始资料”——专门挑选并推荐的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的个别著作。

《关于宣传工作的决议》当然不能仅仅局限于《简明教程》的学习和干部问题。它认为有必要改变从州党委、区委到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等所有各级党组织机构的结构。将之前彼此独立运作的宣传鼓动部门、印刷和出版部门合并为一个宣传鼓动部（ОПиА），而在那些之前根本没有此类部门的个别州党委、区委、专区党委，则立即成立该部门。

新的结构不可避免地成为了关键部门之一，因为它对党的主要职能——意识形态，拥有全面且无遗漏的控制权。从现在起，它应该领导全国所有的印刷业，掌控这一“党的最重要武器”，以及所有的出版社，并通过它们领导文学艺术领域，还应领导联共（布）中央的理论中心——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及其各加盟共和国分院。宣传鼓动部在众多方面如此关键的决定性作用，在政治局和核心领导层中引发了合理的担忧。对成立这个新部门的隐性反对力量非常强大，以至于政治局不得不在 10 月 12 日、11 月 14 日和 21 日三次讨论这个问题，重新做出决定。直到第三次讨论时，才最终确定了该部门的成立，并任命 А.А.日丹诺夫为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部长。[97]日丹诺夫虽然已经担任中央委员会委员和中央书记四年多，担任政治局候补委员三年多，但在这期间，他实际上一直处于权力边缘。因为

直到 1937 年 4 月 16 日政治局做出决定后，他才开始在莫斯科的中央机构工作，每两个月中有一个月在中央工作，而不是像之前那样每月只有十天在中央工作。[98]

最后，11 月 14 日的决议与七天后通过的另一项决议，成为了加速已经在进行的、核心领导层构成必然发生变化这一进程的催化剂。这体现了斯大林早在 1937 年二三月中央全会上就表达过的意图。“我们这些老同志，”这位五十七岁的领导人意味深长地说，“政治局委员们，很快就要退下来，离开舞台了。这是自然规律。我们希望能有几批接班人。”[99]

起初，这些变动完全合乎逻辑地只涉及党组织机构的领导层面。但正是这些变动，让我们能够相当有把握地确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在这两年里，究竟是谁一直在幕后策划和推行这些改革？是谁取得了成功并因此得到了晋升？11 月 27 日，政治局关于联共（布）中央书记之间再次进行重大职责重新分配的决议，就展示了这一切。

自 1935 年 2 月起，安德烈耶夫接替卡冈诺维奇履行实际上的第二书记职责，他主持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会议，监管中央委员会事务管理工作，以及中央委员会的工业和交通部门。如今，除了原有的职责外，他还承担起“监督”农业人民委员部工作的任务。现在，他不得不将大量时间用于解决紧迫的经济问题，而不再主要关注党组织机构的事务。

叶若夫在写下忏悔信并被免去内务人民委员的职务后，只是名义上仍担任党的监察委员会主席，监管组织分配部。他完全失去了自己在“六人小组”中原本的角色。然而，直到四个月后的 1939 年 3 月 29 日，才正式免去他仍挂名的职务，接手他工作的是马林科夫、特别部门（斯大林的书记处）负责人 А．Н.波斯克列贝舍夫以及中央委员会事务主管克鲁平。

卡冈诺维奇虽然没有政治局的书面决议来明确规定，但在被任命为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以及同时担任两个重要人民委员部的部长之后，肯定不能再像以前那样“监督”合并后的莫斯科州委-莫斯科市委的工作了。

而日丹诺夫则接过了工作，从而使斯大林摆脱了大部分日常的、纯粹的例行事务。作为中央委员会书记和宣传鼓动部负责人，日丹诺夫不仅全面、几乎是独揽了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所有工作，还负责监管拥有数百万成员的共青团。

到 1938 年底形成的这种全新的权力平衡，不仅体现在变化不大的核心领导层的人员构成上，也体现在作为其自然补充和更新力量的下一级权力层的人员构成上。那些虽然没有进入政治局或其他党的高级机构，但仍然发挥着相当重要作用的人，他们不仅直接影响着政治路线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还决定着政治路线的走向。他们的起起落落，乍一看似乎难以理解、出人意料。

此前在国内鲜为人知的马林科夫和贝利亚崭露头角并担当重要角色，这是必然的。这对他们来说是当之无愧的奖赏，因为他们比其他人更有力地推动了叶若夫的倒台以及对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控制。对于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贝利亚来说，首先是因为他所领导的部门具有巨大的、无可比拟的重要性和实际影响力，其次才是他个人在结束大规模镇压以及利用一切手段确保国防工业快速发展方面所做出的贡献。对于格奥尔基·马克西米利安诺维奇·马林科夫来说，则是凭借纯粹的机构运作手段和他精心准备的官僚程序，而这得益于政治局 9 月 20 日的一项简短但影响深远的决议。该决议指出：“在苏联所有人民委员部中设立人民委员助理（主管干部）这一职务。规定人民委员助理（主管干部）直接向人民委员负责，并定期就其全部工作向联共（布）中央组织分配部汇报（我已标注。——Ю.Ж.）。”这一决议使马林科夫几乎完全掌控了干部队伍的组建，从而实际上控制了不仅是党的，还有苏维埃和苏联人民委员会权力机构的人员，使他们切实服从于自己。

所有这些情况造就了这样一种局面：贝利亚和马林科夫的决策和行动实际上直接对斯大林负责。他们成为了那个核心小团体的非正式成员，这个小团体除了“五人组”之外，还包括安德烈耶夫和日丹诺夫，真正的权力就掌握在他们手中。

同样必然且不可避免的是，当时两位身居要职的人物的失势。10 月 15 日，莫斯科党组织的第一书记 А.И.乌加罗夫被撤职。按照传统和不成文的规定，莫斯科党组织第一书记拥有特殊的、特权地位，其地位远高于其他地区的党组织负责人。乌加罗夫是一位老资格的干部，是基洛夫提拔的人，他曾担任列宁格勒州委第二书记长达六年，实际上是日丹诺夫的副手，直到 1938 年 2 月 10 日才来到莫斯科接替赫鲁晓夫。然而，乌加罗夫成为了新一轮干部清洗的受害者，很可能是因为他参与推行了之前的路线，但与半年前不同的是，对他并没有提出政治指控，而是指责他在工作中的失职。“……由于政治上的盲目、疏忽和官僚主义，以及莫斯科市委领导对为民众服务的漠视，今年 5 月至 6 月，在苏联首都莫斯科，出现了肉类供应中断和肉店排队的现象，而目前又出现了人们排队购买卷心菜和土豆的情况，莫斯科地区的土豆和蔬菜储备出现短缺，莫斯科的木材供应也面临威胁……”随后的“组织处理决定”异常严厉：“1.免去乌加罗夫同志莫斯科州委和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的职务，将其调回联共（布）中央听候处理。2.对莫斯科苏维埃主席西多罗夫同志提出警告。”

十天后，根据马林科夫的提议，政治局“建议”莫斯科联合委员会主席团选举 А．С．舍尔巴科夫担任这个空缺的职位，舍尔巴科夫显然是日丹诺夫的人。舍尔巴科夫曾与日丹诺夫在下诺夫哥罗德并肩工作了七年，之后又在中央委员会机关任职。显然，在日丹诺夫这位老上司的支持下，舍尔巴科夫在苏联作家协会成立并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时被任命为该协会的书记。此后，他每年都会被调往不同的州委任职——先是列宁格勒州委第二书记，然后是伊尔库茨克州委第一书记、斯大林诺州委（顿巴斯）第一书记。与此同时，舍尔巴科夫也是一个具有妥协性的人物，他能让日丹诺夫、安德烈耶夫和马林科夫都接受他。但党内成员直到 12 月初才从莫斯科州委-莫斯科市委全会的报告中得知这些人事变动。

而在三周前，即 11 月 19 日，在莫斯科召开了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全会，会上解除了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 А．В.科萨列夫的职务。对他的指责是公然的政治错误：“严重违反共青团内部民主，对共青团的诚实工作者采取冷漠的官僚主义和敌对态度，庇护道德败坏、与党和共青团格格不入的分子，并包庇两面派分子。”但在所有这些冠冕堂皇的言辞背后，就像马林科夫在 1 月党的全会上的讲话一样，实际上隐藏着对科萨列夫参与大规模镇压的直接指责，指责他即使不谴责镇压行为，也不愿意与之划清界限。他至少应该像维辛斯基那样采取行动。

用 Н．А.米哈伊洛夫取代“职业共青团干部”科萨列夫，从各方面来看都是一个明智的选择。米哈伊洛夫不仅比他的前任年轻四岁，在年龄上更接近年轻人，而且知识更丰富，生活经验更广泛。米哈伊洛夫并非自己不愿意，而是没能从大学毕业并获得学位。他从事了八年的新闻工作，其中有两年担任国内最受读者欢迎的报纸之一《共青团真理报》的主编。所有这些都使他能够在尚未因成为公认的青年领袖而备受瞩目、未被盛名所累的情况下，轻松融入权力机构。他一直甘居次要、从属地位，甚至杜绝了给人留下任何具有独立性印象的可能性。

在科萨列夫和乌加罗夫这两个案例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的被撤职并没有伴随着对他们属于“布哈林分子”或“托洛茨基分子”的那种高调的、标准化的指责，也没有成为引发喧闹和屈辱审判的理由，更没有引发新一轮的镇压浪潮。此外，两人几乎同时被撤职，正如前面所提到的，这意味着核心领导层的权力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表明他们的庇护者 Л．М.卡冈诺维奇不得不“放弃”他们。卡冈诺维奇承认了失败，同意满足那些现在负责“监督”共青团和莫斯科州委-莫斯科市委工作的人的要求，即日丹诺夫和马林科夫。但与

此同时，这些“干部”变动也证实了：这个国家距离民主以及通过正常的退休方式来解决高层干部问题的文明方式还很遥远。逮捕仍然是政治路线转变的必然伴随物，而在乌加罗夫和科萨列夫的案例中，逮捕还被当作对“叶若夫时代”违法行为的象征性惩罚。

1938 年至 1939 年之交发生的所有事情，都迫切需要通过党的代表大会及其决议来加以巩固和从法律上予以确认。此外，欧洲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也越来越强烈地促使人们采取最果断、最激进的措施。

仅在 1938 年一年，由于西方民主国家的纵容，德国的人口增加了超过 1000 万——至少有 300 万是来自奥地利和苏台德地区的士兵和高素质工人。与此同时，柏林公然试图对苏联的乌克兰地区建立控制，这成为了英国和法国政府首脑在外交层面讨论的话题。

1938 年 11 月 2 日，在当时仍然存在但已名存实亡的捷克斯洛伐克，外喀尔巴阡乌克兰获得了一种奇怪的自治权。这显然是一种挑衅行为，使得张伯伦和达拉第寄希望于德国未来的侵略意图将指向苏联。11 月 24 日，英国首相满怀希望且毫不掩饰地对法国同僚表示：“德国政府可能有这样的想法，即通过支持乌克兰独立的煽动活动来开始分裂俄罗斯。”两周后，英国驻苏联大使馆参赞奥吉尔维-福布斯向哈利法克斯表达了同样的想法：“无论是在纳粹圈子还是非纳粹圈子里，似乎都有一种一致的观点，即下一个目标（实现这一目标的措施可能在 1939 年就会采取）是在波兰的协助下或在没有波兰协助的情况下，在德国的庇护下建立一个独立的俄罗斯乌克兰。”

12 月 6 日，里宾特洛甫和达拉第签署的声明也表明，西方民主国家愿意与希特勒达成默契，以牺牲苏联为代价。该声明称，两国今后在相互关系中仅以追求和平与睦邻友好关系为指导。这份文件使博内在给所有法国驻外使节的备忘录中声称：他的印象是“德国的政策今后将致力于与布尔什维主义作斗争”。

随后发生的事件似乎证实了伦敦和巴黎的幻想。1939 年 3 月 15 日，德国国防军的部队进入布拉格，柏林宣布彻底废除主权国家捷克斯洛伐克。而在慕尼黑会议之后，英国和法国曾保证捷克斯洛伐克将在新的、缩小的边界内得以保留。德国将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并入第三帝国，作为“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而自 1938 年 10 月起就已自治的斯洛伐克，在 3 月 14 日被宣布为“独立”国家，但却“置于德国的保护和监护之下”，德国随后立即占领了这个国家，并事先将其相当一部分领土，包括外喀尔巴阡乌克兰，移交给匈牙利，作为对匈牙利忠诚和支持纳粹吞并野心的奖赏。

伦敦官方的反应远不止具有象征意义。在一份名为“抗议书”的文件中，英国表明其完全置身于东欧发生的事件之外。“陛下政府，”在这份“抗议书”中告知柏林方面，“无意干涉其他国家政府可能直接感兴趣的事务……陛下政府将对一切可能破坏日益增长的普遍信任氛围的行为感到遗憾……”[106]

十天后，张伯伦试图为自己对希特勒的纵容行为辩解，他在一封私人信件中写道：“必须承认，我对俄国怀有深深的不信任。我一点也不相信它有能力发动真正的进攻，即使它想这么做。而且我也不信任它的动机，在我看来，其动机与我们的自由理念几乎毫无共同之处。它只想让其他所有国家陷入纷争。此外，许多小国，尤其是波兰、罗马尼亚和芬兰，都对它怀有敌意和猜疑。”[107]

事实上，这位英国首相是在试图在糟糕的局面下做出最好的表现。他不惜一切代价为自己的不作为辩护，进而诋毁苏联的官方声明。例如，莫斯科州委-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舍尔巴科夫无疑是根据上级指示，于 3 月 4 日发表声明：“我们将面临与资本主义、法西斯主义的决定性战斗。我们知道，这场斗争将是艰难的，需要付出牺牲并全力以赴。但布尔什维克坚信，在即将到来的战斗中我们必将取得胜利。”[108]

不过，如果说张伯伦即便知晓舍尔巴科夫的这番言论，也可能不会给予其应有的重视，那么他肯定得对 3 月 18 日苏联政府的照会做出回应。在这份照会中声明，苏联“不得不认定德国的行为是专横、暴力和侵略性的”。照会还指出，克里姆林宫“不能承认德国将捷克并入其帝国，以及以任何形式将斯洛伐克并入的行为是合法的，这些行为不符合公认的国际法准则、正义原则或民族自决原则”[109]。

不仅如此，同一天苏联政府还提出了一项极为重要的倡议，有可能为抵御德国创造条件。李维诺夫向英国大使递交了一份照会，其中提议召开由英国、法国、苏联、罗马尼亚、波兰和土耳其等最相关国家参加的会议，以制定出符合欧洲现有局势的共同立场。伦敦迅速宣称，认为此类会议“为时过早”，然而几天后，即 3 月 21 日，它改变了这一消极决定。英国提议苏联、法国和波兰签署一份联合声明，以进行磋商并确定共同抵御对这四个国家中任何一国侵略的措施。但到了 4 月 1 日，英国外交部又回到了“不干涉”的立场，放弃了自己先前的打算。

与此同时，欧洲大陆的局势日益紧张。2 月 9 日，西班牙内战以得到柏林和罗马支持的叛乱分子的胜利而告终，最后的共和派部队撤往法国，并在那里被拘禁。3 月 22 日，德国军队占领了自 1920 年起受国际联盟保护、自 1923 年起属于立陶宛的梅梅尔（克莱佩达）地区。两天后，柏林以最后通牒的形式要求波兰政府放弃对但泽的政治控制，并为连接自由市但泽与波美拉尼亚的铁路和高速公路确立治外法权。不久之后，4 月 7 日，意大利军队入侵阿尔巴尼亚，阿尔巴尼亚很快就被宣布为意大利帝国的一部分。

苏联领导层不可能不注意到、不严重关切两个非常引人注目的情况。西方民主国家对德国最近的所有侵略行为不仅没有采取任何回应行动，甚至没有进行严肃的外交抗议。此外，希特勒如此坚决地打破了凡尔赛体系，不知为何却从未提及德国在西部和北部失去的领土：割让给法国的阿尔萨斯和洛林；并入比利时的埃彭和马尔默迪地区；割让给丹麦的南石勒苏益格。第三帝国的边界调整完全只在东部进行。这显然表明了元首计划和意图的主要目标。因此，4 月初，舍尔巴科夫在莫斯科党积极分子的秘密会议上明确发出警告，表达了核心领导层的观点：“战争危险在增加……战争正在逼近。我们无法确定战争何时爆发，但有一点很清楚，战争已近在咫尺，我们终究还是要参战……”[110]

紧张的国际局势必然会对同一时期，即 3 月 10 日至 21 日召开的联共（布）十八大产生影响。几乎所有代表，无论是做报告的还是参与讨论的，都一致认为战争威胁不可避免，而且是同时来自两个方向：西方的德国和东方的日本。但令人惊讶和奇怪的是，所有人都回避了对苏联国防能力、军事装备质量、陆军、空军和海军状况进行深入的比较分析。军方人士，如国防人民委员 К. Е. 伏罗希洛夫、工农红军总参谋长 Б. М. 沙波什尼科夫、太平洋舰队司令 Н. Г. 库兹涅佐夫、第一滨海集团军司令 Г. М. 施特恩，以及后来成为伟大卫国战争英雄、当时还默默无闻的 А. И. 罗季姆采夫上校、И. В. 潘菲洛夫上校，还有政府官员，如航空工业人民委员 М. М. 卡冈诺维奇、造船工业人民委员 И. Ф. 捷沃相，都表现出了过度的乐观情绪。他们显然是在“盲目乐观”，向大会和整个国家保证，如果敌人胆敢进攻，必将立即被击败，无法越过边境一步。

甚至莫洛托夫在向大会提交第三个五年计划草案、对其进行解释并阐述其特点和主要方向时，也刻意没有提及国防工业的存在，以及它需要解决的任务。不过，他做了另一件事。他大胆地对过去两个五年计划所取得的成就做出了在当时相当不寻常的评价。他不仅承认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存在极其严重的失败，还坚决要求“结束苏联经济水平不足的现状”[111]。

斯大林对局势的描述则更为清醒。他没有刻意让听众关注这一点，但还是指出：苏联工业的成就具有欺骗性，一旦将所有产出按人均计算，这些成就就失去了所有意义和吸引力。

这表明我们与所有工业发达国家相比存在巨大差距，因为在这种比较体系下可以发现：我国的指标比英国低一倍，更不用说美国或德国了。而要消除这种差距“需要时间，而且是大量的时间”——十到十五年。他没有直接说苏联没有为战争做好准备，但正是基于这一点，他将对外政策目标表述如下：“推行和平政策，加强与所有国家的商业联系”，“保持谨慎，不让我们的国家卷入冲突”[112]。

然而，尽管这些问题非常现实且重要，大会并没有局限于此。大会对《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以及 11 月 14 日《关于宣传工作》的决议中只是略有暗示的内容给予了同样多，甚至更多的关注。大会着手进行了一项自 1917 年 10 月以来真正史无前例、前所未有的工作——对共产党本身及其在国家治理中未来的作用进行全面重新评估。

在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报告中，再次提到了苏联进入新的“阶段”（这个术语只有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使用了两次，这让人有理由推测——正是他创造了这个术语）或“时期”（用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的话来说）的发展。但只有斯大林不仅使用了这个概念，还解释了这个国家生活中宣告的历史性独立时期的本质。与之前从十月革命到新宪法通过的两个阶段不同，这个阶段在于“和平的经济组织和文化教育工作”，此时军队和内务人民委员部“不再针对国内，而是针对国外的外部敌人”。这体现了社会已经实现的政治道德上的统一、各民族的团结、苏联的爱国主义，其基础是共产党员和无党派人士的联盟以及选举制度的民主性。

反过来，所有这些都产生了对新干部的迫切需求。确切地说是新干部。“老干部，”斯大林指出，“当然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然而，他继续阐述道，他们“有一种固执地回顾过去、停留在过去、拘泥于旧事物而忽视生活中新事物的倾向”。他提议努力巧妙地结合对新老干部的依靠，并优先任用年轻干部。他甚至提出了“提拔年轻新干部”这个早已不新鲜的口号。他深知，对那些仅拥有高等教育和专业经验这一优势的人采取这样的态度，并非能得到所有人的认可和支持，于是他又回到了 11 月 14 日决议中提到的观点：“对于新的知识分子，需要一种新的理论，这种理论要表明对他们友好相待、关心他们、尊重他们并与他们合作的必要性。”[113]

不过，或许最坦率地揭示了新“阶段”——“时期”本质的是日丹诺夫。他就联共（布）章程这样一个看似与现实生活中的紧迫问题相距甚远的问题发表讲话，完全是有意地继续阐述了未来十到十五年的本质。他直接指出，这将在于党与国家的分离。他将这一措施的必要性与解决纯粹的经济问题联系起来。“在那些党组织承担了不属于它们的经济管理职能，取代并架空了经济管理机构的地方，”日丹诺夫强调，“工作必然陷入僵局。”他正是这样解释了之前几个五年计划的所有失误和失败。而且他说的已经不是州委、边疆区委或区委，而是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机关，他宣称：“如今各产业部门不知道自己到底应该做什么，他们允许经济管理机构被取代，与这些机构竞争，而这就导致了工作中的职责不清和缺乏责任感。”[114]他不顾党的官僚阶层会对他的提议作何反应，宣布撤销这些部门。除了两个部门——暂时保留的农业部（因为其仍然具有重要意义）和学校部门（因为当时国家没有全联盟的教育人民委员部）之外的所有部门。

他进一步阐述了斯大林在报告中提出的观点，提议全面重构党的机构结构。将其建立在两个基础之上。一个是干部管理（干部管理局），从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的讲话背景来看，这只能意味着一件事——实施对“知识分子”，更确切地说是对拥有高等教育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新政策，应该将这些人提拔到领导岗位上。而且不仅是在国家机关，在党的机构中也是如此，因为日丹诺夫指出，甚至在州委、边疆区委和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书记中，超过 40%的人甚至没有中等教育水平。

党机构今后赖以支撑的第二个基础是宣传鼓动管理部门（宣传鼓动部）。它承担两项主要职能：通过其掌控的报刊、广播、出版社、文学和艺术等进行宣传鼓动工作，以及从理论层面（“共产主义教育”）对全体党和国家公职人员进行培养。在针对基层干部的年度进修培训班、为期两年的列宁学校（针对中层干部）以及联共（布）中央所属的为期三年的高级党校（为高级领导干部培养后备力量）中开展相关工作。

与此同时，日丹诺夫还公布了其他一些同样重要的计划，这些计划将从根本上改变党内生活的整体面貌，以及党本身的性质。大会被提议批准废除一系列原则性规定。此前存在的“类别”，换句话说，就是按照阶级标准对入党人员进行划分，分为工人、农民、职员，其中自然是工人享有绝对优势。这样一来，联共（布）为职员、“苏联知识分子”敞开了原本极为困难且受限的大门，这些人立即积极地开始实际上模糊党的“无产阶级”成分构成。也正因如此，在统计数据汇报时，就有必要将党员中的工人和职员归为一组，以掩盖后者数量不断增长的优势。

日丹诺夫以不容置疑的方式提议确定废除党内各级组织领导的推选制，改为公开的、“列名单式”的选举。用无记名投票的新程序取代旧程序，这理应体现党内民主的胜利并保障党内民主。日丹诺夫提出并得到大会批准的另一项提议也旨在实现这一目标，即废除此前或多或少经常进行的大规模清洗，因为大规模清洗曾是可能再次发生大规模镇压的潜在依据。

最后，由于又一项变动，现在对入党者的要求不再是“掌握”（即深入了解党章和党纲），而仅仅是“承认”它们。如今，不再期望新党员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也就意味着不再期望他们具备相应的意识形态、信念、觉悟和坚定的观点。实质上，所有即将加入联共（布）队伍的人都应成为某种特殊“联盟”或“人民阵线”的一部分。他们只需凭借自身的数量优势，为领导国家、确定党的路线、策略和战略的那个小团体赋予掌权的权利。

就这样，从联共（布）十八大开始，仅仅因为几项看似微不足道的调整，联共（布）甚至在形式上，依照党章规定，也不再是革命和国内战争年代以及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的那个党了——不再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激进和极端主义政党。它公开转变为一个为政权提供干部和意识形态保障的政党。与此同时，党的领导层也出现了相当重大的变动，这表明那些改革的发起者和推行者的地位得到了加强。

在 1939 年 3 月 22 日召开的中央全会上，在政治局中，很久以来就不再发挥重要作用，但作为革命时代光荣代表、象征着传承的 Г.И.彼得罗夫斯基被正式接纳为政治局委员的 А.А.日丹诺夫所取代，在大会召开以及关于改组党机构的正式决议通过之前，日丹诺夫就已成为宣传鼓动部的负责人。Л.П.贝利亚被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这最终巩固了他在领导层中的地位，Н.М.什维尔尼克也被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但他更多的不是以苏联工会主席的身份，而是作为“年轻干部”的一种制衡力量。中央书记处的人员变动更为显著。Л.М.卡冈诺维奇被从书记处中除名，这再次证明了他的职业生涯走向衰落，而 Г.М.马林科夫则进入了书记处，他同时也被选入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一个月后的 3 月 31 日，他还被任命为干部管理局局长[115]。日丹诺夫和马林科夫的任命在时间上存在如此明显、引人注目的间隔，只能用一个原因来解释。那就是，作为明显的改革者，格奥尔基·马克西米利安诺维奇·马林科夫的晋升遭到了核心领导层中保守派的强烈、顽固抵制。这些人有理由不仅担心干部政策的全面改变，而且担心作为其后果，自己的未来——失去以往的绝对权力。

第五章

在联共（布）十八大上，虽然斯大林声称战争已经开始，只是尚未具有全球性，但人们并未公开、明确地谈论苏联的实际战备情况。不过，正因如此，为了应对几乎不可避免的侵略，苏联采取了诸多措施。首先，在短短几个月内，迅速对显然已经无法胜任的经济部门管理体系进行了重组，这些部门直接或间接地与武器生产相关。

1939 年 1 月 11 日，庞大且僵化、已证明无法在工作中取得积极进展的国防工业人民委员部（由 М.М.卡冈诺维奇领导）被拆分为四个部门，这四个部门明确体现了各自的专业细分。新成立了航空工业人民委员部（简称航工民委，由 М.М.卡冈诺维奇领导）、造船工业人民委员部（简称船工民委，由 И.Ф.捷沃相领导）、弹药人民委员部（简称弹民委，由 И.П.斯米尔诺夫领导）和武器人民委员部（简称武民委，由 Б.В.万尼科夫领导）。诚然，在此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不可避免的小失误。例如，将子弹生产的责任划归武民委，而弹壳和火药的生产则由弹民委负责。此外，尽管坦克工业在现代战争中具有重要意义，但它仍仅作为机器制造人民委员部下属的一个总局（机械制造总局）存在。

1 月 24 日，将最重要的工业部门独立设为人民委员部的工作继续进行，长期以来多次改组的重工业人民委员部（由 Л.М.卡冈诺维奇领导）被撤销。取而代之的是，在其基础上成立了燃料工业人民委员部（由 Л.М.卡冈诺维奇领导）、电站和电力工业人民委员部（由 М.Г.别尔乌辛领导）、黑色冶金人民委员部（由 Ф.А.梅尔库洛夫领导）和有色冶金人民委员部（由 А.И.萨莫赫瓦洛夫领导）、化学工业人民委员部（由 М.Ф.杰尼索夫领导）。2 月 5 日，进一步对工业管理进行细分，机器制造人民委员部（由 В.К.利沃夫领导）被拆分为重型机器制造人民委员部（由 В.А.马利舍夫领导）、通用机器制造人民委员部（由 П.И.帕尔申领导）和中型机器制造人民委员部（由 И.А.利哈乔夫领导），并在中型机器制造人民委员部中保留了“坦克”总局。10 月 12 日，燃料工业人民委员部又被拆分为石油工业人民委员部（由 Л.М.卡冈诺维奇领导）和煤炭工业人民委员部（由 В.В.瓦赫鲁舍夫领导），至此完成了这一系列的拆分工作。

这类行政措施迅速得到了财政方面的支持。3 月 23 日，政治局重新审议了此前通过的本年度第二季度国民经济计划，并确定了预算支出部分如下：航工民委为 14.67 亿卢布，船工民委为 6.741 亿卢布，武民委为 11.479 亿卢布，弹民委为 10.798 亿卢布，各机器制造人民委员部为 35.182 亿卢布，而这些部门的总支出占分配给整个工业的 231.789 亿卢布的三分之一。1939 年全年的预算则更明显地显示出对备战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航工民委获得 23.854 亿卢布，船工民委获得 21.627 亿卢布，弹民委获得 25.292 亿卢布，武民委获得 14.189 亿卢布，国防人民委员部获得 333.793 亿卢布，海军人民委员部获得 77.241 亿卢布，内务人民委员部获得 54.427 亿卢布。总体而言，考虑到坦克制造的支出，这些费用恰好占苏联预算支出部分的一半。这种趋势在次年得以稳定。在又一次几乎成为必然的计划调整中，预计第三季度的支出如下：四个国防工业人民委员部的支出为 20.82 亿卢布，三个军事部门的支出为 158.75 亿卢布，也就是说，这些支出总和略超过预算支出部分（354.63 亿卢布）的一半[116]。

毫无疑问，这一切意味着苏联不得不放弃在近期哪怕是最小程度地改善民众生活水平的尝试。限制主要食品的消费，不再像以前那样扩大日用品的生产，削减在教育、医疗和文化方面的支出。国防开支的增加是由非常严重的原因导致的。例如，西班牙内战揭示了一个令人不快的事实：苏联的航空制造业不仅在飞机总产量上比德国落后一倍，而且生产的是过时的军事装备型号。德国的 Me-109E 型战斗机比苏联的 И-16 战斗机具有绝对优势，而容克-87 型轰炸机也优于苏联的 СБ 型轰炸机。同样在西班牙，苏联的轻型和中型坦克都暴露出

了严重的结构缺陷，必须尽快用全新的、与之前有本质区别的型号来替代它们。最后，德国占领捷克斯洛伐克使斯柯达公司能否按照长期协议交付各种火炮（包括在伟大卫国战争期间成为国土防空军炮兵基础的 76 毫米和 85 毫米高射炮）变得不确定。新成立的四个国防工业人民委员部以及为相关工作（包括研发新型军事装备）提供资金，为老旧国防企业的现代化改造和新国防企业的创建提供了必要条件。

从对重工业的重组开始的管理体系改革，不可避免地扩展到了国民经济的其他部门。轻工业人民委员部（由 В.И.舍斯塔科夫领导）被拆分为两个部门——轻工业人民委员部（由 С.Г.卢金领导）和纺织工业人民委员部（由 А.Н.柯西金领导）。食品工业人民委员部（由 И.Г.卡巴诺夫领导）被拆分为三个部门——食品工业人民委员部（由 В.И.佐托夫领导）、肉奶工业人民委员部（由 П.В.斯米尔诺夫领导）和渔业人民委员部（由 П.С.热姆丘日娜领导）。水运人民委员部（由 Н.И.叶若夫领导）也被拆分为两个部门——海运人民委员部（由 С.С.杜凯尔茨基领导）和内河航运人民委员部（由 З.А.沙什科夫领导）。与此同时，1939 年春天，建筑材料工业委员会（由 Л.А.索斯宁领导）和建设委员会（由 С.З.金斯堡领导）改组为人民委员部，并且还成立了一个新的委员会——地质委员会（由 И.И.马利舍夫领导）。

苏联政府成员数量的大幅增加，以及他们相对摆脱了联共（布）中央各部门、地方党组织（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边疆区委、州委）此前颇为繁琐的监督，还有新的干部政策（确保了合格的专业人员进入各级领导岗位），所有这些都对苏联经济状况，包括国防工业的改善，产生了积极影响。然而，更为重要的是，从 1939 年初开始在政府内部实现的稳定局面。

1938 年 11 月 17 日和 12 月 1 日的联合决议，很快就证明并非一纸空文。它们确实对国内政治局势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尽管从决议内容来看，它们并没有消除无端镇压的现象。非法逮捕、由非司法机构做出的判决（包括判处“最高刑罚”）仍未停止。但它们确实改变了此前那种真正全面、毫无节制的镇压性质。这些决议主要（如果不是唯一的话）对高层官僚（包括党内和国家官僚）的处境产生了实际影响。这些决议为他们提供了人身安全保障，消除了（但同样只是针对他们）不仅是失去职位，更可怕的是失去自由甚至生命的持续威胁。

情况向好的转变很快就变得十分明显，其方向也毋庸置疑。如前所述，仅在 1938 年上半年，就有两名政治局委员（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 С.В.科西奥尔和 В.Я.丘巴尔）、两名政治局候补委员（农业人民委员 Р.И.叶若夫和库比雪夫州委第一书记 П.П.波斯蒂舍夫）遭到镇压，而不论他们的职位高低。然而，此后镇压行动突然停止了。诚然，1939 年 3 月 29 日，水运人民委员兼党的监察委员会主席 Н.И.叶若夫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但是，他被秘密逮捕、撤职，没有任何事先的说明，人们不应再将此视为令人担忧的复发，或是过去镇压做法卷土重来的危险信号。这是早已注定的。这是那场过去风暴的最后回响。这是同一联合决议的自然且必然的结果，尽管有些姗姗来迟。只有在此之后，国家高层领导成员才能感到完全的安全，对未来充满信心。

在随后的十五年里（当然，当时没人能预知这一点），在他们之中只有三人遭到镇压。1949 年，政治局委员、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 Н.А.沃兹涅先斯基和联共（布）中央书记、负责国家安全机构的 А.А.库兹涅佐夫遭到镇压。1953 年，又有一名政治局委员、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内务部长 Л.П.贝利亚遭到镇压。

类似的“安全区”也在一定程度上扩展到了权力结构的下一级——苏联各人民委员。这一点从他们的命运在上述决议通过后发生的根本性变化中得到了有力证明。

1938 年 1 月 19 日，苏联第一届最高苏维埃第一次会议根据新宪法批准了苏联政府的组成。然而，十二个月后，政府成员中只有一半（29 人中的 14 人）仍留在原岗位上。其余的人都被逮捕了。不仅如此，在接下来的半年里，又有五名人民委员被免职。但此时出现了新的情况。如果说以前被撤职的部门负责人往往是毫无踪迹地消失，那么现在他们只是被降职或退休。例如，林业工业人民委员 Н.М.安采洛维奇、渔业人民委员 П.С.热姆丘日娜、外交人民委员 М.М.李维诺夫、中型机器制造人民委员 И.А.利哈乔夫、黑色冶金人民委员 Ф.А.梅尔库洛夫、采购人民委员 С.Е.斯克里尼科夫就是如此。

从 1939 年 3 月到 1941 年 6 月，在作为人民委员或相当职位进入苏联政府的 65 人中，有 20 人被免职。乍一看，如果不考虑最关键的因素，这一比例与“叶若夫时期”的高峰期相近。其中四人（总检察长 А.Я.维辛斯基、А.Н.柯西金、В.А.马利舍夫、М.Г.别尔乌辛）得到了晋升；两人（К.Е.伏罗希洛夫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 Р.С.杰姆利亚奇卡）仅成为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八人被降职。只有两人遭到镇压：海军人民委员 М.П.弗里诺夫斯基（此前在 1938 年 8 月之前担任内务人民委员部副部长兼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局长）和 Б.Л.万尼科夫（1941 年 6 月被捕，但几个月后获释并再次被任命为弹药人民委员部人民委员）。可以较为宽泛地将 М.М.卡冈诺维奇也归入此类，他先是被免去航工民委主席的职务，调任第 1242 号航空厂厂长，后来结束了自己的职业生涯。此外，弹药人民委员 И.П.谢尔盖耶夫、有色冶金人民委员 А.И.萨莫赫瓦洛夫和卫生人民委员 М.Ф.博尔迪列夫的命运仍未明确。

在这类人事变动中，有一个并非形式上的重要细节。从 1939 年春天开始，几乎所有被免职的人民委员（除了 П.С.热姆丘日娜[117]）都没有受到政治指控，没有人被宣布为人民的敌人，也没有人被审判。他们因“工作失败”而被免职，而且往往是在多次因对其所负责行业的企业管理不善而受到警告和斥责之后。

例如，关于 И.А.利哈乔夫的问题首次出现在 1940 年 8 月 14 日，原因是“吉姆”牌和“З и С-101”牌轿车模型的试验失败。随后，9 月 6 日，根据 В.А.马利舍夫的提议，利哈乔夫针对莫斯科汽车厂的命令被宣布为“错误”而撤销。直到 10 月 2 日，政治局才做出决定：“鉴于利哈乔夫同志多次不执行政府决议，以及在生产工艺纪律方面违反政府具体指示的不可容忍行为，免去利哈乔夫同志中型机器制造人民委员的职务并降职。”他（并非立即，而是过了一段时间）被调任为莫斯科汽车厂厂长[118]。

同样，弹药人民委员部领导人 И.П.谢尔盖耶夫被免职也是早有预兆。1940 年 9 月 26 日，政治局在审议了基洛夫州委第一书记关于弹药厂产品生产“灾难性”状况的报告后，责成 Л.З.梅赫利斯和 Л.П.贝利亚全面检查该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一个半月后的 11 月 11 日，根据这次检查的结果，采取了极为严厉的措施。“警告”了弹药人民委员部第二总局局长伊万诺夫，免去了副部长托尔斯托夫的职务并降职，解除了弹药人民委员部党组织书记阿加托夫的职务，逮捕了副部长赫连科夫，并将他的“案件”移交内务人民委员部。最后，在 1941 年 3 月 1 日，由于子弹生产没有增加，政治局又做出了一项决定——免去 И.П.谢尔盖耶夫本人的职务[119]。

对苏联国家银行行长 Н.К.索科洛夫的活动也给予了严厉的负面评价，他在这个职位上仅工作了半年就被认为“工作失败”而被免职。接替他的 Н.А.布尔加宁被要求“立即消除国家银行在业务处理中的混乱局面，以及在国家银行中被党的监察委员会检查发现的对文件的犯罪态度”[120]。

与此同时，对 1939—1941 年苏联政府组成情况的分析，可以发现另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特点，而这个特点正是在那个时期显现出来的。人民委员中留任时间不再像他们的前任那样只有几个月，而是显著地、长得多的人数逐渐增加。例如，在 1941 年苏联人民委员会

的 45 名成员中，有 5 人在这个职位上工作了 6 年，4 人工作了 7 年，6 人工作了 8 年，2 人工作了 9 年，18 人工作了 10 年以上。其中，最后这 18 人中的 4 人——В．А．马利舍夫、Г．М．奥尔洛夫、М．Г．别尔乌辛和 И．Ф．捷沃相——工作了 18 年，А．Г．兹韦列夫工作了近四分之一个世纪，而 А．А．伊什科夫、А．Н．柯西金、Д．Ф．乌斯季诺夫工作了 40 年以上，这最终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其消极的一面。

但即使在少数人民委员被免职的情况下（无论是晋升还是降职，都无所谓），接替他们职位的人不再像过去二十年那样从外部选拔，而通常是他们的第一副手。这些人拥有高等教育和专业经验。例如，在别尔乌辛被任命为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并且电站和电力工业人民委员部按行业拆分为两个部门后，情况就是如此。接替他的是原来相应的副手：В．В．博加特廖夫成为电站人民委员，А．И．列特科夫成为电力工业人民委员。当 1942 年因工作失败免去博加特廖夫的职务时，他的职位又一次由第一副手 Д．Г．日梅里宁接任。有色冶金人民委员 П．Ф．洛马科、石油工业人民委员 И．К．谢金、中型机器制造人民委员 С．А．阿科波夫也都经历了类似的职业发展阶段。

在这种成为必然的高级管理职位更替体系中，还出现了一种特殊的、独特的变体。在极少数特殊情况下，会专门为第一副手任命一个“在人民委员之下”的职位。当出于政治原因决定免去该部门负责人的职务时，无论是晋升还是降职，都会出现这种情况。时间和意义都非常明显的任命例子有：Л．П．贝利亚“在”Н．И．叶若夫之下，А．И．亚什科夫“在”П．С．热姆丘日娜之下，Н．Г．库兹涅佐夫“在”М．П．弗里诺夫斯基之下，М．З．萨布罗夫“在”Н．А．沃兹涅先斯基之下。

苏联政府组成的稳定性——这是完全自然、正常且有利于工作的状态，在大规模镇压的那些年里人们已经对此非常陌生——总体上对高层权力的稳定产生了积极影响。但同样重要的因素是，从 1939 年开始，几乎所有被任命到如此高位的人民委员都具备了在当时绝非寻常的品质。与老一辈领导干部（主要是党的职能人员）不同，他们不仅拥有高等教育，而且尽管年轻，却已经能够在生产岗位上凭借专业工作数年，从内部了解生产情况。换句话说，联共（布）十八大所推崇的那些选拔干部的标准开始发挥作用。这种纯粹的工作导向、甚至可以说是实用主义的选拔方式，使得苏联人民委员会真正具备了专业素养。到 1940 年底，这样的人民委员在 47 名成员中占了绝大多数——31 人。

同样的选拔方式在任命苏联人民委员会下属各委员会主席、各总局和管理部门负责人时也越来越得到确立，这些人虽然领导着独立的部门，但根据宪法是由苏联人民委员会而非苏联最高苏维埃批准任命的。例如，1939 年任命文学评论家 М．Б．赫拉普琴科为艺术事务委员会主席，地质学家 И．И．马利舍夫为地质事务委员会主席，化学家 С．В．卡夫塔诺夫为高等学校事务委员会主席，地球物理学家、北极研究所所长 Е．К．费多罗夫为水文气象总局局长，著名的极地探险家兼实业家 И．С．帕潘宁为北方海路总局局长，飞行员 В．С．莫洛科夫为民航总局局长，石油工业人民委员部副部长 Я．И．多岑科为石油总局局长，林业工业人民委员部副部长 Е．И．洛普欣为林业总局局长……

偏离这些规则的情况越来越少，但每次都与有必要为那些没有任何业绩的官僚在官僚等级制度中保留高位“官职”有关。最典型的这种公然形式上的调动例子是，任命在苏联人民委员会担任了十年管理助理和管理工作的 И．Г．博尔沙科夫为电影事务委员会主席。

昨天的工程师、工厂厂长要在等级阶梯上实现大幅跃升并非易事，也不会毫无痕迹。首先，这产生了一种特殊的工作风格，通常人们认为这种风格只属于斯大林的怪癖，他更喜欢主要在晚上和夜里工作。这也导致了人们心理上的变化，对于一个意外发现自己处于权力巅峰并且还能留在那里的人来说，这种变化是不可避免的。在唯一真实、因偶然因素躲过审查和自我审查的回忆录中，这样一个人的代表——先是人民委员，后来成为海军人民委员部部

长的海军上将 Н.Г.库兹涅佐夫，对自己新处境的评价、对新游戏规则的领悟以及对这些规则的适应就是这样解释的。

“当然，经验和知识是不够的，”库兹涅佐夫回忆道，“我不得不通过增加工作时间来弥补……我是稳步晋升的坚定支持者，但我晋升得太快了，跳过了一些级别，并且在一些职位上甚至没有达到最低规定的任职时间……这无疑是一个缺点，我意识到了这一点，试图通过挑选有经验的人作为我的副手并更频繁地与他们商量来弥补这一点。”但紧接着回忆录的作者不得不承认一个不愉快的事实：“永远不能完全依赖助手，也不能过度信任他们。只能依靠自己，否则在某些情况下你会陷入愚蠢的境地。”

然后是这样的话，任何一个党的职能人员都不会允许自己哪怕在一本不打算给别人看的日记中记录下来：“此外，在高位上不仅需要知识和经验，还需要像人们说的那样，有能力牢牢地坐在自己的位子上。”库兹涅佐夫真诚的自我评估的结果是，他承认自己性格的变化仅仅是因为他能够保住“位子”——“如果说在莫斯科担任新职务的头几个月里，我觉得自己过早地坐在了这个位子上，那么逐渐地我确信自己能够胜任这个职位的工作。也许这其中有夸大的成分。也许一个人并不总是能够批判性地看待自己，并且往往更倾向于高估自己的能力，而不是低估它们。”[121]

……一个不太引人注意但同样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干部政策发生了根本性转变的情况，也同时在更低的、加盟共和国层面普遍确立起来。但不是在 1939 年初，而是早在 1938 年年中，与各加盟共和国最高苏维埃的选举及其第一次会议同时发生。诚然，在推选担任高级领导职务时，被认可的标准非常独特。不是专业素养、教育程度，而仅仅是属于当地的主体民族。

正是在那个时候，白俄罗斯、外高加索、中亚的国家权力分支才获得了开展有计划工作所必需的稳定性。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和人民委员会主席分别是 Н.Ф.纳塔列维奇和 К.Н.基谢廖夫，阿塞拜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是 М.卡苏莫夫和 Т.库利耶夫，格鲁吉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是 Ф.马哈拉泽（1941 年他去世后是 З.丘比阿尼什维利）和 З.凯乔瓦利，亚美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是 Г.帕帕扬，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是 А.卡扎克巴耶夫和 Н.温达辛诺夫，乌兹别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是 Ю.阿洪巴巴耶夫和 А.阿卜杜拉赫曼诺夫，土库曼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是 Х.巴巴耶夫和 А.胡达伊别尔根诺夫，塔吉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是 М.沙加达耶夫和 М.库尔巴诺夫，吉尔吉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是 А.托卢巴耶夫和 Т.库拉托夫，他们至少在这些共和国宪法规定的任期内一直担任各自的职务。

在乌克兰也可以看到类似但只是部分相似的情况。1938 年当选为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的 Л.Р.科尔涅茨在权力巅峰停留了很长时间，但绝不是一成不变。几个月后，他就被调到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职位上，取代了 Д.С.科罗琴科。而科罗琴科也没有失去他的“官职”地位，但直到 1947 年才再次担任这个职务。1939 年，М.С.格雷丘哈成为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并且一干就是 16 年。

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的职位最为稳定——А.Е.巴达耶夫连续担任了 5 年，直到因在访问蒙古期间的不道德行为被免职[122]。而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职位则变成了一个特殊的起点平台，几乎是晋升到联盟层面的一个阶梯。1938 年夏天被任命的 Н.А.布尔加宁，同年年底就被任命为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国家银行行长。他的继任者 В.В.瓦赫鲁舍夫也仅仅过了几个月，就被任命为苏联煤炭工业部部长。只有 И.С.霍赫洛夫没有像他的前任们那样得到晋升，他在这个职位上任职了 4 年。

但如果说新干部原则在老的加盟共和国中占据主导地位是出乎意料、突然的，因此也在相当程度上能被明显感觉到，那么对于1940年才成立的新加盟共和国来说，这已经是一种自然的、不言而喻的、似乎是唯一可能的状态。部分原因是，正是在这些新加盟共和国的高层权力机构中，后来才普遍出现了长期的任职稳定性。摩尔达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布罗夫科在这个职位上任职了10年；拉脱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А.基尔兴施泰因任职了12年；卡累利阿—芬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О.库西宁任职了16年；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Ю.帕莱茨基斯任职了27年。人民委员会主席的任职年限也不遑多让：立陶宛的М.格德维拉斯任职了16年，拉脱维亚的В.拉西斯任职了19年；卡累利阿—芬兰的П.普罗克科宁任职了23年。这里唯一的例外是爱沙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第一任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1946年去世的И.瓦列斯，以及人民委员会主席——1941年去世并被А.韦伊默取代的И.劳里斯顿。

从1939年开始，稳定性不仅体现在国家机构中，也体现在党的机构中，首先是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机关的领导层。

1939年3月31日，政治局任命Н.Н.沙塔林为干部管理局局长的第一副手，而实际上他是该局真正的常任负责人[123]，按照旧的标准和观念，他显然不属于老一派的官僚。35岁的他是一名教师出身，曾担任地方学校的校长，还在研究生院学习过，但没有“党的领导工作经验”，如果不算他在一个深海集体农庄担任政治部门负责人的短暂经历的话。然而，正是马林科夫注意到了他，对他给予了高度评价，并将他招入了组织指导部，几个月后就促成了沙塔林被任命为国内最重要的职位之一。

А.А.日丹诺夫的表现则稍微保守一些，但也只是一开始如此。尽管他在1939年1月中旬就用年轻的哲学家М.Б.米季宁取代了革命运动最资深的活动家之一В.В.阿多拉茨基，担任联共（布）中央委员会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所（马列所）所长[124]，但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他仍让专业官僚机构的第一副手П.Н.波斯佩洛夫负责处理一般事务[125]。按照当时的观念，波斯佩洛夫已经不算年轻，40岁的他只在红色教授学院接受过系统的教育，但他从1930年起就在中央监察委员会工作，从1937年起在宣传鼓动部工作，因此完全掌握了那里不成文的游戏规则，始终如一地按照要求行事、表现。

直到1940年9月，很可能并非是日丹诺夫本人的主动提议（可以有很大把握这样推测），宣传鼓动部终于开始发生重大变化。由于“工作负担”加重，安德烈·亚历山德罗维奇再也无法亲自领导该部门，每天持续深入处理所有日常事务，接替他的不是波斯佩洛夫（波斯佩洛夫立即被调去担任《真理报》主编），而是Г.Ф.亚历山德罗夫[126]。亚历山德罗夫比沙塔林更不属于老一派的官僚机构。他毕业于共产主义社会科学教师大学，在莫斯科哲学、文学和艺术学院（莫哲文学院）工作了几年。他先是在那里负责哲学系，后来担任哲学历史教研室主任，因为在30岁时他就已经是三部重要学术著作的作者，拥有哲学博士学位。后来他担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共产国际执委会）编辑出版部主任，1939年1月21日从那里被调到中央委员会，被任命为宣传鼓动部副部长，负责宣传事务[127]。

成为宣传鼓动部部长后，亚历山德罗夫直到两年后才成功摆脱了他“继承”下来的旧官僚机构成员Д.А.波利亚尔科夫和А.А.卢津。他成功地让前者担任全苏无线电委员会的领导，后者担任高等学校事务委员会下属的讲座局局长。取而代之的是，他吸引了在精神和观点上与他相近的莫哲文学院的同事，文学评论家А.М.叶戈林，哲学家М.И.约夫丘克（格奥尔基·费奥多罗维奇在共产国际执委会时就曾与他共事），П.Н.费多谢耶夫[128]。

亚历山德罗夫一担任宣传鼓动部部长就立刻赢得了好评，表现出对自身职责的充分理解。他展示了一种全新的工作风格（当然，这得到了上级，包括日丹诺夫和整个核心领导层的认可）。他让下属们主要把注意力集中在当时被认为是大众宣传最重要的工具上：电影、

戏剧、文学。在广播极度不发达、民众没有定期阅读报纸习惯的情况下，这些领域能够以最通俗易懂、形象的形式将新的意识形态观念传达给所有人——包括文盲和半文盲。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仅在1940年的最后四个月里，亚历山德罗夫就向政治局提交了七份在宣传鼓动部参与下制定的详细决议（1938年只批准了一份这样的文件，谴责了玛丽埃塔·沙吉尼扬的纪实小说编年史《乌里扬诺夫一家》；1939年批准了两份，而且在这两个案例中，“被指责者”都是诗人伊利亚·塞尔文斯基）[129]。这些决议迫使剧作家、小说家和诗人立即根据新的意识形态路线调整他们的创作。艺术事务委员会主席М.Б.赫拉普琴科在《真理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表达了这种变化的本质（这篇文章在那个时候发表绝非偶然），虽然表面上看只是针对戏剧领域。文章中直接指出：“直到最近，还创作了大量关于间谍和破坏分子的剧本。我们国家的杰出人物、新生活的创造者、做出英雄事迹的人们被推到了一边。一些剧作家特别努力地描绘丑恶和人性的卑鄙。现在，这股浪潮已经过去了。”[130]

对于1940年底通过的大多数决议而言，有两个共同的典型特征：一是没有严厉的“惩处措施”，二是没有任何关于这些决议的官方信息，更不用说决议本身的内容了。这些决议没有被公开公布，这样就避免了无意中让它们成为新的把柄，避免出现引发不可接受的政治运动的借口。只是私下里让那些受到批评的人，以及苏联作家协会的领导层知晓这些文件内容，如果有需要的话，还包括一些主要的电影导演。通过这种方式，达到了一个重要目的：正是文学艺术界的人士以他们自己的名义，对被选中的对象进行批评，以儆效尤。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满足于将“有问题的”戏剧作品——比如阿纳托利·格列博夫的《大扫除》、瓦莲京娜·卡泰耶娃的《小屋》、米哈伊尔·科扎科夫的《当我独自一人时》、列昂尼德·列昂诺夫的《暴风雪》——从全国所有剧院的剧目中剔除，并在《真理报》《文学报》《苏联艺术》上对这些作品进行尖锐的、往往令人费解的批评。而当受批评的范围开始超出预设的界限时，宣传鼓动部就会阻止此类文章的进一步发表。但在个别情况下，甚至连关于这些决议的间接消息都没有超出极小范围的相关人士圈子。1940年10月20日关于乌拉尔散文作家Н.鲍里索夫的书《判决》的决议，以及10月29日关于女诗人安娜·阿赫玛托娃的诗集《六部诗》的决议，就是这种情况。

唯一的例外是对导演А.斯托尔佩尔和Б.伊万诺夫根据亚历山大·阿夫杰延科的剧本《生活法则》拍摄的电影的严厉批评。首先，1940年8月16日，《真理报》对这部电影进行了抨击，几天后，一些主要的电影工作者——Г.罗沙尔、Ю.莱兹曼、А.马切列特在“莫斯科电影制片厂”的讨论会上也对其进行了批评。之后斯大林也加入了批评者的行列，他在10月9日的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上严厉地指出了这部电影的不足之处，主要是剧本方面的问题[131]。也正因如此，随后出现了极为罕见的情况：阿夫杰延科被开除出苏联作家协会，他作为马凯耶夫卡市苏维埃代表的资格被取消，最后，作为最终的惩罚，他被开除出联共（布）党籍。然而，体现了国家生活新阶段特点的是，这位作家没有遭到镇压。三年后，人们认为他“改正了错误”，“认识到了”自己的过错，于是允许他重新从事新闻工作，准许他在《红星报》上发表文章。又过了一年，文学界向他敞开了大门，在《新世界》杂志上发表了他的小说《大家庭》，并且他再次被吸收入党。

可以很容易猜到，对阿夫杰延科发起如此猛烈攻击的原因是斯大林亲自在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上发表了讲话，这次会议邀请了许多作家、剧作家和电影导演。在这些人中，有些人急于表忠心，想要显示自己比教皇还要虔诚。然而，持续了一个半月的激烈批评情绪在很大程度上有所缓和，因为同样是这些报纸，同时以更大的篇幅关注了肖洛霍夫的新小说《静静的顿河》、法捷耶夫的《最后一个乌德格人》、卡维林的《两个船长》，以及马雅可夫斯基和勃洛克的作品（因为恰逢他们的周年纪念）。

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情况则完全不同，这进一步凸显了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机关高层更新过程的矛盾性和复杂性。1939 年 3 月，А.А.安德烈耶夫取代了 Н.И.叶若夫，而实际上，从实践来看，作为该委员会进行的所有党内侦查工作的唯一负责人，被任命为第一副手的是一个公然的蒙昧主义者、明显支持镇压手段的 М.Ф.什基里亚托夫[132]。他仅拥有初等教育水平，而他用长达 18 年的“党的工作学校”经历取代了正规教育，在这个过程中，他从最底层开始，一步步晋升。然而，事实证明，什基里亚托夫为日后成功的职业生涯积累的主要经验，是在声名狼藉的叶若夫领导下的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党委会中获得的。

沙塔林在他的庇护人马林科夫失势之前一直“身居高位”，直到 1955 年 2 月。什基里亚托夫则一直任职到 1954 年去世。最不走运的是亚历山德罗夫，他在 1947 年成为了核心领导层内部派别斗争的牺牲品。

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以及地位与之相当的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党组织第一书记的任职时长，同样有力地证明了党内高层权力结构稳定性的形成。他们中的许多人，根据联共（布）中央 1938 年 3 月 29 日的决议首次当选或再次当选后，任职了七八年，甚至更久。例如，Н.С.赫鲁晓夫在乌克兰任职（中间有十个月的间隔）一直到 1950 年，П.К.波诺马连科在白俄罗斯任职到 1948 年。М.Д.巴吉罗夫在阿塞拜疆、Г.阿鲁秋诺夫在亚美尼亚任职到 1953 年，К.И.恰尔基亚尼在格鲁吉亚任职到 1952 年，А.А.库兹涅佐夫在列宁格勒任职到 1946 年，А.С.舍尔巴科夫在莫斯科任职到 1945 年。1940 年当选的 Н.卡罗塔姆在爱沙尼亚任职到 1948 年，博罗金在摩尔达维亚任职到 1949 年，Я.卡尔恩别尔津在拉脱维亚任职到 1959 年，而斯涅奇库斯在立陶宛任职到 1974 年。

唯一的例外是莫斯科市委和莫斯科州委第一书记 А.И.乌加罗夫，他于 1938 年 12 月被捕，还有中亚各加盟共和国的党组织领导人，如哈萨克斯坦的 Н.А.斯沃尔佐夫、土库曼斯坦的 Я.А.丘宾、塔吉克斯坦的 Д.З.普罗托波波夫、吉尔吉斯斯坦的 А.В.瓦贡和乌兹别克斯坦的 У.尤苏波夫，他们由于各种原因（主要是因为他们的民族身份）在伟大卫国战争结束后立即被撤职。

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在仅仅两年的时间里（这在苏联是非常短暂的时期），一个在组成上几乎全新的高层权力层级——联盟和加盟共和国两级权力机构——得以形成。与此同时，这个层级也进行了结构划分，这首先最鲜明地体现在 1938 年 6 月至 12 月苏联人民委员会通过的决议所规定的五个等级的月薪制度中，当然，政治局此前也通过了类似的决议[133]：

1.最高月薪为 2500 卢布，大约是熟练工人和职员平均工资的九倍，领取者包括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及其副手、“A”组联盟工业人民委员、对外贸易和财政人民委员、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也就是说，最初有 21 个职位的人员领取这个薪资；

2.2300 卢布——联共（布）中央书记和各部门负责人、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以及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格鲁吉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阿塞拜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乌兹别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共 12 人；

3.2200 卢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主席、联共（布）中央各部门负责人，共 13 人；

4.2000 卢布——苏联总检察长、其他苏联人民委员、各加盟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州执行委员会主席、哈巴罗夫斯克和滨海边疆区执行委员会主席，共 34 人；

5.1800-1750 卢布——苏联最高法院院长、亚美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吉尔吉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塔吉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土库曼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联共（布）中央各部门负责人、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二书记、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州委书记、哈巴罗夫斯克和滨海边疆区委书记，共 70 人。

此外，当然，还确定了另外 15 个人的月薪水平，他们是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州委书记、哈巴罗夫斯克和滨海边疆区委书记。合理推测（目前尚未发现相关文件），他们的月薪应该在 2000 到 2200 卢布之间。

这套薪资体系在实施时总共涵盖了 165 人。然而，毫无疑问的是，他们并非都拥有同等的地位和相应的权利。五个等级的薪资只是勾勒出了政治局官职名录的范围，换句话说，就是广义的领导层。其中包括那些真正参与最重要决策的制定、讨论，或者仅仅参与准备工作的人，以及那些潜在地希望迟早能进入这个高层权力阶层的人。

实际上，仅从薪资数额本身，并不能让人相信领取者处于特殊、独特的地位。毕竟，莫斯科大剧院的歌剧和芭蕾舞独唱演员、莫斯科艺术剧院的资深演员也有大致相当的收入。此外，在官方的、斯大林时期的定期奖励制度建立之前，一些艺术工作者还会以非公开奖金的形式获得在当时堪称天文数字的款项。例如，1939 年 3 月，由于制作了具有巨大宣传价值的电影《列宁在 1918》《肖尔斯》和《带枪的人》，导演 М.И.罗姆、А.П.杜甫仁科、С.И.尤特凯维奇每人获得 10 万卢布，摄影师 Б.И.沃尔切克、Ю.И.叶克尔奇克、Ж.К.马尔托夫每人获得 3 万卢布，饰演列宁的演员 Б.В.舒金获得 2 万卢布[134]。

广义的党内和国家领导层的真正结构划分、实际的等级制度和从属关系，与其说是由金钱决定的，不如说是由薪资和各种特权、优惠的总和决定的。在住房危机极其严重、食品和日用品短缺且实际上实行配给制的情况下，所有这些将人们划分成了不同的社会阶层，分为生活水平高的人和生活水平低的人。在那个年代，有些东西即使有足够的钱也无法自由购买，只能作为奖励获得。即使按照今天的标准，这些特权也非常可观，比如在当时最负盛名的格拉诺夫斯基街 5 号，为每个家庭提供面积巨大、设施完备的多居室公寓，以及在谢拉菲莫维奇街 2 号（“滨河街的房子”）提供面积小得多的公寓。此外，还有克里姆林宫自动电话交换台的电话（“旋转电话”“克里姆林宫电话”）、从位于马涅什的政府车库配备司机的私人汽车、使用位于格拉诺夫斯基街的克里姆林宫医疗管理局下属的门诊部和医院、“巴尔维哈”疗养院、“松树林”休养所的权利。

但如果说以前几乎只有苏联人民委员会事务管理局负责提供各种特权，那么现在内务人民委员部也分担了这一重要且责任重大的义务。更确切地说，是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第一局（负责保护党和政府领导人的安全），1938 年 11 月 18 日，国家安全大尉（肩章上有一个菱形标志，类似于大尉）Н.С.弗拉西克被任命为该局局长[135]。1939 年 6 月 9 日政治局的一项非常有说服力的决议证明了这一点：

“1.从 7 月 1 日起，将克里姆林宫医疗管理局的食堂（供负责人员使用）移交给内务人民委员部管理。2.将克里姆林宫医疗管理局食堂的人数减少到 400 人。责成由 П.波斯克列贝舍夫、М.什基里亚托夫、Н.弗拉西克和 М.赫洛莫夫（苏联人民委员会事务管理局负责人）组成的委员会确定有权使用该食堂的人员名单……”[136]。

在这项决议中，几乎每一点都值得特别关注。首先是确定了“负责人员”的人数，从现在起，这些人享有最明显的特权之一——“克里姆林宫的伙食”。这些伙食质量上乘、数量充足，足以供养一整个家庭，而且价格极其低廉。其次，1939 年年中，特权体系仍在形成过程中，逐渐具备了在随后的五十年里一直具有的那些特点。从那时起，一些激励措施开始发挥作用，迫使人们不惜一切代价“向上爬”，尽可能快地沿着等级阶梯往上晋升。

最后，值得注意的是，特权的分配，换句话说，“大棒与胡萝卜政策”的实施，掌握在一小群人手中，他们并非偶然地代表了四个不同的部门。А.Н.波斯克列贝舍夫——政治局特别部门，实际上是斯大林的私人办公室。М.Ф.什基里亚托夫——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它坚持不懈且密切地关注着进入“官职名录”的人的道德和政治形象。Н.С.弗拉西克——负责核心领导层福祉和安全的部门。М.Д.赫洛莫夫——苏联人民委员会事务管理局，它只是联共（布）中央经济活动的官方掩护，从其预算中为所有必要的开支提供资金。

在这种明显具有部门间协作形式的尝试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核心领导层清楚地意识到，刚刚形成的高层官僚阶层、刚刚萌芽的“新阶级”脱离控制所带来的危险性，这一点在工作中愈发明显地体现出来，尤其是在各联盟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中。这些部门明白自己的重要性日益增加，他们有意愿并且也在努力追求完全的独立性。不仅是为了解决生产问题、完成计划，还包括确定和建立自己的机构结构、人员编制表。因此，有意或无意地，他们预先决定了“官职名录”不可避免地会扩大。

这个过程发展得如此迅速，以至于在 1940 年 5 月 11 日，使用位于格拉诺夫斯基街的克里姆林宫食堂服务的“人员配额”数量不得不增加一倍，达到 800 人[137]。几乎与此同时，政治局还通过了另外两项同样具有代表性的决议。5 月 4 日，决定为“人民委员、各委员会主席以及其他中央机构的负责人”建造 15 座别墅，这里的“其他中央机构负责人”指的是党的机构人员。建造地点实际上选在了一个已经封闭的区域——在“阿尔汉格尔斯克”和扎哈罗沃村之间，在所谓的梅科沃斯卡亚树林地区[138]。7 月 12 日，决定通过克里姆林宫自动电话交换台，在政府成员的别墅之间建立直拨电话联系[139]，而这在此前是政治局成员才享有的特权。

这类福利逐渐不再仅仅是广义领导层的专属。早在 1939 年 5 月 11 日，苏联作家协会这个成为长期党的宣传重要工具之一的组织，就被允许建造 50 座私人别墅[140]。“佩列杰利基诺”聚居地的建立，很快就成为了作家们在官僚机构（而绝非创作机构）中地位的重要标志之一。稍晚一些，在 1941 年 2 月 22 日，即红军节前夕，国防人民委员部也获得了类似的权利。允许（但资金来自预算）为国防部副部长、总政治宣传部部长在市中心建造别墅，在地方则为军区司令、副司令、军事委员会成员、军区参谋长、政治宣传部负责人建造别墅[141]。

但正是在那个时候，高层官僚阶层获得特殊、特权地位，对当时仍未完全形成、仍然是党和国家二元一体的权力体系构成了非常严重的威胁。因此，6 月 6 日成立了一个专门的机构——国家编制委员会，这并非是为了纠正已经发生的事情，而仅仅是为了防止未来出现不可预测、无法控制的局势发展。国家监察人民委员 Л.З.梅赫利斯被任命为该委员会的负责人，其成员包括国家监察人民委员部、财政人民委员部和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的代表。从形式上看，该委员会隶属于苏联人民委员会，实际上受核心领导层控制。其任务表述如下：“制定国家官职名录、职位和职务工资标准，整顿编制事务；取消人为设立的机构层级……”[142]。

第六章

在联共（布）十八大结束后不久，克里姆林宫最后一次尝试改善与西方民主国家的关系，以期望最终能达成它们对建立集体安全体系的共识。建立这样一种体系，既能有效地遏制侵略国家的进一步扩张，同时又能为苏联提供有力保障，确保在战争爆发时，苏联不会独自面对德国。

4 月 16 日，M.M.李维诺夫接见了英国大使威廉·西兹，并与他就近期建立反希特勒联盟的可能性恢复了意见交流。几乎就在第二天，显然是为了推动和加速事态发展，苏联外交部向伦敦和巴黎发出照会，提议组建一个广泛的和平国家统一战线。苏联领导层的构想是，首先签订一项为期 5 年甚至 10 年的三边互助条约，其中必须包括军事互助。这三个国家通过这种方式保障自身安全的同时，还应做出更多安排。即当“位于波罗的海和黑海之间且与苏联接壤的东欧国家”，也就是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波兰和罗马尼亚遭受侵略时，为它们提供一切必要的支持。最后，照会中还包含了另一项原则性条款。在极端情况下，即当德国进攻条约的一个或所有参与国时，各方有义务“不进行任何谈判，且未经三国共同同意，不得单独与侵略者媾和”[143]。

伦敦和巴黎一如既往地没有急于做出回应，尽管战争的威胁日益明显和真实。4 月 28 日，希特勒在帝国议会发表讲话，宣布废除英德海军协定，不久后又通知华沙，将废止波德互不侵犯条约。然而，即便在希特勒如此明确地表达了他的近期意图之后，张伯伦内阁仍在等待，没有急于对苏联的提议做出回应。

西方民主国家危险的冷漠态度以及它们令人震惊的置身事外的立场，使欧洲濒临灾难边缘，这让苏联领导层认为有必要更换外交人民委员部的负责人。5 月 3 日，政治局做出决定：“1.满足李维诺夫同志的请求，解除他外交人民委员的职务。2.任命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莫洛托夫同志为外交人民委员。”显然，核心领导层认为这一举措将提升仍在期待中的谈判水平，进而加速条约的签订，而这是唯一能够阻止战争的办法。与此同时，为了在这一关键时期确保外交部工作的更高保密性，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副部长 Б.Г.杰卡诺佐夫被派往外交部担任副部长，并且更换了干部、密码、外交关系、政治档案等部门的负责人以及外交部的安保负责人。政治局还认为有必要重新启用已经在国家文艺出版社担任了两年社长而被人遗忘的 С.А.洛佐夫斯基。利用他在 1921 年至 1937 年担任红色工会国际总书记期间积累的丰富国际事务经验，5 月 11 日，任命所罗门·阿布拉莫维奇为外交人民委员部副部长[144]。

苏联外交领导层面的重大变动，对于驻莫斯科的外交使团来说并非意外之事。无论如何，早在 2 月 22 日，美国事务专员 A.柯克就向华盛顿报告称：“李维诺夫的影响力大幅下降，这可能意味着外交人民委员将换人。”[145]但并非这些人事变动，而是议会中对张伯伦立场日益激烈的批评，促使英国外交部在 5 月 8 日终于给莫斯科做出了回应。这一回应极为含糊且不确定。苏联被客气地赋予了“立即协助”英国、法国以及在 3 月 31 日已从英法方面获得单边担保的波兰的权利，但前提是“在有必要的情况下”。与此同时，对于遭受侵略的苏联，却只字未提给予任何支持。英国的这份照会可以被视为一种明确的拒绝，还因为此时波兰和罗马尼亚已经坚决拒绝了来自其东部邻国的任何担保，完全排除了这种可能性。

在仍处于初步的照会交换、“谈判”（更确切地说，是西方民主国家的立场毫无新意）中的这种转变，迫使莫洛托夫采取了更为果断的行动。5 月 14 日，一份新的照会被发往伦敦和巴黎，5 月 31 日，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在苏联最高苏维埃第三次会议上几乎

逐字重复了照会的内容。在那次会议上，还批准了一些人民委员部的改组，包括国防工业人民委员部，并且将军费开支增加到了年度预算的 50%。

在克里姆林宫，面对代表们发表讲话时，莫洛托夫知道他的讲话会通过广播播出，而且第二天会在全国所有报纸上发表，所以他更多地是在向世界公众发声。他向西方各国公开了苏联最后一份照会的内容。他表示，为了建立一个有效的“和平国家反对即将到来的侵略的阵线”，“至少需要三个条件：英国、法国和苏联之间签订一份有效的、完全具有防御性质的互助条约；英国、法国和苏联对中欧和东欧国家提供担保，其中包括与苏联接壤的所有欧洲国家，以防止它们遭受侵略者的攻击；英国、法国和苏联签订一份具体的协议，明确规定立即且有效的援助的形式和规模”[146]。

莫洛托夫的讲话同时也是对张伯伦 5 月 19 日在下议院就同一个问题（是否与苏联签订合作条约）进行激烈辩论时发言的回应。英国首相这样阐述了自己的立场：“如果我们能够找到一种方法，通过这种方法我们可以确保在建立这样一个和平阵线的工作中得到苏联的合作与帮助，我们会对此表示欢迎，我们希望如此，我们认为这是有价值的。那种认为我们轻视苏联帮助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的。”

但内维尔·张伯伦的辩解既没能说服他的反对者（工党成员），也没能说服他的支持者（保守党成员）。温斯顿·丘吉尔轻易地揭露了他的党内同僚根本无意采取行动的事实。“如果你，”他说，“准备在战争时期、在最严峻的考验和重大事件中成为俄罗斯的盟友，向所有人展示自己，如果你准备与俄罗斯联合起来保护你已经给予担保的波兰，以及保护罗马尼亚，那么你为什么现在不想成为俄罗斯的盟友呢？毕竟这样做，你或许可以避免战争。我不理解所有这些外交上的微妙之处和复杂情况。如果最糟糕的情况发生了，你最终还是会和他们站在一起……如果陛下的政府……拒绝并摒弃对俄罗斯的必要帮助，从而以最糟糕的方式将我们卷入最糟糕的战争，那么它就辜负了人们的信任……”[147]

丘吉尔敏锐地勾勒出未来的走向，因此坚持与苏联结盟，他甚至无法想象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会发生什么。而这也促使莫洛托夫如此坚持不懈地、一次又一次地向西方呼吁。5 月 22 日，德国和意大利的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和齐亚诺签署了所谓的《钢铁条约》，根据该条约，他们承诺“共同努力确保自身的生存空间”。至于这种“确保”将采用何种方式，他们刚刚在捷克斯洛伐克和阿尔巴尼亚展示过。只有在柏林-罗马侵略性条约正式签订后，张伯伦才不得不对莫斯科的提议做出肯定回应。他同意就共同抵抗德国和意大利在欧洲的行动展开直接谈判，但仅仅是基于旧的、显然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曾由国际联盟制定的程序。5 月 27 日，莫洛托夫在与英国大使和法国专员的会面中再次不得不明确表示：“苏联政府无意仅参与那些其目标苏联并不知晓的条约的谈判。”[148]

与此同时，西方民主国家越来越多地失去了对局势发展施加影响的可能性。当它们无动于衷地思考与苏联“合作的方法”时，德国已经成功签订了自己的互不侵犯条约：5 月 31 日与丹麦签订，6 月 7 日与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签订。而伦敦和巴黎直到 6 月 13 日才就对莫斯科提议的共同意见达成一致。并且再次将其归结为，在任何情况下，对于苏联以及芬兰、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遭受侵略时，它们不承担任何义务，同时却希望在德国进攻波兰、罗马尼亚、希腊、土耳其甚至比利时的情况下，迫使苏联给予它们所需的帮助。这使得克里姆林宫在这场拖延且看不到尽头的对话中只能做出唯一可能的回应——苏联政府“无法接受使苏联处于屈辱的不平等地位的情况”。

张伯伦随后的决定同样傲慢。在收到莫洛托夫邀请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前往莫斯科制定并签署合作条约的邀请后，英国首相实际上拒绝了这一邀请。他也拒绝了安东尼·艾登，艾登此前曾与斯大林进行过谈判，并且一直强烈希望推动三边条约尽快签订[149]。被派往苏

联首都的是英国外交部的一名普通官员威廉·斯特朗，这再次暴露了英国政府对与苏联共同遏制侵略者的真实负面态度。

与此同时，苏联的处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艰难。这不仅仅是复杂，而是极其危险，直接威胁到国家利益，需要立即做出最终决定。早在 5 月底，日本军队就再次挑起事端，不过这次他们没有入侵苏联境内，而是进入了蒙古领土。根据 1936 年 3 月 12 日的条约，苏联有义务在蒙古面临外部威胁时提供援助，苏联红军的部队驻扎在那里。最初在哈拉哈河地区的一些局部、规模较小的边境冲突，到 6 月底已经升级为一场真正的局部冲突，双方都投入了步兵和骑兵师、数百架飞机和数百辆坦克。

考虑到德国和日本《反共产国际协定》的本质和导向（1937 年意大利加入该协定，1939 年初伪满洲国、匈牙利和西班牙也加入了），苏联领导层不得不做最坏的打算——同时在欧洲和远东爆发战争。正因如此，克里姆林宫不得不采取极端措施。试图对西方民主国家施加最大可能的压力，迫使它们加快签订共同抵御侵略者的条约。6 月 29 日，《真理报》发表了 А．А.日丹诺夫的一篇文章，这无疑表明——它代表了苏联核心领导层的观点，文章标题极具暗示性且明确：《英国和法国政府不想与苏联签订平等基础上的条约》。文章内容重复了莫斯科此前在与伦敦和巴黎交换照会时提出的所有提议。这迫使后者做出某种回应，最终给出直接答复，告知其真实意图和计划。

同一天，苏联核心领导层的另一名成员莫洛托夫向驻柏林专员 Г．А.阿斯塔霍夫发去电报，阿斯塔霍夫正在进行关于恢复苏德贸易经济协定的平淡谈判，该协定的期限不久前刚刚到期。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建议阿斯塔霍夫口头通知德国外交部，“在改善经济关系的情况下，苏联和德国之间的政治关系当然也可以得到改善……但只有德国人能说出政治关系的改善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150]。通过这种外交上常见的试探方式，克里姆林宫试图在与伦敦和巴黎的谈判无果，且哈拉哈河的战斗升级为真正战争的情况下保护自己。试图找到摆脱苏联因张伯伦而陷入的困境的出路。以任何方式确保国家的安全，因为克里姆林宫比任何人都清楚，苏联还没有准备好应对严重的武装冲突，更不用说两线作战了。同时也试图向英国和法国表明（因为没人打算隐瞒在柏林可能进行的谈判，也无法隐瞒），苏联有两个解决方案，有选择的余地。并且它达到了预期目的。

8 月 2 日，里宾特洛甫向阿斯塔霍夫表示，他的国家希望在平等原则的基础上与苏联建立关系。第二天，德国驻莫斯科大使舒伦堡在与莫洛托夫的会谈中更进一步。他指出：“德国不会妨碍苏联在波罗的海国家的切身利益。至于德国对波兰的立场，德国无意采取任何违背苏联利益的行动。”然而，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在确认希特勒不仅试图以各种方式避免两线作战，而且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准备在东方做出一定让步后，并没有急于给出最终答复。他甚至故意回避了这个问题，告诉舒伦堡，苏联政府不想放弃与伦敦和巴黎的协议。“苏联坚持其一贯的和平政策，”莫洛托夫解释了自己的想法，“只会签订纯粹的防御性反侵略协定。这样的协定只有在苏联或苏联不能漠不关心其命运的国家受到攻击时才会生效。”命运的骰子还没有掷出。1939 年 8 月 3 日，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一个月，苏联领导层仍然倾向于与西方民主国家结盟。

克里姆林宫展示出改变外交政策方向和取向的可能性，这一举措起到了作用。英国和法国似乎对苏联 7 月 23 日照会中提出的立即开始谈判以尽快签订三边军事公约的提议做出了回应。8 月 5 日，由英国朴茨茅斯海军基地司令、海军上将 R.德克率领，法国将军 Ж.迪蒙克陪同的两国代表团抵达苏联。不过，他们选择了并非最快的交通方式——乘船前往列宁格勒，直到 8 月 11 日才抵达苏联首都。莫洛托夫再次采用了之前奏效的施压方式，当天指示阿斯塔霍夫告知德国外交部，苏联对恢复贸易协定和讨论波兰问题感兴趣，但有一个必要条件——谈判必须在莫斯科进行。可以推测，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希望两个竞争方同

时在场能让他掌控局势。迫使双方做出让步——与英国和法国尽快签订防御性条约，与德国签订贸易经济协定，同时迫使德国至少在近期放弃对苏联及其实际上毫无防御能力的西部邻国的侵略意图。

然而，8 月 12 日，英苏谈判开始，在谈判中，东道主一方由国防人民委员 К．Е.伏罗希洛夫和总参谋长 Б．М.沙波什尼科夫代表出席，结果发现了许多令克里姆林宫意想不到且不愉快的事情。伦敦和巴黎不仅任命了并非主要职位的人员担任代表团领导，而且没有赋予他们在最终制定出军事公约的情况下签署该公约的相应权力。伦敦和巴黎也没有找到解决关键问题的办法——如果苏联和德国之间没有边界，而夹在它们之间的波兰和罗马尼亚坚决拒绝让苏联军队进入其领土，那么苏联红军究竟应如何对德国国防军采取军事行动。

8 月 15 日，当三边谈判毫无结果变得显而易见时，舒伦堡主动拜访了莫洛托夫，并向他宣读了里宾特洛甫的信件，信中表示他准备访问莫斯科，以便详细阐述德国政府的设想。但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再次没有加速事态发展。他建议大使“对某些问题进行准备工作，以便做出决策，而不仅仅是进行谈判”。例如，关于德国是否准备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关于是否有可能为波罗的海国家提供共同担保，此外——关于是否有可能对德国的盟友日本施加影响，以实现远东地区关系的正常化。第二天，舒伦堡向莫洛托夫转达了他的上级对所有上述问题的答复，而且都是肯定的答复。尽管如此，当时仍没有向里宾特洛甫发出邀请。苏联核心领导层仍然希望与英法代表团的谈判能取得圆满结果。直到 8 月 19 日，当与伦敦和巴黎签订军事公约的希望彻底破灭时，克里姆林宫才被迫做出一个绝非所愿、完全被迫的选择——接待里宾特洛甫，但最早也要在一周之后，并且要在媒体公布签订贸易信贷协定的消息之后[152]。

贸易信贷协定在 8 月 20 日深夜签署。一天后，里宾特洛甫收到了他期待已久的邀请，但时间定在 8 月 22 日或 23 日。这是在英法代表团完全拒绝了苏联军队通过波兰和罗马尼亚领土的问题，且德克建议将下一次会议推迟几天之后才收到的邀请。尽管如此，8 月 22 日塔斯社关于里宾特洛甫即将抵达莫斯科的消息（主要是为了外国媒体）中特别强调：“与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谈判绝不能以任何方式中断或拖延英法苏谈判。这是为了促进和平事业：一方面旨在缓解国际紧张局势，另一方面旨在为在侵略发生时进行斗争准备途径和手段。”[153]

8 月 23 日上午，里宾特洛甫抵达莫斯科。当天下午谈判开始，只持续了三个小时，而就在同一天晚上，那份著名的条约被签署了。尽管如此，第二天莫洛托夫仍坚持向法国大使解释：“与德国签订的互不侵犯条约与英国、法国和苏联之间的互助联盟并不矛盾”，“过一段时间，比如一周后，与法国和英国的谈判可以继续进行”。8 月 26 日，洛佐夫斯基在与中国大使的谈话中也指出了同样的可能性：“谈判中断了，但恢复谈判取决于英国和法国”[154]。

西方仍然有机会，但他们最终没有把握住。实际上，这是一种自杀式的决定，让希特勒更轻松地进行战争——只在西方一条战线上作战，因为普遍认为波兰军队对德国国防军来说并非强大的对手。而苏联领导层则成功地同时解决了当时最为紧迫的两个问题。不仅确保了国家在西方的安全，也确保了在东方的安全。8 月 30 日，日本军队停止了军事行动，9 月 15 日，通过签署相应的协议，哈拉哈河的停战得以确认。然而，欧洲局势的悲惨发展使得外交政策问题仍然是首要问题，压倒了其他所有问题。

波兰军队在英国和法国武装力量几乎是公开的、毫无作为的情况下遭到了迅速的溃败，英法两国在 9 月 3 日向德国宣战。正是这种始料未及的情况，迫使苏联领导层放弃了某种武装中立的立场。利用与德国签订的条约所带来的优势，更确切地说，是利用附加议定书（也就是秘密附件，它与 1807 年 7 月 7 日拿破仑和亚历山大一世在蒂尔西特签订的条约非常相

似，根据该条约，芬兰和比萨拉比亚被划归俄罗斯帝国）。现在，在 130 年后，苏联在类似的国际形势下，获得了显著加强国家安全保障的机会。

苏联领导层的行动极为谨慎。它没有在 9 月 5 日利用潜在的优势，尽管柏林当时一直坚持不懈地敦促它这样做。直到波兰政府逃往罗马尼亚，德国国防军在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附近合拢了“钳子”，完成了对在莫德林和华沙仍在继续抵抗的最后一批波兰军队的包围之后，苏联才有所行动。只有到那时，欧洲的局势即便不能说具有双重含义，也呈现出了非常奇怪的特征。一方面，波兰没有一个合法且有实际能力行使其权力的政府，既无法继续抵抗，也无法投降。另一方面，用丘吉尔的话来说，在西方，“出现了一段漫长而令人痛苦的间歇期”，不久后这段时期被不无道理地称为“奇怪的战争”。英国和法国的军队甚至都没有尝试去拯救波兰，没有发动进攻，以利用德国两线开战所给他们带来的无可争议的优势。

直到 9 月 17 日，波兰驻莫斯科大使 B.格日博夫斯基被召到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并收到了苏联政府的照会。照会中特别提到：“苏联政府已向红军最高统帅部下达命令，让部队越过边境，保护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居民的生命和财产。与此同时，苏联政府打算采取一切措施，将波兰人民从其愚昧的领导人拖入的不幸战争中解救出来，并给予他们过上和平生活的机会。”[155]很容易注意到，照会中甚至没有丝毫暗示西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西部地区有被并入苏联的可能性，而且似乎还隐含着这样一种解决波兰命运的可能性，即波兰不应该从世界政治版图上消失。

同一天，B.M.莫洛托夫发表了广播讲话，从内容上看，这篇讲话也没有预先决定苏联西部邻国的未来。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解释说：“波兰已成为各种可能对苏联构成威胁的意外情况和突发事件的理想场所。苏联领导层直到最后一刻都保持中立。但鉴于上述情况，它不能再对当前局势保持中立。也不能要求苏联政府对居住在波兰的乌克兰和白俄罗斯族同胞的命运漠不关心。”[156]苏联如此执着地强调自己只是在关心白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的命运，这绝非偶然。这是在向英国和法国政府暗示“寇松线”，该线早在 1919 年 12 月就由协约国最高委员会划定，并在 1920 年 7 月的斯帕会议上被波兰承认为两国之间自然、公正的民族边界线。

在大约三天的时间里，即 9 月 17 日、18 日和 19 日，由 M.П.科瓦廖夫和 C.K.铁木辛哥指挥的，已改编为白俄罗斯方面军和乌克兰方面军的白俄罗斯特别军区和基辅特别军区的部队，与那些陷入混乱、失去指挥和协同、士气低落的波兰部队进行战斗时，苏联领导层一直在观望。它仍然犹豫不决，因此没有宣布其后续行动，因为很可能还不确定该如何行动。直到 9 月 19 日晚上，苏联才最终承认，主权的波兰已不复存在，就像一年半前的奥地利和半年前的捷克斯洛伐克一样。波兰甚至作为一个领土大幅缩减的德国傀儡政权，也不会有重生的机会。正因为如此，克里姆林宫才迈出了下一步——同意将西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西部地区并入苏联版图，莫洛托夫也将此事告知了舒伦堡，而这一步在后来给苏联带来了诸多麻烦。

但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在接见舒伦堡之前，又过了六天——在这六天里，他们一直在犹豫不决，权衡着这个艰难做出的决定所带来的所有后果。9 月 25 日，他们告知舒伦堡，苏联准备彻底消灭波兰。两天后，为了签订新的协议，里宾特洛甫再次来到莫斯科，9 月 28 日拂晓，他与莫洛托夫一起签署了第二个苏德条约——《苏德友好边界条约》。根据该条约，立陶宛划入了苏联的“利益范围”，而东波兰则沿着与“寇松线”相差不大的界线并入了苏联版图。第二天，该条约（但不包括一份“机密”和两份“秘密”议定书，以及那份在半个世纪后引发了巨大争议的地图）在《真理报》上公布。

当然，这个条约不承认由弗拉迪斯拉夫·西科尔斯基将军领导的波兰民族统一政府，该政府于 9 月 30 日在巴黎成立，是一个流亡政府，西科尔斯基将军多年来一直处于与波兰萨

纳齐政权对立的状态。英国和法国也不承认这个条约。温斯顿·丘吉尔这位有远见的军事政治家，理解苏联被迫采取的长期战略的本质，并且敢于公开表示认可。1939 年 10 月 1 日，他在伦敦广播电台发表了对事件的又一次评论，他说：

“俄罗斯奉行的是符合自身利益的冷静政策。我们更希望俄罗斯军队能以波兰的朋友和盟友的身份坚守目前的阵地，而不是以占领者的身份出现。但为了保护俄罗斯免受纳粹的威胁，显然俄罗斯军队有必要驻守在这条战线上。无论如何，这条防线是存在的，因此，也建立起了东方战线，纳粹德国不敢对其发动进攻……

我无法预测俄罗斯未来的行动。这是一个极其难以解开的谜团，然而，解开这个谜团的关键是存在的。这个关键就是俄罗斯的国家利益。考虑到安全因素，俄罗斯不会对德国在黑海沿岸立足，或者德国占领巴尔干国家并征服东南欧的斯拉夫民族这些情况感兴趣。因为这将违背俄罗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国家利益。”[157]

当时丘吉尔与克里姆林宫没有任何联系，仅仅凭借着知识和经验，他就在那天精准地预测到了苏联在接下来两年的外交政策，没有丝毫差错。

与此同时，苏联的国际地位发生了重大变化，其孤立程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深。在爱好和平的民主国家眼中，苏联看起来成了纳粹德国这个侵略者的盟友，甚至是帮凶。1939 年秋天，苏联国内局势也变得更加严峻，这是由于加速备战所导致的，备战过程伴随着对旧的国民经济管理体系的坚决而彻底的打破，以及对主管重工业部门的人民委员部的重组。

还有另一个完全主观的因素加剧了国内政治局势的复杂性。高层权力斗争中起初不太明显但在实际情况下始终极其危险的个人对抗，开始有了复苏的迹象。

В.М.莫洛托夫从 5 月起就不得不将全部精力集中在对国家命运至关重要的外交政策问题上，实际上他开始逐渐放下履行政府方面的其他职责。他越来越少地参与当时对他来说最重要的两个机构的工作。经济委员会（1937 年 11 月 23 日之前名为劳动与国防委员会，是苏联人民委员会的一个常设的核心机构，成员包括委员会主席、第一副主席、副主席和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和苏联人民委员会下属的国防委员会（1937 年 4 月 27 日成立，“旨在整合所有与国防相关的事务和问题”）[158]，除了莫洛托夫之外，后者的成员还包括 Л.М.卡冈诺维奇、К.Е.伏罗希洛夫，以及来自党的代表 И.В.斯大林。在经济委员会中，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的工作越来越多地被他的正式副手 А.И.米高扬所取代，而在国防委员会中，从 6 月 21 日起，根据政治局的决定进入委员会的 Н.А.沃兹涅先斯基开始参与工作。这很快就导致国防委员会这个原本纯粹的协调机构开始占据主导地位。因为当时新的实际领导人沃兹涅先斯基不仅是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从 4 月 4 日起还是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159]。

沃兹涅先斯基这个年轻的晋升者，担任重要职位仅一年，在党的十八大上才刚刚成为中央委员（仅仅如此!），却集这三个如此重要的职位于一身，这无疑让新组建的核心领导层成员们感到警惕。在斯大林明显庇护的沃兹涅先斯基身上，他们清楚地看到了一个新的、极其危险的竞争对手：他在等级阶梯上已经超越了卡冈诺维奇；与米高扬平起平坐；还对莫洛托夫构成了威胁。为了恢复因沃兹涅先斯基的出现而被打破的权力平衡，即刚刚形成的权力格局，核心领导层成员采取了一项重大举措。6 月 26 日，他们将 А.А.安德烈耶夫、А.А.日丹诺夫和 Г.М.马林科夫引入经济委员会，首先是为了制衡米高扬的独立性，限制他日益增强的地位。他们这样做时，并不担心在这三人中只有安德烈耶夫拥有形式上的权力，因为他是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此外，他还是联共（布）中央对农业、国营农场和采购这三个农业人民委员部的负责人。

然而，实际上这种机构层面的调整并没有带来任何结果。日丹诺夫即使想这么做，也根本无法在身体上履行政治局的指示——“认真参加会议并积极参与经济委员会的工作”。在那些日子里，作为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部长，他忙于建立一个培养年轻且最有潜力的党员的体系，工作已经到了极限。因为就在同一天，政治局批准了一项决定，除了已经存在的高级党校（在那里提升那些没有中等教育水平的人的知识）之外，还在联共（布）中央设立了一所高级党校。正是在这所高级党校里，学制为两年半，招收 500 名年龄在 22 岁至 28 岁之间、具有中等教育水平的学员[161]，未来将培养出一批干部，他们很快将在党、经济和苏维埃的所有权力层级的所有机构中任职。此外，对日丹诺夫和他所负责的工作来说，同样重要的是按照政治局的决定组建新的创作联盟：从 5 月 3 日起是苏联作曲家联盟，从 6 月 21 日起是苏联画家联盟[162]。马林科夫也同样忙碌。几乎所有人民委员部和地方党组织的领导班子的更新都要通过他所在的联共（布）中央组织局，通过他本人来进行，这些地方党组织开始选举新的局委会——州委、边疆区委和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而这也注定了莫洛托夫将进一步失去他以前的权力和在国家中作为二号人物的地位。从 8 月开始，А.И.米高扬不仅日常领导着经济委员会的工作，而且根据政治局 9 月 10 日的决定，正式担任了经济委员会的主席[163]。这样一来，他取代了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作为政府首脑的职位，不过现在他的权力受到了很大限制，其中很大一部分权力转移到了国防委员会。从 1939 年 9 月 10 日起，根据苏联人民委员会和联共（布）中央《关于经济委员会和国防委员会》的决定，国防委员会获得了一些根本性的新职能。从那时起，它成为了两个重要的人民委员部群体之间的唯一中介。一方面是国防工业、交通、海军和内河航运人民委员部，另一方面是国防人民委员部、海军人民委员部、内务人民委员部。它必须确定并满足陆军和海军在武器、技术装备、汽车运输方面的所有需求，保障它们在运输方面的需求。这也就意味着，它还要规划国民经济的相关部门，并监督它们的工作。尽管根据同一项决定，国防委员会的成员大幅扩充，增加了海军人民委员 Н.Г.库兹涅佐夫、内务人民委员 Л.П.贝利亚、国防人民委员部副部长兼总参谋长 Б.М.沙波什尼科夫、情报总局局长 И.И.普罗库罗夫、Г.И.库利克，以及为了平衡还包括 А.И.米高扬和 А.А.日丹诺夫，但沃兹涅先斯基在其中仍然保持着主导地位[164]。

由于这些人事变动，党和国家机构出现了融合，而且国家机构明显占据主导地位，这不可避免地引发了政治局保守派试图恢复他们以前的主导地位的努力。而米高扬和沃兹涅先斯基显然都不愿意在如此复杂、严峻的情况下，承担起国家防御能力和国家经济备战的全部责任，这使得他们的这种努力变得更加容易。他们愿意与任何人分担这种责任，但有一个条件——确保他们已经获得的地位稳固不变。正因如此，对党的十八大决议的公开重新审视很轻易地就开始了，党的机构逐渐恢复了对国民经济的原有控制权。

早在 9 月，虽然只是在个别地区，工业部门的重建工作就已经开始了。9 月 27 日，在阿塞拜疆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巴库市委中恢复了石油工业部门；11 月 14 日，在斯大林格勒州委和伏罗希洛夫格勒州委中恢复了煤炭工业部门；11 月 21 日，在新西伯利亚州委恢复了煤炭工业部门，在车臣-印古什州委和格罗兹尼市委恢复了石油工业部门[165]。这种对刚刚制定的规则的偏离，从表面上看似乎完全是合理的——这是出于对随着国际局势的紧张而增加战略资源开采量的担忧。另外一件事也对这类行动产生了重大影响。莫洛托夫在 9 月 17 日的广播讲话中公开承认了在进行部分动员时存在的“错误和不足”。

所有这些因素加在一起，导致 1939 年 11 月 29 日，政治局批准了一项关于在地方党组织中恢复工业部门的决定，除了现有的五个部门——干部部门、宣传鼓动部门、组织指导部门、农业部门和军事部门之外。

该决定称：“1.为了加强党对工业和交通的领导（此处为我所强调——Ю.Ж.），在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边疆区委、州委和市委中，根据各共和国、边疆区、州和城市的主要工业部门，分别设立工业部门。将在工业和交通领域执行党的指示的实际工作、监督工业和交通企业生产计划的执行情况（此处为我所强调——Ю.Ж.）、检查党组织和经济组织在开展社会主义竞赛和斯达汉诺夫运动方面的工作、检查基层党组织行使对企业行政活动的监督权的情况，都交给工业部门负责。”随后，该文件规定，特别是在乌克兰，除了现有的煤炭工业部门之外，还要设立冶金、机械制造、交通和工业部门；在莫斯科州委，要设立机械制造、国防、燃料和能源、纺织和轻工业、交通、工业部门[166]。但由于新的结构只在地方建立，而在联共（布）中央机构层面没有相应安排，对它们活动的控制和协调从逻辑上来说应该由国防委员会和经济委员会负责。

在这段时间里，莫洛托夫不知不觉地处于被动地位，无法采取任何行动。他不得不接受这种局面，转而忙于其他事务。他参与了与爱沙尼亚（9 月 28 日签署）、拉脱维亚（10 月 5 日签署）、立陶宛（10 月 10 日签署）的互助条约的筹备和签订工作，并将维尔纽斯地区移交给立陶宛，立陶宛政府在 1938 年 3 月 19 日已从法律上放弃了该地区。根据这些条约，苏联获得了在波罗的海沿岸各共和国建立军事、海军和航空基地的机会，从而增强了自身的防御能力。莫洛托夫还参与了与芬兰签订类似条约的筹备工作，苏联提议将佩萨莫和汉科长期租借给苏联，并进行领土交换：通过将卡累利阿地峡的边界向北移动，在卡累利阿获得更大的区域。

众所周知，芬兰方面在 11 月 13 日拒绝了这些提议，这引发了持续三个多月的战争。这也加剧了苏联与英国和法国之间的敌对情绪，甚至发展到公开对抗的程度。英法在德国前线继续无所作为，但却开始准备从北方——通过挪威和芬兰，从南方——通过土耳其和伊朗对苏联发动进攻。

直到 1940 年 3 月 7 日与芬兰政府开始的和平谈判，才让莫洛托夫能够果断地介入政府中形成的这种局面，而此前他似乎一直置身事外。他阐述了自己对国民经济管理体系进行重组的方案，该方案已于 3 月 28 日在中央全会上获得批准。根据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的提议，出台了一项决定——仅以苏联人民委员会的名义发布，这再次意味着莫洛托夫权力的恢复——该决定极大地削弱了沃兹涅先斯基的地位，因为其中隐含着对他工作的批评。

“人民委员部的拆分、人民委员部数量的增加、苏联人民委员会下属新委员会和管理机构的设立，以及工业和农业所有部门的进一步发展，使得领导工作的任务变得更加复杂，尤其是在对苏联人民委员会下属的经济机构和机关的管理方面，并提出了一个紧迫的问题，即如何协调和整合众多经济机构的工作。

在当前的情况下，由于苏联人民委员会，特别是经济委员会必须处理大量问题，并且每天都要与众多人民委员部、中央机构和地方机关打交道，苏联人民委员会和经济委员会无法具体了解各经济人民委员部的实际情况，无法及时发现它们的需求和尚未利用的潜力，也无法检查这些人民委员部对苏联人民委员会和经济委员会决议的执行情况。结果，我们至今还没有真正的经济计划，也没有为执行该计划提供应有的保障。此外，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由于同时兼任人民委员部的工作，无法将精力集中在对经济的个别部门的领导上。

为了改善苏联人民委员会和经济委员会对经济人民委员部的领导工作，使经济委员会能够对各经济部门进行适当的协调，改进国民经济的计划工作和已制定计划的执行工作……1.在苏联人民委员会下设立以下经济委员会：a)冶金和化学委员会；b)机械制造委员会；c)国防工业委员会；d)燃料和电力委员会；e)大众消费品委员会；f)农业和采购委员会……3.苏联人民委员会下属上述第 1 点所列经济委员会的主席应由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担任。4.苏联人民委员会下属经济委员会由上述经济委员会主席组成，这些主席同时也是苏联人民委员

会副主席，此外还包括苏联监察委员会主席、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书记、经济委员会主席莫洛托夫同志和经济委员会副主席米高扬同志……6.苏联人民委员会下属各委员会的职能具有执行性质。各委员会向其下属的人民委员部发布命令，这些命令对这些人民委员部具有约束力。”

在会议快结束时，对已批准的文件文本做了一项非常重要的修改。在阐述经济委员会组成的第 4 点中，补充规定将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也纳入其中[167]。

该文件于 1940 年 4 月 2 日正式公布，但仅两周后，根据 4 月 16 日政治局的决定，除了一个职位外，新的职位空缺都得到了填补。任命 Н．А.布尔加宁为冶金和化学委员会主席，Ｂ.А.马雷舍夫为机械制造委员会主席，Н．А.沃兹涅先斯基为国防工业委员会主席，М.Г.普尔哈诺夫为燃料和电力委员会主席，А.Н.柯西金为大众消费品委员会主席。根据同一决定，马雷舍夫、普尔哈诺夫和柯西金被任命为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布尔加宁被免去国家银行行长职务，马雷舍夫被免去重型机械制造人民委员职务，普尔哈诺夫被免去电站和电力工业人民委员职务，柯西金被免去纺织工业人民委员职务[168]。

在一个机构中如此公开地将官员（布尔加宁、沃兹涅先斯基）和专业人士（马雷舍夫、普尔哈诺夫、柯西金）结合在一起，很可能是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之间暂时妥协的结果，并得到了改革派的支持。虽然沃兹涅先斯基仍保留在经济委员会的领导岗位上，但他的作用已大大降低。他的职责仅限于国防工业问题，这使得国防委员会能够恢复其直接职能，并再次隶属于苏联人民委员会，也就是莫洛托夫。

然而，不久之后，5 月 5 日，关于新的高层管理结构的规定得到了大幅补充，其中的权力分配和隶属关系——实际的权力也发生了变化。（很可能是在斯大林的压力下）他们认为有必要“除了经济委员会副主席米高扬同志外，经济委员会还应有两名副主席——布尔加宁和沃兹涅先斯基同志，而且经济委员会副主席在主席缺席时应依次主持经济委员会会议，并相应地为经济委员会会议准备议题”[169]。这样，沃兹涅先斯基再次迅速向上攀升，势不可挡，实际上没有遇到任何阻碍，这仅仅是因为他得到了斯大林的坚定支持，斯大林得以报仇雪恨。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显然对现在的领导体制应该是什么样子有自己的想法——不是党和国家相结合的领导体制，而是国家和党相结合的领导体制，既包括广泛的层面，也包括核心的层面。因此，他提拔了沃兹涅先斯基，同时，为了确保他的成功，或者在最坏的情况下，只是为了以防万一，他还提拔了布尔加宁。他成功地改变了权力平衡，使其对自己有利，但却没有考虑到更重要的一点：整个经济，特别是国防工业的紧迫需求。为了自身利益，为了维护自己的领导地位，他已经牺牲了 Л.М.卡冈诺维奇。现在，他不仅准备对 А.И.米高扬采取同样的做法，也准备对 Ｂ.М.莫洛托夫这样做。

在核心领导层中争夺影响力的斗争并未就此结束。在维护了沃兹涅先斯基的地位后，斯大林几乎同时不得不接受在人事博弈中的又一次失败。伴随着他的老战友、最可靠的同志 К.Е.伏罗希洛夫不可避免的失势。

早在 3 月 21 日，在政治局多数成员的压力下，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就不得不接受一件让他非常不愉快的事情。将一个此前未作安排、对于党的会议来说非常不寻常的额外议题列入即将召开的中央全会的议程——“苏芬战争的教训”。此外，他还得同意由显然辜负了期望的国防人民委员来做报告[170]。当然，这个不幸的卢甘斯克钳工（指伏罗希洛夫，他出身钳工）试图为自己辩解的努力以悲剧告终。正如那些坚持要求伏罗希洛夫做报告、要求他解释红军为何完全没有做好战争准备的人所预料的那样，没有人听到任何合理的解释。因此，核心领导层，甚至是那些仍然对斯大林保持着以往的忠诚、信任他的人，在 5 月 8 日投票决定解除伏罗希洛夫的国防人民委员职务。批准任命基辅特别军区司令 С.К.铁木辛哥接替他的职位[171]。铁木辛哥将军在波兰战役期间不仅成功地指挥了集团军群，还展现

出了另一个重要品质——作为一名出色的政治组织者的能力。他成功地完成了一项对于军事干部来说不寻常、艰巨且责任重大的任务，即在西乌克兰的大片领土上组织苏联政权机构。

尽管如此，斯大林并没有抛弃他的战友。他伸出援手，证明了旧日友谊的珍贵。在 7 月 24 日重新确定国防委员会组成时（这是经济委员会改组的直接结果），他成功地让伏罗希洛夫取代莫洛托夫担任国防委员会主席。沃兹涅先斯基仍担任副主席，但现在严格按照职位规定，成员只有 С.К.铁木辛哥、Н.Г.库兹涅佐夫、Л.П.贝利亚、В.М.沙波什尼科夫，以及来自政治局的 И.В.斯大林和 Л.М.卡冈诺维奇。但很快，8 月 31 日，显然是应被排挤的团体的要求，又将 А.А.日丹诺夫重新纳入国防委员会，在经济委员会中，Н.А.布尔加宁和 В.А.马雷舍夫取代了莫洛托夫，在内务人民委员部中，还将不久前被任命为副国防人民委员的 С.М.布琼尼和 К.А.梅列茨科夫也纳入了国防委员会[172]。

但是，自 1940 年春天以来，作为解决所有有争议问题的唯一方式的妥协，并没有就此结束。在另一个意图非常重要的关于改组苏联监察委员会的提议中也有所体现。这个很少见的提议由斯大林亲自提出，并得到了核心领导层成员的支持。政治局在 5 月 26 日会议上做出的决定称：“1.认为有必要组建联盟-共和国国家监察人民委员部，其主要职能是监督物质和财政资源的核算和支出情况，以及检查政府主要决议的执行情况。2.在苏联监察委员会和国防委员会军事监察部门的基础上组建国家监察人民委员部。3.委托由莫洛托夫同志（主席）、维辛斯基、安德烈耶夫、杰姆利亚奇卡和马林科夫组成的委员会就组建国家监察人民委员部提出具体建议。4.解除党的监察委员会检查经济和其他国家组织工作的职能”[173]。

实际上，最后一点包含了整个文件的实质内容：消除，首先是消除人民委员部和企业面临的最危险的威胁，即来自不称职的党的监察委员会的意外检查。对这类检查的规模进行了实质性限制，尤其是对国防委员会和苏联监察委员会的检查，规定这类检查的进行和性质仅由苏联人民委员会决定。决定的第三点表明了斯大林再次做出妥协的意愿。他委托莫洛托夫组织制定关于新的人民委员部的法律。但当时就完成这一设想的计划在夏天未能实现。国际形势的急剧变化阻碍了这一进程。

1940 年 4 月 9 日清晨，德国国防军的部队在几个小时内占领了中立的丹麦和挪威。直到这时，英国才决定采取军事行动。在纳尔维克、特隆赫姆以及挪威北部的其他一些城市，登陆了一支由英国、法国和波兰部队组成的远征军。然而，持续了一个多月的战斗以远征军的失败和 6 月 8 日的撤离而告终。

在西线，德国军队同样出人意料地在 5 月 10 日拂晓发起进攻。他们侵入了法国北部、比利时、中立的荷兰和卢森堡境内。5 月 27 日，他们迫使比利时国王投降。5 月 31 日，他们迫使被困在敦刻尔克海边的英国军队撤离。6 月 14 日，他们占领了巴黎。

欧洲的军事行动几乎结束了。纳粹德国成为欧洲大陆上唯一强大且难以预测的力量。因此，苏联领导层不得不立即对这一意外的新情况做出反应。要考虑到一切，包括可能出现的事态转变，比如柏林方面撕毁条约，德国国防军向苏联的“利益范围”发起进攻。很快，这种担忧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证实：9 月 19 日，德国军队进入罗马尼亚，9 月 21 日进入芬兰。

因此，直到 6 月 16 日，在巴黎沦陷之后，在法国武装部队总司令魏刚将军首次试图投降之后，克里姆林宫才做出了最终决定。莫洛托夫将一份性质完全是最后通牒的照会交给了被召到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的爱沙尼亚公使。照会要求塔林方面毫无条件且立即同意让苏联红军的额外部队进驻。一天后，类似的照会也交给了立陶宛和拉脱维亚的公使。但这只是一种纯粹的象征性姿态——就在同一时刻，苏联的几个师在未经三国政府同意的情况下越过了

波罗的海三国的边界。6 月 26 日，他们又将一份内容类似但语气更加强硬的照会交给了罗马尼亚公使。照会中要求罗马尼亚在 48 小时内从 1918 年非法占领的比萨拉比亚以及北布科维纳地区撤出罗马尼亚军队。6 月 28 日，正如所计划的那样，苏联红军占领了基希讷乌和切尔诺夫策。

苏联领导层采取这样的行动，仍然担心欧洲会做出负面反应。他们预计会有抗议游行、强烈抗议以及明确表示对所采取行动的坚决反对。甚至预计英国和德国都会宣战。6 月 25 日政治局批准的苏联最高苏维埃关于将工作时间从 7 小时制改为 8 小时制、从每周工作六天改为传统的一周工作时间（这将每月的休息日从 5 天减少到 4 天）、禁止自行辞职或换工作的命令文本，间接地反映了极度的紧张、不安以及对最悲惨消息的准备状态。同一天政治局批准的另一份文件传达了更强烈的山雨欲来的感觉：《致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的信》，这份文件是为向苏联公民解释颁布这项损害劳动者权利的命令的原因而准备的。在《致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的信》中，完全坦诚地，没有隐瞒事件发展的最坏结果，指出：

“资本主义世界再次被世界大战所震撼。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已经将地球上一半以上的人口卷入其中……因此，我们国家的军事危险增加了（此处及以下为我所强调——Ю.Ж.），国际形势充满了不确定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国家，忠实于和平政策，为了苏联人民的利益，必须进一步加强我们的国防和经济实力……我们必须强大许多倍，以便能够应对任何考验。”[174]

在开始实施波罗的海行动时，苏联领导层还没有最终放弃另一种外交政策路线。没有放弃与伦敦方面建立合作关系，5 月 10 日，丘吉尔接替张伯伦担任英国首相。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克里姆林宫同意采取一项前所未有的举措——在没有国书的情况下，接受英国新任大使斯塔福德·克里普斯。

克里普斯于 6 月 12 日抵达莫斯科，第二天他就与莫洛托夫进行了会谈。英国大使在给伦敦的电报中这样描述了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阐述的苏联政府的立场：“唯一能够促使他（苏联领导层——Ю.Ж.）在这个最后时刻采取强硬立场的论据，是美国明确、清晰地承诺进行合作和支持。如果美国大使能够说服罗斯福总统向苏联驻华盛顿公使做出这样的承诺，那么我认为，这仍然可能会产生效果，并使苏联加入反对德国的共同战线。”

然而，当时不能指望罗斯福政府做出这样的声明，因此，为了推动英国和苏联之间关系的进展，丘吉尔于 6 月 25 日给斯大林发出了第一封私人信件。在信中，他只是对局势进行了总体评估，没有提出任何具体建议，他指出：“目前，包括我们两国在内的整个欧洲面临的问题是：欧洲各国和人民将如何应对德国在欧洲大陆建立霸权的前景。”

7 月 1 日，克里普斯在与斯大林会面时将这封信交给了他。但双方的意见交流再次没有超出对欧洲局势的评估范围，也没有超出对希特勒在巴尔干地区的可能计划、土耳其的立场以及海峡问题的讨论范围。克里普斯对斯大林当时的观点及其理解，用以下的话表达了出来：“斯大林依靠我们在海上的优势，这种优势能够阻止德国在欧洲建立霸权，至少在苏联做好准备之前是这样。他打算对我们友好相待，并且在我们与德国的斗争中，如果我们也希望以我们所能做到的方式提供帮助，他不会置身事外。但他现在不会公开做任何会激怒德国或撕毁与德国协议的事情。”[175]

刚刚显现的，或者更确切地说，只是在未来有可能出现的两国关系向好的变化，意外地消失了。7 月初，德国人故意公布了他们缴获的文件，这些文件证明了英法有进攻苏联的计划[176]。由于丘吉尔在他的信中，以及克里普斯都没有暗示过这一点，与英国大使的谈判中断了，苏联领导层做出了最终决定，完成已经开始的行动——将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和摩尔达维亚（比萨拉比亚从此被这样称呼）并入（或收复）苏联版图。

7 月期间，日丹诺夫在塔林、维辛斯基在里加、杰卡诺佐夫在维尔纽斯为波罗的海三国新的最高立法权力机构的选举做准备。他们组建了政府班子，这些政府将以自己的名义正式宣布克里姆林宫做出的决定。复杂行动的最后一部分顺利完成，8 月初，在苏联最高苏维埃第七次非常会议上，四个刚刚宣布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国家加入了苏联。诚然，波罗的海三国是在特殊条件下加入的，这些条件没有在任何地方公布，也没有被强调。它们暂时保留了自己的国家货币体系、军队（后来成为军团），指挥系统基本不变，还有自己的边界和海关，对于苏联其他公民来说，穿越这些边界和海关就像一两年前一样困难。

……“奇怪的战争”以敦刻尔克的不光彩结局、巴黎的沦陷以及希特勒和贝当于 1940 年 6 月 22 日签署的《贡比涅停战协定》而告终，这一切促使苏联领导层再次将注意力集中在对国际局势的分析上。之所以再次关注国际局势，还因为与克里普斯的谈判毫无结果。英国，作为唯一对抗法西斯阵营的国家，没有提出任何具体措施来共同抵御侵略者。尽管斯大林向英国大使坦诚地阐述了他对事件可能发展的看法，指出德国在欧洲的霸权并不意味着它的最终胜利，世界大战的主要战役还在后头[177]，但情况依然如此。

就在此时，莫洛托夫也自然地对局势进行了评估，不过这次是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公开进行的，时间是 8 月 1 日。他说：“欧洲战争的第一年即将结束，但这场战争的结局仍未可知。更有可能的是，目前我们正处于一个新阶段的前夕，一方面是德国和意大利，另一方面是得到美国支持的英国，它们之间的战争将进一步升级。所有这些事件都没有改变苏联的外交政策。苏联忠实于和平与中立政策，不参与这场战争。”[178]

无论是斯大林对克里普斯，还是莫洛托夫对代表们，都无法说出一件事：苏联能够遵循所选择的路线、保持中立多久。然而，他们的预测被证明是准确的。9 月 27 日，德国、意大利和日本在柏林签署了条约。对于苏联领导层来说，这无疑标志着战争进入了预期的全球阶段：“从现在起，日本放弃不干涉欧洲事务的政策，而德国和意大利则反过来放弃不干涉远东事务的政策。这无疑意味着战争的进一步加剧和其行动范围的扩大。”[179]在这种表面上平静、风格学究式的陈述背后，克里姆林宫明白该条约不可避免的后果——对苏联的直接威胁首先会增加。因为鉴于其地理位置，在西部与德国有陆地边界，在东部与日本有陆地边界，苏联现在被侵略国军事联盟的钳子夹住了。它陷入了一种美国和英国都不会陷入的境地，美英两国因海洋和大洋的可靠保护而免受对其领土的突然入侵。

日益增加的军事危险迫使核心领导层试图重新采取以前被证明是正确的政策——与柏林进行谈判。而莫洛托夫早在 9 月 21 日就向大使舒伦堡、9 月 26 日向临时代办蒂佩尔斯基希指出的德国对《苏德条约》的直接违反行为，被用作谈判的契机。这些以及苏联外交部的其他类似外交行动，似乎达到了预期的效果。10 月 17 日，舒伦堡向莫洛托夫转交了里宾特洛甫的信件，信中邀请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访问柏林，以讨论出现的分歧。核心领导层接受了这一建议，决定利用这一机会，以便弄清楚德国的计划，“获取信息并试探一下合作伙伴”[180]。

巴尔干地区的最新事件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克里姆林宫采取这一步骤。10 月 28 日，驻扎在阿尔巴尼亚的意大利军队入侵了希腊。而与希腊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的英国，起初只是在 11 月 1 日占领了克里特岛——以掩护苏伊士运河和其在地中海的交通线。现在，除了南斯拉夫之外，整个欧洲大陆都处于柏林和罗马的控制之下，因此，即将到来的与德国的战争将需要比以往可能的情况多十倍的军事力量，以及强大的经济支持。

1940 年 11 月 12 日和 13 日，第二次苏德谈判在柏林举行。莫洛托夫在与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的会谈中，纯粹从实用主义角度出发，没有回避对德国人提出的苏联加入三国条约这一想法进行理性的探讨。但他以其特有的固执和坚持，没有偏离他此行的主要目的——检验他的对手对满足苏联利益和协助确保苏联国家安全这一要求的反应。

根据出发前夕核心领导层制定的指示，莫洛托夫提出了一些先决条件和必要条件，要求柏林方面做到以下几点，在一定程度上，这些条件本应防止德国对苏联发动突然袭击：

-保证瑞典保持中立，确保苏联船只能够自由地从波罗的海进入北海；从芬兰撤出德国国防军部队（以掩护未来战区的北部侧翼）。

-重新审视与罗马尼亚的关系；不阻碍苏联与保加利亚签订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地区建立苏联基地的条约（这将保障南部侧翼的安全）[181]。

总体而言，莫洛托夫试图将最大威胁的区域限制在一定范围内，将其限制在现有的苏德边界区域内，从而获得将当时仍然相对薄弱的红军力量集中在那里的可能性。然而，谈判证实了最令人不快的预期——德国完全不愿意触及这些问题。而且，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还没等回国，就在从柏林发回的电报中告知斯大林：会谈“没有取得预期的结果”；“没什么可炫耀的”。

溺水的人会抓住救命稻草。因此，在如此可怕、毫无希望的情况下，如果苏联领导层同意达成一项魔鬼般的联盟——无条件地加入柏林-罗马-东京条约，那也不足为奇，甚至是可以理解的。他们会这样做，只是为了推迟战争，因为国家还没有做好战争准备。会想尽一切办法推迟战争，哪怕是通过这种方式，以争取时间。正如克里姆林宫所认为的，用这两年时间足以让陆军和海军完成全面重新武装，让新兵和预备役人员为未来的战斗做好准备。然而，投降最终并没有发生。

11 月 25 日，莫洛托夫回到莫斯科后，邀请舒伦堡进行会谈。他表达的绝非个人意见，而是表示愿意继续讨论苏联加入三国条约的可能性。但同样的，前提是德国方面必须预先同意接受在柏林提出的所有苏联条件。

随后的死一般的沉默，以及没有任何回应的反应，最终让人不得不承认：1939 年 8 月获得的那次看似几乎是无限期的延期，已经结束了。因此，现在必须迅速而果断地改变外交和国内政策。要不惜一切代价加快军事准备，在经济上取得成功，但首先是在国防工业方面取得成功。

但在苏联的首都，人们很久之后才知道，希特勒在 12 月 18 日签署了“巴巴罗萨”计划，并确定了对其东方邻国发动进攻的日期。

第七章

8 月 1 日，莫洛托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发言，他绝非偶然地再次提醒所有人不要掉以轻心。他提到，国家仍然面临着战争的威胁，只是在他看来，战争威胁的时间稍微推迟了一些。

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说：“为了确保我们苏联未来取得必要的成就，我们必须始终牢记斯大林同志的话，即‘我们全体人民都必须保持动员准备状态，以应对军事进攻的危险，这样任何‘意外情况’和我们外部敌人的任何诡计都不能让我们措手不及’（长时间的掌声）。如果我们都牢记这一神圣的职责，那么任何事件都不会让我们措手不及……”[182]

因此，笼罩在国家头上的可怕威胁不再是秘密。不再对任何人隐瞒，并且迫切需要立即完成工业现代化，以便更快地制造出现代化武器，并实现这些武器的批量生产。改革的支持者们不失时机地利用这一局势来实现他们的目标，并再次将党的十八大提出的任务放在首位。首先，尝试尽可能地限制各级党委会随意干涉经济管理的权力，因为这种干涉往往是不专业的。其次，在选拔干部时，不再依据其党派成员身份和党龄，而仅仅依据专业能力——即是否拥有高等教育背景和工作经验。

1940 年夏天，在这方面迈出了相当重大且果断的一步。6 月 25 日，中央委员会政治局通过了一项决定，事实证明，这是一系列削弱严格的垂直党组织结构基础的决定中的第一个。该决定首先旨在取消当时最令人无法容忍的中央委员会在个别企业设立的特别机构。这些机构显然是多余的，几乎是自治的，公然重复甚至取代了企业管理层的活动，最终使原本复杂的管理体系变得更加混乱。诚然，该决定提出了一个纯粹的官僚主义解决方案来根除这些机构，这非常符合马林科夫及其中央委员会组织局的特点。

这份新的指导性文件指出：“认为有必要减少联共（布）中央在企业中的党组织数量，主要将其保留在国防工厂、大型发电站、最重要的黑色冶金企业以及一些化学工业企业中。”三周后，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开始精简人民委员部和交通部门中性质类似的政治管理机构，这些部门当时由 Л.М.卡冈诺维奇负责监管。7 月 17 日，民用航空总局的人员从 208 人减至 41 人，北方海航道总局的人员从 125 人减至 40 人；7 月 25 日，海军人民委员部和内河航运人民委员部的人员分别从 829 人减至 41 人和从 1477 人减至 41 人。最后，7 月 27 日采取了最极端的措施——完全取消了渔业人民委员部的政治管理机构[183]。

与此同时，中央委员会组织局利用新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构实际成立的机会，通过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做出了一项决定，为这些机构规定了不同寻常的小规模编制。摩尔达维亚的编制为 75 名负责人员和 24 名技术人员，立陶宛为 50 名和 23 名，拉脱维亚为 45 名和 18 名，爱沙尼亚为 40 名和 19 名，这迫使他们只能将全部注意力集中在两个方向上：选拔和安排干部，以及宣传和鼓动工作，并且明确放弃对工业企业、交通运输业和渔船队的工作进行干涉[184]。

在这方面，改革的支持者们没有遇到政治局保守派的丝毫反对，甚至连一点异议都没有。此后不久，10 月 24 日，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又批准了另一项或许是最重要的决定。该决定实际上消除了一年来因被迫偏离改革路线而产生的压力，要求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边疆区委员会和州委员会的工业部门只能在先前规定的编制范围内组建[185]。

还有一项更为重要，甚至具有原则性的决定，但和之前所有决定一样，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彻底的，这项决定旨在消除党对武装力量的琐碎监督。诚然，作为一项预备措施，首先需要更新最高军事委员会的成员构成，最高军事委员会是国防人民委员部的一个集体议事机

构。7 月 24 日，政治局任命新任国防人民委员 С．К.铁木辛哥为最高军事委员会主席，成员包括：总参谋长 Б．М.沙波什尼科夫、炮兵总局局长 Т．И.库利克、空军司令 Я．В.斯穆什克维奇、最重要的几个军区司令，即基辅特别军区的 Г．К.朱可夫、白俄罗斯军区的 Д.Г.帕夫洛夫、列宁格勒军区的 К．А.梅列茨科夫、莫斯科军区的 С．М.布琼尼，以及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 Л.З.梅赫利斯、中央委员会书记 А．А.日丹诺夫和 Г．М.马林科夫[186]。

毫无疑问，改革的支持者们依据这些人的意见，并利用他们的支持，起草并于 8 月 12 日在政治局批准了《关于加强红军和红海军的一长制》的决定。该决定次日便作为苏联最高苏维埃的命令在全国所有报纸上公布，内容如下：

“鉴于军事委员制度已经完成了其主要任务，红军和红海军的指挥干部在过去几年中得到了显著加强，并且为了在部队和兵团中实现完全的一长制，并进一步提高指挥官作为部队全权领导人的权威，指挥官还需对部队的政治工作负全部责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决定：1.废除 1937 年 8 月 15 日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批准的《工农红军军事委员条例》（第 105/1387 号）。2.在红军和红海军的兵团（军、师、旅）、部队、舰艇、分队、军事院校和机构中设立政治副指挥官（首长）制度……”[187]

四天后，这项规定也推广到了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部队——边防部队、负责保护铁路设施、特别重要工业设施的部队以及护卫部队。尽管当时还无法完全消除党在武装力量中的存在，但党对指挥官做出决策的影响已被降至最低。

这标志着苏联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方向，而党的第十八次代表会议巩固了这一方向。由于国际局势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这次会议曾两次推迟——先是从 6 月推迟到 1940 年底，然后又推迟到次年年初[188]，最终于 1941 年 2 月 15 日召开，此时距离战争爆发仅四个月。

在会议上发言的两位报告人之一，Н．А.沃兹涅先斯基，描述了过去一年国民经济的发展情况，并介绍了当年的计划。与此同时，他似乎预见到了财政人民委员 А．Г.兹韦列夫将在即将召开的苏联最高苏维埃第八次会议上的发言，完全回避了国防工业的问题，将国防工业的支出隐藏在“生产资料生产”和“机械制造”项目中。他只字未提工业中的失误，对于失误的原因也只是轻描淡写地提了一下，似乎在暗示存在这些问题，并且提到了官僚主义。同时，他也巧妙地暗示了国家的实际情况。根据沃兹涅先斯基的提议，代表会议以及随后的会议应该通过批准计划来巩固苏联国民经济相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自主性和独立性，特别是在冶金和机械制造领域。此外，还要“有能力突破并增加和建立新的国家储备”[189]。

这种分析经济问题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是由非常具体的情况所决定的。而关于这些情况——关于沃兹涅先斯基没有提及的所有内容，第一位报告人马林科夫都进行了阐述。

格奥尔基·马克西米利安诺维奇已经向代表们说明，1940 年各行业的计划未能完成，实际上已经失败。诚然，马林科夫以一种相当独特、委婉的方式表达了这一点，他需要听众和读者的理解。这位联共（布）中央书记指出：“有些人民委员部不仅没有完成 1940 年的计划，而且与 1939 年相比，产品产量甚至明显下降。”他举例提到了渔业人民委员部、建筑材料人民委员部、林业人民委员部、交通人民委员部、海军和内河航运人民委员部、纺织人民委员部、食品人民委员部和轻工业人民委员部。也就是说，只是那些与民用产品生产和交通运输相关的部门。只是在谈到具体企业的工作时，他才扩大了未完成计划的人民委员部范围，包括电力工业、重型和中型机械制造、弹药、黑色和有色金属冶金等人民委员部。这

样一来，他让人们明白，几乎整个国家经济在如此关键的时刻都未能完成计划。他提出了一个相当独特的解决方案。

马林科夫多次强调，主要责任在于各地方的州委和市委，它们“削弱了在工业和交通运输领域的工作……认为自己对这些领域的工作不负有责任”。但他随即补充说明：联共（布）中央要求各市委、州委以及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绝不是去领导国民经济。不，它们只需“检查人民委员部的企业对决议的执行情况”，并“监督”这些执行情况。接着，他明确界定并列举了应该进行检查和监督的方面：设备和原材料的核算、产品生产的均衡性、工艺纪律、新技术的掌握和应用、降低生产成本以及物质奖励。

为了让任何人都不会对地方党组织，包括新成立的工业部门的新职能的局限性产生怀疑，他补充并强调说：“党组织有义务帮助人民委员部和企业整顿秩序（此处为我所强调——Ю.Ж.）”，1929 年 9 月 7 日联共（布）中央做出的、未被任何人废除的关于企业一长制的决定仍然有效，它是管理体系不可动摇的基础。

最后，马林科夫也没有回避导致年度计划未能完成的根本原因。他以一种不同寻常的自我批评态度，将其归咎于自己负责的干部政策。他对拥有高等教育背景的专业人员的使用情况进行了极其令人沮丧的分析。结果发现，45%，即 9.5 万人，在人民委员部从事行政工作，24%，即 5.1 万人，在工厂管理部门工作，而只有 31%，即 6.8 万人，直接在生产一线工作。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格奥尔基·马克西米利安诺维奇得出结论，只有 22%的车间主任、32%的副主任和 20%的班组长拥有高等教育背景。“机构，”马林科夫以他独特的方式总结道，“扩大了自身编制，并将工程师和技术人员用于办公室工作，从而使他们脱离了生产一线。”

在发表了上述言论之后，马林科夫提出的“在工业发达的城市、州、边疆区和共和国中，党的市委和州委负责工业的书记不应只有一名，而应该有多名”这一说法，可能会让人觉得奇怪，甚至自相矛盾且不合逻辑。但很快一切就都清楚了，因为从他报告的后续内容可以看出，这些负责工业的书记的主要职能应该是为工业和交通运输部门选拔干部，且仅限于此。但有一个前提条件——要彻底改变选拔这些干部的方式。

马林科夫接着说：“直到现在，尽管党在许多党组织和经济机构中都有指示，但在任命工作人员时，更多的是去查明他的出身，了解他的祖父母是做什么的，而不是考察他个人的工作能力和政治素质，以及他的才能。在选拔干部的工作中，关键问题是要正确地提拔那些能够组织实际工作的新工作人员。同时必须明白，这里所说的提拔不仅包括党内干部，也包括非党布尔什维克。在非党人员中有许多诚实且有能力的工作人员，他们虽然不是党员，没有党龄，但工作往往比一些有党龄的共产党员更好、更认真。”

在如此坦率地指出在工作中要依靠非党专业人员之后，马林科夫还提出了另一点建议。他主张清除那些不称职的共产党员，称他们为夸夸其谈者和无知之徒。他说：“同志们，是时候把这类经济管理人员揭露出来了。对于那些夸夸其谈、无法胜任实际工作的人，无论他们是党员还是非党员，都应该解除他们的职务，并安排他们从事较低级的工作。”“无知之徒就是那种什么都不懂，而且也不想学习的人……这样的无知之徒占据着企业经理、铁路负责人或其他职位，却什么都听不进去……同志们，我们必须揭露这些无知之徒，把他们从领导岗位上赶下去。我们不能容忍无知之徒担任企业领导，以及任何领导职务。”[190]

所有这些提议和指示目前只涉及经济管理的基层，主要是担任企业经理及以下职位的人员。但在代表会议的决议中，这些提议有了全新的特点：必须“确保企业经理成为企业实际的全权领导人，全面负责企业的状况和生产秩序”。这样一个完全正式的要求，本应使企业经理在工作中完全独立自主。

与此同时，代表会议的另一项决议展示了一种全新的、对许多人来说不熟悉的评估国民经济领域工作人员专业活动的方式。该决议明确警告了 М.М.卡冈诺维奇、М.Ф.杰尼索夫、З.А.沙什科、А.А.伊什科夫、В.В.博加季廖夫等人民委员：“如果他们不能改善其人民委员部的工作……那么他们将被免去人民委员的职务。”而那些因人民委员部工作失败已被撤职的人被调往党组织这一事实，证明了这并非空洞的威胁，而是完全可能采取的措施。对于这些人，不再对他们提出任何政治指控——比如指控他们是托洛茨基或布哈林的支持者，或是其他反对派成员：解除了 Н.М.安采洛维奇、П.С.热姆丘任娜、М.М.李维诺夫、И.А.利哈乔夫、Ф.А.梅尔库洛夫的中央委员职务，将农业人民委员部副人民委员И.А.贝内迪克托夫、国防人民委员部副人民委员 Е.А.什恰坚科从中央委员降为候补中央委员[191]。

所有这些都再次证实了一种趋势，这种趋势从沃兹涅先斯基、布尔加宁、马雷舍夫、普尔哈诺夫、柯西金被选入苏联人民委员会领导班子后就已显现，他们是在被任命担任这些高级职务后才成为中央委员的。这表明，在形式上的党的最高机构——中央委员会中任职，现在只是专家已经获得提拔的一种体现，而不再是未来晋升的跳板。

在代表会议的最后一天，即 2 月 21 日，还发生了另一件重要事件，这件事标志着新的核心领导层的形成完成，结束了自党的十八大结束以来已经持续了两年的、对外界来说不知不觉、没有表面冲突、没有外在表现的斗争。在当天举行的中央委员会全会上，几乎在会议结束的最后时刻，没有任何严肃的解释、说明和讨论，政治局的成员大幅增加。斯大林提出了关于这个问题的建议，再次表明了党作为一个整体、党的代表会议，甚至中央委员会的作用已经变得微不足道，现在这些机构已无关紧要，只是在必要时被用来为核心领导层的决策提供形式上的支持。

“斯大林：我们在这里，政治局委员和一些中央委员进行了商议，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最好至少扩大一下政治局候补委员的人数。现在政治局里有不少老同志（此处为我所强调——Ю.Ж.），一些即将退休的人，我们需要选拔一些更年轻的人，让他们得到培养，以便在必要时能够接替他们的位置。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扩大在政治局工作的人员范围。

具体来说，我们有这样一种想法——现在增加一些人是个好主意。目前有两名政治局候补委员。第一个候补委员是贝利亚，第二个是什维尔尼克。最好增加到五名，再增加三名，让他们协助政治局委员开展工作。比如说，把沃兹涅先斯基同志列为政治局候补委员是不错的，他当之无愧，还有莫斯科州委第一书记舍尔巴科夫，以及马林科夫——第三名。我认为把他们纳入是个好主意。

安德烈耶夫：有人想发言吗？没有。对整个名单进行表决。同意接受斯大林同志提议的请举手。请放下手。有反对的吗？没有。有弃权的吗？没有。提议通过。”[192]

从这一刻起，苏联的核心、非正式领导层构成如下。纯粹的党组织代表有斯大林、安德烈耶夫、日丹诺夫、马林科夫，而且他们更多地是以中央书记的身份，而非政治局委员或候补委员的身份存在——也就是说，他们实际上领导着党的机构，真正地管理着它，并指导着联共（布）在中央和地方的所有活动。政府机构方面有莫洛托夫、米高扬、卡冈诺维奇、贝利亚（就在一周前，后两人还被纳入了经济委员会[193]，这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拉扎尔·莫伊谢耶维奇以前的作用，并极大地增强了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的作用，此外，2 月 3 日他还被任命为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194]，这使他在权力方面最终超过了伏罗希洛夫）、沃兹涅先斯基，还有布尔加宁。布尔加宁是这十人中唯一一个仍然只是中央委员的人，这使他完全依赖于斯大林这位庇护者的意愿。

现在可以说领导层真正实现了年轻化。这证实了斯大林作为扩大政治局成员的正式理由的那种观点。斯大林本人是最年长的——他 62 岁了，较年长的是 52 岁的卡冈诺维奇和 50 岁的莫洛托夫，而其他七人，也就是大多数人，年龄大致相同——在 37 岁到 45 岁之间。

正是这个新组成的“十人小组”，而绝非政治局的十四名委员和候补委员，完全承担起了就外交和内政问题、确定国民经济发展的性质和速度等所有最重要、最关键的决策任务。这一说法很容易得到证实，因为政治局正式会议（有会议记录的会议）的数量持续减少。如果 1936 年还有九次会议，1937 年有六次，1938 年有三次，1939-1940 年每年只有两次，那么在 1941 年上半年——一次都没有！然而，在同一时期以政治局名义做出的实际决策数量并没有减少，仍保持在原来的水平。相应地，每年的决策数量分别为 275 项、346 项、290 项、306 项、315 项和 148 项[195]。

由于发生的这些变化，整个广泛的领导层的各个层级也最终得以构建。在权力结构中，按重要性和作用排在第二位的精英群体由那些未进入核心领导层的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组成——伏罗希洛夫、加里宁、赫鲁晓夫、什维尔尼克、舍尔巴科夫，他们的具体职能局限于特定职位，只是偶尔被要求参与做出一般性决策。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也属于这一群体——维辛斯基、杰姆利亚奇卡、柯西金、马雷舍夫、梅赫利斯、普尔哈诺夫[196]，他们担任着非常高的职位，负责监管多个人民委员部的工作。

权力等级的第三层级包括那些没有兼任其他任何国家或党内职务的苏联人民委员，以及负责联共（布）中央一些小型但独立部门的负责人——组织指导部和学校部。他们都在全联盟范围内开展工作。最后，第四层级由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赫鲁晓夫除外）、边疆区委员会和州委员会的第一书记组成。尽管他们现在已经失去了作为联盟层面权力补充来源的原有重要性，但在其所在地区仍然（或暂时仍然？）保持着主导地位，每天领导着 12835 名党的职能人员——他们的下属的工作[197]。

在代表会议召开前的几个月里，三个最重要的非经济人民委员部发生了重大的人事变动。外交部的变动最小。在 1940 年 2 月 25 日，В.П.波将金因在布加勒斯特、索菲亚和安卡拉的使命失败而被免去副外交人民委员的职务（他被任命为俄罗斯联邦教育人民委员）[198]之后，直到 1940 年 11 月才组建了新的领导班子。新班子成员包括 В.М.莫洛托夫、А.Я.维辛斯基、В.Г.杰卡诺佐夫、С.А.洛佐夫斯基，以及作为秘书长的 А.А.索博列夫[199]。但和之前一样，在 М.М.李维诺夫被免职后，驻外大使的人员构成几乎没有变化。在一年半多的时间里，只进行了四次任命：Г.М.普希金被派往新成立的国家斯洛伐克；А.Е.博戈莫洛夫接替 Я.З.苏里茨（由于法国政治体制的重大变革及其半被占领国家的地位）被派往维希；В.Г.杰卡诺佐夫因与德国的“特殊”关系接替施瓦茨瓦在柏林的职位；И.В.斯捷潘诺夫接替 П.Д.奥尔洛夫被派往芬兰。此外，根据 1939 年 7 月 28 日政治局的决定，全苏对外文化联络协会（ВОКС）正式隶属于外交部（该协会此前就在外交部的监管下工作），以及 1940 年 12 月 4 日任命 Я.С.哈文松为塔斯社的负责人，这些也可被视为常规变动[200]。

武装力量方面的人事变动更为显著。在 С.К.铁木辛哥担任国防人民委员后，几乎更换了所有军区司令，因为战争爆发后，这些军区要么要改编为前线部队，要么要成为组建和补充前线部队的基础。到 3 月初，在几个月内经过两到三次更替后，各军区司令分别是：阿尔汉格尔斯克军区——В.Я.卡恰洛夫，列宁格勒军区——М.М.波波夫，波罗的海特别军区——Ф.И.库兹涅佐夫，白俄罗斯军区——Д.Г.帕夫洛夫，基辅特别军区——М.П.基尔波诺斯，敖德萨军区——Я.Т.切列维琴科，莫斯科军区——И.В.秋列涅夫，奥尔洛夫军区——Ф.Н.雷米佐夫，哈尔科夫军区——А.К.斯米尔诺夫，伏尔加河军区——В.Ф.格拉西缅科，北高加索军区——И.С.科涅夫，外高加索军区——Д.Т.科兹洛夫，中亚军

区——С.Г.特罗菲缅科，外贝加尔军区——П.А.库罗奇金，而远东地区已经是前线——И.Р.阿帕纳先科[201]。

与此同时，国防人民委员部本身及其主要机构的领导班子也进行了更新。1940 年 8 月 26 日，П.В.雷恰戈夫取代 Я.В.斯穆什克维奇被任命为空军司令。10 月 5 日，А.И.扎波罗热茨被任命为新设立的（名称不同但实质相同）总政治宣传部部长（取代了与军事委员制度一同被废除的总政治部），副手为 В.Н.鲍里索夫和 Ф.Ф.库兹涅佐夫。11 月 30 日，免去了原骑兵军军长、曾参与保卫察里津的斯大林的老战友 В.А.什恰坚科的副国防人民委员兼干部管理局局长的职务，由 А.Д.罗季奥诺夫接替。1941 年 1 月 14 日，Г.К.朱可夫取代被调往负责作战训练的副国防人民委员职位的 К.А.梅列茨科夫，被任命为总参谋长。六周后，为他挑选了新的副手：第一副手——Н.Ф.瓦图京，第二副手——В.Д.索科洛夫斯基，作战管理局局长——Г.К.马兰季纳。大约在同一时间，两个重要的总局也迎来了新的局长。汽车装甲坦克总局——Я.Н.费奥伦科，防空总局——Е.С.普图欣[202]。

最后，最重大的变动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改组。根据 1941 年 2 月 3 日政治局的决定，“认为有必要”从内务人民委员部中分离出国家安全总局，并将其改组为一个独立的联盟-共和国人民委员部[203]。保留了原来名称的内务人民委员部仍然像以前一样，不太连贯地负责领导各种功能上几乎没有关联的机构。首先，是许多国家的国家机构通常具有的职能：

1.“保护公民的公共财产、人身和财产安全”——民警总局；地方防空（МПВО）；打击青少年犯罪。

2.公民身份登记（户籍登记处）；“国家档案基金的登记、保护、科学研究和业务处理（此处为我所强调——Ю.Ж.）”；矿山技术监督和锅炉检查；消防。

3.对国家边境、特别重要的工业企业和铁路设施的军事保卫。

4.管理监狱和护卫部队。

其次，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结构中，那些与宪法条文和精神、刑事诉讼法典相矛盾，但最重要的是与 1938 年 11 月 17 日的联合决定相违背的部门仍然原封未动。正是这些部门，其存在本身就侵犯了公民被赋予的权利：

5.一个非司法的确定有罪和宣判的机构——人民委员部下属的“特别会议”；即所谓的行动部队。

6.九个负责组织“对被判刑人员的劳动改造”以开展“大型经济建设工作，开发苏联偏远北部地区的新区域”的总局，其中包括古拉格、远北建设总局及其他类似机构[204]。

改组后，Л.П.贝利亚再次被任命为内务人民委员。他的副手包括以前担任相同职务的人员——С.Н.克鲁格洛夫、В.В.切尔内绍夫、И.И.马斯连尼科夫，以及获得晋升的人员——被撤销的总经济管理局的一个部门负责人 Б.П.奥布鲁奇科夫、罗斯托夫州内务人民委员部负责人 В.С.阿巴库莫夫[205]。

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НКГБ）的职能界定同样具有两面性，尽管方式完全不同。和任何一个情报机构一样，它应该保护苏联的国家利益，抵御任何侵犯行为。这一原则体现在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的结构以及它需要解决的任务中。

“开展国外情报工作”由第一总局负责（局长为 П.М.菲廷，副手为 П.М.苏多普拉托夫、В.М.扎鲁宾）。“打击外国情报机构在苏联境内的破坏、间谍、破坏和恐怖活动”，而且绝不是打击那些只存在于卢比扬卡办公室人员想象中的活动，而是打击完全真

实、切实存在且极其危险的活动，这属于第二总局的职责范围（局长为 П. В. 费多托夫，副手为 Т. М. 博尔舍夫、Л. Ф. 赖希曼）。

这些是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的正常、合理职能。但与此同时，它还有其他特殊职能。这些职能的目的不再是保护国家利益，而仅仅是保护权力，即核心领导层的利益。

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有必要解决一个显然是虚构的任务，这可以说是一种尚未结束的内战的特殊形式，但已经是“无形的战线”：“对苏联各阶层民众、工业、交通、通信、农业等系统中各种反苏政党和反革命组织的残余进行业务侦查和清除”。这些明显人为制造的问题由第三局，即秘密政治管理局（局长为 С. Р. 米尔施泰因，副手为 Н. Д. 戈尔林斯基、И. Г. 舍韦廖夫）负责处理，此外，侦查部门（Л. Е. 弗洛德济米尔斯基、А. А. 叶萨乌洛夫、Л. Л. 施瓦茨曼）以及一些辅助部门——会计统计部门、对外监视部门、搜查和逮捕部门也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其中，并承担其他任务。

在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НКГБ）的体系中，实际上处于特殊且独立地位的是那些直接隶属于核心领导层、只为核心领导层服务的部门，即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卫戍司令管理部门（负责人为 Н. К. 斯皮里多诺夫）和第一局——党和政府领导人保卫局。前者确保了克里姆林宫的封闭性，即使是在克里姆林宫内工作的人员也必须遵守极其严格的制度，同时还对整个周边区域进行管控——红场和马涅什广场、位于那里的建筑物，特别是上（如今的国立百货商场，ГУМ）下商业长廊、历史博物馆、圣母升天大教堂、马涅什展览厅以及亚历山大花园。与此同时，该管理部门还负责保护位于克里姆林宫区域内的建筑古迹、博物馆的艺术和历史藏品的安全。而第一局，正如其名称所示，负责保障政治局和人民委员会成员的安全，承担着克里姆林宫、联共（布）中央机构所在建筑、格拉诺夫斯基街和谢拉菲莫维奇街的政府住宅楼、政府别墅以及连接这些别墅与莫斯科市中心的道路的安保工作。此外，该局还直接负责克里姆林宫电话交换台、食堂、政府疗养院、莫斯科郊区、克里米亚、高加索地区的度假屋和别墅的运营管理。

国家安全人民委员一职由 В. Н. 梅尔库洛夫担任，在此之前的二十年里，他一直在格鲁吉亚国家政治保卫总局（ГПУ）-内务人民委员部系统工作，从 1938 年底开始担任 Л. П. 贝利亚的第一副手。该人民委员部的副手包括 И. А. 谢洛夫（此前近一年时间里担任乌克兰内务人民委员部负责人）、Б. З. 科布洛夫（此前是在改组时被撤销的总经济管理局的负责人）、М. В. 格里博夫（此前也曾担任过副人民委员）[206]。

然而，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的独立性实际上只是虚幻的。其原因与其说是贝利亚和梅尔库洛夫之间原有的、相互信任的关系，不如说是因为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作为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和政治局候补委员，成为了这两个部门的负责人。在国家安全部门从内务人民委员部中分离出来后，他仍然完全按照规定正式地“监督”这个新的人民委员部的工作，并“指导”其活动。

第二部分、1941—1944 年的“三巨头”时期

1941 年对于欧洲来说，新年伊始便异常灰暗，没有像往常那样带来对美好未来的希望。相反，巴尔干危机每周都在加剧，这加剧了人们的不安和不确定性，同时也让人愈发感觉到一场致命的危险正不可避免地逼近。然而，克里姆林宫深知国家尚未做好战争准备，不得不寄希望于能够推迟这场灾难的爆发。为了更坚定地抱有这种希望，它试图通过传统的外交手段来试探德国领导层的态度，揭开其真实意图。

起初，克里姆林宫采取了在这种情况下常用的方式——发布塔斯社声明。1 月 13 日，它以这种极为谨慎的方式表达了对局势的不满。声明援引“外国媒体的报道”，称德国国防军部队正在向保加利亚调动，并指出：“……这一切的发生都没有通知苏联，也未得到苏联的同意。”同一天，通过同样的渠道，以德国新闻局的名义做出的回应模棱两可，几乎没有提供任何实质信息[207]。

因此，1 月 17 日，莫洛托夫在莫斯科向德国大使舒伦堡，杰卡诺佐夫在柏林向德国外交部国务秘书魏茨泽克，不得不发表了内容明确的声明。声明中冷静地陈述了一个显而易见、无可辩驳的事实：“根据所有信息，大量德国军队已在罗马尼亚集结，并且已经准备好进入保加利亚，其目的是占领保加利亚、希腊和海峡地区。”接着，声明以一种强硬甚至近乎最后通牒的口吻得出结论。按照声明的意图，这个结论应该有助于得到那个关键问题的答案——在接下来的几周或几个月里会发生什么。莫洛托夫和杰卡诺佐夫提醒道：“苏联政府曾多次向德国政府声明，由于保加利亚领土和两个海峡地区被苏联视为安全区域，因此苏联政府不能对威胁到苏联安全的事件无动于衷。鉴于此，苏联政府认为有责任预先警告，任何外国武装力量出现在保加利亚领土和两个海峡地区，苏联政府都将视为对苏联安全的侵犯。”[208]

这次试探的结果令人沮丧，证实了最坏的预期。一周后，苏联外交部收到的回复中，既没有明确否认相关事实，也没有透露任何隐秘信息，只是完全无视了苏联的利益。德国方面傲慢地让莫斯科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如果对希腊采取任何军事行动”，那么“德国军队打算穿过保加利亚”[209]。换句话说，柏林保留了行动的自由，不打算与克里姆林宫协商，它仍有可能在合适的时机占领这两个巴尔干国家。毕竟，早就有了采取行动的正式借口——希腊境内有英国军队，包括英国皇家空军的 8 个飞行中队和高射炮部队。但是，对于是否会发动战役，如果发动，何时发动，以及之后会发生什么，双方之前达成的协议是否会继续被违反，回复中只字未提。但这恰恰就是柏林那些隐秘意图的核心所在。

似乎从那时起，人们不应再怀疑，与德国那短暂的“睦邻友好关系”已经结束。这种关系突然中断，而且就在不久前还是克里姆林宫的合作伙伴，如今却成为了其主要的潜在对手，德国为自己赢得了无可争议的战略优势。在确保了欧洲后方的安全后，德国开始在苏联整个西部边境——从巴伦支海到黑海沿线集结数十个师的兵力。现在，只能寄希望于以下两种情况中的一种：要么巴尔干战役不会很快爆发；要么即便在近期爆发，也会相当激烈且持续较长时间。

一个半月后，局势才逐渐明朗起来。3 月 1 日，保加利亚首相菲洛夫在维也纳签署了加入《三国同盟条约》的议定书，并同意德国军队进入保加利亚，德国军队当天就出现在了希腊边境。四天后，在雅典，新西兰第 2 师、澳大利亚第 6 师和第 7 师以及英国第 1 装甲旅开始登陆。此后事件的发展完全取决于伦敦，取决于它是否有意愿积极对抗纳粹主义。此外，还取决于它能否说服南斯拉夫和土耳其加入对德战争，与它们一起在巴尔干地区建立起强大的防线，至少能在这里阻止侵略者的步伐。

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做出了一个犹豫不决的决定。他认为，再次避免进行大规模战斗行动，再次从欧洲撤退，更符合大英帝国的利益。3 月 6 日，他就向艾登暗示：“失去希腊和巴尔干地区对我们来说不会是一场严重的灾难……”[210]

而苏联领导层的反应则截然不同。它不再自欺欺人，显然开始改变外交政策路线。更确切地说，是改变外交导向，明显放弃了之前那种在国际舞台上毫无保留地支持德国的立场，这种立场已经持续了将近两年。无论如何，英国驻莫斯科大使斯塔福德·克里普斯就是这样理解和解读 3 月 3 日 А.Я.维辛斯基发表的声明的[211]。这位副外交人民委员以苏联政府的名义毫无保留地谴责了菲洛夫同意德国军队进入保加利亚的决定。他批评这一决定“不会带来和平的巩固，反而会导致战争范围的扩大”[212]。

此时，想要更强烈地强调莫斯科和柏林之间已经显现出的、巨大的利益分歧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克里姆林宫更倾向于等待德国对声明的反应，并严格根据反应来采取行动。然而，英国明显的犹豫不决，以及它更关注在非洲——昔兰尼加、厄立特里亚、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对意大利军队的作战行动的结束，而非欧洲战场的战事结果，这产生了负面的影响。3 月 25 日，南斯拉夫也加入了《三国同盟条约》。似乎德国还未开始的巴尔干战役已经胜券在握。

第八章

面对如此复杂的局势，这一切都只意味着一件事——战争危险的加剧，苏联的核心领导层做出了非常独特的反应。然而，与那些较为引人注目的外交举措不同，克里姆林宫内发生的一系列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隐秘的，不仅对西方的政治家们保密，对本国的公民也是如此。

3 月 10 日，在巴尔干危机的第一个高峰期，政治局做出了一项影响深远的决定：“1. 任命 Н．А.沃兹涅先斯基同志为苏联人民委员会经济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并解除他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的职务。2.任命 М.3.萨布罗夫同志为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和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3.关于国防工业委员会主席和苏联人民委员会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的问题，将另行讨论”[213]。第二天在报纸上公布的前两项内容，尽管表述略有不同，且是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令的形式出现，但看起来就像是一项普通的政府法令。从表面上看，这是沃兹涅先斯基飞速晋升的又一证明。但也仅仅是表面上如此，前提是不考虑最关键的一点——在此之前一直是沃兹涅先斯基负责国防工业。

做出这一决定还有其他一些动机，这些动机与核心领导层内部的斗争有关，而这种斗争在此之前就已经多次显现。早在 1939 年底至 1940 年初，米高扬就已经取代莫洛托夫担任了经济委员会主席。而在 12 月初，仅仅在国家计划委员会工作（或实习？）了几个月的萨布罗夫被任命为第一副主席，职位在沃兹涅先斯基之下。正是这些事实表明了莫洛托夫地位的动摇。这意味着他随时可能不仅会被免去政府首脑的职务，还可能会被免去外交人民委员的职务。毕竟，1940 年秋天，外交人民委员部突然出现了第一副人民委员 А．Я.维辛斯基，这并非偶然。作为一个“外来者”，他迅速且积极地参与到人民委员部的日常管理工作中，不仅接待了许多大使，还承担了重要外交文件的起草工作。

那么，是什么因素促使做出更换政府首脑这样重大、必然会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广泛反响的举措呢？很可能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首先，莫洛托夫是旧的核心领导层中为数不多的，在权力机构——无论是党组织还是政府机构中，仍然保留着所有原有职位的人之一。尽管经历了 20 世纪 30 年代末的“大清洗”和人事更替，他依然保住了自己的地位。他无意中成为了那个年代政策的象征，而人们都尽量避免提及那个年代的政策，试图将其遗忘。莫洛托夫还象征着另一个方面——即已经退出政治舞台的领导层。

其次，在极有可能发生外交政策路线重大转变的情况下，最好能考虑更换一些曾执行旧政策的人。而正是莫洛托夫，比其他人都更与亲德政策紧密相连。正是他签署了那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发挥了重要作用的著名条约。正是他率领苏联官方代表团前往柏林，与希特勒进行谈判。总之，从各方面来看，莫洛托夫都是最适合为所有的失误和错误承担责任的人。将他调离岗位，最能鲜明地体现出苏联领导层新的政治路线，即完全且毫无保留地摒弃已经过时的旧政策。他是为了证明那些仍处于权力巅峰的人的地位而被牺牲的人。

新一轮的调整进行得非常迅速。仅仅两周后的 3 月 21 日，政治局又以苏联人民委员会和联共（布）中央的名义做出了两项同样重要的决定[214]。第一项决定是《关于苏联人民委员会的工作组织》，这份内容丰富、共十四条的决定，本质上是为了解决管理问题。首先，它要求“解散苏联人民委员会下属的经济委员会，实践证明，这些经济委员会成为了人民委员部和苏联人民委员会之间的中间机构”。这实际上是对与莫洛托夫相关的组织改革和行政创新成果的否定，而这些改革和创新不久前还曾得到政治局和中央全会的一致支持与认可。该决定规定，不再保留原有的五个管理国家国民经济的主要机构，而是创建其他一些从表面上看数量更多的机构：

“4.为了更好地领导各人民委员部，并迅速解决实际问题，增加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的数量，以便每位副主席仅负责两到三个人民委员部。5.规定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在联共（布）中央和苏联人民委员会制定的计划和决议范围内，独立解决其所负责的人民委员部提出的所有实际问题，但以下情况除外：ａ）提高工资和调整物价；б）根据国家储备管理局（УГР，即国家储备管理部门——Ю.Ж.）的规定使用国家预算储备和物资储备。6.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就其所负责的人民委员部做出的所有决定，均作为苏联人民委员会的指令发布。”

但这种通过增加人民委员会副主席数量来增强他们的作用，从而看似削弱政府首脑作用的纯粹官僚式调整，并没有改变、也没有打破一直以来稳固不变的国家经济垂直管理原则。第二项决定《关于成立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团》对第一项决定进行了重大修正，实际上否定了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们看似获得的所有权力。

顺便提一下，该决定的第九条废除了早已失去其原有重要性的经济委员会。在政府内部创建了一个真正的、尽管完全不符合法律规定且违宪的权力机构：

“1.在苏联人民委员会内成立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团，赋予其苏联人民委员会的所有权力。

2.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团由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В.М.莫洛托夫同志、苏联人民委员会第一副主席——Н.А.沃兹涅先斯基同志以及 А.И.米高扬同志、Н.А.布尔加宁同志、Л.П.贝利亚同志、Л.М.卡冈诺维奇同志和 А.А.安德烈耶夫同志组成。

3.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团的职责包括：ａ）编制季度和月度国民经济计划、预算和军事订单，并提交联共（布）中央和苏联人民委员会批准；б）批准季度和月度供应计划、季度信贷和现金计划、月度运输计划；в）解决当前的经济和行政问题以及文化建设问题。

4.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团以检查国民经济计划以及联共（布）中央和苏联人民委员会的主要决议的执行情况作为工作的基础……”

该决定还包含了另一个同样重要的条款：“10.将苏联人民委员会国防委员会的成员减少到五人，由苏联人民委员会亲自批准。11.赋予苏联人民委员会国防委员会以下职责：ａ）根据国防人民委员部和海军人民委员部的提议，决定新型技术装备的列装；б）审议军事和海军订单；в）制定动员计划，并提交联共（布）中央和苏联人民委员会批准。”

从这两项决定的内容可以明显看出，它们旨在共同解决一个唯一的问题：对苏联人民委员会进行改组。为它找到一种与以往不同的、更优化的结构，以及管理国家最重要经济部门的体系。然而，这些相互关联、相互补充的决定中的众多条款和分条款并没有全部得到执行。例如，一个月后，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的数量仍然保持不变——为 13 人。他们分别是沃兹涅先斯基、伏罗希洛夫、杰姆利亚奇卡、柯西金、马雷舍夫和普尔哈诺夫，他们没有其他任何职务；贝利亚、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梅赫利斯、米高扬和萨布罗夫，他们除了担任副主席外，还担任人民委员这一主要职务；以及维辛斯基，与其他人不同，他只是外交人民委员部的第一副人民委员。这样一来，他们每个人所负责的部门不是规定的两到三个，而是三到四个。

正是这一情况可能会让人产生一种错觉，即最终在 3 月 21 日，只是高层权力结构中的力量分布发生了变化，仅此而已。“年轻派”失去了关键职位，“老资格派”的地位得到了加强，尽管他们没有受过高等教育，但却在“官僚体制的游戏”中积累了经验，多次证明了自己的管理能力。但只有在这些决定仅仅是用一个新的机构——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团（БСНК）取代早已过时的经济委员会和五个经济委员会的情况下，才会出现这种情况。

实际上，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团的设立不仅是为了让那些开始失去权力的人重新掌权，还旨在成为一个特殊的战时内阁，这一点从它的本质中就可以看出。

在 3 月 21 日之前，苏联人民委员会实行的是两级管理体系：经济委员会——负责与国防工业直接或间接相关的部门，为军队和海军提供一切必要的物资；人民委员会副主席——负责管理纯粹的民用部门的人民委员部或委员会、总局、管理局。而现在，组织架构发生了变化，变成了三级体系：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团——人民委员会副主席——人民委员部，而且体系的最底层是所有的部门。最高层的权力分配如下：莫洛托夫负责领导外交政策，沃兹涅先斯基负责国防工业，米高扬负责整体的物资供应，布尔加宁负责重工业，贝利亚负责国家安全，卡冈诺维奇负责交通和运输，安德烈耶夫负责农业。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团的职权范围不包括陆军和海军，然而，这次改组，实际上只是人事方面的改组，对它们也产生了明显的影响。

就在重大变革的前夕，即 3 月 8 日至 10 日，国防人民委员部的领导层发生了重大变化。除了已经担任此职的 С.М.布琼尼（第一副人民委员）、Б.М.沙波什尼科夫（负责总军事工程管理）、А.Д.鲁缅采夫（负责人事）、И.И.普罗苏林（情报管理局局长）、Г.К.朱可夫（总参谋长）、К.А.梅列茨科夫（负责作战训练的副人民委员）、А.И.扎波罗热茨（红军总政治宣传部部长）之外，С.К.铁木辛哥的副手还包括（4 月 9 日任命的）空军司令 П.Ф.日加列夫、炮兵司令 Г.И.库利克[215]。4 月 10 日，最高军事委员会也进行了重要改革。政治局决定“1.最高军事委员会定期每周召开一次会议。2.国防人民委员部具有任何重要意义的命令，须由人民委员、最高军事委员会成员日丹诺夫同志或马林科夫同志以及总参谋长签署后发布”[216]。最后，在同一天，即 4 月 9 日，国防委员会的组成也得到了批准。其中保留了伏罗希洛夫，作为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他成为了两个权力机构之间的连接纽带，还有国防人民委员铁木辛哥、海军人民委员库兹涅佐夫，当然，还有中央书记斯大林和日丹诺夫[217]。

然而，不能仅仅将这次改组归结为当时国家迫切需要的、为战争做准备的工作，以及经济的秘密动员。那些无法接受党和个人失去权力垄断的势力显然也参与了这次改革，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功。这些势力已经持续了一年半的时间，坚持不懈地对党的十八大的基本决议进行重新审视。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会出现一个乍一看难以理解、甚至毫无意义的要求，即要求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现在他们构成了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团，布尔加宁除外）严格按照……同一个政治局（在文件中通常被称为“联共（布）中央”）的指示行事。由此也产生了中央书记处对国防人民委员部所有“具有任何重要意义”的命令的监督，这使得军事部门在最需要主动性的时候失去了主动性。总之，有人非常巧妙、几乎难以察觉地试图恢复专业人员对非专业人员意见的依赖，而这些非专业人员的意见往往是不专业的，因此也是错误的。

但无论如何，这次改组进行得非常及时。它与苏联在国际舞台上的积极行动相吻合，与苏联对德国侵略行为日益坚定的对抗态度相呼应，这并非偶然。

3 月 24 日，显然是为了促使土耳其更紧密地与希腊和南斯拉夫进行军事合作，苏联政府向安卡拉保证，在土耳其受到攻击的情况下，“苏联完全理解并保持中立”[218]。几乎在此之后，克里姆林宫首次向德国发出了公开挑战，借口是贝尔格莱德发生的变化。3 月 27 日，在那里，由杜尚·西米奇将军率领的一群空军军官，决心抵抗德国人，发动了一场政变。他们将摄政王保罗亲王和前一天签署了南斯拉夫加入《三国同盟条约》议定书的总理Д.茨韦特科维奇赶下了台。八天后，新的贝尔格莱德领导层代表团抵达莫斯科，并在 4 月 5 日深夜与苏联签署了《友好互不侵犯条约》。根据该条约，双方承诺“互不进行任何攻击，并尊重苏联和南斯拉夫的独立、主权权利和领土完整”。如果一方受到攻击，另一方有

义务“对其保持友好关系”[219]。不仅如此，条约签署后，斯大林立即与大使加夫里洛维奇讨论了向南斯拉夫提供军事援助的问题。4 月 13 日，利用从柏林回国途中在莫斯科停留的日本外相松冈洋右的机会，苏联促成了《苏日中立条约》的签署[220]。这消除了苏联面临两线作战的可能性。

就这样，克里姆林宫越来越远离了作为《苏德条约》基础的解决国际问题的方式，越来越有力地展示了其新的外交政策原则，以及对抗纳粹侵略的决心。然而，令人遗憾的是，1941 年春天，所有这些努力都白费了。4 月 6 日黎明时分，德国国防军部队入侵了希腊和南斯拉夫境内。被英国抛弃、听天由命的这两个巴尔干国家几乎立即停止了抵抗。4 月 17 日，南斯拉夫签署了投降书，4 月 24 日，希腊也签署了投降书。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军队几乎还没有在战场上与敌人交锋，就被紧急疏散到了克里特岛，一个月后又被疏散到了埃及。

尽管局势发展迅速且明显恶化，但克里姆林宫再次表明了自己的新立场。4 月 12 日，维辛斯基召见了匈牙利大使克里什托菲，并告诉他：“苏联政府不能同意”“匈牙利对南斯拉夫发动战争”这一行为[221]。毫无疑问，这种不满同样（如果不是更多的话）也指向了侵略的发起者——德国。但伦敦再次没有理解或者不愿意理解莫斯科发出的信号。在那些日子里，更让伦敦担忧的是全球战略，尤其是近东地区的局势，这对大英帝国的利益构成了威胁。

4 月，隆美尔将军的非洲军团在昔兰尼加发起了成功的进攻，不久后就抵达了埃及边境。与此同时，苏伊士以东也出现了相当严重的威胁。4 月 3 日上台的亲纳粹总理拉希德·阿里指挥伊拉克军队，对驻扎在哈巴尼亚空军基地的英国军队发动了军事行动。如果拉希德·阿里取得成功，德国几乎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控制世界上最重要的产油区之一。不仅如此，仍然犹豫不决的维希法国及其在北非和近东的殖民地，还有葡萄牙、西班牙，甚至可能包括土耳其和伊朗，肯定会加入《三国同盟条约》。这将决定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

尽管如此，伦敦仍然对与莫斯科结盟的潜在可能性不屑一顾。4 月 18 日，斯塔福德·克里普斯向维辛斯基递交了一份英国外交部的备忘录，其意图和目的相当奇怪。在备忘录中，英国坦率地承认：“维护苏联的完整并非英国政府的直接利益”，不过也提到，如果德国进攻苏联，“英国政府将根据自身（此处为我所强调——Ю.Ж.）利益，努力……在苏联的斗争中给予协助”。与此同时，备忘录也明确表示，伦敦可能会放弃目前的武装对抗政策：“在英国的某些圈子里，可能会有人赞成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这一想法……”[222]。

作为唯一一个仍在独自与德国战斗的国家，英国这种模棱两可的立场迫使克里姆林宫在表面上像美国一样保持孤立主义。继续采取以往的平衡策略，其唯一目的就是尽可能地推迟参战时间。此外，苏联领导层还受到来自国防人民委员部情报管理局和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第一局的相互矛盾的信息的影响。从 2 月开始，这些信息明确表明希特勒决定在未来几个月内进攻苏联。然而，从 4 月底开始，又出现了其他消息，称德国据说放弃了使用武力，试图通过施加压力从苏联获得所需的原材料和粮食[223]。

正是这些情况导致克里姆林宫采取了一种特殊的政策，对于不了解内情的人来说，这种政策显得奇怪且缺乏连贯性。尽管如此，这一政策的基础仍然是保护国家利益，同时不承认希特勒是胜利者。例如，4 月 22 日，苏联政府就德国空军飞机多次侵犯苏联领空一事向柏林提出抗议[224]。与此同时，莫斯科在 5 月 3 日承认了拉希德·阿里政府，5 月 7 日要求比利时和挪威（在这些国家被德国占领一年后！）驻苏联大使馆的工作人员离开苏联领土，5 月 8 日中断了与南斯拉夫的关系。

表面上看，这似乎是外交政策的又一次重大转变。然而，实际上这些外交举措只是一种转移注意力的策略。它们旨在在国外营造一种印象，即克里姆林宫在评估国际形势时仍然存在不确定性，在制定政策时仍在犹豫不决。而实际上，苏联领导层已经毫不怀疑与德国的战争不可避免，而且很快就会爆发。因此，也毫不怀疑是时候完成战时内阁的组建了。

4 月 5 日政治局做出的决定，虽然三天后才作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令公布，但无疑是苏联已经做出了最终且不可逆转选择的有力证明。和往常一样，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令内容简短：解除 В.М.莫洛托夫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职务，由 И.В.斯大林接任该空缺职位[225]。这表明：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在长达十八年多的时间里一直形式上处于幕后的斯大林，终于亲自承担起了全部责任，并且正式地为苏联政府随后采取的所有行动负责。此外，一人身兼两个实际权力分支的最高职位，再次强调了这一时刻的重要性，以及从那时起纯粹的国家机构所应发挥的作用。这也再次显示出，尽管党放弃解决经济问题的趋势远未得到巩固，也并非不可逆转，但这种趋势再次占据了上风。

政治局决定的文本[226]，在长达数十年的时间里一直处于保密状态，它不仅篇幅较长，而且极其具体。其标题为《关于加强苏联中央和地方机构的工作》，直接表明了改革必然会继续深入进行。同时，它也明确了高层权力结构中的权力分配，以及对究竟谁真正掌握权力以及掌握何种权力的理解。

该决定指出：“为了全面协调苏联各苏维埃和党组织的工作，并确保它们在领导工作中的绝对统一，同时，为了在当前紧张的局势下进一步提高苏维埃机构的权威，这要求全面加强苏维埃机构在国家防御工作中的作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定：

1.任命 И.В.斯大林同志为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

2.任命 В.М.莫洛托夫同志为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并负责领导苏联的外交政策，同时保留他外交人民委员的职位。

3.鉴于斯大林同志在政治局的坚持下，仍继续担任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无法有足够时间处理中央书记处的工作，任命 А.А.日丹诺夫同志为斯大林同志在中央书记处的副手，并解除他对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的监督职责。

4.任命 А.С.舍尔巴科夫同志为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并负责领导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同时保留他联共（布）莫斯科州委和市委第一书记的职位。”

以这样的方式表述，以“紧张局势”以及“加强国防工作”的必要性来解释，结合 3 月 21 日的另外两项决定，这份决定最终让人们对新的核心领导架构的完成情况有了全面的了解。其核心是由斯大林、沃兹涅先斯基和日丹诺夫组成的“三巨头”。只有他们，也只有他们有权做出那些将决定国家及其众多人民命运的最重要决策。“三巨头”的职能也变得清晰而具体。斯大林进行总体领导，整合并协调两个权力机构。沃兹涅先斯基负责整个国民经济的状况，尤其是国防工业，他通过下属的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团开展工作。日丹诺夫领导党的机构，通过干部管理和宣传这两个主要部门来指导其工作。

同样明显的是另一点——莫洛托夫和马林科夫的地位明显下降，他们退居幕后。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甚至在名义上也不再是国家的二号人物，失去了作为领导人最亲密的战友和助手的光环。他从政府首脑的位置上退下来，未能进入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团，降为现在十五位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之一。格奥尔基·马克西米利安诺维奇在党的等级体系中的地位也发生了变化，此前他的地位与日丹诺夫相当，而现在却成了日丹诺夫的下属。相反，舍尔巴科夫和沃兹涅先斯基一样，在职务级别上迅速上升。仅仅用了两年半的时间，他就进入了核心领导层。

当然，如此巨大的变化必然会导致争夺领导权的斗争重新开始并加剧，人们试图夺回失去的“高层”位置。仅仅过了两天，瞬间加剧的竞争，甚至可能是幕后的谈判、公开的阴谋所产生的结果，迫使政治局对 3 月 21 日的决定进行修正，批准了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团的新组成人员。除了原有的成员——沃兹涅先斯基、米高扬、布尔加宁、贝利亚、卡冈诺维奇、安德烈耶夫之外，5 月 7 日，梅赫利斯以及更具代表性的莫洛托夫也被纳入其中[227]。因此，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再次成功避免了失势，而且可能避免了被彻底排除在权力机构之外。但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团的重组并未就此结束，同时它也失去了独特性和重要性。5 月 15 日，伏罗希洛夫和什维尔尼克加入其中，5 月 30 日，日丹诺夫和马林科夫也加入进来[228]。

由于成员数量如此之多——多达十二人！——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团不可避免地失去了它最初设立时的目标：对所发生的事情迅速做出反应的能力；在极端情况下，尤其是在战争爆发时，能够避免现在难以避免的拖延、失误和错误，及时做出决策。此外，战时内阁中出现了一些此前与苏联人民委员会长期以来的特定工作毫无关联的人，如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什维尔尼克、中央书记日丹诺夫和马林科夫，这也带来了不少麻烦。

毫无疑问，斯大林的新职位是几乎整个政治局成员迅速加入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团的推动因素。仅因为这一点，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团几乎自动地成为了主要的权力机构。对于那些担心失去在核心领导层中地位的人来说，它自然成为了一个吸引点，因为核心领导层的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是否拥有相应的职位。但无论如何，这种复杂的情况需要立即得到解决。并且也找到了一个解决办法。

为了恢复其最初的作用，获得所期望的、极其必要的灵活性和有效性，并且为了在其他机构之上占据一席之地，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团以一种非常独特的方式摆脱了“多余的人”。它自行决定成立了另一个管理机构。这就是由沃兹涅先斯基担任主席，成员包括米高扬、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和安德烈耶夫的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团当前事务委员会。正是这个委员会承担起了对国家整个国民经济的日常实际领导工作。然而，这样一来，它彻底打乱了所有新旧的等级关系，给苏联人民委员会及其自身的工作带来了混乱和无序。

同样的仓促和缺乏连贯性也体现在同期进行的国防委员会改组上。5 月 30 日，在没有任何解释和说明的情况下，国防委员会被改组为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团军事和海军事务委员会。其任务保持不变，但成员构成发生了变化，而这正是改组的目的所在：斯大林（主席）、沃兹涅先斯基（副主席）、伏罗希洛夫、日丹诺夫、马林科夫。也就是说，仍然保持着苏联人民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代表的固定比例。但在 6 月 9 日，他们惊慌失措，意识到这个委员会缺乏主要的实际执行者和决策者，因而缺乏专业性。于是又增加了国防人民委员铁木辛哥和库兹涅佐夫[229]。

斯大林在那段时间里唯一一次公开演讲——5 月 5 日在克里姆林宫为红军各学院毕业学员举行的招待会上的讲话，更是有力地证明了国家和领导层已进入“战斗准备状态”[230]。这是一次特殊的“就职声明”，因为这是他刚刚就任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一职后发表的讲话。

斯大林在向武装部队指挥官和年轻军官们发表讲话时，运用了惯用的修辞技巧，没有错过为《苏德条约》进行辩护的机会。

但他的辩护有些轻描淡写，因此缺乏足够的说服力。他将 1939 年德国国防军行动的所谓正义性作为有力论据，声称他们是在“摆脱《凡尔赛和约》”的口号下行动的。与此同时，他也承认当时苏联还没有做好战争准备，这更接近事实。而讲话的实质在于其他方面。在于宣布与西方邻国建立新的关系。他是这样解释这种关系的：“……现在，我们已经对军

队进行了重组，为现代战争配备了充足的装备，我们变得强大了——现在我们必须从防御转向进攻。在保卫我们国家的过程中，我们必须采取进攻性的行动。”他以此承诺，将不再与希特勒进行妥协，不再与他达成任何协议。同时，他也向与会者保证，必将战胜敌人：“德国军队在侵略、征服战争的口号下不会取得成功。”

如今，我们无法确切知道斯大林当时是真心这么认为，还是陷入了自我欺骗，被一种特殊的兴奋情绪所左右，因为他已经跨过了那条不可回头的界线。毕竟，他不可能不知道，红军在武器装备和机械化程度上与德国国防军相比仍有很大差距。原计划 1940 年生产六百辆 T-34 坦克，但实际上从生产线上下来的只有 115 辆，在随后的几个月里也只生产了大约一千辆，这显然远远不够[231]。重型 KV 坦克的生产情况也不容乐观——一年下来总共只生产了六百多辆，拉格-3 战斗机、伊尔-2 强击机、叶尔-2 轰炸机、佩-2 轰炸机、佩-8（TB-7）轰炸机以及冲锋枪的产量也都远远低于军队的最低需求……毫无疑问，斯大林知道这一切，但同时他又不愿意面对这些现实。因此，他只能寄希望于一切都会向好的方向发展。希望命运能给他足够的时间来完成重新武装的工作。

这种自我安慰和乐观情绪并非斯大林所独有。只有坚信在近期内不会发生任何严重和意外的事情，才会让日丹诺夫在 6 月 10 日去索契休了一个半月的假……[232]

在听到关于赫斯飞往英国这一轰动且神秘的消息后，核心领导层的乐观情绪迅速消退。有消息称，希特勒的副手于 5 月 10 日晚在格拉斯哥附近跳伞降落，正在与英国人进行秘密谈判。在莫斯科，人们再次对伦敦的行动产生了警惕和怀疑。人们并非毫无根据地担心丘吉尔可能会与希特勒达成单独协议，这不仅会加速战争的爆发，还会让苏联独自面对一个极其强大的敌人。毫无疑问，正是出于这个原因，由于核心领导层内部意见分歧，导致了一个有些姗姗来迟的决定，即认为有必要进行新的试探，而 6 月 14 日塔斯社发布的著名消息就是这种试探的体现。

这条震惊了所有人的消息并非偶然地同时指向德国和英国。它首先应该明确英国政府的真实意图——英国政府是否打算故意在这个时候让德国与苏联发生冲突，然后通过这样的交易退出战争。在一周的时间里，无论是柏林还是伦敦都没有给出回应。人们已经不再怀疑，战争将在最近几天内爆发。

6 月 21 日晚上七点零五分，核心领导层——И．В．斯大林、Н．А．沃兹涅先斯基、В．М．莫洛托夫、К．Е．伏罗希洛夫、Л．П．贝利亚，以及 Г．М．马林科夫、С．К．铁木辛哥和红军总政治宣传部副部长 Ф．Ф．库兹涅佐夫也参加了会议[233]。由于未能对极其紧张的局势达成一致、明确的评估，他们决定再次采用老办法——进行外交试探。他们委托莫洛托夫立即与舒伦堡会面，试图从他那里得到哪怕一点明确的信息。

晚上九点半开始的这位人民委员与大使的简短谈话，证实了人们最糟糕的担忧。莫洛托夫回到克里姆林宫后只能报告一件事。当他询问“当前苏德关系现状的原因是什么”时，舒伦堡没有给出答案，只是借口说他没有从柏林得到相关信息。在此之后，人们不得不承认，已经做出了选择，现在只能依靠军队了。

就在三天前，考虑到可能发生的事态发展，政治局开始秘密地为此做准备。决定将波罗的海特别军区、白俄罗斯特别军区和基辅特别军区，即德国国防军最有可能发动主要攻击的地区，改组为西北方面军、西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现在，在等待莫洛托夫回来的时候，他们在晚上八点五十分召见了朱可夫和布琼尼，在与他们商议后，认为有必要再组建一个方面军，即南方方面军——针对德国进攻的第二个潜在方向，此外还需要建立第二条防线。他们任命 И．В．秋列涅夫指挥该方面军，军事委员会成员包括 А．И．扎波罗热茨、Л．З．梅赫利斯和 С．М．布琼尼，以及军事委员会成员 Г．М．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回来后，他们采取了

最极端的措施，这是唯一符合这种一触即发局势的措施。他们命令铁木辛哥和朱可夫下达命令，让边境军区的所有部队和编队进入全面战斗准备状态。

午夜时分，这份文件——“第 1 号指令”——准备就绪，并通过总参谋部的通讯渠道发出。指令内容如下：

“1.在 1941 年 6 月 22 日至 23 日期间，德军有可能在列宁格勒军区、波罗的海沿岸特别军区、西部特别军区、基辅特别军区、敖德萨军区的防线上发动突然袭击。袭击可能会以挑衅行动为开端。2.我军的任务是不被任何可能引发重大复杂情况的挑衅行动所激怒……保持战斗准备状态，迎接德军或其盟友可能的突然袭击。3.我命令：ａ)在 1941 年 6 月 22 日夜间，秘密占领国家边境设防地区的火力点；б)在黎明前……将所有飞机分散到野战机场……в)使所有部队进入战斗准备状态……г)未经特别命令，不得采取任何其他行动。铁木辛哥。朱可夫”[234]。

至此，已经做了一切可能做的事情。接下来的发展只取决于总参谋部为武装部队做好战争准备的程度，而这也是总参谋部唯一的职责，取决于指挥人员的专业素养和能力。总之，只取决于军队，取决于军队的训练水平和作战能力。但军队让人大失所望。它无法像海军那样执行收到的命令，无法利用剩下的时间。尽管收到了明确的预警，军队还是被敌人打了个措手不及。

6 月 22 日凌晨四点，随着黎明的到来，在苏联西部边境的整个战线上，德国国防军开始入侵。与此同时，舒伦堡第二次在夜间与莫洛托夫会面，但这次是他主动要求的，他宣读了德国政府关于战争开始的声明。五点四十五分，核心领导层召开了当天的第二次会议。

莫洛托夫、贝利亚、梅赫利斯、铁木辛哥和朱可夫最先来到克里姆林宫斯大林的办公室。由于他们甚至没有关于前线局势的确切信息，更不用说详尽的信息了，他们只能做唯一能做的事情。他们商定了下一份指令，即第 2 号指令的内容，这是最符合当时情况的：“部队应全力以赴，以各种手段向敌军发起进攻，并在敌军侵犯苏联边境的地区将其歼灭。在接到特别命令之前，地面部队不得越过边境。”一个半小时后，随着马林科夫、米高扬、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和维辛斯基的到来，按照最高军事委员会的规定，由马林科夫签署了这份指令，并紧急发送给了西部各军区的指挥官[235]。随后，他们开始处理另一个同样重要的问题——由谁以及如何向苏联民众宣布战争的消息。

斯大林坚决拒绝发表讲话，因此莫洛托夫承担起了这项沉重而又责任重大的任务[236]。就在会议现场，在准备讲话文本时，他最初受到了内心深处对旧怨的隐秘情感的影响。他试图只做他认为作为外交人民委员的直接职责范围内的事情。只是后来，很可能是在其他核心领导层成员的坚持下，他才在讲话中加入了第一句话：“苏联政府及其领导人斯大林同志委托我发表以下声明”，以及最后五个简短的段落，这些段落完全是宣传性质的，旨在激发人们的情感——从“这场战争……”到最后一句，这句话立刻变得非常流行，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号召的口号：“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敌人必将被打败。胜利必将属于我们。”[237]。

当莫洛托夫从广播委员会回来（他在那里进行了现场直播讲话）后，会议继续进行。会议批准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指令《关于动员适龄公民服兵役……》《关于在苏联部分地区宣布战时状态》《关于战时状态》《关于批准军事法庭条例……》。当天下午两点，斯大林召集了一些军事指挥官——铁木辛哥、库兹涅佐夫、朱可夫、沙波什尼科夫、库利克、瓦图京。他们总结了收到的关于战斗进展的信息，准备了第三份也是最后一份指令：“在从波罗的海到与匈牙利国界的战线上，我允许越过国界并采取行动，不必考虑国界……铁木辛哥、朱可夫、马林科夫”。

在战争的第一天，苏联人民委员会的实际领导人沃兹涅先斯基，以及他的副手布尔加宁和安德烈耶夫没有参加核心领导层的会议。

第九章

6 月 22 日当天，一个月前在权力结构重组时所犯的原则性错误，不仅变得极为明显，而且因其不可避免的后果而极其危险。出于极端情况而设立的“三巨头”和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团，由于各种原因，显然无法正常运转。他们不仅失去了主动性，而且恰恰在国家命运几乎完全取决于他们所做决策的时刻，毫无作为。因此，在如此关键的时刻，为了保持对局势施加影响的可能性，不至于完全失去对局势的掌控（这将带来灾难性后果），政治局不得不紧急成立另一个中央机构——最高统帅部大本营。试图通过它重新掌控局势，将与前线作战行动以及为武装部队提供一切必要物资相关的决策统一起来。

最高统帅部大本营的高层成员包括铁木辛哥（主席）、朱可夫、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布琼尼、库兹涅佐夫——实际上，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最合理地取代了之前的最高军事委员会成员构成。当然，有一个非常重大的变化。在其中代表党的不再是日丹诺夫和马林科夫，而是斯大林和莫洛托夫。而由“常任顾问”组成的第二层级，旨在履行国防委员会的职能——充当最高统帅部与政府之间的中介。正因如此，它既包括军事指挥官，如沙波什尼科夫、库利克、梅列茨科夫、日加列夫、沃罗诺夫、瓦图京，也几乎囊括了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团的全体成员，如米高扬、卡冈诺维奇、贝利亚、沃兹涅先斯基、日丹诺夫、马林科夫、梅赫利斯[238]。

作为最高统帅部大本营的一种特殊补充，6 月 24 日，也就是一天之后，成立了另一个权力机构——疏散委员会，它被赋予了具体的任务范围。卡冈诺维奇被任命为该委员会主席，柯西金和什维尔尼克为副主席，成员包括：国防部副部长沙波什尼科夫、内务部副部长克鲁格洛夫、列宁格勒市执行委员会主席波波夫、交通部副部长杜布罗温以及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基尔皮奇尼科夫[239]。

在如此迅速地做出这些重要且十分必要的决定时，核心领导层唯独没有做一件事。没有确定所有现存权力机构（新旧机构，包括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团、最高统帅部大本营、疏散委员会）之间的相互关系和隶属关系。没有根据职能和任务责任对它们进行严格划分。显然，他们寄希望于，作为政治局的核心领导层本身，将成为所需的、稳固的连接纽带。通过他们在各个机构中的亲自参与，将所有人团结起来。因此，他们不仅保留了决策权，而且继续以政治局或苏联人民委员会及联共（布）中央的名义做出那些似乎已属于他们所创建的紧急机构职责范围内的决策，实际上是在重复和取代这些机构的工作。

尽管最高统帅部大本营有一批常任顾问，他们也是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团的成员，但核心领导层似乎并不信任他们，继续插手国防工业事务，比如：实施弹药动员计划，生产卡车、履带式车辆、火炮牵引车、KV、T-34、T-50 坦克、坦克装甲和发动机。在疏散委员会成立后，还负责人员运输和安置、贵重物品的运输、从莫斯科运出贵重金属和宝石、转移军械库的钻石基金、将航空工业人民委员部的工厂从列宁格勒和莫斯科向东转移到新的基地、在乌拉尔和西伯利亚建立新的坦克工业基地，以及将人民委员部和总局从莫斯科转移到偏远地区等事务[240]。

与此同时，核心领导层在不知不觉中，实际上解散了最高统帅部大本营的军事核心部分。他们拼命试图挽救前线的局势，因为德军在多个方向突破了防线，阻止红军混乱无序的撤退，为此做出了一系列堪称自杀式的决定。6 月 22 日晚，派格·康·朱可夫前往西南方面军，两天后，派克利缅特·叶夫列莫维奇·伏罗希洛夫、格里戈里·伊万诺维奇·库利克和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沙波什尼科夫前往西方方面军，而在 6 月 24 日，最糟糕的是，批准逮捕了康斯坦丁·亚历山德罗维奇·梅列茨科夫。当朱可夫返回莫斯科后，又立即派谢

苗·康斯坦丁诺维奇·铁木辛哥前往西方方面军，尼古拉·费多罗维奇·瓦图京前往西北方面军。

在这之后，最高统帅部大本营陷入瘫痪，仅在名义上存在。留在首都的总参谋长格·康·朱可夫、空军司令帕·费·日加列夫和国土防空军司令尼·尼·沃罗诺夫，尽管有心，但根本无法对国防委员会的工作以及整个现役军队的行动进行应有的指挥。

“三巨头”成员、党中央第二书记日丹诺夫的行为也同样前后不一。他公然无视作为国家三位最高领导人之一的职责，6 月 24 日，在莫斯科短暂停留的几个小时里，坚持认为对他来说最重要的是在列宁格勒的工作，而当时列宁格勒这座城市还没有直接面临危险。

只有少数人能够保持冷静和克制，莫洛托夫就是其中之一。他坚持不懈地尽一切可能为国家寻找急需的盟友。事实上，有两个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帮了他的忙。首先，苏联此前对德国的政策使全世界都相信：苏联成为了无端侵略的受害者。此外，幸运的是，之前对英国的怀疑并未得到证实。

6 月 22 日上午，温斯顿·丘吉尔通过广播发表讲话，让人们坚信：苏联在其斗争中不会孤立无援。这位英国首相表示：“我们将尽我们所能向俄罗斯和俄罗斯人民提供一切帮助。我们将向全世界所有的朋友和盟友发出呼吁，要求他们坚持同样的路线，并像我们一样坚定、毫不退缩地将其贯彻到底……威胁俄罗斯的危险，同样也是威胁我们和美国的危险，正如每一个为自己的家园而战的俄罗斯人的事业，就是全世界自由人民和自由民族的事业……”[241]。

丘吉尔对迅速建立广泛的反希特勒联盟的信心是完全有根据的。几乎就在第二天，美国代理国务卿萨姆纳·韦尔斯将对苏联的进攻视为“背信弃义”的行为，同时承认，“任何反对希特勒主义的斗争”都将有助于美国的安全。6 月 24 日，美国总统罗斯福表示准备向苏联提供“一切可能的帮助”。尽管他表示目前还无法确定以何种形式提供帮助，但他的政府随即宣布了一些非常重要的决定。宣布发放通用许可证，允许使用 1940 年 1 月因苏芬战争而被冻结的苏联存款，同时还宣布，对苏联将不适用《中立法案》中规定的限制措施[242]。

与此同时，在尚未签署条约之前，与英国的联盟关系就已经开始呈现出具体的态势。6 月 27 日，斯塔福德·克里普斯返回莫斯科，但并非独自一人，而是由拥有所有必要权力的军事和经济代表团陪同，代表团分别由中将米·麦克法兰和莱·卡德伯里率领。莫洛托夫与他们进行了三天紧张的谈判，明确了大规模援助的规模、细节、期限，包括武器、技术、战略原材料的援助，以及交付这些物资的方式。就在同一天，即 6 月 29 日，在莫洛托夫与美国大使劳·斯坦哈特会面后，与罗斯福政府也开始了类似内容的磋商。

然而，为了使所有预期的物资供应真正能够对红军和国防工业有所帮助，首先需要仔细考虑国家真正需要的是什么，不仅是当前的需求，还有近期的需求。而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迅速整顿权力结构和管理机构。

毫无疑问，人们不再怀疑，这个国家几乎在一周内就濒临全面失败，部分原因正是由于现有的管理体系。这个体系复杂多样、层级繁多、令人困惑不已，同时又过于僵化，束缚了执行者的任何主动性。此外，斯大林、沃兹涅先斯基和日丹诺夫明显缺乏预见事件的能力，无法提前做出正确的决策，这也使局势更加恶化。不仅如此，他们现在明显且固执地试图完全逃避做出任何决策，将决策责任推给其他人，而这正是创建各种紧急机构的原因，这些机构实际上只是扰乱了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使原本就混乱的局面更加混乱。

莫洛托夫在担任政府首脑的十年间积累的经验，以及他作为政治家无可争议的才能，为他指明了唯一可行的出路。必须紧急创建一个全新的中央权力机构，无论在人员构成还是任务方面都与以往截然不同。这个机构不仅要像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团成立之前那样直接管理执行机构，还要将国家权力和党的权力这两个实际权力分支都置于自己的掌控之下。并且要完全正式、公开地承担起国家、人民和建设的命运的全部责任。

这个构想不仅看起来像是一场政变，实际上也确实如此。因为这意味着要将沃兹涅先斯基、日丹诺夫，甚至斯大林从权力中排除，或者极大地限制他们的权力。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作为在克里姆林宫幕后阴谋中经验丰富的人，深知这样做的危险性，他知道自己单枪匹马无法完成此事。因此，他决定必须确保得到那些拥有实际权力的人的全力和无条件支持，这些人要认同他对局势的评估，同意他提出的行动方案。当然，也会与他共同分享权力和责任。

6 月 30 日白天，莫洛托夫把负责国家安全的贝利亚和在日丹诺夫离开后实际上再次掌控党的机关的马林科夫，叫到了他在克里姆林宫苏联人民委员会大楼的办公室。他向他们阐述了自己的想法，并得到了他们的充分理解和支持[243]。在形式方面达成一致意见很容易。对于新机构的名称，他们没有过多思考，采用了一个旧名称，意思相近——国防委员会。只是为了强调它不仅完全独立，而且具有绝对的至高无上性，加上了“国家”这个词。其成立的理由——“为了迅速动员苏联人民的所有力量以抵抗敌人”，以及职能——“集中国家的全部权力”“要求所有的党、苏维埃、经济和军事机构无条件执行国防委员会的决定和指示”，也没有引起争议[244]。

他们同样简单、合理地确定了国防委员会的成员构成。当然，他们把自己都纳入其中，但也没有忘记斯大林，因为如果不提及斯大林，这一行动确实会带有明显的公开政变的色彩。这会引发更大的混乱，加剧动荡，必然会导致社会分裂，从而无法实现其目标。但为了不让领袖感到受辱、孤立无援，他们还加入了伏罗希洛夫，他们清楚地知道伏罗希洛夫不会发挥任何独立作用，只会成为委员会的一个名义成员。

乍一看，这个决定既没有表现出权力欲，也没有虚荣的成分。毫无疑问，莫洛托夫、贝利亚和马林科夫是受其他因素的驱使。他们怀着绝望的决心，只有一个目标——拯救国家。甚至可以说是有些不顾一切。核心领导层的成员们理解并接受了这一点，莫洛托夫把他们召集起来，向他们介绍了这个方案。然后，他们一起前往沃伦斯科耶，去斯大林的“近郊别墅”。

斯大林没有反对，也没有提出异议。他同意了所有内容，因为在新的权力架构下，他没有失去任何东西——既没有失去他习惯的最高领导人的角色，也没有失去威望，因为没有人打算公开国防委员会成立的真相。斯大林只是稍微修改了一下文本。在最后一点中添加了“所有公民”几个字，把之前隐含的“苏维埃”一词所代表的“经济”一词，改为了“共青团”。这最后一点应该既强调了共青团的某种独立性，也突出了构成应征入伍主要群体的年轻人的重要性[245]。

但是，他们没有以书面形式明确、确定地规定国防委员会每个成员的权力，只是口头约定：纯粹的军事、作战问题将由斯大林负责处理。而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和贝利亚，除了履行他们的直接职责外，还将承担动员工作、组建新部队、将部队送上前线的任务，并立即使国家的整个经济服从于一个目标——国防需求。为军队和海军最大限度地提供武器、弹药、食品和装备[246]。

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和贝利亚首先利用了他们获得的权力。他们首先做了他们认为最重要、最根本的事情。第二天，即 7 月 1 日，通过苏联人民委员会颁布了《关于在战时扩大苏

联人民委员权力的决议》。赋予了各部门领导人相当大的自主权，使他们能够自行解决许多以前属于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团职责范围内的问题。他们可以支配下属人民委员部的物质资源，比如“在各个企业和建筑工地之间分配这些资源”，并且这些企业和工地的负责人有权“从自己的资源中向其他企业提供必要的材料”。在一定程度上，在财务方面也有了权力，比如“重新分配超限额建设项目的资本投资”“预留……批准的工资基金的 5%”“允许从下属经济机构和企业的结算账户中注销款项”“为恢复因军事行动而受损的企业和住房进行支出”“注销资产负债表上的亏损”。最后，人民委员们还拥有“允许部分偏离批准的项目和预算”“允许正在建设中的企业及其部分设施投入使用”的权利[247]。

7 月 18 日，这项重要决议的效力扩大到了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和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人民委员，这一决议打破了以前严格的经济管理体系[248]。

然后，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和贝利亚向所有人清楚地展示了他们权力的真正规模。他们任命了核心领导层的其他成员担任职务，这是一项前所未有的举措，明确强调了这些成员只是受国防委员会授权的从属地位。负责军事运输的，先是卡冈诺维奇，后来是安德烈耶夫。负责组建新部队的是伏罗希洛夫，他在形式上是国防委员会的成员。负责武器和弹药的是沃兹涅先斯基。负责物资供应的是米高扬。并且任命什维尔尼克为新的疏散委员会主席[249]。

还有三项举措进一步凸显了这些任命的严肃性。7 月 3 日，解散了不久前在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团下成立的为军队提供物资的委员会（主席米高扬）和负责武器和弹药的委员会（主席布尔加宁）。7 月 4 日，委托沃兹涅先斯基、萨布罗夫、别尔乌辛，在各国防工业人民委员的参与下，制定“保障国家国防的军事经济计划，考虑利用伏尔加河流域、西西伯利亚和乌拉尔地区现有的资源和企业，以及在疏散过程中运往这些地区的资源和企业”。7 月 11 日，批准了新的工业企业疏散计划[250]。

7 月开始组建的国防委员会自己的非官方管理结构，也是为了实现对工业的直接控制这一目标。这个结构逐渐由委员会派往各州和地区、各个企业和行业的代表组成。

……国防委员会的成立本身，以及在核心领导层中终于出现了一些勇敢的人，他们在如此关键的时刻不畏惧分担最高但同时也很沉重的责任，这无疑让斯大林松了一口气。最终使他从消沉中振作起来，让他重新获得了自信，恢复了精神的坚定。让领袖有勇气去做他在战争第一天一直未能下定决心去做的事情。

7 月 3 日，斯大林通过广播向全国公民发表讲话。他鼓起勇气承认了前线的失败。承认在近期内不会有重大的变化，撤退还将继续。因此，他号召人民在跟随红军向东撤退时，要留下一片荒芜的土地。赶走火车头、车厢和牲畜，运走粮食和贵重物品。在敌人占领的地区创建游击队。他还谈到了一个大家都知道且无需多言的事情，即需要加强后方建设，将所有工作都调整到战时状态，并且军队和海军要“保卫苏联的每一寸土地”。

怀着负罪感，斯大林没有忘记回到那个显然最让他困扰的问题——苏德条约的问题。他再次像 5 月 5 日那样，试图为该条约进行辩护。但显然与他一开始对前线局势的清醒评估（在十天内失去了立陶宛的全部领土、拉脱维亚的大部分地区、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西部地区）相矛盾的是，他声称：由于该条约，苏联获得了“准备自身力量进行抵抗的机会”。而所有的失败，他以与基本逻辑完全矛盾的理由解释为，战争“在对德国军队有利的条件下开始”。

在讲话的结尾，斯大林忍不住提到了国防委员会，这是他一生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提到它，包括它的任务和目标。他随即号召全国人民“团结在列宁-斯大林的党周围，团结在

苏联政府周围”[251]。从这些话中可以看出，他对国防委员会并不是很信任，甚至有些害怕它。

一周后，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开始了对军队领导机构的又一次重组。他将最高统帅部大本营改组为最高统帅部，并对其成员构成做了一些改变。现在，作为国防委员会主席，他亲自领导最高统帅部，在其中用沙波什尼科夫取代了库兹涅佐夫。他重建了总政治部，任命梅赫利斯为主任。他调整了作战战略军队集群的体系。通过国防委员会发布命令，用三个方向（西北方向、西方方向和西南方向）取代了现有的四个方面军（北方方面军、西方方面军、西南方面军和南方方面军）。同时，他还更换了现役军队的指挥人员。他分别任命了他一直信任并完全依赖的几位元帅担任各方向的总司令，即伏罗希洛夫、铁木辛哥、布琼尼。并且任命日丹诺夫、布尔加宁和（从 8 月 5 日起）赫鲁晓夫为军事委员会成员。

这样的人事变动带来了必然的、预料之中的结果。在最高统帅部中，和两周前一样，只剩下了两位专业军人——朱可夫和沙波什尼科夫。但现在这样的决定不再是绝望的举措，而是经过冷静思考的结果。这是为实现一个对斯大林本人来说极为困难但又极其重要的计划所做的必要准备——无论如何要夺回以前的权力，完全恢复他不可动摇的权威。向苏联人民和全世界证明：他重新获得了往日的精力和意志。但这一切必须在国防委员会所限定的范围内进行，并且要尽快实现他的计划。

7 月 19 日，斯大林没有做任何解释就担任了国防人民委员的职务，几天之内几乎完全更新了他的副手人选。现在他的副手是谢苗·康斯坦丁诺维奇·铁木辛哥、格奥尔基·康斯坦丁诺维奇·朱可夫、列夫·扎哈罗维奇·梅赫利斯、叶夫根尼·阿列克谢耶维奇·什捷缅科、雅科夫·尼古拉耶维奇·费多连科、阿列克谢·弗拉基米罗维奇·赫鲁廖夫、帕维尔·费多罗维奇·日加列夫、伊万·季莫费耶维奇·佩列先金。而沙波什尼科夫则被派去担任西方方向的参谋长。

7 月 29 日，他完成了人事调动。沙波什尼科夫被调回莫斯科，再次被任命为总参谋长，而朱可夫则被委派指挥维亚济马—勒热夫防线的后备部队。

8 月 8 日，斯大林宣布自己为最高统帅。从那一刻起，最高统帅部失去了它最初的作用，实际上变成了一个特殊的议事机构。

斯大林承担起了军队和海军后续行动的全部责任，起初他不得不依靠国内战争时期相当有限的战斗经验——对察里津的防御、对利沃夫的进攻。因此，他身边围绕着他熟悉的军长们——布琼尼、伏罗希洛夫、赫鲁廖夫、什捷缅科。他将不太熟悉的军种——空军、装甲兵、通信兵的指挥权交给了其他副手。由于不太信任初级指挥员的能力和训练水平，7 月 16 日，他提前通过苏联国防人民委员部的命令恢复了军事委员学校，并让连、营指挥官，炮兵连和炮兵师指挥官始终处于他们的监督之下。

然而，这些措施也没有使前线的局势有所好转。军队仍在继续撤退。战斗已经在列宁格勒城下、斯摩棱斯克、扎波罗热等地展开……

贝利亚也没有忽视行政方面的决策。不过，规模要小得多，而且最重要的是，目的不同，更具实用性。他试图尽可能地从人民委员的工作中解脱出来，以便有更多的时间来解决纯粹的经济问题，首先是增加坦克和飞机的生产。

7 月 13 日，国防委员会通过决议，任命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阿尔捷米耶夫中将，即捷尔任斯基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师师长，为莫斯科军区部队指挥官[252]。这样就考虑到了一种非常可能的情况——德军突破防线逼近首都，这可能会引发恐慌、混乱和失去控制。7 月 17 日，他将苏联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第三局（反间谍局）改组为特别部门管理局，以

“打击红军部队中的间谍活动和叛国行为，并消除前线附近地区的逃兵现象”[253]。他任命维克托·谢苗诺维奇·阿巴库莫夫为该局局长，并任命所罗门·罗曼诺维奇·米尔施泰因为他的第一副手，米尔施泰因是叶若夫时期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领导人之一，已经在林业工业副人民委员的职位上任职了一年半[254]。7 月 30 日，贝利亚促成了他所管辖的内务人民委员部和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合并为一个统一的内务人民委员部。同时，他简化了其结构，减少了管理部门的数量，恢复了运输和经济等部门。但保留了原有的领导班子，只是增加了阿纳托利·帕夫洛维奇·扎韦尼亚金，他被委托负责处理与使用强制劳动相关的所有问题[255]。同时，他开始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防国家所有高级机构被迫迁往古比雪夫和乌法。7 月 20 日，他已经将两千名工作人员派往那里[256]。

与国防委员会的其他成员不同，莫洛托夫不得不将所有精力主要集中在他作为外交人民委员的直接职责上。集中精力解决一个至关重要的紧迫问题——使苏联摆脱近两年来所处的孤立状态，与所有与德国作战的国家建立最紧密、最牢固的关系。

第一个无可争议的成功是 7 月 12 日在莫斯科与英国签署的协议。该协议的发起者是莫洛托夫和斯大林，他们在 7 月 8 日与克里普斯会面时提出了签署此类声明的想法[257]。这份对两国关系具有转折意义的文件出现的真正动机是，希望彻底消除以前的相互猜疑，消除对新伙伴不会战斗到胜利的担忧。前面已经提到了苏联方面的担忧。伦敦方面也长期存在同样的不信任。丘吉尔甚至在 7 月 10 日给海军大臣 A.亚历山大写信时，几乎是这样说的：“如果俄国人能够坚持下去，并且至少在冬天到来之前继续进行军事行动，这将给我们带来不可估量的优势。俄罗斯提前签署的和平协议，将使我国众多民众感到极其失望。”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这份为反希特勒联盟奠定基石的协议只包含了两项简洁的义务：“在当前对希特勒德国的战争中，相互提供各种帮助和支持”，以及更重要的——“未经双方同意，不得进行谈判，不得签署停战协定或和平条约”[259]。

随后，在 7 月 18 日至 8 月 7 日期间，在驻英国大使伊万·米哈伊洛维奇·迈斯基的积极斡旋下，苏联恢复了与成为纳粹侵略受害者的国家（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波兰、希腊、挪威和比利时）政府的外交关系，同时也恢复了国家的威望。几乎与此同时，苏联成功与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签署了重要协议，内容是在苏联境内的两国公民中组建军队，莫斯科负责这些军队的装备和供应。事实上，在这过程中，苏联不得不对波兰方面做出一个非常重大的让步。官方宣布放弃苏德条约的秘密议定书：“苏联政府承认 1939 年关于波兰领土变更的苏德条约已经失效”[260]。

外交人民委员部为确保苏联南部边境安全所采取的行动也同样重要。在通过外交渠道多次发出警告（6 月 26 日仅由莫斯科发出，7 月 19 日和 8 月 16 日由莫斯科和伦敦共同发出），要求德黑兰政府“制止德国人的敌对活动”之后，采取了军事行动。根据之前达成的协议，8 月 25 日，苏联和英国军队进入伊朗领土，仅用两天时间就占领了商定的区域。当前的战略形势使土耳其从此无法再考虑与德国结盟的可能性，将外高加索变成了后方地区，为作为向苏联运送英国和美国援助物资通道的跨伊朗铁路的顺利运行创造了条件。

同样在 8 月，通过国防委员会做出了一项同样重要的决定——通过中国甘肃省的兰州，恢复向中华民国提供飞机、航空发动机、备用零件、弹药和其他物资的军事援助[261]。但由于此类行动可能会被日本视为违反《互不侵犯条约》，所以物资供应必须秘密进行。

莫洛托夫成功解决的第二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是，发展与英国和美国的全方位关系，与它们达成援助协议。苏联在企业疏散到深远后方的时期，以及在国防工业（首先是坦克、航空和弹药生产）能力大幅提升之前，迫切需要这种援助。

这方面的开端是6月底访问莫斯科的英国经济代表团（卡德伯里率领）。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其实际成果仅仅具有象征意义：7月，“阿格斯”号船载着军用物资抵达阿尔汉格尔斯克，8月初，两个飞行中队（40架“飓风”战斗机）抵达[262]。直到8月16日米高扬和克里普斯在莫斯科签署了苏英贸易、1000万英镑信贷和结算协议后，事情才取得了进展。9月6日，伦敦做出了对苏联非常重要的决定，即根据租借法案提供物资，这进一步补充了该协议的内容。

第一个英国护航队，代号为“苦行僧”，由七艘船组成，载有飞机、坦克、橡胶和锡，于8月21日从斯卡帕湾海军基地出发，十天后抵达阿尔汉格尔斯克[263]。不久之后，南部的伊朗交通线也开始运作。

要与美国达成类似的协议并获得军事援助则困难得多。尽管韦尔斯和罗斯福做出了坚定的支持承诺，但这个问题的审议却拖延了三个月。事实上，在7月30日开始的哈里·霍普金斯（总统物资供应问题首席特使）对莫斯科的三天访问之后，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缓解。在与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会谈中，他既谈到了可能向苏联提供的物资的规模和数量，也谈到了世界政治局势，特别是日本近期可能采取的行动。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潜在威胁似乎促使了会谈的结果，即把1937年签署的旧苏美贸易协定延长一年。

莫洛托夫对所取得的成果并不满意，他继续坚持不懈地争取其他更实质性的东西。他利用一切可能的外交手段，朝着既定目标努力：获得一笔5亿美元、年利率3%的长期贷款，并在这笔资金的范围内购买武器和技术。然而，美国的军事工业计划当时只打算向英国和中国提供援助，这使得他无法实现自己的愿望。

直到9月24日才出现了转机。当天，苏联与英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比利时、荷兰、卢森堡、南斯拉夫、希腊、挪威和自由法国共同参加了在伦敦举行的同盟国间会议。此外，苏联宣布加入《大西洋宪章》。“苏联政府，”驻伦敦盟国政府的大使A.E.博戈莫洛夫宣读的声明中指出，“表示同意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英国首相丘吉尔声明的主要原则，这些原则在当前国际形势下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264]。

五天后，即9月29日，在莫斯科又召开了一次会议，但这次只有三个国家参加，在公报中首次将这三个国家称为“三大强国”。美国总统特别代表哈里曼、英国飞机生产大臣比弗布鲁克勋爵和莫洛托夫，作为全权代表团团长，最终彻底商定了向苏联提供首要援助的所有问题。他们在秘密议定书中确定了交付的期限和数量：从10月10日起，每月提供400架飞机、500辆坦克；在九个月内提供152门高射炮、756门反坦克炮、5000辆“威利”吉普车和卡车；原材料——铝、锡、镍、橡胶；金属加工机床、各种工业设备；小麦、糖、可可豆、军用装备；以及许多其他同样必要的物资，也在同一时期提供[265]。

为了确保这些战略物资的快速交付，除了现有的运输通道（通过海路运往阿尔汉格尔斯克和符拉迪沃斯托克，通过陆路经过伊朗）之外，苏联领导层还不得不创建另一条运输通道——空中通道“东方航线”。这条航线很快将阿拉斯加经韦尔恩、阿纳德尔和雅库茨克与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连接起来[266]。

此时，新的领导人认为他们也完成了权力结构的重组，这一重组改变了核心领导层的权力格局。7月10日，将布尔加宁从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团中调出，任命他为西方方面军军事委员会成员。8月20日，决定了沃兹涅先斯基的命运。当天国防委员会通过的决议解除了他“在苏联人民委员会的所有当前职务”。将他以前的职责转交给了米高扬、马雷舍夫和别尔乌辛。现在，这位昔日的“三巨头”成员只被赋予了一个相当低微的角色——负责弹药生产工业计划的执行[267]，也就是说，他只是一个人民委员部的监管者。

米高扬出乎意料地取代沃兹涅先斯基，担任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团当前事务委员会主席一职，这很可能是因为，在政治局的少数元老中，只有他在战争初期作为组织者和领导者都表现出色。无论是在国防委员会负责物资供应（包括服装、食品和燃料）的专员职位上，还是在疏散委员会中，他都表现出色。唯一让人不能完全满意的是，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的新职位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以前的重要性。不过，就像整个苏联人民委员会一样，自 6 月 30 日起，其职能也大幅受限。它完全服从于国防委员会赋予它的任务，而且仅限于动员有劳动能力的人口代替应征入伍者参与农业、地方工业、贸易、教育等工作……

贝利亚和马林科夫不得不认真放弃他们熟悉的、习惯的工作，完全投入到他们完全陌生的、专业性很强的国防工业问题中。他们要深入了解各个行业、各个企业以及每种产品的所有细节。首先要处理最紧迫、刻不容缓的问题——企业疏散、在新地点启动工厂以及立即恢复并不断增加生产。

例如，马林科夫从 9 月 2 日起负责“所有类型坦克的生产”[268]，他首先从改革管理结构入手。他像对待航空工业一样，将坦克工业分离出来，成立了一个独立的部门。他将以前分散、联系不紧密的装甲、发动机和坦克本身的生产集中起来，使其服从于共同的、协调一致的任务和计划。9 月 11 日，通过政治局决议，他巩固了这一局面，决定成立第五个国防人民委员部，由 V.A.马雷舍夫领导，副手为 I.I.诺森科[269]和 A.I.叶夫列莫夫。在重型机械制造人民委员部的两个空缺的副部长职位上，他任命了 S.A.阿科波夫和卡普伦，同时暂时撤销了机床制造人民委员部。

在 8 月 29 日国防委员会成员首次划分职责时，贝利亚被委托监督“所有类型武器生产计划的执行和超额完成情况”[270]。但几乎立即就发现，对一个人来说，这样的职责范围是不可能完成的，于是限制他主要监督飞机的生产。

航空工业多年来形成的特殊性和复杂性，迫使贝利亚采取了一种特殊的方式。他首先将紧急准备好的产品生产计划提交国防委员会审议并批准，该计划考虑到了前线不可避免的损失规模。他力求在当年年底前大幅提高产量：拉格-3 战斗机的产量提高七倍，伊尔-2 强击机的产量提高六倍，雅克-1 战斗机和佩-2 俯冲轰炸机的产量提高三倍，这使得每月平均可以向前线运送 1750 架作战飞机。

同时，贝利亚认识到，不仅飞机的数量很重要，飞机的类型、构造以及在空中对抗德国空军的能力也很重要，于是他做出了一个当时必然且甚至可以说是习惯的决定。9 月 23 日，他获得了政治局的批准，完全恢复了 A.N.图波列夫及其 14 名员工的名誉（撤销了对他们的定罪，恢复了所有国家荣誉），此前不久，图波列夫及其团队设计的图-2 轰炸机及其改型图-6、图-8、图-10 刚刚投入批量生产[271]。

同样在 9 月，贝利亚和马林科夫不得不抽出时间来解决另一个问题，当然，这个问题也是他们从一开始就承担下来的。那就是加快组建红军新部队。他们说服斯大林立即用更果断甚至强硬的什捷缅科取代显然无法胜任组建国防委员会主要职责的库利克，担任组建局局长[272]。四天后，在顺利解决了人事问题后，他们参与了第二次全面动员——动员 1890-1904 年和 1922-1923 年出生的适龄公民，紧急组建 85 个步兵师和 25 个骑兵师，并立即将这些部队派往前线。由于军队总人数达到了 740 万人，而且武器和军事装备的供应不仅持续不断，还在不断增加，这为 9 月 10 日组建 5 万人的空降部队和 9 月 13 日组建 44 个坦克旅提供了积极支持[273]。

在苏联最艰难的那些日子里，国防委员会的领导人还不得不插手实际上属于斯大林专属职责范围内的事务。他们至少暂时直接参与了列宁格勒的防御组织工作，自 7 月 10 日起，

伏罗希洛夫担任列宁格勒前线总司令，日丹诺夫担任西北方向军事委员会成员，负责领导列宁格勒的防御工作。

克利缅特·叶夫列莫维奇和安德烈·亚历山德罗维奇指挥着北方、西北方面军以及波罗的海舰队的 50 多万人，但他们未能阻止德军极其危险的突破。8 月 21 日，德军部队切断了十月铁路，占领了丘多沃，8 月 30 日，德军完成了对列宁格勒的合围，彻底切断了这座城市与国内的联系，占领了姆加车站，并抵达涅瓦河和拉多加湖。

8 月 26 日，日丹诺夫预见到了事态的发展，似乎提前就对这座城市的失守表示屈服，他给莫斯科发了一封电报，这封电报不能不被视为惊慌失措的表现。电报中强烈请求批准立即疏散列宁格勒最大的两家国防企业——基洛夫工厂和伊若拉工厂，这两家工厂已转产坦克。国防委员会为以防万一，初步同意了这一极端行动，并在同一天派莫洛托夫和马林科夫前往被围困的城市。与他们一同前往的还有 A.N.柯西金，他被派去研究在当前形势下为城市居民和军队人员提供食品供应的问题，海军人民委员 N.G.库兹涅佐夫和红军炮兵司令 N.N.沃罗诺夫则被派去了解前线的真实情况。

在实地了解情况后，国防委员会成员不同意日丹诺夫的意见。他们坚决支持他的反对者——列宁格勒州委和市委第二书记 A.A.库兹涅佐夫的观点，库兹涅佐夫认为不仅有必要，而且有可能抵御敌人的进攻。两天后，也就是 8 月 28 日，莫洛托夫和马林科夫刚一回到莫斯科，国防委员会就坚决驳回了自己先前对疏散工厂的同意意见[274]。

然而，由于斯大林对局势的极度担忧，尤其是在敖德萨、基辅以及莫斯科附近局势急剧恶化的情况下，他内心的不自信甚至对未来的恐惧，很快促使国防委员会对这个看似已经确定的决定做出了重大修正。9 月 13 日，派内务部副部长 V.N.梅尔库洛夫前往列宁格勒，与 A.A.库兹涅佐夫一起为执行与敌人的既定计划做准备——“在我军被迫撤退的情况下，炸毁和摧毁企业、最重要的设施和桥梁”[275]。与此同时，斯大林还亲自下达了在波罗的海舰队的舰船上布雷的命令[276]。最后，10 月 4 日，他们认为有必要开始疏散工厂，不过这次不是两家，而是三家——基洛夫工厂、伊若拉工厂和第 174 工厂，但最终未能完全实现这一目标。

国防委员会的领导人们克服了弥漫在许多核心领导层成员（尤其是斯大林）心中的悲观情绪以及对列宁格勒后续防御的绝望感，成功地做出了一些完全相反的决定。召回了伏罗希洛夫，他再次表现出作为指挥官的无能，将其调回国防委员会。9 月 8 日，任命朱可夫为列宁格勒前线司令[277]。派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贸易人民委员 D.V.帕夫洛夫作为国防委员会专员前往被围困的城市[278]，以立即建立起尽可能充足且最好是不间断的食品供应，保障被围困民众的生活。

尽管在 1941 年秋天乃至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红军都未能解除或突破列宁格勒的封锁，但德军的进攻被阻止了。这座十月革命的象征城市没有向敌人屈服。不过，莫洛托夫和马林科夫此次列宁格勒之行的成果并不仅限于此。他们插手列宁格勒的防御组织工作，无意间使日丹诺夫与自己以及库兹涅佐夫产生了对立，而这一情况在多年后显现出了非常严重的后果。

第十章

到九月底，德国国防军的部队占领了整个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和白俄罗斯，几乎整个乌克兰，除了塞瓦斯托波尔和刻赤以外的克里米亚地区。德军已经非常逼近维亚济马—勒热夫防线，这是通往苏联首都道路上的最后一道屏障。10 月 2 日，当希特勒宣布对莫斯科发动“最后”进攻时，德国军队已经开始从南面进攻图拉，从北面进攻加里宁，在中部进攻莫扎伊斯克。他们打算像钳子一样夹住这座城市，迫使它投降。并以此结束他们的东方征战以及对苏战争。

局势的严峻性，所有人甚至是普通民众都感觉到灾难迫在眉睫，这就需要采取果断、激进的措施。也许，需要在最高层进行人事调整。正因如此，10 月 2 日，政治局成员同意有必要在 10 月 10 日召开中央全会。并确定了会议议程：“1.我国的军事形势。2.为保卫国家而开展的党和国家工作”。然而，一周后他们放弃了这个计划。关于同一问题的另一项决定称：“鉴于最近前线出现的紧张局势，以及将领导同志从前线调离不合适，中央政治局决定将全会推迟一个月”[279]。但在今天，我们是否应该把这样的解释当作唯一真实的原因呢？

事实上，对于所有人来说，莫斯科附近局势恶化的第一个无可争议的迹象是苏联新闻局早晚发布的简报，从 10 月 7 日起，这些简报就报道了“维亚济马和布良斯克方向”激烈的战斗。10 月 9 日《真理报》的头版文章也说明了同样的情况，该文章呼吁国家“动员一切力量抵御敌人”。而 10 月 12 日在首都开始建造街垒，这无疑是预示着一场可怕决战即将来临的明确标志。

就在那时，即 10 月 8 日，真正的恐慌笼罩了高层领导圈子。就在这一天，也就是他们推迟召开全会的同一天，“鉴于当前局势”，国防委员会“为了对莫斯科市和莫斯科州的企业采取特殊措施”，换句话说，就是为了像在列宁格勒那样进行爆破，成立了一个特别“五人小组”（原文如此。——Ю.Ж）。小组成员包括内务部副部长 И.А.谢洛夫、莫斯科内务人民委员部负责人 М.И.朱拉夫廖夫、莫斯科市委书记 Г.М.波波夫和 Б.Н.切尔诺乌索夫，以及国防委员会总军事工程管理局局长 Л.З.科特拉尔。在所有地区都成立了“三人小组”，其组建目的和原则与上述相同[280]。

10 月 15 日，国防委员会不得不做出另一项决定，这一决定是基于之前的情况逻辑推导出来的。这一决定是为了确保政权免受任何意外情况的影响，尤其是那些完全可以预见的情况——“关于疏散苏联首都莫斯科市”[281]。当然，在这个听起来非常宏大、冠冕堂皇的名称背后，隐藏着一个非常简单而具体的行动——紧急将苏联和俄罗斯联邦的最高立法和行政机构的仅有的一些部门——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人民委员会——向东转移。同一天，这些机构开始匆忙（如果不能说是惊慌失措的话）迁往古比雪夫。

然而，尽管局势被认为几乎到了绝境，尽管高层领导采取了绝望的行动，斯大林还是成功地保持了坚定的信念。这一次，与 6 月 22 日不同，他没有被恐惧征服，没有惊慌失措。他一定非常清楚，无论如何都不能把莫斯科交给德国人。这无疑会导致国家、政府以及斯大林本人在全世界（包括敌人和盟友）眼中的威望彻底丧失。与此同时，他还不得不考虑其他因素。考虑到即将召开但被推迟的中央全会对他来说潜在的威胁。因为在像失去首都这样无法挽回的情况下，人们可能再也不会原谅他如此无能的领导。因此，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不得不将国防委员会的这两项决定不仅视为自然、必要的预防措施，而且视为最后的警告。

从 10 月 10 日起，当从列宁格勒召回未能突破封锁的朱可夫来指挥莫斯科防御时，斯大林就专注于最重要的事情——准备红军在从波罗的海到黑海的整个前线进行大规模、全面的反攻。但他也能够利用显然对自己不利的情况来达到其他目的。为了尽可能削弱国防委员会的重要性，减少自己对它的依赖，摆脱强加给他的角色，恢复昔日的至高权力和威严。为此，他在 10 月 25 日通过政治局发布了苏联人民委员会和联共（布）中央的联合决议，这不仅表明了他无论如何都要继续战斗的决心。同时也强调了国防委员会的临时、紧急性质，其职能的局限性，以及最重要的一点——苏联人民委员会作为主要的、常设的、宪法规定的权力机构，仍然是国家的核心，而他（斯大林），也只有他，是苏联人民委员会无可争议的领导人。

该决议将国家划分为两个作战区域：前线区域和后方区域。它委托苏联人民委员会第一副主席沃兹涅先斯基“在古比雪夫代表苏联人民委员会，领导疏散到东部的各人民委员部的工作，首先是航空工业、坦克工业、武器工业、黑色冶金工业、弹药工业等人民委员部的工作”[282]。这样的表述几乎让沃兹涅先斯基重新获得了对战争条件下基础行业的全面控制权，使他成为从伏尔加河到太平洋广大地区局势的完全掌控者。而官方通知“供各人民委员部了解和执行（我标注的重点。——Ю.Ж）”[283]则进一步强调了该文件的重要性。

与此同时，政治局又做出了另一项决定，该决定以苏联人民委员会决议的形式发布，这次它应该在一定程度上限制的不是整个国防委员会的权力，而只是马林科夫的权力，马林科夫在党的机构中几乎已经拥有了绝对权力。文件中指出：“允许联共（布）中央书记安德烈耶夫同志，他在古比雪夫，就疏散相关的工业组织问题，以联共（布）中央的名义向伏尔加地区、乌拉尔地区、中亚地区、西伯利亚地区的州委发布指示和命令，并与沃兹涅先斯基保持联系”[284]。不久之后，11 月 10 日，对莫洛托夫也采取了类似的行动。再次通过政治局和苏联人民委员会，任命 M.M.李维诺夫为副外交人民委员[285]。这个人在两年前被迫将自己的职位让给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莫洛托夫），因此对这件事恐怕不会有什么好感。

通过这种方式，斯大林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自己在高层领导中的原有地位，然后他采取了下一步行动。在确信红军有能力在近期内改善前线局势后，他两次发表公开演讲，这些演讲立即让他重新获得了人民以前对他的坚定信任。11 月 6 日，在十月革命周年纪念日，他在地铁“马雅可夫斯卡娅”站发表演讲；11 月 7 日，他在红场，在阅兵参与者面前发表演讲，这本身就具有巨大的精神意义。

在 11 月 6 日发表的内容丰富、严肃且经过精心准备的演讲中，斯大林像往常一样使用了宣传性的刻板模式，用非黑即白的方式来对比德国国防军和红军，对比德国人和苏联人。但他只是顺便这样做了一下。他主要关注的是他认为最重要的事情——阐述那些由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精神所催生的观点：强调国家、民族利益优先于阶级利益和国际利益。

斯大林坚持不懈地解释说，这场战争应该被视为“解放战争”，是与“德国帝国主义者”进行的战争。在演讲结尾，他不仅突出强调，而且着重强调了这样一个观点，即与德国军队战斗的是“伟大的俄罗斯民族……普列汉诺夫和列宁，别林斯基和车尔尼雪夫斯基，普希金和托尔斯泰，格林卡和柴可夫斯基，高尔基和契诃夫，谢切诺夫和巴甫洛夫，列宾和苏里科夫，苏沃洛夫和库图佐夫”。他绝非偶然地将列宁列入其中，而且还没有像往常那样把列宁排在第一位。在那之后，他呼吁“消灭每一个作为占领者进入我国领土的德国人”也就不足为奇了。但作为一个实用主义者，斯大林不能仅仅局限于这类新思想。他没有忘记多年来一直支撑着传统意识形态的那些东西。他将闪电战的失败归因于苏联各民族牢不可破的友谊，这种友谊在艰难的考验中得以巩固；归因于苏联体制，事实证明它是所有现存体制中“最坚固的”；归因于红军的力量。

与此同时，他坦率地向西方盟友表示敬意，指出打败德国的首要条件是建立反希特勒联盟，以及德国人自己把自己视为“民主自由的敌人”。

顺便说一下，他忍不住提到了那件似乎一直让他最困扰的事情。他轻描淡写地提到了《凡尔赛和约》条件的不公平性。他斥责了（虽然没有指名道姓）莫洛托夫、贝利亚和马林科夫，他实际上是在对少数理解他的人——高层领导成员说话，指责他们在战争头四个月的失败。他暗示，这些失败是由于坦克、飞机和反坦克武器的短缺造成的[286]。

几个小时后在红场上发表的演讲，从形式上看完全是口号式的，其内容归结为重复之前的所有观点。唯一与之前不同的是，它加强了同时提出的、相互矛盾的、模棱两可的呼吁。新的内容是：“让我们伟大的祖先——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德米特里·顿斯科伊、库兹马·米宁和德米特里·波扎尔斯基、亚历山大·苏沃洛夫和米哈伊尔·库图佐夫的英勇形象在这场战争中激励你们”，而旧的、人们熟悉的内容是：“让伟大的列宁的胜利旗帜鼓舞你们”[287]。

斯大林如此坦率地只赞颂俄罗斯民族，只推崇俄罗斯将领（而且是革命前时期的将领）作为唯一的榜样和未来胜利的象征，他站在了非常危险的境地。他越过了马克思主义所允许的界限，越过了官方的、未被废除、未被修正的党的意识形态教义的界限，而在过去的二十年里，正是这些王子、沙皇制度的拯救者、帝国的建造者一直受到这种教义的谴责。他成为了他不久前还宣布为最可怕罪恶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坚定鼓吹者。不久之后，他走得更远，开始在红军中组建民族部队。

这一切始于拉脱维亚共产党中央的请求，国防委员会早在 8 月 3 日就审议并批准了这一请求——关于组建拉脱维亚步兵师的请求[288]。但当时，这个非同寻常的决定更多的是试图恢复革命的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精神，唤起对苏联政权最可靠支柱——拉脱维亚红军战士的美好回忆。随后类似性质的行动则是由完全不同、更实际的原因所解释。

11 月 13 日，国防委员会主动开始组建数量和人员规模都相当可观的民族军事单位。组建了两个巴什基尔骑兵师、两个土库曼骑兵师和两个独立步兵旅、五个乌兹别克骑兵师和九个独立步兵旅、一个塔吉克骑兵师、两个哈萨克骑兵师和两个独立步兵旅、两个卡尔梅克骑兵师、三个吉尔吉斯骑兵师、两个车臣—印古什骑兵团、两个卡巴尔达—巴尔卡尔骑兵团。12 月 18 日，又组建了立陶宛和爱沙尼亚步兵师[289]。

在这里，组建民族部队的过程中明显呈现出一个突出特点和独特之处。其中没有白俄罗斯、乌克兰和外高加索地区的部队。而正是这一情况揭示了这一决定的真正原因。当新兵不懂俄语时，才会从某些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的应征者中单独组建军事单位。因为他们无法融入红军的任何其他部队。而且当时根本没有时间像 1940 年那样进行扫盲和培训，即使是加速培训也来不及。没有时间教那些半文盲的新兵掌握技术。

与此同时，斯大林利用当时的局势，进一步发展并加强了 10 月 25 日决议中隐藏的实质内容。他又补充了两项看似微不足道、具有局部性质的决议。11 月 6 日，最高权力机构联共（布）再次修订了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宣布在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中恢复政治部门，理由是战争时期的特殊情况。一个月后的 12 月 10 日，出于同样的原因，认为有必要在州委、边疆区委和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中设立负责贸易和公共饮食的书记职位[290]。这样，一个与总体系统平行的、独立的党组织体系不知不觉地形成了，这些党组织只服从于政治局的一名成员，由该成员负责监督相应的部门。斯大林负责国防委员会和海军人民委员部，安德烈耶夫负责农业人民委员部和国营农场人民委员部，米高扬负责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和国内贸易人民委员部，卡冈诺维奇则负责那些尽管困难重重但仍然保留下来的部门，如

交通人民委员部、海运人民委员部、内河航运人民委员部。这一切进一步缩小了马林科夫原本就已经有所限制的控制和责任范围，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他实际的权力。

但斯大林没有只专注于“机构游戏”，他没有忘记最重要的事情。他知道这是他最后的机会——必须制定并实施一场大规模、必须成功的全线反攻。从根本上改变战争的进程。为此，计划了三个主要的战略进攻方向：在季赫温地区——为了解除或至少突破列宁格勒的封锁；在顿河畔罗斯托夫地区——为了解放顿巴斯，向彼列科普推进，然后进入克里米亚，以解除英勇抵抗的塞瓦斯托波尔的围困；在莫斯科地区——为了拯救首都。

总参谋部精心制定的行动于 11 月 10 日在季赫温附近开始，11 月 17 日在罗斯托夫附近开始，12 月 5 日在莫斯科附近开始。然而，尽管所有行动都有了一个成功的开端，但无论是在北方还是南方，都未能实现既定目标。只有在莫斯科战役中取得了完全且无可争议的成功。在 И．С．科涅夫、Г．К．朱可夫和 С．К．铁木辛哥（12 月 18 日由 Ф．Я．科斯坚科接替他）的指挥下，加里宁方面军、西方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右翼的部队取得了胜利。

12 月 9 日，他们解放了罗加乔夫，11 日解放了伊斯特拉，12 日解放了索尔涅奇诺戈尔斯克，15 日解放了克林，16 日解放了加里宁，20 日解放了沃洛科拉姆斯克，将敌人从首都击退了 100 至 250 公里。莫斯科战役成为了自 1939 年 9 月 1 日以来德国军队的首次重大失败，打破了德国国防军不可战胜的神话。这是红军在战争半年来取得的首次真正胜利。它对苏联人民的精神和政治士气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它恢复了人们对红军力量的信心，恢复了对领袖的信心。斯大林迅速利用了对他来说理想的形势。

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即 12 月 14 日，当时战役的结果还远未明朗，国防委员会就做出了对首都进行排雷的决定[291]。12 月 15 日，政治局决定“允许安德烈耶夫同志与在古比雪夫的联共（布）中央机关一起，在 1941 年 12 月 25 日前迁往莫斯科”[292]。新年前夕，不仅所有疏散的干部管理部门和宣传部门的人员都回到了首都，沃兹涅先斯基也回来了，这应该表明他完成了自己的特殊使命。在这之后，斯大林终于有机会展现他以前的权威，向国防委员会的领导人指出他们应有的位置。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发动了一次巧妙的攻击，没有直接指责他们中的任何人，但在一定程度上诋毁了他们在国防工业领域的工作，让人对其工作成效产生怀疑。12 月 14 日，国防委员会做出了一项相当模糊、内容奇怪的决议，其名称更加抽象——“航空工业人民委员部的问题”[293]。决议中指出：

“鉴于航空工业人民委员部最近工作极其糟糕，未能完成所有飞机和发动机的生产和交付计划，从而辜负了国家和红军的期望，国防委员会决定：1.将航空工业人民委员部置于国防委员会成员贝利亚和马林科夫同志的监督之下，责成这两位同志采取一切必要的紧急措施，以扩大飞机生产……2.责成航空工业人民委员及其副手无条件执行贝利亚和马林科夫同志的所有指示……”。

这份文件隐藏的含义是什么，没有直接表达的威胁又在哪里呢？问题在于，贝利亚和马林科夫本来就已经对航空工业人民委员部的工作负责，监督其战时计划的执行情况。因此，仅仅指出航空工业人民委员 А．И.沙胡林不仅“未能完成”既定计划，而且“辜负了”国家和军队，这对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和格奥尔基·马克西米利安诺维奇来说，肯定是一个明确的警告。这是一个暗示——又出现了一个人，他总是能找到不足之处、失误甚至错误，并且能够严厉地追究这些问题，如果有必要，还会采取极端措施。而决议的隐晦性、表面上的温和以及某种不确定性，是由于贝利亚、马林科夫的工作成果与斯大林的老战友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的工作成果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所导致的。

在伏罗希洛夫从列宁格勒被召回，因其在担任西北方向总司令的职位上明显彻底地失败而被解除职务一个月后，人们才为他找到了一个他不太可能对工作造成特别损害的职位。11月9日，他被任命为国防委员会负责检查和监督正在组建的10、26、60和61军军事委员会工作的专员。但即使在这里，克利缅特·叶夫列莫维奇也未能带来明显的益处，于是又委托他监督莫斯科、伏尔加、乌拉尔、南乌拉尔和中亚五个后方军区的师和旅的组建工作[294]。

对卡冈诺维奇的处理方式稍有不同。考虑到所有铁路干线都出现了极其危险的混乱局面，12月25日国防委员会决定："为减轻铁路上中转货物及其他长期滞留货物的积压，成立一个委员会，成员包括：米高扬（主席）、柯西金、卡冈诺维奇、沃兹涅先斯基、赫鲁廖夫"。同时，由于疏散委员会已无存在必要，通过同一法令将其撤销，并将其机构移交给新委员会[295]。

但即便采取了这些行动，效果仍不显著，未能迅速、彻底地改善铁路运输工作。因此，1月27日，任命安德烈耶夫为交通人民委员部第一副人民委员，辅佐卡冈诺维奇[296]。就这样，在一个人民委员部的领导岗位上同时安排了两名政治局成员。

斯大林通过打压对手，迫使他们再次认清自己只是傀儡，必须毫无异议地认可他的任何提议，稳步推进着对国防委员会领导人的攻势。更确切地说，是对他们在高层领导集团中地位的攻势。首先，1942年2月1日，他在重新获得稳固多数支持的政治局通过了中央委员会和苏联人民委员会的联合决议，出人意料地使实际上已处于停滞状态的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团恢复了生机。决议内容如下："批准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团当前事务委员会的以下组成人员：沃兹涅先斯基（主席）、莫洛托夫、米高扬、安德烈耶夫、别尔乌辛、柯西金（3月4日，成员中又增加了什维尔尼克。——Ю.Ж）。2.该委员会负责解决苏联人民委员会的所有当前问题，并在必要时提出建议，供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批准"[297]。通过这一举措，斯大林不仅恢复了他的亲信沃兹涅先斯基以往的政治影响力和重要性，通过将他置于莫洛托夫之上，且未将贝利亚和马林科夫纳入委员会，强调了这一点，还创建了一个暂时虽小但能与国防委员会相抗衡的力量。他获得了在必要时进行策略调整的可能性，能够为了自身利益利用这两个最高权力机构的存在。

五天后，斯大林取得了更大的成果，扩大了重新组建的委员会的权力，实际上恢复了它对所有联盟部门活动的原有控制权。新的决议，这次是苏联人民委员会的决议规定："允许在莫斯科组建由疏散的各人民委员部、委员会和总局组成的作战小组，由人民委员（委员会主席、总局局长）或其第一副手领导。作战小组在莫斯科的组成人员由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团当前事务委员会确定"[298]。

不久之后，斯大林认为是时候彻底且不可逆转地完全恢复自己作为不受限制的唯一领导人的地位了。恢复这位无可争议、被普遍认可的领袖有些动摇的威望。他开始认为，终于有机会摆脱一直以来沉重的束缚，摆脱国防委员会强加给他的控制。废除国防委员会作为一个绝对的、不受任何法律或传统规范约束的、真正的最高权力机构的现有重要性，这个机构同时兼具立法和行政职能。它凌驾于所有机构之上，毫无例外，包括党的机构和政府机构。国防委员会的成员，以及因此整个国防委员会，斯大林，都共同为所有决定承担责任，即使这些决定是由每个成员独立做出的，未经与其他成员协商。

斯大林无疑试图将国防委员会实际上降低到苏联人民委员会以前的一个经济委员会的水平——仅负责国防工业，不再涉及其他所有问题。为此，他采用了自己最为熟悉、经过多次检验且表现出色的方法——人事调整。改变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不仅要在其中实现力量的重新分配，还要确保在任何情况下、任何情形下都能无条件地支持自己的意见，为此要始终保持票数上的优势。

2 月 3 日，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向政治局提交了一项提议供审议，他毫不怀疑这项提议会获得通过：“将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的两名副手——А.И.米高扬同志和 Н.А.沃兹涅先斯基同志增补为国防委员会成员”[299]。不难注意到，即使在提议的项目表述中（当然，该提议随即被通过），斯大林强调了这两名国防委员会新成员在法律上实际上是隶属于他这个政府首脑的，他有意识地避免再次提及他似乎更为重要的职位——国防委员会主席。这里还有另一个有趣的点。他首先提到了米高扬，这不会引起莫洛托夫、贝利亚和马林科夫的丝毫反对或怀疑。而只是在第二位提到了他不太走运的亲信、苏联人民委员会第一副主席沃兹涅先斯基。

国防委员会的扩大不可避免地迫使成员们放弃以往彼此间的信任、以往的集体协作精神，不再认为在极端情况下，每一分钟都至关重要，无需任何繁文缛节，就应着手处理任何凸显出来、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问题。只是在国防委员会成立半年后的现在，他们才在彼此之间划分了工作领域，并且还以书面形式确定下来，明确了各自的日常工作范围。2 月 4 日国防委员会决议的第一项内容如下，对职责进行了如下分配：

“В.М.莫洛托夫同志：监督国防委员会关于坦克生产的决议执行情况，并准备相关问题。

Г.М.马林科夫同志和 Л.П.贝利亚同志：а）监督国防委员会关于飞机和发动机生产的决议执行情况，并准备相关问题；б）监督国防委员会关于红军空军工作的决议执行情况（组建航空团，及时将其调往前线，组织问题和薪资问题），并准备相关问题。

Г.М.马林科夫同志：监督国防委员会关于最高统帅部迫击炮部队参谋部的决议执行情况，并准备相关问题。

Л.П.贝利亚同志：监督国防委员会关于武器和迫击炮生产的决议执行情况，并准备相关问题。

Н.А.沃兹涅先斯基同志：а）监督国防委员会关于弹药生产的决议执行情况，并准备相关问题；б）监督国防委员会关于黑色冶金工业的决议执行情况，并准备相关问题。

А.И.米高扬同志：监督红军的供应工作（物资、食品、燃料、资金和弹药供应），并准备相关问题。

将国防委员会所有供应部门的所有供应和运输方面的事务置于米高扬同志的监督之下。批准 Яковлев 同志为米高扬同志在弹药供应方面的副手”[300]。

总之，该决议实际上并未改变现有局面，为国防委员会的新老成员保留了他们原有的职责。只是提升了米高扬和沃兹涅先斯基在高层领导集团中的地位，使他们从被委派的、即隶属于委员会的人员，变成了与其他成员平等的人。而且，最重要、最值得注意的是，该决议完全回避了对斯大林工作范围的明确界定。这实际上使他真正成为了国防委员会主席，似乎要对所有事情负责，成为了最高仲裁者，只需指导其他人，给他们分配任务，检查任务的执行情况，如果有必要，还可以非常严厉地进行督促。

与此同时，同一决议的第二项内容试图从根本上改变这个因特定且真正悲惨的情况而产生的紧急机构的本质。现在规定：“国防委员会的每个成员都应有副手，以监督各人民委员对国防委员会关于其负责领域工作的决议的执行情况”[301]。简而言之，他们试图将国防委员会转变为一个普通的、庞大的官僚机构，建立起复杂的等级隶属制度，并有可能将其纳入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团，使其成为其中的一部分。

斯大林如此急切地进行这种不为人知、非官方的国防委员会重组，必然会引起该委员会创建者们的坚决反对。他们的想法（从他们的角度来看完全合理）首先是要让沃兹涅先斯基远离那些他在战争前和战争开始后都无法解决的问题。

2 月 12 日，国防委员会的老成员们成功坚持通过了一项对他们在高层领导集团中维护自身威望、地位和角色至关重要的决议。决议内容为：“1. 对 1942 年 2 月 4 日国防委员会决议进行部分修改，委托 Н. А. 沃兹涅先斯基同志监督国防委员会关于黑色和有色金属、石油、煤炭和化工产品生产的决议执行情况，并准备相关问题。2. 批准 М. Г. 别尔乌辛同志为国防委员会成员 Н. А. 沃兹涅先斯基同志在化工和燃料工业方面的副手”[302]。这不仅使沃兹涅先斯基不再负责国防工业问题，还立即缩小了这次赋予他的新权力范围。他们将这些权力进行了分配，将对四个人民委员部工作的实际控制权交给了别尔乌辛。

两天后，又批准了另一项同样具有原则性的决议——关于成立独立的运输委员会，其任务确定如下：“а）规划和调节铁路、海运和内河运输的运输量；б）协调所有运输方式在运输方面的工作；в）制定改善物质基础的措施，并确保上述运输方式配备新的运输工具（机车车辆、线路、通信设备、装卸设备）以及进行维修……”。委员会主席由斯大林担任，这首次明确了他的直接职责，副主席是安德烈耶夫，实际上安德烈耶夫已经在取代交通人民委员，委员会成员包括卡冈诺维奇、米高扬、Ширшов（海运人民委员）、Шашков（内河航运人民委员）、赫鲁廖夫、Ковалева、Карпоносова（国防委员会）和 Ковалева（交通人民委员部）[303]。

最后，2 月 16 日，考虑到贝利亚明显的工作负担过重，再次调整了国防委员会成员之间的职责分配。将飞机和发动机生产以及空军部队组建的监督工作交给马林科夫，而让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负责迫击炮武器和弹药人民委员部的工作[304]。

现在轮到斯大林对所发生的事情做出反应了。在当时的情况下，他几乎立即采取了唯一可行的行动。2 月 20 日，他成功（当然是在政治局会议上）实现了国防委员会的再次扩大，将……卡冈诺维奇纳入其中[305]。他这样做时，非常清楚在高层领导成员眼中，拉扎尔·莫伊谢耶维奇早已声名狼藉。在过去的八个月里，他未能完成交给他的任何任务。他既无法胜任交通人民委员的直接工作，也无法胜任疏散委员会主席的职位，还无法履行国防委员会专员的职责，尽管所有这些工作都涉及到他似乎早就应该熟悉的活动。

但“机构博弈”并未就此结束，因为任何一方都未能取得决定性的优势，无法证明谁是赢家：是以莫洛托夫、贝利亚和马林科夫为首的国防委员会，还是以斯大林和沃兹涅先斯基为首的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团。因此，在极端不稳定的平衡时期，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古老的、在克里姆林宫的激烈斗争中多次得到检验的政治斗争武器——人事变动，更确切地说，是某个任命背后的意义。在这里，马林科夫的地位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他不仅是国防委员会的领导人之一，还是中央委员会书记、干部管理部门负责人。正因为如此，即使在“敌方阵地”（政治局），国防委员会也得以巩固后方，通过任命在对国家防御至关重要的人民委员部中已经表现出色的专业人士担任领导职务，加强了其发起者的地位。

早在 1942 年 1 月，在公开对抗开始之前，А. И. 列特科夫就被其第一副手 Д. Г. 日梅里琴科取代，担任发电站人民委员的职位，而 И. И. 诺森科在不再需要他时，被调回司法人民委员部。2 月，在高层领导集团对抗最激烈的时候，任命 Б. Л. 万尼科夫为弹药人民委员，丝毫没有因他最近被捕和短期监禁而有所顾虑。任命著名的海洋学家、极地探险家 П. П. 希尔绍夫为海运人民委员，将被撤职的 С. С. 杜克尔斯基（一名伞兵指挥官）派往车里雅宾斯克州担任国防委员会弹药生产专员。重新组建了迫切需要的机床制造工业人民委员部，让 А. И. 叶夫列莫夫回到原来的职位。М. Г. 别尔乌辛在保留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

席职责的同时，还被委托亲自领导化学工业人民委员部，以加强他作为沃兹涅先斯基在该领域前副手的独立作用[306]。

然而，高层领导集团中最激烈的斗争在春天才达到高潮，这次斗争并非直接源于对领导地位的追求，而是出于为了使国家在与在军事技术和将领经验上暂时占优势的敌人的激烈对抗中坚持下来，并最终赢得战争胜利的必要性。事实证明，国防委员会的发起者们能够给予决定性的一击，这一击的力量如此强大，以至于斯大林不得不意识到：继续抵抗，坚持己见，对他个人而言将是毁灭性的。

1942 年 4 月 1 日，政治局通过了一项关于个人问题的详细决议：“关于 Б.伏罗希洛夫同志的工作”。在决议的陈述部分，列举了斯大林最亲密的战友、他忠诚可靠的老朋友在过去两年半时间里众多且后果严重的“失误”。决议指出，甚至在苏芬战争期间，“国防委员会管理上的严重混乱和滞后……国防委员会对确保行动顺利发展的准备不足”导致了战争的过度拖延和巨大的、不合理的损失。这位元帅后来在担任西北方向总司令的职位上也犯了严重错误，其结果是列宁格勒被围困。伏罗希洛夫也未能完成在沃尔霍夫方面军相对不那么重要的任务。总之，他表现出了与所担任的所有职务极不相称的能力。

然而，所做出的惩罚与所提出的指控完全不相符。联共（布）中央决定：“1.认定 Б.伏罗希洛夫同志未能完成在前线交给他的工作。2.派伏罗希洛夫同志从事后方军事工作”[307]。

为什么对克利缅特·叶夫列莫维奇如此宽容呢？甚至与对他的下属、元帅 Г.И.库利克的处理方式形成了鲜明对比——库利克曾担任副国防人民委员，后来担任国防委员会总军械部部长，从 1941 年 8 月起担任保卫列宁格勒等地区的第 54 军军长，从 1942 年 2 月起被交付法庭审判，剥夺了勋章，军衔降至少将，而且这还是在经过长时间的犹豫之后[308]。对伏罗希洛夫如此宽容有两个原因。首先，很可能是斯大林在保护他，千方百计地为他开脱。此外，国防委员会成员并不那么渴望看到克利缅特·叶夫列莫维奇倒霉。他们需要的不是一个仪式性的牺牲品，而是别的东西——利用他的失败，彻底将这位元帅排除在政治舞台之外；剥夺他在国防委员会或政治局会议上发言的道德权利。并向斯大林表明，在必要的时候，从库利克到伏罗希洛夫的这条线总是可以延伸到他（斯大林）这个国防委员会主席和最高统帅身上，他有责任与下属共同为所有的失误、失算和错误承担责任。

在所有这些戏剧性事件的背后，人们并没有忘记成立国防委员会的初衷。莫洛托夫、贝利亚和马林科夫对国家防御问题给予了同样甚至更多的关注，他们需要满足本国军队不断增长的需求，到 1942 年初，军队人数已增加到 850 万人[309]，同时还需要组建捷克斯洛伐克旅和两个波兰师。

在新的一年的头几个月里，军事工厂的疏散工作实际上已经完成，并全面投入生产。因此，1 月份飞机的产量（主要是拉格-2、雅克-1、雅克-7、拉-5 战斗机，伊尔-2 强击机，佩-2 轰炸机）达到了 1039 架，2 月份为 915 架，3 月份为 1647 架[310]。与此同时，由于在战斗中对技术装备的检验，需要对计划和计算进行修正。例如，坦克工业人民委员部 1942 年第一季度的计划规定，其产品中重型 КВ 坦克和中型 Т-34 坦克几乎占一半[311]。但在 2 月，在第一次大规模反攻之后，不得不完全停止生产轻型 Т-50 坦克，增加 Т-34 坦克的产量，并将 Т-60 坦克的产量限制在少量（该坦克装备有 35 毫米装甲和 20 毫米火炮）[312]，并准备很快用装备 45 毫米火炮的 Т-70 坦克取代它。

然而，苏联工业生产的飞机和坦克仍然不足，而来自美国和英国的物资供应却意外减少，而且这绝不是任何人的恶意造成的。

1941 年 12 月 7 日，日本将其海军、空军和陆军的全部力量投入到对美国的夏威夷、菲律宾，英国的新加坡和马来亚，以及荷兰的印度尼西亚的进攻中。第二天，根据《三国公约》的规定，德国和意大利向美国宣战。战斗波及了所有大陆和所有海洋。这迫使罗斯福政府暂时限制对苏联和英国的援助，首先将其全部军事力量用于保卫本国领土和海上交通线。

全新的国际形势要求加快准备两项条约——关于军事互助的条约和关于战后世界组织的条约——苏联和英国计划相互签订这两项条约。为此，12 月 15 日，安东尼·艾登飞抵莫斯科，随即开始就两个项目草案进行协商。然而，参与谈判的斯大林的立场，以及他坚持利用当前局势以便在条约中从法律上巩固 1941 年苏联边界的强烈意愿，还有解决德国战败后瓜分德国的问题，使得包括莫洛托夫和迈斯基在内的外交官们的努力付诸东流。艾登依据丘吉尔的指示和《大西洋宪章》的规定，拒绝就世界的单独划分、边界变更，尤其是波兰（德国侵略的首个受害者）的边界变更问题进行讨论[313]。12 月 20 日，他离开了莫斯科，最终未能达成共识。

与此同时，英美外交取得了相当显著的成功。1942 年 1 月 1 日，在华盛顿，26 个国家的代表，其中包括罗斯福、丘吉尔以及不久前被任命为驻美国大使的 M. M. 李维诺夫，宣布成立军事政治联盟——同盟国（联合国前身）。他们承诺遵守《大西洋宪章》的原则，与德国、意大利、日本以及与其结盟的国家进行斗争，不与它们单独媾和。克里姆林宫对第二点和第三点完全满意，但对第一点却无法接受。确认《大西洋宪章》作为盟友（未来的胜利者）之间关系的基础，阻碍了任何边界的变更。因为它开篇就写道：“美国和英国不追求领土或其他方面的获取。它们不会同意任何不符合相关人民自由表达的意愿的领土变更”[314]。

与艾登谈判的失败，以及对同盟国宣言实质内容的官方支持，迫使苏联领导层紧急寻找迂回的办法，以便能够克服在努力维护 1941 年苏联边界过程中遇到的如此严重的障碍。1 月 28 日，政治局不得不紧急成立“外交材料筹备委员会”。该委员会的任务只有一个：找到法律、历史甚至民族志方面的依据，以便说服盟友承认对波罗的海沿岸共和国、波兰东部和比萨拉比亚的吞并[315]。

然而，最为重要的仍然是消除与英国的分歧，以便能刻不容缓地与英国签署同盟条约。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莫洛托夫、迈斯基和外交部的工作人员花费了五个月的时间。

第十一章

1942 年 5 月 20 日，在其工作团队完成了长时间的草案拟定工作后，莫洛托夫飞抵伦敦，次日清晨便开始与丘吉尔和艾登进行谈判。他连续两天试图说服英国首相接受苏联的立场，更确切地说是斯大林的立场，但毫无结果。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还竭尽全力，希望能在近期内开辟第二战场。借助第二战场吸引四十个德国师的兵力，从而减轻德军对在持续战斗中疲惫不堪的苏联红军部队的压力。但在这个问题上，他也没有得到支持。直到第三天，才找到摆脱僵局的办法，当时决定甚至不再提及领土问题。仅以一项为期二十年的同盟条约为限。

利用谈判时斯大林不在场的机会（斯大林总是坚持己见，哪怕是明显不可能实现的要求），莫洛托夫在当时取得了主要成果。5 月 26 日下午，用丘吉尔的话说，在“双方极为友好的氛围中”，苏英两国签署了《关于对希特勒德国及其欧洲帮凶作战的同盟以及战后合作与互助条约》。这终于成为了现实。

在伦敦取得明显成功后，莫洛托夫立即乘飞机前往华盛顿。在那里，经过与罗斯福、霍普金斯和国务卿赫尔相对不那么激烈的谈判后，几乎没有出现分歧，他又签署了一项同盟条约，这次是与美国签署的《关于在对侵略作战中适用的互助原则的条约》。在莫斯科会议上诞生的三大强国联盟，成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一个实际因素。

然而，在与美国人的交谈中，莫洛托夫也没有听到任何关于近期内有可能开辟第二战场的令人欣慰的消息。因此，在回国途中再次访问伦敦时，他只能满足于一份联合公报，该公报仅仅简单地指出，在“1942 年在欧洲建立第二战场的某些任务方面”达成了“协议”。而且，据丘吉尔承认，这样做只是为了对敌人进行虚假宣传，仅此而已。诚然，莫洛托夫还是设法促成了另一项秘密条约的签署——两国之间关于军事技术信息交换的条约。而正是因为三年后英国方面违反了这项条约，才发生了那些真正具有悲剧性的事件，这些事件也决定了整个战后时期的特征。

国防委员会中（当然不包括伏罗希洛夫），唯一一个在所有事务中都还没有取得成功的成员是斯大林。他的功绩中只有一项——无可争议、令人信服的莫斯科保卫战的胜利，但这显然不足以实现战争进程的决定性转折。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作为国防人民委员和最高统帅的处境变得更加艰难，当德军在因春季泥泞而短暂停歇后，再次发起进攻时，他的处境变得极其困难和复杂。正如希特勒后来所解释的，他开始了对苏联的最后一场、决定性的战役。

1942 年 5 月 8 日，德国各师突破了克里米亚的防线，一周后迫使苏联红军部队放弃了刻赤，7 月 2 日，由于继续防守已毫无希望，又放弃了塞瓦斯托波尔。

为了扭转日益不利的局面，斯大林批准了在哈尔科夫地区进行一次行动。根据苏联指挥部的设想，如果行动成功，可能会导致顿巴斯的解放，解除笼罩在北高加索上空的威胁，并有可能尝试恢复对克里米亚的控制。5 月 12 日，西南方面军司令谢苗·康斯坦丁诺维奇·铁木辛哥指挥的部队和南方方面军右翼（罗季翁·雅科夫列维奇·马利诺夫斯基指挥）发起了进攻，但五天后进攻陷入困境。德国军队利用其明显的优势，不仅抵挡住了进攻，还转入了反攻，反攻在两个方向上迅速推进：向东，指向斯大林格勒和伏尔加河；向南，首先占领北高加索，然后是拥有石油资源的外高加索地区。

5 月 29 日，哈尔科夫地区的苏联红军部队被歼灭，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根据苏联新闻局的汇总，有 7 万人被俘，5 千人死亡。7 月 6 日，德军占领了沃罗涅日，抵达顿河；7 月 17 日，占领了伏罗希洛夫格勒；23 日，占领了顿河畔罗斯托夫；8 月 8 日，占领了迈科

普；9 日，占领了皮亚季戈尔斯克；25 日，占领了莫兹多克，险些到达格罗兹尼。只是在这里，在高加索的前山地区，才成功阻止了他们的进攻。在德军进攻的另一个方向上，形势更加严峻。8 月 2 日，德军各师抵达斯大林格勒郊区，8 月 23 日，从北面绕过城市，抵达伏尔加河岸边。在这里，开始了一场决定整个战争命运的战役。

直到这时，斯大林终于确信，他身边的许多将军和元帅，他所依靠、信任的人，却一次又一次地打败仗，不断向东撤退，已经退到了伏尔加河，他们没有能力胜任。因此，这一次他不再仓促行事，而是非常谨慎地开始了对苏联红军指挥层的又一次更替。

早在 5 月 11 日，由于生病，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沙波什尼科夫被免去总参谋长的职务，最初任命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华西列夫斯基代行其职责。同样在春天，他更换了一些国防人民委员部主要部门的负责人：5 月任命了兹韦兹丹·伊万诺维奇·康德拉季耶夫为汽车运输部部长，11 月任命了弗拉基米尔·叶夫根耶维奇·别洛科斯基；任命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诺维科夫为空军司令。他还确认了自己在国防人民委员部的新副手：负责化学防护和近卫迫击炮部队的弗拉基米尔·瓦西里耶维奇·阿博连科夫，负责人事的亚历山大·德米特里耶维奇·鲁缅采夫，总政治部主任（取代被撤职的列夫·扎哈罗维奇·梅赫利斯）为亚历山大·谢苗诺维奇·舍尔巴科夫，总参谋长为华西列夫斯基，装甲坦克兵司令为雅科夫·尼古拉耶维奇·费多连科。但最重要、最具决定性的任命是格奥尔基·康斯坦丁诺维奇·朱可夫的任命；8 月 26 日，他被任命为苏联红军和海军最高统帅的副手，第二天，又被任命为国防人民委员的第一副手，取代谢苗·米哈伊洛维奇·布琼尼。

不久之后，在秋天，他更换了那些即将参与已经在策划中的斯大林格勒战役的各集团军群的指挥官。8 月，任命安德烈·伊万诺维奇·叶廖缅科为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司令，任命伊万·伊万诺维奇·马斯连尼科夫为北高加索方面军司令；9 月，任命康斯坦丁·康斯坦丁诺维奇·罗科索夫斯基为顿河方面军司令；10 月，任命尼古拉·费多罗维奇·瓦图京为西南方面军司令，12 月，任命他为沃罗涅日方面军司令。

同样重大的人事变动也波及到了核心领导层，这再次改变了其中的权力平衡，同时也最终消除了在以沃兹涅先斯基为首的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团恢复运作后，核心领导层所处的那种复杂甚至模棱两可的局面。

即将发生变化的预兆是，早在 3 月 25 日，卡冈诺维奇就被免去交通人民委员的职务，这在他仅被任命为国防委员会运输委员会成员后是可以预料到的。任命阿列克谢·瓦西里耶维奇·赫鲁廖夫为交通人民委员部部长，并保留他国防人民委员副手的职位。直到 7 月 23 日，才为拉扎尔·莫伊谢耶维奇找到了一个更符合他能力的职位，在这个职位上，即使在最糟糕的情况下，他对工作造成的损害也最小——担任联共（布）中央和苏联人民委员会负责地方燃料储备供应的专员。他被赋予的工作不向国防委员会负责，而是向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团负责。然而，卡冈诺维奇很快就把这项工作搞得一团糟，以至于一个月后就不得不解除他的这些职务，由柯西金取代了他。

大约在同一时间，8 月 16 日，发生了一件对政权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件。根据政治局的决定，“废除 1941 年 3 月 10 日的法令”，再次任命莫洛托夫为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的第一副手，“负责苏联人民委员会工作的所有问题”。此外，8 月 21 日，政治局又做出了另一项决定，根据这项决定，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除了所有其他职务外，还成为了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团当前事务委员会的主席，而沃兹涅先斯基只是该委员会的六名成员之一。这样，莫洛托夫完全恢复了他在国家中作为第二号人物的地位。政治局 12 月 5 日的决定进一步巩固了他作为外交人民委员的原有权力。该决定将“对苏联新闻界关于国际生活和外交政策问题的报道以及广播进行审查的控制权”，从苏联新闻局（即由联共（布）中央书记亚历山大·谢苗诺维奇·舍尔巴科夫领导的宣传鼓动部）“移交给外交人民委员部的出版

司（就像战前那样）”。将外交政策审查工作委托给该部的一名委员、前苏联驻美国大使康斯坦丁·亚历山德罗维奇·乌曼斯基和出版司司长尼古拉·格里戈里耶维奇·帕尔古诺夫。

10 月 16 日国防委员会的另一项决定，尽管表面上看起来不太重要，但也表明了政权高层权力平衡的重大、原则性变化。该决定委托“由贝利亚同志（主席）、沃兹涅先斯基和马林科夫组成的三人小组采取一切措施，既要增加煤炭产量，又要削减其他用户的煤炭用量，并将一些铁路改用褐煤，以便为交通人民委员部提供煤炭，既作为冬季储备，又满足当前的运营需求”。这样一个“三人小组”的成立本身就使人们对沃兹涅先斯基之前的所有行动以及他在国防委员会中负责能源问题的工作产生了怀疑。而且，除了其他事情之外，他被置于与他地位似乎平等的贝利亚的领导之下，这非常有力地表明了沃兹涅先斯基开始了又一次的地位下降，他好不容易才开始恢复的威望又一次丧失了。

然而，政权结构中的新情况持续的时间非常短。利用苏联红军的巨大胜利，以及在斯大林格勒取得的辉煌胜利（11 月 19 日，由保卢斯元帅指挥的 33 万德军部队被包围，注定灭亡或被俘），斯大林试图重新夺回他的绝对领导权。如果不能废除国防委员会，至少也要降低其发起者的重要性。当然，他已经无法简单地恢复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团以前的权力，因为他不得不让莫洛托夫担任其主席。他也不能采取激烈、果断的措施，因为他非常清楚，如果没有莫洛托夫、贝利亚和马林科夫，斯大林格勒的胜利是不可能的。于是，他采用了惯用的方法，利用古老的原则：分而治之。他实现了政权结构的全面重组。

1942 年 12 月 8 日，他通过政治局颁布了《关于国防委员会作战局和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团的组成和工作》的法令。该法令规定：

“1.确认国防委员会作战局的组成如下：莫洛托夫、贝利亚、马林科夫、米高扬。将对所有国防工业人民委员部、交通人民委员部、黑色冶金人民委员部、有色冶金人民委员部、电站人民委员部、煤炭工业人民委员部、石油工业人民委员部、化学工业人民委员部的当前工作的监督和观察，以及对这些工业部门生产和供应计划的编制和执行所需的一切工作的监督，交由国防委员会作战局负责。解散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团当前事务委员会。

2.确认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团的组成如下：莫洛托夫、米高扬、安德烈耶夫、沃兹涅先斯基、什维尔尼克。将代表苏联人民委员会审议和批准国民经济计划（生产和供应计划）、国家预算以及对国民经济所有部门的信贷，解决所有机械制造人民委员部、建筑人民委员部和建筑材料生产人民委员部、食品工业和轻工业人民委员部、农业人民委员部、农业采购和贸易人民委员部、海军和内河航运人民委员部、橡胶工业人民委员部、林业人民委员部、纸浆和造纸工业人民委员部、卫生人民委员部、司法人民委员部以及苏联人民委员会下属的所有委员会和管理部门在文化建设和行政管理各个部门的实际工作问题，交由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团负责。

3.鉴于煤炭、金属和铁路运输方面的紧张局势，委托：

-国防委员会成员贝利亚同志，除了已承担的职责外，额外负责对煤炭工业人民委员部和交通人民委员部工作的监督和观察；

-国防委员会成员马林科夫同志，除了已承担的职责外，额外负责对黑色冶金人民委员部工作的监督和观察；

-国防委员会成员米高扬同志，除了已承担的职责外，额外负责对有色冶金人民委员部工作的监督和观察，以及对燃料、金属和电力分配的监督和观察。

4.解除沃兹涅先斯基同志对煤炭工业人民委员部、黑色冶金人民委员部和有色冶金人民委员部工作的监督和观察职责。任命沃兹涅先斯基同志为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解除萨布罗夫同志的这一职务。

5.委托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萨布罗夫同志对电力工业人民委员部、重型机械制造人民委员部和机床制造人民委员部的工作进行监督和观察。”

这项法令，其第一部分在仅仅四天后就被国防委员会再次确认，标志着苏联政权的又一次重大重组。首先，这意味着实际上废除了 1941 年 6 月 30 日成立时具有相应权力的国防委员会。其次，这意味着在国防委员会和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团的基础上形成了一个全新的、两级的核心领导机构，现在由九个人组成：斯大林、莫洛托夫、贝利亚、马林科夫、米高扬、安德烈耶夫、沃兹涅先斯基、什维尔尼克和萨布罗夫。从现在起，所有的权力都集中在他们手中，同时他们也对战争的结果、国家的命运承担着全部、不可分割的责任。然而，这项法令虽然看起来像是斯大林的胜利，是他愿望的实现，但实际上却是一种特殊的妥协，是双方的让步。

是的，斯大林重新夺回了国家元首、绝对领导人的角色，得到了所有核心领导层的认可。他保留了战时的三个最高职位——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联共（布）中央第一书记和国防人民委员，他没有进入两个新的主席团并非偶然。正是这种地位使他能够超越权力斗争，扮演最高仲裁者的角色，他的裁决是不可更改的。此外，除了领导陆军和海军之外，没有明确制定、以文件形式固定下来的职责，这使他无需对任何具体事情负责。

但 12 月 8 日的法令与前一天的情况相比，不仅在权力平衡方面带来了相当大的变化。无论斯大林多么希望，这些变化并没有使他的地位得到足够的加强，使他能够感觉自己不受任何可能的批评，以及作为批评潜在后果的对他特权、绝对权力的又一次侵犯。这种情况的解释是，在他所有忠诚的战友中，核心领导层中只剩下了沃兹涅先斯基，而且还是在第二级结构中。这一次，日丹诺夫、伏罗希洛夫和卡冈诺维奇完全被排除在政治游戏之外。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现在只能依靠七个人中的三个人——沃兹涅先斯基、安德烈耶夫、什维尔尼克，还有米高扬，但这也很成问题。

还有一件事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斯大林的作用。他让莫洛托夫重新担任第二号人物的职位，从而在曾经团结一致、紧密相连、意见一致的三人小组中造成了目前还不明显的——不，不是分裂，而是分歧。贝利亚首先感受到了这一点。同样，只是在斯大林格勒战役结束后，这场战役使军队成为了主要机构，在当时的情况下，不仅确保了苏联的独立、完整及其在世界舞台上作为大国的地位，还确保了斯大林的个人权威和权力。

1943 年 4 月 14 日，由贝利亚领导了两年的统一部门，这个部门甚至在核心领导层中为他创造了特殊的地位，却意外地被分成了两个人民委员部，就像战争前夕发生过的那样。只是这一次没有试图以任何方式解释所做出的决定，说明其必要性。政治局只是表示：“从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中分离出行动-肃反管理部门和科室，并在此基础上组建苏联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НКГБ）”。

新部门的职能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仍然和以前一样：“a）在国外进行情报工作；b）打击苏联境内外国情报机构的破坏、间谍、破坏和恐怖活动（不包括苏联红军和海军的部队和机构以及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部队）；c）打击苏联各阶层居民、工业、交通、通信、农业等系统中的各种反苏分子和表现；d）保护党和政府的领导干部”。

很容易注意到，与 1941 年 2 月 3 日的类似法令相比，非常重要、意义重大、具有代表性的是，完全没有提到“消灭所有反苏政党和反革命组织的残余”。这样的问题已经成为遥

远的过去，被遗忘了，因为它既失去了现实意义，也失去了重要性。相反，出现了一个新的任务，这是由战争时期的具体情况所产生的：“组织破坏活动和在敌人后方开展工作”。

但 1941 年和 1943 年的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的主要区别还在于其他方面。重新组建的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现在被严格禁止干涉军队和海军的活动，禁止对军人进行调查。以前负责这些问题的特别部门，根据国防委员会的另一项决定（这并非偶然），不再受贝利亚的控制，而是改组为国防人民委员部的一个结构部门——军事反间谍总局（“反间谍机关”），其负责人弗谢沃洛德·谢苗耶维奇·阿巴库莫夫同时获得了国防人民委员部副部长的职位。他成为了斯大林唯一的直接下属，从那时起只执行斯大林的命令和指示。

新成立的苏联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由弗拉基米尔·尼古拉耶维奇·梅尔库洛夫担任人民委员，鲍里斯·扎哈罗维奇·科布洛夫担任第一副部长，米哈伊尔·格里戈里耶维奇·斯维内卢波夫担任负责人事的副部长。各管理部门的负责人仍然是那些在改组前担任相应职位的人：第一（情报）部门——帕维尔·米哈伊洛维奇·菲季纳，第二（反间谍）部门——彼得·瓦西里耶维奇·费多托夫，第三（运输）部门——所罗门·罗曼诺维奇·米尔施泰因，第四（破坏）部门——帕维尔·亚历山德罗维奇·苏多普拉托夫，特别重要案件侦查部门——列夫·叶夫根耶维奇·弗洛济米尔斯基。只有第六部门——“保护党和政府的重要工作人员”的负责人尼古拉·谢苗诺维奇·弗拉西克，很快在 8 月 21 日被降职。他被任命为保卫部门负责人的副手，他的职位被交给了阿列克谢·康斯坦丁诺维奇·库兹涅佐夫。

贝利亚职责的一定程度缩减成为了 7 月 5 日再次在国防委员会成员之间重新分配职责的理由。莫洛托夫被解除了“对坦克工业人民委员部工作的监督和观察”职责，将其转交给了贝利亚。现在，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将不得不专注于解决那些数量和复杂程度都日益增加的问题，这些问题是由即将到来的胜利所带来的——专注于外交政策问题。重新全面掌控外交人民委员部后，莫洛托夫首先进行了人事调动，将与他观点相近的人安排在关键职位上：他任命自己的助手谢尔盖·彼得罗维奇·科兹列夫为外交人民委员部的秘书长，任命谢苗·伊万诺维奇·卡夫塔拉泽和伊万·米哈伊洛维奇·迈斯基为副部长，任命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葛罗米柯为驻美国大使，任命费奥多尔·季莫费耶维奇·古谢夫为驻英国大使，任命弗拉基米尔·扎哈罗维奇·列别杰夫为驻伦敦盟国政府的代表，任命尼古拉·格里戈里耶维奇·帕尔古诺夫为塔斯社的负责人。

斯大林摆脱了贝利亚对军队和海军明显且充满各种意外情况的监督后，并没有就此满足。他摒弃了现在对他来说完全不必要的军事委员制度。也摆脱了来自党的相对不那么烦人的、虽不那么重要但仍然存在的监督。在斯大林格勒战役最激烈的时候，1942 年 10 月 9 日，他通过政治局做出决定（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命令），废除军队中的军事委员制度，三天后，又废除了海军中的军事委员制度。七个月后，他更进一步。1943 年 3 月 24 日，他作为国防委员会主席签署批准了《关于废除排、炮兵连、飞行中队、航空大队、独立小队政治副职制度以及部分裁减其他类别的政治工作人员的决定》。

这一让许多人感到意外的举措，是由“苏联红军战士的政治成长和指挥干部的政治成长”以及“进一步加强指挥干部”的目标所解释的。根据该决定，不仅废除了政治副职制度，还创建了一个新的制度——旅、师、军、军事院校的政治部门负责人制度。所有这些使得能够立即将大约 12 万名政治工作人员转到相应军种的指挥岗位上，还有 3000 人转到了“反间谍机关”。

在这之后，对于再做出的另一个决定，已经没有人能够提出异议，甚至连一丝怀疑都没有。7 月 2 日，国防委员会决定，鉴于在新情况下明显没有必要，关闭以列宁命名的苏联红军军事政治学院。在其基础上创建了为期一年的政治人员再培训课程，人数仅为 800 人。

这些已经实施和还在筹备中的行动，为斯大林对国防人民委员部的领导进行根本性变革提供了坚实、严肃且经过深思熟虑的基础。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基于两年的经验，比以前更深入地了解了总参谋部，详细了解了其优点和缺点、能力和专业知识，做出了最终的选择。他尽可能简化了作为国防人民委员的核心圈子的组织架构，并于 5 月 20 日通过了国防委员会的如下决定：

“战争初期，当国防人民委员部根据战争需求进行改组，当国防人民委员部各部门和军种的领导岗位上启用了新的负责人时，为了提升他们的权威，将他们任命为国防人民委员的副手，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而现在，当国防人民委员部已经适应了战争需求，且各部门负责人和军种指挥官已经积累了足够的经验和权威时，已经没有必要设置大量的副手，也没有必要为各部门负责人和军种指挥官保留国防人民委员部副部长的职位。

国防委员会决定：

1.国防人民委员部仅设两名副部长：第一副部长——苏联元帅朱可夫，总参谋部副部长——苏联元帅华西列夫斯基。

2.解除以下人员的国防人民委员部副部长职务：二级国家安全委员阿巴库莫夫同志、炮兵中将阿博连科夫同志、苏联元帅布琼尼同志、工程兵中将沃罗比约夫同志、炮兵元帅沃罗诺夫同志、上将戈利科夫同志、中将格罗莫达同志、空军上将日加列夫同志、陆军上将梅列茨科夫同志、空军元帅诺维科夫同志、通信兵上将佩列谢普金同志、苏联元帅铁木辛哥同志、坦克兵上将费多连科同志、军需兵上将赫鲁廖夫同志、苏联元帅沙波什尼科夫同志、上将沙德科同志、中将舍尔巴科夫同志，同时保留他们目前担任的各部门负责人、军种指挥官等职务。”

马林科夫立即利用了这种形势，认为此时恢复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的路线正当其时，即尽量减少党的机关对经济问题的干预，遏制它们无休止地想要凌驾于国家机关之上，以各种可能的方式和手段对其进行领导，却又在出现失败、未完成计划时不承担任何责任的倾向。

起初，格奥尔基·马克西米利安诺维奇采用了一种渐进式的改组方案。实际上，他重复了在改组军队党组织时所采用的决定。1943 年 1 月 19 日，他通过政治局做出决定，“为了加强铁路运输方面的统一指挥”，规定“铁路政治部门的负责人同时担任铁路政治副职”。2 月 18 日，为了解决同样的问题，政治局又通过一项决定，以类似的方式改组了海军、内河航运和国家内河航运总局的政治部门。

但对马林科夫来说，这一行动只是一次力量的试探。检验他在试图恢复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路线——国家经济管理结构最大限度的非党化方面能走多远。由于没有任何人提出意见，更不用说反对了，他继续有针对性地采取行动，试图尽可能充分地利用对他有利的形势。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斯大林不得不将全部精力用于解决主要问题——军事和国际问题。此外，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最终放弃了军事委员制度，他已经没有道德权利坚持在其他部门保留类似的结构。贝利亚也不得不勉强采取类似的立场，因为他的反对可能会被视为试图以迂回的方式恢复对军队的个人控制，从而对斯大林进行控制。而莫洛托夫，正如后来的事件所表明的，完全无条件地支持马林科夫，以实现自己的目标。

格奥尔基·马克西米利安诺维奇预计，即使不能得到其他政治局成员的积极支持，至少也能得到他们的中立态度，不过原因各不相同。安德烈耶夫是因为他已重病缠身，竭尽全力才能勉强完成在中央委员会和苏联人民委员会负责农业方面的唯一任务。沃兹涅先斯基、伏罗希洛夫和卡冈诺维奇是因为在经历了所有这些事情之后，他们无法再提出任何特殊的、独立的立场，更不用说与领导人的立场不同了。加里宁是因为长期以来一直因病只能履行纯粹

的代表、装饰性的职能。日丹诺夫和赫鲁晓夫是因为他们不在莫斯科。舍尔巴科夫是因为最终党的改组加强了他的地位，使他个人的地位变得非常重要。

正因为如此，马林科夫坚信自己的计划会成功，他大胆地开始实施改革的第二阶段。5月26日，他获得了政治局的批准，废除了最不重要的人民委员部之一——渔业人民委员部的政治部门。由于格奥尔基·马克西米利安诺维奇提出的建议毫无波澜地通过了，没有经过过多的讨论和质疑，5月31日，他又向政治局提交了另外两个类似的方案——关于废除机器拖拉机站和国营农场、铁路、海军和内河航运部门的政治部门的方案。这些方案的理由都是老一套："……政治部门的存在导致了管理方面的严重缺陷"，它们"重复了经理们的工作……从而降低了他们对工作状况的责任感"，"政治工作做得极不令人满意"。得到了预期的批准后，7月3日，马林科夫通过政治局做出了关于同一问题的第四项决定，废除了苏联人民委员会下属的国防工业建设总局各地区军事建设管理部门中仍然存在的最后一批政治部门。这一次，没有给出任何解释。

就这样，存在了大约十五年的临时、特殊、实际上独立的、部门性的党的机关不复存在了。这些结构脱离了地方党组织的章程控制。早在1939年3月，就曾预计要彻底放弃这些结构。

8月6日，马林科夫成功完成了他复杂、多步骤的策略。他通过政治局做出了一项对党的改组这一阶段来说实际上是决定性的决定：《关于市党委、州党委、边疆区党委、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工作的组织整顿》。他成功废除了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之后人为建立起来的一切，而这些东西唯一的存在理由就是战争危险的增加，以及采取一切可能措施提高国家防御能力的必要性。

"为了加强市党委、州党委、边疆区党委、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书记们对城市、州、边疆区、共和国工作状况的责任感，以及为了对市党委、州党委、边疆区党委、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领导工业和运输企业、集体农庄、机器拖拉机站、农业方面的工作进行组织整顿，联共（布）中央决定：

1.州党委、边疆区党委、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设三至五名书记，但不得超过五名。

2.取消市党委、州党委、边疆区党委、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现有的各行业书记职位，设立市党委、州党委、边疆区党委、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在工业、运输和农业各相应行业的副职职位。

3.规定书记副职同时担任市党委、州党委、边疆区党委、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相应行业部门的负责人。

4.书记副职的工资和物质待遇保持与各行业书记相同的水平。"

只有这样，纯粹从形式上，甚至带着明显的拜占庭风格，马林科夫才能克服在实现他所设想的、逐步但又不可避免地进行的国家机关非党化道路上的主要障碍。通过决定的第四点，他富有远见地避免了众多地方党的机关可能的普遍抗议和公开反对，为失去了有威望职位的官僚们保留了高薪和特权。他只剥夺了他们一样东西——那些使他们能够取代宪法规定的、合法的行政机关结构的职位。他们曾干涉经济事务，而且是以非常不专业的方式，因为他们并不具备相应的能力。虽然仍然保留了各行业部门，但从现在起，这些部门应该履行其直接职责：监督的不是企业、组织和机构的工作，而只是它们的党组织的工作。只从事党的组织、宣传、鼓动和人事工作。仅此而已，别无其他。

同样，在党的改组措施中，还应该提到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 5 月 15 日关于“自行解散”的决定。通常，这一事件被视为纯粹的国际工人和共产主义运动历史的一部分，但实际上，共产国际的解散完全是联共（布）中央的内部事务。在党的结构改革框架内，现在甚至没有必要在形式上保留一个早已不被任何人认真对待的、似乎凌驾于所有共产党之上（包括联共（布））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此外，在变化了的形势下，按照核心领导层所奉行的外交政策路线，即使是共产国际的名义上的存在也被认为不仅是多余的，而且是有害的。

因此，在 5 月 21 日批准准备在报纸上公布的关于共产国际命运的消息时，政治局还提到了一些没有打算公开的内容。

“……还有另一个动机，”决定中指出，“这一动机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提议中没有提及，那就是，兄弟共产党希望通过退出共产国际并解散它，摆脱敌人的不实指责，即他们似乎是按照一个外国国家的指示行事。他们希望以此剥夺敌人的一张王牌，从而使他们在群众中的工作更容易开展……”但不应认为这里所说的“敌人”仅仅指德国及其卫星国。同样也包括苏联的盟友——英国和美国、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以及其他反希特勒联盟的国家。

随着共产国际的解散，莫洛托夫完全能够将所有外交政策问题的筹备工作集中在自己手中，这些问题将提交给核心领导层批准。唯一似乎被剥夺的是机密信息，也就是情报信息。这些信息他只能从斯大林那里获得，而国防人民委员从阿巴库莫夫那里直接得到这些信息，绕过了中央委员会机关的任何中间人。然而，借助马林科夫的帮助，莫洛托夫很快就克服了这一障碍。1943 年 12 月 27 日，在莫斯科保留的已不复存在的共产国际的结构基础上，成立了联共（布）中央对外联络部，由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领导。而对这个新部门的监管，换句话说，就是领导工作，委托给了莫洛托夫。现在，通过那些古老而有效的秘密渠道，他也开始收到所有他急需的关于国外政治局势的信息。

通过这样的行动，马林科夫成功地向所有人，包括核心领导层和地方党的官僚们证明，只有他完全掌控着党的机关，能够控制和引导它。因此，8 月 6 日他在中央委员会的官方地位发生变化也就完全顺理成章、自然而然了。他从实际上的第二书记地位转变为法律上的第二书记地位。当天政治局批准的决定规定：

“1.除了现有的工作外，联共（布）中央书记马林科夫同志还承担以下职责：每天处理州党委、边疆区党委、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问题，检查他们的工作，在联共（布）中央书记处和组织局召集并听取州党委、边疆区党委、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的汇报，根据检查结果做出必要的决定和实际措施，以纠正发现的不足之处并改进地方党组织的工作，并通过联共（布）中央书记处和组织局执行这些决定和措施。书记处和组织局的会议由马林科夫同志主持。

2.在听取汇报和检查州党委、边疆区党委、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时，主要关注以下方面：

-根据农业工作的结果了解农业的状况，同时考虑州党委、边疆区党委、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提高每公顷农产品总产量方面取得了哪些成就，国家采购计划的执行情况如何，以及采取了哪些措施来提高集体农庄和集体农庄庄员的收入；

-工业和运输企业的国家计划执行情况问题，以及了解州党委、边疆区党委、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改善工人的食品供应、公共饮食和住房生活条件方面的工作成果；

-农村和城市居民中的政治和文化工作问题，特别是改善地方报纸和杂志工作的问题。

3.在检查党的州党委的工作时，特别关注从德国占领下解放出来的地区和区域，考虑到尽快恢复经济和改善这些地区和共和国劳动人民中的政治工作的任务。”

这项决定不仅使马林科夫正式成为党内的第二号人物——这一点从决定的第一点内容可以看出。它还将核心领导层大多数成员（安德烈耶夫、沃兹涅先斯基、卡冈诺维奇、米高扬、萨布罗夫）的苏联人民委员会的工作置于格奥尔基·马克西米利安诺维奇的直接控制之下。此外，它还为所有党组织确定了全新的目标，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份类似短期纲领的文件。它要求的不是取代或（最好的情况下）重复苏联人民委员会、加盟共和国人民委员会、市、州、边疆区执行委员会等机构的活动，而是完全不同的事情。它要求每天关心人民。关心那些用自己的劳动创造了一切的人们。在国家最危险、最关键的时期支持着国家的人们。他们养活、穿衣、武装军队，为打败敌人做出了贡献。它要求关心让集体农庄庄员（妇女、老人、儿童）的辛勤劳动最终能够得到应有的回报。

这种新的规定绝不是普通的宣传性民粹主义言辞。它与国家经济转入战时轨道以及因占领而造成的破坏所导致的必然结果有关。配给制度的后果——这是最严重短缺的表现，生活最必需的东西（首先是食物、衣服、燃料）的匮乏。早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就出现的短缺，在战争期间首先催生了黑市，而各种仓库、商店成为了黑市的主要（如果不是唯一）来源。这导致了贸易和供应系统中的掠夺和浪费，而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米高扬对此负责。这些问题已经达到了如此可怕的程度，以至于仅在 1943 年，国防委员会就不得不在 1 月 22 日和 5 月 22 日两次做出相应的决定。不幸的是，后来的情况表明，这些决定对于根除如此严重的弊病毫无作用。同样，根据 1942 年 1 月 2 日苏联人民委员会《关于利用当地原材料生产大众消费品和食品的决定》，试图通过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团下属机构的力量来克服物资短缺的努力，以及其他类似的尝试，也同样毫无成效。

至于政治局 8 月 6 日决定中最实质性的第三点内容，两周后，它在 8 月 21 日苏联人民委员会和联共（布）中央的一项特别的、全面的联合决定《关于在从德国占领下解放出来的地区恢复经济的紧迫措施》中得到了进一步阐述和详细说明。这项决定从未公开过，因此除了通常被删去的最后一点之外，人们都很熟悉。执行该决定的任务被交给了苏联人民委员会下属的一个专门成立的委员会，该委员会由马林科夫领导，成员包括贝利亚、米高扬、沃兹涅先斯基和安德烈耶夫。

最后，还有一个非常有说服力的事实，充分表明了马林科夫在国内已经无可争议地处于第三重要的地位。由于苏联代表团即将出发参加德黑兰会议（这是三大强国的首次会议），1943 年 11 月 22 日，政治局委托“由马林科夫同志（召集人）、卡冈诺维奇同志和舍尔巴科夫同志组成的联共（布）中央和苏联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人民委员会委员会，在斯大林同志、莫洛托夫同志、伏罗希洛夫同志和贝利亚同志离开莫斯科期间，领导党内和国家事务”。预计，在完成任务返回首都后，米高扬、安德烈耶夫、沃兹涅先斯基，以及如果康复的话，日丹诺夫也将加入到马林科夫这个类似“临时政府”的团队中。

重大的变革波及了苏联政治领导层的各个层面。这些变革绝不仅仅局限于出现了新的“三巨头”——斯大林、莫洛托夫、马林科夫，也并非仅仅归结于此。它们反映在所有处于权力高层（包括第二和第三层级）的人的地位上。

尽管看起来有些矛盾，但在 1943 年年初，2 月 26 日，卡冈诺维奇借助政治局的力量，重新获得了交通人民委员的职位。显然，事实证明，这是他唯一熟悉、掌握且理解的工作领域。在相对恢复正常的情况下，出于惯性，他也只能勉强胜任这一工作。在这一任命过程中，军事运输这一拉扎尔·莫伊谢耶维奇工作中最为关键的部分仍处于赫鲁廖夫和科瓦列夫的控制之下，这一点也起到了重要作用。斯大林没有完全将卡冈诺维奇排除在领导活动之

外，从而避免他彻底脱离政治精英阶层。他迫切需要一个对自己绝对忠诚、对自己感恩戴德、在任何情况下都会支持自己的人，哪怕只是多一张支持自己的选票。

出于同样的原因，为了确保在任何情况下都能获得一张支持自己的选票，斯大林在核心领导层中保留了伏罗希洛夫。诚然，在经历了所有这些事情之后，他只能在 1943 年 4 月 19 日给伏罗希洛夫一个公开的名义上、纯粹形式上的职位——国防委员会战利品委员会主席。更准确地说，根据明确的隶属关系，在国防人民委员部的结构中，也就是他自己的人民委员部中。他让伏罗希洛夫负责的与其说是国防人民委员部战利品武器、物资和废金属管理局的前线和军队部门，以及其各个旅和营，不如说是设在莫斯科的中央文化休息公园内的战利品技术博物馆展览。

从 1943 年 11 月 11 日起，安德烈耶夫的处境与卡冈诺维奇非常相似。根据政治局的决定，他被赋予了农业人民委员的职责，同时将该部门的前任负责人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贝涅迪克托夫降职为第一副部长。这样一来，从现在起，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不仅要与其他人一起为农业工作操心，还要亲自对其负责。然而，应该承认，在很大程度上，1942 年 12 月 6 日苏联人民委员会和联共（布）中央的联合决定减轻了他的这种“责任”，该决定由斯大林和安德烈耶夫共同签署。该决定禁止“收集集体农庄实际粮食产量的数据，因为这些数据会歪曲实际情况”。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完全虚假的统计方式——“在收获开始前由中央统计局进行的目测评估”（着重号为我所加——Ю. Ж.）。

正如前面所提到的，沃兹涅先斯基再次遭遇了失败。在经历了迅速崛起、达到国家二号人物的高位之后，他的活动范围再次像他快速晋升初期那样，被限制在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内，而该委员会也失去了一些以前的重要性。然而，他以前的副手兼继任者萨布罗夫却相反，地位急剧上升。摆脱了在实际上受国防委员会控制的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工作后，他成为了苏联政府主席名副其实的副手，而不仅仅是在职位上。柯西金也得到了同样程度的信任。1943 年 6 月 21 日，他被任命为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之一，同时还担任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主席，这极大地扩大了他实际的权力范围。

尽管经历了短暂的挫折，两位“工业巨头”——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马雷舍夫和别尔乌辛仍然保持了以前的重要地位。

1942 年 7 月 1 日，根据政治局的决定，马雷舍夫被解除了他所担任的两个职务之一——坦克工业人民委员的职务。由于未能完成 6 月份 T-34 坦克的生产计划，他被撤职，取而代之的是基洛夫工厂的厂长伊利亚·米哈伊洛维奇·扎尔茨曼。这一决定及其理由显然是编造的。其目的只有一个——展示以前核心领导层表面上的绝对权威，当时政治局就是这种权威的代表。这至少是对负责坦克生产的莫洛托夫的一种间接打击，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提升沃兹涅先斯基的威望。惩罚的象征性、甚至是表面性，以及其真正目的，都可以从以下事实得到证实：马雷舍夫仍然保留了一个更重要的职位——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从 9 月 19 日起，他“监督”着三个在战争时期同样重要的人民委员部的工作：重型机械制造人民委员部、电力工业人民委员部和通信人民委员部。挫折，更准确地说，制造出挫折的假象，持续了整整一年。1943 年 6 月 26 日，现在由国防委员会而不是政治局做出的决定，恢复了马雷舍夫坦克工业人民委员的职位。在这种情况下，权力机构的博弈并没有给沃兹涅先斯基带来明显的好处。

别尔乌辛也成为了这种精心策划的阴谋的对象。1942 年 10 月中旬，根据苏联人民委员会的决定，也就是以斯大林的名义，他被解除了“在苏联人民委员会监督煤炭工业人民委员部、中央林业化学工业管理局和电站人民委员部工作的职责，以及在苏联人民委员会负责准备燃料和能源供应计划并对其执行情况进行实际控制的当前工作”。解除的这些职责，正是在国防委员会职责分配时属于沃兹涅先斯基负责的范围，也是沃兹涅先斯基打算在没有他认

为是马林科夫的干涉和监视的情况下开展的工作。但同样，就像马雷舍夫的情况一样，完全排除别尔乌辛是不可能的。他保留了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化学工业人民委员以及“监督橡胶工业人民委员部工作”的职位。这是斯大林对被迫同意将伏罗希洛夫和卡冈诺维奇排除在外的回应，显示了一种平衡的策略。然而，对于别尔乌辛本人来说，这个决定却意外地对他有利，因为不久之后，他被委以监督原子弹项目工作的重任。

在芝加哥首次实现世界上可控核链式反应的前五天，1942 年 11 月 27 日，国防委员会通过了一项决定，开启了苏联原子弹的研制工作——《关于铀的开采》。该决定要求：“1. 到 1943 年 5 月 1 日，在‘B’工厂（主要稀有金属管理局下属的塔博沙尔工厂）组织铀矿的开采和加工，每年生产四吨铀盐……3. 在资金投入、设计建设、工资支付、物资技术和食品供应方面，将‘B’工厂等同于特别重要用途的建设项目……4. 责成苏联科学院辐射研究所（由赫洛平院士负责），并吸引萨马拉化肥和昆虫真菌研究所以及乌拉尔有用矿物机械加工研究所，在 1943 年 2 月 1 日前，制定出从塔博沙尔铀矿中提取铀精矿并对其进行加工以生产铀盐的工艺流程方案。5. 苏联人民委员会地质事务委员会（由马雷舍夫同志负责）在 1943 年开展寻找新铀矿的工作，并最迟于 1943 年 5 月 1 日向苏联人民委员会提交第一份报告……”该决定由莫洛托夫签署。

仅仅过了两个半月，1943 年 2 月 11 日，在“曼哈顿计划”的参与者接近研制出原子弹（当时原子弹的研制仍存在不确定性）之前很久，国防委员会又出台了一项新的决定。这次的决定旨在“更成功地推进铀相关工作”。为了实现这些目标，做出了如下规定：

“1. 委托米哈伊尔·格里戈里耶维奇·别尔乌辛同志和谢尔盖·弗拉基米罗维奇·卡夫塔诺夫同志承担日常领导铀相关工作的职责，并向苏联科学院原子核特别实验室提供系统的帮助。2. 铀相关工作的科学指导委托给伊戈尔·瓦西里耶维奇·库尔恰托夫教授。3. 允许苏联科学院主席团将原子核特别实验室的一组工作人员从喀山转移到莫斯科，以完成铀相关工作中最重要的部分……9. ……确保用飞机将苏联科学院的 5 名工作人员和总重量不超过 1 吨的设备从埃里温运往莫斯科。10. 责成列宁格勒苏维埃（由波波夫同志负责）拆卸并将列宁格勒物理技术研究所的设备和回旋加速器运往莫斯科。11. 责成原子核特别实验室主任伊戈尔·瓦西里耶维奇·库尔恰托夫教授在 1943 年 7 月 1 日前进行必要的研究，并在 1943 年 7 月 5 日前向国防委员会提交一份关于制造铀弹或铀燃料可能性的报告。”

同样是这项决定，给许多人民委员部（黑色冶金人民委员部、中型机械制造人民委员部、电力工业人民委员部、有色冶金人民委员部、财政部）下达了紧急特别任务：在 1943 年 3 月 1 日至 5 月 15 日期间，为库尔恰托夫实验室制造并交付所有必要的设备和原材料。同样，这份如此重要的文件不是由斯大林签署，而是由莫洛托夫签署。

第十二章

在两年半的时间里，苏联高层权力机构中发生的所有极其重要的人事变动，伴随着意外的起伏，总体而言，并非苏联所独有。归根结底，所有这些变动都属于任何一个国家常见的政府任命的传统范畴。这些人事变动旨在决定个人的职业生涯，以及更自然的任务：根据不断变化的情况，制定和实施内外政策方针。尤其在战争的极端条件下，还要凝聚全国的力量，以击败敌人，战胜侵略者。

对于苏联的核心领导层而言，只有一个特殊的问题——去党派化艰难地推进着。当然，随之而来的，作为其逻辑延续以及对意识形态进行逐步重新审视的必要性，即对意识形态进行调整。这种调整是潜移默化的，绝不是激烈的、激进的。实际上，几乎只有两个人要为这项工作的成果负责。他们是联共（布）中央书记、莫斯科市委和莫斯科州委第一书记、红军总政治部主任阿列克谢·谢尔盖耶维奇·舍尔巴科夫，以及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部长格奥尔基·费奥多罗维奇·亚历山德罗夫。将这些新举措付诸实践、不断阐释和说明新规定，并监督其严格执行的，是宣传鼓动部人数不多的机关工作人员。而大众媒体、战争爆发后成立的创作联盟，如看似社会组织但隶属关系和地位不明确的苏联新闻局（简称苏新局）、苏联妇女反法西斯委员会、青年反法西斯委员会、学者反法西斯委员会、犹太反法西斯委员会等，则成为了推动工作的力量。

从表面上看，无论是对全国人民还是对普通党员来说，这些变化都是悄无声息地发生的。变化始于一些细微之处，起初人们并没有特别关注。大家认为这些都是完全正常的，没有引起任何怀疑或疑问。1941 年 11 月 6 日，斯大林在纪念十月革命 24 周年的庄严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到了伟大的俄罗斯民族，并提及了其杰出代表苏沃洛夫和库图佐夫。11 月 7 日，他还呼吁人们“以我们伟大的祖先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德米特里·顿斯科伊、库兹马·米宁、德米特里·波扎尔斯基、亚历山大·苏沃洛夫、米哈伊尔·库图佐夫的英勇精神为榜样”。这些话是在苏联命运最悲惨的时刻说出的，当时敌人已经兵临莫斯科城下，国家的自由与独立面临着生死存亡的抉择。

然而，这些话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只是说说而已。它们虽然每天、每时都被用于宣传，但仅仅停留在宣传层面。不过，这些话落在了早已准备好的土壤上。因为在战争爆发前不久，苏联的电影院放映了几部电影，数百万观众观看了这些影片，如《亚历山大·涅夫斯基》（1938 年，导演谢尔盖·爱森斯坦，编剧彼得·帕夫连科）、《米宁和波扎尔斯基》（1939 年，导演弗谢沃洛德·普多夫金，编剧弗拉基米尔·什克洛夫斯基）、《苏沃洛夫》（1941 年，导演弗谢沃洛德·普多夫金，编剧格里戈里·格列布纳和尼古拉·拉维奇）。诚然，当时这些电影从意义上来说是公然的国家爱国主义电影，歌颂的是俄罗斯军队而非苏联军队的英雄主义和力量，表达的是对任何敌人（无论他们是谁）的仇恨，针对的是祖国的敌人而非社会主义制度。为了平衡这些电影，当时还放映了其他具有不同意识形态负载但同样受欢迎的电影，如《夏伯阳》（1934 年，导演和编剧为瓦西里耶夫兄弟）、《肖尔斯》（1939 年，导演和编剧为亚历山大·杜甫仁科）。此外，1941 年底，库克雷尼克塞创作了战争时期最受欢迎的海报之一。这张海报试图在大众意识中建立起这个国家所有著名将领之间的某种遗传联系，因为它配有萨穆伊尔·马尔夏克意义非凡的诗句：“我们英勇奋战，疯狂拼搏——苏沃洛夫的子孙，夏伯阳的后代。”

只有当苏联再次面临战败、输掉战争的危险，当德国师团抵达伏尔加河，斯大林格勒战役打响时，这些话才开始付诸实践。1942 年 7 月 21 日，政治局批准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关于设立三个新勋章以奖励红军指挥人员的命令草案——苏沃洛夫勋章、库图佐夫勋章和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勋章。[362]这样的举措的真正本质并不在于出现了新的战斗勋章。毕

竟，这并没有什么新奇之处，苏联的勋章已经存在了四分之一世纪。然而，直到那时，这些勋章总是在其名称中体现、承载着苏联制度的象征意义，体现了它与沙皇制度的区别。勋章名称中必定包含“红旗”这一称号——如战斗红旗勋章、劳动红旗勋章、红星勋章，还有党的领袖和革命领袖的名字——列宁勋章。最后，后来出现的、国内最高级别的勋章，其名称也同样公然地带有意识形态色彩，如苏联英雄的“金星奖章”或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的奖章。

而现在，出现了一系列原则上不同的战斗勋章，这些勋章在语义上与旧制度相关联，而就在不久前，旧制度还被视为反人民的、专制的。在斯大林格勒战役和库尔斯克会战胜利后，又增设了四枚勋章，延续了这一趋势：1943 年 10 月 10 日设立了博格丹·赫梅利尼茨基勋章，1944 年 3 月 3 日设立了乌沙科夫勋章和纳希莫夫勋章，此外，还为列兵、中士和上士设立了三个等级的“光荣”勋章，这一勋章重复了革命前的圣乔治勋章的标志——下级军官的乔治十字勋章。

再次强调，这种当时仍如暗流涌动般的趋势，得到了宣传电影《库图佐夫》（1944 年，导演弗拉基米尔·彼得罗夫，编剧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的支持，同时，另一部关于国内战争英雄的电影《科托夫斯基》（1943 年，导演亚历山大·费因齐默尔，编剧亚历山大·卡普勒）也在意识形态上对其进行了平衡。但现在，历史题材电影的比例明显不利于“苏联”题材的电影。

绝非偶然的是，正是苏联的胜利之师成为了基础，在这基础之上，十月革命前被摒弃了二十多年的传统开始复苏，尽管目前这种复苏只体现在象征和标志上。乍一看，这似乎微不足道，但恰恰是在 1917 年，从 3 月开始，整个这一年成为了人民对已经覆灭的旧制度，尤其是对数百万士兵和水兵群体所厌恶的旧制度的表达，也成为了革命的顶点。在军队分裂为“红军”和“白军”之前，“金色肩章”一直是对沙皇制度、君主制忠诚的主要标志，而无论是支持布尔什维克的人，还是乌克兰和波罗的海地区的民族主义者，都同样厌恶它。在革命和国内战争的几年里，肩章象征着属于某个政治阵营。而现在，政治局完全无视旧的苏联“阶级”象征，公然摒弃它，于 1943 年 11 月 23 日批准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关于引入肩章的命令草案。[363]根据军种和所属武装部队的不同，肩章有金色和银色之分，宽肩章和窄肩章之别。肩章上有革命前的装饰和小星星，取代了人们熟悉的带有“三角形”“方块”“剑形”标志的肩章。

而几乎完全、全面地复兴曾经存在但尚未被遗忘的帝国军队传统的标志，是根据 1943 年这个转折之年 8 月 21 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命令，为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设立苏沃洛夫学校，为苏联海军人民委员部设立纳希莫夫学校。这也是对革命前就已存在的为青少年设立的军校生军团的复兴。对于那些尚未达到应征年龄的人来说，这些学校为他们提供了接受带有军事倾向的中等教育的机会。

这些已经进入教育领域的改革，也完全有理由被称为“反改革”，但改革并不仅限于此。1943 年 7 月 17 日，政治局批准了不久前重新组建的联共（布）中央高等院校和学校部门提出的建议，恢复了革命前的男女分校制度，即在现在的男子和女子初等、不完全和完全中等学校中实行单独教学。[364]此外，对于女学生，还引入了必修制服，这套制服几乎在细节上模仿了女子中学的制服。

对外部统一的这种意外且看似毫无缘由的偏好，以及对早已被遗忘的、既符合职位又与几乎所有部门所设定的军衔、职务相匹配的区别标志的使用，成为了 1943 年的一个显著特征。正是在那时，人们突然觉得，仅仅军队、海军、内务人民委员部和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等军事化部门拥有作为合理甚至必要属性的制服和区别标志是不够的。而且，和世界上其他地方一样，民用航空总局、内河航运总局、海军人民委员部和内河航运人民委员部也有制服和标志。人们认为这种传统的状况明显不足，并开始将其推广到纯粹的民用部门。

同样，根据政治局的决定，5 月 28 日为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引入了制服和军衔，9 月 16 日为苏联检察院引入了制服和军衔。[365]大约在同一时间，苏联交通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制服上原本不起眼的肩章，上面带有外人难以理解的区别标志，被结构复杂的肩章所取代，肩章上同样有那些小星星。而且，不仅交通人民委员部的实际工作人员必须穿着这种半军事化的制服，所有与之相关的人员，包括该人民委员部门诊部的医生，也都必须穿着。

这样一来，其工作人员被迫按规定穿着带有相应等级区别标志制服的部门数量，仅在半年内就从 8 个增加到了 11 个。但这项新举措，表面上恢复了国家官员的特殊地位，将他们从所有人中区分出来，从形式上看是恢复了十月革命废除的官职和军衔，实际上还有另一个，而且是主要的、更重要的意义。无论是制服，还是肩章、肩章带、袖子上的臂章等形式的区别标志，都只引入到了联盟人民委员部。这些标志应该只区分出这些部门的工作人员。特别是那些中央政权所依靠的人，那些联盟政府意志的执行者。这些标志应该直观而有力地展示莫斯科的至高无上、其代表的强大权力和特殊权限，无论他们身在何处。要始终在生活的各种情况下强调国家的单一性，尽管根据宪法，国家是联盟制的。

自然而然，这样的变化必然会反映在意识形态上。体现在意识形态缓慢、不易察觉的转变、演变，最终是重生上。为此，必须尽可能地最大限度利用旧事物中所有以前被摒弃、被无条件谴责的东西，但在新的情况下，随着政策的转变，这些东西可能会发挥良好的作用。其中一种手段，能够在道德上让社会为即将到来的变革做好准备，尽管核心领导层中没有人能想象到变革的规模和结束时间，这就是一种非常独特的结构。从本质上说是意识形态的，从方向和地位上说是民族国家性质的。而且，它还是一个严格、垂直、结构上等级森严的组织，并且拥有传统的制服——俄罗斯东正教会。

……从国内战争开始，苏联政权考虑到国内人口的识字率极低，以及人口的多样性、多民族性和多宗教性，还有几个世纪以来形成的传统、习惯，甚至日常生活的日历，试图自上而下地进行一种特殊的改革。它对信徒数量最多、同时又保留着最古老的、类似于早期封建主义时期结构的教会——天主教和俄罗斯东正教会，施加了最大程度的压力。它公开迫害既非法的（实际上也是如此）“地下”东正教会，也迫害明显具有政治性、公然反苏的组织——国外的东正教会。但与此同时，它又在一定程度上支持、庇护了从俄罗斯东正教会分裂出来的东正教革新派（“现世”）教会，其创始人是亚历山大·韦坚斯基。实际上，它基本不干涉路德会、浸信会、门诺派以及其他不太普及的新教教会的教区生活。

然而，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这种政策被摒弃、被遗忘了。取而代之的是“战斗的无神论”，伴随着所有宗教的教堂建筑被大规模关闭，神职人员、修道士、大主教被逮捕、流放，大多数以前颁发的允许教区存在的许可被取消，而当时这些教区是作为法人存在的。直到 1943 年，对宗教和信徒的政策才发生了同样剧烈的转变。在国家和教会之间长达四分之一世纪没有任何关系、没有任何联系之后，情况几乎在一瞬间、以最根本的方式发生了变化。而这绝非与俄罗斯东正教会表达的忠诚和爱国情感无关。这些情感被听到了、被理解了、得到了恰当的评价，并得到了利用。

1941 年 6 月 22 日，莫斯科和科洛姆纳的都主教谢尔盖，即俄罗斯东正教会的实际领袖，撰写并向所有教区发出了《致东正教基督徒的牧羊人和羊群》的呼吁书。他祝福“所有东正教徒保卫我们祖国的神圣边界”。他不断提醒他们有责任以“俄罗斯人民的神圣领袖”——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和德米特里·顿斯科伊为榜样。他强调、灌输说，“拔都、德国骑士、瑞典国王卡尔、拿破仑的时代又回来了”，“基督教东正教的可憎后代们想再次尝试让我们的人民在不公正面前屈服，用赤裸裸的暴力迫使他们牺牲祖国的财富和完整，违背对祖国热爱的神圣誓言”。在结尾，他表达了坚定的信念：“上帝会赐予我们胜

利。”[366]总之，他的言辞和内容在很大程度上模仿了斯大林在 11 月 6 日和 7 日讲话中的历史部分的修辞和内容。

俄罗斯东正教会的教区居民和神职人员积极参与为国防基金募捐，不断见证纳粹占领者的野蛮行径，见证他们对平民的残忍，对教堂、大教堂、修道院的无意义破坏，以及对信徒的神圣场所的亵渎。考虑到在西方，尤其是在英国和美国，仍然存在的关于苏联迫害宗教的说法（纳粹宣传也在利用这一说法，而且总体上并非毫无根据），俄罗斯东正教会迅速准备并在 1942 年夏天出版了一本显然主要针对国外读者的文集《俄罗斯宗教的真相》，自然，它只收集了证明正是因为苏联政权对俄罗斯东正教会的善意态度，俄罗斯东正教会才得以自由存在并开展活动，而且没有遭受任何所谓迫害的证据。

俄罗斯东正教会在苏联绝大多数基督徒中仍然具有强大的影响力，从战争第一天起就采取的坚定爱国立场，不仅导致政权对它的意识形态压力大幅减轻，还促成了一项协议的签署。

1943 年 8 月下旬，当时疏散到乌里扬诺夫斯克的都主教谢尔盖（自 1925 年去世的牧首吉洪之后，他是牧首宝座的实际占据者），以及列宁格勒和拉多加的都主教阿列克谢、基辅和加利西亚的都主教尼古拉被紧急召到莫斯科。9 月 4 日深夜，他们被邀请到克里姆林宫。在那里，他们与斯大林、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利亚，以及当时不太知名的官员之一格奥尔基·格里戈里耶维奇·卡尔波夫进行了谈判，谈判结果不仅让不久后得知此事的全国人民感到意外，而且对俄罗斯东正教会非常有利。

苏联政府和俄罗斯东正教会达成了一项协议，规定立即、在最短时间内确立俄罗斯东正教会作为半官方机构的地位。协议要求在最近几天内召开第二届地方宗教会议，选举莫斯科和全俄罗斯的都主教谢尔盖为牧首。协议还规定开放许多以前不活动的大教堂和教堂、神学院和几所修道院，出版《莫斯科牧首区杂志》，释放被关押的大主教，在俄罗斯东正教会下开设蜡烛工厂，甚至规定了必要的国家财政补贴。最后，为牧首提供了位于莫斯科市中心（清洁胡同，5 号）的一座三层别墅作为官邸，这座别墅在战争开始前是德国驻苏联大使舒伦堡的住所。[367]

此后，事件发展得异常迅速。9 月 5 日，《消息报》报道了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与都主教们的会面以及达成的协议，仅仅三天后，宗教会议就选举谢尔盖为牧首。然而，俄罗斯东正教会始终没有获得完全的自主权，即使在其内部事务中也没有完全独立。如同彼得一世时代直到十月革命时期一样，它受到一个世俗机构的严格监督，这个机构实际上取代了以前的宗教会议（宗教事务部）。根据联盟人民委员会 9 月 14 日的决定成立的俄罗斯东正教会事务特别委员会，承担着“在苏联政府和牧首之间建立联系”的任务。委员会主席仍然是积极参与筹备、组织和高层会面以及宗教会议的格奥尔基·格里戈里耶维奇·卡尔波夫。[368]随后，在几个月内，悄无声息地解散了“革新派”，让他们“回到教会母亲的怀抱”。

反过来，俄罗斯东正教会继续表现出忠诚和努力。例如，从 1945 年开始出版的《东正教教会日历》中，除了宗教节日外，无疑还包括世俗的、更确切地说是明显的苏联节日：1 月 22 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纪念日和 1905 年 1 月 9 日”；2 月 23 日——“红军和海军节”；3 月 8 日——“国际共产主义妇女节”；5 月 1 日和 2 日——“劳动者武装力量阅兵日”；11 月 7 日和 8 日——“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周年纪念日”；12 月 5 日——“斯大林宪法日”。[369]

另一个虽然不太明显、规模较小的迹象，表明苏联逐渐放弃的与其说是旧的意识形态路线，不如说是这种路线以“个人崇拜”形式表现出来的过于恶劣的表现，这就是城市和铁路的又一次更名。如果说在 20 世纪 20 年代和 30 年代，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试图将苏联政治领

导人的名字永远铭刻在人民的记忆中，那么现在的做法则完全相反。人们开始删除这些姓氏。根据政治局 9 月 3 日的决定，谢尔戈市（伏罗希洛夫格勒州）恢复了原来的名称卡季耶夫卡，奥尔忠尼启则市（斯大林州）恢复为叶纳基耶沃，卡冈诺维奇市（伏罗希洛夫格勒州）恢复为波帕斯纳亚。9 月 13 日，同样根据政治局的决定，一些铁路也被更名：卡冈诺维奇铁路更名为斯维尔德洛夫铁路，伏罗希洛夫铁路更名为北高加索铁路，莫洛托夫铁路更名为外贝加尔铁路，贝利亚铁路更名为外高加索铁路，捷尔任斯基铁路更名为莫斯科-库尔斯克铁路，列宁铁路更名为莫斯科-梁赞铁路。[370]最后，1943 年 5 月 31 日，海军也进行了类似的行动。“马拉特”号战列舰更名为“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巴黎公社”号战列舰更名为“塞瓦斯托波尔”号。[371]

从以前的阶级和国际主义立场“缓慢地”转向全民的、国家民族主义的立场，在苏联新国歌中得到了某种形式的终结。1943 年 10 月 28 日，政治局以谢尔盖·米哈尔科夫和叶尔·雷吉斯坦创作的歌词版本以及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夫创作的音乐版本为基础，通过了新国歌。[372]当天，核心领导层承认，《国际歌》，作为共产国际及其各支部（各国共产党）以及苏联的共同国歌，现在“从其内容来看，已无法反映我国发生的根本性变化”。[373]从现在起，苏联主权的两个象征之一不再是呼吁“饥饿者和奴隶们”在殊死搏斗中推翻资本主义，而是赞颂苏联的力量，歌颂祖国和斯大林，以及国家胜利之师的力量。此外，国歌还赞颂了“牢不可破的联盟”，它“永远团结了伟大的俄罗斯”。1941 年 11 月 6 日开始的这句话，在 1944 年 1 月 1 日凌晨首次通过广播响起的新国歌中得以延续，而新国歌在稍晚些时候，从 1944 年 3 月 15 日起开始在各地传唱。

就这样，仅仅几个月的时间里，有着数百年历史的、真正的俄罗斯国家民族主义或民族国家意识之树不仅成长起来，而且变得更加坚固，枝繁叶茂。曾经与专制制度划等号、被坚决谴责为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相矛盾的、二十多年来一直被坚决批判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旧官方意识形态，再次成为了现实，尽管目前只是在表面上、在一些个别方面。显然，这种明显的不和谐，这种已经变得过于明显的矛盾，需要以某种方式消除、缓和，如果不能完全消除的话。在不放弃社会主义理想的前提下，要努力减少这些理想与日常生活中不可阻挡地涌现出来的新事物之间的冲突。

自 1941 年深秋以来悄然进行的这些潜在变化，迟早会在散文、诗歌、戏剧、电影中得到体现。在这些对大众意识产生长期影响的主要手段中，党将其视为极其重要的宣传和鼓动工具并非偶然。这些艺术形式比新闻报道、海报、漫画更有意义，后者虽然能迅速对一时的愤怒做出反应，但也同样容易在事件过去一周左右后，随着事件的消逝而毫无希望地过时，并完全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但要实现这一点，就需要消除由事件自然发展所引发的不可避免的冲突——这次没有既定的任务，也没有预先制定好的准则。无论是宣传鼓动部的领导舍尔巴科夫、亚历山德罗夫，还是创作联盟，或是艺术委员会、电影委员会，无论他们多么希望，都无法号召文学艺术工作者遵循中央委员会的具体指示，依据斯大林在某篇讲话中明确表达的立场。因为官方上并没有人重新审视意识形态路线。

另一方面，作家、剧作家、诗人、导演们，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已经习惯了、适应了党的教条，在没有得到任何“宝贵指示”的情况下，还没有理解这些变化，也无法自行调整。有太多因素阻碍了他们。创作过程本身的特殊性——情节和形象的缓慢、长期成熟，以及一部完成的作品从创作到与读者、观众见面所经历的复杂、长达数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创作联盟、委员会和编辑部的官员、艺术顾问和审查机构常常成为难以逾越的障碍。

因此，调整过程是由“自下而上”巧妙地发起的。新的思想、观点、概念并非由任何人的意志强加，而是仿佛自然而然地产生。创作者们在 1943 年 3 月至 1944 年 1 月期间举行的作家、作曲家、艺术家、剧作家、艺术史学家、电影工作者会议上表达了这些想法。

1943 年 1 月，《文学与艺术》报（战争开始后，该报在亚历山大·法捷耶夫的编辑下，合并了《文学报》和《苏联艺术》）发起了一场广泛的宣传俄罗斯爱国主义的运动。这场运动以作家阿列克谢·托尔斯泰和伊利亚·爱伦堡、音乐学家和作曲家鲍里斯·阿萨菲耶夫、艺术家亚历山大·格拉西莫夫和伊戈尔·格拉巴尔的文章拉开序幕。后来，又陆续发表了作曲家弗拉基米尔·扎哈罗夫和阿纳托利·诺维科夫、艺术史学家阿布拉姆·叶夫罗斯和亚历山大·费多罗夫-达维多夫的评论。官员们，即全联盟委员会的主席们：艺术委员会主席米哈伊尔·鲍里索维奇·赫拉普琴科、电影委员会主席伊万·格里戈里耶维奇·博尔沙科夫，只是偶尔在会议上重复他们的观点。正是他们，在 1943 年上半年，共同宣布了爱国主义在文学和艺术中的首要地位。但此时的爱国主义已不再是最初的苏联爱国主义，而是俄罗斯爱国主义。同时，他们也坚决谴责了对国外的奴颜婢膝——即世界主义。

阿列克谢·托尔斯泰在《苏联文学的四分之一世纪》中写道：“到目前为止，关于西欧文学对俄罗斯文学的单方面影响的观点仍未被打破……那么，关于俄罗斯文学对西欧和美国文学的影响的研究在哪里呢？关于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列夫·托尔斯泰，尤其是契诃夫对西欧和美国文学的影响的研究又在哪里呢？”（1 月 1 日和 1 月 9 日第 1 期和第 2 期）

普列多夫在《论俄罗斯民族自豪感》中写道：“俄罗斯民族为自己的伟大、强大、富饶而自豪，为自己的祖国从白海延伸到黑海，从波罗的海延伸到太平洋而自豪，为自己孕育出了列宁和斯大林、别林斯基和车尔尼雪夫斯基、普希金和托尔斯泰、格林卡和柴可夫斯基、高尔基和契诃夫、谢切诺夫和巴甫洛夫、列宾和苏里科夫、苏沃洛夫和库图佐夫这样的巨人而自豪，为自己的民族文化、科学、艺术、文学对人类精神发展产生了并正在产生巨大影响而自豪……文学艺术工作者的最重要任务之一，是培养全体苏联人民对俄罗斯民族文化及其最优秀传统的深深敬意，培养苏联青年对俄罗斯艺术的热爱（着重号为我所加——Ю. Ж.）……

只有那些失去了本土根基的人，才无法理解俄罗斯艺术以其伟大的传统和最优秀的当代典范，在培养俄罗斯民族的爱国情感、培养青年以及培养新的艺术工作者方面所起的作用……苏联人民……对自己民族的艺术财富持虚无主义态度是陌生的，这种态度通常伴随着对一切国外事物的奴颜婢膝，是那些没有根基、没有出身、没有宗族的人的特征。”（4 月 10 日第 15 期）

亚历山大·格拉西莫夫在《论当代俄罗斯艺术文化》中写道：“非常重要的是，现在我们的艺术中，民族俄罗斯元素得到了越来越深入的展现，俄罗斯艺术的世界历史作用也得到了更深刻的认识。”（7 月 3 日第 27 期）

伊利亚·爱伦堡在《艺术的使命》中写道：“我们的爱国主义没有矫揉造作。我们知道我们从别人那里借鉴了什么，也知道我们给予了别人什么……19 世纪的俄罗斯小说改变了世界文学。我不知道我们这个时代有哪位法国或英国作家没有感受到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的有益影响。从穆索尔斯基和柴可夫斯基到肖斯塔科维奇的俄罗斯音乐，是对世界音乐的无价贡献。我们的戏剧在世纪之交引发了欧洲舞台艺术的革命。我们的芭蕾舞在各地复兴了舞蹈艺术……我们知道，艺术与土地相连，与土地的盐分、气息相连，没有民族文化就没有艺术。世界主义——这是一个事物失去色彩和形态，语言失去意义的世界（着重号为我所加——Ю. Ж.）。我们热爱我们过去的一切，我们认为那些是我们自己的、美好的和公正的……我们的爱国主义是纯洁的，它没有吹嘘、没有不容忍、没有兽性。我们的作家、艺术家、音乐家、演员，作为民族天赋的承载者，仍然忠于全人类和永恒艺术的崇高理想。”（7 月 3 日第 27 期）

只有在进行了如此认真且令人印象深刻的准备之后，在让大家都清楚地知道对文学艺术工作者的期望是什么之后，宣传鼓动部才让他们参与到自己的、实际上是审查的工作中。宣传鼓动部建议他们对稿件进行评估。首先是对电影剧本进行评估，以便当时迅速提高艺术电影的质量。这一建议得到了充分的理解和合作的意愿。

阿列克谢·托尔斯泰对弗拉基米尔·施韦策和亚历山大·罗伊创作、谢尔盖·戈罗杰茨基配诗的电影剧本《不死的卡什切伊》的评价是：“我认为这个电影剧本是迎合时势的，在艺术上是虚假的，它的爱国主义是肤浅的，因此——不值得拍摄。”

亚历山大·杜甫仁科对弗拉基米尔·科热夫尼科夫根据自己的小说《三月-四月》创作的电影剧本的评价是：“我不喜欢这个电影剧本。不是因为我在其中发现了任何反艺术或有害的东西。我不喜欢它是因为它的优点微不足道。”[374]

一旦同意哪怕一次为宣传鼓动部撰写内部评论，而且几乎总是负面的评论，作家们，无论他们是否愿意，都成为了新的大俄罗斯思想形成的自愿和直接参与者。他们没有意识到，他们的顺从迟早可能会反过来伤害到他们自己。但他们这样做表明，他们彼此之间并不是非常尊重和珍视。他们总是准备在别人身上挑毛病。

然而，宣传鼓动部明白，这样的措施，即使所有发表的观点立即被毫无保留地接受并付诸实践，也不会很快在艺术上得到体现。宣传鼓动部也非常清楚另一件事。由于纸张极度短缺，甚至像《真理报》和《消息报》这样的报纸的发行量也不得不分别从 130 万份减少到 100 万份，从 50 万份减少到 40 万份。[375]广播覆盖的城市、居民点、村庄和小村落不到一半。所有这些都严重降低了宣传的可能性。因此，宣传鼓动部决定加强口头宣传。当然，规模要比文学和艺术宣传大得多。尽可能地涵盖整个精神领域，包括科学、政治以及关于世界事件的信息。

7 月 31 日，根据政治局的决定和苏联人民委员会的决议[376]，在高等学校事务委员会下成立了演讲局。任命安德烈·亚努阿里耶维奇·维辛斯基为负责人，责任秘书为宣传鼓动部副部长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卢津，成员包括宣传鼓动部部长格奥尔基·费奥多罗维奇·亚历山德罗夫、高等学校事务委员会主席谢尔盖·弗拉基米罗维奇·卡夫塔诺夫、俄罗斯联邦教育人民委员鲍里斯·彼得罗维奇·波将金、苏联科学院秘书尼古拉·格里戈里耶维奇·布鲁耶维奇、苏联科学院世界经济与世界政治研究所所长叶夫根尼·萨穆伊洛维奇·瓦尔加，以及著名的宣传家——军事记者米哈伊尔·罗曼诺维奇·加拉克季奥诺夫、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塔连斯基。他们需要在最短的时间内，为最不识字的人群，制定出最实际且同时受欢迎的演讲主题，从高等院校的教师中挑选演讲者，如果没有合适的人选，则从中学教师中挑选；并立即开始工作。

与此同时，宣传鼓动部利用这一形势，完成了对所有与文学和艺术直接相关的机构和组织的控制。具体来说，就是将最后一个仍具有一定自主性的机构——由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博尔沙科夫领导的电影委员会纳入掌控。宣传鼓动部以电影委员会工作中存在的不足之处为正式理由，解释说，例如，获得斯大林奖的电影数量从 1939 年的 7 部减少到了 1942 年的 3 部[377]，并于 1943 年 2 月 17 日获得了中央委员会书记处的同意，在其结构中成立电影部，并任命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科瓦列夫为电影部负责人[378]。这样一来，就对电影剧本的准备过程进行了全面重组，当时电影剧本被认为是电影的基础。现在，这个过程如下：

“电影委员会将完成的文学剧本送交联共（布）中央。在联共（布）中央，剧本被送到宣传鼓动部，现在宣传鼓动部甚至专门成立了电影部门。电影部门将剧本分发给 15 至 20 名顾问征求意见。每位顾问都认为有必要提出自己的意见。然后，剧本被送到宣传鼓动部部长

手中，部长也提出自己的意见。带着这些意见，剧本再次被送回电影委员会进行修改，如果宣传鼓动部认为电影剧本合适，就会将其提交给联共（布）中央书记处审阅。整个这个过程需要 2 到 3 个月的时间。”[379]

这种有意复杂化、公然官僚化的电影剧本审查和接受方式，使得能够进行非常必要的筛选。剔除所有不符合新要求的内容。因此，早在 1943 年 3 月，在计划拍摄的 23 部艺术电影中，宣传鼓动部认为可以毫无保留地批准拍摄的只有 3 部——《库图佐夫》（导演弗拉基米尔·彼得罗夫，编剧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彩虹》（导演马克·顿斯阔依，编剧维拉·瓦西里耶夫斯卡娅）、《格奥尔基·萨阿卡泽》第二部（导演米哈伊尔·齐阿乌列里，编剧安娜·安东诺夫斯卡娅）。还有 3 部电影有条件地被接受，但要求进行具体修改——《伊凡雷帝》（导演和编剧谢尔盖·爱森斯坦）、《等着我》（导演亚历山大·伊万诺夫，编剧康斯坦丁·西蒙诺夫）、《莫斯科的天空》（导演尤里·莱兹曼，编剧尼古拉·姆季瓦尼）。[380] 宣传鼓动部对爱森斯坦作品的评论中，最明显地体现了意识形态的变化。

“在剧本中，”亚历山德罗夫写道，“存在以下不足之处：将伊凡四世为加强俄罗斯国家的中央集权而进行斗争的唯一原因归结为在外部威胁面前进一步统一国家的必要性。这是一个重要原因。但 16 世纪俄罗斯国家加强中央集权斗争的另一个同样重要的原因是俄罗斯国家的内部发展，尤其是经济联系的快速增长……与此相关的是，出现了新的社会阶层（商人、城市贸易阶层），他们与相当一部分贵族一起，支持伊凡四世与大贵族的斗争。所有这些情节可以通过引入一个新场景来展现——伊凡四世前往亚历山德罗夫村后，莫斯科不同群体之间的斗争场景。如果不展示这场斗争，对于苏联观众来说，就无法理解为什么莫斯科人决定‘不能没有沙皇’，并前往亚历山德罗夫村请求伊凡四世返回王位。此外，在电影中需要展示，伊凡四世在与大贵族的斗争中不够坚决。”[381]（四年后，斯大林将重复亚历山德罗夫的最后一条意见，作为对该电影第二部的主要批评之一。）

宣传鼓动部对各种剧本给出的新的标准和评价，在几个月内只有其作者知晓。甚至在 1943 年夏天，当意识形态路线的变化已经有了相当清晰的轮廓时，舍尔巴科夫，更不用说亚历山德罗夫了，都认为没有必要让电影界人士了解这些。在 7 月 31 日在老广场召开的会议上，舍尔巴科夫告诉作家、剧作家、导演的不是具体的任务，不是党的指示，而是其他内容。他说，编剧们必须自己意识到对他们的期望是什么。他暗示，需要的不是盲目执行他人意志的人，而是有意识的支持者。是那些自己得出必要观点、自己站在坚定立场上的人。他目前只提出了一种帮助形式——“建议”。

“在军队中，”舍尔巴科夫指出，“那里的一切生活都由命令、指示、指令决定。按理说，在军队中似乎没有建议的空间，但尽管如此，我们军队的领导——最高统帅部大本营——要求人们提出建议。在那里，他们教导说：在命令，比如说，写出来之前，人们要提出建议，因为可能会出现新的想法、新的建议，这些建议可以在命令中得到考虑。在命令发布之前，就应该提出建议。一旦命令被接受，就必须毫无保留地执行。要对其执行情况进行监督，关注其执行情况。如果在军队中人们都要提出建议，那么，显然，在艺术领域也必须提出建议。”

换句话说，他非常明确地暗示：关于艺术领域的下一道命令目前还没有下达。只是正在准备中。而且每个人都可以为其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嗯，如果有人不想这么做，而且也不提出建议，那就只能自食其果了。他还提醒大家，批评对于艺术的发展是必不可少的：

“没有批评，艺术怎么能发展呢？”舍尔巴科夫补充道，“这是不可能的。这就意味着把艺术置于温室般的环境中，罩在玻璃罩下。首先，批评应该存在于苏联作家协会和电影委员会周围。它们首先应该组织起这种批评，即同志式的批评。而且应该做到全面细致，不留任何死角。”（着重号为我所加——Ю. Ж.）

然而，批评的第一击并非如人们所预想的那样针对电影艺术，而是针对文学。毕竟，电影的核心是剧本，而剧本是由作家、剧作家——苏联作家协会的成员创作的。在 7 月 31 日的会议上，他们占了大多数。此外，苏联作家协会总书记法捷耶夫也出席了会议。但无论是他，还是其他人，都没有得出应有的结论。他们没有“组织”起必要的批评。不是像以前那样以向中央委员会写便条的形式进行背后的批评，而是在协会理事会和书记处的会议上，在协会自己的报纸《文学与艺术》的版面上进行公开的批评。正因为如此，宣传鼓动部才承担起了推动这一进程的发起者的角色。

1943 年 11 月，宣传鼓动部准备了一份关于《伊·塞尔文斯基创作中的错误》的决议草案。“联共（布）中央委员会认为，”草案中指出，“伊利亚·塞尔文斯基的诗作《俄罗斯》《俄罗斯哺育了谁》和《插曲》中存在严重的政治错误。在《俄罗斯哺育了谁》这首诗中，塞尔文斯基诽谤俄罗斯民族，声称俄罗斯民族的灵魂有些‘疯狂’，还滋养了一些怪物。在草率写成的《俄罗斯》一诗中，包含着荒谬和低俗的关于我们祖国的议论（‘我爱你，我爱你爱到呻吟和喃喃自语’）。在充满恶意、敌视苏联人民的《插曲》一诗中，对战争进行了诽谤性和扭曲的描写。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认为，只有塞尔文斯基缺乏对自己责任的认识，忘记了对苏联人民的义务，才能解释他创作出这样政治上有害且低俗的诗歌。联共（布）中央委员会警告塞尔文斯基同志，如果再犯类似错误，他将被排除在苏联文学之外。”[383]

但是，书记处，更确切地说，是马林科夫和舍尔巴科夫，没有支持亚历山德罗夫的提议。他们认为，如此公然地表达观点还为时过早，这可能会引起政治局中那些最坚定、“顽固”的成员的反对，从而使新的意识形态路线的发展停滞不前。因此，亚历山德罗夫和他负责文学工作的副手普济宁和耶戈林不得不紧急准备另一份报告。这份报告的措辞不那么绝对，更隐晦地表达了主要观点——应该赞美俄罗斯民族、它的过去和文化，而不是谴责它们。在第二份文件中，许多人都受到了不客气的批评。法捷耶夫因其在与青年作家的会面中的发言而受到批评，杜甫仁科因其小说《胜利》和《战火中的乌克兰》受到批评，卡达耶夫因其轻歌剧《蓝手帕》受到批评，普拉东诺夫因其短篇小说《保卫塞姆德沃里亚》受到批评，塞尔文斯基还是因为之前提到的那些诗歌受到批评。而主要的批评火力集中在左琴科身上，他的小说《日出之前》被认为是“对我们民族的诽谤，是对民族情感和生活的侮辱”。在这份长达十二页的报告中，仅对这篇小说的批评就占了五页。

“在他的作品中，所有俄罗斯作家似乎都是悲观主义者和堕落者。”构成这部小说的短篇小说“是自然主义的粗俗之作”。“从这部小说来看，左琴科在生活中似乎从未遇到过一个正直的人。在他眼里，整个世界都是低俗的。左琴科所描写的几乎所有人都是酒鬼、骗子和放荡之徒。”“左琴科毫不掩饰地以轻蔑和厌恶的态度谈论我们民族的人民，诽谤我们的民族，故意把它描绘得愚蠢，并扭曲它的生活方式。”“左琴科的小说与我们民族的情感和思想格格不入……”[384]

正是这种表述形式——不是“俄罗斯”民族，而是“我们的”民族，以及对“诽谤”民族的指责，使得能够避开之前过于直白、甚至刻意的表述。此外，这一次亚历山德罗夫还找到了另一个重要的批评对象——文学艺术杂志的编辑部，正是这些编辑部发表了那些“有害”的作品。这种做法，就像对待电影委员会的情况一样，使得宣传鼓动部能够加强对苏联作家协会及其机关刊物——杂志的活动的控制。

12 月 2 日，组织局批准了《关于对文学艺术杂志的控制》的决议草案，确立了那种能够防止出现政治上有害作品的秩序：

“应当指出，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宣传鼓动部及其出版部门对杂志，尤其是文学艺术杂志的内容控制不力。正是由于控制不力，像左琴科的《日出之前》或塞尔文斯基的《俄罗斯哺育了谁》这样政治上有害且反艺术的作品才得以进入杂志。责成亚历山德罗夫和卢津同志组织对杂志内容的有效控制，以杜绝在出版物中出现政治上可疑和反艺术的作品。在宣传鼓动部内部，将对《新世界》杂志的控制任务交给亚历山德罗夫同志，对《旗帜》杂志的控制任务交给卢津同志，对《十月》杂志的控制任务交给费多谢耶夫同志。规定，负责监督这些杂志的人员要对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就杂志的内容承担全部责任。”[385]

而在第二天，又批准了另一项决议，同样是由宣传鼓动部准备的，该决议进一步阐述、深化了对编辑部工作的负面评价，在很大程度上把责任从党的工作人员身上转移开——《关于提高文学艺术杂志秘书的责任》。决议内容如下：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指出，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为改善文学艺术杂志的工作、加强对杂志编辑委员会的领导以及与作者群体的合作而任命的文学艺术杂志《十月》（尤诺维奇同志）、《旗帜》（米哈伊洛夫同志）、《新世界》（舍尔比纳同志）的责任秘书，未能很好地履行赋予他们的职责。杂志的编辑委员会没有正常工作，收到的稿件没有得到讨论，与作者群体的合作也安排得不尽如人意。杂志的责任秘书对收到的稿件不加批判，对所发表作品的质量、思想性和政治性没有提出高要求。由于杂志责任秘书对发表艺术作品的不负责任态度，一些平淡无奇、未经充分修改，有时甚至是有害的作品得以发表。在《十月》杂志上发表了左琴科的反艺术、低俗的小说《日出之前》。在《旗帜》杂志上发表了塞尔文斯基政治上有害的诗作《俄罗斯哺育了谁》。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决定：

1.责成所有文学艺术杂志的责任秘书提高对杂志所发表作品质量的要求，建立起对收到的稿件进行处理的秩序，以完全杜绝杂志上出现反艺术和政治上有害的作品。

2.警告文学艺术杂志的责任秘书，他们要对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就杂志的领导工作、思想性和政治方向以及内容承担个人责任。”[386]

然而，这两项决议——看似如此重要，从那时起本应决定苏联文学，甚至不仅仅是文学，还有艺术的所有后续发展——却没有见诸报端。甚至在文章中，无论是编辑的还是作者的文章，都没有提及。当时没有，后来也没有。在 1946 年 8 月，当左琴科和“厚重”的杂志再次受到攻击，而且这次攻击最为严厉时，也没有人想起它们。只有极少数人知道这些文件的内容。只有那些直接相关的人：苏联作家协会的领导层、《十月》《新世界》《旗帜》杂志编辑委员会的成员，以及文件中提到的作家。然而，出现这种情况绝非因为核心领导层打算像战前那样，继续遵循不泄露意识形态“厨房”秘密的旧规则。这两项如此重要的党内决议实际上被保密的原因在于其他方面。原因在于，它们最终无法完全解决当初制定时所期望解决的问题。

归根结底，这些决议只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措施，最终演变成了笼统的批评。它们以一系列散文家、诗人的各种失误和错误为依据，但始终没有揭示出塞尔文斯基的过错究竟在哪里，他的一首诗中所谓的“政治危害”究竟体现在何处。不仅如此，绝非偶然的是，他们有意识地、故意地将左琴科的名字与塞尔文斯基的名字相提并论，而且还用“反艺术”来形容左琴科那篇明显带有弗洛伊德主义色彩的小说。由于偶然的因素，左琴科成为了一个非常合适的人物，使得为这两项决议所做的准备工作变成了一种复杂的组合。这位著名的列宁格勒作家的名字，巧妙地掩盖了当时四份文学艺术杂志中第四份杂志——列宁格勒的《星》杂志的缺失，甚至连对其编辑委员会工作中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错误的最轻微暗示都没有。因为

在封锁的艰难条件下，哪怕是对《星》杂志编辑委员会工作的最轻微指责，都将是不道德、不伦理的。

从这些决议中获益的只有亚历山德罗夫和他领导的宣传鼓动部。这两份文件成为了他们的第一次重要行动，有力地证明了意识形态机构的存在。证明了它并非无所作为，而是在监督着一切，并在必要时采取所有适当的措施。此外，正是由于决议内容和方向的改变，宣传鼓动部得以加强对苏联作家协会的日常和直接控制。1944 年 1 月 19 日，宣传鼓动部消除了亚历山大·法捷耶夫在决策中过于独立、很少考虑宣传鼓动部工作人员“建议”的情况。在当天召开的苏联作家协会扩大理事会紧急会议上，法捷耶夫被免去了协会总书记的职务，取而代之的是“受掌控”的列宁格勒诗人和散文家尼古拉·吉洪诺夫。这样的任命从形式上也可以表明，苏联作家协会的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民主化，至少因为在 20 世纪 20 年代上半叶，吉洪诺夫和左琴科一样，都曾是文学团体“谢拉皮翁兄弟”的成员，而不像法捷耶夫那样属于声名狼藉的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协会。与此同时，同样在 1 月 19 日，亚历山德罗夫成功地让自己的直接下属德米特里·亚历山德罗维奇·波利卡波夫进入苏联作家协会主席团，并“当选”为协会理事会秘书。而对于空出来的无线电委员会主席第一副手的职位，他派去了自己的另一名工作人员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普济宁。

试图在官方的党内文件中巩固新的意识形态立场的这些深远计划最终以失败告终。它们变成了一场普通的官僚游戏，进而引发了更为严重的事件。

第十三章

从 1942 年 10 月废除军事委员制度，到 1943 年 8 月取消各加盟共和国、边疆区、州的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部门书记职务，政治局就组织问题和党的建设所做出的所有决定，都基于同一个原因：需要确立完全的集中统一领导。因此，这些决定迟早会共同促成某种最终的决议，其中将重新审视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在社会和国家生活中的地位、作用和实际状况。

很快就找到了这样做的契机。1943 年 12 月 27 日，鉴于加里宁的健康状况恶化，以及他的主要副手之一、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阿·叶·巴达耶夫因“公然酗酒”和“道德败坏”被撤职，政治局决定由什维尔尼克接替巴达耶夫的职位。在苏联层面，这样的人事变动属于苏联议会的职权范围，因此计划于 1944 年 1 月 25 日召开苏联议会会议。由于这次会议是战争爆发以来的首次会议，他们还打算利用这次会议批准国家预算[387]。这样一来，就像是恢复了立法权力机构的职能，在民众眼中，这应该是逐步恢复到正常和平状态的一个标志。

利用这一难得的机会——按照惯例，在议会会议前夕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这也是战争爆发以来的首次），马林科夫很可能在沙塔林的积极协助下，准备了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的决议草案——《关于改善地方国家机关》。该草案在形式上以 1941 年 5 月 4 日政治局决议的实质内容为依据，但实际上对其进行了大幅的发展和补充。格奥尔基·马克西米利安诺维奇（马林科夫）设法获得了政治局两名成员——莫洛托夫和赫鲁晓夫的支持，并于 1944 年 1 月 24 日将这份有三人签名的文件呈递给了斯大林。这份草案非常独特、重要且具有开创性，尽管篇幅较长，但值得全文引用：

一

“在伟大的卫国战争抗击德国侵略者的过程中，地方的党组织和国家机关在组织后方工作以及动员人民力量抵抗敌人方面开展了大量工作。迁移到东部的工厂已全面投产。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为军队和国家持续提供粮食，没有出现严重的供应中断。交通运输部门保障了军事和民用物资的运输。

地方党组织和国家机关在执行党和政府关于组织和加强我军后方的指示时，在领导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成功地完成了将经济转入战时轨道的任务，以及为红军提供打败敌人所需的一切物资的任务。

然而，我们不能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在地方党组织和国家机关领导经济和文化建设的实践中，无论是在战争期间还是战前时期，都存在着严重的缺陷。

我们的地方党组织在很大程度上承担了管理经济机构的日常工作，这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党组织和国家机关职能的混淆，导致国家机关被取代和失去独立性，削弱了它们的责任，并加剧了国家机关中的官僚主义。由于党组织和国家机关职能的混淆，非党群众常常不知道该向谁求助来解决他们的问题，因为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领导工作人员不是独立地解决问题，而是看州委和党的机关的脸色，等待对每一个具体情况的特别指示。党组织和苏维埃机关之间这种不正确的关系，也导致了地方党组织领导的某种不负责任，因为他们认为自己只对共产党员和党组织负责，而不对非党群众负责。

在组织方面，地方党组织和苏维埃机关工作中的上述缺陷导致了领导干部在两者之间的不合理分配。党组织集中了最有威望和经验的领导干部，这是以削弱苏维埃机关的领导干部力量为代价的，这不可避免地加剧了上述国家机关工作中的缺陷。这种领导力量的不合理配

置导致了目前如果不消除这一严重的组织缺陷，就无法将苏维埃机关的工作提升到符合当代苏联国家任务的水平。

二

为了消除上述党组织和国家机关工作中的缺陷，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认为有必要：

1.结束地方党组织和国家机关在领导经济和文化建设方面长期存在的有害的职能重叠和并行现象，以及不正确的取代国家机关和使其失去独立性的做法，将经济和文化建设的日常管理完全集中在一个地方——国家机关。这种将日常领导和力量集中在一处的做法，在领导工业和交通运输企业方面已得到充分证明是合理的，因为在这些企业中，全部权力属于企业领导人；在军事方面也是如此，指挥官对军队的工作负有全部责任。

2.用最有威望和经验的干部加强国家机关，这些干部能够确保国家机关工作的进一步提升，并将领导经济和文化建设的工作集中在各共和国的人民委员会和苏维埃执行委员会。

3.使党组织关注全面加强国家机关，提高它们的作用和威望，使党组织摆脱不属于它们的行政经济职能，并在党组织和国家机关之间建立正确的分工和职责划分。

4.责成地方党组织在调整与苏维埃机关的关系时，对国家机关的工作进行政治领导，并对它们正确执行党和政府的指示进行政治监督；确保正确选拔和任用国家机关的干部，并始终关注他们的思想政治成长；在广大劳动群众中开展政治教育工作，进一步将群众团结在苏维埃周围，以支持苏维埃开展的各项活动。

三

作为确保调整和加强地方国家领导机关的组织措施，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认为有必要：

1.认为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边疆区、州、专区、市、区党委的第一书记同时担任加盟（自治）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边疆区、州、专区、市、区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是适宜的。

2.加强各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人民委员会、边疆区、州、专区、市、区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领导干部队伍和机构，为此将目前在党组织中从事经济工作的领导干部调到苏维埃机关。

3.取消市、专区、州、边疆区党委以及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负责工业、贸易、交通和农业等各个部门的副书记职务，以及相应的党的部门。

4.责成政治局确定实施本决议第 1、2、3 点所阐述指示的程序和期限”[388]。

斯大林支持了这个草案。他亲自写下了批示：“通过（对文本进行修改）。约·斯大林”。所做的修改不是实质性的、原则性的，而纯粹是文体上的。他划掉了一句话（第二部分“a”点的最后一句），还有六个词——明显的重复内容，并提出了自己的标题建议——《关于地方党组织和国家机关领导的合并》，这与第三部分的主要内容含义相符。

在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明确表达了意见之后，安德烈耶夫也加入了支持该草案的行列[389]。看起来，现在不会再有任何意外和挫折了。这份文件肯定会被所有人一致通过。但事实并非如此。1 月 26 日，召开的不是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而是一次小范围的领导会议，也就是政治局会议。在这次会议上，该决议草案不仅被坚决否决，而且还从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的议程中被完全划掉了[390]。为什么会这样呢？

当时，不仅关于这次会议，而且关于所有以政治局会议形式举行的小范围领导会议，都没有任何记录、会议纪要，更不用说会议速记记录了。因此，我们永远无法知道究竟是谁，以及以什么正式理由成功否决了这份决议草案。这份草案完全符合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的路线，同时又对其进行了发展，将其逻辑推到了极致。它最终使党完全摆脱了对国家机关日常活动的哪怕是间接的参与。使党无法对经济、科学、文化、教育等众多领域的发展产生影响。从本质上说，它废除了存在了四分之一世纪的党的权力分支。但我们可以尝试还原 1 月 26 日发生的事情。

支持该草案的有政治局的四名成员——斯大林、莫洛托夫、安德烈耶夫、赫鲁晓夫，以及一名候补委员——马林科夫。要使这份文件被否决，至少需要有同样数量的政治局成员投反对票。在当天的会议上，除了上述人员外，政治局成员中还有卡冈诺维奇、加里宁、米高扬、什维尔尼克，以及三名候补委员——贝利亚、沃兹涅先斯基、舍尔巴科夫出席。日丹诺夫和伏罗希洛夫不在莫斯科，因此无法参与讨论。所以，为了使草案不通过，卡冈诺维奇、加里宁、米高扬、什维尔尼克肯定会投反对票，此外，至少还需要贝利亚、沃兹涅先斯基或舍尔巴科夫中的一人投反对票。然而，舍尔巴科夫可以立即从潜在反对者的名单中排除，因为即将进行的改革对他个人、对他所负责的宣传鼓动领域都没有任何威胁。相反，这极大地增强了他在党内的地位和作用。因此，也不能排除马林科夫事先向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舍尔巴科夫）通报了准备好的文件内容，并得到了他的支持和认可。

如果假设讨论的结果是“赞成”和“反对”的票数相等，那么反对该草案的人必定是贝利亚和沃兹涅先斯基中的一人。考虑到沃兹涅先斯基与莫洛托夫和马林科夫之间相当复杂的关系，可以几乎肯定地说沃兹涅先斯基会投“反对”票。但基于同样的原因，也不能排除贝利亚也是反对该草案的人。他以此表达了对莫洛托夫和马林科夫地位得到加强的不满，因为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以他的利益为代价的。最后，日丹诺夫也可能提出反对意见，他在党的领导中的地位也已不如从前。如果有人通过电话向他通报了会议情况，那么没有什么能阻止他进行缺席投票。

但无论如何，我们必须承认一个事实：这份得到斯大林如此公开支持的决议草案被否决了。否决它的正是斯大林原本指望并打算争取其支持的那些人。之所以会这样，只是因为所提议的改革恰恰针对的是政治局中的这些成员，导致他们无法再参与权力结构，因为他们很清楚，如果不在党内，仅在国家机关中，他们是无法长久立足的。

事实上，决议草案中的一个条款，尽管是最简化的版本，还是得到了批准。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之后，1944 年 1 月 29 日，政治局做出了一项决议，理由是“需要进一步加强苏维埃的工作”：“推举”赫鲁晓夫担任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波诺马连科担任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同时让他们继续担任相应共和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第一书记。而乌克兰和白俄罗斯此前的政府首脑，列·罗·科尔涅茨和伊·谢·别林斯基，则自动成为人民委员会第一副主席[391]。这样，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 1941 年 5 月 4 日开始的权力结构调整的一条路线——党和国家权力机构领导人职务的兼任。

然而，对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改革的坚决拒绝，以及决议草案被果断否决，很难仅仅用部分小范围领导的个人利益、他们试图维护自己的高位、保住权力巅峰地位的企图来解释。对这样一个事实的认识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即党是维护和保障苏联完整性的唯一结构。而苏联解体的威胁在 1943 年底确实成为了现实。

早在 1942 年，莫斯科就开始收到关于德国人利用亲德分子组建警察和“自卫队”的第一批消息，以及关于出现了一个起初政治倾向不太明确的“乌克兰民族革命军”（“布尔布维茨分子”）的消息。后来又得知了其他情况。由于遭受一次又一次的失败，纳粹德国极度

需要补充兵力来扩充国防军，于是开始从苏联公民中组建军队：爱沙尼亚师——第 14 乌克兰师（“加利西亚”师）、第 15 立陶宛师、第 19 拉脱维亚师、第 20 爱沙尼亚师、第 29 俄罗斯师（“俄罗斯解放军”，“弗拉索夫分子”）、第 162 步兵师（由来自高加索、伏尔加河流域和中亚的突厥民族组成，即“穆斯林军团”）、第 1 和第 2 骑兵师（由顿河、库班河、捷列克河的哥萨克以及北高加索居民组成）。此外，1943 年 3 月，还开始组建奥努夫连科领导的乌克兰起义军。

面对这种公然表现出来的，已不再是意识形态上的民族主义，而是武装分离主义，小范围领导面临着必须立即解决这一问题的紧迫任务，而且不能进行广泛的宣传解释。必须迅速根除一切与苏联各民族牢不可破的友谊、他们对社会主义理想的忠诚以及对苏维埃政权的忠诚等口号相悖的东西。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党委第一书记米·阿·苏斯洛夫和边疆区内务人民委员部负责人特卡琴科是最早提出解决方案的人之一。1943 年 5 月 5 日，在该地区从敌人手中解放三个月后，他们向北高加索方面军司令伊·伊·马斯连尼科夫提出请求，“以行政手段驱逐”那些跟随德国人离开的人、祖国的叛徒和卖国贼、土匪及其帮凶的家属；“那些有间谍嫌疑，但没有足够证据进行逮捕的人”[392]。换句话说，他们提议恢复 1938 年 11 月 17 日苏联人民委员会和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决议所谴责和否决的那种做法。

这种公然违法、不经审判的解决复杂问题的方式立即被小范围领导成员接受。显然，在他们看来，这是在战时条件下唯一可行且完全合理的办法。从 1943 年 10 月开始，内务人民委员部开始进行驱逐行动，但被驱逐的不仅仅是那些真正的叛徒，而是整个民族——卡拉恰伊人、卡尔梅克人、车臣人和印古什人、巴尔卡尔人，不久之后还有克里米亚鞑靼人。作为这些行动的高潮和某种结果，紧接着是政治局的决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命令，决定撤销卡尔梅克、车臣-印古什、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将卡巴尔达-巴尔卡尔自治共和国改组为卡巴尔达共和国，将卡拉恰伊-切尔克斯自治州改组为切尔克斯州[393]。关于这些情况的信息零星地见诸报端，但只是简单地陈述事实，没有任何理由、解释或评论。

小范围领导成员肯定讨论过这个问题——前线沿线的政治局势。很有可能，负责执行驱逐行动、因而掌握该问题全面信息的贝利亚，会利用这些信息作为最有力、最有说服力且“客观”的论据，来反对党的改革和加强苏维埃的作用。至少在当时是这样。他可能会利用相关论据，说服斯大林放弃最初的想法。无论如何，小范围领导在 1 月的那些日子里努力寻找解决因民族主义意外抬头而产生的局面的办法，这一点从当时“杜甫仁科事件”的出现就可以得到证实。

早在 1943 年夏天，亚历山德罗夫就对乌克兰导演兼作家杜甫仁科在小说《胜利》中表达的观点给予了负面评价。然而，当时宣传鼓动部负责人丝毫没有提及民族主义是禁止该手稿的决定性原因[394]。但半年后，在宣传鼓动部领导的一份长篇报告中，对同一部作品的解读却截然不同，这份报告还附有中央委员会关于文学艺术杂志的两项决议草案。这份日期为 1943 年 12 月 2 日的文件已经明确指出：在小说中“明显表达了与布尔什维主义相悖的民族主义观点……杜甫仁科固执地试图让读者相信，似乎只有乌克兰人在为乌克兰而战”，而且“乌克兰从未被称为苏维埃乌克兰”。但即便如此，即使在同名小说的电影版《战火中的乌克兰》出现后（宣传鼓动部认为，在这部电影中作者犯了“更严重的政治错误”[395]），杜甫仁科当时仍未成为特别关注的对象，在决议文本中也没有像左琴科和塞尔文斯基那样被提及。

杜甫仁科错误的严重性直到 1944 年初才发生变化。2 月 8 日，在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后不到两周，一份由舍尔巴科夫签署的通知发往所有中央报纸、杂志、出版社的编辑部，以及在从敌人手中解放的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领土上恢复

工作的所有乌克兰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州委。通知含糊地告知，“在杜甫仁科的作品中……存在严重的反列宁主义政治错误”，因此要求“未经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宣传鼓动部特别许可，不得发表杜甫仁科的作品”[396]。毫无疑问，重新关注“杜甫仁科事件”的依据是小范围领导对在仍被敌人占领的加盟共和国，尤其是在乌克兰日益增长的民族主义问题的讨论。在对导演错误实质的模糊表述背后，隐藏着一些没有直接使用但在 1943 年秋季宣传鼓动部对小说《战火中的乌克兰》的内部评论中已经提到的内容：这部作品“是狭隘、局限的乌克兰民族主义的平台，敌视列宁主义，敌视我们党的政策以及乌克兰和全体苏联人民的利益”[397]。

赫鲁晓夫曾轻率地（事实证明是这样）与莫洛托夫和马林科夫一起签署了决议草案，现在他不仅要兼任两个责任重大的职务，而且还得亲自积极地与各种表现形式的乌克兰民族主义作斗争——无论是公开的、武装的，还是隐蔽的、意识形态上的。显然，他是在执行小范围领导的口头指示，而绝非出于自己的主动。1944 年 2 月 12 日，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让乌克兰共产党（布尔什维克）政治局通过了一项决议，根据该决议，由于杜甫仁科再次犯下“严重的反列宁主义政治错误”，他被免去了在国家机构和社会组织中担任的所有职务[398]。直到 3 月 1 日，赫鲁晓夫在乌克兰最高苏维埃会议上作报告《乌克兰土地从德国侵略者手中解放以及恢复苏维埃乌克兰国民经济的新任务》时，才不得不摊牌。他终于直言不讳，承认了奥努夫连科分子的武装抵抗确实存在，并将他们定义为“乌奸纳粹分子——希特勒的帮凶，乌克兰人民最凶恶的敌人”[399]。就这样，他找到了对右岸地区所发生事件唯一可行，同时也较为坦诚、客观的解释。

从这时起，与民族主义者作斗争、在苏联境内消灭他们的问题，对于全国人民来说已不再是秘密。然而，这个问题似乎立刻从具有全联盟重要性的层面，被转移到了具有地方特色的共和国层面。与此同时，这个问题不仅变得极其复杂，而且由于当时与盟友关系中的一个关键事件，几乎变得无法解决。

1943 年 10 月 19 日至 30 日，在苏联、美国和英国的外交部长莫斯科会议上，达成了一项协议，决定成立一个新的国际组织——联合国，以取代国际联盟，近期将由反希特勒联盟的 26 个国家共同组建。这样一来，战后世界安全保障问题将不再是三国领导人私下会面时的闲谈话题，而是要公开进行讨论，并且还要通过投票来做出决定。毫无疑问，通过这种方式，一些苏联必然不会同意的决定可能会强加给苏联。因为美国提出的任何建议，肯定会得到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 8 个国家的支持，而英国提出的建议则会得到其四个自治领和印度的支持。英美集团在 26 个国家中总能获得 13 票的多数，而苏联只有自己的一票。在最好的情况下，苏联只能指望得到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的支持。

莫洛托夫很可能是根据外交部关于战后欧洲、亚洲和世界其他地区国家体制规划的委员会的建议，向小范围领导层提出了一个独特的解决方案。即赋予各加盟共和国更多纯粹象征性的权力、独立性和主权。试图使它们成为与世界其他国家相同的国际社会主体，就像英国的自治领——加拿大、南非联邦、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殖民地印度一样[400]。

遵循这一逻辑，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莫洛托夫）准备了苏联最高苏维埃的命令草案，内容是将苏联的联盟国防人民委员部和外交人民委员部改组为联盟-共和国人民委员部。根据其中第二项命令规定：“各加盟共和国可以与外国建立直接关系，并与它们签订协议。”这样一来，预计将赋予 16 个加盟共和国一些特权，使它们有资格申请成为联合国的成员。

莫洛托夫的报告草案和政治局的命令于 1 月 26 日进行了审议，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于 1 月 27 日进行了审议[401]，而苏联最高苏维埃则于 2 月 1 日进行了审议。他们公开说明，提出这些措施的必要性是基于各加盟共和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发展成果。并强调：

“我们不能不看到，这是在多民族的苏维埃国家实际解决民族问题方面迈出的新的重要一步，不能不看到我们列宁-斯大林民族政策的新胜利。”他们解释说，扩大各加盟共和国的权力不仅会加强这些共和国自身，也会加强整个联盟国家[402]。只有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发言时，莫洛托夫才说出了心里话。“很明显，”他说，“这将意味着增加苏联对其他国家施加影响的砝码。这也将意味着，苏联在国际机构、会议、会谈和国际组织中的参与度和代表权重将得到加强。这还将意味着，在发展我们的国际关系方面，在准备就国际问题发表某些声明时，或者在通过共和国的渠道，而非一定以苏联的名义，预先了解其他国家的某些意见或观点时，将有更多的机会。”[403]

直到半年后在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上，才出现了实施这一计划的机会。1944 年 8 月 31 日，在关于创建联合国的具体问题的谈判中，苏联代表团团长安·安·葛罗米柯首次告知美国国务卿科·赫尔，“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应该成为创建安全组织的发起国之一”。美国的反应虽然非常含糊，但也迅速做出了回应。第二天，罗斯福在给斯大林的又一封信中提议：“如果目前推迟讨论这个问题，这并不妨碍以后在联合国大会成立后再进行讨论。到那时，联合国大会将拥有做出决定的所有权力。”[404]

经过近一年半的紧张等待，最终不可避免的事情还是发生了。恰恰在本可以相对轻松地从根源上遏制西部地区公然的民族主义倾向的时候，他们却被迫无所作为。无法坚决阻止这些倾向的加强，以及它们与亲德武装分离主义的合流。由于必须不断且坚定不移地证明各加盟共和国所宣称的，但仍然非常虚幻的独立性，小范围领导层失去了及时、公开地与包括纯粹意识形态领域在内的所有民族主义表现形式作斗争的机会。他们明白，在这方面的任何行动都可能被美国和英国利用，被解读为那些申请加入联合国的共和国甚至连名义上的主权都不存在的切实证据。

与此同时，其他一些因素也对日益复杂的局势产生了重大影响。首先，是苏联自身的联邦结构。各加盟民族共和国及其所有象征——国徽、国旗、国歌、政府、“国家”语言的存在，以及从 1944 年 2 月起，在法律上还有权组建自己的军队、与其他国家建立直接外交关系，这些本身就注定了必然会出现、存在着官方宣传中所称的“民族主义”。

小范围领导层没有放弃将民族特征作为任何苏维埃国家形式基础的原则，因此无法消除民族主义滋生的土壤。他们不能公开宣扬任何可能被视为体现、强加单一制倾向的内容。不得不避免任何可能被地方视为俄罗斯化的呼吁、指示，更不用说以中央委员会决议的形式出现了。不能强调在十六个加盟共和国中，只有俄罗斯联邦对国家历史起着决定性作用，也不能突出其核心——俄罗斯人民的重要性。总之，要避免在当时的情况下必然会引发民族主义进一步全面加强的一切因素。

其次，自革命以来，尤其是在通过新宪法之后，对各加盟共和国采取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了局势。这一政策本应令人信服、直观地证实“列宁-斯大林民族问题解决方案的胜利”。它不仅体现在司法程序中使用民族语言，以及在中小学和高校的教学中使用民族语言。还鲜明地体现在坚持不懈地强调“民族文化的空前繁荣”，这表现为多种多样的形式。

这体现在毫无例外，在所有加盟共和国都开设了具有鲜明民族特色剧目的民族戏剧院、歌剧芭蕾舞剧院，不过这些剧目主要是由俄罗斯剧作家和作曲家创作的；体现在组建共和国创作联盟，其成员大多是从莫斯科、列宁格勒和俄罗斯联邦其他城市迁来的文学艺术工作者。还体现在仅在乌克兰、白俄罗斯、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开展的本国电影制片厂的工作上。甚至还体现在科学院的运作上——除了已有的乌克兰、白俄罗斯、格鲁吉亚科学院外，1943 年（！）还在乌兹别克斯坦和亚美尼亚成立了科学院。所有这些，自然导致了民族知识分子过早、人为地形成。

而这些民族知识分子由于教育程度不够、缺乏应有的专业经验、没有取得任何实际成就，只能在严格遵守一个不变条件的情况下才能证明自己的存在。即为自己创造并采用特殊的、与普遍标准相比明显较低的评价自己作品的标准。而只有在每个加盟共和国承认民族语言相对于国家通用语言——俄语的实际优先地位时，才有可能采用这些标准，这就排除了进行客观、公正比较的可能性。这种情况不可避免地、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民族主义和离心力滋生的温床，这些力量暗中削弱了苏联的统一和稳固。

这种复杂的局势给小范围领导层只留下了两条出路。要么用国际主义对抗民族主义，要么用单一制的“统一不可分割”、“牢不可破”的苏联理念对抗分离主义倾向。但第一条道路已经被政党改革和共产国际解散过程中出现的现实所否定。由于在联合国中急需额外的选票，第二条道路也变得不可能实现。这就是为什么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关于文学艺术杂志的决议，以及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杜甫仁科的决议，都具有那种意义上的不明确性，仿佛是未完成的状态，这成为了它们的典型特征。党的宣传鼓动机构的核心——宣传鼓动部，不得不寻找一种截然不同的解决方案。

1944 年 3 月，宣传鼓动部的“关于改进党组织宣传鼓动工作的活动计划”中已经大致、模糊地指出了这个解决方案。该计划提议用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来对抗民族主义……而首次从理论上为这一立场提供依据的是 5 月 1 日政治局批准的《关于哲学领域科学工作的缺陷》的决议。通过该决议的正式契机是三卷本《哲学史》的出版。然而，该文件的主要意义绝不是那些平淡无奇、几乎没有新意的论断，比如“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在本质上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相对立”之类的内容，而是其他方面。隐藏在对这部重要著作作者的批评背后的是，他们“对关于日耳曼民族是‘被选中的民族’的反动论断、‘黑格尔关于有必要系统地殖民其他民族的论点’避而不谈”[405]。

这份极其复杂、纯粹学术性的决议文本，让每一个阅读它的人都痛苦地猜测：为什么上个世纪初的德国哲学，尤其是黑格尔的观点，突然变得如此重要？为什么偏偏在战争期间，当德国纳粹主义的罪恶和丑恶如此明显的时候，却要去谴责早已消失的普鲁士君主制呢？

《党的建设》杂志的一篇编辑文章对这些问题给出了答案，并对决议进行了解读。文章毫不避讳、毫不含糊地直接指出：“民族关系、各民族的历史一直是意识形态斗争中的问题之一，任何与我们敌对的意识形态都试图渗透其中，党组织必须警惕哪怕是最轻微的传播那些体现大国沙文主义或地方民族主义观点的企图。”紧接着，文章提出了治愈这两种“弊病”的良方——“当前重要的是要不断阐释我们社会制度所基于的那些原则”[406]。

政治局显然意识到了关于哲学的决议存在的缺陷，因此只提议在《布尔什维克》杂志上发表该决议。不仅是以编辑文章的形式，而且还打破传统，只发表了其中陈述性的部分。主要是为了那个抽象的呼吁，这个呼吁是针对一小群学者的——“对 18 世纪末 19 世纪初德国哲学的作用和本质给出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阐述”。而决议中具有决定性的部分只有少数直接相关的人知道。因为它只涉及到人事问题：根据该决议，哲学研究所所长帕·费·尤金被免去职务，弗·伊·斯维特洛夫被任命为所长。此外，还将亚历山德罗夫从《哲学史》编辑委员会中除名，因为“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宣传鼓动部部长不应兼任个别出版物的编辑职责”[407]。这样就排除了未来一个人同时担任批评者和被批评者的可能性。

在借助哲学问题未能取得成功后，亚历山德罗夫试图通过新的行动来挽回自己的声誉。5 月 18 日，他签署了另一份报告，这次是《关于一些苏联历史学家工作中的严重缺陷和反列宁主义错误》。利用这份报告，他成功地促成了 5 月底召开的一次会议，与会者不仅有国内最杰出的历史学家，还有党的领导人。他希望在这次会议上，最终能找到他积极参与提出的用社会主义对抗民族主义这一观点的必要依据。

会议由马林科夫主持开幕。他表示，中央委员会认为有必要讨论现有的有争议的问题，并制定出共同的原则性规定。毫无疑问，“有争议的问题”指的是那些在战争前夕就已经明确显现的相互排斥的倾向，这些倾向已经不再主要是学术性的，而更多地具有了政治性质。这些问题归结为一个答案：现在应该如何评价俄罗斯国家数百年来的扩张，以及在这一过程中它对被并入领土上非俄罗斯民族的抵抗。

马林科夫很可能认为，现在已经到了彻底克服波克罗夫斯基学派仍然存在的影响的时候了。是时候摒弃该学派所产生的对俄罗斯过去、对其杰出国家领导人（个别沙皇、皇帝、军事将领）的生活和活动的虚无主义评价了。要从学术上为文学和艺术近十年来成功所做的事情提供依据。要证明并解释非俄罗斯民族并入俄罗斯的无可争议的积极意义，同时又不偏离马克思列宁主义方法论，不偏离将阶级斗争定义为历史发展动力的观点。

历史学家们（弗·帕·沃尔金、鲍·德·格雷科夫、尼·谢·杰尔扎温、米·瓦·涅奇金娜、米·米·潘克拉托娃、叶·瓦·塔尔列等）的讨论持续了一个多月，结果表明，会议只能以一个结果结束：共同承认单一制国家的概念。这是唯一能够消除所有积累矛盾的概念。然而，这一结果与宣传鼓动部的想法不一致，因此，第二次重要的反民族主义行动无果而终。亚历山德罗夫和他的同事们作为会议结果预先准备的中央委员会决议草案《关于历史领域科学工作的缺陷》，在舍尔巴科夫第一次审查时就被否决了。日丹诺夫的干预也没有取得任何结果。他也无法找到有说服力的论据来支持“第三条道路”，从而使该文件得以通过[408]。

第十四章

到 1944 年 1 月底，在斯大林格勒、库尔斯克弧形地带、北高加索、第聂伯河地区以及列宁格勒城下取得胜利之后，苏联所面临的战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最初，最为重要的任务——不惜一切代价，竭尽全力阻止敌人，捍卫国家的独立与领土完整——已经完成。从此，苏联红军相对于德国国防军的优势已毋庸置疑。迅猛且势不可挡的进攻开始了，每一天都在向着人们期盼已久的全面解放迈进。德军已经被从他们占领的苏联三分之二的领土上驱逐出去，而即将实施的新一轮作战行动，在不久的将来应能使苏联军队推进到 1939 年 9 月 1 日时的旧边界。

然而，正是苏联红军在各个战线上的胜利，以及它持续不断、坚定不移地向西推进，使得总参谋部的新战略计划不得不暂时推迟实施。更为重要的政治问题被提到了首位。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作战行动将在这样一片土地上展开，按照伦敦和华盛顿的观点，这片土地对莫斯科来说属于“外国”。在三个波罗的海共和国，这些国家在英国和美国看来是独立的；在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西部地区，从波兰流亡政府的角度来看，这些地区是正在与德国作战的波兰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是，苏联领导既不能认同这样的观点，甚至也不能将其作为讨论的起始立场。这样做对苏联领导来说，意味着公开承认其战前政策，说得委婉些，是错误的。意味着忘记 1941 年那惨痛而严酷的教训。意味着忽视历史经验，明知会损害祖国利益，却无视地缘政治因素。意味着故意不记起这样一个事实：西部边界，更确切地说，是白俄罗斯地区的那段边界，常常成为不同敌人入侵莫斯科的必经之路。1612 年的波兰人、1812 年的法国人，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德国人都是如此。

在希特勒发动侵略前夕，克里姆林宫当时还没有战斗盟友，且深知苏联单枪匹马与纳粹德国作战的准备不足，它清楚地明白，哪怕只是那些与苏联接壤的友好国家，也能发挥重要作用。如果这些国家存在，它们将成为缓冲地带，使苏联免受突然袭击。它们将成为第一场战斗的前沿阵地，这些战斗的结果最难以预料，因而也极其危险。当时，由于严峻的现实，苏联那些主要且公开的、毫不掩饰的意图，只能局限于一些被几乎所有人视为“帝国主义”和“侵略性”的简单行动。即恢复莫斯科对在内战中失去的土地的主权，包括波罗的海地区、比萨拉比亚。与此同时，还有看似极其粗暴、强制地将波兰边界向西推移。但如果苏联不这样做，克里姆林宫认为，德国肯定会这么做。而且德国会尽可能地接近列宁格勒、明斯克、基辅、莫斯科这些至关重要的工业中心。希特勒将在时间和空间上赢得优势，很可能为自己赢得一场迅速而轻松的胜利。

而现在，在即将取得胜利之际，苏联领导终于有可能以另一种方式来解决同样的问题。一种对各方来说都更易于接受的方式。一种在国际关系实践中常见、易于理解且文明的方式。首先，通过国际社会认可的条约，巩固苏联在 1939 年至 1940 年获得的领土。其次，以同样的方式实现让苏联周边出现友好国家，最好是通过一系列保障相互安全的条约与苏联联系在一起。这正是斯大林在 1941 年 12 月 16 日于莫斯科与艾登会谈时所阐述的对战后欧洲的展望。当时，保卫首都的战斗才刚刚开始，其结果尚无法预测。

斯大林解释说：“苏联认为有必要恢复其在 1941 年德国入侵苏联前夕的边界。这包括根据 1940 年苏联与芬兰签订的和平条约所确定的苏芬边界、波罗的海共和国、比萨拉比亚和北布科维纳。至于苏联与波兰的边界，正如前面所说，总体上大致可以沿着寇松线划定，并将蒂尔西特纳入立陶宛共和国版图。此外，苏联在 1940 年将佩萨莫归还芬兰作为礼物，鉴于芬兰在当前战争中的立场，苏联认为有必要收回这份礼物。再者，苏联希望罗马尼亚与苏联结成军事同盟，苏联有权在罗马尼亚领土上拥有自己的军事、空军和海军基地……在北

方，苏联也希望与芬兰建立类似的关系，即芬兰应与苏联结成军事同盟，苏联有权在芬兰领土上拥有自己的军事、空军和海军基地。”[409]

就这样，苏联国家安全的概念首次被极其清晰、明确地阐述出来。

在德黑兰会议上，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成功地使丘吉尔和罗斯福同意了这些计划。在大国首脑关于战后欧洲安排的协议中，首次确定了波兰未来的边界。在东部——沿着寇松线；在西部——以奥得河为界，通过获得德国的波美拉尼亚和西里西亚作为对领土损失的补偿；在北部和东北部——出于同样的目的，将但泽、“走廊”和东普鲁士的南部地区纳入版图。英国和美国的首脑也同意，苏联与芬兰的边界应沿着 1940 年春天确定的界线划定[410]。

罗斯福和丘吉尔这样做，绝非是想表现出政治家们少有的无私精神。他们也并非是屈从于斯大林的某种压力，盲目地支持他的计划。他们清楚地明白，若愿意的话，他们的行为很容易被视为对《大西洋宪章》基本原则的意外且无法解释的背离。《大西洋宪章》的第一条规定，明确拒绝将领土获取作为战争目标。应苏联方面的要求，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只是在确定“大博弈”的新规则以及盟友之间的关系。给予苏联在东欧的行动自由，以换取苏联不干涉西方事务。苏联代表最初不参与仅由英美组成的盟军控制委员会的行动，该委员会对已解放的意大利领土实行了全面控制。

对克里姆林宫来说，德黑兰会议的协议意味着的不仅仅是为恢复其战略边界提供了完全合法的依据。如果谈判成功，这些协议实际上还能极大地推动胜利的到来。可以使芬兰和罗马尼亚退出战争，而无需继续与它们进行战斗。否则，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新的、难以预料规模的人员伤亡。

由于前线的局势，芬兰成为了双重压力（军事和外交压力）的第一个目标。在解除列宁格勒的封锁后，列宁格勒方面军的部队没有继续沿着卡累利阿地峡向北发展成功的进攻。从拉多加湖到巴伦支海的卡累利阿前线也陷入了平静。部署在那里的两个集团军群的力量——六个诸兵种合成集团军、两个空军集团军以及波罗的海舰队的力量，现在成为了一种潜在的威胁因素。作为在外交谈判失败的情况下必然会采取的进攻手段，这些力量可以入侵芬兰并占领它，以及随之而来的一切后果。

在解除列宁格勒封锁三周后的 1944 年 2 月 16 日，在斯德哥尔摩开始了秘密的、当时还非官方的谈判。苏联驻瑞典大使 A.M.科伦泰向前来与她会面的前不管部大臣、前驻莫斯科大使尤霍·帕西基维阐述了苏联的和平条件。这些条件除了要求芬兰退出战争、断绝与柏林的关系、解除武装并扣押部分德国国防军士兵、支付赔款外，还包括与丘吉尔和罗斯福商定的内容，即恢复 1940 年的边界，并放弃佩萨莫，这使得芬兰失去了通往巴伦支海的出海口。

在进行了机密谈判后，两国政府之间的意见交流不再保密。3 月 1 日，苏联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阐述了与芬兰媾和的相同条件。一周后，芬兰方面同样公开地做出了回应。芬兰方面表示希望“在最短时间内恢复芬兰与苏联的和平关系”，但与此同时，也表现出了 1939 年 12 月笼罩在总统吕蒂和芬兰政府头上的那种恐惧情绪。他们毫无根据的恐惧是芬兰会被占领，会被变成苏联的一个共和国并并入苏联。赫尔辛基的回复中称：“为了使芬兰在缔结和约后能够保持中立，必须保证其领土上不存在外国军队。”芬兰方面认为只有这个问题需要“更详细的讨论”，于是无奈地同意开始正式谈判。

次日，即 3 月 10 日，苏联外交部做出了愤怒的回应：“向帕西基维先生传达的六点苏联媾和条件是最低限度且最基本的条件，只有芬兰政府接受这些条件，苏芬之间才有可能就停止军事行动进行谈判。”尽管赫尔辛基在再次回复中又一次表达了对媾和条件某种“解读”的担忧，但克里姆林宫坚持己见。最终，3 月 26 日，一个芬兰政府代表团抵达莫斯

科，成员包括外交部长 K.恩克尔和尤·帕西基维。然而，在相当高的层面上（与莫洛托夫及其外交部副手 V.G.杰卡诺佐夫）进行的为期两天的讨论并未取得积极成果。为了拒绝苏联的提议，芬兰方面找到了一个新的借口——担心国家经济无法弥补给苏联造成的损失。

双方的声明交流又持续了将近一个月，直到 4 月 22 日，但最终还是没有达成媾和谈判的开始[411]。

不久之后，从 3 月底开始，苏联对希特勒的另一个卫星国——罗马尼亚施加了军事和外交相结合的压力。苏联红军取得的新胜利为此提供了可能，红军已经推进到普鲁特河——即 1940 年的边界。乌克兰第二方面军的部队迅速解放了北摩尔达维亚，同时占领了罗马尼亚本土的东北部地区，而乌克兰第三方面军则推进到了德涅斯特河。一支强大的苏联部队集结在雅西-基希讷乌-蒂拉斯波尔一线，严阵以待，随时准备恢复进攻的压力。

与此同时，4 月 2 日，莫洛托夫为苏联和外国记者举行了新闻发布会。他向记者们通报了西南地区的局势，并指出：“苏联红军最高统帅部已下令苏联进攻部队追击敌人，直至将其彻底击败并投降。”他明确表示，这里所说的敌人自然是指德国国防军和罗马尼亚军队。随后，他说出了此次发言的重点：“苏联政府声明，它无意获取罗马尼亚的任何领土，也无意改变罗马尼亚现有的社会制度。”[412]对于许多人来说，要更明确、清晰地阐述苏联的新立场——既非革命性的，也非共产国际式的立场，或许是很困难的。而且，如果再考虑到苏德战线上这一地区的战斗已经暂停，那么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的这番话应被视为向罗马尼亚政府发出的含蓄提议。罗马尼亚政府面临着一个选择：要么立即退出战争，要么面临彻底的失败和投降。

次日，即 4 月 4 日，温斯顿·丘吉尔在下议院发言时，看似不经意地提到，莫洛托夫关于罗马尼亚的声明是“盟国合作的一个非常令人满意的例子”[413]。这不仅让议会的议员们明白，也让布加勒斯特方面明白，苏联的立场反映了他丘吉尔和罗斯福的意见。然而，安东内斯库政府在过去半年里一直通过中立国家了解罗马尼亚可能退出战争的条件，但它对苏联的提议并未做出回应。

布加勒斯特的犹豫不决是可以理解的。毕竟，即使是芬兰，凭借其地理位置与德国可靠地隔绝开来，也仍然没有下定决心断绝与柏林的关系，行动迟缓。那么，安东内斯库政府又该如何行动呢？罗马尼亚的处境要糟糕得多。罗马尼亚不仅被德国的卫星国从四面八方包围，被紧紧控制，而且实际上还被德国国防军占领。莫斯科理解布加勒斯特犹豫不决的原因，目前也没有催促它。苏联领导只是采取了一个行动——制造了军事威胁。

直到 1944 年 5 月 13 日，才发出了严厉的警告。这一次是以三个大国的名义发出的，不仅针对芬兰和罗马尼亚，也包括匈牙利和保加利亚。“这些国家，”苏联、英国和美国政府的联合声明中强调，“仍然可以通过退出战争、停止与德国的有害合作，并以一切可能的方式对抗纳粹势力，来缩短欧洲战争的时间，减少自身最终将遭受的损失，并为盟国的胜利做出贡献……因此，这些国家现在必须决定，它们是否打算坚持其毫无希望且注定失败的政策，阻碍盟国不可避免的胜利，尽管它们还有时间为这一胜利做出贡献。”[414]

这就是最后的警告。

但无论芬兰和罗马尼亚最初对向它们提出的提议有何反应，实际上都无关紧要。这些国家退出战争的谈判以及接受苏联实际上带有最后通牒性质的边界要求，都是不可避免的。问题仅仅在于这将在何时发生：是现在，还是稍后，再过两三个月。而对于波兰，这个未来苏联在欧洲国家安全体系中的第三个、也是关键组成部分，却无法做出同样的预测。

这绝不仅仅是因为波兰是苏联在反希特勒联盟中的盟友，原则上这排除了对它施加任何压力，尤其是军事压力。

与波兰流亡政府进行哪怕是普通的磋商都存在问题，其原因在于该政府在东部边界问题上的坚定、明确立场。而 1941 年 7 月 30 日，首相 W.西科尔斯基和大使 I.M.迈斯基在丘吉尔和艾登在场的情况下于伦敦签署的苏波协议，在很大程度上强化了这一立场。协议的第一条、也是最基本的一条明确规定：“苏联政府承认 1939 年的苏德关于波兰领土变更的条约已经失效。”[415]这样一来，莫斯科自己承认了 1939 年 9 月确定的边界在法律上已经不再有效，未来需要通过谈判来重新确定这条边界。

为了不仅实现和解，而且与被敌人占领的邻国建立最密切的友好关系，克里姆林宫竭尽全力。8 月 14 日，苏联与波兰签署了一项军事协议，规定在苏联领土上组建波兰军队，为此，弗拉迪斯拉夫·西科尔斯基政府获得了 3 亿卢布的贷款，并宣布对所有被关押的波兰公民实行大赦。12 月 4 日，双方签署了一份关于友好关系的联合声明，宣布两国将战斗到取得全面胜利。

然而，这一切丝毫没有影响波兰流亡政治圈子中的情绪。那里公开的反苏观点非常强烈，以至于西科尔斯基不得不在 1942 年 1 月 30 日准备了一份通告，旨在消除亲苏派代表的影响。首相写道：“在英国的波兰社会中，一些不负责任的人攻击并不断攻击波苏协议。这些人无所顾忌，利用一些波兰人对俄罗斯的情感因素，毫不犹豫地泄露官方机密文件，这只会对德国有利。”随后，弗拉迪斯拉夫·西科尔斯基不仅谴责，而且要求：“所有波兰公民，无论他们个人对苏联俄罗斯、其制度、政策和经济持何种态度（我们要指出，苏联俄罗斯有许多积极的方面），都必须毫无疑问地服从波兰的国家利益。而国家利益至少要求他们克制自己，不发表任何对苏联不利的评价。”[416]

与此同时，西科尔斯基本人在政府和军队高层中越来越孤立，他不得不妥协，公开表示支持战前波兰边界的不可侵犯性。他试图说服丘吉尔放弃将寇松线作为东部的民族边界，但没有得到英国首相的理解。1942 年 3 月，这位将军飞往华盛顿，希望得到罗斯福政府的支持，但在那里也没有成功。西科尔斯基的犹豫不决，他试图调和不可调和的矛盾——既要与莫斯科保持友好关系，又要在边界问题上与之对抗——导致了悲剧性的结果。他的老政治对手、在苏联组建的波兰军队指挥官 W.安德尔斯将军，早在 1942 年 3 月就坚持将他指挥的、最具战斗力的部分部队调往近东。随后，他坚信苏联很快且不可避免地会失败，于同年 7 月 13 日迫使苏联政府同意将波兰军队全部通过克拉斯诺沃茨克撤往伊朗。与此同时，波兰境内的家乡军（AK）、地下武装力量与红军指挥部刚刚建立起来的合作也随之结束。

现在，苏波关系变成了纯粹的形式上的关系，但即便如此，这种关系也没有持续多久。在斯大林格勒战役失败后，纳粹宣传决定利用德国人早就知道的卡廷森林屠杀波兰将军和军官的事件。他们希望通过大肆宣扬此事，达到破坏苏联与波兰、甚至与英国、美国的关系以及军事同盟的目的。但这次挑衅只取得了部分成功。1943 年 3 月 25 日，莫洛托夫向波兰大使塔德乌什·罗默递交了一份照会，其中特别指出：

“当苏联人民在与希特勒德国的艰苦斗争中流血牺牲，全力以赴地为了打败俄罗斯和波兰人民以及所有热爱自由的民主国家的共同敌人时，波兰政府却为了迎合希特勒的暴政，对苏联进行了背信弃义的攻击。苏联政府知道，波兰政府发起的这场针对苏联的敌对运动，是为了利用希特勒的诽谤性谎言对苏联政府施加压力，以迫使苏联政府割让苏联乌克兰、白俄罗斯和立陶宛的领土……”莫洛托夫认为这种立场极其敌对，因此认为有理由宣布苏联与波兰流亡政府断绝外交关系。

在这种前所未有的、独特的情况下，苏联领导只剩下一件事可做。那就是尽快找到一个更可靠、更顺从的合作伙伴，以便在未来的谈判中使用。找到或创建一个政治组织，它能够作为一个全国性的组织出现，拥有与西科尔斯基政府相当的合法性。同时，这个组织必须毫无疑问地承认寇松线是从占领者手中解放出来、重生的波兰唯一可以接受的东部边界。

与流亡政府断绝外交关系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表明，这一事件对克里姆林宫来说是出乎意料的，使其措手不及。当时，莫斯科还没有像英国和美国在法国问题上在吉罗将军和戴高乐将军之间进行选择那样，拥有一个可供选择的波兰政治结构，甚至还没有准备好人为地创建这样一个结构。因此，苏联领导起初不得不利用波兰爱国者联盟（SPP）。这是一个于1943 年 1 月成立的社会组织，由作家万达·瓦西列夫斯卡娅领导，其作用非常有限——在苏联境内的波兰人中间进行亲苏宣传。正因为如此，波兰爱国者联盟不得不在 5 月 6 日成为创建新波兰部队的的正式发起者。这些新部队将在苏德前线与敌人作战，并且在必要时，还能成为创建与苏联友好的波兰地方行政机构的组织中心。

为了让任何人都不会对波兰爱国者联盟的政治倾向产生怀疑，由他们组建的“科希丘什科”师，在 8 月时已扩编为第 1 波兰军团。该联盟于 1943 年 6 月 16 日发表了一份声明。在声明中，除了其他内容外，还提出了一个相当明确的口号：“为了波兰，强大并非靠夺取他国领土”，这显然暗指有争议的维尔纽斯地区、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西部地区；“而是靠与我们所有盟友的友好关系”，换句话说，不仅是与伦敦和华盛顿，而且必定要与莫斯科友好相处[418]。

但这一切仍无法抵消流亡政府的积极活动，它试图坚持让国际社会承认战前的边界。这种企图在 1943 年秋表现得尤为强烈，当时正值三大国（苏、美、英）外长莫斯科会议召开前夕，此次会议旨在筹备最高级别的德黑兰会议。斯坦尼斯瓦夫·米科瓦伊奇接替了 7 月 4 日在空难中丧生的西科尔斯基，出任首相一职。他做出了孤注一掷的努力，试图获得英国和美国对其领土主张的支持。然而，这些努力并未取得成功，更糟糕的是，结果适得其反——在德黑兰会议上，寇松线被承认为苏波边界的基础。克里姆林宫不得不加快为波兰创建一个替代政府的进程。

由于别无选择，尽管共产国际已经解散，并且在新的形势下不再以共产党为导向，克里姆林宫还是不得不依靠波兰工人党（PPR，即重生的波兰共产党）及其“人民近卫军”，这些名义上是独立的游击队。1943 年底，波兰工人党得以开始创建莫斯科急需的、潜在的权力机构——民族解放委员会（KRN）。12 月 13 日，它（当然是非法地）发布了《波兰民主社会政治和军事组织宣言》，该宣言具有明显的倾向性。这份文件宣布，“萨纳齐亚”政权应对 9 月的灾难负责，谴责流亡政府的反苏行为，同时指出其已彻底破产。它宣称，在当前形势下，有必要创建民族解放委员会，作为“波兰人民的实际政治代表，有权代表人民并对人民的命运负责，直至波兰从占领者手中解放出来”。它还宣布，与此同时创建隶属于民族解放委员会的地下人民军（AL），并且在不久的将来还将成立临时政府[419]。值得注意的是，宣言中刻意忽略了波兰边界的问题。

仅仅两周后，即 1944 年 1 月 1 日，民族解放委员会成为了现实：其领导机构——主席团成立了。成员包括波兰工人党的代表——博莱斯瓦夫·贝鲁特（主席）和卡齐米日·米雅尔（秘书），波兰社会党左派分裂出来的波兰社会工人党（RPPS）的代表——爱德华·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副主席），“人民力量”（农民党）激进派的代表——弗拉迪斯拉夫·科瓦尔斯基，以及人民军的代表——米哈尔·日梅尔斯基（“罗拉”）。然而，苏联领导终于有了一个忠诚可靠的盟友，却并没有急于承认民族解放委员会为波兰的全权代表。目前，它只是利用民族解放委员会的存在来达到一个目的：对流亡政府施加道德压力，迫使其接受克里姆林宫的条件。

事实上，随后莫斯科和伦敦之间开始的信件往来就达到了这个目的。1 月 5 日，米科瓦伊奇政府率先发难，再次声称对 1939 年并入苏联版图的所有领土拥有管辖权。1 月 11 日，克里姆林宫以传统的“塔斯社公告”形式做出了回应。公告中坚定地指出：“波兰的复兴不应通过夺取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土地来实现，而应通过收回被德国人从波兰夺走的波兰固有领土来实现。”与此同时，“公告”也为双方的周旋和通过妥协达成协议留下了可能性：“苏联政府并不认为 1939 年的边界是不可改变的。这些边界可以朝着有利于波兰的方向进行调整，以便将波兰人占多数的地区划归波兰。”[420]而伦敦政府在 1 月 13 日的另一份声明中，并未排除谈判的可能性，但宣布将不会自行进行谈判，而是通过中间人——英国和美国来进行。然而，对于最重要的边界问题，却只字未提。

从这时起，波兰问题就成为了斯大林与丘吉尔和罗斯福之间一场注定无果的讨论话题。苏联方面的态度非常明确：无论是斯大林，更不用说莫洛托夫，都不会在边界问题上做出任何重大让步。但克里姆林宫并不担心讨论进入新的阶段，因为时间站在它这一边，只会不断巩固它的地位。苏联红军与波兰军团（1944 年 3 月已改编为第 1 波兰军）继续坚定地向西推进，逐渐接近 1939 年的边界。这也使得莫斯科能够推迟波兰问题的最终解决，保留根据变化的形势做出最可行、最可接受决定的可能性。

战争的根本性转折已经显现，对敌人的胜利即将到来，这也导致了苏联高层内部几乎无人察觉但却极其重大的变化。苏联武装力量和外交的胜利，尤其是斯大林与丘吉尔和罗斯福平等地参与德黑兰会议，共同决定世界命运，这一切在斯大林看来意义非凡。他认为这是恢复自己昔日独一无二领导地位的最佳时机。他再次成为了毫无争议、无人质疑的领袖，被所有人毫无例外地视为国家和人民、政府和政党的领袖。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正如所发生的事情那样，他发动了一场“悄无声息的宫廷政变”。他试图尽可能地削弱那些对他构成极大威胁的国防委员会同僚的地位，如莫洛托夫、贝利亚和马林科夫。与此同时，不仅要恢复两年半前失去的昔日的伟大和荣耀，还要最大限度地巩固它们，为自己的近期未来提供保障。

和往常一样，权力高层的权力格局变化是通过惯用的、经过实践检验的纯粹官僚手段实现的。但最重要的是，这一切都是在暗中进行的。

作为预示即将发生重大变化的序曲，1943-1944 年之交进行了人事调动。1943 年 12 月 11 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 A.A.安德烈耶夫被任命为农业人民委员（前任贝内迪克托夫被“调任”为第一副委员）[421]，这表明他已被彻底排除在对全国党组织活动的掌控之外。他的活动范围被限制在一个虽然重要但相对狭窄的领域——农业，从那时起，安德烈耶夫不得不同时以两种身份开展工作：既是中央农业部门的负责人，又是执行者——农业人民委员。这样一来，他就陷入了相当危险的境地，因为在苏联，没有什么问题比解决农业问题更没有前景和希望了。现在，随时都可能有人因为工作的失败而指责安德烈耶夫，而工作失败的情况随时都可能被发现。

1 月 19 日，V.V.库兹涅佐夫的调动同样具有预示性。他之前先是一名工厂工程师，后来在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工作，仅仅几个月前才开始领导苏联黑色金属工人工会中央委员会，现在他被任命为苏联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422]。这标志着一颗在苏联权力阶梯上冉冉升起的新星开始了其成功的职业生涯。又一个此前无人知晓、但显然前途无量、被某人提拔上来的官员出现了。

而在高层的广泛范围内，真正深刻、重大的变化直到 1944 年晚春才发生。当时，在苏德战场和外交战线上都出现了短暂的平静，这是因为人们在等待盟军在法国北部登陆。而一个意想不到的、果断行动的正式借口是早就为人所知但却“突然”被发现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副手人数过多，以及他们的工作效率极低且缺乏成效。5 月 15 日和 18 日通过的两项相互

补充的政治局决议，部分地对国家最高行政权力机构进行了重组，改变了其组成人员，同时也改变了高层核心领导中的权力平衡。

第一项决议，即 5 月 15 日的《关于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副手的决议》，内容如下：

“目前，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有 13 名副手：莫洛托夫（第一副手）、米高扬、贝利亚、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沃兹涅先斯基、维辛斯基、马利舍夫、帕尔乌欣、柯西金、萨布罗夫、布尔加宁、梅赫利斯。在这些部长会议主席的副手中，只有 6 到 7 人有机会履行副手的职责，而其余的人，要么是因为在自己所在的人民委员部工作过于繁忙，要么是因为目前被调往前线工作（布尔加宁、梅赫利斯），无法履行部长会议主席副手的职责。另一方面，马林科夫同志虽然不是部长会议主席的副手，但实际上却在履行多个人民委员部的副手职责。

鉴于上述情况，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定：

a)解除梅赫利斯、布尔加宁、维辛斯基、帕尔乌欣、萨布罗夫、马利舍夫、卡冈诺维奇同志的部长会议主席副手职务；

b)任命马林科夫同志为部长会议主席副手；

c)批准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团成员组成如下：莫洛托夫（主席）、米高扬、沃兹涅先斯基、什维尔尼克、安德烈耶夫、柯西金；

d)批准国防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成员组成如下：贝利亚（主席）、马林科夫、米高扬、沃兹涅先斯基、伏罗希洛夫。”[423]

5 月 18 日，政治局的另一项决议进一步明确甚至扩展了前一项决议的内容：

“关于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副手的职责和国防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的工作。

鉴于联共（布）中央 1944 年 5 月 15 日关于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副手的决议，政治局决定：

1.委托伏罗希洛夫同志监督和检查海军人民委员部、渔业人民委员部、交通人民委员部、卫生人民委员部、体育运动委员会、大地测量和制图总局、苏联支援陆海空军志愿协会的工作。

2.委托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团成员什维尔尼克同志监督和检查重型机械制造人民委员部、中型机械制造人民委员部、机床制造人民委员部、劳动力储备总局、标准委员会、度量衡委员会的工作。

3.除已承担的职责外，委托莫洛托夫同志监督和检查司法人民委员部、检察院、高等教育委员会、科学院、塔斯社、俄罗斯东正教事务委员会的工作。

4.除已承担的职责外，委托贝利亚同志监督和检查造纸工业人民委员部、橡胶工业人民委员部和天然气工业总局的工作。

5.除已承担的职责外，委托马林科夫同志监督和检查电力工业人民委员部和氧气总局的工作。

6.除已承担的对财政人民委员部、国家银行和军事工业建设总局工作的监督和检查职责外，委托沃兹涅先斯基同志监督和检查建筑材料人民委员部和建筑事务委员会的工作。

7.除已承担的职责外，委托米高扬同志监督和检查地质事务委员会的工作。

8.除已承担的职责外，委托舍尔巴科夫同志监督和检查艺术事务委员会、电影事务委员会、无线电广播和无线电通讯事务委员会、报刊军事机密保护管理局的工作。

9.将以下工作划归国防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管理：

a)监督和检查所有国防工业人民委员部（航空工业人民委员部、坦克工业人民委员部、弹药人民委员部、海军人民委员部、船舶工业人民委员部、军事建设人民委员部）、铁路和水路运输人民委员部（交通人民委员部、内河航运人民委员部、海运人民委员部和内河航运总局）、黑色和有色金属冶金工业、煤炭工业、石油工业、化学工业、橡胶工业、纸浆和造纸工业、电工器材工业以及发电站人民委员部的工作；

b)审议并提交国防委员会主席审议关于上述人民委员部的个别问题、季度和月度生产计划以及国民经济的金属、煤炭、石油产品、电力供应季度计划，并对这些计划以及上述人民委员部的所有物资技术供应计划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

c)解决与上述‘a’项中所列人民委员部相关的当前问题，并就这些问题发布决议和指令。

10.撤销国防委员会下属的运输委员会，将铁路、海上和内河运输的运输计划的审议工作委托给国防委员会常务委员会。

11.任命萨布罗夫同志为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第一副主席。”[424]

此外，5 月 16 日还通过了一项简短但意义重大的决议，同样是关于人事问题的：任命 L.P.贝利亚为国防委员会副主席[425]。

不难看出，这些表面上似乎仅仅是出于对工作的关心而做出的变动，背后隐藏着更多的东西。一些没有直接表达出来、暗自谋划的东西。首先，正式确定了由 11 人组成（当然包括斯大林）的新的核心领导班子成员构成。而且明显可以看出这是一种妥协，这次也不例外，没有妥协是无法达成的。

为了实现自己纯粹的个人目的，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不得不牺牲掉他的四个亲信——布尔加宁、维辛斯基、卡冈诺维奇和梅赫利斯。反过来，“三驾马车”的成员们，现在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了，也不得不接受他们的三个同伙——马利舍夫、帕尔乌欣和萨布罗夫地位的大幅下降。然而，斯大林无疑是最大的赢家。因为他不仅成功地消除了“三驾马车”对他构成的哪怕一丝一毫的反对迹象，还将 N.A.沃兹涅先斯基纳入了核心领导班子，而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和贝利亚曾长期且成功地反对这一点。现在，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同时进入了两个国家最高行政权力机构，即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团和国防委员会常务委员会。这样一来，他重新获得了 1941 年 5 月之前的地位，而且向所有应该知道的人表明：沃兹涅先斯基即便还没有成为公认的斯大林在苏联部长会议的“接班人”，但无论如何再次成为了他的“得力助手”。此外，作为政治局委员的候选人，他显然取代了卡冈诺维奇在斯大林最亲密的同事圈子中的位置。

这两项决议也显示出 A.I.米高扬在一定程度上所扮演的类似角色。他是除莫洛托夫之外，斯大林旧有圈子中唯一的代表，尽管历经种种波折，他还是成功地在核心领导班子中稳固地保住了自己的位置。他出色地履行着所有职责，对领袖保持忠诚，同时又不与“三驾马车”发生冲突，不追求更多，满足于已取得的成就。

与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不同，A.A.安德烈耶夫和 K.E.伏罗希洛夫没有经受住考验。他们留在核心领导班子里很可能只是名义上的，就像跑龙套的角色，只是因为他们在政治局会议上的决定性一票才得以保留。只是暂时的，直到斯大林不再需要他们，或者他们没

有犯下极其严重的错误，以至于排除了再次被利用、被维护的可能性。现在，显然有人在支持他们，为他们安排了一种类似“后备”的角色，以备万一，为此还引入了三个新的核心领导成员。A.S.舍尔巴科夫——除了担任中央书记、党的理论家之外，还获得了苏联部长会议的一个职位。N.M.什维尔尼克——实际上在苏联最高苏维埃的日常工作中接替了重病的加里宁。A.N.柯西金——在战争最艰难的几个月里，通过紧张的工作证明了四年前赋予他的高度信任是正确的，表明他能够无可挑剔地完成任何最艰巨的任务。

变化最为显著的是前“三驾马车”成员的地位。5 月 15 日和 18 日的决议打破了他们此前明显的平等地位，这种平等地位部分是由于相当频繁的职责重新分配造成的，而且——只是基于个人约定。

莫洛托夫再次像 1941 年 5 月那样，开始被排除在参与解决所有最重要的一般性问题之外。他越来越多地被迫专注于有限的外交政策问题，并局限于此。剥夺他国防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席的职位，以及去年 12 月 27 日交给他的任务——负责监督联共（布）中央外国（后来更名为国际）部的工作（该部门是根据政治局当天的决议，在解散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机关的基础上，由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领导成立的），就是这方面无可置疑的证明。

贝利亚被任命为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和国防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席，这使他在权力上与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完全平等，但他不得不全身心投入到国防工业、交通运输、冶金工业以及许多其他与国家安全的具体问题相距甚远的事务中。而且从 6 月 20 日起，同样根据政治局的决议，他还必须“监督国际石油事务”，这很快不可避免地使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不得不处理仅仅一年后才明确决定的伊朗（南部）阿塞拜疆的命运问题。由于这一切，他失去了每天关注内务人民委员部和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工作、深入了解工作并进而指导其活动的机会。

马林科夫除了在党的等级体系中位居第二之外，还担任了一个相当高的政府职位，而且现在这个职位不再是在紧急情况下（即临时的）设立的机构中，而是在一个宪法规定的机构中。但他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他不得不接受新的、实际存在且极其复杂、相互矛盾的从属关系。他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实际上都要在国防工业的领导方面服从贝利亚，从而不得不接受“三驾马车”成员之间平等关系的终结。作为解放区经济恢复委员会主席，他不得不依赖于看似在这个机构中从属于他的沃兹涅先斯基和米高扬所做出的决策，但首先是要受制于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团的计划和行动。由于马利舍夫、帕尔乌欣和萨布罗夫被排除在部长会议副主席的行列之外，他失去了以往对苏联部长会议施加影响的手段。此外，他还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即他无可争议的支持者和拥护者萨布罗夫被如此明显地降职。萨布罗夫没有被给予与人民委员职位相当的职务，而仅仅被任命为沃兹涅先斯基的第一副手。

与此同时，政治局 5 月 15 日和 18 日的决议还显示出了另一个同样重要的方面。首先，政府职位仍然具有无可争议的优先地位。它们的重要性仍然超过党内职位，因此也依然是最具吸引力的，因为现在这些职位也使得其担任者成为了核心领导班子的成员。其次，政治局的这两项决议，没有像以前那样，通过立法部门相应的法案来加以确认，这凸显了整个体制的不合理性、法律的虚幻性以及对宪法的完全漠视。因为从法律上讲，任命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副手仍然是苏联最高苏维埃的专属特权，是其会议的职权范围。所以，这些仅仅停留在党内层面的决议，是明显专断行为的一个例子。这是对以往那种虽然纯粹是表面上的、但毕竟还是遵循法律条文做法的背离。幕后的阴谋和“机关游戏”变得公开化了。这也证实了政治局大多数成员并非偶然地不愿意在 1 月份通过由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准备的中央全会决议草案，该草案旨在限制党的作用。

第十五章

1944 年春末，苏联高层核心领导集团的重大人事变动，尽管带来了新的权力平衡，但对当时推行的政策并未产生任何影响。这一变动并未促使苏联放弃通过军事与外交相结合的方式来解决芬兰和罗马尼亚退出战争的问题，而且这种解决方案并不意味着要将这两个国家苏维埃化。苏联在夏季依然坚定地执行着原有的政策路线，没有做出任何调整。唯一对局势产生了一定影响、但只是暂时的因素，是 6 月 6 日美国、英国和加拿大军队在诺曼底的登陆行动。这标志着莫斯科长久以来所期待的第二战场（如果不算意大利战场的话）终于开辟。

6 月 10 日，列宁格勒方面军的部队打破了长达四个月的停火状态，开始在卡累利阿地峡发起进攻。十天后，他们没有在旧边界停留，顺利占领了维堡，随后又转入了防御状态。6 月 21 日，相邻的卡累利阿方面军也重新展开了激烈的战斗行动。在那里，红军迅速向西北方向推进，解放了卡累利阿-芬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首府——彼得罗扎沃茨克。7 月 21 日，红军推进到了库奥利西马地区，抵达了 1940 年的边境线，然后在已占领的阵地上巩固了下来。这为外交官们开展后续工作创造了条件。

直到此时，芬兰领导层才最终认识到继续抵抗是毫无意义的。如果他们仍然不想让国家被苏联军队占领，那么就必须立即摆脱目前所处的困境。因此，战争的顽固支持者、芬兰总统吕蒂被迫辞职，将国家元首的职位让给了相对更为温和的元帅卡尔·曼纳海姆。曼纳海姆在两周半后，勇敢地告知抵达赫尔辛基的德国国防军最高统帅部参谋长、陆军元帅凯特尔，他认为芬兰不再受与柏林签订的军事同盟条约的约束。又过了一周，在斯德哥尔摩，苏联驻芬兰大使安娜·米哈伊洛夫娜·柯伦泰与芬兰大使冯·格里彭贝格开始就芬兰退出战争的条件和程序进行磋商。

芬兰方面最终同意完全接受莫斯科早在 3 月份就提出的建议。但他们只坚持一点：在 9 月 15 日前，芬兰有权自行促使德国军队从该国南部地区撤离，或者在同一期限内将德军予以拘留。芬兰试图通过这种方式，排除苏联军队进入并占领芬兰的任何可能借口。在得到苏联的同意后，芬兰政府于 9 月 4 日夜间宣布停止军事行动。

9 月 7 日，由芬兰总理卡尔·哈克塞尔率领的全权代表团抵达莫斯科，后来哈克塞尔生病，外交部长卡尔·恩克尔接替他继续谈判，并于 9 月 14 日签署了停战协定。苏联方面由安德烈·亚历山德罗维奇·日丹诺夫签署了这份至关重要的文件，这也为他随后迅速被任命为具有半军事、半外交性质的芬兰盟国管制委员会主席一职埋下了伏笔。

在西南方向，事态的发展几乎遵循着相同的模式，只是进展速度异常迅速。在长时间的平静之后，8 月 20 日，红军在那里突然发起进攻，展开了雅西-基什尼奥夫战役。在这次战役中，红军彻底击溃了包括 2 个德国师和 3 个罗马尼亚师在内的强大敌军集团，完全解放了摩尔达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并占领了罗马尼亚的大片领土，推进到了普洛耶什蒂-康斯坦察一线。这次战役及其迅速的进展——仅仅十天，就对罗马尼亚的军事和政治圈子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8 月 23 日夜间，布加勒斯特发生了一场政变。总参谋部和军官团意识到继续追随柏林将面临巨大的危险，于是与反对党结成联盟，夺取了政权。自 1940 年秋季以来一直担任独裁者的安东内斯库元帅被逮捕，米哈伊国王被宣布为国家元首，当然，他只是名义上拥有所有必要的权力。第二天早上，以他的名义发布了一份声明，宣布停止对同盟国的军事行动，表达了与同盟国缔结和平的意愿，并宣布成立以康斯坦丁·萨纳特斯库将军为主席的民族团结政府，该政府成员包括自由党代表——格奥尔基·布拉蒂亚努、民族农民党代表——尤

柳·马纽、社会民主党代表——康斯坦丁·彼得雷斯库和共产党代表——卢克雷齐乌·帕特拉斯卡努。同一天，作为对这一意图的有力证明，德国军事使团的成员被拘留。

8 月 24 日，新政府又发布了一份声明，宣布准备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使国家最终、正式地退出战争。与此同时，罗马尼亚驻安卡拉大使利用土耳其的中立地位，将所发生的事情告知了苏联驻土耳其大使谢尔盖·亚历山德罗维奇·维诺格拉多夫。苏联外交部迅速做出了回应。8 月 25 日，莫斯科确认了苏联早在 3 月份就已表明的立场，该立场归结为几个要点。其中主要包括：承认 1940 年的苏罗边界；罗马尼亚归还 1940 年被匈牙利占领的特兰西瓦尼亚部分领土；赔偿苏联因罗马尼亚军事行动所遭受的损失；为红军提供自由行动的权利，以便歼灭德军。

罗马尼亚政府毫无保留地同意了所有这些要求，并于 8 月 30 日向莫斯科派遣了一个全权代表团，以正式确认这些要求。9 月 12 日，经过短暂的讨论后，司法部长卢克雷齐乌·帕特拉斯卡努和元帅罗季翁·雅科夫列维奇·马利诺夫斯基签署了停战协定。

与此同时，由于罗马尼亚实际上已经退出战争，红军部队几乎没有遇到抵抗，于 9 月 2 日抵达了保加利亚边境，9 月 6 日抵达了南斯拉夫边境。在特兰西瓦尼亚进行了一些小规模战斗后，9 月 22 日，红军抵达了匈牙利边境。

1944 年夏天，对于苏联来说最为关键、最为核心的波兰问题的解决进入了决定性阶段。苏联高层领导集团终于找到了一个看似绝境中的最佳解决方案。克里姆林宫似乎选择了一种自我超脱的方式，表面上让波兰人自己去处理国内问题。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苏联采取了一项在整个战争期间都极为特殊的举措。就像 1939 年对待芬兰和 1940 年对待波罗的海各共和国一样，苏联被迫为波兰建立一个明显受莫斯科控制的权力机构。但这并非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政府，因为这样的举措必然会加剧与丘吉尔和罗斯福之间的冲突。目前，这只是一个为解放区的盟国波兰设立的国家行政机构。

正是在 5 月底开始、持续了两个月的苏联领导层与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KRN）的谈判中，找到了这样一种解决方案。这些谈判恰好在红军几乎完全解放了乌克兰（仅剩下利沃夫州和斯坦尼斯拉夫州仍在占领者手中），抵达了一条新的、从国际法角度来看仍存在争议的边界线，并等待着向西进攻华沙的命令时结束。7 月 15 日，由爱德华·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率领的、正在莫斯科的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代表团，显然是在展示其对权力的渴望，以该委员会和波兰工人党的名义向斯大林提交了一份备忘录：

“一、……建立波兰临时政府（以下简称‘波临政府’——尤里·日丹诺夫注）的时机已经完全成熟，进一步的拖延可能会导致严重的复杂情况。首先：在没有波临政府的情况下，红军进入波兰领土，敌对分子会立即利用这一点，无论是在波兰国内还是国外，将红军的到来描绘成‘俄罗斯占领’的开始。其次：建立波临政府将动摇波兰流亡政府在波兰的秘密行政机构及其军事组织的基础……第三：建立波临政府将使苏联和波兰之间的关系能够在国家间协议的基础上得以确立……第四：建立波临政府将使在波兰和苏联的波兰武装力量能够在统一指挥下联合起来……

二、我们设想在地区民族委员会的基础上建立波临政府，在第一阶段，该委员会将由国内和国外的其他民主组织代表进行扩充。波临政府将对扩充后的地区民族委员会负责，该委员会将在波兰人民为反对希特勒主义而斗争过程中所创建的制宪议会（作为临时议会）召开之前一直发挥作用……”[426]

无论是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还是波兰工人党，对于他们打算在苏联支持下建立的政府那极其狭窄、极度受限的政治基础，都丝毫没有感到不安。有一个重要的情况使他们能够采取这样的行动。与伦敦方面相比，他们拥有无可争议的优势，这些优势很好地弥补了他们在合

法性方面哪怕是最微小的欠缺。首先，与米科瓦伊奇政府不同，他们的波临政府将在被解放的波兰领土上存在并开展活动，而不是在流亡中。此外，他们的武装力量将不是在像意大利这样远离祖国的国家作战，而是在波兰本土作战，每天都参与到从占领者手中解放波兰的行动中。

然而，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关注的并非是未来波临政府的这些特点。他们做出决策、将目光投向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的依据，是该委员会对波兰边界问题的态度。6 月 22 日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表达的观点，以及随后在 7 月 18 日至 22 日第三轮谈判中得到确认的观点，即同意莫斯科提出的在东部和西部都调整边界的提议。而且，即将成立的行政机构将包括波兰工人党、波兰社会工人党和农民党三个政党的代表，这表明了它的联合性质，从而在形式上遵循了民主原则。苏联领导层批准了建立这个新的权力机构，但仍然不是将其作为一个完整的政府，而是作为政府的替代品。

在莫斯科的压力下，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不得不放弃立即建立波临政府的计划，只能在严格规定的范围内行事。7 月 21 日，他们在尚未解放的卢布林发布了一份声明（表面上是在那里发布的），宣布接管在苏联的第一波兰军和在波兰的人民军的最高指挥权，从那一刻起，这两支部队合并为波兰军队。第二天，在真正从德国人手中解放出来的第一个波兰大城市海尔姆，发布了一份宣言，宣布成立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PKNO）——临时民政管理的中央机构，显然该机构觊觎着国家政权的角色。爱德华·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波兰社会工人党）担任主席和外交事务部门负责人，副主席由安杰伊·维托斯（农民党）担任，他还兼任农业和土地改革部门负责人，万达·瓦西列夫斯卡（波兰工人党）也担任副主席。人民军指挥官米哈尔·罗拉-日梅尔斯基担任国防事务部门负责人。

斯大林不再需要隐藏自己的计划和决策，他吸取了过去的教训。7 月 23 日，他向丘吉尔解释说：“我们不想也不会在波兰领土上建立我们自己的行政机构，因为我们不想干涉波兰的内政。这些应该由波兰人自己来做。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与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建立联系……在波兰，我们没有找到任何其他力量能够建立波兰的行政机构。”他还立即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补充——“我不能把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视为波兰政府，但有可能在未来，它将成为由民主力量组成波兰临时政府的核心。”[427]这样一来，他为未来的谈判留下了可能性，也为他绝不排除的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与伦敦政府在苏联可接受的条件下合并的可能性留下了余地。

苏联对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的态度在另一份文件中得到了几乎相同、但完全正式的表达。在 7 月 26 日苏联外交部的声明中，特别指出：苏联政府“将红军在一个主权、友好、同盟国家领土上的军事行动视为正常情况。鉴于此，苏联政府不打算在波兰领土上设立自己的行政机构，认为这是波兰人民自己的事情。因此，苏联政府决定与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签署一项协议……”。随后，声明非常坚持且意味深长地强调了克里姆林宫对邻国的新态度，这种态度绝不是革命性的，也不是共产国际式的。就像在与芬兰和罗马尼亚谈判时所表现出的态度一样，这种态度不仅应该让波兰人安心，消除他们对未来的恐惧，还应该让全世界明白，苏联已经不同以往了。“苏联政府，”苏联外交部的这份文件宣称，“声明其不追求获取波兰领土的任何部分，也不打算改变波兰的社会制度（着重号为我所加——尤里·日丹诺夫注）[428]。

从各方面来看，当时苏联领导层认为，这样的立场应该完全消除所有那些导致与流亡政府断绝外交关系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同时，这也使苏联能够重新掌握主动权。正如所期望的那样，这迫使丘吉尔向斯大林提出请求，允许米科瓦伊奇前往莫斯科。从而接受了这一次由克里姆林宫制定的新游戏规则。苏联领导层的这一策略取得了成功。“我们的真诚愿望，”英国首相 7 月 25 日给斯大林的信中写道，“是让所有波兰人在将德国人赶出他们国

家的事业中团结起来，并在建立一个自由、强大、独立且与俄罗斯友好合作的波兰（着重号为我所加——尤里·日丹诺夫注）的事业中团结起来，而您曾宣布这是您的目标。”[429]

在当时已经形成的、相当明确的形势下，流亡政府要想继续掌权，只剩下一种可能性：自己解放华沙，并在红军部队和波兰军队到来之前迁往那里。只有通过这种方式，它才能掌控局势，并迫使莫斯科只与它进行直接谈判。正是出于这个原因，8 月 1 日，根据来自伦敦的命令，由布尔-科莫罗夫斯基将军和蒙特尔将军领导的波兰家乡军（AK）在波兰首都开始了武装起义，起义初期进展顺利。起义者在人数上几乎是敌人的两倍，占据优势。他们还利用了当时战场上非常有利的形势——7 月 29 日，苏联军队已经抵达距离华沙以南仅 90 公里的维斯瓦河，对驻扎在那里的德国军队构成了迂回和包围的威胁。

7 月 29 日，斯坦尼斯瓦夫·米科瓦伊奇与国民委员会（取代议会的机构）主席斯坦尼斯瓦夫·格拉布斯基以及外交部长托马斯·罗默抵达莫斯科。他们希望利用对自己非常有利的形势，说服苏联领导层同意在他们提出的基础上建立民族团结政府，即在政府中为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的代表提供最少数量的职位。但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并不急于会见他们。直到 8 月 3 日才接见了代表团，让他们在毫无意义的等待中煎熬了四天。他们听取了米科瓦伊奇的提议以及他关于华沙起义的第一份、极其乐观的报告。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表示准备下达命令，向华沙起义者提供武器和弹药。但他非常坚定地表示，关于新政府及其组成的问题，不应该与他讨论，而应该与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的成员讨论[430]。

米科瓦伊奇和他的同伴们别无选择，只能听从这一建议。8 月 6 日和 7 日，他们与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维托斯、日梅尔斯基和瓦西列夫斯卡进行了谈判，向他们的政治竞争对手提出在未来政府中给予 20%的职位。他们原本只预计会在部长职位的数量上进行讨价还价，但却陷入了关于现在应该以哪部宪法为基础的讨论中。是被认为具有民主性质的 1921 年宪法，还是 1935 年开始生效、曾是“萨纳齐亚”政权法律基础、甚至在战前就被反对派视为半法西斯性质的宪法。

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坚持无条件恢复 1921 年宪法，并保证如果伦敦方面同意，将给予他们总理职位和另外三个关键的部长职位。米科瓦伊奇寄希望于家乡军在华沙的即将胜利，回避了直接回答，提议尽快继续保持联系。

8 月 9 日，在返回伦敦之前，米科瓦伊奇再次受到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接见。他们对未来政府只字未提，但却开始坚持不懈地说服米科瓦伊奇他们认为最重要的事情。即为了波兰的利益，应该用已经事实上失去的包括维尔纽斯和利沃夫在内的东部领土，换取像弗罗茨瓦夫（布雷斯劳）和什切青（斯德丁）这样拥有大型工业城市的西部领土[431]。他们试图让米科瓦伊奇相信，苏联高层领导集团认为这是一个不容置疑的现实。就在同一天，斯大林签署的最高统帅部命令，虽然表面上涉及的是一个具体问题——战利品的收集，但明确指出：独立波兰的领土从寇松线以西开始[432]。

与此同时，华沙起义者的处境急剧恶化。德国人不仅没有像家乡军指挥部所预期的那样开始向西撤退，反而向波兰首都投入了包括四个坦克师在内的强大兵力。现在，只有红军的行动才能决定这座城市及其居民的命运，但红军仍然距离较远。米科瓦伊奇政府的预期显然没有实现，苏联领导层迅速对所发生的事情做出了评估，并完全与起义撇清了关系。

8 月 12 日，塔斯社的一份声明指出：“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的报纸和电台……暗示华沙的起义者与苏联指挥部有联系，而后者没有给予他们应有的帮助。塔斯社受权声明，外国媒体的这些说法和暗示要么是误解的结果，要么是对苏联指挥部的诽谤。塔斯社知道，对于华沙发生的事情，伦敦的波兰方面没有做出任何努力提前通知苏联军事指挥部并与其协调任何在华沙的行动。因此，华沙所发生事情的责任完全落在波兰流亡者身上。”[433]

8 月 16 日，斯大林写信给丘吉尔：“华沙行动是一场鲁莽的、可怕的冒险，给居民带来了巨大的牺牲。如果在华沙行动开始之前苏联指挥部得到通知，如果波兰人能与苏联指挥部保持联系，这种情况就不会发生。”8 月 22 日，斯大林再次写信给丘吉尔：“迟早，关于那些为了夺取政权而发动华沙冒险的一群罪犯的真相会大白于天下。这些人利用华沙人民的轻信，把许多几乎手无寸铁的人推向了德国的大炮、坦克和飞机之下。造成了这样一种局面：现在的每一天，不是波兰人在利用时机解放华沙，而是希特勒分子在毫无人性地屠杀华沙居民……”[434]

尽管对伦敦政府和家乡军指挥部进行了如此严厉的谴责，苏联领导层还是试图尽一切可能来缓解起义者的处境。当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的部队终于抵达华沙的近郊时，该方面军司令员康斯坦丁·康斯坦丁诺维奇·罗科索夫斯基与斯大林取得了联系。“我汇报了，”康斯坦丁·康斯坦丁诺维奇后来回忆道，“当时的局势以及与华沙相关的所有情况。斯大林问我，方面军的部队现在是否有能力发起解放华沙的行动。在得到我否定的答复后，他要求尽可能地帮助起义者，缓解他们的处境。”[435]

从 9 月 13 日开始，苏联开始定期、密集地通过空中向起义者提供武器、弹药、食品和药品。应家乡军指挥部的指示，苏联空军从空中掩护起义者解放的城市区域，并轰炸德军部队。9 月 14 日，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的部队成功占领了华沙的右岸地区——普拉加。一天后，波兰第一师强渡维斯瓦河，试图从北面进入波兰首都并与起义者会合。然而，与占优势的德军进行的激烈战斗迫使伞兵部队在 9 月 23 日撤回到河对岸。现在，起义已经注定失败，10 月 2 日，布尔-科莫罗夫斯基签署了投降书。

米科瓦伊奇第二次访问莫斯科是在 10 月 12 日至 19 日期间，这次访问并没有改变伦敦方面与苏联领导层之间的关系，因为从那时起，克里姆林宫完全依赖于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及其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10 月 13 日波兰总理与斯大林和丘吉尔的会面，以及 10 月 14 日与丘吉尔和艾登的会面，都没有带来任何积极的进展，他们明确拒绝支持伦敦方面对白俄罗斯和乌克兰西部地区以及维尔纽斯地区的领土要求。英国首相的言论特别鲜明地体现了英国对波兰问题的新态度。

“米科瓦伊奇：斯大林说，波兰和俄罗斯之间的边界应该沿着寇松线划定。

丘吉尔（愤怒地）：我不管这事了。就我而言，我拒绝参与这件事。我们不会仅仅因为波兰人之间的争吵就破坏欧洲的和平。你们如此固执，看不到事情的真相。我们会不欢而散，无法达成协议。我们会告诉全世界你们是多么的不可理喻。你们想要挑起一场新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将会有 2500 万人丧生。但你们根本不在乎这些。

米科瓦伊奇：我知道我们的命运在德黑兰就已经注定了。

丘吉尔：在那里你们的命运得到了挽救……波兰将得到三个大国的保证。我们肯定会提供保证。美国总统的行动受到美国宪法的限制。无论如何，你们没有失去任何东西，因为俄国人反正已经在那里了。

米科瓦伊奇：我们失去了一切。

丘吉尔：普里皮亚季沼泽和 500 万人口。乌克兰人不属于你们的民族。拯救你们自己的民族，让我们有机会采取有效的行动吧。”[436]

10 月 17 日与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的接触也同样毫无结果。米科瓦伊奇试图坚持原来的立场，向波兰工人党在未来政府中提供三个职位，并且坚决拒绝了与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合并的任何可能性。当然，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不可能接受这样对他来说极具侮辱性的达

成妥协的条件。因此，在此次使命彻底失败后回到伦敦的米科瓦伊奇，不得不在 11 月 24 日提交辞呈。将总理职位让给了波兰社会党极右翼代表托马斯·阿尔齐谢夫斯基。

现在，克里姆林宫可以放手行事了。尽管它曾做出过一些尝试，试图在务实的基础上促成两个波兰政治团体的和解，尽管这些尝试非常微弱，远远没有达到可能的坚持和韧性程度，但最终还是没有成功。由于伦敦方面明显的顽固不化和毫无意义的固执，这些尝试以失败告终。完全是他们的过错。既然事情已经如此，那么，显然可以顺应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对权力的渴望。最终允许它实现长久以来的愿望——将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转变为临时政府。这一切在 12 月 31 日发生了，形式上是应波兰解放区人民的强烈要求。几乎就在同时，1945 年 1 月 5 日，苏联承认了这个新的权力机构[437]。

1944 年夏天出现的极其有利的形势，使苏联领导层有机会尝试实施其国家安全理论的最大化方案。不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成果——在西部边境建立一圈友好国家，而是要更进一步。建立又一道、更远的“防御线”。与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建立紧密的、长期的同盟关系。

保加利亚的局势对苏联来说发展得异常迅速，同时也非常顺利。红军刚一抵达保加利亚北部边境，9 月 5 日，索非亚就迅速公布了一份政府施政纲领声明。声明称将恢复民主自由，解散法西斯组织，废除反共产国际协定，并表示今后将奉行中立政策。然而，苏联及其盟友对保加利亚这种试图回避原则性问题的做法并不满意，因为这在本质上并没有改变什么。保加利亚仍然保持着对柏林的长期倾向，德国军队仍驻扎在保加利亚领土上，而且保加利亚的占领军仍在希腊和南斯拉夫。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苏联认为有必要断绝与保加利亚的外交关系并向其宣战。

9 月 7 日，索非亚政权试图通过再次做出让步来推迟自己的灭亡。它最终还是断绝了与德国的外交关系，并在 9 月 8 日宣布对德开战。然而，即使采取了这些措施，它也已经无可挽回地错过了时机。红军部队已经开始从多瑙河向南推进，没有遇到保加利亚军队哪怕是最轻微的、象征性的抵抗。同一天，在索非亚组建了新的政府——基蒙·乔治耶夫政府。新政府下令逮捕亲德摄政委员会的成员，并宣布准备尽一切可能满足苏联的要求，以实现正式退出战争。

苏联对所取得的成果感到满意，宣布停止在保加利亚的军事行动。而向乔治耶夫政府提出的条件也相对宽松。只要求保加利亚军队从在战争期间为德国作战而占领的南斯拉夫和希腊领土上撤出。保加利亚军队的撤离于 10 月 10 日开始，10 月 28 日，保加利亚外交部长佩特尔·斯塔伊诺维奇和乌克兰第三方面军司令员费奥多尔·伊万诺维奇·托尔布欣元帅在莫斯科签署了停战协定。

唯一一个上述经过三次成功实践的模式未能奏效的国家是捷克斯洛伐克。在整个战争期间，苏联与捷克斯洛伐克之间从未出现过任何问题或复杂情况。1941 年 7 月 18 日，苏联就在伦敦与捷克斯洛伐克流亡政府签署了共同对抗德国的条约，1941 年 9 月 27 日的莫斯科协定进一步细化了该条约，规定了在苏联领土上组建捷克斯洛伐克军队的相关事宜，1943 年 12 月 12 日的伦敦协定则规定了两国之间的友好、互助及战后合作关系。1942 年 2 月，在苏联开始组建独立的捷克斯洛伐克营，两年后，该营得以扩编为一个军：下辖两个步兵旅、一个伞兵旅、一个坦克旅和一个航空团，自 1943 年 3 月起，该部队在苏德战场上英勇作战。

1944 年 4 月中旬，红军抵达外喀尔巴阡地区的捷克斯洛伐克旧边界，但没有越过喀尔巴阡山脉。按照计划，只有在出现有利的军事和政治形势时，苏联军队才会继续向西推进。即当斯洛伐克民族委员会（SNS）——这个于 1943 年秋季在多党基础上成立的反法西斯抵抗运动地区中心，发动武装起义时。该委员会指望依靠一支 4.7 万人的、对德国怀有敌意的傀

儡“斯洛伐克国”军队，凭借自身力量解放从科希策到布尔诺的领土。由于预计这一计划必将取得成功，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在 4 月 30 日签署了一项协定，详细规定了红军指挥部与爱德华·贝奈斯政府的国家行政机构之间的关系，预计在起义过程中成立该行政机构。同时，这项新协定也确认了对于战后欧洲格局至关重要的一点：捷克斯洛伐克在慕尼黑会议前的边界内保持独立。

不幸的是，这个旨在以最小的牺牲换取胜利的计划未能实现。就在起义前夕，即 8 月 29 日，德国军队占领了斯洛伐克。他们解除了最具战斗力的东斯洛伐克军团的武装，控制了喀尔巴阡山脉的所有山口。尽管 8 月 30 日斯洛伐克民族委员会还是宣布推翻了蒂索的亲纳粹政权，并在第二天宣布在战前边界内重建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但它始终未能掌控局势。战斗变成了一些局部的、分散的冲突，很快就演变成了纯粹的游击战争。规模相当大的苏联空降部队本应加强和支援起义者，但也未能对局势产生重大影响。乌克兰第一方面军和第四方面军试图突破山口以改变局势的行动也以失败告终。到 10 月底，红军的进攻和斯洛伐克的起义都陷入了困境。

苏联军队进入巴尔干半岛，使莫斯科能够果断介入南斯拉夫极其复杂、前所未有的局势。在那里，多个政治团体长期以来进行着残酷的斗争，但主要是彼此之间的斗争。一方面是德国的盟友：克罗地亚军团、乌斯塔沙分子和国民自卫军；“白军军团”——由三个团的弗兰格尔俄国流亡者组成；斯洛文尼亚国民自卫军。另一方面是反法西斯力量：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将军领导的切特尼克（游击队），他是流亡国王政府的国防部长；由约瑟普·布罗兹·铁托指挥的人民解放军队（NOA），该部队是在 1941 年 7 月就开始抵抗占领者的共产主义游击队的基础上组建的。更糟糕的是，切特尼克游击队与其说在与德国和意大利军队作战，不如说在与人民解放军队作战，而人民解放军队在两线作战的同时，还得保护塞尔维亚和黑山的东正教信徒、波斯尼亚的穆斯林居民免受克罗地亚天主教徒的侵害。

与在开罗的南斯拉夫国王彼得二世及其政府保持着密切联系的英国指挥部，在盟军在意大利登陆后，也与人民解放军队的指挥部建立了联系，并开始向其提供武器。就在这时，莫斯科做出了最终选择。1943 年 12 月，苏联谴责了切特尼克游击队的行为，苏联外交部认为他们实际上是德国的帮凶，并表示支持南斯拉夫民族解放委员会（NKODY），这是人民解放军队的一个政治派别。次年 2 月，苏联领导层拒绝了流亡国王政府提出的签署互助条约的提议，3 月，派遣了由少将科罗廖夫率领的军事代表团前往铁托处。7 月 19 日，斯大林接见了抵达莫斯科的人民解放军队指挥部代表泰尔齐奇和吉拉斯，这一具有象征意义的举动进一步强调了克里姆林宫的立场。

这种局势的转变迫使奉行与共产党人对抗政策的南斯拉夫总理普里奇辞职。新任命的内阁首脑舒巴希奇不得不要求米哈伊洛维奇停止与人民解放军队的战斗，并与之一同组成统一战线。6 月中旬，舒巴希奇在南斯拉夫领土上与铁托进行的谈判巩固了这种关系，并促成了一个内阁的组建，其中包括南斯拉夫民族解放委员会的两名代表——武克 oslavlević 和 Marušić。7 月 22 日，舒巴希奇代表国王宣布任命铁托为所有南斯拉夫抵抗力量的最高统帅，一个月后，他解散了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的指挥部。

流亡国王政府做出这样复杂、显然对自己不利的举措，首先是在丘吉尔的巨大影响下被迫为之。丘吉尔对南斯拉夫政治圈子已经取得的成果并不满意，8 月 12 日和 13 日，英国首相亲自在伦敦接见了舒巴希奇和铁托，在与他们的会谈中强调了反希特勒力量团结的紧迫性。当然，丘吉尔这样做的动机是希望通过加强南斯拉夫的战斗，迫使德国军队尽快撤离希腊，因为英国计划在 10 月初在希腊登陆军队。

苏联领导层也没有袖手旁观。它为共同的斗争做出了自己非常显著的贡献。红军指挥部利用南意大利、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作为基地，在 7 月至 9 月期间，为人民解放军队指挥部

提供了装备 12 个步兵师和 2 个航空师的武器和弹药。通过这种方式增强了铁托部队的战斗力后，苏联军队于 9 月 28 日发起了贝尔格莱德战役，这使得在 10 月初，在得到南斯拉夫民族解放委员会的正式同意后，苏联军队与人民解放军队一起解放了南斯拉夫东部的大片地区，并于 10 月 20 日解放了该国首都。

1944 年盟军在欧洲的行动以一种独特的方式结束，而这也预示着后来在雅尔塔和波茨坦所做出的决定，那就是丘吉尔和斯大林于 10 月 9 日在莫斯科签署的那个后来广为人知的独特的“绅士协议”。实际上，该协议涉及英国和苏联的利益范围、影响力范围，在他们看来，这应该成为战后世界秩序的基石之一。正如英国首相在他的战争回忆录中所描述的那样：

“会议气氛变得务实起来，”丘吉尔回忆道，“我说：‘让我们来解决巴尔干地区的问题吧。你们的军队在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我们在那里也有利益、任务和特工。我们不要为了一些琐事而争吵。就英国和俄罗斯而言，您是否同意俄罗斯在罗马尼亚占据 90%的主导地位，我们在希腊也占据 90%的主导地位，在南斯拉夫则各占 50%？’在翻译这段话的时候，我拿了半张纸，写道：

‘罗马尼亚

俄罗斯——90%

其他——10%

希腊

大不列颠（与美国协商后）——90%

俄罗斯——10%

南斯拉夫——各占 50%

匈牙利——各占 50%

保加利亚

俄罗斯——75%

其他——25%’

我把这张纸条递给了斯大林，这时他已经听完了翻译。出现了短暂的沉默。然后他拿起一支蓝色铅笔，在纸条上画了一个大勾，把纸条还给了我。解决这个问题所花的时间，不比写这些内容的时间多。”[438]

波兰问题虽然在当天以及后来都进行了讨论，但仍然没有得到解决。

在丘吉尔的回忆录中，他只遗漏了与斯大林谈话中的一个细节。两周后，他相当冷淡地向罗斯福透露了这个细节：斯大林“希望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能够组成一个由独立的反纳粹、亲苏国家组成的区域，而且前两个国家可以合并”[439]。他没有提及自己对这个显然超出了可能达成协议范围的提议的反应。罗斯福在回信中也没有对此做出回应。

第三部分、1945－1948 年全球战略

1945 年 1 月初，在盟军诺曼底登陆六个月后，纳粹政权仍在顽强抵抗。它几乎控制着整个中欧地区。除了德国本土之外，还掌控着波兰的大部分地区、捷克斯洛伐克、奥地利、匈牙利西北部、南斯拉夫北部地区以及意大利、荷兰、丹麦、挪威。德国国防军在维斯瓦河西岸与红军对峙，美国、英国、法国的师团也被其阻挡，无法进入德国本土。然而，即便处于这样极为有利的战略形势，纳粹政权也已无法改变任何局面。盟军部队组成的包围圈随时准备收紧，因此第三帝国的覆灭已注定，且不可避免，而且很快就会到来。唯一不太明确的是，胜利之后将会发生什么。

“三巨头”的成员们坚持不懈地努力，希望尽快结束对剩余有争议问题的讨论。彻底决定德国的命运：是将其永远肢解为几个独立的国家，还是暂时划分为几个占领区。确定从战败敌人那里索取赔款的数额和形式。最后，协调他们对于战后世界秩序的截然不同的看法。当然，首先是关于欧洲的秩序。但随着胜利的迅速临近，在大多数这些问题上，他们之间的分歧非但没有缩小，反而进一步扩大，而且相当显著。

苏联领导层试图坚定地遵守 10 月 9 日那份对其极为有利的“绅士协议”，甚至遵循的不仅仅是协议的字面内容，更是其精神实质。苏联没有做出任何哪怕最微小的尝试去改变那些红军部队驻扎国家的社会制度，或者说将这些国家“苏维埃化”。苏联对已取得的成果感到满意，因此与在当地组建的多党政府合作，而这些政府的领导人绝非共产党人。在罗马尼亚，苏联与君主制政府以及无党派将军萨纳特斯库领导的内阁合作。在保加利亚，同样是与君主制政府和乔治耶夫政府合作。在匈牙利，与由小业主党派代表米克洛什领导的临时政府合作。在南斯拉夫，与得到国王认可的舒巴希奇内阁合作。此外，对于希腊境内英国军队与希腊人民解放军（ELAS，即共产党游击队）之间血腥的战斗，苏联没有做出任何反应。苏联领导层也接受了自己不参与解决西欧国家国内政治问题的现状。尽管苏联对罗斯福和丘吉尔在对待戴高乐的问题上存在分歧了如指掌，但它还是在华盛顿和伦敦承认戴高乐的临时政府之后，才予以承认。因此，苏联希望英国和美国也能采取同样的态度，希望今后仍能以同样的妥协方式解决所有日益凸显的问题。但事实证明，这只是徒劳，因为无论是英国首相还是美国总统都在打着自己的算盘，试图实现完全是他们自己的目标。

罗斯福仍然是有限孤立主义政策的拥护者。1944 年 11 月中旬，他就曾公开警告丘吉尔，美国军队很快将撤离欧洲：“在德国崩溃之后，我必须尽快把我的军队带回家，速度要尽可能快，只要运输工具允许。”[440]尽管英国首相曾坚持不懈地试图说服他改变立场，指出法国的力量显然不足以在战后遏制德国，但罗斯福始终没有改变自己的立场。罗斯福的所有利益关注点首先集中在亚太地区。关注中国、法属印度支那、菲律宾、荷属印度尼西亚的命运，以及与日本的战斗的结束，在他看来，这对美国来说比胜利后欧洲的局势更为重要。

丘吉尔对总统的这些观点只是部分认同。他甚至用同样的理由来解释自己在与斯大林谈判中的让步态度。他在给罗斯福的信中写道：“您可能已经得知，苏联政府显然决心在推翻希特勒之后进攻日本，他们正在仔细研究这个问题，并且准备大规模地展开盟国间的相关准备工作。当某些事情让我们感到恼火时，我们应该记住，这个因素对于缩短整个战斗的时间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着重号为我所加——尤里·日丹诺夫注）。”[441]但尽管如此，丘吉尔无论如何都无法放弃他认为是英国传统政策核心的东西——按照伦敦方面的理解，在欧洲实现权力平衡。

正是出于这个动机，他坚决捍卫斯大林所坚持的苏波边界。“我已经在公开会议上向议会通报了，”1944 年 10 月 18 日，丘吉尔从莫斯科返回后立即给罗斯福写信说道，“我们

支持寇松线作为解决东部边界问题的基础，而且我们与俄罗斯签订的 20 年条约使得我们有必要明确我们在这方面的立场，尽管目前美国还没有这样的需求。”[442]他同样直白地解释了 10 月 9 日与斯大林达成的协议。“对我们来说，”丘吉尔指出，“绝对有必要尝试就巴尔干问题达成一致意见，这样当我们和您可能会同情一方，而‘乔大叔’（指斯大林——尤里·日丹诺夫注）同情另一方的时候，我们能够避免一些国家发生内战。”[443]

与此同时，当丘吉尔认为英国的利益需要时，他并不在意自己所造成的矛盾局面。他的行动明显与他自己给出的解释相矛盾，但却完全符合 10 月 9 日的“绅士协议”。尽管遭到美国公众的抗议以及罗斯福的微弱反对，他还是下令在希腊的英国远征军在君主主义者与共和主义者的武装斗争中站在君主主义者一边。而他自己则引发了一场他曾声称非常担心的内战，而且这场内战还持续了很多年。但他对自己这一出人意料的决定的解释绝非出于真心，并非基于英国在东地中海地区真正的战略计划。他在给罗斯福的又一封信中，在谈及希腊问题时耍起了心眼：“如果我们撤出我们的军队，而这对我们来说很容易做到，那么将会发生一场可怕的大屠杀，而且在雅典将会建立起一个极端左翼的共产主义政权。”[444]

这些因观点和目标的分歧而产生的潜在矛盾，使得“三巨头”有必要再次会面，这是第二次会面。由于一个完全可以理解且合理的原因，这次会面直到 1945 年 2 月才得以举行——在美国总统选举之后，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正式就任总统。

与此同时，复杂的国际问题越来越多地将苏联卷入到一种对它来说陌生、不熟悉，因而充满了各种意外的全球战略之中。这不仅迫使苏联在欧洲扮演一定的角色，也在亚洲发挥作用。与此同时，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这些问题预先决定了苏联高层核心领导集团内部在两个关键问题上的观点之争：一是实施全球战略的经济能力，二是该战略的意识形态保障。

第十六章

1944 年 11 月 18 日出版的美国当时流行且广泛传播的杂志《星期六晚报》发表了一篇篇幅较长的文章，标题颇具轰动性甚至带有歧义——《斯大林的时代在流逝》。文章作者亨利·卡西迪是一位知名的评论员，也是美联社莫斯科分社的负责人，他享有极高的声誉，被认为是苏联问题的权威专家。在当时众多身处苏联首都的外国记者中，他与众不同，因为他是仅有的三位（另外两位是英国人拉尔夫·帕克（《泰晤士报》）和金（路透社））在战争期间能够采访斯大林，并得到斯大林对其问题书面答复（美国媒体称之为“信件”）的记者之一。而且他并非像其他同事那样仅有一次机会，而是在 1942 年 10 月 3 日和 11 月 13 日两次就第二战场的重要性问题得到了斯大林的书面回复。

《星期六晚报》上的这篇文章总体上相当客观且较为友好，其中包含了一个让读者颇为意外的细节。“约瑟夫·斯大林现在知道，他已时日无多，无法完成自己的工作了……最近，斯大林在与来访者的交谈中，几乎带着忧伤地谈到苏联未来的经济发展五年计划，或是战后的贸易与合作时，总会用‘如果我能活到……如果我能活到’这样的话打断自己。他说这句话时，语气更像是肯定而非假设。12 月 21 日就年满 65 岁的斯大林知道，他活不了多久了……”

为了避免产生误解，亨利·卡西迪急忙解释道：“我这样说并不是指斯大林即将离世。”但他仍然认为有必要基于对这位领导人健康状况的悲观评估，对苏联局势的发展做出自己的预测。“更有可能的是，”这位记者推测道，“他会采取一种适度的保守路线，以便在去世前保住他所能做到的一切。”[445]这则来自遥远莫斯科的颇为奇特的消息，恐怕很难在美国读者心中激起什么波澜。他们更应该担心的或许是刚刚第四次当选的自己国家的总统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的身体状况。但从那时起，美国人乃至全世界所了解到的关于斯大林健康状况的信息，实际上在苏联国内都是被严格保密的国家机密。除了苏联高层核心领导以及中央委员会机关的一些高级官员之外，所有人都无从知晓。尽管卡西迪的这篇文章已经晚了六个月，但宣传部门还是认为有必要将其翻译出来，并只让极少数人知晓。[446]然而，对于这些人来说，真正重要且决定他们未来行动的，与其说是来自美国的这则令人沮丧的消息，不如说是政治舞台上权力格局的一个新的、突然且重大的变化。事实证明，就在仅仅五个月前（即当年 5 月）进行的人事变动，远非最后一次。这些变动突然再次开始，而且——说来也怪——恰恰就在 1944 年 11 月。而且和之前一样，这次变动之前也是一些不太重要的、例行的低级职位任命。

早在 7 月，I.T.佩雷谢平娜就被免去了交通人民委员的职务，只保留了苏联国防委员会交通总局局长的职位。[447]新任交通人民委员是他多年的第一副手 K.Y.谢尔久克。不久之后，9 月初，采购人民委员 K.P.苏博京因“不胜任工作”被撤职。他被任命为罗斯托夫州委第一书记，这个职位既“烫手”又缺乏吸引力，接替他的是 B.A.德温斯基。两周后，采购人民委员的职务从 A.I.米高扬手中被拿走，并交给 G.M.马林科夫“监督”其工作。[448]

真正重要、最具意义且从根本上决定了新局势的，是 N.A.布尔加宁地位的变化。

从 1941 年 6 月起，他一直只参与“军事”工作——担任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最初是在西方面军，从 1943 年 10 月起在波罗的海第二方面军。然而，这次调动并没有让布尔加宁摆脱对所犯的疏忽和错误应承担的责任。由于西方面军的失利持续时间过长，最高统帅部于 1944 年 4 月成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来调查那里发生的事情的原因。中央委员会书记处派出了 G.M.马林科夫（担任主席）和 A.S.什维尔尼克，总参谋部派出了 S.M.什捷缅科、F.F.库兹涅佐夫和 A.希莫宁。根据他们的结论和建议，V.D.索科洛夫斯基被解除了方面军司令的职务，降职为乌克兰第一方面军参谋长。而 N.A.布尔加宁则根据 4 月 20 日政治局的决

定，受到了党内警告处分，并被免去了波罗的海第二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的职务，理由是“未能履行职责”。[449]

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的失势出人意料地短暂，仅仅持续了三周。尽管官方认定他不称职，但 5 月 11 日他再次被任命为同样的职务，这次是在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但在那里，布尔加宁也未能恢复自己的声誉，用实际行动证明恢复他原职是合理的。因此，8 月 1 日他最终还是被解除了“军事”工作。他被任命为苏联部长会议驻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代表——这个职位甚至连大使的级别都不如。而且如果再考虑到不久前，也就是 5 月，N.A.布尔加宁不再担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一职，那么几乎可以肯定地说，他那曾经辉煌的职业生涯就此结束了。

但这个看似非常合理的推测后来被证明是站不住脚的。毫无缘由、没有任何解释（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显然无法给出合理的解释），1944 年 11 月 20 日，根据斯大林的提议，政治局批准……布尔加宁担任副国防人民委员。[450]他的地位提升到了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的级别。不仅如此，11 月 21 日，根据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的提议，布尔加宁还被纳入了国防委员会——取代了伏罗希洛夫。[451]直到这时，所有人都终于确信，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是“谁的人”，谁对他的不断晋升感兴趣，以及他被赋予了怎样的角色。而被从国防委员会中除名的伏罗希洛夫，不得不接受一个相当低微的职位——匈牙利联合控制委员会主席。[452]

另外两项同样重要的任命也值得关注，它们对苏联高层核心领导集团的权力格局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12 月 14 日，根据政治局的决定，N.A.沃兹涅先斯基被任命为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453]这一任命恰逢莫洛托夫越来越多地关注和投入时间到国际问题上，尤其是联合国的创建问题。因此，这实际上意味着沃兹涅先斯基在这个职位上取代了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让他全权负责苏联部长会议的日常工作。这再次证实了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在国家经济管理中日益重要的地位。

同样具有象征意义的是，A.A.日丹诺夫在离开莫斯科三年半后再次回到莫斯科，这同样是根据政治局的决定——从 1945 年 1 月 4 日起。[454]因为在安德烈·亚历山德罗维奇在列宁格勒的这段时间里，他在党内等级制度中的崇高地位每个月都变得越来越不确定，因为他在书记处的职责先是由 A.A.安德烈耶夫履行，后来则是 A.S.什维尔尼克。甚至在 1944 年 8 月，日丹诺夫被任命为芬兰联合控制委员会主席——这个职位的级别低于元帅 R.Y.马利诺夫斯基和 F.I.托尔布欣，后来甚至还低于失势的伏罗希洛夫，这似乎都明确表明：他正逐渐从政治舞台上退下来。这表明，日丹诺夫可能只是在即将召开的党代会或中央全会之前保留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会书记的职位。而现在，一切又突然发生了变化。安德烈·亚历山德罗维奇仿佛从虚无中重新浮现，他夺回了一切——原来的职位，以及在老广场大楼里原来的办公室。但他能回来只是因为什维尔尼克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而此前没有人对他的工作有丝毫的质疑，现在他的健康状况已经不允许他哪怕名义上履行众多的职责了。

布尔加宁和沃兹涅先斯基史无前例的再次崛起，以及日丹诺夫回到莫斯科工作，成为了一个极端的标志，标志着苏联高层核心领导集团权力格局的新变化。另一个标志则是 N.N.沙塔林同样急剧、突然的失势。

他是多年来马林科夫在联共（布）中央干部管理局的第一副手，实际上参与组建了全国的党内和行政机构。1944 年 11 月 11 日，根据政治局的决定，他被派往一个荣誉性的职位。他被任命为联共（布）中央爱沙尼亚局主席。[455]这是一个类似于国防委员会的非常设的党和国家机构，专门为波罗的海各共和国和摩尔达维亚设立。只为这四个共和国设立，因为在解放后，这些地方需要做的与其说是恢复，不如说是重新建立苏维埃政权。要为从未进行过的集体化做准备，逐步取消仍然存在的私人小型零售贸易和服务业企业。而最重要的

是，要坚决、持续、顽强地与民族主义作斗争，不仅要打击在占领期间得以加强的民族主义，还要打击在波罗的海地区已经发展成极端激进形式的武装分离主义。正因为如此，才决定“为了帮助……加强党、苏维埃和经济机构的领导”，成立这些既未在党章中规定，也未在宪法中提及的联共（布）中央地区局。这些机构包括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和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的授权代表、民族共产党的第一书记和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而在这些局中担任主席的必须是从莫斯科派来的被赋予全权的人。

第一个担任这种特殊“检察官”角色（负责立陶宛）的是M.A.苏斯洛夫，他实际上只是换了个工作地点，而工作本身并没有改变。他曾是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无所不能的第一书记，现在在维尔纽斯担任同样的角色。同一天，但在塔林，N.N.沙塔林也得到了任命。但即使在一个半月后的12月29日，他还同时兼任了拉脱维亚局主席，[456]这也丝毫没有改变他明显“被降职”的处境。而1945年3月，完全不知名的党的工作人员F.M.布托夫被任命为基希讷乌类似的职位，这再次表明，这样的职位对沙塔林来说是一种公开的降职。

但是，N.N.沙塔林这样一个不属于苏联高层核心领导集团的人的调动，对集团内的权力格局有什么意义呢？他与马林科夫关系密切，他们观点一致、相互理解，这对任何人来说都不是秘密。因此，这样一个可靠的下属的失势，尤其是在另一个毫无争议的乔治·马克西米利安诺维奇（马林科夫）路线的支持者、“他的人”（不过不是在党内机构，而是在国家机构中）M.Z.萨布罗夫降职之后，看起来太刻意了。这无疑是对马林科夫的又一次打击，尽管不是直接的，而是间接的。打击的是他的威望，以及他通过同事或仅仅是盟友（甚至是临时盟友）对决策的准备、做出和实施产生影响的过大的影响力和能力。

如今，仍然无法明确回答亨利·卡西迪的说法是否正确，即1944年底斯大林的健康状况严重恶化。但毫无疑问、不容置疑的是另一件事。当时，在权力高层的所有变动背后，不是别人，正是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而且，从各方面来看，他这样做绝非为了国家利益，而完全是为了个人利益。他试图通过这种方式恢复自己的权威和领导者的原有地位，目的只有一个：正如卡西迪所推测的，并被后来的事实所证明的，推行他自己的、真正适度保守的路线。如果这个最初的假设是正确的，那么有两个情况让斯大林能够实现这一目标。

首先，红军的持续胜利推进。几乎整个国家都获得了解放——尽管德国国防军的一部分仍留在“库尔兰口袋”，但仅在拉脱维亚西部。在欧洲占领了大片领土——完全解放了罗马尼亚、保加利亚，以及波兰和南斯拉夫的东部地区，并进入了匈牙利。斯大林试图为苏联在战争初期的准备不足开脱罪责，淡化自己因1941年6月的灾难而产生的恐惧和绝望，他必须尽一切可能将胜利与自己作为国防委员会主席和最高统帅在领导红军方面的作用联系起来。他坚持不懈地让自己和所有人相信，苏联军队的胜利只与他密不可分。因此，尽管他完全是一个平民身份，在1943年3月6日斯大林格勒战役结束后，他还是接受了元帅的军衔。1944年7月28日，当敌人几乎被赶出苏联时，他也没有拒绝胜利勋章。

他认为所有这些荣誉和英雄主义的标志都是他应得的。

其次，苏联外交的辉煌成就对斯大林的行动以及他的自我评估也产生了同样强烈的影响。在较小程度上体现在使芬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在没有过多战斗和牺牲的情况下退出战争。在更大程度上体现在首先与丘吉尔，然后与罗斯福就对苏联最重要的问题达成了协议。确保了胜利后苏联的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有一种观点也不能排除，即高层会议上达成的成果是他个人的功劳。最后，在这里起决定性作用的肯定还有大家对他斯大林作为“三巨头”之一（与英国首相和美国总统平起平坐）的认可。这实际上是对他作为世界三大强国之一领导人的认可。

与此同时，在寻找这些事件发生的原因时，也不应忘记纯粹的人性因素——骄傲。1941年6月30日，斯大林被迫同意成立国防委员会，这让他感到屈辱。他不得不与莫洛托夫、贝利亚、马林科夫分享权力。这些人虽然对他完全忠诚，但在许多方面与他的观点不同，对近期和远期的计划也有不同的想法。很有可能，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担心莫洛托夫会不同意坚决放弃革命国际主义路线，而这可能会被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视为即使不是反革命的，至少也是修正主义的观点。担心这会滑向机会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立场。斯大林也可能担心贝利亚，他很可能会反对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反对削弱各加盟共和国的实际权力，反对将它们降为州和边疆区的级别。也不能排除斯大林与马林科夫之间可能会出现严重分歧，正如后来的所有事件所表明的，马林科夫是胜利后尽快缩减国防工业的坚定和一贯的支持者。

斯大林只能对那些他亲自提拔的人充满信心，他用自己的名字和持续坚定的支持为他们提供了可靠的保护。对“年轻一代”（如沃兹涅先斯基、布尔加宁、柯西金）充满信心，他们还需要不辜负领导人的信任。在苏联高层核心领导集团可能出现的所有分歧中，他们都能得到无条件的支持。对“老一辈”（如安德烈耶夫、日丹诺夫、米高扬、什维尔尼克）也充满信心，他们已经不止一次地证明了对他斯大林个人的忠诚和奉献。无论是“年轻一代”还是“老一辈”，对他来说都无所谓，只要他们是“可掌控的”，不希望也不能提出自己独特的想法和计划。

毫无疑问，正是这些原因首先导致了苏联高层核心领导集团的人事变动，带来了新的权力平衡，加强了斯大林的地位。同样可以肯定的是，用卡西迪的话来说，适度保守的路线在G.F.亚历山德罗夫及其领导的宣传鼓动部的辛勤工作下得以实现，他们致力于制定和巩固全新的意识形态指导方针。创建了新的坐标轴线，旨在不再按照旧的原则（将苏联人民分为社会主义的支持者和反对者、“白”和“红”）来划分，而是分为“爱国者”和“世界主义者”，当时使用这个还不常见的委婉说法，指的是民族主义者。既包括西部土地上的分离主义者，也包括那些主张维护加盟共和国权利的人。

斯大林认为，战争最重要的（如果不是唯一的）最终目标是可靠地保护国家免受军国主义德国的潜在威胁，他认为，即使在德国被击败后，在可预见的未来，德国也应该继续存在。早在德黑兰会议上，他就自信地宣称：“德国很快就能恢复元气。为此，它只需要15到20年的时间。无论我们对德国施加什么样的限制，德国人都有能力绕过这些限制……因此，德国会再次崛起并发动侵略。”[457]基于这样的想法，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以过去的惨痛教训为基础，首先寻求国际社会对苏联与波兰新边界的认可，将波兰转变为可靠和忠诚的盟友。然后，才试图争取从战败的敌人那里获得最大的赔款，以恢复苏联的国民经济，同时还争取让几个加盟共和国成为联合国的成员，这些国家的投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确保苏联在这个新成立的世界组织中提出的建议得到支持。

但正是这些问题成为了最复杂、最具争议的问题。在初步阶段，就已经暴露出丘吉尔、罗斯福（一方）与斯大林（另一方）观点的分歧。如果说在第二个和第三个问题上还可以期待达成妥协的话，那么第一个问题，即波兰问题，更确切地说是对卢布林政府的合法性的认可，有可能成为达成协议道路上的绊脚石。这有可能会使莫斯科与华盛顿和伦敦之间原本就不那么融洽的关系更加恶化。也会对在克里米亚会议上将要讨论的所有问题的讨论结果产生负面影响。

1944年12月30日，也就是雅尔塔会议召开前一个月，罗斯福还在坚持不懈地建议斯大林放弃对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PKNO）和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政府的无条件支持。“我一直认为，”这位美国总统写道，“我确信，米科瓦伊奇先生真心希望解决苏联和波兰之间所有尚未解决的问题，他是唯一一位值得接待的波兰政治家，似乎只有他能够为解决波兰这

个棘手而危险的问题提供真正的方案。”丘吉尔也毫不掩饰自己在这方面的兴趣。此外，他还准备随时与罗斯福一起向斯大林施加必要的压力。12 月 31 日，他告知斯大林：“当然，一旦您说这样做会有帮助，我们就会发出支持您的信息。”[458]

除此之外，1945 年 1 月，又出现了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伊朗的局势。在那里，苏联只是试图从伊朗沙阿政府那里获得英国很久以前就拥有的东西。即在伊朗北部省份、伊朗阿塞拜疆地区发现石油矿床的情况下，拥有勘探权和开采特许权。但这样一个在国际实践中完全合理的愿望，却意外地遭到了盟友的坚决反对。丘吉尔建议罗斯福采取毫不妥协的立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让莫斯科抱有在伊朗阿塞拜疆实现经济巩固的希望。“我们不希望，”他向总统解释自己的立场时说，“俄国人以后会声称，他们没有及时得到警告，不知道我们对这个问题的态度有多严肃。”美国国务院也同样坚决地表明了立场。在给罗斯福的一份备忘录中，该备忘录基于伊朗驻美国大使的言论，对局势做出了如下评价：“俄国人……的行为方式使得伊朗当局在不久的将来几乎不可能采取任何行政行动。”[459]然而，当时英国和美国并没有采取联合行动。为了实现其他更重要的目标，他们将行动推迟到了当年年底。

2 月 4 日，三大强国的领导人确定了雅尔塔会议的议程，尽管存在种种分歧，但这个议程对他们所有人来说都是可以接受的。议程仅限于最紧迫的问题：德国的命运、波兰问题、联合国宪章。这不仅预示着有展示给全世界看三国仍然团结一致的愿望，还预示着有达成协议或妥协的可能性，此外还有其他因素。罗斯福非常希望让苏联卷入与日本的战争。总统对驻扎在岛屿上的 400 万日本军队的无端担忧，无疑可能会在美军登陆时导致巨大的人员伤亡。

2 月 8 日，罗斯福在与斯大林的单独会晤中，成功达成了苏联参与太平洋战争的协议，他承诺从蒋介石那里获得对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独立的承认，将旅顺港租借给苏联作为海军基地，恢复苏联对中长铁路和南满铁路的权利。此外，总统还保证将库页岛南部和千岛群岛归还给苏联。反过来，苏联方面除了参与对日本的军事行动外，还承诺与中国签订友好同盟条约，承认中国对满洲的主权。[460]

在此之后，罗斯福在讨论过程中支持了斯大林提出的大部分建议。因此，很快就没有遇到太多分歧地在许多问题上达成了一致。关于德国行政管理的权力分散问题，划出法国的占领区（由美国和英国占领区划出），并让法国代表加入盟国管制委员会，这一点是丘吉尔特别坚持的。他们还接受了斯大林关于白俄罗斯和乌克兰有权成为联合国成员的提议，不过拒绝了让立陶宛加入。在其他情况下，当出现严重的意见分歧时，这些问题只是被提了出来，将其解决方案和最终表述推迟到以后。在讨论德国的肢解问题、联合国宪章以及其中的投票程序、南斯拉夫政府的命运、重新审视《蒙特勒公约》（该公约规定了黑海海峡的通航制度）的可能性、从德国获得赔款的最终数额等问题时，他们就是这样做的。

在讨论波兰问题时，他们极其谨慎，力求达成妥协，而实际上从 2 月 4 日到 11 日，会议每天都在讨论这个问题。他们满足了斯大林的要求，承认了波兰的新边界：东部以寇松线为准，北部和西部包括波美拉尼亚和但泽，以奥得河和尼斯河为界。然而，他们拒绝了罗斯福一开始就坚持的在会议期间成立一个由贝鲁特、格拉布斯基和萨佩哈组成的临时民族政府和摄政委员会的提议。他们将这个问题的决定权交给了一个特别委员会，该委员会包括莫洛托夫以及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阿韦雷尔·哈里曼、英国驻莫斯科大使阿奇博尔德·克尔，但必须满足两个条件。新的、统一的（取代当时分别在伦敦和卢布林，此时已成为华沙的临时政府）临时民族政府应该按照斯大林所希望的那样，不是通过扩大，而是通过重组华沙政府来组建。在此之后，大约一个月后，必须在波兰举行自由和民主的选举。[461]

丘吉尔相信斯大林会信守诺言，因此在英国下议院坚决捍卫这样解决波兰问题的方案。“波兰人的命运，”他在 2 月 27 日的下议院发言中说道，“将掌握在他们自己手中，唯一

的限制是他们必须与盟友真诚合作，奉行与俄罗斯友好的政策。”为了保护在他直接参与下达成的雅尔塔协议免受批评，这位英国首相只忽略了一件事——盟友之间矛盾的出现，而这绝非斯大林的过错。这是因为美国和英国违反了与苏联的协议，该协议禁止与德国当局进行单独谈判。

在瑞士伯尔尼，美国战略服务局代表艾伦·杜勒斯与德国驻意大利北部军队总司令凯塞林元帅的特使进行的秘密会晤，以及 3 月初，由英国陆军元帅亚历山大领导的盟军司令部军官与党卫军将军沃尔夫之间的会谈，这些会谈已具有谈判的性质，他们讨论了 25 个德国师投降的条件。这些情况莫斯科很快就知道了。尽管美国人惊慌失措，3 月 12 日通过他们的大使哈里曼试图向苏联领导层解释自己的行为，但却无法纠正这个错误。无论是罗斯福在 3 月 25 日那封来得太迟的信中，还是丘吉尔，都无法消除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的疑虑。

除此之外，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之间关系的恶化也加剧了局势的复杂性。在克里米亚会议上，可能会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即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比他的上司更倾向于采取强硬路线。但外交人民委员的职业特点迫使他总是带着所有与之相关的“算计”。在苏联高层核心领导中，莫洛托夫比任何人都更清楚措辞的重要性，以及其中最微妙的含义，如果措辞不完善，可能会导致对文件的任何解读，甚至是完全相反的解读。在“三巨头”批准了各项方案之后，他又同样一丝不苟地开始实际执行这些决定。在波兰事务莫斯科委员会的首次会议上，他就是这样做的。他表示，美国和英国的观察员有可能前往华沙，实地了解情况。然而，这个提议虽然在雅尔塔会议期间与斯大林的意见并不冲突，但后来与有关在伯尔尼进行单独谈判的情报相叠加，可以相当肯定地说，这引发了领导人对他这位老同事的不信任。怀疑他过于急切地向不可靠的盟友做出让步。

为了不失去主动权，斯大林完全接管了后续的外交政策事务。他将苏联高层核心领导的其他成员排除在对关键外交政策问题的传统集体讨论之外。他的做法非常独特，3 月 9 日通过政治局发布了一项决议，根据该决议，从今以后，外交人民委员部的所有密码电报都只送交他本人以及（这是无论如何都无法避免的）莫洛托夫审阅。不仅如此，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还迫使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公开撤回他之前向美国和英国代表发出的访问波兰的邀请。最后，他突然将莫洛托夫从苏联参加在旧金山召开的会议的代表团中除名，这次会议预计将宣布成立联合国。他用美国大使 A.A.葛罗米柯取代了莫洛托夫，他非常清楚这样的决定对盟友来说是一种侮辱。只是在最后一刻，在丘吉尔和罗斯福的压力下，他不想在他们面前暴露克里姆林宫幕后政治的秘密，才改变了原来的想法。他还是允许莫洛托夫率领苏联代表团。与此同时，斯大林在三个东欧国家中从温和路线转向了强硬路线。

2 月 27 日，副外交人民委员 A.A.维辛斯基抵达布加勒斯特，肩负着一项重要而艰巨的任务，类似于他 1940 年在拉脱维亚所执行的任务。他代表苏联政府宣布将特兰西瓦尼亚归还罗马尼亚管辖。他做了在和平条约签署之前他无权做的事情，因为只有和平条约才能确定这个前纳粹德国卫星国的边界。但作为交换，他成功获得了国王米哈伊签署的对苏联有利的法令。2 月 28 日——关于总理拉代斯库将军辞职的法令，3 月 6 日——关于任命共产党人彼得鲁·格罗扎担任该职位的法令。诚然，新内阁的形式上的民主性——联合性得以保留。它包括罗马尼亚所有被允许的政党的代表：民族自由党、民族君主主义党、社会民主党、共产党、民族人民党、农民阵线、爱国者联盟。

斯大林不再反对铁托元帅的权力野心。当铁托违反先前的协议，于 3 月 7 日担任南斯拉夫政府首脑，并任命前总理舒巴希奇为外交部长时，斯大林给予了官方认可。

然而，苏联在波兰的行动才是最严重的，这些行动有可能破坏与丘吉尔和罗斯福的友好关系。苏联国家安全部的顾问们派遣了仍然担任主要职务的 I.A.谢洛夫（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副部长）和 P.Y.梅希卡（苏联国防委员会反间谍总局（“锄奸部”）副局长）前往波

兰。他们到达后不久，一大批完全亲伦敦的波兰军事和政治活动家就被逮捕，这绝非偶然。这些人对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构成了明显的威胁，无论是在组建临时民族政府时，还是在举行全国选举时，他们都是实实在在的竞争对手。

在被苏联特工部门逮捕并立即驱逐到莫斯科的人员中，有准将 L.奥库利茨基，自 1944 年 9 月起他指挥着波兰家乡军，在 1945 年 1 月 19 日该军正式解散后，他领导着一个任务类似的地下战斗组织“NE”（“不屈”——“独立”），该组织公开宣布红军为占领军。此外，被捕者中还有在波兰的伦敦政府副总理 Y.扬科夫斯基，地下“部长会议”成员 A.贝尼亚、S.亚休凯维奇、A.派达克，以及另外 11 名来自“建设人民”党、“建设民族”党、“建设劳动”党、“民主联盟”等政党领导层的人。[465]

斯大林批准了在一个独立国家的领土上采取如此不寻常的镇压行动，他做了在雅尔塔会议上只是作为一种可能性被警告过的事情。他将其解释为波兰内战的开始，而红军的士兵和指挥官首先成为了这场内战的受害者。因此，起初他得到了丘吉尔的理解和支持，丘吉尔很可能没有想到逮捕行动的规模会如此之大。

在还不知道斯大林发起的政治行动的规模时，仅仅得知布加勒斯特和贝尔格莱德的政府更迭，英国首相平静地接受了所发生的一切。他甚至在 3 月 8 日给罗斯福的信中试图为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的行为辩解：“我相信，您会和我一样对罗马尼亚最近发生的事件感到遗憾。俄国人通过武力和欺骗手段建立了共产党少数派的统治。我们之所以没有抗议这些事件，是因为当我和艾登 10 月份在莫斯科时，为了在拯救希腊的事情上放开手脚，我们承认，在我们承担起在希腊的领导角色的同时，俄罗斯应该在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拥有主导影响力。斯大林在与共产党和希腊人民解放军（ELAS）在雅典进行的 30 天战斗期间严格遵守了这一协议，尽管这一切对他和他的周围人来说都极其不愉快……

斯大林在形式上遵循了雅尔塔会议的原则，毫无疑问，这些原则被罗马尼亚人践踏了。然而，我非常不想如此强调这一结论，以免斯大林会说：‘我没有阻止你们在希腊的行动。那你们为什么不想让我在罗马尼亚拥有同样的行动自由呢？’

这又会导致对他的行动目的和我们的行动目的进行比较。而且任何一方都无法说服另一方自己是正确的。考虑到我与斯大林的个人关系的性质，我相信，在这个时候走上争论的道路对我来说将是一个错误。”[467]

当丘吉尔和罗斯福得知波兰的逮捕事件时，他们都不想在那个时候谴责斯大林。当时他们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结束在德国领土上的战斗行动上。随后，易北河会师、攻克柏林、签署无条件投降书所带来的狂喜情绪，尽管时间很短，但也让其他一切都退居次要地位。

诚然，3 月底，丘吉尔还是决定与罗斯福商量一下。他想确认一下——“现在是不是我们两人都该就波兰问题给斯大林发个信息的时候了？”但美国总统认为时机还不成熟。他建议推迟联合行动。时间不会太长。他在 4 月 6 日回复说：“我们不能让任何人产生错误的印象，认为我们害怕了。再过几天，我们的军队将占据有利位置，这将使我们能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硬’，而这对参与战争来说似乎是有利的。”[468]

4 月 12 日罗斯福的突然去世并没有影响英国和美国领导人之间的信任关系，也没有影响他们协调行动的愿望——即决定应该采取什么措施、何时采取措施来遏制斯大林。美国国务院的立场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这一点，在给成为总统并需要某种指导的哈里·杜鲁门的一份备忘录中表达了这种立场。美国外交政策部门的负责人斯退丁纽斯解释说：“大不列颠。丘吉尔先生的政策首先基于与美国的合作。同时，它也基于维护三大强国的团结，但英国政府已经表现出对俄罗斯及其意图越来越多的担忧……苏联。雅尔塔会议后，苏联政府在我们关系中出现的大多数问题上坚持强硬和不妥协的立场。其中最重要的问题包括波兰问题、在

解放区执行克里米亚协议的问题、关于交换被解放的战俘和平民的协议问题、旧金山会议问题……”[469]

因此，杜鲁门急忙听从了丘吉尔的建议。他做了罗斯福没能做到的事情。4 月 18 日，美国和英国的领导人给斯大林发出了一封可能是战争四年以来最严厉的联合信件。当然，这封信是关于波兰问题的——“以免在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立场上产生误解”。实际上，他们以最后通牒的形式要求“立即”邀请三个政治团体的代表到莫斯科，就雅尔塔会议上计划的组建民族统一政府的问题进行谈判。必须这样做：“以防止我们解决波兰问题的努力付诸东流，避免产生难以预料的后果。”[470]

斯大林的回复表明，卡西迪在 1944 年 11 月做出的预测开始应验。但目前只是部分应验——仅适用于外交政策方面。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确实开始推行“适度保守”的路线，如果将其理解为不择手段地追求自己的目标，而这些目标并不总是与他的盟友所追求的目标一致的话。他的行动和丘吉尔或罗斯福在西欧的行动一样坚决和不顾一切。他扶持并公开支持波兰和罗马尼亚的亲苏政权。在斯大林的设想中，这些主要邻国应该成为保障苏联国家安全的区域，从而成为他切身利益的范围。他通过与这些国家签订为期数十年的友好互助条约，从法律上巩固了这种关系。首先，自然是与波兰——4 月 21 日签订。与此同时，利用这个机会，也与南斯拉夫——4 月 11 日签订了条约。

4 月 24 日，斯大林坚决而明确地向杜鲁门和丘吉尔解释了他的行为动机：“波兰与苏联接壤，而这一点是英国和美国所不具备的。对苏联国家安全来说，波兰问题就如同对英国国家安全来说，比利时和希腊问题一样重要。

你们可能不同意苏联有权要求波兰存在一个对苏联友好的政府，也不同意苏联政府不能容忍在波兰存在一个对它怀有敌意的政府。除其他原因外，为了解放波兰，苏联人民在波兰的土地上流淌了大量的鲜血，这一点也决定了苏联的立场。我不知道在希腊是否真的建立了一个有代表性的政府，也不知道比利时的政府是否真的是民主的。当这些国家建立政府时，苏联没有提出疑问。苏联政府也没有要求干涉这些事情，因为它理解比利时和希腊对英国安全的重要性。”

在回复中，斯大林也没有忍住强调了以前关系中出现的裂痕。“必须承认，”他写道，“美国和英国两个政府事先就波兰问题进行协商，而在这个问题上苏联是最感兴趣且利益最大的一方，这是一种不寻常的情况，这使苏联代表处于难以忍受的境地，他们试图将自己的要求强加给苏联。我必须指出，这样的情况不利于协调解决波兰问题。”[471]

然而，在仔细权衡了与华盛顿和伦敦断绝关系（哪怕是暂时削弱已建立的关系）的所有可能后果之后，斯大林不得不做出一些让步，明显减轻了自己的压力。他这样做是为了不失去在战争年代所占据的主要地位——世界三大强国领导人之一的地位。在旧金山会议上，这个地位很容易就会失去。

在最终确定联合国宪章，也就是原则上全新的政治结构（旨在确保国际合作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得到协调）时，展开了一场微妙的外交斗争。很明显，从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所熟知并成功运用的就所有问题达成共识的旧机制，明确而明确地转向了新的、不可预测的机制。转向公开投票的程序，在这种程序下，苏联甚至不能指望得到联合国大会多数的支持。按照美国和英国的设想，联合国大会应该成为联合国的主要机构。

这种转变的原因很简单。英美集团至少可以得到 1945 年春天组成联合国的 50 个国家中一半国家的支持，即 25 票：包括他们自己的票、英联邦五个自治领的票以及 18 个拉丁美洲国家的票（对华盛顿来说，唯一的复杂因素是阿根廷的态度，因为当时掌权的胡安·庇隆是美国的死对头）。而且如果考虑到，在原则性问题上，这个集团很可能还会得到六个西欧国

家——法国、比利时、荷兰、卢森堡、丹麦、挪威的支持，那么就会形成一个稳固的、固定的多数，即 31 票。而苏联只能依靠三票——即苏联自己、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和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票，并且还得寄希望于另外两票——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的支持。

这些简单的分析促使莫洛托夫、葛罗米柯以及苏联代表团的其他成员在会议上付出了巨大努力，以从根本上改变联合国结构的这些初步设定的原则基础。他们争取到让最重要的决策不是在联合国大会的会议上做出，而是在一个更小规模的范围内，即在安全理事会做出。将安全理事会转变为联合国的主要机构，并赋予其五个常任理事国——英国、中国、苏联、美国和法国否决权。在当时的情况下，只有莫斯科才需要这种否决权。因为只有这样，在必要时，它才能否决任何针对其利益的提议。

与此同时，还需要不断争取每一张支持票。只是为了让盟友承认波兰政府，并最终让波兰代表进入联合国，就必须尽一切可能，甚至在这方面做出明显的让步。而在明显被迫做出妥协的情况下，帮助斯大林保住他作为“三巨头”成员，或者用他的话说，“五百万大军俱乐部”成员的角色的，是哈里·霍普金斯出人意料地访问莫斯科。在 4 月 12 日之前，霍普金斯是罗斯福的顾问和私人助理，他在离职前同意再执行一次他所熟悉的调解最复杂问题的任务。

霍普金斯在莫斯科待了两周——从 5 月 25 日到 6 月 7 日，并且做了很多事情。在与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三次会面中，他商定了又一次高层会晤，还解决了自雅尔塔会议以来遗留的有争议的问题。包括关于成立战败德国的盟国管制委员会、赔款数额、德国舰队的分配等问题。甚至还确定了必须由朱可夫元帅担任管制委员会成员。他还详细讨论了苏联即将对日本开战的问题。但和在克里米亚会议上一样，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讨论波兰的局势上，因为正如霍普金斯非常严肃地指出的，波兰局势“已经成为我们能否与苏联解决问题的一个标志”[472]。

斯大林做出了让步。在哈里·霍普金斯离开仅仅五天后，即 6 月 12 日，波兰事务莫斯科委员会——莫洛托夫、哈里曼、克尔——完全商定了所有提交给他们审议的问题。他们设法就组建临时民族统一政府的原则达成了一致，不过比预定时间晚了四个月。6 月 17 日，三个波兰政治团体的代表抵达了苏联首都。来自华沙政府的代表有：B.贝鲁特、V.科瓦利斯基、E.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W.哥穆尔卡。来自国内反对派的代表有：V.克尔尼克、G.科洛杰伊茨基、A.克里日扎诺夫斯基、S.库奇巴、Z.祖拉夫斯基。来自流亡团体的代表有：S.米科瓦伊奇、D.科洛杰伊、Y.斯滕奇克。他们的谈判在 6 月 21 日以期待已久的协议结束：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主席团接纳了 V.维托斯和 S.格拉布斯基，未来政府的成员中，来自国内反对派的有 N.克尔尼克和 C.维泰赫，来自伦敦方面的有 S.米科瓦伊奇、Y.斯滕奇克和 M.图古特。他们的协议文本毫无异议地得到了莫洛托夫、哈里曼和克尔的认可。

完全按照莫斯科的决定，6 月 28 日上午，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政府在华沙提交了辞呈，当天下午，作为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主席（即波兰临时总统）的博莱斯瓦夫·贝鲁特批准了临时民族统一政府。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保留了总理职位，米科瓦伊奇成为第一副总理。[473]丘吉尔和杜鲁门的愿望得以实现。因此，英国和美国不得不按照雅尔塔会议的规定，立即断绝与伦敦的阿尔齐谢夫斯基政府的外交关系。正式承认新的华沙联合政府，即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和米科瓦伊奇政府。并允许波兰代表占据其在联合国一直空缺的合法席位，从而为苏联提供了额外的一票支持。

对克里姆林宫来说，一个问题得以解决。可以希望，如果不是所有问题，那么许多其他问题也能够成功解决。不仅是在 7 月 17 日开幕的波茨坦会议上的外交问题，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与之密切相关的国内问题，主要是经济问题。

由于不指望能得到对苏联有利、真正与战争造成的破坏程度相符的赔款数额和形式的确定，苏联领导层在胜利前两个月就决定开始从德国运走工业设备、原材料、食品和牲畜。最初，1945 年 2 月 21 日，国防委员会通过决议，将解决这个重要问题的任务交给了在四个方面军司令部设立的常设委员会。在乌克兰第一方面军由 M.Z.萨布罗夫领导，在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由 P.M.泽尔诺夫领导，在白俄罗斯第二方面军由 P.S.库楚莫夫领导，在白俄罗斯第三方面军由 G.I.伊万诺夫斯基领导。然而，这种组织方式立即显示出其低效性，3 月就不得不被另一种统一的组织方式所取代。成立了以 G.M.马林科夫为主席的国防委员会特别委员会，负责指导和协调从德国和其他国家运走被认定为以赔款形式的预付款项的所有工作。

委员会的所有实际工作都交给了萨布罗夫，他被任命为国防委员会专员。[475]这样，马林科夫得以恢复他这位忠诚同事失去的崇高地位。不仅使他摆脱了沃兹涅先斯基的烦人的监督，还赋予他一项独立且对国家命运极其重要、责任重大的任务。与此同时，格奥尔基·马克西米利安诺维奇（马林科夫）获得了重新牢牢掌控国家经济恢复和转向和平轨道的主要控制权的机会。

萨布罗夫 4 月底首次前往德国的初步考察非常成功，这使他能够在 5 月 11 日的特别委员会会议上提出具体建议。第二天，萨布罗夫再次飞往柏林，不久后他将所有实际工作的指挥权交给了他的副手 K.I.科瓦利，科瓦利在 6 月被任命为苏联驻德国军事行政当局（SVAG）第一副最高长官——盟国管制委员会经济部门苏联部分负责人。

在苏联占领区新组织的紧张工作，到年底该组织包括了 9000 多名不同专业的专家——几乎来自所有人民委员部和部门的代表，仅在 1945 年就使拆除了 4000 多家企业（包括在奥地利、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的领土上）成为可能。此外，在发现后立即控制了两个战略目标：位于图林根州的德国火箭制造中心之一，以及萨克森州的铀矿。

大量运走战利品设备应该使国家经济的快速恢复和现代化成为完全现实且相对容易实现的目标。与此同时，这也有助于实现胜利后国防委员会 5 月 26 日发布的“关于因减少武器生产而对工业进行重组的措施”的决定。最后，这两个因素——即从国外运进赔款设备和工业转型，促使苏联部长会议在 8 月底做出了两项对经济至关重要的决定。“关于增加大众消费品和食品生产的措施”——目前仅通过地方工业、手工业合作社和残疾人合作社来实现，以及“关于恢复和发展汽车工业的决定”。后者规定从 1945 年底开始生产新的载重汽车，从次年夏天开始生产轿车（“胜利”和“莫斯科人”），主要基于从德国运到苏联的工厂。[477]

胜利以及随后对德国和奥地利的占领引发了一系列其他紧迫问题，但这些问题完全是另一个层面的。仅仅是人事问题，因此并不构成困难。需要任命新的、以前未设的职位——驻在德国和奥地利的苏联军队指挥官的政治顾问。这些职位本质上是外交性质的，因为需要与盟国代表共同行动。考虑到这些职位的特殊性，莫洛托夫通过政治局任命了他的副手担任这些职位。4 月 7 日，V.G.杰卡诺佐夫被派往维也纳，5 月 30 日，A.Y.维辛斯基被派往柏林。[478]他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将那些显然令他不悦的人从自己身边和外交人民委员部中清除出去。这些人与苏联高层核心领导的其他成员，如 L.P.贝利亚和 I.V.斯大林关系过于密切。这些人是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毫无根据地视为对他职位的潜在竞争者的人。

在 1945 年的那些夏日里，苏联高层核心领导集团的权力格局比以往更加清晰地显现出来。莫洛托夫被允许前往旧金山的行程（从 4 月 25 日持续到 5 月 10 日），引发了政治局一个琐碎但原则上并非必要的决定。在莫洛托夫不在莫斯科期间，他在苏联部长会议的职责被委托给了 N.A.沃兹涅先斯基。[479]这再次强调了沃兹涅先斯基的新地位，以及他在等级制度中所占据的稳固地位——在国家机构中扮演着第三号人物的角色。

与此同时，斯大林提拔的另一个人N.A.布尔加宁的命运也最终确定。5月25日，政治局解除了他苏联国家银行管理委员会主席的职务。这个职位在整个战争期间他只是象征性地担任着，“因为转向了军事工作”。[480]从现在起，布尔加宁需要让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完全摆脱目前对他来说微不足道的、在国防人民委员部的日常、例行工作。让国家元首能够专注于他认为更重要的其他问题。

当时的另一件事，要是在以前，可能会导致重大的人事变动，但这次却表明：权力高层的局势正在稳定下来。A.S.什维尔尼克的去世就证明了这一点，他于5月10日去世。这位中央委员会书记、莫斯科市委和市苏维埃主席团第一书记、中央干部部部长的离世，并没有像人们预期的那样引发一连串的立即任命。仅仅一个月后，即6月4日，G.M.波波夫被任命为莫斯科市委和市苏维埃主席团第一书记。又过了一段时间，9月8日，I.V.希基纳被任命为空缺了四个月的苏联国防委员会中央干部部部长职位。[481]这种在人事更替上的不着急，相当清楚地证实了：所有这些职位，曾经在党的结构中是关键的、极其重要的，现在已经失去了它们的重要性。而且，日丹诺夫已经牢牢掌控了整个意识形态机构。

然而，苏联高层核心领导集团成员看似稳固的地位很快又发生了变化。当真正具有全球规模的事件发生时——在波茨坦会议期间以及太平洋战争的最后阶段。

波茨坦会议，或称为柏林会议，是一次非常不寻常的高层会议。会议的性质首先取决于它是在战胜德国之后召开的。实际上，它成为了一次和平的预备会议，使与会者能够将自己的工作与当年的凡尔赛会议进行比较。与此同时，会议的进程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到了“三巨头”成员几乎完全更换的影响。这次美国由杜鲁门代表，英国先是由丘吉尔代表，后来是克莱门特·艾德礼，他的工党在议会选举中获胜。但无论如何，会议上仍然保持着以前的联盟精神。大家都渴望达成共识，理解为了就最紧迫的问题达成协议而进行相互让步的必要性。而这些问题，事实证明，在雅尔塔会议后的五个月里已经积累了足够多。

首先是与德国相关的问题。是否应该肢解德国，以便永远消除欧洲大陆面临的新侵略威胁，还是应该努力找到其他方法来消除战争的潜在根源？占领区应该是什么样的，以什么作为德国的初始边界？到底应该从德国获得哪些赔款，以及以何种形式获得？所有这些在春天被推迟的问题，现在都不能再拖延了。

关于最根本的问题——是否肢解德国，“三巨头”达成了斯大林的立场。这是他在5月9日关于胜利的告人民书中表达的立场。他宣称，苏联“不打算肢解或摧毁德国”[482]。杜鲁门和丘吉尔承认，最终目标也可以通过其他途径实现——即实现非军事化和去纳粹化。完全取缔德国的军事工业，并在民主基础上重建政治体系。诚然，大国领导人也拒绝了在这种情况下看似合理的为德国建立某种中央权力机构的提议。他们认为，中央权力机构的缺失将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对国家管理体系进行彻底改革。他们为德国保留了一个共同的机构，即由四个占领军总司令组成的管制委员会，以及为其配备的行政机构。

他们也以同样的方式解决了赔款问题。由于未能就赔款总额达成一致，他们同意分别在各自的占领区内收取赔款。由于斯大林放弃了对被英美军队缴获的黄金的要求，他们承认将英、美、法占领区内拆除的工业设备的四分之一转交给苏联是合理的。对于德国的舰队，包括军舰和商船，他们也采取了同样简单的处理方式。英国、苏联和美国将其平均分配。

最后，在波茨坦会议上，几乎最终解决了那个似乎已经成为永恒难题的波兰问题。他们满足了丘吉尔的要求，丘吉尔严肃地指出：“如果会议在10天后结束时，没有就波兰问题做出任何决定……这无疑将意味着会议的失败。”[483]尽管英国首相明显不愿意将什切青港（什切青）和上西里西亚连同布雷斯劳（弗罗茨瓦夫）交给华沙控制，但由于杜鲁门对这

样的“细节”漠不关心，斯大林得以确认雅尔塔会议关于波德边界的协议。诚然，边界的具体划定还是被推迟到了与德国签订和平条约之时。

会议花了相当多时间讨论的第二类问题与评估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的局势有关。引起杜鲁门对这些地方局势关注的是他。在会议的第一天，即 7 月 17 日，他要求“立即重组”布加勒斯特和索非亚的政府，在他看来，这些政府远远缺乏真正的代表性和民主性。他坚持要在这些地方尽快举行自由选举，而且必须在三大强国的监督下进行。一周后，总统的态度更加坚决。他以丘吉尔和自己的名义试图向斯大林施压：“在这些政府按照我们认为必要的方式进行重组之前，我们无法恢复与它们的外交关系。”[484]他拒绝接受斯大林的解释，即无论是在意大利、希腊，还是在西欧的任何其他国家，选举都还没有举行，但这些国家的政府仍然被视为合法和民主的。直到斯大林提出一个远非等价的瓜分德国资产的方案时，他才在讨论中取得了突破。他提议将位于东欧国家的德国资产交给苏联，位于西欧和拉丁美洲国家的德国资产交给美国和英国。

与此同时，会议上还讨论了另一类问题，这些问题与欧洲和德国的事务相距甚远。可以推测，斯大林提出这些问题只是为了反过来伤害他的对手，使他们陷入困境。迫使他们在涉及苏联战略利益的问题上做出让步。

他迫使丘吉尔为自己辩解，提议讨论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局势。确定在那里，英国军队（名义上是为了支持法国军队而进入，实际上是为了推迟这两个近东国家获得独立）的行动是否合法。他还让杜鲁门和丘吉尔陷入了模棱两可的境地，他提出要确定 1940 年被西班牙占领的丹吉尔的地位。顺便也谴责了佛朗哥政权，因为它是在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直接支持下建立的。他还提到了艾登最近在下议院的发言——意大利失去了在非洲的殖民地，并补充说：“俄罗斯希望参与”对这些殖民地的管理。而所有这一切——只是为了争取大家认可有必要从根本上重新审视《蒙特勒公约》（该公约确定了黑海海峡的通航制度）的条款。顺便也让英国和美国知道了苏联对土耳其的领土要求，土耳其非法占领了卡尔斯、阿尔特温及阿尔达汉地区。他想尽一切办法，准备采取任何手段，只为了确保苏联对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拥有与英国对苏伊士运河、美国对巴拿马运河同样的控制权。

但无论在波茨坦会议上遇到了多少困难，他们都成功地克服了。由于仍然保持着相互理解的精神，他们得以实现既定目标。与此同时，正是在这次“三巨头”的会议上（这次会议恰好是最后一次），苏联方面对盟友的计划和意图产生了严重的怀疑。而这一怀疑的起因是杜鲁门与斯大林在 7 月 24 日的一次简短谈话。“我，”这位美国总统回忆道，“不经意地告诉斯大林，我们拥有一种具有非凡破坏力的新武器。苏联总理没有表现出特别的兴趣。他只是说，很高兴听到这个消息，并希望我们能够‘好好利用它来对付日本人’。”[485]

丘吉尔回忆起这次谈话时，对其做出了如下评论：“我站在离他们大约五码远的地方，仔细观察着这次重要的谈话。我知道总统打算说什么。关键在于，这会给斯大林留下怎样的印象。他脸上仍保持着愉快和亲切的神情，两位大人物之间的谈话很快就结束了。当我们在等车的时候，我走到杜鲁门身边。‘那么，情况如何？’我问道。‘他一个问题都没问我。’总统回答道。这样一来，我确信，在那个时刻，斯大林对美国和英国长时间以来进行的那项庞大的科学研究进程并不是特别了解，而美国冒着极大的风险，在这项研究上花费了超过 4 亿英镑。”[486]

然而，无论是杜鲁门还是丘吉尔都错了。在波茨坦会议上是如此，后来他们在撰写回忆录时也是如此。斯大林在与杜鲁门谈话之前很久就对原子弹有了足够的了解。但在那时，也就是七月底，让他担忧的是别的事情。苏联参加对日战争的预定日期日益临近，这一日期在雅尔塔会议上确定为德国投降后整整三个月。换句话说，就是 8 月 8 日。与此同时，在杜鲁

门和丘吉尔于 7 月 17 日在柏林收到来自洛斯阿拉莫斯的简短电报——“婴儿顺利诞生”之后，太平洋上的战争越来越像是一场体育竞赛。

就在波茨坦会议期间，7 月 26 日，美国、英国和中国向日本发出了无条件投降的要求。尽管两天后东京拒绝了最后通牒，但华盛顿和伦敦已经不再担心对手可能会进行怎样的抵抗。他们也放弃了在日本岛屿登陆的必要性。从那时起，他们完全寄希望于原子弹轰炸所能产生的效果。盟友们也不再需要红军的支持。“总统和我，”丘吉尔回忆道，“不再认为我们需要他（斯大林。——作者注）的帮助来战胜日本……我们认为这些军队几乎不会派上用场，因此斯大林没有了他在雅尔塔谈判中成功运用的那张对付美国人的王牌。”[487]

但是，即使知道出现了全新的、具有原则性的战略形势，不仅是斯大林（在克里米亚，除了罗斯福，没人如此坚持不懈地劝说他对日参战），整个苏联领导层仍继续进行在亚洲的军事行动准备工作。从春天开始，他们就向远东调遣军队。4 月 5 日，苏联宣布废除《苏日中立条约》，明确无误地表明了战争的不可避免。而在 6 月 30 日至 7 月 14 日期间，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与中国政府首脑蒋介石及其外交部长王世杰在莫斯科进行的谈判中，双方就稍后于 8 月 14 日签署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主要条款达成了一致。条约规定中国有义务归还苏联对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中东路和南满铁路）的权利，将旅顺和大连长期（30 年）租借给苏联，苏联承认满洲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中国承认外蒙古独立[488]。最后，7 月 13 日，莫斯科信守其对盟友的义务，拒绝了东京让其代表近卫文麿来讨论日本退出战争条件的请求。

此后，事态发展得极为迅速。

8 月 6 日，美国人在广岛投下了第一颗原子弹。8 月 8 日，苏联宣布从次日起将视自己与日本处于战争状态，8 月 9 日，美国在长崎投下了第二颗原子弹。8 月 10 日，东京通知各方，准备按照提出的条件投降，8 月 14 日，宣布无条件投降。第二天，即 8 月 15 日，美国、英国、中国和日本之间签署了停战协定。

尽管如此，苏联军队仍继续推进。他们在自己的战线上继续作战，尽管其他所有战线的战争都已结束，只为了一个目的：通过他们的存在来确保苏联根据与中国签订的条约以及与罗斯福、后来又与霍普金斯达成的口头协议所争取到的一切。到 8 月 22 日，红军部队控制了辽东半岛，包括位于那里的旅顺和大连。到 8 月 25 日，控制了南库页岛。到 9 月 1 日，控制了千岛群岛。他们成功完成了摆在面前的任务，因为日本正式签署投降书是在 9 月 2 日，地点是在东京湾的美国战列舰“密苏里”号上。

第十七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就这样结束了。它分两次结束。5 月 8 日——在欧洲结束，9 月 2 日——在亚洲结束。

5 月 9 日对于苏联人民来说成了一个非同寻常的节日。这绝不是一个形式上的、由某人的决定强加的，或者仅仅是日历上的一个日期。这是一个真正属于人民的、自发的节日。这是全民一致的欢庆，因为与纳粹德国的战争对这个国家来说是最严峻的考验。毕竟，国家不得不拼死捍卫自由与独立，捍卫生存的权利，捍卫国家存在的权利。因此，在德国指挥部签署无条件投降的广播通知发出后，民众的庆祝活动立刻开始，直到一个半月后，即 6 月 24 日在莫斯科红场举行的庄严而隆重的胜利阅兵式后才结束。

9 月 2 日则完全不同。那一天平静、低调，如同平常的日子。没有喧闹、欢乐的人群，没有阅兵式。这不仅是因为在满洲和太平洋岛屿上的战斗行动对苏联民众来说没有什么吸引力，也没有对他们的日常生活产生任何影响。对于除了最高指挥部、除了在远东作战的士兵和军官之外的所有人来说，这些战斗行动显得非常遥远。这个国家似乎没有注意到第二次战争的结束、第二次胜利，还因为就在那时，即 1945 年 8 月，苏联高层领导对盟友真正意图的怀疑——那些意图远不像表面看起来那样友好——最终得到了证实。

美国展示核武器，以及拒绝让苏联参与占领日本，这明确地向莫斯科表明：三大强国的军事联盟已成为过去。这个联盟被遗忘了，因为它不再被需要。与此同时，苏联最近所扮演的角色也成为了历史。苏联再次被置于次要地位。

按理说，没有发生什么特别可怕的事情。苏维埃国家本可以平静地回归和平生活。可以复员军队，进行经济转型，取消配给制，恢复并同时实现工业和农业的现代化，从废墟中重建城市和乡村。然后尝试去实现曾经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向人民承诺过的事情——让人民的生活水平达到与西方发达国家相同的水平。

但从斯大林的角度，而且不仅仅是他的角度来看，只有建立在武器力量以及与周边国家的军事政治联盟基础上的国家安全，才能保证这一切的实现。而现在，第一个基础因素已经崩塌。从那时起，苏联失去了依靠自身武装力量来维护国家利益的可能性。苏联必须认识到：未来起决定性作用的不是五百万大军，而是最新式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一颗原子弹就在广岛瞬间夺去了超过 20 万人的生命）。对于这种苏联当时没有、但美国和英国拥有且不打算放弃其垄断权的武器，杜鲁门在 8 月 6 日上午坦率地发表了声明。“在当前情况下，”他说，“这些（原子弹。——作者注）武器的生产技术过程和战斗特性在我们和世界其他国家获得可靠的防御手段以避免可能被毁灭的危险之前，不会被公开。”[489]因此，核武器很容易成为国际关系中施加压力甚至进行讹诈的手段。

斯大林对盟友这种无视同盟义务行为的第一反应，是为苏联在外交政策领域可能采取的行动做好铺垫。为此，就在同一天，即 8 月 6 日的晚上，他促使政治局做出决定，将А.Я.维辛斯基从柏林召回。让他回到莫斯科，重新担任莫洛托夫第一副手的原职[490]。斯大林采取这一步骤，是为了加强自己对整个外交人民委员部以及对外交人民委员本人工作的个人影响力。随后，他才与其他高层领导成员一起，开始寻找加速推进苏联铀项目工作的方法，该项目早在 1942 年秋天就已启动，但在接下来的近三年时间里进展缓慢。

到 8 月 20 日，也就是广岛原子弹轰炸仅仅两周后，他们找到了一个解决方案。国防委员会通过决议成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该委员会承担“领导所有关于利用铀的原子能的工作：开展这一领域的科学研究工作；广泛开展地质勘探工作，为苏联建立铀矿开采的原料基地，同时利用苏联境外（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及其他国家）的铀矿；组织相关工业对与

利用原子能相关的特殊设备和材料进行加工和生产；以及建设原子能设施，研发和生产原子弹”。

无论是目标的广泛和多样性，还是委员会的组成人员——Л.П.贝利亚（主席）、Г.М.马林科夫、Н.А.沃兹涅先斯基、М.Г.别尔乌辛、Б.Л.万尼科夫、А.П.扎韦尼亚金，以及科学家 И.В.库尔恰托夫、П.Л.卡皮察，都使这个委员会实际上成为了一个类似苏联部长会议的部门性办公室。这是一个跨部门机构，旨在协调各人民委员部的活动，以解决具体问题。然而，同一决议还规定了其他内容：“为了直接领导从事铀原子能研究以及原子弹生产的科研、设计、工程组织和工业企业，在苏联部长会议下设立一个总局——苏联部长会议第一总局，并将其隶属于国防委员会特别委员会。”第一总局（总局）的领导由Б.Л.万尼科夫担任，此前他是弹药人民委员，副局长分别是 А.П.扎韦尼亚金——内务人民委员部副部长、Н.А.鲍里索夫——国家计划委员会弹药部门负责人、П.Я.梅希卡——内务人民委员部副部长、П.Я.安特罗波夫——有色冶金人民委员部副部长，以及А.Г.卡萨茨金——化学工业人民委员部副部长[491]。

8 月 27 日，总局的核心机构——特别委员会技术委员会召开了第一次会议，该委员会成员包括苏联最著名的物理学家——科学院院士 А.И.阿里哈诺夫、А.Ф.约费、П.Л.卡皮察、И.В.库尔恰托夫、В.Г.赫洛平，通讯院士 И.Н.沃兹涅先斯基、И.К.基科伊内，以及教授 Ю.Б.哈里顿。会议确定了首要工作的具体方向。然后，在 9 月 1 日出版的《新时代》杂志（该杂志与《劳动报》一样，旨在表达苏联高层领导对国际问题的真实看法，尽管并非官方观点，且常被用于试探舆论）上，发表了苏联对杜鲁门声明的一种回应。

在《外国媒体关于原子弹的报道》这篇综述中，作者 М.鲁宾斯坦从“他的”角度指出了困扰莫斯科的三个主要问题。首先，美国媒体显然有意夸大核武器的威力，从而夸大其重要性。其次，这种武器是在对盟友苏联保密的情况下制造出来的——这暗示了 1942 年 9 月 29 日苏英关于军事技术信息交流的协议被违反。第三，美国已经出现了呼吁白宫利用原子弹的垄断地位“承担起世界领导权”的声音。然而，在综述结尾，作者做出了一个明显只针对杜鲁门政府的合理推断。他说，所发现的这些侵略性情绪反映的不是总统的意见，而是“相对少数但非常聒噪的反动分子”的意见[492]。这样一来，杜鲁门就有机会以对他方便的方式来证实或反驳这一推测。

回应很快就来了，而且还出现了两次。10 月 9 日，在田纳西州蒂普顿维尔的新闻发布会上，总统只是简短地表示，美国不打算向任何国家透露原子弹的秘密[493]。10 月 29 日，在纽约的一次群众集会上，杜鲁门不仅确认“关于原子弹问题的讨论……不会涉及到其生产过程”，还基于这一原则构建了他新的外交政策理念。

在总统归纳的“美国维护世界和平的十二项义务”中，有三项与苏联直接相关。他相当强硬（尽管不具体）地重复了在波茨坦时就对斯大林说过的话：“我们将拒绝承认任何外国通过武力强加给其他国家的任何政府。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无法阻止这种政府的武力建立。但美国不会承认任何这样的政府。”这里显然指的是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但这一警告也适用于波兰。

杜鲁门并不满足于此，他放弃了在波茨坦时表达的承认苏联在黑海特殊权利的立场：“我们认为，所有国家都应该享有海洋自由。”最后，总统还宣布了美国即将发起的意识形态攻势——“我们必须继续为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的地区建立思想自由和宗教自由而斗争。”

杜鲁门解释了是什么让他如此自信地阐述这样的外交政策路线。他说，即使美国在复员武装力量后，“仍将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空军之一”。而

“原子弹……使我们制定和实施这一政策比六个月前我们预想的更加必要和紧迫”。他还警告或威胁说：“对我们最直接和最严重的威胁是失望的危险，是狡猾的怀疑主义的危险——对国际合作有效性的信心丧失。在任何时候，这种信心的丧失都是危险的。在原子时代，这将等同于一场灾难。”[494]

现在，苏联高层领导不得不基于一个对他们来说非常不利的预测来行事。他们有很大把握推测，华盛顿（无论是否与伦敦联合）在不久的将来会试图加大对欧洲所有国家的压力。不仅是西欧国家，还有东欧国家。在合适的时机，美国可能会采取极其强硬的立场，并坚持（甚至以最后通牒的形式）让这些国家接受美国所设想的政府组建方案。如果美国能够实现这一目标，那么苏联将完全失去其在战争期间以及在莫斯科、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等高层会议上所获得的战略优势。苏联将被孤立在自己的边界内，而这些边界还存在着危险的缺口。美国一直不承认波罗的海共和国并入苏联。美国与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的流亡政府保持着外交关系，尽管这些政府的主权范围仅限于它们在华盛顿的“大使馆”所占据的公寓。

然而，克里姆林宫拒绝屈服。它不能承认失败，不能承认所有希望的破灭。它不愿意承认，这场付出了难以想象的高昂代价才赢得的胜利并没有带来和平。更确切地说，没有带来苏联从战争第一天起就为之战斗的那种和平。仅仅基于恢复与美国近期力量平衡的潜在可能性（尽管这种可能性仍然充满问题），苏联高层领导试图重新获得他们突然失去的作为大国的道义权利，哪怕只是在口头上。莫洛托夫在 11 月 6 日做到了这一点，当时他宣读了一篇已获政治局成员批准和审核的报告，该报告是为了纪念十月革命的又一个周年纪念日。这篇报告在风格上极具“莫洛托夫特色”，如果将其内容与引发它的缘由联系起来，就会发现它非常奇怪。

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莫洛托夫）发言一个多小时，几乎没有谈到革命、党及其领导作用。只是在报告结束并进行传统的（此时已完全成为仪式性的）致敬时，他赞扬了（但排在“胜利的苏联人民”、“伟大的祖国”、“苏联政府”之后的第四位）“列宁—斯大林的党”。但他把整个报告都用于阐述纯粹的国家问题。他几乎首先对德国占领者造成的破坏进行了总结性评估。他列举了令人震惊的数字，这些数字堪比蒙古入侵时期：1710 座城市、7 万多个村庄、31850 家工业企业、9.8 万个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被摧毁，2500 万人失去了亲人和家园。这样，他展示了这个国家在不久的将来面临的状况。即将面临多么艰巨的工作，以及需要投入多少巨大的资源来进行恢复。

莫洛托夫还谈到了许多其他同样值得关注的事情。谈到了苏联对战胜纳粹德国的贡献。谈到了进一步加强苏联国家和发展苏联民主的必要性，以及与西方模式相比它们的优势。当然，作为外交人民委员，他也谈到了国际形势。正是在报告的这一部分，他表达了苏联高层领导对核武器的新看法。

“维护世界和平的利益，”莫洛托夫强调，“与国外那些帝国主义政策的狂热支持者所宣扬的大国军备竞赛政策毫无共同之处。在这方面，必须谈谈原子能的发现和原子弹，在与日本的战争中使用原子弹显示了其巨大的破坏力。原子能尚未在预防侵略或维护世界和平方面得到检验。另一方面，目前不存在这样大规模的技术手段，能够成为任何一个国家或任何一个小国家集团的专属。因此，原子能的发现不应鼓励任何国家沉迷于在外交政治游戏中使用这一发现的力量，也不应让爱好和平的各国人民对未来感到无忧无虑。”

这样，莫洛托夫对苏联先前的立场进行了一些修正。就是《新时代》杂志所发表的那种立场。他最终公开承认了核武器“巨大的破坏力”，因此也承认了它作为政治施压手段的重要性。但正因为如此，尽管只是作为外交人民委员，他也谨慎地指出了使用核讹诈可能带来的未来——将世界分裂为两个不可调和的阵营。但这一次，不再是因为布尔什维克的意识形

态设定，而完全是由于美国追求霸权的缘故。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莫洛托夫）冒昧地预先警告那些“武力政策的狂热支持者”。他非常明确地提到了“围绕建立国家集团和联盟的喧嚣”，这显然指的是伦敦毫不掩饰的建立西方联盟的想法。他提出了一个同样可能出现的替代方案，即“爱好和平的国家”组成的联盟（自然包括苏联），以此来对抗西方联盟[495]。

当双方都以他们不习惯的方式阐明自己的立场时，苏联高层领导并不希望发生对抗，而是希望和平解决出现的分歧，他们开始着手处理一个早已成熟的问题——对现有的特殊管理形式进行重组。他们试图创建一种不同的、更符合已经开始的恢复时期的最高行政机构结构，同时也符合宪法的规定。

9 月 4 日，政治局批准了一项重要的、早就该出台的决议：“鉴于战争结束和国家非常状态的终止，认为国防委员会继续存在已无必要，因此解散国防委员会，并将其所有事务移交给苏联人民委员会。”[496]该决议于次日公布，但作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命令，它给人的印象是苏联人民委员会所有的宪法权利都得以恢复，从此不再被替代或重复。然而，实际上，国防委员会的解散只是形式上的，仅仅是文字游戏，实质上并没有改变任何事情。

9 月 6 日，政治局又发布了一项更为重要的决议——《关于成立苏联人民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的决议》，该决议将最高管理机构在过去四年中形成的一分为二的模式无限期地保留了下来。决议内容如下：

“鉴于国防委员会的解散，苏联人民委员会决定：

1.为了对各人民委员部和部门的日常工作进行实际领导，取代目前存在的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团和国防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成立：

-苏联人民委员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处理以下人民委员部和部门的工作问题：内务人民委员部、海军人民委员部、农业和食品人民委员部、贸易和财政人民委员部，以及苏联人民委员会下属的各委员会和管理部门，具体包括以下人民委员部和部门：国防人民委员部、海军人民委员部、海军舰队人民委员部、内河航运人民委员部、采购人民委员部、国营农场人民委员部、农业人民委员部、食品工业人民委员部、肉类和奶类工业人民委员部、渔业人民委员部、贸易人民委员部、中央消费合作总社、财政人民委员部、国家银行、邮电人民委员部、卫生人民委员部、司法人民委员部、民航总局、国家物资储备总局、劳动力储备总局、苏联人民委员会劳动力统计和分配委员会、国家编制委员会、高等教育委员会、北方海路管理总局、中央林业工业管理总局、大地测量和制图总局、体育运动委员会、建筑委员会、电影委员会、艺术委员会、标准委员会、度量衡委员会、无线电频率管理和广播委员会、报刊保密检查总局；

-苏联人民委员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处理以下工业人民委员部和铁路运输的工作问题，具体包括以下人民委员部和部门：黑色冶金人民委员部、有色冶金人民委员部、煤炭工业人民委员部、石油工业人民委员部、化学工业人民委员部、橡胶工业人民委员部、电力工业人民委员部、重型机械制造人民委员部、中型机械制造人民委员部、机床制造人民委员部、建筑材料工业人民委员部、航空工业人民委员部、坦克工业人民委员部、弹药人民委员部、武器人民委员部、迫击炮武器人民委员部、造船工业人民委员部、林业人民委员部、造纸工业人民委员部、纺织工业人民委员部、轻工业人民委员部、建筑人民委员部、建筑材料人民委员部、国防工业建设总局、天然气工业总局、煤炭供应总局、天然气和石油供应总局、氧气工业总局、木材供应总局、森林保护总局、地质委员会。

2.规定苏联人民委员会常务委员会：

-准备并提交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审议关于国民经济计划（季度和年度）、物资技术供应计划的决议草案，以及苏联人民委员会需要解决的其他重要问题的决议草案；

-采取实际措施确保苏联人民委员会制定的计划得到执行，并对苏联人民委员会相关决议的执行情况进行实际监督，以苏联人民委员会的名义就各人民委员部和部门当前实际领导工作中的问题做出对相应人民委员部和部门具有约束力的决议。

3.批准负责内务人民委员部、海军人民委员部、农业和食品人民委员部、贸易和财政人民委员部以及苏联人民委员会下属各委员会和管理部门工作的苏联人民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其组成如下：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莫洛托夫（主席）、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沃兹涅先斯基（副主席）、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米高扬、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安德列耶夫、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布尔加宁、尼基塔·米哈伊洛维奇·什维尔尼克。

4.批准负责工业人民委员部和铁路运输工作的苏联人民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其组成如下：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贝利亚（主席）、格奥尔基·马克西米利安诺维奇·马林科夫（副主席）、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沃兹涅先斯基、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米高扬、拉扎尔·莫伊谢耶维奇·卡冈诺维奇、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柯西金”[497]。不难看出，9 月 6 日的决议使得国防委员会的解散变成了一场公然的闹剧。实际上，国防委员会（更确切地说是国防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只是被改了个名字。只是根据当时的需要做了一些调整——从常规武器的生产转向了核武器的生产，而且，还有他们更不愿提及的，转向了作战火箭、雷达设备的生产。以前的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团的任务也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改变。最后，苏联高层领导集团的组成几乎没有变化，除了上述人员之外，还包括斯大林以及专门负责党务工作的安德烈·亚历山德罗维奇·日丹诺夫。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细节。从决议文本可以看出，四个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内务人民委员部、外交人民委员部、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以及刚刚成立的第一总局，在法律上仍然像以前一样，不属于苏联人民委员会的管辖范围。

目前没有任何文件能够明确确定斯大林以及苏联高层领导集团其他成员在解散国防委员会时的真实意图。然而，政治局在两天内通过的两份实际上相互矛盾的文件之间的明显矛盾，为我们提供了一些进行推测的依据。

根据 9 月 4 日的决议，国防委员会的解散应该是彻底和最终的。这只意味着一件事——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团自动恢复其原有的、由宪法规定的合法权力。这样一来，沃兹涅先斯基的地位得到了加强，而战时“三巨头”成员的地位则显著下降。因此，从 9 月 4 日晚上到 9 月 6 日晚上的这两天时间，很可能是两个权力集团之间激烈斗争的时间。而 9 月 6 日的决议显然是被迫妥协的结果，这表明双方的势力依然均衡。与此同时，这也显示出斯大林相对较弱的地位，他没有能力坚持自己的主张。因为如果确实需要成立常务委员会，那么完全没有必要只成立两个，因为这会加强它们主席的地位。按照逻辑，人们原本期待的是另一种结果——恢复到战前的做法，即恢复苏联人民委员会的结构，将其分为四个、五个甚至六个部门性的主席团。只有这样的决定才能使所有权力争夺者在彼此之间以及在斯大林面前处于平等的地位。

但实际上，原有的权力格局没有发生任何变化。莫洛托夫、贝利亚和马林科夫在国家机构中仍然保持着相当稳固的地位。前两人在权力重组后的苏联人民委员会（表面上是这样）中分享领导权，且没有向沃兹涅先斯基做出任何让步。而第三个人（马林科夫）则像过去一年半那样，继续兼任一个稍微降低了的国家职务——现在在等级制度中不再是第二位，而只

是第三位，同时担任党的第二书记的职责。毫无疑问，当时对国家来说最重要的问题——尽快制造出苏联的原子弹，帮助他们维持了现有的权力格局。

国防委员会特别委员会和苏联人民委员会两个常务委员会之一的成员构成几乎完全相同，这绝非偶然。在这两个机构中，主席都是贝利亚，副主席都是马林科夫，成员都有沃兹涅先斯基。实际上，这个苏联人民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已经取代了特别委员会，特别委员会从1945 年 9 月起实际上已经停止了活动。而且它也不再被需要了。因为那些最初（从 1942 年 10 月起）就与铀项目工作相关的人民委员部和部门，现在都直接处于作为苏联人民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席的贝利亚的控制之下：有色冶金人民委员部、化学工业人民委员部、电站和电力工业人民委员部、重型和中型机械制造人民委员部、建筑人民委员部、国防工业特殊建设总局、氧气工业总局、地质委员会。但这种官僚体制的转变，最初只是让贝利亚和马林科夫得以继续保持在权力的巅峰，很快就产生了影响，而且仅仅是由于军事工业综合体的组织和出现。

……现在，苏联高层领导集团只需要做一件事——公开、正式地确认已经形成的权力格局。在因战争而推迟、最终定于 1946 年 2 月举行的苏联最高苏维埃选举之后，在第二届最高苏维埃第一次会议上完成这件事。然而，一切似乎已经商定好的事情，突然都受到了威胁。原因是斯大林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据他的一位近亲（因此是一个消息灵通、可靠的消息来源）称，医生诊断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中风了[498]。政治局有充分的理由担心最坏的情况，于 10 月 3 日决定将苏联政府首脑暂时退出日常领导工作正式定为休假。但在 10 月 9 日发生的事情不得不向公众公开，并在第二天（令人惊讶的迅速！）在全国所有报纸上公布：“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同志休假。昨天，即 10 月 9 日，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同志已休假去休息。”[499]

杜鲁门从莫斯科得到了这个不同寻常的消息，而且很可能将其与将近一年前亨利·卡西迪的预言联系起来，他急忙核实、确认这个如此重要的消息。他要确定斯大林的真实健康状况，以及在制定外交政策时是否应该将其视为一个新的因素。10 月 14 日，美国总统认为不仅有必要，而且刻不容缓地向苏联领导人发送一封私人信件。信中内容似乎非常重要——信中谈到了召开和平会议的问题，以至于美国大使艾夫里尔·哈里曼必须立即、务必亲手将信交给斯大林。

经过短暂的拖延后，会面终于举行了。此外，为了消除那些产生怀疑的人的疑虑，塔斯社立即发布了一份相当冗长且笨拙的声明：“外国媒体出现了各种关于美国总统哈里·杜鲁门向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发送信件的报道。据可靠消息来源称，杜鲁门总统于 10 月 14 日发送的信件于 10 月 24 日由美国大使艾夫里尔·哈里曼亲手交给了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哈里曼大使受特别委托拜访了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并对总统的信件进行了解释。哈里曼先生在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正在休假的索契地区拜访了他，并与他进行了两次谈话。10 月 26 日，哈里曼先生返回了莫斯科。”[500]

这样一来，似乎一切都得到了妥善的解决。然而，有一点没有得到解释。为什么在有电话通讯和莫斯科-索契航线的航空运输的情况下，哈里曼前往高加索黑海沿岸地区却花了整整十天时间。可以推测，正是这十天对生病的斯大林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在那段时间里，他不希望有一个美国人（作为证人）出现。

但是，美国大使前往索契的行程以及塔斯社的声明都没有消除人们产生的疑虑。西方媒体仍然不断传播着关于斯大林健康状况的各种猜测和谣言，这些消息主要来自驻莫斯科的外国记者。因此，苏联高层领导集团不得不（确实是延误得令人无法接受）在 11 月 28 日采取极端措施。为了防止信息进一步泄露，他们实行了特殊的审查制度，由外交人民委员部的新

闻部门负责。禁止向国外传递：“a）泄露苏联军事、经济和其他国家机密的材料；b）外国记者的报道，其中包含对苏联的攻击以及对苏联国家领导人的虚构内容（我强调。——作者注）；c）对苏联政策和苏联生活进行歪曲报道的信息；d）所有其他可能损害苏联国家利益的材料”[501]。同样是通过这个决议，任命了自 3 月 27 日以来一直空缺的新闻部门负责人（此前担任该职位的 А．А.彼得罗夫被任命为驻中国大使），由 К．Е.津琴科担任。

顺便说一下，几天前，即 11 月 14 日，苏联高层领导集团试图将哈里曼访问斯大林的声明所带来的错误归咎于执行者塔斯社。他们发现塔斯社内部“状况极不理想”。他们委托了一个由成员强大的委员会（包括无处不在的马林科夫、内务人民委员部部长亚历山德罗夫、不久前从维也纳被召回担任外交人民委员部职务的杰卡诺佐夫，以及苏联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第一总局副局长费多托夫）“对塔斯社进行检查，并向政治局提交关于大力加强该机构领导的建议”[502]。然而，不久之后，其他更为紧迫的事务让他们忘记了这个计划，而这个相当危险的决定最终也没有对塔斯社总经理 Н.Г.帕尔古诺夫以及塔斯社其他领导人的命运产生影响。

困扰苏联的不幸并没有就此结束。在确认斯大林很快就能恢复履行职责后，西方三大主要国家的领导人——美国的哈里·杜鲁门、英国的克莱门特·艾德礼、加拿大的麦肯齐·金，于 11 月 15 日在伦敦会面，显然是在挑衅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刺激并诱使他采取错误的行动，他们再次声明，“原子弹的生产方法应该保密”。对所有人保密，包括苏联。与此同时，他们还宣布，希望在联合国框架内成立一个特别委员会，“目的是完全消除将原子能用作毁灭武器的可能性”[503]。换句话说，他们要让一切都取决于他们和国际社会，只是为了不让苏联加入这个新的、目前最具声望和特权的俱乐部——核国家俱乐部。

苏联高层领导集团还面临着确定其外交政策路线的必要性，这使他们陷入了更加困难的境地。他们需要做出最终决定：是履行国家在国际协议中承担的义务，还是故意忽视这些义务，在当时的情况下，无论选择哪一种都并非易事。而且，他们不得不处理那些直接关系到国家安全保障的问题。这些问题涉及世界上的一些地区，这些地区具有战略意义，沿着从敖德萨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整个南部边界连成一串：黑海海峡、外高加索南部、新疆、蒙古、满洲。而且，就在实际上，五大国外长会议（外长会议）第一次会议在伦敦从 9 月 11 日开到 10 月 2 日期间失败了。会议讨论了与芬兰和意大利（德国在战争中的其他盟友）的和平条约草案，结果发现各方立场的分歧多于接近。

在所有外交问题中，蒙古问题是最容易解决的。根据 8 月 14 日在莫斯科签署的中苏条约，只有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外蒙古）人民（仅从克里姆林宫的角度来看）或中国的一个省份（中国、美国、英国、法国仍然正式这样认为）通过公民投票表达了对国家独立的意愿之后，南京方面才应该承认外蒙古的独立。而在 1945 年 10 月 20 日举行这次公民投票，对莫斯科和乌兰巴托来说都毫不费力。当然，在公民投票中，98.4%的外蒙古公民参加了投票，而对于获得国家独立这一点（这是毫无疑问的），100%的投票者都表示支持。条件得到了满足，在 11 月 12 日外蒙古小呼拉尔主席团批准了中央选举委员会的决议之后[504]，南京方面不得不正式承认这个庞大的中国省份脱离中国。

与满洲相关的问题起初看起来稍微复杂一些，但也只是表面上的。根据同一份中苏条约，苏联红军部队从这个省份撤离的时间不得晚于战胜日本后的三个月，也就是 1945 年 12 月 3 日。后来的事件表明，对于克里姆林宫来说，这个期限是不够的，因为它打算确保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人在那里完全掌控局势。这样就在满洲建立一个友好的（尽管只是自治的）政权，掩护苏联远东边境的整个地区，同时保证中东铁路、南满铁路以及旅顺和大连的海军和空军基地的安全。

尽管苏联直接提供了武器援助，并在政治上给予了间接支持，但共产党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在他们所拥有的时间内仍然无法重新部署到满洲。甚至在 11 月，他们还只是在接近满洲的地方，在绥远、热河、河北等省份与政府军进行激烈的战斗。但正是这种情况也阻止了国民党在东北广大地区建立自己的行政机构。蒋介石坚信美国会在山东和河北南部驻军，并给予美国援助，因此他拒绝承认内战已经重新爆发的事实。和毛泽东一样，他只是在拖延时间，与共产党人就召开具有初步和联合任务的政治协商会议进行谈判。他希望迟早能战胜共产党人，因此在 11 月中旬，他亲自向指挥驻满洲苏联红军部队的马林诺夫斯基元帅请求，将部队撤离的时间无限期推迟[505]。

在中国另一个地区——西北地区的新疆，情况变得极其复杂。新疆位于中亚深处，但由于其地理位置（处于苏联、中国、蒙古、印度的交界处），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正因为如此，莫斯科无论如何都不想失去自 1934 年以来在那里拥有的政治和经济优势。

日本对中国发动侵略后，苏联尽一切可能帮助其伟大但弱小的邻国。两项向国民政府提供总额达 1 亿美元贷款的协议，确保了苏联武器、弹药、汽油和军事装备备件的供应。为了运输这些物资，使用了主要的交通线路，这些线路经过新疆。刚刚修建的公路和当时开通的航空线路（由苏中合资公司哈阿米亚加运营）[506]连接了阿拉木图和哈密。1938 年夏天，这些交通线路突然受到了威胁。在该省南部，在伊斯兰教和民族自治的口号下，爆发了一场起义。苏联领导层不排除在这场起义背后很可能是日本人，因为就在那些日子里，他们在哈桑湖地区挑起了冲突，并打算占领外蒙古，为此他们建立了一个傀儡“蒙古国”——蒙疆，作为一种跳板。但克里姆林宫也不能排除另一种可能性。英国在该地区的活动有所增加，英国认为西藏是其利益范围，并且很可能会利用中国的“混乱”，轻易地加强其在中亚的存在。

1938 年 9 月，苏联边防部队在红军正规部队的支持下进入新疆领土，并于 10 月 15 日帮助该省省长恢复了秩序。在战斗中，他们彻底击溃了起义军——第 36 东干师和第 6 维吾尔师[507]。这样，就确保了能够继续定期向中国国民军供应武器。

1943 年春天，新疆的局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的前夕，苏联领导层试图在那里保持其政治存在。确保该边境地区的安全，防范对苏联中亚地区虽不太可能但仍需考虑的威胁。5 月 4 日，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放弃了在该地区的先前方针，转而押注于民族因素。决定利用长期以来居住在该省的人民（其中绝大多数是维吾尔族、哈萨克族、东干族，以及其他穆斯林）对自治的渴望。委托马林科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便“支持新疆的非汉族居民”，帮助他们建立一个与苏联友好的自治政权——民族政治委员会。

恢复的分离主义运动的主要基地是该省北部与苏联接壤的三个地区——伊犁、塔城和阿尔泰。随着起义范围的扩大，苏联也加强了其秘密支持和直接援助。然而，当时中国国民政府已经能够集结力量并投入到镇压运动中。尽管如此，莫斯科并没有改变其路线。1945 年 6 月 22 日，政治局通过了另一项决议：支持抵抗蒋介石军队进攻的起义者，“提供武器和人员”，而这次组织这种援助的任务则交给了苏联副国防人民委员 Н．А．布尔加宁。

8 月 14 日的中苏条约规定，克里姆林宫在新疆持续的内战中保持完全中立，国民政府将这场内战视为中国自己的内部事务。而现在，苏联高层领导集团必须决定接下来该怎么做。是退缩，将这个在其参与下出现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听天由命，还是不顾一切地继续支持它。9 月 15 日，政治局选择了第三条道路，一条中间道路。这条道路规定，必须以某种方式使交战双方和解，以保持莫斯科在该地区的原有影响力。承担起仲裁者的角色，为新疆争取到自治地位，同时在其秘密的实际保护下。最终，正是基于这样的协议，才得以坚持下来，但时间稍晚——在 1946 年 1 月。

苏联试图控制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所引发的问题，是最困难的，几乎是无法解决的。在波茨坦会议上，已经记录下了对莫斯科非常有利的认可。会议确认：“《蒙特勒海峡公约》已不符合当前形势，应予以修订。”然而，紧接着做出的一项附加说明，将大国领导人的“一致意见”变成了对其中一个国家——苏联的陷阱。说明解释道：“这个问题将成为三个政府中的每一个与土耳其政府之间直接谈判的主题”[508]。这样一来，对安卡拉的共同压力被明确排除，而莫斯科则被要求白白浪费时间。因为根据美国和英国希望确保所有国家在海峡享有海上航行自由的意愿，土耳其可能还会拖延十年才对该公约进行修订，而该公约的有效期要到 1956 年才到期。

1945 年 3 月，在波茨坦会议议定书出现令人鼓舞的条款之前，莫洛托夫采取了一个绝望的步骤。他宣布，苏联方面将单方面不延长 1925 年 12 月签署的为期 20 年的《苏土友好中立条约》。他不祥地威胁要采取任何最严厉的措施，包括使用武力。显然，这位外交人民委员以及整个苏联高层领导集团，包括斯大林，都认为这将迫使安卡拉做出让步。但他们错了。这次以及随后所有纯粹外交性质的（而且还是单方面的，不是由三大强国共同发起，而只是由苏联发起的）行动都没有取得任何结果。甚至连外交人民委员部在 9 月中旬宣布的条约废止声明，也没有对土耳其政府产生任何影响。

在用尽了所有可能的施压手段之后，苏联高层领导集团不得不采取一些明知不会有任何效果的措施。这些措施只是虚幻的、宣传性的。在苏联的报刊上发动了一场虚幻的对土耳其的“进攻”。一些知名的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的学者及社会活动家们以自己的名义，与其说是在说服别人，不如说是在说服自己，称将原属俄罗斯帝国的卡尔斯地区以及巴统地区和埃里温省的部分地区交给安卡拉管辖是不合法的。他们以这种独特的方式废除了 1921 年 3 月 16 日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与土耳其签署的，以及 1921 年 10 月 13 日外高加索各苏维埃共和国与土耳其签署的那些确认失去这些领土的条约。并且在报刊上固执地坚持认为：这些地区据称仍然是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509]。

不出所料，土耳其对这类历史法律方面的探究没有做出任何回应。

最后，在伊朗北部出现的局势最为尖锐，就其可能产生的后果而言也是最危险的。根据 1942 年 1 月 29 日的苏英伊三国条约，进入伊朗的苏联红军部队，与英国部队以及后来在那里登陆的美国部队一样，应在“德国战败后不迟于六个月”撤离。也就是说，正如后来的事态发展所示，应在 1945 年 11 月 9 日之前撤离。但很快就发现，这个日期对苏联来说太不方便了。这使得克里姆林宫无法完成其计划中的所有事情，既无法确保外高加索地区的安全，也无法获得在伊朗北部那些不太可靠的石油产地的特许权。正因为如此，苏联高层领导集团才试图重复他们在新疆已经取得一定成功的做法。利用伊朗沙阿政府与该地区居民之间早已存在的对立，为自己谋取利益。

1945 年 7 月 6 日，政治局决定“从组织上加强”“在外阿塞拜疆、北库尔德斯坦、吉兰、马赞德兰、呼罗珊的分离主义运动”。将开展这类工作的责任交给了阿塞拜疆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巴吉罗夫。他们寄希望于他对东方特殊性的天生理解，以及他的知识和经验。因此，莫洛托夫后来在波茨坦会议上很轻易地就与他的同事艾登和伯恩斯达成了一致，他们提醒莫洛托夫外国军队从伊朗撤离的最后期限即将到来。莫洛托夫甚至欣然同意了对撤离阶段进行细化和明确。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莫洛托夫）确信，在四个月内，秘密行动将会成功实施。但他又一次失算了。他和苏联高层领导集团的其他成员一样，未能预见到所计划事情的全部复杂性，也没有充分考虑到来自强大对手——华盛顿和伦敦的抵制力量。这一切都迫使政治局在 10 月 8 日再次重新考虑这个问题。这使得他们不得不大幅缩小先前的目标，只限于支持外阿塞拜疆和北库尔德斯坦的分离主义运动。

9 月初，几周前成立的阿塞拜疆民主党（阿民党），以首相萨德拉拒绝承认外阿塞拜疆中心城市大不里士选出的市自治政府的合法性为相当有力的理由，要求给予该省民族文化自治权。两个月后，即 11 月 20 日和 21 日，由该党召集的国民大会匆忙宣布了争取自治的合法愿望。他们追求的仅仅是自治，而绝不是独立，也不是脱离伊朗。为了在实践中实现自己的权利，大会宣布外阿塞拜疆实际上实行自治，并将在最短时间内举行自己的议会（议会）选举。

11 月 12 日，议会会议开幕。就在同一天，阿民党领导人、知名记者赛义德·贾法尔·皮舍瓦里向代表们提交了他组建的内阁部长名单，并立即得到了批准。随后，他开始与当地警察、宪兵和军队的指挥官进行谈判，成功地使他们服从于自己的政府。他宣布将所有国营和私立学校的教学语言从波斯语改为阿塞拜疆语。

与此同时，在伊朗库尔德斯坦，库尔德斯坦民主党也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该党也是在巴库专家的影响下成立的。这个组织要求德黑兰给予库尔德人居住地区广泛的自治权。甚至在没有等待首都的回应之前，他们就无视所有民主规范，成立了“民族政府”，由民族运动领导人穆罕默德·加齐担任首脑。

直到这时，苏联高层领导集团才能够放心地继续就其军队从伊朗北部最终撤离的日期进行谈判。他们确信，已经为两个自治政权的存在做了一切必要的事情，而这两个自治政权旨在为苏联外高加索地区提供掩护。他们认为，已经解决了该地区的两个任务之一。至于第二个与石油相关的任务，暂时被他们遗忘了。

第十八章

在两个半月的时间里，斯大林成功恢复了健康和工作能力。而且，从随后不久采取的行动来看，他还仔细谋划了新的路线，这条路线是由与华盛顿和伦敦关系中出现的矛盾所决定的。他认为，并非一切都已失去，只要坚持不懈地努力，仍有可能恢复昔日战斗盟友之间原有的团结与共识。

12 月 17 日，斯大林及时回到了莫斯科。就在苏联首都召开苏联最高苏维埃第二次会议的次日，此次会议将再次讨论并商定与战争期间德国的卫星国——意大利、保加利亚、匈牙利、罗马尼亚和芬兰的和平条约条款。如果谈判成功，还要确定召开和平会议的日期。

会议的组成本身就令人感到乐观。这一次，参加会议的不是像在伦敦时那样的五国外交部门首脑，而是只有三个国家，就像在雅尔塔和波茨坦所规定的那样。苏联方面是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美国方面是詹姆斯·伯恩斯，英国方面是欧内斯特·贝文。显然，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与哈里曼在索契附近别墅的会谈，以及他在这个问题上采取的极其强硬的立场，对杜鲁门产生了影响。这使得白宫和国务院减轻了压力，做出了一些让步。不过目前只是在程序方面，其他方面还没有改变。

伯恩斯在英国同僚的支持下，继续坚持美国有权干涉东欧国家的内政。他因此拒绝承认在欧洲大陆已经形成的势力范围。他要求改组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政府，大幅增加这两个巴尔干国家内民主党派（这里指的是非共产党）在政府中的代表比例。此外，他还试图通过一项作为会议决议的要求，即布加勒斯特方面有义务赦免自 1944 年 8 月 23 日政变以来被捕和被判刑的所有政治犯。他犯了一个极其严重的错误，让莫洛托夫有机会在言辞交锋中给予巧妙的回击。他让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莫洛托夫）有机会向他阐明一些显而易见的道理。首先，自去年秋天以来，在罗马尼亚受到镇压的是那些因与纳粹分子、安东内斯库集团合作而声名狼藉的人，而三大国的法学家已认定安东内斯库为战犯，此外还有法西斯“铁卫队”的成员。其次，11 月 18 日，保加利亚举行了议会选举，祖国阵线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胜利——获得了超过 80%的选票，祖国阵线这个联盟除了共产党人之外，还包括农民人民联盟和社会民主党。顺便说一下，莫洛托夫还提醒说，当时意大利和其他西欧国家都还没有举行选举。

讨论苏联和美国军队从中国撤离的期限问题更加复杂，最终也未能达成一致意见。然而，这种公开的、如此严重的分歧，甚至无法找到妥协方案，在一定程度上通过在议程几乎所有其他要点上达成的协议得到了弥补。

为期十天的会议结果总体上对苏联非常有利。最终就五项和平条约的准备程序达成了一致，确定了条约不可动摇的条款，最后确定了召开会议以详细讨论并随后签署这些条约的日期——不迟于 1946 年 5 月 1 日。为了监督日本履行投降书，决定成立远东委员会，该委员会旨在取代自 9 月以来一直存在的咨询委员会以及盟军委员会。盟军委员会应包括远东盟军最高统帅作为主席和四名成员：分别来自美国、苏联、中国以及一名由英国、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共同派出的成员。会议宣布其致力于在朝鲜建立一个临时民主政府，为此需要由驻扎在朝鲜半岛的苏联和美国军队指挥官的代表组成一个特别委员会。此外，关于由美国、苏联、英国和中国对朝鲜进行为期五年托管的想法也没有被搁置。最后，对于因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问题引发的争端，也找到了一个折中的解决方案。建议罗马尼亚政府“给予”国家农民党和自由党各一个部长职位。建议保加利亚的祖国阵线吸纳两个未加入该阵线的民主团体。如果满足这些简单条件，美国和英国就有义务立即承认布加勒斯特和索非亚的政权[510]。

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闭幕之前，斯大林在核心领导层内以各种方式避免参与任何关于国内政治问题的讨论。他显然在等待国际关系局势明朗化，以便之后能根据局势准确地调整自己的路线方案。也许他还没有做出最终决定：是加强路线，还是相反，根据情况缓和路线。他大概在盘算着，在即将到来的新的一年里，在即将开始的五年里，从他为国家和人民设想的、如此紧迫和必要的计划中，能够实现哪些目标。

12 月 25 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正式结束了工作。12 月 28 日，根据已有的协议，三大国的大众媒体公布了由莫洛托夫、伯恩斯和贝文签署的关于会议具体成果的公报。而 12 月 29 日，在中断多年后，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中央政治局举行了正式的、有记录的会议。这几乎是自 1940 年秋天以来的第一次。只有当核心领导层的所有成员都应该清楚地认识到：斯大林坚定的、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强硬的路线又一次带来了期望的胜利时，才召开了这次会议。这迫使美国和英国最终承认东欧是苏联的切身利益范围。而对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政府的那些建议——只不过是华盛顿和伦敦试图“保全面子”而已。仅此而已。因此，在国际关系中，应该继续保持这种毫不妥协的路线，因为它是最富有成效、最有成果的。要无视原子弹的讹诈。

可以推测，在 1945 年底，斯大林仍然试图不强行推行自己关于可能采取的行动路线，而是说服核心领导层的其他成员相信这条路线的必要性。他更倾向于证明：“适度保守的”路线是唯一可行的，而衡量这条路线的“尺度”应该只是对国家防御能力的关注。制造本国核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的期限，而不是别的什么，决定了被迫加强路线的时期。而所有其他的力量和资源都必须用于恢复工业、振兴农业，以便在明年年底前取消配给制。为此，至少要让市场上有一些食品和大众消费品，因为在四年艰苦的战争期间，人们没有这些东西，即使在胜利后也没有得到。

在政治局会议上，一如既往，只讨论了最重要的问题。主要是斯大林近三个月来思考的成果。而拥有投票权的人——伏罗希洛夫、日丹诺夫、卡冈诺维奇、加里宁、米高扬、莫洛托夫、斯大林、赫鲁晓夫、贝利亚、沃兹涅先斯基、马林科夫、什维尔尼克，以及“受邀者”——布尔加宁、柯西金、波斯克列贝舍夫、什基里亚托夫、沙塔林、库兹涅佐夫，一致批准了所有提出的建议。马林科夫提出的是非常常规的建议，关于苏联最高苏维埃第二届代表大会代表候选人的问题。贝利亚的建议是“由于他被其他中央工作过度占用”，即因为原子弹项目，辞去内务人民委员的职务，由 С．Н.克鲁格洛夫接替。斯大林提出了四个问题。

关于成立新的人民委员部——农业机械制造人民委员部以及建筑和筑路机械生产人民委员部；将燃料工业建设人民委员部分为三个，同样是建设方面的——燃料工业、重工业、军事和海军工业人民委员部，将煤炭工业人民委员部分为两个，即地区性的——苏联西部和东部地区人民委员部，这样做的动机是改善和加快恢复国民经济工作的必要性。关于解除А．И.沙胡林航空工业人民委员的职务，主要原因是该部门在胜利后才被发现的严重失败——苏联空军没有像美国的 B-29 那样的远程轰炸机，而 B-29 是当时唯一能够运载原子弹的工具。关于“从州和中央机构的领导干部中组建一个约 50 人的工作小组，对他们进行培训，使其成为从事对外关系工作的大型政治工作者”的必要性，或者用正常的话来说，就是关于培训未来在苏联大使馆工作的外交官的问题，在两年内，苏联大使馆的数量增加了一倍。

斯大林的另一个建议，作为最后一个建议的组成部分，记录了不久前，即在 9 月刚刚形成的核心领导层中的权力平衡。这意味着在权力斗争中又一次承认了妥协，尽管它只是以“成立政治局对外事务委员会”的必要性的形式出现。不仅委员会的组成，而且其中成员的列举顺序都强调了两个团体的平等：“斯大林、莫洛托夫、贝利亚、米高扬、马林科夫、日丹诺夫”[511]。这也意味着，除此之外，斯大林此后放弃了独自处理国际关系问题，不再

为这些问题制定行动路线和方针。在某种程度上，贝利亚作为内务人民委员的职位被克鲁格洛夫取代这一事实，也证实了这种对现状的被迫承认。众所周知，克鲁格洛夫是与马林科夫关系最密切的人，因此，这个对经济和国内安全都同样重要的部门仍然在同一个人（表面上似乎已经不存在的“三巨头”）的控制之下。

一些看似不太重要的人事变动也说明了同样的问题。将国防人民委员部和海军人民委员部合并为一个武装力量人民委员部，斯大林任人民委员，布尔加宁任其在一般问题上的副手。完全由斯大林一人决定、直接向他负责的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第一副人民委员的职位，由一直依赖贝利亚的 Б.З.科布洛夫换成了此前担任哈萨克斯坦国家安全人民委员的 С.И.奥戈尔佐夫。在内务人民委员部，乌克兰内务人民委员部部长 В.С.里亚斯诺夫被任命为克鲁格洛夫原来的职位，这使得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贝利亚）能够对内务人民委员部保持一定的影响力。同样，实际上也是一种人员调动的是，沙胡林被弹药人民委员部第一副人民委员 М.В.赫鲁尼切夫取代，这一任命在 12 月 30 日得到批准[512]。

然而，斯大林始终未能实现主要目标。他提出的第四个建议——恢复政治局定期会议，每两周一次，在周二晚上 20 点至 21 点举行[513]，他很可能希望打破现有的、对他不利的决策机制。将核心领导层的作用降至最低，因为在这个核心领导层中他没有多数支持，这次他们只是把这个核心领导层称为“委员会”，这绝非偶然。恢复成员更为广泛的、由 13 人组成的党章规定的政治局的昔日重要性。在这个机构中，肯定会有超过半数的成员投票支持他。尽管这个问题得到了一致批准，但不知为何，核心领导层成功地拖延了这一规定的实际执行。最高党组织的下一次会议在三周后才召开，而接下来的会议则拖延得更久，仅仅在一个半月后才召开，而且还是因为需要正式筹备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和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

尽管困难重重，但克里姆林宫的局势依然稳定，管理体系中没有出现任何重大变化，这不仅得益于政治力量的平衡，还得益于仍然存在的兴奋状态。这种状态是由对德国的胜利、苏联仍然被承认为三大强国之一（如今只有这三个国家有权在新的基础上建立世界秩序）以及莫斯科召开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的成功所催生的。1946 年 2 月 1 日，政治局批准的、在即将举行的苏联最高苏维埃选举之际发表的“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致全体选民的呼吁书”，正是充满了这种乐观精神，它将尽快恢复国民经济列为首要主要任务，其次才是“保持国防能力”，强调有必要“巩固已取得的胜利”，“坚定维护苏联的利益”，这应该被理解为加强在东欧国家的影响力。只是在呼吁书的结尾，而且相当模棱两可地，包含了“与其他国家的民主力量共同努力，加强爱好和平国家之间的合作”的呼吁[514]。而这可以有各种不同的理解。既可以理解为希望继续与反希特勒联盟的盟友合作，也可以理解为承认世界分裂为两个阵营。毕竟，1945 年 11 月 6 日，莫洛托夫在提到“爱好和平的国家”时，指的只是东欧国家……

然而，仅仅三天后，一切都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莫斯科收到的一则消息，彻底推翻了之前的所有计划和盘算。美国著名政治评论家德鲁·皮尔逊，实际上表达了总统政府的意见，他突然透露了一件去年 9 月 5 日发生的事情，而此前相关各方一直对此事保持沉默。皮尔逊报道称，苏联驻加拿大使馆的密码员伊戈尔·古曾科“选择了自由”。简单来说，他叛逃了，背叛了祖国。而且还出卖了祖国——他泄露了苏联情报小组的构成，这个小组在美国、英国和加拿大四处搜寻原子弹生产的秘密。不出所料，这一轰动性消息在西方引发了间谍恐慌，随之而来的还有反苏歇斯底里情绪。

似乎斯大林有了充分的理由对核心领导层的一名成员采取“措施”。毕竟，1945 年 8 月 20 日国防委员会关于成立特别委员会的决议的第 13 点规定：“委托贝利亚同志采取措施，组织国外情报工作，以获取关于铀工业和原子弹的更全面的技术和经济信息，并将在这

一领域由情报机构（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红军情报总局等）开展的所有情报工作的领导权交给他”[515]。然而，斯大林忽视了这个绝佳的机会，没有利用它来改变核心领导层的构成。他采取了不同的行动。他认为更有必要、更及时地回应西方的直接挑战，公开宣布加强自己的路线。2 月 9 日，在与选民的会面中，他甚至不再模糊地提及与昔日盟友的继续合作。相反，他暗示：苏联科学家必将制造出核武器[516]。但当时谁也无法预料，这样的声明带来了无法挽回的后果。

美国驻莫斯科代办乔治·F.凯南于 2 月 22 日向华盛顿发送了一份文件，这份文件后来被载入史册，被称为“长电报”。这是一份分析报告，在随后的四十年里，它在美苏关系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在报告中，他以职业的态度表达了自己对“战后苏联世界观”的看法，同时向国务院提出了自己对于确定美国政策的实际结论的建议。

凯南认为，“苏联仍然处于与‘资本主义包围’的对抗状态，从长远来看，它与资本主义无法实现持久的和平共处”。他随意地将实际情况和自己的想象结合起来，为克里姆林宫归结出以下基本立场：“苏联的国内政策致力于以任何方式加强苏联国家的实力和威望：……加强军事工业化；最大限度地发展武装力量，并进行展示以震慑外部势力；对国内问题进行持续保密，旨在隐藏自身的弱点并向对手隐瞒信息。在所有被认为是及时且有希望的情况下，都会努力扩大苏联官方势力的范围。目前，这些努力仅限于一些被认为具有直接战略意义的邻近地区，如伊朗北部、土耳其，可能还有博恩霍尔姆岛[517]……

莫斯科并不认为联合国是一个基于所有国家的共同利益和目标建立的持久且稳定的世界共同体的机制，而是将其视为一个竞技场，为实现上述目标提供了可能性……在国际经济问题上，苏联的政策实际上将由苏联及其周边地区（总体上由苏联主导）追求自给自足的愿望所决定……”

接着，凯南非常悲观地预测，莫斯科将试图利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削弱西方主要大国的总体政治和战略潜力……削弱西方大国在殖民地落后或附属民族中的实力和影响力”。“长电报”的作者也没有排除另一种更可怕的情况：“当个别政府阻碍苏联实现其目标时，”凯南指出，“将会施加压力以将其推翻……在其他国家，共产党人通常会努力消灭一切形式的个人独立：经济上的、政治上的或道德上的……将尽一切可能使西方大国相互对抗……”他得出结论：“我们面对的是一股政治势力，它狂热地坚信与美国不可能实现持久的和解，认为破坏我们社会的内部和谐、摧毁我们的传统生活方式、消除我们国家的国际影响力是可取且必要的，以确保苏联政权的安全。”

凯南不满足于仅仅做出这些纯粹的、不超出外交范畴的专业预测，他还对苏联进行了历史政治评价，对苏联的未来进行了展望，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他斩钉截铁地宣称：“与整个西方世界相比，苏联仍然是一个相对弱小的力量。因此，他们的成功将取决于西方世界能够达到的团结、坚定和活力的实际水平。我们有能力影响这一因素。

作为一种国内政权形式，苏联体制的成功尚未得到最终证明。还需要证明它能够经受住权力从一个人或一个团体到另一个人或团体的连续传递这一重大考验。第一次这样的权力传递发生在列宁去世时，其后果在 15 年里震撼了苏联国家。第二次传递将在斯大林去世或退休后发生。但即使这也不是最后一次考验。由于最近的领土扩张，苏联的国内体制现在也将面临一系列额外的压力，这些压力曾沉重地压在沙皇制度上。我们坚信，自内战以来，俄罗斯民众在情感上从未像现在这样远离共产党的教义。共产党现在已经成为俄罗斯最强大、目前非常成功的独裁政权工具，但它已不再是情感激励的源泉。因此，不应认为苏联运动的内部力量和有效性已经得到证明。”[518]

凯南的电报连同美国联合情报委员会和参谋长联席会议的评估，使杜鲁门总统坚信，苏联的近期目标不是加强其国家安全，不是加强其在与本国接壤国家，尤其是在东欧的政治影响力，而是占领新的领土。不排除——甚至可能是整个欧洲，直至大西洋。与此同时，还有世界上其他一些地区，美国在这些地区拥有自己的战略利益。可能是满洲，苏联红军的部队仍未从那里撤离，而且共产党的力量正在逐步占领满洲——自年初以来，美国总统的私人特使乔治·C.马歇尔将军一直在忧心忡忡地向杜鲁门报告这一情况。也可能是伊朗，长期以来，美国一直因其巨大的石油储备而对伊朗感兴趣，而现在苏联也在坚持不懈地对伊朗的石油资源提出要求。

另外一件事也必定影响了美国总统的立场。与凯南不同，杜鲁门并不了解斯大林在与选民会面时发表的讲话内容。因此，他不知道苏联政府首脑在回答自己提出的一个反问式问题——战争的主要成果究竟是什么时，给出的答案与“长电报”中的解读截然不同。斯大林以他惯有的说教方式明确指出了三个这样的成果：战胜了“我们的苏维埃社会制度”、“我们的苏维埃国家制度”、“我们的红军”。而对于共产党，他赋予其从属的、纯粹的经济角色。他甚至都不愿提及国防委员会，而是宣称——党确保了“胜利的物质基础”。在谈到经济恢复计划时，他再次将这些计划的制定与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联系起来。

当然，杜鲁门对此一无所知。他只能依靠其他人提供的信息。因此，他很快就与丘吉尔站在了一起，丘吉尔自 1943 年以来就一直鼓吹建立西方联盟以制衡苏联在欧洲的力量这一想法，而这一想法正开始呈现出新的形式。3 月 5 日，英国前首相在密苏里州富尔顿市的威斯敏斯特学院发表了演讲。他在杜鲁门在场的情况下发表了这篇演讲，因此可以认为杜鲁门当时是默认了这一演讲内容的。他以专业演说家的热情和说服力，猛烈抨击了莫斯科的外交政策。他似乎是按照凯南提出的剧本，指责苏联推行扩张主义，指责苏联已经占领了整个东欧，东欧上空已经降下了“铁幕”。因此，他又完全按照这位美国外交官的建议，呼吁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立即联合起来。利用对核武器的现有垄断，立即抵制苏联的侵略意图。

斯大林再次不得不参与论战，只不过这次是公开论战。3 月 13 日，他接受了《真理报》的采访。他将丘吉尔的演讲视为“危险的举动，旨在播下盟国之间不和的种子，阻碍它们之间的合作”。他不满足于如此激烈的言辞，还补充道：“丘吉尔先生的言论是在挑起战争，是在呼吁对苏联发动战争。”他坚决否认了关于扩张主义的指责，他再次强调了自 1941 年 12 月以来就一直坚持的观点——主要是对西方领导人说的——“苏联希望为未来保障自身安全，努力确保在这些国家（东欧国家。——作者注）存在对苏联忠诚的政府”[519]。

一周后，斯大林利用美联社记者的请求，回答了记者的问题，实际上他再次驳斥了凯南对苏联的另一项指责。他阐述了克里姆林宫对联合国的作用和重要性的如下理解：“联合国是维护世界和平与国际安全的重要工具。这个国际组织的力量在于它基于国家平等的原则，而不是一些国家对另一些国家的统治原则。”同时，他也表达了自己对整个国际形势的看法。“我认为，”斯大林指出，“‘当前的战争威胁’是由一些政治团体的行动引起的，这些团体在宣传新的战争，从而播下了不和与不信任的种子。”[520]

但是，每次谈到国际问题，谈到西方领导人的具体言论时，斯大林从未谴责过华盛顿和伦敦官方的政策。他这样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因为他仍然抱有一线希望。希望在可预见的未来，能保持与美国和英国的原有关系。他甚至回避对代理国务卿迪安·腊斯克在 1 月 22 日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的至少可以说是奇怪和意外的言论发表评论。在那次新闻发布会上，这位完全是公职人员的人竟然声称：千岛群岛只是苏联的临时占领区，并且说，关于将这些岛屿移交给莫斯科永久管辖的问题，据说从来都没有过讨论。苏联的大众媒体不得不驳斥美

国国务院这种与协议相悖的观点。几乎是立刻，1 月 27 日——塔斯社发表了声明，两周后——在《消息报》上，公布了三大国关于远东地区命运的雅尔塔协定[521]。

世界局势急剧恶化，几乎到了灾难性的程度，这不仅可能意味着与昔日战斗盟友真正爆发战争，而且几乎意味着与他们的友好关系彻底破裂，这表明斯大林的外交政策战略彻底失败。他选择的路线是错误的。这要么需要对已做出的决策进行重大重新评估，修正之前选择的行动路线，要么需要采取新的加强措施。正如权力高层发生的事件所表明的那样，斯大林选择了后者。他进行了又一次宫廷政变。他急于摆脱那些了解所发生事情的竞争对手同事。首先是莫洛托夫和马林科夫。

1946 年 3 月 18 日，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召开了战后的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只讨论了两个问题。一个是例行问题——“苏联最高苏维埃联盟院会议”，即组建其主席团和苏联人民委员会（决定将其更名为苏联部长会议）。另一个是特殊问题——“组织问题”，这意味着要进行重大的人事变动。

第一个以故意歪曲的形式公开的信息是关于第一个问题的。3 月 19 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按照要求，未经讨论就接受了旧政府的辞职，并批准了新政府的组成。新政府成员按以下顺序公布：主席——斯大林，副主席——莫洛托夫、贝利亚、安德烈耶夫、米高扬、柯西金、沃兹涅先斯基、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522]。换句话说，还是那些国防委员会和苏联人民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的成员，只是没有了布尔加宁、马林科夫和什维尔尼克（当时什维尔尼克接替因健康状况严重恶化而退休的加里宁，当选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但增加了从政治舞台沉寂中复出的伏罗希洛夫。

然而，真正的权力，对最高执行机构的实际领导，却对所有人都隐藏起来了。根据批准了 3 月 20 日苏联部长会议严格保密决定的政治局决议，“取代现有的两个苏联人民委员会执行局”，成立了一个统一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团（BSM），成员包括部长会议主席的所有副主席。然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团的主席不是在会议上被列为第二位、在报纸公布中也排在第二位的莫洛托夫，而是贝利亚，副主席是沃兹涅先斯基和柯西金[523]。

一周后，即 3 月 28 日，政府主席所有副主席之间的职责也最终确定下来。这里最关键的是，除了担任实际总理和原子弹项目负责人的职务外，贝利亚还被赋予了“监督”内务部、国家安全部和国家监察部工作的职责。如此巨大的权力使得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贝利亚），对于核心领导层的其他成员来说并不那么意外——在与“古曾科事件”相关的事件发生后，这是可以预料的——成为了国家机构中的第二号人物。实际上，这赋予了他，也只有他，正式控制国家整个官僚机构活动的权力。他不仅可以决定普通公民的命运，还可以决定那些与他处于“同一级别”的人的命运。

莫洛托夫的地位急剧下降。他的职责，就像 1941 年 5 月一样，仅限于领导苏联外交部。但从政治局外交政策委员会的存在这一事实来看，他处于该委员会的持续和不间断的控制之下。而马林科夫则仅仅被剥夺了他在过去三年中担任的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这一国家职务。

同样重大的变化也波及到了党的机构，党的最高机关——书记处、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主席团。3 月 20 日，报纸和广播发布的关于中央全会的官方消息，似乎只记录了一些例行的人事变动。政治局成员增加了贝利亚和马林科夫，政治局候补委员增加了布尔加宁和柯西金，还有一些不太重要的变动——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书记处中，战争时期的主要意识形态家舍尔巴科夫和“农业专家”安德烈耶夫去世近一年后，由列宁格勒和莫斯科党组织的第一书记 А．А.库兹涅佐夫和 Г．М.波波夫接替了他们的第一书记职位[525]。

与往常一样，公开信息掩盖了变动的原因以及新书记的具体职责，这些职责直到一个月后的 4 月 13 日，在战后第四次有记录的政治局会议上才确定下来。就在这一天，早在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就开始的中央委员会机构的全面重组，随着最后两个按生产部门划分的部门——农业和交通运输部门的撤销而终于完成。现在，书记处的活动仅限于那些决定留给党的问题：选拔和安排干部、宣传和鼓动、检查地方党组织的工作，以及与国外共产党的联系，更确切地说——对它们施加温和的影响。新的任务对应着新的党的机构结构。它包括两个管理部门——干部管理部门、宣传和鼓动管理部门，两个部门——组织指导部门、对外政策部门。这些部门的领导几乎全部更新，而且它们以不同的方式分配给书记们进行监督。

马林科夫失去了他的特殊地位，这种地位的特殊性在于，只有他和斯大林一样，同时在党的机构和国家机构中担任高级职务。在中央全会之前，他是中央委员会第二书记，同时也是国防委员会成员，后来又担任苏联人民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副主席之一，而现在，他不仅没有进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团，还失去了中央委员会干部管理部门负责人的职位。从现在起，他的职责仅包括“领导苏联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工作，为组织局准备问题并主持组织局会议”。

在关键的党内职位上出现了一位在莫斯科的新人，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库兹涅佐夫（在圈子里通常称他为“列宁格勒的库兹涅佐夫”），正是他接手了“领导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干部管理部门”的工作，负责“在党的、苏维埃的和经济组织中进行干部分配方面的工作；为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书记处准备问题并主持书记处会议；领导俄罗斯联邦各州党的州委的工作”。与此同时，库兹涅佐夫成为了中央委员会干部管理部门的负责人。

日丹诺夫这次成功地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即他在 1945 年初回到首都后立即占据的那些地位。他被完全正式地赋予了“领导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宣传和鼓动管理部门以及党和苏维埃组织在宣传和鼓动领域（印刷、出版、电影、广播、塔斯社、艺术、口头宣传和鼓动）的工作；领导对外政策部门”的职责。但与库兹涅佐夫不同的是，日丹诺夫没有被任命为宣传和鼓动管理部门的负责人，这个职位仍然由 Г.Ф.亚历山德罗夫担任。很可能，这是在安德烈·亚历山德罗维奇（日丹诺夫）本人的同意和意愿下做出的决定。

四位书记中唯一的一位，Г.М.波波夫，没有获得“关于中央委员会的任何确定职责”。这种例外传统上的解释是他“因领导莫斯科党组织和莫斯科苏维埃而非常忙碌”。

那些保持独立的部门被委托给了中央委员会机构中的新人，这些人刚刚被调到莫斯科工作。对外政策部门，在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回到祖国保加利亚，并于 11 月开始领导该国政府后，由从维尔纽斯召回的 М.А.苏斯洛夫负责。组织指导部门由 Н.С.帕托利切夫负责[526]，他曾先后领导雅罗斯拉夫尔州委和市委，以及车里雅宾斯克州委和市委，时间长达七年多。

这些变动，以及库兹涅佐夫的意外迅速晋升——他不仅年轻，而且是一个鲜为人知的官员，只担任了一年列宁格勒州委和市委第一书记，原因很简单。斯大林不再对身边的人隐瞒他对日益衰老和健康状况恶化的担忧。

与此同时，他努力尽自己所能，确保即使没有他，自己的路线也能继续下去。他向所有人明确表示：他认为自己的接班人，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的职位人选不是马林科夫，甚至也不是忠诚的日丹诺夫，而是库兹涅佐夫。因此，他赋予库兹涅佐夫如此巨大的权力，给他机会展示自己，证明选择的正确性。

这场席卷权力高层的风暴并未平息，而是继续以同样的力量肆虐。它越来越威胁到那些不久前还感觉自己地位稳固的人。4 月底，前航空工业人民委员，最初被降职为俄罗斯联邦

部长会议副主席的 А.И.沙胡林被捕，与此同时被捕的还有苏联空军司令 А.А.诺维科夫，以及中央委员会干部管理部门中负责航空和发动机制造干部问题的两个部门负责人。这一事件为 5 月 4 日核心领导层的又一次会议提供了理由，正式使马林科夫名誉扫地，并将他从书记处中除名[527]。但在那个时代和类似情况下很有可能发生的——解除马林科夫的所有其他职务，并没有随之而来。此外，他还被留在了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中。

同一天，还做出了另一项重要决定，这次是针对贝利亚的。毫无任何动机和解释，自 20 世纪 20 年代初就在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手下工作的 В.Н.梅尔库洛夫，被免去了他担任了两年半的国家安全部长职务。他的继任者是 В.С.阿巴库莫夫[528]，他是“反间谍总局”（“斯梅尔什”）的负责人，自 1943 年 4 月起成为国防委员会的一个结构部门，因此在职务上直接隶属于斯大林，他与前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老上级断绝了所有以往的联系。这样的措施极大地削弱了贝利亚的地位，同时也为中央委员会干部管理部门的新负责人库兹涅佐夫带来了优势。

核心领导层中出现的不稳定局势，立即引发了新一轮争夺领导权的斗争，这场斗争采取了幕后阴谋的形式。

日丹诺夫和他的老门生、坚定的支持者 Г.Ф.亚历山德罗夫，依据 4 月 13 日政治局关于意识形态工作不足之处的决定，试图尽可能地利用这种不确定的局势为自己谋利。他们指责大多数州委和边疆区委的领导严重缺乏专业性、政治素养低下，甚至指责一些共和国的中央委员会，尤其是乌克兰中央委员会，存在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迎合行为。这些表明上述情况的数据，在宣传和鼓动管理部门的会议上公布，并且在详细的报告中阐述[529]，由于日丹诺夫的有针对性的支持，这些报告很快开始形成具有深远意义的中央委员会决议的形式。而且这些决议涉及的与其说是意识形态问题，不如说是干部问题。

在这一系列事件中，第一个也是决定性的事件是 7 月 8 日通过的决议“关于党的发展以及加强对新加入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党员的党组织和政治工作的措施”。正是这项决议，如果有必要的话，可以作为进一步采取重大措施的基础。首先是计划在不久的将来对所有党员无一例外地进行考试，检查他们的理论知识。提出这一建议的动机是，包括州委和边疆区委工作人员在内的 67.2%的共产党员甚至没有中等教育水平。与此同时，还规定减少接收在 1946 年 1 月 1 日已经占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总人数 47.6%（即几乎一半）的公职人员入党[530]。

为了进一步落实这项决议，8 月 2 日又通过了另一项决议“关于党的和苏维埃领导干部的培训和再培训”。该决议要求所有党的干部，根据所担任的职务和已有的教育程度，必须参加为期两年或三年的学习[531]。为了完成这项任务，成立了高级党校、社会科学学院，同时恢复了军事政治学院。

这种解决干部问题的方法必然会使宣传和鼓动管理部门，而不是干部管理部门，成为中央委员会机构中的关键部门。与此同时，所发现的事实，尽管没有列入决议文本，但实际上延续了马林科夫在战前就开始的路线，并使 А.А.库兹涅佐夫的能力受到质疑，因为他对如此具有威胁性的现象完全没有给予任何关注。

与此同时，日丹诺夫和亚历山德罗夫又采取了一个非常典型的“机构博弈”步骤，旨在保护他们免受可能来自各方的批评。他们在春天准备了一系列关于意识形态问题的尖锐决议，并在 1946 年下半年通过了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审议。这些决议涉及《真理报》、《消息报》、《劳动报》、广播委员会、电影部、联合国家出版社（OGIZ）的工作不足之处，以及文学艺术批评方面的问题。但在这些表面上极其自我批评的文件中，他们成功地将重点转移到了仍然是选拔和安排干部的问题上。

这些行动极大地加强了日丹诺夫的地位。8 月 2 日，政治局做出决定，根据该决定，主持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会议和领导书记处工作的职责现在由他而不是库兹涅佐夫承担[532]。换句话说，日丹诺夫被公认为党内的第二号人物，并且再次像战前一样，与斯大林一起签署苏联部长会议和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的联合决议。

同样根据政治局的这项决定，马林科夫在 5 月 4 日失去的领导苏联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职责，被交给了新进入书记处的 Н．С.帕托利切夫，他所在的部门地位得到提升，并改组为党组织检查管理部门[533]。同一天，马林科夫从三个月的失势中恢复过来。他被任命为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团成员，负责通信工业部、电力工业部和通信部的工作[534]。格奥尔基·马克西米利安诺维奇（马林科夫）因此再次回到了权力的巅峰，但他的权力大幅缩小，仅限于国家经济管理机构的领域。

然而，所有这些任命和职责重新分配仍然没有带来哪怕是微弱的、哪怕是不稳定的核心领导层权力平衡。相反，不可调和的矛盾继续撕裂着核心领导层，这些矛盾源于莫洛托夫、贝利亚、马林科夫以往权力被削弱所引发的不满，但在更大程度上，是源于库兹涅佐夫那永不满足的野心，他不愿接受日丹诺夫如此迅速地取得优势地位。斯大林也不自觉地卷入了这场持续不断的阴谋之中。

1946 年晚春，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能够对自己的外交政策路线的成果进行一番总结。对比一下胜利和失败的数量。

的确，新的西部边界已经划定。成功地让华盛顿和伦敦最终承认了包括波兰在内的东欧国家，是苏联的切身利益范围和国家安全区域。但成就也就仅限于此了。而失败的情况则多得多。

在最严厉的压力下——1 月 9 日伊朗向安理会提出了苏联干涉其内政的问题，3 月 2 日第三届伦敦苏美英外长会议做出决定，3 月 8 日凯南向苏联递交照会——苏联红军部队还是不得不紧急从伊朗撤离。在 5 月 9 日之前完成撤离。而且完全没有把握，也没有可靠的保证，说南阿塞拜疆和北库尔德斯坦的自治政权在没有它们迫切需要的直接支持的情况下能够维持下去。诚然，从 2 月 12 日持续到 3 月 3 日的德黑兰首相卡瓦姆·萨坦内的访问时间之长前所未有，似乎已经实现了莫斯科的主要目标。促成了关于成立伊苏混合公司以勘探和开发石油矿床的条约草案的出台。然而，伊朗议会计划直到 10 月底才审议和批准该条约。而且要等到伊朗领土上不再有一名苏联士兵之后才行。

在苏联南部边界沿线其他对苏联具有战略意义的地区，情况同样令人沮丧。土耳其一如既往地不急于同意重新讨论黑海海峡的航行制度问题，对莫斯科方面，甚至更不用说第比利斯和埃里温方面试图对其施加的道义压力没有任何反应。不得不停止对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公开支持，承认中国中央政府（蒋介石政府）对新疆的最高权力。苏联军队也撤离了满洲——在 5 月 3 日之前，还来得及帮助毛泽东的两支军队在那里，包括哈尔滨、长春、沈阳（奉天）等重要中心城市，建立起绝对的控制权。但美国军队和海军仍然留在中国，展示着他们在整个北太平洋地区的主导地位。

在国际舞台上的失败还因为，原计划在 1946 年底取消配给制的期望落空了。一场可怕的、前所未有的旱灾袭击了这个国家的大片地区，就是那些在战争期间曾两次遭受残酷战火蹂躏的地区——摩尔达维亚、乌克兰、北高加索、伏尔加河流域，这不仅导致了歉收。还带来了饥荒，而人们不得不对此保持沉默，以免给西方以借口，说苏联制度软弱。为了不让美国提出提供经济援助，从而对苏联施加某种政治压力。而且由于刚刚展开的制造原子弹的工作——直到 1946 年 5 月才建立了本国的核武器中心，一个后来被称为“阿尔扎马斯-16”的

城市，这项工作需要的力量和资源比最初预想的要多得多，因此甚至不得不忘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计划。总之，放弃了 2 月份宣布的所有计划。

斯大林试图以任何方式，甚至是明显不理智的方式，来弥补他的路线，尤其是在苏联人民眼中的这种惊人的失败，他在 4 月 13 日的政治局会议上试图把一切所谓的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都当作替罪羊。印刷、出版、文学艺术杂志、苏联作家协会、剧院，甚至博物馆。他发表了长篇讲话，谈到“承认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是存在严重缺陷和重大失败的工作”。他没有局限于一般性的论述，而是列举了具体的例子。他指出，甚至连《真理报》都没有就任何一个外交政策问题发表过意见。他把莫斯科小剧院导演亚历山大·泰罗夫的作品评价为负面现象。在分析“厚”杂志上发表的作品时，他把《新世界》评为最差的，认为格里戈里·亚戈德费尔德在《星》杂志上发表的小说《时间之路》的出现是一个错误。他一刻也没有忘记与华盛顿和伦敦日益激烈的文字交锋，提出了一个不同寻常的建议：“难道不能在列宁格勒有一个‘反对派’机构，来批评盟友和自己人吗？”

但无论斯大林在讲话中涉及到什么，几乎都归结为缺乏真正的批评。“我们这里没有真正的批评，”他谈到文学时说，“而那些存在的批评家，是受他们所服务的作家庇护的批评家，是友好的爬虫。他们的任务就是赞扬某些人，而诋毁其他人。”他提出把“客观的、独立于作家的批评”作为万灵药。而“推动这一切的旗手应该是宣传管理部门”。并给了宣传管理部门三个月的时间来准备必要的措施[535]。

就在规定的期限，7 月 15 日，宣传和鼓动管理部门在书记处批准了其未来工作的计划。其中包括为“提交中央委员会审议”准备关于改善文学艺术杂志内容的决议、关于戏剧剧院剧目以及改善剧目的措施的决议、关于 1946-1947 年艺术电影制作的决议，以及关于创建自己的出版物的决议。事实证明，最后一项任务是最容易完成的。7 月 26 日，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批准了一份文件，根据该文件，很快就开始出版后来声名狼藉的报纸——《文化与生活》。这是宣传和鼓动管理部门的机关报。正是斯大林设想的那个用于“批评盟友和自己人”的报纸。当然，这只是在意识形态层面上，而不是在政治层面上[536]。

然后开始了对另外三项决议的制定工作，当时谁也无法预料，这三项决议将在米哈伊尔·左琴科和安娜·阿赫玛托娃的命运中扮演悲剧性的角色。在准备这些文件时，无论是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还是亚历山德罗夫，或是日丹诺夫，都绝非渴望鲜血。他们并不想把任何一位散文家、诗人、剧作家、戏剧和电影导演送进监狱，让他们成为仪式性的牺牲品。根本没有这样的必要，而且亚历山德罗夫六年来的全部实践经验，他非常了解日丹诺夫，熟悉他的风格和工作方法，也排除了这样的决定。两人都致力于其他目标。只是想证明一件事：如果没有宣传和鼓动管理部门的领导和监督，文学和艺术工作者必然会犯下极其严重的错误，而且不仅是意识形态方面的错误，还有纯粹的专业和艺术方面的错误。

正是本着这种精神，最初的两项决议草案——《关于〈星〉和〈列宁格勒〉杂志的不满意状况》、《关于戏剧剧院剧目的状况》以及伴随它们的“报告”诞生了。在这些文件中，他们严格遵循斯大林的指示，只做了一处修改。他们宣布最差的不是莫斯科的《新世界》，而是列宁格勒的《星》杂志。而且他们自己决定，要实现要求的文学艺术出版物数量的减少，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关闭其中最“薄弱”的一份，即只在涅瓦河畔的城市发行的《列宁格勒》杂志。

在这两份报告中，列举了数十个负面例子。纯粹是艺术水平低下的作品——Г.戈拉、Г.亚戈德费尔德、А.施泰因、Б.克内希特、М.马柳金、Л.鲍里索夫、С.斯帕斯基、М.斯洛尼姆斯基、И.塞尔文斯基、С.瓦尔沙夫斯基和 Б.雷斯塔、Д.奥斯特罗夫、Д.拉赫曼诺夫的作品；“堕落、有害”的作品——А.阿赫玛托娃、И.萨多菲耶夫、М.科米萨罗娃的诗歌；“堕落、荒谬”的作品——左琴科（但关于他当时只有三句话！）；“空洞、

无思想”的作品——В.马斯和 М.切尔文斯基、图尔兄弟和 Л.谢宁娜、Н.波戈金等人的戏剧。在关于剧目的决议草案中，谴责中亚和外高加索的剧院过度沉迷于历史题材，错误地夸大了古代当地民族英雄的形象；俄罗斯的剧院则因在舞台上过度上演极其薄弱的、同时也是“资产阶级沙龙戏剧典范”的美国、英国、法国作家的戏剧而受到谴责。

不满足于这种狭隘的视角，关于剧目的“报告”大大扩大了应受指责的范围。它不局限于剧作家和剧院，还指出：“由于艺术事务委员会的过错，在剧院里出现了上演有问题的西方剧作家戏剧的倾向。这些剧目在剧院上演后，已经不得不禁止，因为剧院为了上演这些剧目投入了大量资金。”接着说：“一些剧作家（克伦、波戈金）非常正确地指出，接受戏剧作品和对其进行审查的机构和人员数量非常庞大。在艺术事务委员会、剧目委员会、共和国艺术管理部门、剧院的文学部门、军事和社会组织中，总共有数十人有权‘扣留’戏剧作品并对其进行修改。这些审查者中的许多人过于直接、简单地理解戏剧艺术在宣传、鼓动工作体系中的作用，迫使剧作家走上表面反映日常现实弊端的道路。”[537]

似乎所有决议草案的批准都不会出现问题。但就在 8 月 9 日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会议开始前的 48 小时，这次会议计划审议宣传和鼓动管理部门的三份文件，日丹诺夫收到了来自“书记处”的某种指示（来自谁呢——所有人，斯大林、库兹涅佐夫、帕托利切夫、波波夫？还是仅仅来自斯大林？但如果是这样，为什么不直接引用他的话呢？）。他被要求紧急将电影制作计划替换为对 Л.卢科夫刚刚创作的第二部电影《伟大的生活》的尖刻批评。要对这部电影进行谴责，以便有足够令人信服的理由禁止这部电影在全国影院上映[538]。而在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上，在讨论议程的第一个问题——《星》和《列宁格勒》杂志的状况时，毫无外在原因地爆发了一场戏剧，这场戏剧催生了如今广为人知的关于“日丹诺夫决议”的传说。

一切都始于回应者——代表《星》杂志的 В.萨亚诺夫、《列宁格勒》杂志的编辑 Б.利哈列夫和苏联作家协会列宁格勒分会的负责书记 А.普罗科菲耶夫不愿意接受在这种情况下通常的游戏规则。他们拒绝了，按照规定，他们本应只是忏悔，承认任何哪怕是最荒谬的指责，承诺尽一切努力改正错误并保证不再重犯。而且，他们一致不同意关闭他们所在城市出版的两份文学杂志中的任何一份。也许，他们寄希望于“老乡”——日丹诺夫和库兹涅佐夫的同情和支持。也许，他们认为他们不会让自己受委屈，会保护他们免受宣传和鼓动管理部门的攻击。但无论如何，被批评者的这种行为，在这样的场合下是奇怪而不寻常的，改变了会议的进程。从一开始，会议就几乎没有了友好的意见交流的性质，而是变成了激烈、甚至愤怒的、针对个人的争吵。在这场争吵中，讨论的实质和主题也不知不觉地发生了变化。

一个关于杂志归属的问题完全偶然地浮出水面。为什么它们突然不再是苏联作家协会的机关刊物，而变成了隶属于苏联作家协会列宁格勒分会的刊物呢？而且还发现，列宁格勒市委知道这件事。事实证明，就在不久前——6 月 26 日，列宁格勒市委还批准了对《星》杂志编辑委员会的改组，并且将在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上多次被提及的、绝对不受好评的左琴科纳入了编辑委员会。列宁格勒州委和市委第一书记 П.С.波波夫为自己辩解时，没有考虑到自己话语的后果，他说：“我就这件事向库兹涅佐夫同志提供了一份说明。”而马林科夫在被迫回答“为什么批准了左琴科？”这个问题时，不高兴地把责任推给了第二书记 Я.Ф.卡普斯京。

就这样，对于大多数会议参与者来说不知不觉地，一个全新的问题层面出现了。一个纯粹的政治层面，直接与中央委员会书记 А.А.库兹涅佐夫的活动相关。他的竞争对手——日丹诺夫和马林科夫，有了一个虽然还很脆弱但却有可能把发现的问题的责任推到他身上的机会。毕竟，除了他之外，没有人监督俄罗斯联邦所有州委的工作，包括列宁格勒州委。嗯，如果发现的严重失误比宣传和鼓动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预想的要多，如果这些失误看起

来更严重，那么库兹涅佐夫的责任相应地也会增加。然而，要做到这一点并不那么容易，因此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推迟了做出决定。它委托一个按照此类情况的常规组成的特别委员会——А.А.日丹诺夫（召集人）、А.А.库兹涅佐夫、Н.С.帕托利切夫、Г.М.波波夫、Г.М.马林科夫、Г.Ф.亚历山德罗夫、П.О.波波夫、В.М.萨亚诺夫、Б.М.利哈列夫、А.А.普罗科菲耶夫、Н.С.吉洪诺夫（苏联作家协会管理委员会第一书记）、И.М.希罗科夫（列宁格勒市委宣传部门负责人）和列宁格勒作家 В.В.维什涅夫斯基，他严厉批评了这些杂志的工作，“根据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上的意见交流，制定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关于彻底改进《星》杂志的决议草案”。

对下一个问题——电影《伟大的生活》第二部的讨论进行得较为平静。导演 Л.卢科夫和编剧 П.尼林没有与报告人争论。正如人们所期望的那样，他们完全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并为此忏悔。他们表示愿意立即根据提出的每一条意见对影片进行修改。因此，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总结会议结果就变得更容易了。会议决议称：“1.禁止电影《伟大的生活》（第二部）在影院上映。2.委托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书记处，根据会议上的意见交流，制定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关于禁止该电影上映的决议草案，阐述禁止该电影的理由。3.委托电影部艺术委员会就修改电影《伟大的生活》的可能性提出自己的意见。”

而在当天快结束时，当他们转到第三个问题，即关于戏剧剧院剧目的问题时，情绪已经完全平静下来，宣传和鼓动管理部门事先准备好的决议草案几乎得到了批准[539]。

然而，在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幕后，紧张情绪并未平息。甚至还加剧了，因为《星》杂志的命运不知不觉地与库兹涅佐夫的命运联系在了一起。发生了一些事情，这些事情很快就极大地改变了事态的发展。

第二天，8 月 10 日，国家安全部长 В.С.阿巴库莫夫向库兹涅佐夫提交了一份“关于作家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左琴科的报告”，这份报告是在同一天撰写的，而且根据中央委员会的办事规则，显然是库兹涅佐夫明确要求的结果。在报告的第四段中，已经包含了政治评价——“多年来，左琴科一直被认为是一位具有反苏观点的作家，他批评党在文学和艺术领域的政策”。但——一个非常有趣的细节！——在国家安全部的这份报告中，没有提到 1943 年 12 月 2 日中央委员会的决议，在该决议中，左琴科因小说《日出之前》而受到谴责[540]。在另一份同样关于左琴科的文件（或者是另一份报告的打印件）中，也没有提到这个重要事实，这份文件没有地址，也没有签名，其写作风格只有内务部或国家安全部的工作人员才会有。在这份文件中，“追踪”了这位讽刺作家的“关系”。文件指出，与他关系最密切的是萨亚诺夫、普罗科菲耶夫、斯洛尼姆斯基、卡维林和尼基京。文件还指出了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在他的亲密圈子的交谈中”都说了些什么。文件还提到，但引用了“苏联小百科全书”的内容，“左琴科、斯洛尼姆斯基和卡维林之间的良好关系可以追溯到 1926 年，当时他们三人创建了‘谢拉皮翁兄弟’团体，这个团体在文学界是一个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上有害的反对派”[541]。

目前还不能完全确定这两份文件对于准备关于《星辰》和《列宁格勒》杂志的最终决议版本起到了多大的决定性作用。但可以肯定的是：它们绝非偶然地出现在宣传和鼓动管理部门关于列宁格勒杂志的档案中。而且，毫无疑问，8 月 10 日库兹涅佐夫收到的报告（也许还有其他类似的监视材料），他转交给了宣传和鼓动管理部门，与 8 月 12 日斯大林与日丹诺夫和库兹涅佐夫的谈话之间存在着直接的联系。而日丹诺夫不得不把一个重要指示记在笔记本上：“激怒。更换积极的工作人员。任命叶戈林。说脏话。（我加粗强调。——作者注）”[542]。在这之后，亚历山德罗夫终于能够准备好决议文本的那个版本，而这个版本最终也得到了批准。诚然，在 8 月 12 日那天，决议包含的不是 13 条，而是 12 条。其中包

括：“4.批准 А.М.叶戈林同志为《星》杂志主编，同时保留他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宣传管理部门副主任的职位<…>6.取消列宁格勒市委今年 6 月 26 日关于《星辰》杂志编辑委员会的决定，因为该决定在政治上是错误的。宣布对市委第二书记 Я.Ф.卡普斯京同志做出这一决定的行为进行斥责。7.解除列宁格勒市委宣传书记兼宣传和目前还无法完全确定，这两份文件对于准备关于《星》和《列宁格勒》杂志决议的最终版本起到了多大的决定性作用。但可以肯定的是：它们绝非偶然地出现在了宣传鼓动管理部门关于列宁格勒杂志的档案中。而且，毫无疑问，库兹涅佐夫在 8 月 10 日收到的那份报告（或许还有其他类似的监视材料），他转交给了宣传鼓动管理部门，这与 8 月 12 日斯大林同日丹诺夫和库兹涅佐夫的谈话之间存在着直接的联系。而日丹诺夫不得不把一条重要指示记在笔记本上：“激怒。更换积极的工作人员。任命叶戈林。说脏话。（我标注了重点。——尤·日）”[542]。在这之后，亚历山德罗夫终于能够准备好决议文本的那个版本，而这个版本最终也得到了批准。诚然，在 8 月 12 日那天，决议包含的不是 13 条，而是 12 条。其中包括：“4.批准 А.М.叶戈林同志为《星》杂志主编，同时保留他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宣传管理部门副主任的职位<…>6.取消列宁格勒市委今年 6 月 26 日关于《星》杂志编辑委员会的决定，因为该决定在政治上是错误的。宣布对市委第二书记 Я.Ф.卡普斯京同志做出这一决定的行为进行斥责。7.解除列宁格勒市委宣传书记兼宣传鼓动部主任 И.М.希罗科夫同志的职务，将他交由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调配。”

很遗憾，目前对于所发生的事情只能进行推测性的解读。很可能，库兹涅佐夫在斯大林面前为自己进行了辩解。他证明了——而且是强行灌输了这样一种对整个问题的看法，即在列宁格勒的作家圈子里，很久以来，从日丹诺夫还在那里担任第一书记的时候起，就存在着“不良倾向”，而助长这些倾向的首先是左琴科及其“反苏观点”，还有阿赫玛托娃及其“颓废主义”。因此，如果要找这方面的责任人，那就非日丹诺夫莫属。很有可能，斯大林不想让日丹诺夫为所发现的问题负责，不想因为这么一个总的来说微不足道的原因而让他名誉扫地，但在原则上还是同意了库兹涅佐夫的看法。他把纠正当前局面的任务交给了自己这位久经考验的老战友和同志。也只有这样才能解释，为什么在 8 月 14 日，决议中出现了最后一条，即第 13 条——“命令日丹诺夫同志前往列宁格勒，对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的本决议进行解释”[543]。日丹诺夫很清楚，这种“解释”该是什么样的——“说脏话”。8 月 15 日到了。他不得不去完成这项吃力不讨好的任务，扮演一个蒙昧主义者、知识分子迫害者的角色。去做那件很可能是想让库兹涅佐夫去承担的事情。

库兹涅佐夫的反对者们终究没能直接打击到他。这场争斗以他的胜利告终，而不得不品尝苦果的是左琴科和阿赫玛托娃、卡普斯京和希罗科夫，他们成了别人这场大棋局中的小卒。与此同时，正是这样才孕育出了更可怕的事情，而这件事后来也确实发生了。两年半之后，就出现了“列宁格勒案件”。

与以往的做法不同，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意识形态问题的新决议被公布了出来。而创作组织、大众媒体、口头宣传也随即长时间地将这些决议作为主要关注对象。这样一来，那些对国家更为重要、极其紧迫的问题——外交政策问题、经济问题，就被坚持不懈地挤出了大众的意识，而与此同时，这些问题的解决却越来越遥遥无期。

第十九章

1946 年 4 月 25 日至 5 月 15 日在巴黎举行的外长理事会（СМИД）会议，之后在休会一段时间后，又于 6 月 15 日至 7 月 12 日继续举行，此次会议旨在完成对与五个曾是纳粹德国卫星国的国家签订和平条约草案的讨论，尽可能地协调三大强国的立场。然而，会议的进行远不如人们在 12 月莫斯科会议后所预期的那样顺利。一方面，美国和英国与另一方面的苏联之间的矛盾不仅没有得到缓和，反而急剧加剧。矛盾激化到了这种程度，以至于莫洛托夫在评论第一轮会议结果时——无疑是得到了整个核心领导层的认可——公开承认了出现的这种趋势。“很明显，”他在 5 月 27 日的新闻发布会上指出，“美国和英国代表团通常是按照彼此的默契行事。”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莫洛托夫）还借此机会强调了另一点：“苏联为达成总体协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莫洛托夫的某种让步是由莫斯科无论如何都要实现主要目标的愿望所决定的。尽一切可能，通过国际协议来确定国家新的西部边界，即与芬兰、罗马尼亚以及匈牙利的边界。匈牙利是在 1945 年 6 月 29 日的条约将外喀尔巴阡地区移交给苏联后出现的。因为不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即如果谈判失败，美国和英国可能会将领土问题的讨论转移到和平会议上，而在这个会议上，参与的将不是三个国家，而是二十一个国家，并且在那里，所有未解决的问题都将通过投票而不是达成共识来解决。

在巴黎，苏联代表团仅在讨论与意大利的条约草案时拒绝做出妥协。

主要是在三个问题上不让步——意大利殖民地的命运、的里雅斯特（尤利娅地区）以及赔偿问题，原因如下。第一个问题，莫斯科将其视为对显然已无前景的黑海海峡问题的一种可能的补偿。正因为如此，莫洛托夫才提议将北非的的黎波里塔尼亚（现为利比亚的一部分）交由苏联单独托管，或者由苏联和意大利共同托管。他坦诚地向同事们解释说：“这对苏联商船在地中海航线上的航行具有重大意义。”他认为，与意大利交战的三大强国有权共同分担对意大利所有海外领土的托管，而不是将其交给英国或英美两国进行军事占领下的管理。的里雅斯特引发争端则另有原因。南斯拉夫，作为苏联的新盟友，坚决要求将这个位于威尼斯附近、在亚得里亚海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港口移交给它。而赔偿的数额——无论是意大利的赔偿，当然还有德国的赔偿——对于莫斯科来说，连同赔偿期限一样，都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国家经济的恢复和现代化直接取决于此。

莫洛托夫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苏联在国际上失去了大国的地位，他试图唤起伯恩斯和贝文的情感。他带着压抑的痛苦和愤怒提醒他们：“苏联国家承担了拯救人类免受法西斯暴政的主要重担，如今在国际关系中理应占据这样一个符合大小国家平等利益、符合它们对和平与安全追求的地位。”[544]但这一呼吁是徒劳的。过去的一切都已被彻底遗忘。

在巴黎外长理事会的第二轮会议期间，勉强达成了在不损害苏联利益的前提下尽可能的立场协调，但随即又出现了新的复杂情况。1946 年 7 月 29 日开幕的巴黎和平会议开始讨论一个令克里姆林宫头疼的问题：应该以简单多数还是特定多数来做出决策。整整一个月，代表们像在旧金山会议时一样，陷入了激烈且并非毫无意义的辩论中。美国和英国坚持简单多数原则，这能保证他们的方案得以通过。而苏联则坚决要求特定多数，即三分之二多数。苏联之所以争取这样的程序，是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抵御英美集团的压力。凭借苏联、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三张选票，再加上另外三张选票——来自其盟友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以及预计能得到印度和埃塞俄比亚的支持。总共八张选票，并且只有在特定多数的情况下才会发挥作用。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拖延了具体工作的开始。会议变成了一场言辞较量的舞台，在其中起作用的不是意义和事实，而是情

绪。这导致和平条约的准备工作不得不在因这些矛盾而召开的纽约外长理事会会议上（11月至12月上半月）完成。

所发生的这一切丝毫没有促进克里姆林宫一直坚持不懈追求的三大强国之间昔日团结的恢复。它们之间的关系继续恶化，在秋天达到了又一个负面的顶峰。

9月，美国国务卿詹姆斯·伯恩斯在斯图加特的一次美国军事管理当局高级官员和美国占领区三个州的总理会议上发表讲话，对德国问题的解决表达了相当奇怪的观点。他宣称，美国人民希望将权力归还给德国人民。他明确表示，美国不会允许德国成为外国的附庸，或者受到国内或国外的独裁统治。国务卿还谈到了领土问题。他原则上同意萨尔有可能并入法国，但对波兰有权永远将德国东部土地视为自己的领土表示怀疑。他指出，目前这些土地只是波兰的占领区，其最终命运将在签署和平条约时决定。顺便说一下，伯恩斯首次承认了东西方之间存在军事竞争。

从纯粹的法律角度来看，詹姆斯·伯恩斯的立场无可挑剔。确实，只有和平条约才能最终确定德国的新边界。但同样明显的是另一点。在准备这样一个尚未开始起草的条约时，即使是在未来的和平会议上，美国完全有可能重新审视波茨坦会议的各项协议。再次使这些协议成为激烈争论和讨论的对象，并以坚定的多数票来支持自己的立场。如果由于事态的这种转变，波兰突然失去其获得的德国东部土地，那么那个曾让波兰（尽管付出了巨大努力）放弃东部土地（有利于苏联）的原则基础也将崩塌。

莫斯科立即做出了回应。莫洛托夫第一个发声。几天后，他接受了波兰通讯社记者的采访。他明确表示：“柏林会议关于波兰西部边界的历史性决定不容任何人动摇。事实表明，现在要改变这一点根本不可能。这就是苏联政府的观点。”[545]

斯大林则触及了伯恩斯讲话中另一个隐藏的方面。9月17日，他在回答伦敦《星期日泰晤士报》记者亚历山大·韦尔特的问题时，谈到了更严肃、更具全球性的问题。首先，关于东西方的军事对抗以及这种对抗演变成战争的可能性。“我不相信‘新战争’存在真正的危险，”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坚定地说，“现在大谈‘新战争’的主要是一些军政间谍以及他们在文职官员中的少数支持者。他们制造这种喧嚣，至少是为了以下目的：a）用战争的幽灵吓唬他们对手中的一些天真的政治家，从而帮助他们的政府从对手那里榨取更多的让步……必须严格区分现在正在进行的关于‘新战争’的喧嚣和‘新战争’的真正危险，目前并不存在这种真正的危险。”

其次，斯大林也谈到了德国可能成为某个国家的附庸、受其“控制”的问题。“我认为，”他指出，“苏联利用德国来对抗西欧和美国是不可能的。我认为这不可能，不仅是因为苏联与英国和法国签订了反对德国侵略的互助条约，与美国也有三大强国波茨坦会议的各项决定，还因为利用德国来对抗西欧和美国的政策将意味着苏联背离其根本利益。简而言之，苏联在德国问题上的政策归结为使德国非军事化和民主化。”

顺便说一下，斯大林利用这个机会，还试图阐述他对更广泛问题的理解。与其说是实际问题，不如说是理论问题，而且这个问题与其说对西方重要，不如说对苏联人民重要。他再次确认了自己坚信“尽管存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苏联与西方民主国家仍有可能进行友好且持久的合作”，以及“两种制度之间的友好竞争”。更简单地说，他表达了对和平共处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的信念。

他重新评估了核心领导层以前对核武器作用的看法。他又回到了最初在苏联第一份评论（发表在《新时代》杂志上）中表达的乐观态度。“我不认为，”斯大林指出，“原子弹像一些政治人物认为的那样是一种极其强大的力量。原子弹是用来吓唬胆小鬼的，但它们无法决定战争的命运，因为仅靠原子弹是远远不够的。”“当然，”斯大林承认，“对原子弹秘

密的垄断确实构成了威胁，但至少有两种应对方法：a）对原子弹的垄断不可能持续太久；b）使用原子弹将被禁止。”他之所以发表这样的声明，是因为他已经确切知道——苏联科学家正在制造自己的核武器。但由于这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在此期间不应屈服于核讹诈。要证明核讹诈对苏联不起作用。

最后，在同一次采访中，斯大林极为简短地、没有任何解释地展示了他愿意在未来回到1938年时的观点，即认为在资本主义包围的条件下不可能建设共产主义。他相当委婉地同意了韦尔特的观点：“在一个国家建设共产主义是完全可能的，尤其是在像苏联这样的国家。”[546]他使用“可能”这个词绝非偶然。这样一来，他排除了任何确定性、绝对性和必然性。他这样说，是为了给自己在未来保留回到这一预测的权利。根据情况或政治需要来证实或反驳这一预测。

1946年秋天，苏联国内的政治局势也没有改善。尽管战争结束已经一年多了，但在波罗的海地区、乌克兰西部地区，民族主义分裂分子的武装抵抗并未减弱。他们制造恐惧和死亡，给试图保持中立的和平居民带来了绝望。他们不仅以小规模、分散的部队和团体形式活动，还以大规模、协同作战的部队形式出现，比如乌克兰起义军。

严重旱灾以及收获季节西伯利亚的持续降雨所带来的悲剧性后果也在加剧。这导致了一个早已被遗忘的可怕结果——饥荒，这使得实现承诺的取消配给制的想法变得遥不可及。此外，为了自身利益，还不得不履行在4月初相当轻率地做出的向法国供应粮食的义务[547]。由于政治需要，在同意减少赔偿的同时，还得向同样遭受史无前例旱灾的罗马尼亚和匈牙利提供粮食援助。此外，还得确保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的居民能稳定地、在全国范围内最高水平地消费食品，以此来防止民族主义分子可能引发的共和国全体居民的不满情绪爆发。

斯大林应该已经清楚：他无法像最初打算的那样，在康复后独自解决所有不断出现且丝毫未减少的问题，无论他有多么强烈的愿望。但也不能把这样的“遗产”留给自己的继任者。因此，他不得不回到以前的管理形式、权力组织方式。也就是说，回到就具有重大国家意义的关键问题做出决策的旧机制。恢复一年前他自己坚决摒弃的一切，当时他试图用人员更多的政治局（ПБ）来取代核心领导层。那些在政治局中占多数的人太软弱了，他们会毫不犹豫、毫无疑问地支持领袖提出的任何提议。无论是安德烈耶夫、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还是什维尔尼克。甚至日丹诺夫，在与库兹涅佐夫的冲突中陷入了错误的境地，同意扮演一个他内心抵触的、对那些强加给他的决议进行“粗暴解释者”的屈辱角色。他们所有人，即使尝试了，也无法帮助找到最优化的路线，使国家摆脱困境。

所有这些，以及结束核心领导层中对所有人都越来越危险的个人竞争的必要性，让所有人都意识到变革的紧迫性。回到在不久前已经得到检验并证明有效的制度。1946年10月3日，根据斯大林的提议，通过了一项决定，正式记录为政治局第55次会议记录的第94项。决定内容如下：

“1.委托政治局外交政策委员会（六人小组）今后除了处理外交政策问题外，还处理国内建设和国内政策问题。

2.增补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沃兹涅先斯基同志进入六人小组，今后将六人小组称为七人小组。”[548]

就这样，又一次达成了妥协，事实证明，没有这个妥协，就无法决定权力的命运。斯大林承认了“三巨头”成员曾经失去的地位。他们拥有处理国家所有最重要问题的专有权，且不受宪法或党章的约束。作为回报，他得到了自己长期以来未能实现的东西。他将自己的老门生、在国家机构中很可能成为他继任者的沃兹涅先斯基纳入了新的核心领导层。

就这样，这个长期以来一直在苏联掌权的小团体，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尽管远非原创）再次将自己确立为最高权力机构。斯大林、莫洛托夫、贝利亚、米高扬、马林科夫、日丹诺夫、沃兹涅先斯基宣布自己——也只有他们自己，作为政治局成员的一半，凌驾于所有国家和党内机构之上。而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安德烈耶夫、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柯西金；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他们还包括赫鲁晓夫、什维尔尼克、布尔加宁；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书记帕托利切夫和波波夫则被排除在外。他们在形式上构成了权力的第二层级，但实际上不存在任何等级制度。因为从那一刻起，党内真正的、完整记录的政治局全体会议几乎停止了。在接下来的六年里，只召开了两次会议：1947 年 12 月 13 日和 1949 年 7 月 17 日。书记处变成了类似全国干部部门的机构，而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边疆区党委、州党委、区委等地方党委则变成了辅助性的监督和检查机构。

然而，事实很快证明，“七人小组”的出现并没有带来政治权力巅峰局势的稳定。与预期相反，它成为了新一轮无情、对失败者毫不留情的个人竞争的导火索。权力斗争的加剧与斯大林的健康状况直接相关，同时也与新核心领导层成员的运气、错误或失算有关。

“七人小组”中无可争议的领导者——贝利亚、沃兹涅先斯基（他们领导着苏联部长会议）和日丹诺夫（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第二书记），坚持不懈地努力巩固自己的地位。他们力求使自己的主导地位合法化，并将已形成的权力格局尽可能长期地固定下来。正是出于这些目的，他们在 1947 年 1 月 7 日促使政治局做出决定，在当年年底或次年年初召开党的第十九次代表大会[549]。

七周后的 2 月 26 日，当天召开的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的与会者也得知了即将召开的党的会议的消息。在战后一系列无休止的会议中，这次会议是第一次，这些会议持续了近四十年，都致力于农业问题，并试图在不改变实质的情况下实现农业的快速增长。在这次全体会议上，主要报告人是安德烈耶夫（这是他政治生涯中的最后一次），但他什么也没能提出。可以说什么都没有——没有任何半激进甚至伪激进的措施，能够使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摆脱长期的危机。而关于即将召开的代表大会的消息，没有包含在官方的新闻报道中，是日丹诺夫宣布的。他宣布了即将召开的代表大会的议程，包括通过新的党纲和党章。他还说出了负责准备这些重要文件的人员。当然，主要的起草者包括日丹诺夫本人和他的忠实盟友亚历山德罗夫[550]。

这样的事态发展让“七人小组”中的“局外人”，比如莫洛托夫和马林科夫，极为不满。看来，正是他们在全体会议前不久发动了一场宫廷小政变。1947 年 2 月 8 日，他们推动政治局通过了一份极其重要的文件——苏联部长会议和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的联合决议——《关于苏联部长会议的工作组织》。借助这份文件，他们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个国家最高行政权力机构的组成和结构。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团（ＢＣＭＣＣＣＰ）不再仅仅由贝利亚、沃兹涅先斯基和柯西金组成。现在由斯大林亲自领导，莫洛托夫担任第一副主席。除了他们之外，还包括所有的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他们从此领导着各自独立的工作部门，即所谓的行业局。马林科夫负责农业，沃兹涅先斯基负责冶金和化学，萨布罗夫负责机械制造，贝利亚负责能源和发电站，米高扬负责食品工业，卡冈诺维奇负责交通和通信，柯西金负责贸易和轻工业，伏罗希洛夫负责文化和卫生。

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将国家监察部、司法部、物质和劳动力储备部、国家编制委员会以及苏联部长会议的一些主要管理部门直接纳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团（即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直接领导之下。此外，作为额外的职责，“监督”财政部的工作被交给了沃兹涅先斯基，内务部和莫斯科高层建筑建设工作被交给了贝利亚，林业和造纸工业部被交给了柯西金。同样，像特别委员会（原子弹项目）、雷达委员会、火箭技术委员会（火箭项目）、特别委员

会、外汇委员会等关键部门也被置于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直接控制之下。“外交部、对外贸易部、国家安全部的问题，货币流通、外汇问题，以及武装力量部的最重要问题”都集中在“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在当时的情况下，这只不过是对核心领导层“七人小组”的委婉说法。

这样一来，莫洛托夫恢复了他在等级制度中官方的第二职位。马林科夫在地位上与贝利亚和沃兹涅先斯基平起平坐，并且还成功恢复了他的同事萨布罗夫原来的级别。而贝利亚失去了对交通和运输机械制造、国家安全、国家监察的控制权；沃兹涅先斯基失去了对航空和汽车工业、重型机械制造、机床和造船、军事和海军企业建设的控制权。在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团成员中，安德烈耶夫仍然留任，但他没有负责任何一个行业局的工作。他只是在形式上，而且也是最后一次担任国家的高级职务之一[551]。

重大变革并不仅限于此。它们还波及到了权力结构中较低但同样重要的层级。莫洛托夫成功摆脱了所有强加给他的、相当危险的外交部副部长：1946 年 8 月 22 日解除了李维诺夫的职务，1947 年 1 月 7 日解除了伊·米·迈斯基的职务，1 月 24 日解除了弗·格·杰卡诺佐夫的职务。他用年轻的专业人士取代了他们，任命费·特·古谢夫为驻伦敦大使，安·安·葛罗米柯为驻华盛顿大使，亚·亚·马利克为驻东京大使[552]。与此同时，与贝利亚关系过于密切的人被派往苏联境外工作。前不久的国家安全部长弗·尼·梅尔库洛夫被派往罗马尼亚，他的副手鲍·扎·科布洛夫被派往德国，担任苏联企业的负责人，处于对外贸易部下属的苏联国外财产总管理局这个对他们来说全新的体系中[553]。在米高扬的领导下，他所负责的行业的下属人员也进行了更换，同时对该行业进行了重组。马林科夫所负责的三个部——农业、经济作物、畜牧业——被合并为一个农业部。根据同一项决议，任命伊·阿·贝涅迪克托夫为农业部长，尼·阿·斯米尔诺夫为国有农场管理局局长[554]。

很可能正是这个取得了报复性胜利的团体推动了禁止在媒体上哪怕是最轻微地提及即将召开的党代表大会。与此同时，这个团体对取得的成果并不完全满意，继续对高层领导进行调整。2 月 12 日，他们将拉·莫·卡冈诺维奇从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团中除名，派他前往基辅担任乌克兰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而他在苏联部长会议的职责则转交给了贝利亚[555]。3 月 5 日（一个不祥的预兆！），斯大林关于辞去武装力量部长职务的请求得到了批准，这无疑意味着承认他已失去了以往的工作能力。他的职位由尼·阿·布尔加宁接替，布尔加宁同时被任命为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团成员[556]。（有充分的理由可以断言，与此同时，布尔加宁也被纳入了“七人小组”，这样“七人小组”就变成了“八人小组”。）

党的机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第一个证明是 1 月 7 日政治局的一项决议，该决议篇幅不大，看似是局部性的，但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决议承认“有必要大幅减少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在工业、交通企业和建筑工地的党组织工作人员的数量”。并委托“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书记处重新审查应保留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党组织工作人员职位的企业名单，并进行裁减”[557]。通过这种极其简单的方式，国家机构——各部、委员会、总局——预计将尽快摆脱党（确切地说是由阿·阿·库兹涅佐夫领导的中央委员会干部局）无效的监管。不久之后，另一个党的机构——党的监察委员会（КПК）也进行了同样重大的裁减。4 月 21 日，政治局规定：“认为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在各地区、边疆区和共和国（自治共和国——尤·日注）的党的监察委员会授权代表这一制度继续存在已无必要，并认为有必要予以废除”[558]。

然而，这场变动的目标与其说是整个党，不如说是“八人小组”中的一员——日丹诺夫。他患有严重的心脏病，这使他在 1946 年 12 月 1 日至 1947 年 1 月 25 日这两个关键的月份里不得不住在疗养院。按照已形成的、成功的惯例，对日丹诺夫权力的逐步剥夺从清除他

所依靠或可能依靠的所有人开始。1946 年 12 月至 1947 年 2 月，格·费·亚历山德罗夫的四位副手（其中两位最强有力的）被免职：被任命为苏联电影部副部长的康·斯·库扎克和被任命为白俄罗斯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宣传书记的米·季·约夫丘克[559]。

2 月底，同样的命运降临到了党的机构检查部。该部部长、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书记尼·谢·帕托利切夫最初被派往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担任农业书记，六个月后再次被降职，成为罗斯托夫州委书记。他的两位副手之一、未来的国家安全部长谢·德·伊格纳季耶夫被派往明斯克担任农业书记，该部的三位检查员之一尼·伊·古萨罗夫也被派往明斯克，但担任白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560]。

对日丹诺夫所负责的宣传鼓动部以及马林科夫的支持者所掌控的党的机构检查部的整治，是阿·阿·库兹涅佐夫的一次先发制人的打击。库兹涅佐夫的竞争对手绝非莫洛托夫和马林科夫，他首次崭露头角。他相信斯大林的承诺，即让他成为党内权力的继任者，因此觊觎日丹诺夫的职位。他想要占据日丹诺夫作为第二书记、“八人小组”成员的实际地位。

……莫洛托夫重新成为国家二号人物，这除了其他方面，还表明了对外交政策问题的重视。这表明核心领导层明显有意不仅利用经验，还利用维·米·莫洛托夫在战争期间亲自建立的人脉关系，以及他的新副手们最近刚刚建立的人脉关系。利用一切可能的手段，试图以某种方式修复与华盛顿和伦敦破裂的关系。然而，正是在国际舞台上，克里姆林宫面临着最明显的失败。

1947 年 3 月 12 日中午，杜鲁门在美国国会众议院会议厅发表政策演讲，参议员们也出席了会议。他提到了笼罩在希腊和土耳其上空的某种共产主义威胁。事实上，他没有说明在希腊，在英国军队的支持下，君主主义者正在与同时也是共产主义者的共和主义者进行内战。他没有说英国政府几天前证实，由于缺乏资金，最迟将于 4 月 1 日撤出其军队，将希腊听天由命。杜鲁门也没有提及土耳其实际上并没有感受到来自苏联的真正、有效的压力。只是在华盛顿和伦敦的默许支持下，土耳其拒绝重新审视黑海海峡的航行制度。它没有做杜鲁门自己在 1945 年 7 月的波茨坦会议上与斯大林一起公开坚持要求做的事情。

总统回避了所有这些微妙的细节，仅以情感和言辞来表达。实际上，他只是换了一个具体提议，重复了丘吉尔的富尔顿演讲。他呼吁国会批准他所请求的拨款：2.5 亿美元用于向希腊提供军事援助，1.5 亿美元用于向土耳其提供军事援助。这样做应该是为了“自由人民”的利益，从现在起，支持“自由人民”将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国会支持了这一提议，该提议很快被称为“杜鲁门主义”[561]。

来自华盛顿的关于美国总统演讲内容的消息，在克里姆林宫应该如同晴天霹雳一般。但核心领导层的反应实际上相当平静。这并没有立即导致公开的对抗，也没有引发任何激烈的政治或意识形态行动，至少在苏联方面，这并不意味着冷战的开始。这只引发了一场半学术性的丑闻——“ＫＰ 事件”，它没有像 20 世纪 30 年代那样引发大规模的镇压浪潮，但仍然造成了一些受害者。

微生物学家尼·格·克柳耶夫和组织学家格·伊·罗斯金早在 1946 年春天就完成了《恶性肿瘤的生物疗法》手稿。他们在其中表示坚信，他们创造出了一种能够治愈癌症的药物。3 月 13 日，他们在医学科学院主席团会议上就这一发现的成果作了报告。这一切就足以让关于终于找到了这种药物的最离奇的传言在首都流传开来，而全世界成千上万的患者都如此迫切地需要这种药物。这些传言也传到了美国驻莫斯科大使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的耳中。在得到苏联卫生部长格·阿·米季列夫的许可和外交部的同意后，他于 6 月 20 日参观了流行病学、微生物学和传染病研究所，会见了在那里工作的克柳耶夫和罗斯金。他提议

他们在美国出版他们的书，并建议不仅在苏联，而且在美国的医学中心继续进行尚未完成的药物验证实验。

关于所发生事情的信息，立刻传到了日丹诺夫那里，而这些信息极其矛盾。苏联卫生部副部长阿·亚·库兹涅佐夫不仅支持史密斯的想法，还向正在美国执行公务的科学院院士弗·弗·拉里尼发了一份电报，表示同意大使的提议。而外交部（以刚刚被任命为驻伦敦大使的格·尼·扎鲁宾和美国事务司司长谢·康·察拉普金为代表）则坚持拒绝美国的支持。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干部局副局长安德烈耶夫采取了观望的立场。他只是确认了这一事实，并顺便提到了国家安全部副部长奥戈利佐夫的意见，引用了他的话，即“史密斯与克柳耶夫和罗斯金教授的会面是正常组织的”。日丹诺夫感觉到了明显的危险，试图回避做出决定。他把这件事转交给了莫洛托夫，但莫洛托夫非常外交地建议卫生部向斯大林请示。1946 年 11 月 14 日，一封加密电报发往正在高加索度假的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

“斯大林同志。莫洛托夫同志向您询问是否可以将克柳耶夫和罗斯金的手稿《癌症的生物疗法》以及克柳耶夫-罗斯金治疗癌症的药物交给美国人。我们正在印刷这本书以便广泛发行。在美国的科学院院士拉里尼报告说，派往美国的肿瘤医生小组从美国医生和癌症研究机构那里得到了他们所需的广泛信息。我们的专家学者认为可以将其交给美国人以便进一步进行实验研究。卫生部对此表示支持。

请您给予指示。

苏联卫生部副部长库兹涅佐夫。”

收到斯大林的坚决否定答复后，中央委员会干部局副局长帕夫连科和干部局某司司长彼得罗夫，显然是在他们的上级阿·阿·库兹涅佐夫的同意甚至授意下，向日丹诺夫提交了一份关于“苏联卫生部长米季列夫同志对克柳耶夫和罗斯金教授开发的抗癌药物‘ＫＰ’的错误态度”的报告。他们特别指出：“史密斯先生参观实验室只能被视为一名经验丰富的间谍的试探行动，是试图收买苏联科学家，通过贿赂和承诺在他们中间制造分裂。”这份文件最后提出了一个具体建议：“我们认为有必要由书记处做出决定，鉴于米季列夫同志对苏联科学家这一最重要发现的非党性态度以及他未执行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书记处关于全力协助克柳耶夫和罗斯金教授的指示，对苏联卫生部长米季列夫同志提出批评，并警告他如果再次发生类似情况，将解除他的职务。”中央委员会干部局局长阿·阿·库兹涅佐夫没有等待所谓的“组织结论”，就召见了米季列夫，并向他指出“有必要在该问题的研究上提供大力协助，并严格保密，避免有关该药物的信息落入美国人手中”。但对米季列夫的惩罚已经不可避免，而且是必然的。11 月 27 日，帕里将克柳耶夫和罗斯金的手稿交给了美国科学家。

对违规者的惩罚很快就来了。1 月 29 日，度假归来的日丹诺夫召见了同样刚结束休假的米季列夫，并警告他所发生事情的严重后果[562]。2 月 17 日，格·阿·米季列夫被免去所担任的职务，并被派往一家卫生科学研究所担任所长[563]，而弗·弗·拉里尼一回到首都就被逮捕了。

如果不是杜鲁门主义的出现，“ＫＰ 事件”可能不会继续发展。正是杜鲁门主义要求对所有与美国直接或间接相关的事物、与美国的正常关系采取一些尚不明确但足够严厉的措施。很快就找到了应对之策。3 月 28 日，政治局批准了苏联部长会议和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的联合决议《关于苏联各部和中央机关的荣誉法庭》。通过看似“公众舆论”的方式，试图影响当时仅为国家机构的人员的心态。仿佛是在为可能发生的、至少是

意识形态上的对抗做准备。同时，也为将来创造了一个新的、独特的机制，用于整治不受欢迎的人，而无需同时采取镇压措施。

该决议规定在所有机构中普遍设立“荣誉法庭”，人们那些“不应受到刑事处罚”的行为应提交给这些法庭审理。判决将是公开批评或公开谴责。只有在极端情况下，才不排除另一种可能性——将案件移交“侦查机关以便以刑事诉讼程序提交法院”[564]。

对“杜鲁门主义”的第二个、更严重的反应是 1947 年 5 月 30 日在外交部成立了自己的国外情报机构——信息委员会。莫洛托夫亲自担任该委员会主席，基·基·罗季奥诺夫被任命为第一副主席，同时他也是反情报部门的负责人[565]。信息委员会的任务是收集和分析个别西方国家或国家集团对重大政治问题的态度信息，特别是它们对即将召开的联合国大会、安全理事会关键问题的立场。这样就有可能确定政治行动的可能范围，使苏联代表团的立场更加灵活。

与此同时，尽管困难重重，这场绝非“隐蔽”的权力机构斗争不仅没有平息，反而愈演愈烈。4 月 22 日政治局的一项决议开启了新一轮的斗争，该决议决定对格·费·亚历山德罗夫的《西欧哲学史》一书进行第二次讨论（第一次讨论在 1 月举行）。与已经进行的纯粹学术性的讨论（无论是讨论的性质还是结果）不同，这次显然是要对宣传鼓动部部长的著作给予负面评价。从而在政治上诋毁该书的作者，为日后采取“组织措施”奠定基础[566]。

最后，5 月 22 日，米·阿·苏斯洛夫通过“选拔”进入书记处，取代尼·谢·帕托利切夫，并被任命为党的机构检查部部长，同时保留他对外政策司司长的职务，这无疑是即将发生变革的又一确凿证据。最后一点尤为具有象征意义，因为在 1946 年 4 月苏斯洛夫被任命为最后一个职位后，斯大林曾表示对所选候选人的不满。他坚持让日丹诺夫寻找一个“懂外语的人”担任这个职位[567]。然而，不知为何，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的指示没有得到执行。

此后，一切发展得极其简单而迅速。

6 月 25 日，第二次哲学讨论结束，最终认定宣传鼓动部部长亚历山德罗夫的书既错误又有害。然而，这里最值得关注的并非完全可预测的讨论结果，而是讨论的进行方式。作为意识形态书记的日丹诺夫虽然是主要参与者，但只是讨论的一员。组织并主导讨论进程的是另一个人——中央委员会干部局局长阿·阿·库兹涅佐夫，苏斯洛夫与他一起坐在主席团中。

7 月至 8 月，继续对日丹诺夫这位党的第二书记的权力转移进行筹备。这体现在《真理报》史无前例、前所未见且此后未再发生的对宣传鼓动部机关报《文化与生活》的猛烈抨击，以及对宣传鼓动司司长谢·米·科瓦列夫毫无根据的谴责上。仅这一点就表明，日丹诺夫已完全失去了对他所负责领域局势的控制，他要么不愿意，要么无法在没有过多协调的情况下解决下属部门的内部人事问题。

但 9 月 17 日才发生了最关键的事情。格·费·亚历山德罗夫和他的副手彼·尼·费多谢耶夫（后者因隐瞒“富农出身”）被免去宣传鼓动部的领导职务。党的意识形态部门被委托给米·阿·苏斯洛夫领导，他再次成功保留了对他来说可能更重要的职位——对外政策司司长，就像 5 月时一样。德·季·谢皮洛夫被任命为该部门的第一副手[568]，谢皮洛夫从教育背景和职业来说是一名经济学家，但最近一段时间一直担任《真理报》宣传部门的编辑。

就这样，日丹诺夫陷入了一个没有军队的将军的境地，完全失去了对决策准备的影响力，进而也失去了对决策制定的影响力。他仍然是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的

第二书记，但只是名义上的。他只是书记处和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的主席。他作为国家“首席意识形态家”的所有实际权力都落到了苏斯洛夫手中。

重大的、根本性的人事变动还不止于此。出于完全不同的原因，高层军事将领也受到了影响。第一个倒下的是尼·格·库兹涅佐夫，他在战争期间曾担任海军人民委员。1947 年 2 月 19 日，他被免去武装力量部副部长兼海军总司令的职务，这个职位是在两个人民委员部合并后他所担任的。没有任何解释，他被派往列宁格勒担任海军军事院校管理局局长。随后，朱可夫元帅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

1946 年 3 月，他从柏林被调回莫斯科。被任命为武装力量部副部长兼陆军总司令。但仅仅四个月后，他的职位就被大幅降低。原因完全是道德品质方面的。最高军事委员会，即武装力量部的扩大会议，在 6 月 9 日的会议上“认定”：“朱可夫元帅失去了所有的谦逊，被个人野心冲昏了头脑，他认为自己的功绩没有得到充分认可，在与下属的谈话中，他将伟大卫国战争的所有主要军事行动的策划和执行都归功于自己，包括那些他根本没有参与的行动……他这样做是将自己置于政府和最高统帅部的对立面。”或者更简单地说，他试图在胜利的荣耀方面与斯大林竞争。仅仅基于这一点，朱可夫就被调任敖德萨军区司令。敖德萨军区在战略上极其重要，但毕竟只是一个军区。诚然，他仍保留了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的身份。

1947 年 2 月，在中央全会召开的前夕，朱可夫在不知情的情况下陷入了更危险的境地。斯大林在与日丹诺夫的谈话中坚持要把朱可夫从中央委员会中除名。与此同时，还打算把另一个人——马林科夫（!）也一并除名[570]。然而，仅仅因为领导人的一时兴起，没有明显的理由就把格奥尔基·马克西米利安诺维奇（朱可夫）拉下马是不可能的。他仍然是一个极具影响力的政治人物。但是，尽管方式不同且稍晚一些，格奥尔基·康斯坦丁诺维奇（朱可夫）还是被降职了。

1947 年 6 月 21 日，政治局通过了《关于朱可夫和杰列金非法授予演员鲁斯拉诺娃及其他人员苏联勋章和奖章的问题》的决议：

“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查明，朱可夫和杰列金同志，前者作为苏联驻德占领军第一总司令，后者作为该集团军军事委员会成员，根据他们 1945 年 8 月 24 日第 109/H 号命令，授予演员鲁斯拉诺娃一级卫国战争勋章，并根据 1945 年 9 月 10 日第 94/H 号命令，授予 27 名演员不同的勋章和奖章。鲁斯拉诺娃以及其他受勋演员与军队毫无关系。因此，朱可夫和杰列金同志严重违反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 1943 年 5 月 2 日《关于对非法授予苏联勋章和奖章行为的责任》的命令，根据该命令，这种行为应处以 6 个月至 2 年的监禁。

为了掩盖对鲁斯拉诺娃的非法授勋行为，在 8 月 24 日的命令中编造了授予鲁斯拉诺娃勋章的理由，称其‘在为红军装备最新技术装备方面提供了积极的个人帮助’，这显然是一种伪造行为，表明朱可夫和杰列金的道德水准低下，并损害了指挥层的权威。

在部队阅兵期间，在第 2 骑兵军（当时由鲁斯拉诺娃的丈夫、中将瓦·瓦·克里乌科夫指挥。——尤·日注）的部队面前授予鲁斯拉诺娃勋章并将勋章交到她手中的整个场景，是一场可耻的闹剧，这进一步加重了朱可夫和杰列金同志的罪责。

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认为，杰列金同志作为集团军军事委员会成员，对这一事件负有特殊责任，他在这件事中表现出的政治上的无原则性，表明他是一名不合格的党员。

考虑到上述情况，并听取了朱可夫和杰列金同志的个人解释后，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决定：

1.对格·康·朱可夫同志提出批评。

2.将基·费·杰列金同志从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党员转为候补党员。

3.接受尼·阿·布尔加宁同志关于解除基·费·杰列金同志在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并将其从武装力量中开除的提议。

4.向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提出建议，取消对演员鲁斯拉诺娃以及朱可夫和杰列金命令第 94/Н 号中提及的 27 名其他演员的授勋。”[571]

这样一来，现实生活就被调整得符合刚刚出现的斯大林《简短传记》第二版（大幅扩充版）的模式了，这本书正是在 1947 年 2 月开始发售。这本书由格·费·亚历山德罗夫领导的一群作者编写（不过，这也没能使他免于失势），书中坚称一个不可动摇的真理：斯大林是“英明的统帅，苏联军队在战斗中高呼着他的名字冲锋陷阵，他预见了事件的发展，并使这场巨大战役的进程服从于他的意志”。在这本书中，其他将领的名字只被提及了一次——作为“被斯大林挑选、培养和提拔的人”，而且在这样一个绝非按字母顺序排列的名单中，布尔加宁被排在第一位，而朱可夫只排在第五位[572]。

斯大林本人成功地做到了更多——在核心领导层中战胜了他潜在的对手。首先，他在“八人小组”中获得了最基本的、数量上的多数。无论如何，米高扬、日丹诺夫、沃兹涅先斯基、布尔加宁总会支持他，对抗莫洛托夫、贝利亚、马林科夫，甚至不考虑后者中任何人倒向他这一边的可能性。然后，他还确保了日丹诺夫很快会被不可避免地取代，从而使自己免受威胁。1947 年 9 月 17 日，阿·阿·库兹涅佐夫被委托监管苏联国家安全部（МГБ），而在此之前，这是斯大林本人的特权[573]。他将“九人小组”（根据间接数据推测，同一天库兹涅佐夫也被纳入了这个最高权力圈子）、政治局、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团的安危都托付给了库兹涅佐夫。毕竟，苏联国家安全部不仅负责保护领导层的所有成员，还为他们提供一切所需——公寓和别墅、汽车和家具、衣物和食物。

斯大林就这样为任何意外情况做好了准备，为任何对苏联和他个人来说最不利的事态发展做好了准备。如果有必要，他可以采取更强硬的路线，放弃以前的观点和声明。他可以做出任何最意想不到的决定，只根据他对局势的看法和评估来做决定，而无所畏惧。

第二十章

当杜鲁门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称东欧国家被苏联“占领”时，他似乎并非完全与事实不符。无论如何，在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确实掀起了第一轮逮捕浪潮，但这些逮捕行动勉强才能被视为政治镇压。实际上，它们当时具有不同的性质。受影响的是相对较小的群体，人数在 30 到 60 人之间，他们被指控犯有“君主主义”（匈牙利）、“分离主义”（罗马尼亚）、“恐怖主义”（波兰）等罪名。这些情况远不能证明存在暴力的苏联化，或是对莫斯科的完全服从。

斯大林并不急于推动事态发展。他依然坚持和平共处的原则。就在不久前，1946 年初，他接受了埃利奥特·罗斯福为《生活》杂志所做的采访，该采访内容于 1 月 23 日被《真理报》转载，他试图借此将自己的观点传达至白宫。

“问题：您认为像美国这样的民主国家，是否有可能与苏联存在的这种共产主义国家治理形式在这个世界上和平共处，并且双方都不会尝试干涉对方的内政？

回答：是的，当然。这不仅是可能的。这是明智且完全可行的。在战争最紧张的时期，治理形式上的差异并未妨碍我们两国联合起来并战胜敌人。在和平时期，这种关系的维持更是有可能的。

……问题：大元帅，您是否认为，我们两国之间达成广泛的经济协议，就工业产品和原材料进行相互交换，将是迈向世界和平的重要一步？

回答：是的，我认为这将是迈向建立世界和平的重要一步。当然，我对此表示赞同。在许多方面，扩大世界贸易将有助于促进我们两国之间友好关系的发展。

……问题：您是否认为召开新的三巨头会议来讨论当前威胁世界和平的所有国际问题是有益的？

回答：我认为不应该只召开一次会议，而应该召开几次会议。如果能召开几次会议，它们将非常有助于实现有益的目标……

……问题：您认为自罗斯福去世以来，我们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和相互理解有所减弱，原因是什么？

回答：我认为，如果这个问题是关于美国人民和俄罗斯人民之间的关系和相互理解，那么并没有出现任何恶化，相反，关系得到了改善。至于两国政府之间的关系，后来出现了很大的喧嚣声，有人开始叫嚷说，今后关系还会进一步恶化，但我认为，在破坏和平或引发军事冲突方面，这里没有什么可怕的。任何一个大国，即使其政府有这样的意愿，目前也无法派出一支庞大的军队去与另一个大国作战，因为目前没有人能够在没有本国人民支持的情况下进行战争，而人民并不想打仗。人民已经厌倦了战争。此外，也没有任何明确的目标可以为一场新的战争辩护。没有人知道自己应该为了什么而战，因此，我认为美国政府的一些代表所说的两国关系恶化并没有什么可怕的。基于这些考虑，我认为新的战争威胁是不现实的。”

即使在杜鲁门在国会发表演讲之后，斯大林也没有放弃与华盛顿和伦敦达成相互理解的希望，并借此获得带领苏联走和平道路的机会。1947 年 4 月 9 日，他在与美国共和党领导人之一哈罗德·史塔生交谈时，再次声明坚持和平共处的原则。“苏联的制度被称为极权主义或独裁制度，而苏联人则称美国的制度为垄断资本主义。如果双方开始相互指责对方为垄

断者或极权主义者，那么就无法实现合作。必须从存在两种被人民认可的制度这一历史事实出发。只有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实现合作。”[574]

杜鲁门政府的第二项非常重要的外交行动，极大地改变了苏联核心领导层对美国的态度。6 月 5 日，新上任的国务卿（他于当年 1 月才担任这一职务）乔治·C·马歇尔在哈佛大学（波士顿）发表了一篇详尽的演讲，提出了向那些需要的欧洲国家提供经济援助的计划。

英国、法国、意大利以及其他一些国家的政府立即支持了这一想法。它们决定于 7 月 12 日至 16 日在巴黎举行欧洲经济会议，并邀请苏联以及东欧国家参加。这一如此出乎意料的前景，使得苏联核心领导层在经过长时间的犹豫之后，最终确定了未来的路线。确定在可预见的近期内，苏联的政策应该是致力于广泛的国际合作，还是采取孤立主义呢？

起初，克里姆林宫倾向于第一种选择。在 6 月 27 日为制定对马歇尔计划的共同立场而召开的法国、英国和苏联外交部长巴黎会议上，苏联代表团团长莫洛托夫明确表示了积极的态度。6 月 30 日，他甚至向同僚们提出了这样的建议：“法国、英国和苏联外交部长会议认识到加速恢复和进一步发展因战争而遭到破坏的欧洲国家国民经济这一任务的重要性，并认为，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先生 6 月 5 日声明中所提及的美国提供经济援助，将有助于完成这一任务……认为有必要……成立一个协助委员会”，以接收欧洲国家的申请，并在此基础上编制一份综合计划[575]。

但最终，在最后一刻，选择了第二种、消极的解决方案。在克里姆林宫，显然无法接受作为一个大国似乎不可避免地会失去的威望，也无法接受在接受马歇尔计划的情况下，苏联将不可避免地扮演一个次要的、受保护和依赖的伙伴角色。当然，还有另一个原因导致了这样的选择。苏联核心领导层无疑意识到，在恢复国民经济的同时，投入大量资金研发新型武器，已经不能像不久前，即战争爆发前那样，仅仅依靠自身的力量。它不得不指望美国的帮助，或者最大限度地利用新获得的盟友的经济潜力、他们各自的实力和自然资源。但与此同时，它也明白，根据马歇尔计划提供的援助最终将不可避免地迫使东欧国家放弃完全以苏联为导向，转而支持欧洲一体化[576]。

命运的骰子很可能在 7 月 1 日就已经掷出，因为就在第二天，显然是在莫斯科的“命令式暗示”下，莫洛托夫宣布苏联代表团无法继续参加巴黎会议。同时，他指责英国和法国试图将欧洲“分裂成两个国家集团”，其后果将是“它们之间出现新的困难”。“在这种情况下，”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强调说，“美国的贷款将不会用于欧洲经济的恢复，而是用于一些强国利用一些欧洲国家来对抗其他欧洲国家，这些强国认为这样做对它们有利，并且试图实现世界霸权。”莫洛托夫所说的强国很可能指的是美国，不过他并没有直接点明。

克里姆林宫的下一步行动是展示自己的实力，展示如果有必要，能够迅速建立一个与西方相对抗的东方阵营的能力。一个相当明显的证明就是，毫无疑问是协调一致的行动——几乎在同一时间，即 7 月 9 日和 10 日，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芬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明确拒绝参加巴黎经济会议。就这样，苏联领导层在走向世界分裂、对抗和冷战的道路上迈出了回应性的一步。但是，由于不具备在最明显、最关键的层面——在人民的生活水平、日常生活和劳动的技术装备方面与西方竞争的实际能力，却又注定要参与竞争，它几乎立刻就不得不采取唯一可行的手段——“意识形态斗争”。开始无节制地、常常是口头上地谴责西方的生活方式、西方的政策，同时也同样无节制地赞美一切“社会主义的”、“苏联的”事物。

执行这样的任务与其说是落在了实际上仅仅为此而存在的宣传鼓动部身上，不如说是落在了各种“公众”、看似“独立”的机构身上。根据 7 月 31 日中央委员会的决定，《文学报》从一份纯粹的文学报纸转变为“社会政治和文学报纸”。它在形式上仍然是苏联作家协会的机关报，尽管其任务得到了大幅扩展。其任务包括“揭露当代资产阶级文化的反动本质”，持续开展“反对一切崇拜西方的表现形式的斗争”，“阐述苏联民主的问题，并展示其相对于反人民的资产阶级民主的优越性”。实际上，《文学报》的主要目标应该是：“动员全世界的舆论（没错！——尤·日注）反对煽动战争，反对资产阶级的种族优越和统治理论，反对帝国主义的所有意识形态代理人。揭露资产阶级的谎言和对苏联人民、其社会主义国家及其文化的诽谤……揭露伪科学理论，并与对列宁—斯大林学说的一切歪曲作斗争”。

为了增强这份报纸对读者（主要是知识分子）的影响力，其发行量增加了十倍——达到 50 万份，发行周期也发生了变化——从每周一期变为每周两期，并且允许编辑部在包括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中国、日本在内的 11 个国家拥有自己的驻外记者[578]。

在改造《文学报》的过程中，苏联核心领导层试图创建一份明显带有非官方色彩的机关报，它可以表达一种看似与党和政府的意见不完全一致或不相符的观点。而斯大林则试图将他关于一份既能警醒“自己人”又能警醒“外人”的报纸的梦想变为现实。根据作家兼剧作家康斯坦丁·西蒙诺夫的证词，在 8 月 27 日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坚持建议该报编辑部“在某些问题上要更加尖锐、更加‘左’倾……在问题的尖锐程度上与官方表达的观点有所不同。很有可能，我们有时会因此批评《文学报》，但它不应该害怕这一点，尽管会受到批评，它也应该继续做好自己的工作”[579]。然而，不久之后，作家兼政论家伊利亚·爱伦堡相当坦率地表达了这份报纸的目标，这显然不仅仅是他个人的立场。他在苏联作家协会的一次会议上说，这份报纸应该“培养对我们当今敌人的仇恨”。“主要目标应该是什么呢？显然，是美国和美国人试图强加给世界的美国生活方式。”[580]

经过彻底改版的《文学报》第一期在中央委员会规定的日期，即 9 月 20 日出版。其中包含了作家鲍里斯·戈尔巴托夫的一篇史无前例、极具攻击性的小册子《哈里·杜鲁门》，这立刻引发了美苏之间激烈的外交照会交锋。这期报纸上还有一封公开信《你们与谁为伍，美国的文化大师们？》，由万达·瓦西列娃、弗谢沃洛德·维什涅夫斯基、鲍里斯·戈尔巴托夫、瓦伦丁·卡塔耶夫、亚历山大·科尔涅楚克、列昂尼德·列昂诺夫、尼古拉·波戈金、康斯坦丁·西蒙诺夫、亚历山大·特瓦尔多夫斯基、亚历山大·法捷耶夫、康斯坦丁·费定、米哈伊尔·肖洛霍夫联名签署。信中特别指出：“我们请你们思考一下，在与法西斯的战争结束后，正是在你们国家，出现了一些人，他们虽然以其他形式掩盖自己的行为，但实际上宣扬并越来越多地在实践中推行那些我们各国人民所击败的法西斯所宣扬和推行的同样不人道的思想。”

在下一期，即 9 月 24 日的报纸上，反美运动进一步升级，变得完全明显。这体现在弗·维什涅夫斯基的文章《美国的法西斯军团》、德·扎斯拉夫斯基的《世界的普通人向维辛斯基鼓掌》、瓦·瓦西列娃的《欧内斯特·贝文或不是灰姑娘的童话》、尼·波戈金的《华尔街的夏洛克（关于乔治·马歇尔）》、伊·爱伦堡的《作家笔记》（“我们并不孤单，”他写道，“在这场白人至上主义者向我们宣战的精神战争中。”）中。此后，该报开始系统地反对崇拜西方，将白俄罗斯科学院院长、遗传学家阿·拉·日勃拉克作为第一个牺牲品，指责他是乌克兰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文学报》主编弗·弗·叶尔米洛夫在感受到完全不受惩罚后，甚至敢于攻击苏联作家协会的领导层——攻击阿·法捷耶夫、康·西蒙诺夫、亚·特瓦尔多夫斯基。随后，他公开支持了李森科的“农业生物学”……

苏联核心领导层不想自断后路，试图保留退路——实现和解，恢复与美国以往的友好关系，因此将反美运动的开展也委托给了另一个形式上的社会组织。根据 1947 年 1 月 2 日中央政治局的决定，前隶属于高等教育部的全苏演讲局改组为全苏政治和科学知识普及协会[581]。一份呼吁创建该协会的公开信——“致苏联所有科学、文学和艺术工作者，致苏联的科学、社会及其他组织和机构”于 5 月 1 日由中央媒体发表，5 月 13 日，该协会的某个组织委员会宣告成立。其成员包括苏联科学院院长谢·伊·瓦维洛夫、乌克兰科学院院长阿·瓦·帕拉季纳、哈萨克科学院院长克·伊·萨特帕耶夫、格鲁吉亚科学院院长尼·伊·穆希利什维利、苏联农业科学院院长季·德·李森科；院士帕·格·布鲁耶维奇、叶·斯·瓦尔加、叶·瓦·塔尔列、鲍·德·格雷科夫、伊·伊·阿尔托博列夫斯基、阿·伊·奥帕林、伊·伊·明茨、伊·斯·加尔金；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阿·阿·沃兹涅先斯基、苏联作家协会中央委员会书记尼·瓦·波波夫、苏联高等教育部部长谢·费·卡夫塔诺夫、全斯拉夫委员会主席米·罗·加拉季奥诺夫中将等[582]。从 1947 年秋天开始，在他们的不懈监督下，新协会的演讲者们开始按照已审定并必须以小册子形式出版的文本开展工作。他们解释与昔日的战斗盟友美国和英国决裂的原因——解释它们是如何以及为什么成为了苏联人民的敌人。他们试图说服民众，尤其是几乎普遍缺乏收音机和报纸的农村民众，让他们相信只有苏联、只有苏联国家和布尔什维克领导层的立场才是正确的。

最后，1947 年秋天，克里姆林宫在创建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通常被称为“情报局”）时，也追求着几乎相同的目标。

尽管在 7 月 4 日至 6 日，苏联核心领导层已经就马歇尔计划表明了自己坚定的立场，但仍建议八个东欧国家派遣代表团参加巴黎经济会议，不过不一定要接受所提供的援助计划。但在 7 月 7 日夜间，向这些国家的首都发出了一封电报，要求它们拒绝前往法国首都参会[583]。

苏联与西方关系的突然 180 度大转弯，从逻辑上引发了对七个国家（决定不将芬兰纳入即将采取的行动范围内）共产党路线的重新审视。首先，对 1944 年至 1947 年上半年期间莫斯科所欢迎和支持的“通向社会主义的民族道路”这一概念进行了重大修正。这一概念并非基于革命，而是基于通过议会制、广泛的民主联盟实现向新制度的和平过渡，其本质上重复了人民阵线的理念。与此同时，对国内政策和策略进行这样的重新审视也是由东欧国家共产党自身的利益所决定的。1947 年 5 月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在选举中失利，失去了部长职位，以及本国小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影响力的增强，这些都必然使他们深感担忧，甚至对未来的处境感到恐惧。

最后，巴黎经济会议在没有提出任何关于共同摆脱危机状况（不仅是东欧的工业和农业处于危机之中）的具体建议的情况下，引发了莫斯科的担忧并改变了其看法。

召开一些共产党会议的想法最初是由波兰提出的，但在 8 月 15 日由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外政部）准备的一份报告中得到了详细阐述，该部由苏斯洛夫领导。在该报告的主要观点首先得到日丹诺夫的认可，随后又得到斯大林的认可后，外政部又出台了另一份文件——《关于联共（布）的国际联系》。在这份文件中，明确表达了必须立即创建一个国际共产主义组织的想法[584]。

在进行了所有必要的细化之后，1947 年 9 月 22 日，在波兰的一个小度假城市什克拉尔斯卡波伦巴（位于弗罗茨瓦夫以西约 100 公里处，靠近苏联军队北方集团军群总部），九个国家（保加利亚、匈牙利、意大利、波兰、罗马尼亚、苏联、法国、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的共产党会议召开。实际上，这次会议主要是分析意大利和法国共产党所犯的错误，评估东欧国家的局势——列举那些远非无可争议的成就和困难，此外，马林科夫作了关于联共

（布）活动的报告，日丹诺夫作了关于国际形势的报告，这些报告成为了会议的主要内容和纲领性文件。

对日丹诺夫的报告对会议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正是在这份报告中，在几乎中断了十多年之后，“两个阵营”（“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的概念得以复兴，并重新成为不容置疑的理论。此时，除了苏联之外，社会主义阵营还包括东欧国家（芬兰除外），这些国家被称为“爱好和平的”、“民主的”、“新民主国家”。日丹诺夫非常关注意大利和法国共产党在选举中的失败，他将其解释为帝国主义“新攻势”的结果，是美国“奴役欧洲”的企图。但最主要、最关键的内容包含在报告最后一部分（第四部分）未公开的内容中，该部分专门论述“共产党在团结所有民主、反法西斯、爱好和平力量以反对新的战争和侵略计划方面的领导作用”。其主要论点重复了一个相当古老的观点，即 20 世纪 20 年代至 30 年代上半叶共产国际广泛使用的观点：

“由于苏联站在反对帝国主义新扩张企图的最前列，兄弟共产党应该认识到，在加强自己国家的政治地位的同时，它们也同样关心加强苏联的力量，因为苏联是民主和社会主义的主要支柱。兄弟共产党应该诚实地、公开地推行支持苏联的政策作为争取持久和平、争取民主斗争中的主导力量。必须大力强调，兄弟共产党为加强苏联而付出的努力，符合其本国的根本利益。一些兄弟共产党的活动家不断强调自己独立于莫斯科的做法是不正确的。问题不在于独立，因为莫斯科从未将任何人置于从属地位，也不希望这样做。刻意强调这种“独立于莫斯科”、“脱离莫斯科”，本质上意味着迎合、顺应、讨好那些将莫斯科视为敌人的人。共产党不应害怕大声宣称，他们支持莫斯科的爱好和平和民主的政策，不应害怕宣称，苏联的政策符合其他爱好和平的人民的利益。”[585]

但是，从这一点似乎不可避免地得出的结论——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组织上完全整合，类似于共产国际——却并未出现。此外，甚至在会议进行期间，在核心领导层中，“温和”派和“半强硬”派之间的斗争仍在继续。9 月 22 日，马林科夫在其开幕报告中仅谈到“加强共产党之间的联系”、“在它们之间建立持续的联系，以实现相互理解和协调行动”。不久之后，9 月 25 日，莫洛托夫从莫斯科坚持要求成立的情报局“不具备协调职能”。而斯大林则通过电报向日丹诺夫传达了自己的特殊意见——新组织不应局限于信息职能。最终，在一些共产党代表的影响下，达成了妥协。与会者一致同意，“将在情报局身上赋予组织经验交流的任务，并且在必要时，在相互同意的基础上协调各共产党的活动”[586]。

这一决定还得到了进一步的证实，即不久之后，在 10 月，莫斯科坚决拒绝了成立类似的地区性共产党组织的尝试，如东北欧、近东和亚洲地区的组织[587]。

尽管如此，什克拉尔斯卡波伦巴会议的一些与会者还是设法取得了对自己非常有利，尽管相当独特的成果。受到日丹诺夫报告中呼吁采取激进行动、无需丝毫顾及西方意见或反应的鼓舞，他们强行将最危险的对手——那些在民众中拥有广泛支持、与共产党一起加入民族阵线的政党——逐出了政治舞台。在此之后，他们还改变了自己国家的国家体制，这当然只对他们自己有利。也就是说，他们进行了一场准革命。

在保加利亚，早在 6 月，一群以其领导人尼古拉·佩特科夫为首的保加利亚农民人民联盟的领导活动家就被逮捕。对他们的审判成为了首先解散该党，随后进行议会特别选举的借口。这些选举使共产党人获得了约 60%的选票，而整个祖国阵线则获得了 78.3%的选票。凭借在该国立法机构中获得的绝对多数，保加利亚共产党于 1947 年 12 月 4 日得以批准一部对未来变革有利且方便的新宪法。

在匈牙利，同样在夏季，即 5 月 30 日，正在瑞士度假的总理费伦茨·纳吉（代表小农党）担心可能被捕，宣布辞职并表示不再回国。接替他担任内阁首脑的拉约什·迪尼什同样根据《独立民族阵线协议》，是小农党的成员。但是，共产党在新政府中设法获得了最重要、最关键的职位：马蒂亚什·拉科西担任副总理，拉斯洛·拉伊克担任内政部长，伊什特万·里斯担任司法部长。然而，即使在这种极为有利的情况下，匈牙利共产党在 8 月 31 日举行的议会选举中仅获得了 21.8%的选票，而小农党获得了 15.2%，社会民主党获得了 14.6%。直到 1948 年 6 月，由于匈牙利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合并为匈牙利劳动人民党，才改变了这种局面，该党立即在所有其他政治团体（包括民族阵线内的团体和反对派团体）中占据了显著优势。

在罗马尼亚，政治镇压也成为了变革的起点。7 月 16 日，布加勒斯特宣布揭露了“反民主阴谋”，据称是由国王党及其领导人、政府成员尤利乌·马纽组织的。这使得在两周后，甚至在审判和判决之前，就禁止了民族国王党，11 月又一并禁止了民族自由党。通过这种方式铲除了对手后，共产党于 1947 年 12 月 30 日坚持要求国王米哈伊一世退位，废除宪法并解散议会。取而代之的是，由它任命的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主席团开始运作，成员包括无党派人士格奥尔基·帕尔洪、米哈伊·萨多维亚努、斯特凡·沃伊捷克、格奥尔基·斯泰雷、尼古拉·尼古莱，以及实际上的一党制共产党政府，由彼得鲁·格罗查领导。

不久之后，捷克斯洛伐克也进行了类似的行动，但原因完全不同。1948 年 2 月 20 日，十二名部长以不同意总理、共产党人克莱门特·哥特瓦尔德所推行的政策为由，提交了辞呈。根据宪法，在这种情况下，整个内阁都应该辞职。然而，五天后，留任的政府成员——共产党人只是用他们的支持者填补了出现的空缺职位。5 月 9 日，他们组织通过了新宪法，6 月，哥特瓦尔德取代爱德华·贝奈斯担任总统这一高级职位。

由于拒绝了马歇尔计划，所有东欧国家都不得不开始通过苏联的直接援助来解决经济问题。与苏联签订了双边条约：1947 年 12 月 11 日，捷克斯洛伐克签订了贸易条约；1948 年 2 月 4 日，罗马尼亚签订了友好、合作与互助条约，2 月 18 日，匈牙利签订了该条约，3 月 18 日，保加利亚签订了该条约，4 月 6 日，芬兰签订了该条约。波兰和南斯拉夫则早在 1945 年就签订了类似的、几乎相同的条约。

……苏联核心领导层也不得不彻底改变其整个外交政策。在东欧稳固立足后，放弃了对与苏联边界相邻的其他地区的旧计划。停止要求土耳其重新审视黑海海峡的航行制度。卷入希腊内战，明知这毫无结果。不仅在联合国公开为共产党游击队辩护，还开始通过南斯拉夫非法向 1947 年 12 月 24 日成立的自由希腊人民民主临时政府的军队提供武器。

苏联核心领导层还不得不接受其在伊朗的所有行动的失败。当 1946 年 12 月 10 日伊朗政府军队开始对南阿塞拜疆和北库尔德斯坦的自治地区发动进攻时，它无所作为，1947 年春天默默地接受了这些由莫斯科组织的运动的领导人被处决的事实，只是特别中立地通报了以谢赫·穆斯塔法·巴尔扎尼为首的库尔德自治力量残余部队进入苏联领土的情况。对于 1947 年夏天美国向德黑兰提供 2500 万美元贷款用于军队重新装备，以及 10 月 22 日伊朗议会拒绝批准一年半前与苏联签订的关于勘探和开采石油的条约，它几乎没有做出任何反应。

然而，苏联的国家利益要求立即采取应对措施。任何措施都行。这迫使它不惜使用任何手段来实现一个目标——首先确保国家在最危险的南部侧翼的安全，保护外高加索地区。现在的目标不再是将土耳其和伊朗转变为盟友，或者至少是友好国家，而是要使它们保持中立，摆脱美国和英国的直接影响。因此，克里姆林宫决定转移华盛顿和伦敦的注意力，让它们深陷某个地区冲突之中，而苏联很难被怀疑参与其中。为此，中东地区是最合适的选择——它是世界经济中最敏感的地区之一。近四分之一世纪以来，这里一直是争夺对伊拉克、波斯湾南岸、沙特阿拉伯的石油产区控制权的激烈竞争的场所。苏联核心领导层不无道理地认

为，美国和英国在该地区的利益冲突应该会比它们的“大西洋”团结更强大。此外，正是在中东地区，早就酝酿着一场急需的冲突——在英国托管的巴勒斯坦地区。

在圣经之地以色列建立犹太家园的问题，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以来就被搁置到了次要位置，但在德国战败后，这个问题再次变得紧迫起来。毕竟，数十万在美英占领区的流离失所者营地中的犹太人将自己的命运与回到“历史家园”联系在一起。与此同时，英国由于不得不首先考虑其阿拉伯盟友——尤其是伊拉克和沙特阿拉伯的意见，限制了犹太人进入巴勒斯坦。它为犹太人设定了严格的配额——每年不超过 1.8 万人。与此同时，美国的犹太组织不断要求杜鲁门对英国首相艾德礼施加压力，要求立即允许 10 万名犹太人进入应许之地。

杜鲁门后来在回忆录中承认，他屈服于压力。在与犹太复国主义组织领导人会面时受到了直接压力，通过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受到了间接压力。1945 年 8 月 31 日，他写信给艾德礼，坚持要求立即允许 10 万名流离失所的犹太人进入巴勒斯坦[588]。在这个已经相当棘手的问题上，又叠加了另一个问题——关于巴勒斯坦未来政治走向的争议。关于在那里是否应该建立一个独立的犹太国家存在分歧。为就这个问题制定共同立场而两次成立的英美委员会始终未能达成共识。英国不想与阿拉伯国家发生冲突，坚持接受由温斯顿·丘吉尔内阁的内政和国家安全大臣赫伯特·莫里森提出的“省级自治”计划：在巴勒斯坦建立三个自治地区——阿拉伯地区、犹太地区和由中央政府直接控制的耶路撒冷地区。

在 1946 年 9 月至 10 月以及 1947 年 1 月至 2 月于伦敦举行的第二届巴勒斯坦问题圆桌会议上，英国代表团也采取了类似的立场。诚然，现在除了莫里森的计划外，外交大臣贝文的计划也被列为可选项。贝文的计划提议“分州治理”——将巴勒斯坦进一步分割为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小型聚居区。不出所料，巴勒斯坦阿拉伯居民的代表和犹太事务局都反对这两个计划。后者只认可一个解决方案：英国政府立即宣布建立一个独立的犹太国家。而阿拉伯人则同样坚决地反对建立哪怕是自治或分州形式的犹太国家，也反对犹太人进一步进入巴勒斯坦。

由于无法达成妥协，英国决定完全摆脱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使它同时受到来自美国（2 月杜鲁门再次要求立即允许 10 万名犹太人进入巴勒斯坦）和阿拉伯国家的攻击。1947 年 4 月 2 日，英国常驻联合国及安全理事会代表亚历山大·卡多根向联合国副秘书长转达了英国政府的请求，要求将巴勒斯坦问题列入联合国大会下届会议的议程。

与此同时，在莫斯科，联共（布）中央机关正在决定犹太反法西斯委员会的命运。该委员会于 1941 年秋成立，其唯一任务是作为众多外交宣传工具之一。与苏联新闻局、苏联妇女反法西斯委员会、苏联青年反法西斯委员会、苏联科学家反法西斯委员会一样，犹太反法西斯委员会应该在为外国媒体准备的材料中“向国外的犹太群众展示如何与法西斯作斗争”，“围绕苏联人民史无前例的斗争动员公众同情”[589]。

1946 年 4 月，米哈伊尔·阿列克谢耶维奇·苏斯洛夫开始领导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他像通常接手一个全新且庞大的机构的人一样，开始了解该部门所有分支机构的活动，包括那些同时隶属于外交部和该部门的反法西斯委员会。他发现，其中两个委员会，即妇女和青年反法西斯委员会，迅速适应了变化的形势。它们认为最初的任务已经完成，并为自己找到了其他任务。1945 年底，它们成为了两个新的国际组织的核心：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和世界民主青年联合会，并在外交部和对外政策部的指导下，积极将其工作引向对苏联有利的方向。而另外两个委员会，即科学家和犹太反法西斯委员会，则继续固执地坚持早已失去现实意义的旧职能。就是那些苏联新闻局执行得更成功、更专业的职能。

苏斯洛夫得到了这样一个总体客观的评价，且其中没有任何反犹主义的成分，他完全同意该部门的意见：“解散犹太反法西斯委员会，将宣传职能移交给苏联新闻局。关闭作为犹

太反法西斯委员会机关报的《团结报》，因为它未能实现其宗旨。将是否有必要为苏联的犹太居民创办一份犹太报纸的问题（苏联。——尤·日注）提交给宣传管理部门的出版部门审议。”苏斯洛夫认为这个问题很简单，于是在 1946 年 9 月 23 日向日丹诺夫提出请求，希望将对外政策部关于解散犹太反法西斯委员会的提议提交给书记处审议[590]。但遭到了坚决拒绝后，他决定无论如何都要达到自己的目的，于是采用了他熟悉的“机关手段”。

很难想象，犹太反法西斯委员会的命运在几乎同一时间引起另外两个部门的关注完全是偶然的。更重要的是，这两个部门得出了与苏斯洛夫相同的结论。具体来说，有两份报告的内容就是如此。第一份报告是《关于苏联犹太文学中的民族主义和宗教神秘主义倾向》，10 月 7 日由宣传管理部门出版部门负责人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舍尔巴科夫提交给他的上级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库兹涅佐夫。报告中严厉批评了犹太反法西斯委员会成员佩列茨·马尔基什、伊利亚·费弗尔、大卫·别尔格尔松以及其他用意第绪语写作的作家和诗人的诗歌和散文。《团结报》（“Единение”）因发表这些作品也受到了负面评价。在结论部分，不知为何突然谈到了整个犹太反法西斯委员会，称其“在向国外发送苏联作家作品时表现出不加区分的态度”，并得出结论：该部门“认为有必要在书记处讨论……这个问题”[591]。

五天后，即 10 月 12 日，第二份报告《关于犹太反法西斯委员会一些工作人员的民族主义表现》问世。这份报告由国家安全部部长维克托·谢苗诺维奇·阿巴库莫夫亲自签署，它重复了前一份文件的意思，并提出了同样的建议——在书记处审议犹太反法西斯委员会的命运并解散它[592]。

得到了如此有力的支持后，苏斯洛夫再次施加压力。1946 年 11 月 19 日，他向中央政治局所有成员发送了一份长达 17 页的打字报告，再次提及犹太反法西斯委员会。在报告中，他毫无争议地指出，犹太反法西斯委员会的活动“越来越具有犹太复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特征，因此在意识形态上是有害且不可容忍的”。他用实例证明了这一评价，并提出了唯一可行的措施：“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认为，犹太反法西斯委员会在苏联继续存在是不合适且在政治上有害的，并将其解散的提议提交给您审议”[593]。

在如此有分量的论据的压力下，同时也清楚地认识到国家安全部部长意见的重要性，日丹诺夫改变了他最初将犹太反法西斯委员会的命运推迟到不确定时间再做决定的决定。然而，他不想失去主动权，于是将决议草案的准备工作委托给了宣传鼓动部部长格奥尔基·费奥多罗维奇·亚历山德罗夫。他希望这个人能够按照自己（日丹诺夫）的意愿，而不是阿巴库莫夫、库兹涅佐夫或苏斯洛夫的意愿来起草必要的文件。

亚历山德罗夫很快完成了任务。1947 年 1 月 8 日，他向作为政治局国际问题负责人的莫洛托夫以及负责人事的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库兹涅佐夫发送了两份文件。一份是供小范围传阅的联共（布）中央决议草案：“1.鉴于苏联科学家反法西斯委员会和犹太反法西斯委员会所面临的任务已经完成，接受宣传鼓动部和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关于停止这些委员会活动的提议。2.提交政治局批准。”

亚历山德罗夫为这一决定提供了如下理由：“在伟大卫国战争期间，犹太反法西斯委员会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有助于动员国外犹太民众参与反对德国法西斯的斗争。战争结束后，该委员会的活动越来越具有民族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的特征，客观上助长了国外犹太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运动的加强，并在苏联部分犹太民众中煽动了民族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情绪。”但与之前报告的作者不同，亚历山德罗夫没有让犹太反法西斯委员会的领导层为目前的状况负责，而是给了他们体面退出的机会：“宣传鼓动部和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与犹太反法西斯委员会主席米霍埃尔斯同志以及该委员会负责秘书费弗尔同志就战后委员会工

作中出现的错误做法进行了交谈。在这些交谈中，米霍埃尔斯同志和费弗尔同志承认委员会的任务已经完成。”

基于上述约定，为了可能的公开使用，亚历山德罗夫还提出了另一份文件草案，即《关于犹太反法西斯委员会自行解散的决议》。“战后，当苏联各民族与国外各民族，包括犹太民众之间的联系通过工会、妇女、青年、文化交流协会等社会组织得到加强时，苏联的犹太反法西斯委员会认为其任务已经完成，并决定停止其活动。”[594]

就在这时，当犹太反法西斯委员会的命运似乎已经最终且不可逆转地确定下来，而且是以强调其功绩并避免对民族主义、犹太复国主义的指责的方式确定下来时，解散该委员会的问题却始终没有提交到书记处或政治局。亚历山德罗夫的报告很可能在莫洛托夫收到关于土约（土耳其-外约旦）条约签署的信息时送到了他手中，而且很可能促使他寻找能够转移华盛顿和伦敦对土耳其和伊朗的注意力的事情，同时让苏联能够以某种方式进入该地区，哪怕是秘密进入。以便在潜在敌人的后方占据稳固的阵地。

也可以有另一种推测。莫洛托夫想起了苏斯洛夫的报告。他重新审视了这份报告，并在其中找到了他一直在寻找的东西。报告中提到了一个他可以利用的冲突，以及一个渗透的渠道。毕竟，正如对外政策部负责人尽职地报告的那样，犹太反法西斯委员会为了实现完全相反的目标，与世界犹太代表大会、美国犹太代表大会、“联合分配委员会（“Joint”）等有影响力的组织，以及许多其他组织有着长期而稳固的联系。其中包括与在巴勒斯坦活动的组织的联系，而这可能是决定性的因素。

有直接证据表明莫洛托夫对犹太反法西斯委员会事务的关注。从 1947 年开始，该委员会的两位监管人之一发生了变动。日丹诺夫保留了对委员会的监管，但仅通过对外政策部这条线，也就是说，只对其完全公开的、宣传性质的活动进行监管。但库兹涅佐夫被完全禁止对犹太反法西斯委员会进行监管。取而代之的是莫洛托夫。所有与该委员会相关的文件都毫无疑问且明确地证实了这一点。这些文件要么包含诸如“根据同志日丹诺夫·A.A.和同志莫洛托夫·V.M.的指示”这样的表述，要么带有日丹诺夫含义丰富的批示——“同意。告知同志莫洛托夫”[595]。

然而，从形式上来说犹太反法西斯委员会归其管辖的苏斯洛夫，仍然对该委员会的活动感到担忧——为国外（主要是美国和巴勒斯坦的犹太报纸）准备并发送的文章数量和内容。因此，他批准了对外政策部的又一份报告（该报告也有宣传鼓动部的一名工作人员签署），并在 1947 年 7 月让这份报告得以流转。“该委员会，”报告中指出，“没有与国外的犹太民族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作斗争。无论是在发送到国外的文章中，还是在该委员会发行的报纸《团结报》（“Единение”）的版面上，都没有揭露最近大力活跃起来的各种犹太民族主义者和犹太复国主义者，也没有批评犹太社会民主组织及其个别活动家的民族主义错误。”此外，报告的文本还隐晦地暗示了犹太反法西斯委员会没有与苏联国家安全部进行应有的合作，没有履行其被设定的情报职能：“该委员会没有利用其与国外犹太学者、社会政治和文化活动家的联系，以从他们那里获取对苏联国家有用的科学技术和政治信息。”[596]

刚刚被任命为中央委员会书记的苏斯洛夫，正是以这种方式，毫无疑问地试图坚持他最初的提议，哪怕是现在。他试图迫使犹太反法西斯委员会，如果无法将其解散的话，也要毫无怨言地服从他个人。毫无保留地执行他的所有指示。为此，他连同报告一起向日丹诺夫提交了又一份决议草案。他提议确定“犹太反法西斯委员会的工作存在严重的政治错误和不足”，要求该委员会纠正这些问题，并且为了同样的目的，彻底改变其人员构成。与此同时，苏斯洛夫试图为犹太反法西斯委员会确定未来的任务：“在国外宣传苏联的成就……揭露英美反动势力的反苏运动……获取对苏联有用的信息”[597]。

但就像 1 月份一样，苏斯洛夫的意见再次如同旷野中的呼喊，无人理会。他的提议根本没有被考虑，只是要求犹太反法西斯委员会从 8 月开始，为对外政策部准备每月一期的特别信息简报。简报仅制作两份，标注“绝密”，篇幅为四页印刷纸——内容是关于国外媒体对巴勒斯坦问题的综述[598]。

与此同时，巴勒斯坦问题进入了关键阶段。犹太武装组织“哈加纳”和“莱希”（斯特恩集团）实际上已经对英国军队和阿拉伯居民展开了游击斗争，要求立即建立以色列国。联合国认定该地区的局势对世界和平构成威胁，并于 4 月 28 日召开了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会议议程上只有一个问题——巴勒斯坦的局势。苏联代表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葛罗米柯表示坚信，有必要邀请美国犹太事务局代表团团长本·古里安以有发言权的身份参加会议，因为他代表着两个利益相关方之一。毕竟，另一方冲突相关方的利益由阿拉伯国家的代表表达。然而，苏联的这一支持提议没有得到认可，被否决了。

对该问题的讨论沿着传统的路线进行。解决方案的制定工作被交给了第一委员会，其建议于 5 月 15 日得到批准。由澳大利亚、危地马拉、印度、伊朗、加拿大、荷兰、秘鲁、乌拉圭、瑞典（主席国）、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的代表组成了一个特别委员会，该委员会承担了提案的准备工作。

该委员会于 5 月 26 日开始工作，到其任期结束，即 8 月 31 日，共举行了 52 次会议。其中 4 次在纽约举行，36 次在中东举行，12 次在日内瓦举行（并前往德国和奥地利访问流离失所者营地），并在那里准备了最终文件。由于各方立场无法调和，无法达成任何妥协，最终文件不是一份，而是三份。第一份联合国行动计划草案得到了所有人的认可，规定尽快结束英国对巴勒斯坦的托管。第二份草案得到了多数人的支持，提议将巴勒斯坦分割为两个独立的国家，即犹太国家和阿拉伯国家，并将耶路撒冷划为一个特殊的国际区域。第三份草案由印度、伊朗和南斯拉夫的代表支持（澳大利亚代表既不支持第一份也不支持第二份草案），建议保留巴勒斯坦的统一，并设立两个自治行政区。

联合国大会第二届会议于 9 月 16 日开幕，但直到 11 月 29 日才就巴勒斯坦问题进行投票。以 33 票赞成（包括苏联、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和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13 票反对（主要是阿拉伯国家）和 10 票弃权（包括英国）通过了一项决议，规定结束英国的托管，并在 1948 年 10 月前在巴勒斯坦领土上建立两个独立的国家，即犹太国家和阿拉伯国家。

然而，犹太定居者不想等待一年来完成在这种情况下所需的所有法律手续。早在 12 月，他们的战斗组织——哈加纳、伊尔贡、莱希——就开始了“未宣战的战争”。在正式分割之前，他们试图尽可能扩大未来将成为以色列的区域。他们开始将阿拉伯人赶出加利利、朱迪亚和内盖夫。并为与阿拉伯联盟国家的真正战争做准备，这些国家已经多次公开表示，他们不会允许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国家。

“当然，”果尔达·梅厄回忆道，“我们完全没有为战争做好准备。我们长期以来能够或多或少地将当地阿拉伯人控制在一定范围内，这绝不意味着我们能够应对正规军队。我们迫切需要武器——如果我们能找到愿意卖给我们武器的人就好了。”[599]

是的，未来的以色列已经有了士兵——大约 2.5 万人。这得益于有远见的移民组织。从流离失所者营地送往巴勒斯坦的主要是适龄服役的人，以及经过军事训练的人或机械师、司机。正是他们能够成功抵御阿拉伯联盟国家即将发动的进攻，而事实证明，这些国家只能派出总共 2.3 万名士兵。未来的以色列人只缺少武器，而英国当局禁止武器入境。但他们还是很快找到了武器。

关于这一情况的消息早在 1948 年 1 月就开始传到美国陆军情报部门。美国驻黎巴嫩武官史蒂文·米德少校向华盛顿报告说，大约在贝鲁特以东 50 公里处，经常有一些没有识别标志的飞机在夜间降落，有时一晚降落好几次。后来，在 3 月，米德从他的线人那里得知，这些飞机运送的是武器和弹药，供犹太战斗组织使用。当时美国人始终没有确定是谁从哪里向黎巴嫩供应武器。但在 3 月底，他们发现了另一件事。美国人拉尔夫·科克斯驾驶着美国运输飞机“空中霸王”号，开始定期从布拉格飞往巴勒斯坦。他运送的是捷克的武器和弹药。而且这是在当地国家安全部门的明显协助下进行的。不久之后，华盛顿得到了确凿的证据，证明布拉格-巴勒斯坦的空中桥梁不仅是持续存在的，而且有两条航线。一条是直飞航线，另一条是经过法国南部的航线。

经过对这些消息的仔细核实，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海军上将罗斯科·希伦科特于 4 月 12 日给杜鲁门发送了一份备忘录。他在备忘录中不仅指出了捷克武器走私到“政治局势高度紧张地区”这一事实。还指出，美国公民参与这样的行动，使用美国飞机，是“不负责任的行为”，可能会“对美国的国家安全产生不利后果”。总统对这份备忘录没有做出回应[600]。

中央情报局局长并非唯一一个持公开反以色列立场的人。国务卿乔治·马歇尔也持有相同的立场，他原本打算在 6 月向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发出正式抗议，只是由于美国驻布拉格大使的坚持才没有这样做。国防部长詹姆斯·福雷斯特尔、副国务卿罗伯特·洛维特也持有相同的观点。此外，早在 1948 年 1 月中旬，美国驻联合国代表沃伦·奥斯汀就直截了当地表示：美国不再认为联合国大会 11 月 29 日的决议是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可接受方案；建议放弃已通过的计划，并由联合国对统一的巴勒斯坦实施直接监管。杜鲁门对奥斯汀明显反对其政策的言论感到愤怒，在一份书面声明中驳斥了他的讲话[601]。

当时在莫斯科也可以看到类似的紧张局势。1948 年 3 月 26 日，阿巴库莫夫显然是在其监管人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库兹涅佐夫的授意下，向中央委员会发送了他关于犹太反法西斯委员会的第二份报告。他再次提醒中央政治局成员注意该委员会成员宣扬民族主义的行为。

第二十一章

巴勒斯坦问题尽管至关重要，但对克里姆林宫来说，并非最为首要的问题，更不是唯一亟待解决的问题。解决另一个问题需要最高领导层全体成员无一例外、刻不容缓地予以高度关注，因为国家的未来发展直接取决于这个问题的解决：恢复遭到破坏的工业，将已陷入全面崩溃的农业至少恢复到战前水平。在极为不利的总体形势下，所有这些因素共同促使人们重新启用一个相当古老且明显已经过时的理念——建设共产主义。毕竟，只有这个理念才能让民众同意，或者更确切地说，违心地接受即使在和平时期也继续忍受物资短缺和极度艰难的生活，以及继续拿着微薄的、不符合正常生活水平的工资。而且，正如那些改变意识形态路线的策划者所认为的那样，这种理念不可避免地会在一定程度上、在某个时期内重振民众昔日的热情，让人们不再为了当下或明天而工作，而是为了一个抽象的、非常遥远的目标而努力。诚然，汲取了过去的惨痛教训，这一次他们甚至都没有勇气设定“美好未来”到来的大致期限。

1947 年 7 月 15 日，在通过关于为即将召开的第十九次党代表大会准备新纲领的决议时，政治局最初非常谨慎地表述了新的方针：在文件的第二部分，即“实践-政治”部分，“应该从苏联社会在 20 至 30 年内向共产主义发展的角度，阐述党的主要任务”[602]。然而，仅仅三周后的 8 月 6 日，政治局便更加明确地做出了决定，批准了由 Н．А.沃兹涅先斯基提出的文本。新决议指出：“责成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着手制定苏联的总体经济计划，为期约 20 年，该计划旨在解决苏联最重要的经济任务——在人均工业生产规模方面超过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并在苏联建设共产主义社会。”20 年计划的初步草案应在 1948 年 1 月 15 日前提交给最高领导层审议[603]。

然而，最高领导层深知，仅仅靠承诺是无法让民众满足的，于是终于迈出了早就该迈出但因严重旱灾的影响而推迟的一步。这是恢复正常经济道路上的第一步，也是唯一的一步。1947 年 12 月 13 日，政治局批准了 5 月 27 日成立的货币改革委员会（成员包括莫洛托夫、沃兹涅先斯基、贝利亚、日丹诺夫、米高扬、马林科夫、柯西金，以及兹韦列夫、戈列夫、科先科）的工作，并批准了苏联部长会议和联共（布）中央的联合决议，即由斯大林和日丹诺夫签署的《关于进行货币改革和取消食品及工业商品配给卡的决议》。决议特别规定：“……于 12 月 14 日晚 6 点通过广播公布，并于 12 月 15 日在中央报刊（《真理报》《消息报》）上发表”这一重要文件[604]，以杜绝任何可能的阴谋活动。

对于国内所有居民来说，这项决议意味着生活状况的切实改善，人们能够以固定的、相当低的价格（面粉和面包的价格同时降低了 12%，谷物和通心粉制品的价格降低了 10%）自由、不受任何限制地购买所需的食品、衣物、鞋子、香烟和雪茄。而这正是人们六年来一直严重短缺的东西。取消配给制和关闭由此产生的“限额商店”，以及同时关闭那些以“自由”价格（更确切地说是极其高昂的价格）进行交易的“商业”商店，之所以成为可能，只是“得益于”对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采取的极其严厉的政策。国家以纯粹象征性的收购价格，按照国家规定的数量，从这些农庄和农场中榨取了它们的全部产品——粮食和土豆、肉类和家禽、牛奶和鸡蛋、羊毛和经济作物。此外，国家有目的地储备粮食作为国家储备，以及部分企业的转产，使得一些企业能够重新生产大众消费品，这也起到了同样重要的作用。

对于最高领导层来说，决议的第一部分，即货币改革，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这次改革非常诚实地、公开地解释了为了稳定和整顿国家金融体系（这是解决所有经济问题的关键），必须大幅减少货币供应量的必要性。既要减少因战争期间多次发行大量货币而产生的、本质上属于通货膨胀性质的那部分货币，也要减少由德国造成的货币，德国不仅印刷了明显的代用货币——占领区债券，还印刷了假的苏联卢布。正因为如此，货币兑换采取了两

种方式。新的现金卢布与改革前的 10 个旧卢布等值。而存在储蓄银行账户上的非现金“劳动储蓄”，则按照更为优惠的汇率兑换。存款在 3000 卢布以下的，按 1:1 兑换；4000 至 10000 卢布的，按 2:3 兑换；超过 10000 卢布的，按 1:3 兑换。这种差别化的兑换方式实际上并没有损害到占绝大多数的、非常贫困的那部分民众的利益。它只对富裕阶层（这显然是少数人），但主要是对各种投机者和在战争期间发了横财的黑市商人造成了明显的损害。

在进行改革的同时，最高领导层也没有忘记将自己纳入新的体系的必要性。12 月 9 日，他们为担任国家和党内高级职务的人员确定了“货币工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即斯大林，月薪为 10000 卢布（约相当于 12 个平均工资），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月薪为 8000 卢布；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什维尔尼克月薪为 10000 卢布；联共（布）中央书记月薪为 8000 卢布[605]。此外，在取消配给制之后，12 月 29 日，政府责令“国家安全部（阿巴库莫夫同志）从 1948 年 1 月 1 日起停止通过为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联共（布）中央书记及其他由国家安全部提供物资的负责工作人员设立的内部渠道销售工业商品”[606]。

还有一项措施，尽管比 20 年计划更为具体，旨在使经济摆脱危机状态，但同样着眼于遥远的未来，这就是苏联部长会议和联共（布）中央的联合决议——《关于营造防护林带、实行草田轮作制、修建池塘和水库以确保苏联欧洲部分草原和森林草原地区高产稳产的计划》。该文件在一年多后的 1948 年 10 月 22 日由政治局批准，而且并非如人们所预期的那样由国家计划委员会准备，而是由农业部门、其科研机构和全苏农业科学院在当时负责该领域的 Г.М.马林科夫的总体监督下准备的。这项决议，从在报纸和杂志上发表的那一刻起，被宣传部门委婉地称为“斯大林改造自然计划”。实施该决议中所设想的措施，应该能够消除（并且在很大程度上确实消除了）伏尔加河流域、北高加索和乌克兰南部长期面临的突如其来、难以预测且无情的旱灾的威胁。尽管植树造林是一项需要几十年时间才能完成的工作，但它还是让苏联广大地区的集体农庄庄员和国营农场工人相信，尽管是在未来，他们将能够收获自己种植的作物。当然，收成是否高产，实际上只取决于农民的劳动以及他们对农业技术的应用。与此同时，这项决议是国家和党为振兴农业提出的唯一一项实际措施，尽管来得有些晚。毕竟，1947 年 2 月召开的中央全会最终也未能提出任何具体的措施……

与此同时，Н.А.沃兹涅先斯基作为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和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本应在 1948 年 1 月 15 日将 20 年计划草案提交给最高领导层审议，但他并不急于完成这项任务。事实证明，他的做法是正确的，因为在规定的期限内，没有人想起即将召开的党代表大会，也没有人想起党的新纲领。对日丹诺夫来说，他比其他人更关心新意识形态导向的正式确定，但他却一直生病。而其他最高领导层成员则不想提及此事。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利用这五个月的时间间隔，以一种相当独特的方式行事。他将这段时间用于公然篡改几乎是昨天的历史，创作了“理论”著作《苏联在卫国战争时期的军事经济》。这本书篇幅不大，只有 12 页作者手稿，但在构思和完成方面却非常引人注目。该书旨在让民众为接受最高领导层的重大变革做好准备，同时也强化了那些不久前刚刚成为斯大林第二版《简短传记》基础的观点。

沃兹涅先斯基这部著作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对卫国战争期间国防委员会（ГКО）的存在、其活动及实际作用只字不提，将其从人们的记忆中抹去。在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这部著作的第一版的 189 页中，尽管这本书表面上是关于莫洛托夫、贝利亚、马林科夫以及米高扬等人的工作的，但国防委员会只被提及了三次，而且只是作为一个名称被提及，没有揭示其成员构成，更没有提及成员之间的职责分配。在第 21 页，只是为了确认其成立这一事实，因为这是无法回避的。在第 33 页和第 41 页，提到它是“在斯大林同志领导下”的一个“斯大林式”的机构，仅此而已。与此同时，沃兹涅先斯基非常巧妙地利用了此前从未公开过、仍标有“绝密”字样的国防委员会的决议和决定，有意识地将国防委员会在动员经济、满足前线和后方所有需求方面的作用完全归功于斯大林。诚然，他多次将领袖的名字与其官

方职位一起提及，如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不能排除作者这样做是为了恢复政府本身以及他自己作为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的重要性。

这样，Н.А.沃兹涅先斯基就解决了两个问题。首先，他抬高了斯大林的地位，同时将斯大林的个人形象神话化，积极推动对领袖的崇拜，仿佛所有重大决策都是斯大林一人做出的，而且只有他一人。与此同时，沃兹涅先斯基公开表明了自己的选择。他个人对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无限忠诚，并且只对他忠诚，坚定地准备与他一起在最高领导层为争取绝对领导权而奋斗，无论是与明显的对手，还是与潜在的对手。从他在书中对某些人的只字不提可以明显看出，他认为莫洛托夫、贝利亚和马林科夫，可能还有米高扬，都属于第一类对手。毕竟，正是他们的名字，就像提前预示着未来的事件一样，已经从未来的国家官方历史中被划掉了。

沃兹涅先斯基这样做，很可能是基于他自己的预测，即权力高层不可避免地、而且很快就会迎来新一轮的权力角逐。其依据可能是1947年6月9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颁布的《关于解密国家机密的命令》。这一法令与荣誉法庭的活动密切相关，进一步明确了荣誉法庭的本质、目的和任务，主要针对的是在党内和国家机构中担任高级职务的人。因为只有他们才是真正机密的主要承载者，因此根据新的刑事法令，他们可能会成为被告。

1947年9月23日政治局的决定更是无可争议地证明了最高领导层内部的斗争即将加剧，该决定认为“有必要在联共（布）中央机关中设立荣誉法庭”[607]。做出这一决定绝非偶然，因为与此同时，已经被撤职的内务人民委员部（УПиА）副部长К.С.库扎科夫和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出版局局长М.И.舍尔巴科夫的“反国家行为”也被提交给荣誉法庭审议[608]。他们两人被指控的罪名相同，即对刚刚被揭露为英国间谍的Б.Л.苏奇科夫的“庇护”，以及“把他安插”到内务人民委员部出版局副局长的职位上，后来又在1947年4月23日让他担任外国文学出版社的社长。

苏奇科夫事件是库兹涅佐夫与日丹诺夫之间日益激烈的斗争中第一批倒下的事件之一，它成为了对内务人民委员部进行清洗的正式借口。这次清洗旨在清除内务人民委员部（后来其地位被降低并改组为一个部门）中那些独立思考、以亚历山德罗夫和日丹诺夫为导向的工作人员，使留下来的人员完全服从新的领导——苏斯洛夫和谢皮洛夫。不久之后，类似的手段也被用于苏联武装力量部（МВС），在那里，布尔加宁也以类似的方式巩固了自己的新角色。

11月8日，那些过去曾领导苏联海军人民委员部（НКВМФ）的人被召回莫斯科，包括1939年至1946年担任人民委员的海军上将Н.Г.库兹涅佐夫、1940年至1946年担任副部长的М.М.加列尔、1942年至1943年以及1944年至1945年担任海军总参谋长的В.А.阿拉富佐夫、1943年至1944年担任海军总参谋长的Г.А.斯捷潘诺夫。他们被告知，被指控在战争期间非法向盟友传递关于伞兵鱼雷的秘密文件。12月11日，在布尔加宁主持的会议上，决定将他们的案件提交给苏联武装力量部荣誉法庭审议，次日苏联部长会议通过了相应的决议。一个月后的1948年1月12日至15日，苏联武装力量部荣誉法庭按照其章程，将这四位海军上将的案件移交给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后者于2月3日判处阿拉富佐夫和斯捷潘诺夫十年监禁，加列尔四年监禁，对库兹涅佐夫则出人意料地从轻发落，只是将他的军衔降为海军中将，但在6月10日又部分恢复了他的名誉，任命他为远东军区海军部队总司令的副手。

可以想象，荣誉法庭如此具有破坏性的活动，让最高领导层的一些成员对自己的地位和命运深感担忧。这可能引发了一种预感，即局势很容易失控，演变成新一轮的大规模镇压，这必然会导致整个国家机构的彻底混乱，而在与西方对抗的情况下，这是完全不可接受的。正因为如此，可以肯定地说，1948年3月15日政治局认为有必要规定：“今后禁止各部长

在未经政治局批准的情况下，对各部门工作人员组织荣誉法庭审判。”此外，这项决定毫不掩饰地直接提到了当时对最高领导层大多数成员构成明显威胁的那些人。它以一个相当次要的事件为借口：“认为阿巴库莫夫同志在未经政治局知晓和同意的情况下，对该部两名工作人员组织荣誉法庭审判是错误的，并对阿巴库莫夫同志提出警告。指出联共（布）中央书记库兹涅佐夫同志单独（着重号为我所加。——Ю.Ж）批准对两名工作人员组织荣誉法庭审判的做法是错误的。暂停国家安全部荣誉法庭对博尔季诺夫和纳杰日金同志的判决，直到联共（布）中央书记处对该案件进行审议。”[610]

很可能，这项决定是由那些不仅不想效仿这种镇压行动，而且试图利用这一机会大幅限制库兹涅佐夫权力的人起草的。库兹涅佐夫与阿巴库莫夫及其可怕的国家安全部合作，权力已经过大。这些人试图并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自己的目的。无论如何，从 1948 年春天开始，荣誉法庭的审判越来越少，后来干脆就不复存在了。但在此之前，已经出现了另一种更“温和”的手段，能够诋毁并将那些由于某种原因不受掌权者欢迎或不合适的人从政治舞台上清除出去。对待 Г.К.朱可夫就是这样做的，既没有进行政治指控，也没有使用荣誉法庭。他们找到了一个看起来更有分量、更容易被将军们和军官们理解的借口。

1948 年 1 月 20 日，政治局通过了《关于苏联元帅 Г.К.朱可夫同志的决定》：

“联共（布）中央在听取了由日丹诺夫、布尔加宁、库兹涅佐夫、苏斯洛夫和什基里亚托夫组成的委员会提交的关于敖德萨军区司令朱可夫同志行为不端的材料后，做出如下决定。

朱可夫同志曾担任苏联驻德国占领军总司令，他的行为有损联共（布）党员的崇高称号和苏联军队指挥官的荣誉。在国家为他提供了一切必要条件的情况下，朱可夫同志滥用职权，走上了掠夺的道路，为了个人私利，从德国掠夺并运走了大量各种贵重物品。

为了达到这些目的，朱可夫同志放任自己对财物的贪婪欲望，利用下属，而这些下属为了讨好他，犯下了明显的罪行，他们从宫殿和别墅中拿走画作和其他贵重物品，撬开罗兹市一家珠宝店的保险箱，拿走其中的贵重物品，等等。

最终，朱可夫共掠夺了近 70 件贵重的黄金物品（带有宝石的杯子和戒指、手表、钻石耳环、手镯、胸针等），近 740 件银质餐具和银器，此外还有近 30 公斤各种银制品，近 50 块昂贵的地毯和挂毯，600 多幅具有重大艺术价值的画作，约 3700 米丝绸、羊毛、平绒、天鹅绒和其他布料，超过 320 张珍贵的毛皮等等。

当被传唤到委员会进行解释时，朱可夫同志的行为不符合党员和苏联军队指挥官的身份，他在解释中不诚实，并试图以各种方式隐瞒和掩盖自己的反党行为事实。

上述朱可夫的行为以及他在委员会上的表现，表明他在政治和道德方面已经堕落。

考虑到以上所述，联共（布）中央决定：

1.鉴于朱可夫同志的行为应被开除出党并交付法庭审判，但给予朱可夫同志最后一次警告，给他最后一次改正的机会，使他能够成为一名诚实的党员，配得上指挥官的称号。

2.解除朱可夫同志敖德萨军区司令的职务，任命他为较小军区之一的司令。

3.责令朱可夫同志立即将所有非法占有的贵重物品和财物上缴国家宝库。”[611]

1948 年 2 月 13 日，Г.К.朱可夫元帅就任乌拉尔军区司令。该军区不仅在地域上较小，而且只是一个纯粹的后方军区，没有战略意义。

……不仅仅是惩戒行动，同样具有象征意义的人事变动也表明了权力高层极有可能发生的变化。这些变动始于对几十年来一直拥有巨大权力的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的改组。1947 年 12 月 13 日，从该委员会中分离出两个具有全联盟规模的全新国家机构，作为完全独立的机构——国家物资技术供应委员会（Госснаб）和国家新技术采用委员会（Гостехника）。相对而言，其重要性有所减弱的国家计划委员会（不久后，中央统计局也脱离了它的管辖）由 Н.А.沃兹涅先斯基继续领导。国家物资技术供应委员会主席一职由根据 12 月 15 日政治局的决定回到莫斯科的 Л.М.卡冈诺维奇担任，而国家新技术采用委员会主席则由 В.А.马雷舍夫担任。对于后者来说，尽管他仍保留着对之前所领导的运输机械制造部的监管权，但这样的调动意味着他在高层领导中的地位和级别大幅下降。

与马雷舍夫一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另一位已不再年轻的“工业巨头”М.Г.别尔乌辛身上。11 月 29 日，他也被解除了化学工业部部长的职务，仅仅被任命为国家计划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从而使其直接置于贝利亚的直接控制之下。1948 年 1 月 26 日，解除了 М.Б.赫拉斯琴科艺术事务委员会主席的职务，理由是“未能进行正确的领导”。他被认为允许其部分监管的“苏联作曲家协会地方委员会在苏联音乐领域推行了完全错误的路线……成为了被党谴责的苏联音乐中形式主义、反人民倾向的温床，这对苏联音乐的发展造成了严重损害”[612]。

马雷舍夫和别尔乌辛职务的一定程度下降，自从与马林科夫关系最为密切的人进入权力精英阶层以来，可以纯粹地推测为是对格奥尔基·马克西米利安诺维奇（马林科夫）的一种特殊打击。而解除赫拉斯琴科的职务也同样可以被视为是试图诋毁日丹诺夫的工作，实际上日丹诺夫负责所有创作协会的活动，包括作曲家协会，并且与他所组建的第一个地方委员会的形成有直接关系。

在进行了这些，仿佛是准备性的人事调动之后，政治局接连做出了三项决定，这些决定直接改变了最高领导层的格局以及其中的权力平衡。1948 年 2 月 16 日的决定：“鉴于政治局在工作中很难不依赖于武装力量部部长，政治局认为有必要将关于将 Н.А.布尔加宁同志从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转为正式委员的提议提交给中央委员进行投票表决。”（当然，很快就获得了必要的同意。）3 月 25 日的决定：“认为莫洛托夫同志未与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就（苏联驻华盛顿大使——Ю.Ж）П.Ф.潘友新同志在美国一次集会上的发言以及该发言的文本问题进行协商是错误的。”[614]以及 3 月 29 日的决定：“鉴于工作负担过重，满足莫洛托夫同志关于不再参与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团会议的请求，以便莫洛托夫同志能够主要从事外交政策事务。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团会议的主持工作将依次交由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沃兹涅先斯基、贝利亚和马林科夫同志负责。”[615]

政治局的这三项决定共同意味着对权力突然重新分配的确认。作为国家的二号人物，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莫洛托夫，就像 1941 年 5 月一样，实际上被排除了作为国家政府实际首脑的最重要职责。他仅保留了外交部长一职——但这能持续多久呢？他在政府中的位置再次被 Н.А.沃兹涅先斯基占据，不过沃兹涅先斯基不得不暂时与 Л.П.贝利亚和Г.М.马林科夫分享新获得的权力。贝利亚再次证明了他的地位不可动摇，这直接取决于苏联制造自己的核武器以及相关运载工具的重要性。此外，他部分恢复了失去的对国家安全活动施加影响的能力。4 月 17 日，政治局正是委托他领导一个特别委员会，成员包括卡冈诺维奇、马林科夫、沃兹涅先斯基、阿巴库莫夫、弗拉西克，但不知为何没有库兹涅佐夫，该委员会的任务是接受或拒绝由苏联国家安全部提交的“确保九人之间电话通信完全保密”的方案[616]。而马林科夫则不仅向所有人证明了他对权力的渴望并未减弱，还证明了他有能力、有智慧坚定不移地夺回似乎已经失去的地位。

与此同时，1948 年初还显示出了另一个情况。强硬的国内政治路线得以确立和巩固。那些似乎早已留在遥远的 30 年代的特征又重新出现。4 月 5 日政治局几乎在同一天通过的两项决定无疑证明了这一点。根据其中第一项决定（按登记顺序），М．Б.赫拉斯琴科和他之前在委员会的下属被指控“在使用国家资金方面系统性地违反了财务预算纪律”[617]。这种指控的罪行，根据意愿既可以被视为简单的行政疏忽，也可以被视为应受刑事处罚的行为。

第二项决定因其本质立即具有了达摩克利斯之剑的性质，再次悬在除最高领导层之外的整个权力精英阶层头上。事实证明的确如此，因为它又创建了一个新的违宪惩戒机构，对国家权力的两个分支都适用：“为了加强党内和国家纪律，与表现出的堕落行为和损害苏联和党内领导干部荣誉和尊严的反国家行为作斗争，在苏联部长会议和联共（布）中央设立荣誉法庭。苏联部长会议和联共（布）中央的荣誉法庭负责审理苏联各加盟共和国部长及其副手、苏联部长会议各委员会主席及其副手、苏联部长会议各总局局长及其副手、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书记、各加盟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和各加盟共和国部长的反国家和反社会行为……”而且就像为联共（布）中央设立荣誉法庭时一样，立即在会议记录的另一个条款中确定了第一个，也是唯一的受害者。决定：“将关于科瓦廖夫同志反国家行为的案件提交给苏联部长会议和联共（布）中央的荣誉法庭审理，并解除他交通部长的职务。责令交通第一副部长别舍夫同志立即开始履行交通部长的职责。”[618]

高层领导们应该保持警惕，甚至可能感到恐惧。这不仅是因为政治局的这两项决定，还因为它们所带来的后续影响。一些部长被免职的情况变得过于明显，而这些部长似乎本不应有什么可担心的。毕竟，他们不仅经历了极其严格的服从和管理的考验，而且在战争年代成功地通过了某种特殊的“考试”。他们通过实际工作证明了自己有能力完成任何最艰巨的任务。然而，正是他们成为了这次不寻常清洗的对象。仅仅三个月内，就有九名政府成员因各种原因被免职。前面已经提到的 В．А.马雷舍夫、М．Г.别尔乌辛、И．В.科瓦廖夫、М．Б.赫拉斯琴科，此外还有司法部长 Н．М.雷奇科夫、财政部长 А．Г.兹韦列夫、交通部长 К．Я.谢尔盖丘克、海军部长 П．П.希尔绍夫、体育运动委员会主席 Н．Н.罗曼诺夫[619]。

对于所有被清洗的人和未被波及的人来说，只有一件事可能会让他们感到些许安慰。没有人受到政治性质的指控，没有人——甚至包括被免职的人，包括科瓦廖夫，没有被送上法庭，没有被判处剥夺自由，更不用说被处决了。即使是赫拉斯琴科，尽管他的“案件”伴随着意识形态方面的行动，其规模比 1946 年 8 月至 9 月的事件更为重大。他的“案件”与 2 月 10 日政治局通过的严厉的《关于 В.穆拉杰利的歌剧〈伟大的友谊〉》的决定直接相关，在此之前，还与 1 月 10 日至 13 日在联共（布）中央召开的关于苏联音乐“工作者”的不寻常的大型会议有关。在这次会议上，日丹诺夫发挥了主导作用，但不知为何他与联共（布）中央的其他书记——М．А.苏斯洛夫、А．А.库兹涅佐夫、Г．М.波波夫一起坐在主席团里。这次会议自然而然地过渡到了 4 月 19 日至 25 日召开的苏联作曲家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会议和代表大会上，几乎所有与会者都支持日丹诺夫的观点，试图将那篇著名的、陈旧的“正确”文章《混乱而非音乐》与当下联系起来。他们一致谴责了被排除在委员会之外的阿拉姆·哈恰图良、瓦诺·穆拉杰利、列翁·阿托姆扬以及德米特里·肖斯塔科维奇、谢尔盖·普罗科菲耶夫、维萨里昂·谢巴林、尤里·沙波林、尼古拉·米亚斯科夫斯基的作品。

正是因为在免职或承认严重“意识形态”错误时没有政治动机和司法惩罚，才让人感觉这是一场奇怪的“权力游戏”，幕后的人在操纵着一切，却隐藏在阴影之中。这场游戏是为了实现一个其他人无法理解的目标，至今这个目标仍然是个谜。即使在今天，也无法对当时权力层发生的事情给出一个明确、合理的解释。首先是因为，对高级国家官员态度的强硬同

样削弱了中央书记处书记 А．А.库兹涅佐夫和在离职前将一些人提拔到领导岗位上的 Г．М.马林科夫的地位，而这些人后来也受到了抨击。此外，强硬的人事路线对最高领导层的另外两名成员以及斯大林本人都有利。因为就在那时，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再次表现出了以往的积极性，加强了他作为唯一领袖的地位，巩固了自己的权力。他不满足于通过库兹涅佐夫-阿巴库莫夫和布尔加宁完全控制了权力机构、国家安全部门和军队，还直接将另一个从经济角度来看同样重要的部门纳入自己的掌控之下。3 月 23 日，他用柯西金取代了被降职为第一副部长的兹韦列夫，担任财政部长，并立即亲自“监督和控制”该部的工作。4 月 12 日，他以一种非常奇特的方式改组了政治局的货币委员会。他将 А．Н.柯西金、Л．З.梅赫利斯和 В．Ф.波波夫纳入委员会成员[620]。

但大规模镇压，这一强硬路线的必然特征，还是再次出现了，而且就在同一时期。诚然，镇压的范围非常有限——仅在波罗的海各共和国、乌克兰西部各州；规模也有限——只涉及农村人口，这些人不知不觉地成为了持续不断的武装反抗分子的支持基础，反抗分子的武装抵抗从未减弱；在同样有限的范围内，惩罚形式大多是将乌克兰西部各州的居民流放到中部和东部地区。

如前所述，1947 年 12 月 15 日，根据政治局的决定，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第一书记 Л．М.卡冈诺维奇被召回莫斯科。唯一可能的候选人——政治局委员 Н．С.赫鲁晓夫被任命为空缺的职位，为了保持权力分配，任命 Д．С.科罗琴科为共和国政府首脑。由于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恢复了高位，现在他比以前作为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时，要对乌克兰西部各州的局势承担大得多的责任，在那里，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ОУН）及其“军事分支”——乌克兰起义军（УПА）仍在继续抵抗所有的国家权力机构，包括苏维埃和党组织。此外，赫鲁晓夫还需要以某种方式为他四年来一直夸夸其谈的言论负责。那些过于乐观的断言——比如，消灭武装地下组织将在不久的将来成为一件简单的事情。

1944 年 3 月 21 日，Н．С.赫鲁晓夫在给斯大林的报告中写道：“至于乌克兰-德国民族主义匪帮的问题，应该说，关于他们活动的传言被大大夸大了……我相信，我们很快就能在这些地区恢复秩序。”诚然，他顺便提到——为了恢复平静，已经动用了一个骑兵师、二十辆装甲车、八辆轻型坦克，并且预计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部队也会到达。然而，即使有这些力量，问题也没有得到解决。尽管仅在 1944 年 2 月 19 日至 9 月 20 日期间，就消灭了 13442 名民族主义极端分子，俘虏了 7456 人，但与他们的斗争仍未结束，而且看不到尽头。战斗行动不仅没有减弱，反而随着红军向西推进而加剧。局势变得如此紧张，以至于在最高领导层批准后，内务人民委员部和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于 10 月 9 日发布了联合命令《关于加强与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地下组织的斗争并消灭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西部各州的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匪帮的措施》。在次年，即 1945 年初，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也不得不通过类似的决议[621]。

即使在战争结束后，乌克兰极端分子在沃伦、利沃夫、捷尔诺波尔、德罗戈贝奇、斯坦尼斯拉夫等州的武装抵抗不仅没有被镇压下去，反而还加剧了。抵抗活动蔓延到了国外，覆盖了波兰东南部和斯洛伐克的部分地区。仅为了在 1949 年初消灭苏联境外的乌克兰民族主义武装分子，就需要三个国家的国家安全机构协调行动以及强大的军队集团。与此同时，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西部地区持续不断的斗争最终具有了政治性质。这对基辅迅速推行集体化的努力产生了负面影响。这迫使农民们，尽管他们已经无奈地接受了加入集体农庄的必然性，但由于担心加入后会遭到乌克兰民族主义武装分子的枪击而丧生，所以仍然不愿意这样做。

赫鲁晓夫面临着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推行集体化的艰巨而严厉的任务，他找到了一个在他看来似乎是唯一可行的办法。1948 年 2 月 10 日，他向政治局提交了一项提议，该提议最初仅具有纯粹的地区意义——即有必要采用简化程序，将所有拒绝加入集体农庄以及在某种程度上与分离主义地下组织有联系的人驱逐出去。

政治局支持了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的倡议，并成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成员包括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 Л.П.贝利亚、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第一书记 Н.С.赫鲁晓夫、联共（布）中央书记 М.А.苏斯洛夫、А.А.库兹涅佐夫，以及各部长：国家安全部长 В.С.阿巴库莫夫、内务部长 С.Н.克鲁格洛夫、司法部长 К.П.戈尔申宁、总检察长 Г.Н.萨福诺夫。委员会的任务是准备一份完全不同类型的文件，旨在研究“关于移民、被行政流放和驱逐的人，关于为特别危险的罪犯（包括间谍）组织专门的监狱和劳改营的问题，以及关于将农村中的有害分子从乌克兰驱逐出去并向部长会议主席团提出建议的问题”[622]。

仅仅十天后，即 2 月 21 日，Н.М.什维尔尼克签署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命令《关于将恶意逃避农业劳动、过着反社会和寄生生活的人从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驱逐出去的命令》——也就是那些拒绝加入集体农庄的人，以及《关于将特别危险的国事犯送往苏联偏远地区服流放刑的命令》[623]。后一项法律行为意味着将所有根据《刑法典》第 58 条已经服完或即将服完刑期的人无限期地流放到科雷马、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和北哈萨克斯坦。这意味着苏联恢复了镇压，可能是大规模的镇压。

5 月 7 日，政治局对新的惩戒措施的规模仍不满意，又委托了另一个委员会，这次由Г.М.马林科夫（主席）、А.А.日丹诺夫、Н.С.赫鲁晓夫、М.А.苏斯洛夫、罗季奥诺夫和 С.Н.克鲁格洛夫组成，“根据乌克兰的经验，制定苏联部长会议决议草案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命令草案，内容为关于根据集体农庄大会的决定将反社会分子流放到偏远地区的措施”[624]。同样，所需的法律行为很快就出台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命令《关于将恶意逃避农业劳动、过着反社会和寄生生活的人流放到偏远地区的命令》于 1948 年 6 月 2 日获得批准，并立即适用于波罗的海各共和国、白俄罗斯西部各州和摩尔达维亚。在这些地区，需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集体化，从而使国家的农业领域实现统一。

为了加强新法律行为的效力，8 月 24 日，政治局以表现出“软弱”和“犹豫不决”为由，解除了苏联最高法院院长 И.Т.戈利亚科夫和他的副手、军事法庭庭长 В.В.乌尔里希的职务。取而代之的是更听话、“易掌控”的人——А.А.沃利娜和 А.А.切普佐夫[625]。10 月 26 日，随着苏联国家安全部和苏联总检察长办公室“指令”的出台，恢复后的惩戒体系得以完善。该“指令”规定，对所有从监狱和劳改营释放的服刑人员进行逮捕和无限期流放，无需经过法庭审判，只需根据苏联国家安全部臭名昭著的特别会议的决定即可。而且，可以肯定地推测，这需要得到该部门监管人 А.А.库兹涅佐夫的批准。

但最高领导层的强硬路线最明显的体现与其说是在国内政策方面，不如说是在对外政策方面。可以说，这体现在苏联加入了冷战之中。诚然，起初在国际舞台上的行动还不明确。这反映出在做出最终选择之前的痛苦犹豫，以及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对于是否应该在国家层面上公开、正式地与美国及其盟友展开对抗的不确定性。

1947 年 12 月 15 日，随着在伦敦举行的第五届会议结束，由波茨坦会议决定成立的四大国主要协调机构——外长会议（СМИД）不复存在。随着它的消亡，也就无需再考虑在不久的将来筹备并签署与德国的和平条约。无需再考虑为使这个最为危险的敌人（在半个世纪内曾两次威胁到国家的生存）实现非军事化提供法律保障。也无需再考虑国际社会对苏联将东普鲁士部分地区（未来的加里宁格勒州）以及白俄罗斯和乌克兰西部领土纳入版图的普遍法律认可，而波兰因这些领土获得的补偿是一条尚未得到任何人认可的、沿奥得河和尼斯河的边界。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也证实了最悲观的预测。1948 年 3 月 17 日，英国、法国、

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的代表实施了丘吉尔早就设想的计划。他们在布鲁塞尔签署了建立西方联盟的条约，该联盟后来成为了北约的雏形。

在此之前，在选择最终路线时，这种犹豫仍在继续。这在苏联与南斯拉夫冲突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冲突的演变巧妙地掩盖了其真正原因，也引发了这场冲突。

莫斯科与贝尔格莱德之间的分歧在 1947 年春天就已初现端倪，其本质在于克里姆林宫对铁托和季米特洛夫倡议的评估。他们试图根据列宁和斯大林的学说，通过建立巴尔干联邦来解决所有巴尔干国家（曾被称为“欧洲火药桶”）的民族问题以及与之相关的领土争端。这个国家联盟最初将包括南斯拉夫、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后来还可能包括希腊。通过这种方式来解决与未来的科索沃和马其顿相关的问题。

1947 年 4 月 19 日，卡德尔在与斯大林的会谈中坚定地保证，南斯拉夫方面在所有与巴黎签署的和平条约相关的限制解除之前，无意批准与保加利亚的拟议条约，而该和平条约直到 9 月 15 日才生效。然而，8 月 1 日，这一承诺被违背了。铁托和季米特洛夫宣布，他们已最终商定了两国之间的一项永久友好、合作与互助条约，其他巴尔干国家也可以加入该条约。

斯大林对事态的发展感到担忧，于 8 月 12 日给铁托写了一封信，信中指出：“苏联政府认为，两国政府的仓促行动为英美反动势力提供了便利，给了他们更多的理由加强对希腊和土耳其事务的军事干预，以对抗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两位巴尔干领导人听取了克里姆林宫的建议。11 月 27 日，他们在埃夫克西诺格勒（离瓦尔纳不远）签署了原计划的条约，但不是永久的，而是为期 20 年。尽管不久前联合国大会第二次会议刚刚通过了一项决议，谴责贝尔格莱德、索非亚和地拉那干涉希腊内政，向希腊共产党游击队提供军事援助，但他们还是这样做了。

苏联领导层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仍然没有改变。它适时地批准了该条约的签署，莫洛托夫明确表达了这一点：“这不应该妨碍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按照两国领导认为合适的方式采取措施实现两国的联合。”它也批准了其他事情。1948 年 1 月 9 日，在与抵达莫斯科的吉拉斯会谈时，斯大林表示：“我们同意南斯拉夫吞并阿尔巴尼亚……越快越好。”

只是在获得了关于即将签署布鲁塞尔条约的确切信息后，最高领导层对该问题的态度才开始改变。季米特洛夫 1 月 17 日在索非亚就未来的巴尔干联邦接受采访，成为了克里姆林宫表达新立场的契机。这位前共产国际名义上的领导人表示，他认为巴尔干联邦不仅包括南斯拉夫、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还包括多瑙河沿岸国家——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甚至包括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而在未来还可能包括希腊。一周后，斯大林告诉季米特洛夫，这样的提议“损害了新民主国家的利益，便利了英美两国对这些国家的斗争”。1 月 28 日，《真理报》发表了一篇公开的官方评论，对保加利亚总理的采访进行了严厉谴责，明确地将建立巴尔干联邦的想法定性为“有问题的”和“虚构的”。

同一天，斯大林利用外交渠道，通知铁托他对建立新国家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在苏联的另一份文件中指出：“莫斯科收到消息称，南斯拉夫计划在近期将其一个师派往阿尔巴尼亚南部边境……莫斯科担心，如果南斯拉夫军队进入阿尔巴尼亚，盎格鲁-撒克逊人会将这一行为视为南斯拉夫对阿尔巴尼亚的占领，侵犯其主权，而且很可能盎格鲁-撒克逊人会以‘保护’阿尔巴尼亚独立为借口，利用这一事实进行军事干预。”克里姆林宫并不满足于这些解释，迅速加强了立场。2 月 1 日，铁托收到了一封由莫洛托夫签署但表达了斯大林意见的电报。斯大林对可能被卷入与美国和英国的热战而非冷战感到愤怒。在这封独特的信件中，苏联政府表示：“苏联政府完全是偶然得知南斯拉夫政府关于派遣贵国军队进入阿尔巴尼亚的决定……苏联不能同意被置于既成事实面前。当然，很明显，作为南斯拉夫的盟

友，苏联不能为南斯拉夫政府在未经协商甚至未告知苏联政府的情况下采取的这类行动的后果承担责任。”

为了解决危机局势，斯大林要求立即召开南斯拉夫、保加利亚和苏联三方的会议。1948年2月10日，在莫斯科召开了最高级别会议。苏联方面的代表有斯大林、莫洛托夫、马林科夫、日丹诺夫、苏斯洛夫和佐林；保加利亚方面的代表有季米特洛夫、科拉罗夫和科斯托夫；南斯拉夫方面的代表只有卡德尔、巴卡里奇、吉拉斯和波波维奇。

在会议上，斯大林没有发言，而是让莫洛托夫发言。他只是不时地打断发言者，抛出简短的话语。这些话语极其情绪化，尖锐甚至愤怒。但正是这些话语让人能够理解当时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的状态。他毫不掩饰（毕竟周围都是自己人）内心的恐惧。他极度害怕自己历经千辛万苦建立起来的、旨在切实保障苏联安全的阵营体系，迟早会因为贝尔格莱德和索非亚那些考虑不周、未经协调的言论（而非行动）而带来严重后果。他担心西方对这些言论的解读，西方总是按照自己虚构的、认为莫斯科“具有侵略性”的观念来解读一切，这很可能会导致严重的后果。

这些话语还揭示了另一个情况。斯大林坚信，在已经紧张到极点的国际局势下，即使是表达某种意图，也可能意外地成为一场局部冲突（最初可能是巴尔干地区的冲突）的导火索。而这场冲突必然会演变成第三次世界大战。美国会根据杜鲁门主义卷入战争，苏联作为南斯拉夫的盟友也会被卷入。这将导致最不希望看到的结果，因为莫斯科既没有原子弹，也没有远程轰炸机，必然会输掉战争，遭受毁灭性的打击。

因此，斯大林试图让季米特洛夫明白，他以前的党内职务和现在作为保加利亚政府首脑的职务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区别。他向季米特洛夫解释，作为政府首脑所肩负的对国家命运，不仅是对自己国家，还有对所有与之签订互助条约的国家（尤其是苏联）的高度责任。“你想让世界大吃一惊，”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嘲讽地说，“好像你还是共产国际的书记一样。”随后，他开始告诫这些尊贵的客人：“季米特洛夫说的每一句话，铁托说的每一句话，在国外都会被认为是我们授意说的。”后来，在莫洛托夫宣读南斯拉夫-保加利亚协议的一个条款时，他打断了莫洛托夫，直接说道：“但这就是先发制人的战争……”他毫不掩饰自己的教导口吻，又补充道：“这只是普通的共青团式的冲动。这只是一句响亮的空话，只会给敌人提供口实。”他显然暗示季米特洛夫和铁托缺乏治国理政的智慧。

会议在第二天结束，苏联与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签署了关于就外交政策问题进行磋商的一系列协议。然而，这次会议以及作为会议成果出现的文件，都未能消除克里姆林宫对所发生事件的不可预测后果的严重担忧。这迫使苏联寻找一种方法，以确凿地让西方（华盛顿和伦敦）相信苏联的真正和平意图。唯一的办法可能是废除在埃夫克西诺格勒签署的协议。要么由协议的两个签署国共同废除，要么至少由其中一方废除，但莫斯科必须明确表示不参与其中，并且铁托或季米特洛夫必须无条件同意。

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在会议上已经表示完全愿意放弃他以前的声明和计划。而约瑟普·布罗兹·铁托的立场当时仍然不明确，主要是因为他莫名其妙地拒绝前往莫斯科。直到3月1日，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的决议才明确了这一立场，决议记录了对所发生事件的特别看法：“最近，南斯拉夫与苏联之间的关系陷入了僵局。”得知这一情况后，最高领导层试图采用惯用的强硬施压手段。作为第一个相当严重的警告，3月18日，苏联召回了驻南斯拉夫的苏联顾问（包括经济和军事顾问）。几乎与此同时，3月27日，莫洛托夫和斯大林（他们的签名正是按照这个顺序排列，绝非偶然）通过一封特别信件向南斯拉夫领导层表达了政治上的不信任，故意夸大其词地指责他们犯了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错误。这封措辞粗鲁的信件无疑给随后的所有事件赋予了戏剧性的色彩，显然是对这些事件的一种挑衅。

铁托感到受到了侮辱，但他并不着急。他将自己的回复草案提交给 4 月 12 日召开的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讨论。全体会议不仅完全支持他们的领导人，认可了他在冲突中的立场，而且走得更远。会议指责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 С.茹约维奇和中央委员 А.赫姆布兰加，说他们在为斯大林的观点辩护时……是莫斯科的间谍。在讨论这个问题时出现如此意外甚至奇怪的转折，А.兰科维奇和铁托本人的言论更是加剧了这种情况，他们声称，苏联早就已经在南斯拉夫建立了广泛的、无所不包的间谍网络。这样一来，并非是克里姆林宫的主动行为，在两国、两党的论战中出现了一个最有分量（尽管毫无根据）的论据，这种论据只出现在“猎巫”行动中。

与此同时，在收到铁托的回复之前，斯大林就已经急于做出最终选择。他决定宣布南斯拉夫领导人不仅是关系恶化的主要责任人，而且是唯一的责任人。他认为有必要牺牲与这个最大的巴尔干国家的联盟关系。公开放弃对南斯拉夫的苏联影响力，以避免与西方发生一场极不确定的军事冲突。以一种非常激进的方式证明，莫斯科无意干涉希腊事务。同时，通过让东欧国家的领导人和执政党共同承担责任，最终将他们变成完全服从于自己意志的顺从执行者。展示出现在由谁来决定（而且是毫无例外的所有国家）无论是对外还是对内的政策路线，尽管这个苏联阵营当时尚未正式形成，但实际上已经存在。为此，他利用了已经闲置一年、终于派上用场的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Информбюро）这一机制。

给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成员党的中央委员会发了一封“供参考”的信件，显然希望得到他们的认可。很快，正如所预料的那样，支持莫斯科的一致决议开始陆续送达贝尔格莱德，这使得这场双方的论战具有了广泛的国际性质。毫无疑问，这推动了南斯拉夫采取了一个考虑不周的步骤，使局势更加恶化——南斯拉夫公然无视 2 月 11 日与苏联签订的协议。两次无视。一次是因为美国、英国和法国试图重新审查巴黎和平条约，并将的里雅斯特自由区移交给意大利单独管理。另一次是因为美国发表声明，不愿意支持希腊改变与阿尔巴尼亚边界以使其对自己有利的企图，并表示将使用武装力量，这一声明引起了人们的警惕。

像这样的“黑材料”——南斯拉夫领导层的任何真实或虚构的错误，都被苏斯洛夫这位殷勤且有先见之明的人通过他下属的国际部门的工作人员精心收集起来。这些材料定期形成“清单”，发送给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成员。这些材料帮助斯大林认为问题已经成熟，必须在 6 月上半月之前召开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会议来审议这个问题。斯大林在 5 月 4 日给八个国家共产党（华沙、布拉格、布达佩斯、布加勒斯特、索非亚、贝尔格莱德、巴黎和罗马）的新信件中就包含了这样的提议。

尽管南斯拉夫共产党强烈反对，6 月 19 日会议还是召开了，这次会议在布加勒斯特举行。联共（布）在会议上的代表不仅有日丹诺夫和马林科夫，还有苏斯洛夫，他终于赢得了如此重要的任务。两天时间用于双方的磋商，协调共同立场，并等待贝尔格莱德方面（很可能是不可能的，但非常希望的）投降，等待南斯拉夫共产党代表团抵达罗马尼亚首都。直到给贝尔格莱德规定的期限（6 月 21 日）结束后，会议才开始工作。当然，会议从日丹诺夫的报告开始，该报告基于 3 月 27 日和 5 月 4 日信件的立场，以及对南斯拉夫共产党有倾向性的描述，包括其 4 月全体会议的决定。报告使用了早已被遗忘的谩骂手法，措辞如“造成这种局面的全部责任在于铁托、卡德尔、吉拉斯和兰科维奇。他们的方法来自托洛茨基主义的武器库”。并得出了不可避免的结论：“他们的反党和反苏观点与马克思列宁主义不相容……南斯拉夫共产党的领导人将自己置于参加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各共产党对立面……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将自己和南斯拉夫共产党置于兄弟共产党的大家庭之外……”[634]

所有与会者——雅库布·贝尔曼（波兰工人党）、马蒂亚什·拉科西（匈牙利共产党）、雅克·杜克洛（法国共产党）、特拉伊乔·科斯托夫（保加利亚共产党）、鲁道夫·斯兰斯基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帕尔米罗·陶里亚蒂（意大利共产党）、瓦西里·卢卡（罗马尼亚共产党）——不仅支持将这些同志从运动中开除，还对贝尔格莱德在所有严重罪行方面的指责添油加醋。6 月 23 日，会议通过了正是为了这个目的而召开会议的决议——《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的状况》。该决议不仅重复了日丹诺夫以联共（布）名义表达的评价，决定将南斯拉夫共产党开除出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还包含了一个新的、非常有代表性的内容，明确地阐述了苏联未来可能对任何共产党事务的干预：

“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毫不怀疑，南斯拉夫共产党内部存在着足够多的健康力量，他们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忠于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国际主义传统，忠于统一的社会主义阵线。南斯拉夫共产党这些健康力量的任务是迫使现任领导人公开、诚实地承认他们的错误并加以纠正，摒弃民族主义，回归国际主义，并全力加强反对帝国主义的统一社会主义阵线，或者，如果南斯拉夫共产党现任领导人无法做到这一点，就更换他们，推举出一个新的、国际主义的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集体。

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毫不怀疑，南斯拉夫共产党能够完成这一光荣任务。”[635]

在分析苏南冲突第一阶段的产生和发展时，值得特别密切关注的不仅是其真正目的，还有许多其他方面。比如斯大林在采取果断行动时，试图退居幕后，借莫洛托夫的名义行事。从形式上看，他把两党之间的分歧变成了明显的两国间的分歧。他还确保在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决议中出现了一些对他强硬的外交政策路线至关重要的、内容全新的表述。“统一的社会主义阵线”，其背后隐藏着东欧的、苏联的阵营。“国际主义”，在当时出现的这种局势下意味着每个加入阵营的国家都要完全服从于共同利益，而这些共同利益仅由苏联来表达。“民族主义”，现在应该理解为偏离阵营的共同立场，对这些立场的忽视。

像南斯拉夫这样一个如此严重、重要的“牺牲品”，很显然，需要西方做出相应的回应。做出一种能够弥补这一损失、在美苏对抗尚未形成不可逆转的形式的情况下平衡双方在欧洲的地位的回应。而对于曾经的盟友莫斯科来说，唯一可能的回应举措就是西方国家放弃对各自在柏林占领区的控制权。正因如此，恰恰就在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第二次会议结束、将南斯拉夫共产党开除的前夕，克里姆林宫开始了第二项激进的外交行动。这一行动旨在推动华盛顿、伦敦和巴黎，或者迫使他们做出预期的决定。1948 年 6 月 22 日，苏联驻德国占领军司令索科洛夫斯基元帅通知了他的同事，即克莱将军、罗伯逊将军和肯尼格将军，宣布对西柏林实施封锁。

苏联最高领导层采取的这一行动，不仅看起来完全合理、有依据，而且实际上是被美国、英国和法国的单独行动所推动。正如前面所提到的，旨在协调与德国和平条约条件的外长会议第五届会议无果而终。也许，莫斯科本会接受外交官们的又一次失败，接受解决这个对其至关重要的外交政策问题的再次拖延。它可能会继续期待这个问题迟早会得到解决，等待着下一次四大国外长会议的召开。但它绝对无法接受仅仅两个月后发生的事情。

1948 年 2 月 20 日，美国、英国和法国的外交部门首脑在伦敦开会，他们明显无视苏联的利益以及苏联在解决德国问题上无可争议的权利，达成了一项不同寻常的协议。他们批准了萨尔地区在经济上并入法国，以及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更积极地参与解决德国问题的意愿。但华盛顿、伦敦和巴黎并未就此止步，他们宣布了一项很快就被称为“伦敦建议”的内容。即马歇尔计划扩展到德国的三个西部占领区。有必要为德国人民提供建立一种法律基础——宪法——以实现自由和民主的统治形式并达成国家统一的可能性。在近期将管理国家的全部责任移交给德国人，并为实现这些目标将占领当局的权力限制到最小程度。

苏联最初对所发生的事情做出了完全恰当的回应，通过外交照会表达了态度。分别在 2 月 13 日和 3 月 6 日发出照会。在这些照会中强调：此类行动已经“破坏了四大国关于德国

管制委员会的协议，也破坏了波茨坦会议关于外长会议的协议，而外长会议承担了欧洲和平解决的所有筹备工作。这三个国家的这种政策不仅不利于在欧洲建立持久的民主和平，而且可能会产生这样的后果，即只会对各种新战争的煽动者有利”[636]。

西方的非正式回应相当独特。3 月 23 日，华盛顿、伦敦和巴黎宣布拒绝继续参与德国管制委员会的工作。而 5 月 4 日，美国驻莫斯科大使史密斯在他提议举行的与莫洛托夫的会面中，对于正在发生的事情——对于公然的单独行动，对于德国问题以及这些行动背后的根本问题，只字未提。但他却利用苏联在 2 月至 4 月期间与那些不久前改变了国家结构和统治形式的国家——罗马尼亚、匈牙利、保加利亚——签订的新的友好互助条约，以及 2 月在捷克斯洛伐克发生的“事件”，作为指责莫斯科导致双边关系恶化的理由。史密斯说：“欧洲国家社会和美国对苏联政策的倾向感到担忧，为了相互自卫而团结起来，美国完全有决心在这些旨在恢复和自卫的联合行动中发挥自己的作用。”他试图以此将西方在 2 月所做的事情说成是苏联后来在 2 月至 4 月期间采取行动的结果。诚然，史密斯（更确切地说，是他背后的美国国务院）明白这种推断的所有漏洞，所以他也表达了更乐观的看法：“我们至今仍未以任何方式放弃这样的希望，即事件会出现这样的转机，使我们有机会找到一条途径，在大幅缓解目前普遍对国际关系产生如此不利影响的紧张局势的同时，在我们两国之间建立良好且合理的关系。”他这样明显地暗示，只有苏联放弃对东欧国家的影响，莫斯科不再将这些国家视为苏联利益和国家安全的范围，才可能成为改善两国关系的基础。

苏联最高领导层花了五天时间来确定对这样一个实质上是绝对要求的态度。直到 5 月 9 日，莫洛托夫才邀请史密斯，并向他以及美国国务院和杜鲁门总统阐述了苏联的立场。他拒绝在东欧做出任何可能的让步，因为这些让步对苏联来说完全是不可接受的。与此同时，他也表达了真诚的改善关系的意愿。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指出，苏联政府“一直奉行对美国的和平友好与合作政策，这一政策一直得到苏联人民的一致认可和支持。苏联政府声明，它今后也打算始终如一地奉行这一政策”[638]。

不满足于此，苏联最高领导层试图增强所提提议的重要性。5 月 17 日，利用美国总统候选人亨利·华莱士的公开信作为正式借口，现在由斯大林确认了苏联在国际关系基本问题上原有立场的不变性。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在回信中强调：“尽管存在经济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但这些制度的共存以及苏联和美国之间分歧的和平解决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毫无疑问，为了世界和平的利益，这是必要的。”[639]

然而，莫斯科的一贯且相当坚定的保证都是徒劳的。西方没有表现出哪怕是最轻微的寻求妥协的倾向。它继续采取行动，旨在最终分裂德国和欧洲。6 月 1 日结束的伦敦会议的公报就证明了这一点。该公报确认了先前商定的纯粹经济层面措施的最终确定，这些措施旨在合并德国的三个西部占领区，并且不可避免地要将其并入西方联盟。公报还确认了更严重的事情：改变德国的边界，但只是西部边界，使其对比荷卢国家有利。而根据雅尔塔会议和波茨坦会议的决定，这原本是只有在苏联必然参与的和平会议上才拥有的特权。

最后，为了实现所表达的意图，使其不可逆转，美国、英国和法国于 6 月 18 日宣布在其占领区进行货币改革。在这些占领区，当然也包括西柏林，引入新的、统一的德国货币。这迫使苏联最高领导层最终确定采取最强硬的外交政策路线，从那时起，从 6 月 23 日开始全面封锁西柏林就完全合理且不可避免了。为了加强自身立场，苏联还得到了东欧国家的一致支持。6 月 23 日，在华沙紧急召开的苏联、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这是贝尔格莱德最后一次与莫斯科站在同一阵线）、波兰、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的外长会议发表声明，以此向西方联盟和美国表明：从现在起，他们将面对的不是单独的一个苏联，而是围绕着无可争议的领导者紧密团结的东欧阵营。

冷战变成了现实，成为了确凿的事实。

第二十二章

国际舞台上如此激进的变化导致了公开的对抗，这意味着局势正迅速滑向最难以预测的境地。如今，局势取决于任何一个最微不足道的偶然因素。可能引发任何情况——从激烈的意识形态斗争，到地区冲突，甚至是第三次世界大战。正因如此，在半年内，克里姆林宫迎来了第二次权力调整。这是极为重大的变化，但同时，无论是在最高领导层的构成方面，还是在领导层内部的权力平衡方面，这些变化也变得不可避免。这首先反映了斯大林极力巩固自身地位的愿望，因为在他亲自选定的强硬路线失败的情况下，其地位正变得极其危险。这也反映了其他方面的情况。最高领导层的其他成员试图利用这些不可避免的变革来增强自身地位，获取相较于对手的优势。

个人利益与国家整体利益之间复杂、纠结且相互矛盾的交织，必然导致幕后交易以及其带来的后果——又一次的妥协。斯大林不得不在解除莫洛托夫的部分职务后，同意“战时三巨头”的另一位成员马林科夫重回联共（布）中央书记处。他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事实：格奥尔基·马克西米利安诺维奇（马林科夫）再次像两年多前那样，与他斯大林平起平坐，在国家和党内的权力机构中都占据了关键职位。还有一项重要的人事变动也很能说明问题。1948 年 7 月 1 日，中央委员会书记处通过决议，任命显然与马林科夫关系密切的 П. К. 波诺马连科为中央书记[640]。

这样一来，中央委员会中最重要的、持续发挥作用的机构——书记处，现在已经有七名成员：斯大林、日丹诺夫、库兹涅佐夫、苏斯洛夫、波波夫、马林科夫和波诺马连科。他们将不得不以一种绝非民主的方式，不通过投票，而仅仅依靠幕后阴谋、“权力机构的运作手段”来决定，重病在身的日丹诺夫是否能继续担任党内第二号人物的职位，还是会将这个位置让给库兹涅佐夫、马林科夫，或者也有可能是苏斯洛夫。这个尖锐的问题分两个阶段得到了解决。首先，十天后，在对联共（布）中央机构进行根本性重组的过程中，伴随着书记之间职责的重新分配——这在这种情况下是常见的，也导致了他们权力权限的重大变化。

根据 7 月 10 日以政治局名义通过的决定，中央委员会的三个管理部门停止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在原则上截然不同的结构，使党回到了很久以前，回到了党的十八大之前的状态——即按行业划分部门。同时，立即明确了这些部门的职能：“将按相应行业选拔干部以及检查中央委员会和政府决议的执行情况（着重号为我所加。——Ю. Ж.）视为各部门的主要任务。”

宣传鼓动管理部门变成了以 Д. Т. 谢皮洛夫为首的同名部门。党的机关检查管理部门改组为党的、工会的和共青团的机关部门，由 Б. Н. 切尔诺乌索夫负责。九年来一直未受触动、稳固且铁板一块的干部管理部门被拆分成了七个彼此毫无关联的部门。行政部门由 Е. Е. 安德列耶夫负责，该部门负责在武装力量部、国家安全部、内务部和司法部，以及检察院和整个司法系统中选拔和调配干部。还有各行业部门：重工业部门（负责人 С. Б. 扎季奥年科）、轻工业部门（负责人 Н. М. 佩戈夫）、机械制造部门（负责人 В. М. 丘拉耶夫）、交通运输部门（负责人 Т. А. 丘马琴科）、计划财政贸易部门（负责人萨佐诺夫）、农业部门（负责人 А. И. 科兹洛夫）。

这种新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旧的结构，看起来像是保守倾向的彻底胜利。就是那些曾经辜负了人们期望的保守倾向。它们未能使前两个五年计划得以全面成功实施。最终只导致了党内官僚阶层的得势——这些人文化程度不高，甚至对他们所“监管”的行业的基本特性都一无所知。从表面上看，这次机构重组也表明，自 1939 年以来马林科夫和莫洛托夫先后进行的、且不时得到斯大林支持的所有改革党、大幅限制党对经济以及整个管理体系产生的完全负面的影响的尝试，都以彻底失败告终。然而，各部门在书记之间的分配表明，7 月 10

日政治局的决定绝非偶然的不完整。更确切地说，其中有许多并非一眼就能看出的刻意安排。

日丹诺夫保留了对宣传鼓动部门的控制权。苏斯洛夫则负责在重组中丝毫未受影响的对外政策部门，只是该部门改了名称——变成了对外政治关系部门。库兹涅佐夫设法保住了对行政部门的控制权，但他还额外承担了对机械制造部门的管理工作，这绝非偶然。波诺马连科被委以对交通运输部门和计划财政贸易部门的监督职责。而马林科夫得到了那个从此将取代中央监察委员会的部门——党、工会和共青团机关部门，该部门必须每天一丝不苟地监督整个党的机构，包括中央和地方机构（当然，莫斯科市党委和州党委除外，它们仍归波波夫管理）。此外，还包括所有的部委（包括国家安全部和内务部）、委员会、总局及其下属机构、受其管辖的组织、机构和企业——通过这些单位的党组织进行监督。与此同时，格奥尔基·马克西米利安诺维奇还得负责农业部门的工作[641]。

正是这种毫无根据的职责分配，揭示了这次机构重组的真正本质。它预示着党的领导人和国家领导人这两个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不可避免。这要么会导致一种特殊的“二元统治”，要么会导致他们之间持续的紧张关系和冲突。比如在库兹涅佐夫和萨布罗夫之间，他们都对机械制造部门负责——一个通过书记处，一个通过部长会议。而萨布罗夫明显占据优势，因为库兹涅佐夫仅具有中等教育水平，无论他多么想，都无法深入了解他所负责行业的基本问题。在毕业于莫斯科交通工程师学院、虽只在相关专业工作了很短时间（仅两年）但毕竟有专业背景的波诺马连科和贝利亚之间，因交通运输问题产生了矛盾。波诺马连科和沃兹涅先斯基之间，因国家计划委员会的问题产生了矛盾。波诺马连科和克鲁季科夫之间也存在矛盾，就在 7 月 9 日，克鲁季科夫“因工作负担过重”接替了柯西金，担任苏联部长会议贸易和轻工业委员会主席团主席，并被任命为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642]。同样值得注意的是，重工业和轻工业这两个部门，长期以来一直无人监管，没有任何一位书记负责。所有这些都表明：新的结构与其说是为了改善管理体系，不如说是为了使其更加复杂和混乱。它必然会在党的机构和政府之间制造矛盾。

大约一个半月后，局势才稍微明朗了一些。当时，8 月 26 日政治局的又一项决定表明，政府确实拥有一定的自主权。政治局禁止由梅赫利斯领导、实际上直接向斯大林负责的国家监察部“在未经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团事先批准的情况下，解除职务、实施纪律处分……对各部委进行检查、没收文件”[643]。7 月 10 日政治局的决定中的一个条款也间接证明了这一点，该条款旨在再次尝试规范联共（布）中央各机构的活动。它规定恢复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每月两次，在周一举行”）和书记处会议（“每周一次，在周五举行”）的定期召开，却似乎忘记了政治局本身的存在，以及政治局更有计划地开展工作的必要性。该条款明显暗示，书记处将首先发挥主导作用。这只能解释为，在书记处的七名成员中，绝大多数（四名）都属于最高领导层。

新的权力平衡比 3 月份形成的权力平衡更加不稳定，而且持续时间非常短暂。权力调整的第一阶段就此结束。而第二阶段几乎紧接着就开始了。就在 7 月 10 日通过关于改组党的机构结构的决定的当天，日丹诺夫因健康原因，不得不在 1948 年第二次休两个月的假，而且他再也没能从这次休假中回来。正因为如此，所有意识形态工作的问题、对宣传鼓动部门的监管工作——在 8 月 31 日之前是暂时的，而在日丹诺夫去世后则是永久性的，都由马林科夫承担了起来。而且正因为如此，他再次成为了联共（布）中央第二书记。他完全恢复了自己在权力中的原有地位。当然，对于最高领导层的一些成员，尤其是库兹涅佐夫和苏斯洛夫来说，这一可能出乎他们意料的事件，之前经历了一场在性质和实施方式上都堪称经典的“权力机构运作手段”。

为了除掉在通往梦寐以求的职位道路上的主要竞争对手 А．А.日丹诺夫，马林科夫利用了在……农业领域出现的局势。而农业领域正是他所负责的范围。格奥尔基·马克西米利安诺维奇在幕后支持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院长、自学成才的业余爱好者 Т.Д.李森科，支持他与生物学界的权威进行斗争，这场斗争最终导致了不出所料的结果——国内遗传学学派在几年内被取缔。引发这场斗争的借口是一株神话般的多穗小麦，据称这是李森科通过自己的实验培育出来的。这株小麦如果不是今天，那么明天肯定能够完全保障国家的粮食供应。最终让这个在取消配给制后仍未感受到生活改善的国家的人民吃饱饭。这使得利用一场纯粹的学术讨论来诋毁 А.А.日丹诺夫成为可能，给这个重病之人以沉重的打击，而让他的儿子 Ю.А.日丹诺夫担任宣传鼓动部门科学领域负责人的这一失误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他的儿子曾对李森科那些荒诞的言论和盛行的蒙昧主义提出过尖锐但完全合理的批评。

7 月 15 日，就在 А．А.日丹诺夫前往瓦尔代治疗仅仅五天后，在他去世前的一个半月，政治局在斯大林毫不掩饰的支持下通过了一项决定，其意图毫无疑问：

“鉴于 Ю.А.日丹诺夫关于生物学问题的报告不正确，未能反映联共（布）中央的立场，接受苏联农业部、苏联国营农场部和列宁农业科学院的提议，在列宁农业科学院 7 月会议上讨论院士 Т.Д.李森科的报告《论苏联生物学的现状》，并考虑在报刊上发表该报告”[644]。

这样一来，这场“学术”讨论的走向、结果甚至后果都已预先注定。事实上，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的会议于 8 月 7 日结束，会议宣布李森科的观点是唯一正确的，从今往后不容置疑和批评。而仅仅一天之后，8 月 9 日——这明显证明了对必要的人事“安排”进行了提前准备——所有李森科的反对者都被政治局的决定免去了职务。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院长 В．С.涅姆奇诺夫被 В．Н.斯托列托夫取代。莫斯科大学和列宁格勒大学的生物系主任 С.Д.尤金采夫和 М．Е.洛巴舍娃被 И．И.普列斯滕和 Н．В.图尔宾取代，莫斯科大学达尔文主义教研室主任 И.И.施马尔豪森也被同一位普列斯滕取代。第二天，又做出了一项从本质上来说最荒谬的决定：А．Р.热布拉克被免去莫斯科大学生物系遗传学教研室主任的职务，李森科被任命为该职位的接替者[645]，而李森科曾公开指责遗传学是“资产阶级伪科学”。

8 月 25 日，苏联所有报纸都报道了生物学领域“反科学思潮的被粉碎”。9 月 1 日——报道了 А．А.日丹诺夫在重病之后的离世。不应过分夸大这两件事之间的关联，但也绝不能忽视它们之间的联系。

在 1948 年那个充满政治事件的夏天，取得成功的不仅是马林科夫，还有斯大林。他终于得到了有力的证据，证明他所选择的强硬外交政策路线是正确的，而且主要是在德国问题上的路线是正确的。

自 6 月底以来，与三个占领区隔绝的西柏林通过“空中桥梁”获得了食品和燃料供应。这一手段非常有效，尤其是在宣传方面，但成本太高，而且显然不足以满足居民的需求，更无法保证企业的不间断生产。对结果极为不满的美国、英国和法国再次一致反对昔日的盟友。6 月 7 日，它们向苏联发出了内容相同的抗议照会。在照会中，它们严厉谴责封锁是“违反现有协议”的行为，但不知为何，它们援引的是 1945 年 6 月 14 日和 16 日杜鲁门与斯大林之间的信函往来。照会强烈要求立即恢复到之前的正常状态，但同时也不排除通过“谈判或任何其他和平方式”解决分歧的可能性。当然，它们明确表示，实现这一目标的前提必须是恢复各占领区之间的交通通信功能，恢复人员和货物的自由流动。

可以肯定地说，对斯大林而言，这样的立场意味着对方表现出了软弱，因此他加大了施压力度。7 月 14 日的苏联回应照会阐述了苏联外交部惯常的论据，这些论据基于雅尔塔会

议和波茨坦会议的决定。照会指出，伦敦建议，尤其是单独的货币改革，导致了局势的恶化和加剧，使德国的局势变得不稳定。照会中还包含了一个不太明显的新威胁——声明莫斯科准备用自己的力量为整个“大柏林”提供充足的供应。同时，照会也表达了对和平解决冲突的意愿。照会指出：“苏联政府不反对谈判……但不能将这些谈判的开始与满足任何先决条件联系起来，并且，第二，四方谈判只有在不局限于柏林管理问题的情况下才可能产生效果，因为这个问题无法与对德国实行四方控制的总体问题分开”[646]。

为了加强自己的决心，莫斯科几乎立即宣布从 7 月 25 日起在苏联占领区进行货币改革。

西方国家不得不接受失败的现实。8 月 2 日深夜，应美国大使史密斯、英国大使罗伯逊和法国大使沙特奈的请求，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接见了他们。在听取了他们对西柏林封锁的不满后，斯大林毫不掩饰自己言论的老调重弹，阐述了苏联的立场，而这一立场早已在一份照会中详细说明，并已传达给华盛顿、伦敦和巴黎。他特别指出：“在取消苏联政府军事管理部门实施的交通限制措施的同时，应取消三国在柏林引入的特殊货币——‘B’马克，并以在苏联占领区流通的货币，即‘东德马克’取而代之。这是第一点。第二，必须保证在四大国代表会面并就涉及德国的所有主要问题达成一致之前，推迟执行伦敦会议的决定。美国、英国和法国政府计划于 9 月 1 日在德国成立议会委员会，从而建立西德政府。如果他们这样做了，那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接着，他以自己惯用的清晰方式表达了对事件可能发展的看法：“如果盟友们能够为德国建立一个统一的政府，那么所有问题都将得到解决。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么东德和西德将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这样，他公开警告对手：如果西方继续采取单独行动，苏联将不得不采取类似措施，在苏联占领区建立另一个德国国家。

华盛顿、伦敦和巴黎得知 8 月 2 日会谈的内容后，最终接受了斯大林的提议。他们同意在莫斯科继续谈判，试图找到妥协方案，解决积累的问题。而且，似乎事情终于有了进展。8 月 28 日，各方就一份共同文件的文本达成了一致，两天后，该文件被批准为“苏联、美国、英国和法国政府给驻德占领军四位最高指挥官的指令”。该指令规定解除对西柏林的封锁，并将苏联占领区的货币作为大柏林唯一的支付手段。指令要求“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采取必要的详细措施来执行这些决定，并在不迟于 9 月 7 日向贵国政府报告你们的讨论结果，包括这些措施……能够实施的确切日期”[648]。

取得了无疑的成功后，斯大林急忙利用这一成果，首先是为了加强自己在最高领导层中的地位。恢复领导层原有的权力平衡，确保自己拥有明显的多数优势。为此，他在 9 月 1 日促成了 A.H.柯西金从政治局候补委员转为正式委员。这一决定还伴随着另一个更重要的条款：“将 A.H.柯西金同志增补进九人小组”[649]。斯大林做得非常及时。第二天就发现，莫斯科与华盛顿、伦敦、巴黎的立场接近只是虚幻的表象。这只是后者的一种战术举措，他们从未放弃自己的长期计划。尽管斯大林一再坚持警告说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德国分裂的后果，但 9 月 1 日，如先前宣布的那样，在波恩成立了议会委员会。在康拉德·阿登纳的主持下，该委员会开始为三个占领区制定宪法。但关键是，不久之后，西方占领军的最高指挥官在与索科洛夫斯基讨论赋予他们的“指令”所规定的措施时，出乎苏联方面意料的是，他们再次像之前他们的政府一样，坚持首先解除封锁，只有在此之后才准备就改变大柏林的货币体系达成一致。

9 月 14 日美国、英国和法国的那份值得铭记的照会，证实了双方关系的再度紧张。这份照会不仅确认了在解决柏林问题上存在着截然不同的观点，而且增加了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的概率。照会提出了新的要求，而这些要求显然是苏联无法接受的。特别是，它要求扩大四方金融委员会的权力，该委员会原本只是为了在柏林引入东部货币而设立的。要求将其转变为一个监管只在苏联占领区运营的德国发行银行的机构。

尽管面临明显的反对，莫斯科仍试图达成总体协议。恢复了谈判，莫洛托夫和三国大使参与了谈判，但这次谈判以彻底失败告终。9 月 22 日，美国的又一份照会确认，继续谈判毫无意义，因此通知将该问题提交联合国审议。此后，苏联外交为达成仅有的一个目标——同时解除封锁并引入东部货币——所做的所有后续努力，均未取得成功。10 月 25 日，联合国安理会甚至否决了苏联代表提出的包含同样解决危机方案的决议草案。

巴勒斯坦的局势同样起伏不定——从充满希望到彻底失望，最初它似乎有望在中东实现战略突破。

1948 年 5 月 14 日，英国驻巴勒斯坦高级专员艾伦·坎宁安宣布结束英国的委任统治。同一天，宣布成立独立的以色列国，组建了以大卫·本-古里安为首的临时政府。来自白俄罗斯城市平斯克的哈伊姆·魏茨曼被宣布为临时总统，他自 1929 年起领导犹太事务局。同一天，埃及、外约旦、伊拉克、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军队越过巴勒斯坦边界，对犹太部队展开军事行动。5 月 15 日，苏联在法律上承认了这个新国家，美国则事实上承认了它。

“在随后的二十五年里，苏联对我们的态度发生了多么巨大的变化啊，”果尔达·梅厄回忆道，“但我无法忘记当时呈现在我眼前的情景。谁知道呢，如果不是我们能够在战争初期的黑暗日子里，从捷克斯洛伐克购买武器和弹药，并通过南斯拉夫和其他巴尔干国家运送到以色列，我们是否能够坚持下来呢？直到 1948 年 6 月局势才有所改变。在战争的头六个星期里，我们非常依赖哈加纳从东欧购买的弹药、机枪和子弹，而当时就连美国都宣布对中东实施武器禁运，当然，我们依靠的不仅仅是这些。”[650]

在苏联提供的武器弹药的支持下，以色列不仅抵挡住了阿拉伯军队的首次进攻，还立即在三个前线地区发起了反击：加利利、犹地亚和耶路撒冷。四周的战斗展示了以色列国防军——以色列正规军的巨大优势，以至于联合国安理会担心武装冲突会超出巴勒斯坦的范围，要求立即停火。让联合国调解人福尔克·贝纳多特伯爵有机会开始在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正式划分领土，建立耶路撒冷非军事区。

与此同时，由一群美国飞行员和机械师执行的从捷克斯洛伐克向以色列运送武器的行动达到了顶峰。美国驻布拉格的代表试图制止他们本国公民的非法活动。他们召见了这些人并警告说，如果继续这种活动，他们的护照将被没收，他们驾驶的飞机将在没有任何警告的情况下被击落[651]。然而，这一强硬举措只是导致秘密行动基地从布拉格转移到了布尔诺。布尔诺是著名的“斯柯达”武器工厂的所在地。

一个月后，即 1948 年 8 月，中央情报局局长希伦科特不得不向杜鲁门发送一份新的备忘录。备忘录指出，捷克斯洛伐克已成为“一个广泛的地下组织开展秘密空中运输军事物资到巴勒斯坦行动的主要基地”。不仅武器走私的规模巨大构成了威胁，而且这种走私是在当地捷克当局的默许和秘密警察的直接参与下进行的[652]。

在 2 月的“事件”之后，当哥特瓦尔德取代贝奈斯担任总统，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实际上只由一个政党——共产党代表时，华盛顿毫不怀疑布拉格是在执行谁的意志。但希伦科特的担忧不仅仅源于此。更让他担忧的是其他事情。部分武器是从西欧国家，包括英国，甚至从美国运到捷克斯洛伐克的。而这一切都是在墨西哥总统米格尔·阿莱曼的斡旋下，在虚构的“巴拿马联合航空公司”的掩护下进行的。中央情报局还掌握其他各类情报。例如，在捷克城市奥洛穆茨、大施特伯涅、利贝雷茨、捷克布杰约维采，大约有四千人正在接受训练，这些人是在东欧国家、英国、美国被招募加入以色列军队的。而招募美国人并将他们送到布拉格的工作是由总部位于纽约的犹太慈善组织“联合”负责的。

如果说希伦科特不得不只是向总统通报违反美国法律和联合国关于巴勒斯坦和平协议的事实，那么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则采取了行动。他批准向捷克斯洛伐克外交部递交美国的抗议

照会。此外，他还将所有情况告知了贝纳多特，从而也告知了联合国。因此，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不得不对机密信息的泄露迅速做出反应。两周后，弗拉迪米尔·克莱门蒂斯在 2 月取代马萨里克担任外交部长一职，他告知美国大使：照会中提到的所有美国人都已离开了捷克斯洛伐克的领土。但当然，他只字未提秘密行动仍在以同样的规模继续进行。只是现在行动不再从布尔诺开始，而是从布拉迪斯拉发附近的一个小城市开始。在那里肯定不会有外人或过于好奇的人。

与此同时，苏联阵营对以色列的支持，向其提供军事援助的规模变得如此之大，以至于相关信息不再像以前那样保密。这些情况变得理所当然、司空见惯，因此不知不觉地超出了以往规则的约束范围。甚至开始渗透到联共（布）中央内部流通的文件内容中。例如，在对外政策部门定期编写的一份报告中，即最年轻的职位较低的近东分部工作人员 П.米洛格拉多夫，在 1948 年 7 月 16 日带着困惑和不满指出：

“在巴勒斯坦目前的局势下，以色列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承担起了以色列政府在运送武器和在国外为犹太军队招募志愿者方面的代理角色。为了实现这些目标，以色列共产党书记 С.米库尼斯同志前往各人民民主国家，试图在那里获得受过军事训练的人员和武器方面的帮助。”[653]

米洛格拉多夫没有考虑到一个最重要的因素。这些行动无疑意味着，根据相关规则，米库尼斯进行谈判绝不是出于个人主动，而是仅仅与东欧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相应部门的工作人员进行谈判。他迫使他们与在党的和国家的机构中工作的同事进行谈判。因此，随着米库尼斯每次新的出国访问，知晓秘密行动的人员范围不可避免地扩大了。这导致了各种谣言的传播，在这些谣言中，虚构的内容与事实相互叠加，混淆在一起。

以色列领导层引人注目的行为也助长了这种情况，他们公然无视公众舆论。他们的行为相当模棱两可，因为就在那时，两大阵营——对西柏林的封锁标志着东西方两大阵营的首次公开对抗开始了。

8 月 22 日，“莱希”组织（“斯特恩”集团，长期以来一直被西方怀疑与莫斯科关系密切）的武装分子绑架了美国驻耶路撒冷总领事馆的高级密码员杰弗里·帕罗。他们将他拘留了近一天，不断进行审讯，然后又像绑架时一样突然释放了他。更确切地说，是将他交给了以色列警方。然而，就像 5 月底美国驻耶路撒冷总领事托马斯·沃森被一名身份不明的狙击手暗杀时一样，美国国务院不得不保持沉默。对这一极其恶劣、明显不友好的行为没有做出任何反应。因为它不想恶化与特拉维夫的关系，而当时两国关系已经处于非常糟糕的时期。

9 月 17 日，同一个“莱希”组织的成员在耶路撒冷的犹太区暗杀了联合国调解人福尔克·贝纳多特。以色列政府装作开始搜捕恐怖分子。甚至逮捕了几个人，这些人显然与这起罪行没有直接关系。与此同时，捷克斯洛伐克驻耶路撒冷和海法的领事馆工作到深夜。他们紧急为三十名“莱希”组织成员办理签证。很可能是为那些与暗杀贝纳多特的准备和实施直接相关的人办理的。8 月 18 日和 19 日，他们都飞往布拉格，从此踪迹全无。

10 月底，以色列人在海法炮击了美国驱逐舰“麦肯齐”号，11 月 13 日又炮击了美国船只“盖纳德”号。乔治·马歇尔再次不得不咽下这口恶气。对所发生的事情视而不见，尽管他和他在政府中的同事福雷斯特尔都从美国总领事那里详细了解了所有情况。

与此同时，以色列成功进行的争取独立的战争接近尾声。10 月 14 日，以色列国防军违反了联合国规定的第三次停火协议，发起了新一轮进攻。开始消灭围困在法卢贾地区的埃及军队。现在已经毫无疑问，阿拉伯军队将被彻底击败。也不可能再谈论联合国的调解计划能够实现，该计划设想建立一个包括内盖夫的巴勒斯坦阿拉伯国家，并使完全被犹太力量控制

的耶路撒冷实现非军事化。利用因苏联支持而积累的军事力量，以色列能够将自己的和平条件强加给邻国和整个国际社会。

直到这时，特拉维夫才能够允许自己停止军事行动，满足联合国的要求，并等待：如果杜鲁门再次当选，他是否会履行他很久以前的承诺。是否会在法律上承认以色列，是否会通过进出口银行为其提供 1.35 亿美元的长期贷款。是否会在实践中落实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竞选纲领中的条款，该条款规定承认以色列自行确定的边界，完全从自身利益出发。

1948 年 11 月 7 日再次当选美国总统的哈里·杜鲁门，在他的首次演讲中就证实了他愿意继续他以前对以色列的政策。支持以色列的所有愿望。

苏联领导层面临着重新评估中东局势的紧迫必要性。要预见到这样一种情况，即以色列可能会改变其立场。同时，克里姆林宫应该重新审视外交政策 doctrine（学说），或者根据苏联和美国在世界另一个地区可能出现的利益冲突和战略计划对其进行调整。而做这些并不特别困难。美国总统亲以色列的立场，尽管遭到他的政府一些成员的反对，但对莫斯科来说并不是秘密。还有很多其他事情也是已知的。

1948 年 1 月，犹太反法西斯委员会（ЕАК）的责任秘书 И.费弗尔根据与保加利亚犹太代表团的谈判内容，向联共（布）中央的上级汇报说：“‘联合’组织采用了美国反动分子的言辞，而且‘联合’组织（对以色列。——Ю.Ж.）的援助计划与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非常相似。”[654]莫斯科也知道“联合”组织领导人亨利·摩根索在总统选举前夕，即 10 月 31 日，在《联合组织通讯》上发表的极有意义、非常能说明问题的声明：“在地中海沿岸的所有民族中，只有犹太人能够建立起一个坚固的防御中心，以抵御共产主义的传播。”[655]

而且在此之前，就在同年，即 1948 年夏天，在向特拉维夫大量供应武器的时期，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门应该非常关注特拉维夫共产主义报纸《科尔·加姆》的一位评论员所表达的观点，这一观点已为该部门所知。评论员正式写道：“以色列在国际政治斗争中不能依附于任何一方，但实际上它是美国帝国主义推行政策的盾牌……美国人实际上已经开始控制这个年轻的国家。”[656]

很有可能，正是对与以色列政府的密切关系的不稳定性和暂时性的清晰认识，迫使苏联最高领导层避免对作为冲突一方的以色列给予直接的政治支持。毫无疑问，这就是为什么禁止苏联公民中的犹太人发表致犹太反法西斯委员会的声明，这些声明表达了前往以色列捍卫其自由和独立的意愿。武器和弹药的供应、在不是苏联而是捷克斯洛伐克的领土上为犹太军队招募和训练志愿者。捷克斯洛伐克在 1948 年 3 月之前可以被认为是一个尚未完全加入东欧、苏联阵营的国家。

直到 1948 年 11 月 7 日杜鲁门再次当选，以及他关于对以色列态度的声明，才最终促使苏联最高领导层放弃平衡政策，采取更明确的立场。11 月 20 日，不久后本应派代表团前往特拉维夫与以色列犹太居民建立直接联系的犹太反法西斯委员会被解散。当天政治局通过的决定称：“批准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团的以下决定：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团责成苏联国家安全部立即解散犹太反法西斯委员会，因为事实表明，该委员会是反苏宣传的中心，并且定期向外国情报机构提供反苏信息。据此，关闭该委员会的出版机构，没收其文件。目前暂不逮捕任何人。”[657]然而，该决定仍然被列为机密。这样就保留了重新考虑该决定并回到先前立场的可能性。

指责犹太反法西斯委员会与国外情报组织合作并非偶然。因为这不仅为没收和清理该委员会的档案提供了非常便利的依据，在档案中可以找出任何与秘密行动有关的内容，证实这些行动是由苏联组织的。这在将来如果有极端必要的话，还可以除掉那些与向以色列供应武

器有关的人。出于同样的原因，很可能就在那些日子里，但事实证明只是暂时的，所有从捷克斯洛伐克进行的非法武器走私行动都停止了。就在那时，美国国务院和军事情报部门开始收到有关苏联与以色列关系恶化、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的犹太社会和文化组织被解散以及其领导人被捕的消息。

然而，苏联最高领导层尚未做出决定性的决裂。12 月，由总理 А.扎波托茨基、财政部长 Я.多兰斯基、工业部长 А.克利门特、外交部长 В.克莱门蒂斯组成的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代表团访问了莫斯科。在斯大林、莫洛托夫和米高扬参与的短暂谈判之后，代表团回国，随后向以色列供应武器的行动立即恢复。更确切地说，这些行动开始平静而有序地结束。所有在捷克斯洛伐克接受过军事训练的以色列军人，即所谓的“哥特瓦尔德旅”，带着武器，而且不仅仅是个人武器，有组织地飞往特拉维夫。就在那时，犹太人方面送给苏联一份礼物，这实际上是一份告别礼物。他们在美国缴获了最新的、秘密的移动早期预警雷达，并将其运到了布拉格。

直到 1949 年 2 月初，苏联领导层才最终停止了武器走私行动。只有在那时，即 1 月 24 日，在美国总统就职典礼（恰逢以色列议会选举前夕）之后，美国在法律上承认了本-古里安政府，杜鲁门签署了向以色列提供承诺的数百万美元长期贷款的法案。

就在 1 月的那些日子里，在莫斯科，对那些真正在犹太反法西斯委员会工作而不仅仅是挂名的成员的逮捕仍在继续（或者更确切地说，开始了）。这些人很可能被莫洛托夫、苏联外交部情报部门——信息委员会所利用。在犹太反法西斯委员会领导人 И.费弗尔、他的副手、前苏联驻旧金山领事、参与原子间谍活动的 Г.海费茨之后，前苏联新闻局局长 С.А.洛佐夫斯基以及 Л.克维特科、П.马尔基什、Б.希梅利维奇等人也相继被捕。可能在被捕者中也有那些不知道自己无意中卷入了什么事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偶然知晓此事的人。而对于犹太反法西斯委员会的“婚礼将军”们——作家 В.格罗斯曼、И.爱伦堡、诗人 С.马尔沙克、钢琴家 Э.吉列尔斯、Я.弗莱尔、建筑师 Б.约凡、作曲家 А.克赖恩、雕塑家 П.萨布萨、П.柴可夫、导演 А.泰罗夫、戏剧画家 И.拉比诺维奇、А.季什勒、电影导演 Ф.艾尔姆列尔、《真理报》的常任撰稿人 Д.扎斯拉夫斯基、《鳄鱼》杂志的讽刺作家 Г.雷克林以及许多其他不太知名或完全不知名的人的命运来说，犹太反法西斯委员会的解散几乎没有产生什么影响。

然而，仅仅解散犹太反法西斯委员会并不能限制苏联对中东政策的重大重新审视。这一重新审视必然会涉及到更高层面。而且确实很快就涉及到了。这成为了克里姆林宫又一次、也是最为重要的一次权力调整的契机。

第四部分、1949—1954 年的权力之争

战胜纳粹德国已经过去三年半了。然而，生活提出的那些最紧迫、最关键的任务，苏联最高领导层几乎一项都没能解决，尽管这些任务的提出并非毫无根据。

那些曾两次（从西向东，又从东向西）遭受残酷无情战火肆虐的地区的城市和乡村，仍未从废墟中重建起来。它们依然一片荒芜，尽管用于重建的时间几乎已经耗尽。劳动力和仅有的一些资源，首先且主要被投入到工业的恢复中。但即便在工业领域，进展也远非出色。直到 1948 年底，明斯克和哈尔科夫的拖拉机厂、罗斯托夫和哈尔科夫的联合收割机厂，才得以开始生产农业急需的产品。与此同时，苏联欧洲部分最大的水电站——第聂伯河水电站、亚速和马凯耶夫冶金联合企业、克里沃罗格矿区的企业，以及部分顿巴斯煤矿的恢复工作也宣告完成。

在一定程度上，那些明显的失误、不足和失败，被一些引人注目的成果所弥补，这些成果不仅可以作为已经取得成就的有力证明，还能起到宣传作用。1947 年，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德国的战争赔偿以及从德国运出的工业设备，莫斯科、高尔基和雅罗斯拉夫尔开始大规模生产“З и С-154”和“З и С-155”型公共汽车；“莫斯科人”“胜利”“З и М”“З и С-110”型轿车；“З и С-150”“З и С-151”型卡车；“ГАЗ-63”“ЯАЗ-200”“ЯАЗ-210”型汽车，而在明斯克的新汽车厂开始生产“МАЗ-2”型汽车。1946 年底，开始批量生产“伊尔-62”型客机成为可能，两年后又开始生产多用途的“安-2”型飞机，这重振了民用航空业。

恢复国民经济五年计划未能顺利完成（该计划还包括在恢复之后立即实现国民经济的提升），其背后的原因在于对国际形势的评估和应对方式。苏联不接受美国对核武器的垄断，承认冷战的规则及其必然伴随的军备竞赛。所有这些都迫使苏联最高领导层将国家经济潜力的几乎所有可能性，主要集中在两个方向上。而这两个方向对于政权而言成为了首要任务，其他所有事务都不得不推迟到更合适的时候。

首先是核武器方面：包括阿尔扎马斯附近的萨罗夫、车里雅宾斯克附近的工业核中心的工作；莫斯科和苏呼米的科研工作；塞米巴拉金斯克附近核试验场的建设。其次是所有那些让莫洛托夫在 1947 年 11 月 6 日能够震惊世界的事情。在庆祝十月革命 30 周年的莫斯科苏维埃庄严会议上，莫洛托夫公开宣称：“众所周知，在美国的扩张主义圈子里，出现了一种新的奇特‘宗教’：对自身内部力量缺乏信心，却迷信原子弹的秘密，尽管这个秘密早已不复存在。”

无论苏联愿不愿意，都不得不将经济资源集中在另一个同样重要的方向上。即制造核武器的运载工具。从长远来看是火箭，从近期来看是远程轰炸机。四引擎的“图-4”轰炸机，实际上是美国“B-29”轰炸机的精确仿制品。喷气式的“图-12”轰炸机于 1947 年夏天首次试飞，“图-14”轰炸机也在同年年底进行了试验。

在苏联最高领导层看来，只有实现对等，只有建立起自己的核盾牌，才能与美国平等对话。才能维护苏联的国家利益，保障其在当下和未来的安全。而在此之前，这却导致了那些对民众而言更为紧迫的任务，如大幅增加食品生产、扩大消费品生产、建设住房等，一次又一次地被推迟。这迫使国家将巨额资金投入到国防中。仅维持武装力量的开支（而且是公开的，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确定），1946 年占国家预算支出部分的 22.8%，1947 年为 15.8%，但到了 1948 年就达到了 17.5%，而 1949 年的计划支出则更高，达到了 19.1%。用于内务部及其所属部队的支出略少一些。最后，那些在不同程度上为国防服务的部委也需要大量资金。与此同时，从 1946 年到 1949 年，仅建造海军舰队的支出就几乎增加了一倍。

苏联的国内局势也因波罗的海沿岸各共和国以及乌克兰西部地区分离主义分子的武装抵抗仍未被彻底粉碎而变得更加严峻。这些公然反苏的地下运动，自 1947 年秋天美国国会通过《国家安全法》并据此成立中央情报局后，几乎得到了美国的公开支持。在物质上，美国为他们提供武器、无线电设备和资金。在精神上，通过“美国之音”和“自由欧洲”电台用爱沙尼亚语、拉脱维亚语、立陶宛语和乌克兰语广播，承诺很快就会爆发一场战争，而且不是冷战，而是西方与苏联之间真正的热战。

这种情况直接反映在“莫斯科”（中央）与各地区的关系上，导致各地区的地位得到加强。作为一种宣传性的应对措施，至少在口头上，不得不维护联邦制，这损害了早已成熟的中央集权主义，同时保留各加盟共和国“独立自主”的所有外在特征。加强各共和国政府在管理其辖区内经济方面的作用，在实际上促进民族语言和文化的发展。反过来，这种政策又迫使党增强自身的力量，增强其地方组织的力量，将其作为主要的制衡力量，以遏制日益增长的离心倾向。总体而言，党开始缓慢但不可阻挡地恢复其先前的地位、权力以及相当广泛的职权。并且重新唤起了似乎早已被人们遗忘的向共产主义社会迈进的理念。制定了“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纲领，但这一次不是短期的，而是着眼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

苏联的外交政策也遭遇了严重的失败。更确切地说，是 1948 年夏天最终确定的强硬外交路线遭遇了失败。这条路线未能让苏联夺回在短短两年内失去的任何一个阵地。

苏联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即对它来说至关重要的德国问题仍未得到解决。与被击败的对手签署和平条约是否会发生，如果会，那么何时以及在什么条件下签署，这些仍然不得而知。因此，苏联与波兰的西部边界、将东普鲁士北部（未来的加里宁格勒州）纳入苏联版图等问题，仍未得到国际社会的确认。对西柏林的封锁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绝望的行动，它并没有加速苏联与美国、英国和法国就与德国签署和平条约的条件和期限达成协议。这一行动只是加剧了对抗，使其变得更加明显和确定。

苏联不得不接受朝鲜的分裂。在苏联占领军撤出朝鲜半岛的前半年，于 1948 年夏天建立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仅仅是为了防止美国在苏联的另一段边境（远东边境）附近建立军事存在，这种情况极有可能发生。而在冷战开始后，由于美国在日本驻军，远东地区本就已经成为高度紧张的地区。

苏联还不得不接受其军队于 1946 年春天被迫撤出伊朗的事实，尽管英国军队几乎是在一年之后才撤离的。同时，苏联也不得不接受美国向伊朗提供 2500 万美元贷款用于重新武装的情况。换句话说，就是美国成功地将其影响力范围扩展到了土耳其以东，沿着苏联相当长一段边境地区。

苏联还不得不接受一个更具侮辱性的事实，即实际上被排除在大国行列之外。在解决意大利在非洲的殖民地（昔兰尼加、的黎波里塔尼亚和费赞（未来的利比亚）、厄立特里亚和索马里）的归属问题上，苏联没有参与。这公然无视了苏联作为战胜国的合法权利，而就在仅仅两年多以前，苏联还是世界事务的主导者之一。

苏联也不得不接受在巴勒斯坦的争斗中失败的事实，起初在那里一切看起来是那么可靠、乐观且充满希望。从 1947 年夏天开始，胜利似乎就不可避免了，当时几乎全世界的犹太组织，包括美国的犹太组织，都热烈地欢迎并赞扬了 A．A．葛罗米柯在联合国大会全体会议上的发言。他在 6 月 15 日发表的那些充满感情、感人至深的话语：

“大量在欧洲幸存下来的犹太居民失去了他们的家园、亲人以及生存的手段。数十万犹太人在欧洲各国流浪，寻找生存的途径，寻找避难之所。他们中的大部分人生活在难民集中营里，仍然在遭受着巨大的苦难……现在是时候不仅仅在口头上，而是在行动上帮助这些人了。有必要关心这个在希特勒德国发动的战争中遭受沉重苦难的民族的迫切需求……没有一

个西欧国家能够保护犹太民族的基本权利，使其免受法西斯暴徒的暴力侵害，这一事实解释了犹太人渴望建立自己国家的愿望。忽视这一点并否认犹太民族实现这一愿望的权利是不公平的。否认犹太民族的这一权利是无法自圆其说的……”

一年半后，苏联最高领导层在坚信即将在中东取得胜利，同时又在西柏林遭遇失败的情况下，仍然公开支持已经成为现实的犹太国家——以色列的立场。1948 年 11 月 15 日，苏联代表 Я．А．马利克在联合国安理会坚定地要求立即在巴勒斯坦达成永久停火协议，同时允许以色列军队继续驻扎在内盖夫地区，而根据联合国的计划，内盖夫应成为阿拉伯巴勒斯坦的一部分。嗯，而苏联如此强硬立场的原因，早在 9 月 21 日，伊利亚·爱伦堡就以自己的名义，看似表达个人观点的方式阐述了出来。在当天《真理报》发表的文章《关于一封信》中，他毫不含糊地向特拉维夫建议：“社会主义社会的公民将任何一个资产阶级国家的人民，包括以色列国家的人民，都视为尚未走出黑暗森林的旅伴……各国犹太劳动者的命运与进步的命运、社会主义的命运息息相关。”这样，爱伦堡以一种通俗易懂的方式解释了莫斯科对特拉维夫的期望。再没有比这更明确的了，尽管带有一种形象化的诉求，但苏联领导层的观点，其明显希望将以色列视为可靠的伙伴、朋友，甚至可能是盟友的愿望，已经表达得不能再清楚了。

然而，不久之后，出现了另一种同样明确，但与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的局势相符合的评估。在政治局关于解散犹太反法西斯委员会的决定仍然是绝密的情况下，不到一个月后，终于出现了这样一份声明，应该将其视为克里姆林宫在这个问题上全新的、完全官方立场的非正式表达。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像在广岛和长崎上空原子弹爆炸后那样，他们利用了“独立”杂志《新时代》。

在 1948 年倒数第二期，即 12 月 15 日的第 51 期上，发表了一篇社论（这强调并增强了其重要性），标题极具当时苏联媒体的特色——《借他人之口》。通过这篇社论，告知读者：在以色列“出现了一些圈子和新闻机构，对苏联采取了明显不友好的立场”。像往常一样，文章列举了一系列“恶意诽谤的谎言”来证实这一论点——关于苏联境内犹太人的处境，以及以色列驻莫斯科使团工作的困难。接着，带着完全合理、自然的愤怒，文章指出“反动报纸……大力强调美国代表团在联合国讨论巴勒斯坦局势时的‘重要地位’”。并得出了明确的结论：“为了损害犹太民族的利益，他们（以色列报纸。——Ю．Ж．）执行美国垄断集团的命令，这些垄断集团试图在巴勒斯坦冲突的火中谋取私利。”

《新时代》文章所分析的以色列报纸的名字并未提及，因为问题当然不在于这些报纸本身。这家莫斯科杂志试图展示并让人们知道其他事情。它表明苏联领导层意识到，特拉维夫在没有任何预警和解释的情况下改变了其外交政策路线。从那时起，以色列打算追随华盛顿，迅速与美国靠拢，这损害了克里姆林宫的长远计划和打算。

很有可能，苏联外交遭遇的又一次失败很快就会被遗忘。就像黑海海峡问题、伊朗问题和西柏林问题一样被人们遗忘。毕竟，没有人喜欢回忆失败……但这一次，一个纯粹的偶然事件打破了惯常的事态发展，彻底改变了一切。而这个偶然事件恰好发生在 1948 年 12 月，发生在剧作家和戏剧评论家之间的一场争吵。这场因极其罕见的情况而引发的丑闻——联共（布）中央同一个部门（宣传鼓动部门）的两个分支在工作上的不一致。这场鲜为人知的冲突，仅仅因为与苏联在中东博弈中的失败在时间上的偶然重合，给随后四年国家生活中的太多事件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同时，它也为一场更为严重、真正意义重大的事件——苏联最高领导层内部为争夺领导权的激烈争斗，提供了可靠的掩护。

第二十三章

这一切都始于联共（布）中央机关里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情。11 月 16 日（在政治局就犹太反法西斯委员会的命运做出决定的前四天），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第一书记 Н．А．米哈伊洛夫给马林科夫写了一份报告。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大概是预见到了自己职业生涯的新高峰，决定在一个对他来说不寻常的领域——文化领域展现自己。他首先关注到了他认为正困扰着全国剧院的危机。

“我们认为有必要向您汇报，”米哈伊洛夫写道，“苏联剧院工作中存在的重大缺陷……为了说明剧院目前的状况，我们仅列举一些数据。全国范围内，剧院的上座率不超过 50%至 55%。大多数剧院都没有完成演出计划。高尔基歌剧芭蕾舞剧院的上座率为 39.7%，莫洛托夫剧院为 50.7%，哈尔科夫话剧院为 32%，亚美尼亚的斯彭季亚罗夫剧院为 27%。今年上半年，全国的剧院欠国家大约 1 亿卢布。”

这位共青团的领导人不仅指出了剧院不容乐观的状况，还试图解释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他指出：“年轻人常常抱怨，剧院里优秀的苏联剧本太少。战后生活以及苏联人民斗争的主题在剧本中几乎没有得到体现……苏联部长会议艺术事务委员会没有很好地执行联共（布）中央《关于剧目》的决议。该委员会没有制定出一个良好且积极的计划来落实联共（布）中央的这一决议，而是采取了一些治标不治本的措施。艺术事务委员会没有为执行联共（布）中央的指示进行真正的斗争，也没有根据新的要求对工作进行深入的调整。”

米哈伊洛夫自然也提出了他对解决这个问题的看法。在首要措施中包括：“筹备并召开关于苏联戏剧创作问题的全苏会议。此次会议的组织者可以是苏联作家协会和全苏艺术事务委员会。会议应该听取法捷耶夫和列别杰夫关于苏联戏剧艺术任务的报告，并制定措施，以确保苏联戏剧艺术的显著提升。”[658]

第二天，这份文件就到了负责中央宣传鼓动部的 Д．Т．谢皮洛夫手中，马林科夫还附上了一条明确且要求立即做出回应的批示：“请对此事进行调查。提交相关建议。提交至书记处。”很快就收到了一个相当含糊其辞的回复，因此这个回复不是谢皮洛夫本人签署的，而是由他的副手 А．Н．库兹涅佐夫和艺术部门负责人 Б．С．留里科夫签署的：“本部门目前正在准备一份关于联共（布）中央关于戏剧剧院剧目决议执行情况的报告，在准备过程中，将考虑米哈伊洛夫同志的建议。”[659]随后，事件迅速发展，朝着不可避免的方向推进。

从留里科夫 1949 年 2 月 14 日给谢皮洛夫的解释性报告中可以了解到：

“去年 11 月，艺术部门决定邀请一批评论家来准备有关戏剧创作和剧院状况的材料，这与计划提交的一份关于 1946 年 8 月 26 日联共（布）中央关于戏剧剧院剧目决议后的剧目状况的报告，以及计划在苏联作家协会理事会第 12 次全体会议上的发言有关。11 月 27 日，扎列斯基、卡拉什尼科夫、鲁德尼茨基、博尔沙戈夫斯基、博亚季耶夫、克龙、尤佐夫斯基、古尔维奇等人被召集到宣传鼓动部，普罗科菲耶夫同志（艺术部门副主任。——Ю．Ж．）本应给他们布置任务——思考并就各个问题向部门提出意见。评论家们被分成小组，按不同部分开展工作：关于剧目方面的有卡拉什尼科夫、克龙、古尔维奇、马柳金、博尔沙戈夫斯基；关于剧院方面的有扎列斯基、瓦尔沙夫斯基、博亚季耶夫；关于评论方面的有阿尔特曼、尤佐夫斯基、罗斯托茨基、马茨金。

11 月 28 日的会议我因生病没有参加。普罗科菲耶夫同志通过电话告诉我，这次会议的召集得到了您的批准，而且工作安排和参会人员名单也与 А．Н．库兹涅佐夫同志协商过。

从会议记录来看，普罗科菲耶夫犯了一个错误，他告诉评论家们，他们被邀请来是为联共（布）中央准备材料的，并且没有阻止会议上个别与会者从与苏联艺术相悖的立场上发言。

1948 年 12 月 4 日，上述评论家带着他们准备好的材料来到了部门。当天，我和普罗科菲耶夫同志以及皮萨列夫同志（部门巡视员。——Ю.Ж.）接待了这个小组。В.扎列斯基宣读了关于剧院工作的部分，大家对这部分进行了讨论，与会者提出了自己的意见，然后И.阿尔特曼宣读了关于评论的部分，这部分也在会议上进行了讨论。12 月 6 日，以同样的方式讨论了卡拉什尼科夫关于戏剧创作的部分。

在对材料进行第二次讨论后，我把普罗科菲耶夫同志和皮萨列夫同志叫了过来，告诉他们，这些会议给我留下了很不好的印象，因为与会者不理解也不了解这个问题，而且我们应该不再依赖任何评论家，亲自对戏剧创作、剧院工作和评论方面的数据进行分析。在这之后，普罗科菲耶夫同志和皮萨列夫同志在一些文学部门工作人员的协助下，准备了他们对材料的修订版。您认为这个版本不尽人意。然后，我根据您的指示，重新整理了关于戏剧创作状况的材料。您认为这份材料在主要方面是可以接受的。这份材料的核心思想是关于戏剧创作者面临的积极任务：展现新的人物、新的社会关系以及布尔什维克党在建设共产主义中的作用。

召集评论家的第一次会议上那些不必要的泛泛而谈，以及随后对评论家们提交的材料的讨论，都是部门的严重错误。”[660]

Б.С.留里科夫，从教育背景来看是一名俄罗斯文学教师——1932 年他毕业于高尔基师范学院历史语文系，长期在出版界工作。直到 1946 年，他才被调入纯粹的党内工作——进入联共（布）中央机关。起初是担任巡视员，1948 年年中被任命为部门负责人。所以留里科夫非常清楚：很可能正是他这个“新手”肯定会被认定为责任人，因此他坦然接受了这一不可避免的结果——完全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在解释中，他只字未提与他直接无关的事情。而那些属于苏联部长会议艺术事务委员会主席 П.С.列别杰夫职责范围内的事情：关于全苏戏剧协会（ВТО）的会议，以及很快成为即将爆发的冲突的催化剂的事情，他没有提及。

П.С.列别杰夫——致马林科夫，1949 年 1 月 25 日：

“苏联作家协会戏剧创作委员会和全俄罗斯戏剧协会戏剧评论小组决定在 1948 年 11 月 29 日召开一次创作会议，以讨论莫斯科各剧院为庆祝十月革命 31 周年而排演的剧目。举办这次活动以及邀请评论家博尔沙戈夫斯基作为主要报告人，并没有与委员会协商。得知此事后，我建议戏剧剧院总局介入此事并参与讨论，因为会议将讨论我们剧院的新作品。

尽管戏剧剧院总局提出了要求，但博尔沙戈夫斯基没有提交报告提纲，他声称自己对苏联戏剧的主要创作问题已经足够了解。

在他的报告中，博尔沙戈夫斯基从形式主义美学评论的立场出发，首先猛烈抨击了苏联年轻剧作家的作品——苏罗夫和索菲罗诺夫的作品，对他们最近的剧本《绿色街道》和《莫斯科人的性格》进行了严厉批评……他还直言不讳地反对苏联高尔基模范艺术剧院和小剧院，批评它们排演的《绿色街道》和《莫斯科人的性格》这两部剧。

委员会代表皮缅诺夫同志在这次会议上反对博尔沙戈夫斯基的主要观点……

在总结发言中，博尔沙戈夫斯基指责艺术事务委员会，说它似乎不允许批评高尔基模范艺术剧院和小剧院，并向与会的评论家们呼吁，要求他们给予支持。

在这次会议之后，关于博尔沙戈夫斯基及其支持者对苏联艺术的敌对立场的问题，在苏联作家协会中多次被讨论，这与为苏联作家协会理事会全体会议做准备有关。在我与法捷耶夫同志的谈话以及委员会成员别斯帕洛夫和皮缅诺夫在作家协会书记处的发言中，对博尔沙戈夫斯基、尤佐夫斯基和其他一些人所代表的评论形成了一致的看法……

我认为有必要告知您，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艺术部门的工作人员在这些问题上采取了错误的立场。在为苏联作家协会理事会全体会议做准备期间，艺术部门的工作人员为准备关于剧院和戏剧创作状况的文件做了大量工作。艺术部门主要邀请了一些美学评论家参与这项工作，而他们的言论在苏联作家协会理事会全体会议上受到了严厉谴责。

在苏联作家协会理事会全体会议前不久，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艺术部门召开了一次戏剧评论家会议，古列维奇、马柳金、尤佐夫斯基、博亚季耶夫、博尔沙戈夫斯基、克龙、马茨金、扎列斯基、阿尔特曼、卡拉什尼科夫等人参加了会议。

据艺术部门副主任普罗科菲耶夫同志称，这次会议的任务是为联共（布）中央书记们准备一份关于戏剧创作、剧院和评论发展主要问题的报告。在这次会议上，制定了文件的初步计划，并将文件的准备工作交给了参加会议的评论家们。还安排了定期会议来讨论文件的各个准备部分。

需要指出的是，这次会议是在 11 月 26 日召开的，也就是说，在博尔沙戈夫斯基在讨论十月革命剧目会议上发言的前三天。这一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博尔沙戈夫斯基在会议上的放肆行为。”[661]

列别杰夫关于 А.М.博尔沙戈夫斯基在全苏戏剧协会会议上自信（“放肆”）行为原因的推测是正确的。经验丰富的评论家、资深报人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非常清楚，在 11 月 29 日发言时，参与中央决议的准备工作对他个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好处。他知道党将抨击哪些人，他们犯了哪些过错，以及具体会指责谁。博尔沙戈夫斯基在艺术部门对已经确定的立场的了解，以及由此对整个部门、很可能还有联共（布）中央书记处对最近剧目的立场的了解，让他充满自信，有一种凌驾于他人之上的感觉。

博尔沙戈夫斯基肯定会被要求——为了“让他了解情况”——让他知道部门对已经在小剧院上演的索菲罗诺夫的剧本《莫斯科人的性格》的负面看法。要指出部门从哪些立场上谴责了罗马舍夫的剧本《伟大的力量》、维尔蒂的《我们急需的面包》和《在同一个国家》（《被定罪者的阴谋》）。肯定会向他解释，为什么在节日期间，苏罗夫的剧本《绿色街道》（被高尔基模范艺术剧院接受以庆祝其成立 50 周年）的首演却一直没有举行。也许，甚至还让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读了一份报告，这份报告表达了宣传鼓动部两位副主任 Л.Ф.伊利切夫和 А.Н.库兹涅佐夫的意见，他们对苏罗夫的作品评价如下：“作者对这个现实主题的处理很肤浅、很原始，在很多方面缺乏说服力。一系列的人物形象缺乏心理深度，表现得很模式化，而且有时很虚假……《绿色街道》这部剧不能在高尔基模范艺术剧院的周年庆典期间上演，需要进行大量的修改。宣传鼓动部认为有必要指示艺术事务委员会将其从周年庆典的剧目单中删除，并对剧本和演出进行修改。”[662]

博尔沙戈夫斯基在全苏戏剧协会会议上发言时过于自信、不容置疑，他无意中透露了宣传鼓动部的意图。实际上，他让剧作家们，尤其是索菲罗诺夫和苏罗夫，意识到了他们所面临的危险。而他们自然不会静静地等待联共（布）中央书记处对艺术部门仍在修改的文件的批准。他们立即采取了反击措施。在当时的情况下，他们采取了唯一可行的办法。他们抢在事态发展之前，在得到宣传鼓动部文学艺术部门的支持后，承认剧院工作存在不足，但他们认为责任不在于自己，而在于他们的对手。他们把指责者变成了被指责者。由于没有其他更有说服力的论据，他们试图把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上。集中在那些

与问题本身毫无关系，但正因如此才是万无一失的策略上。他们非常明显地暗示了大多数戏剧评论家的民族身份，仅仅通过他们姓氏的发音来暗示。同时，他们还给这些评论家贴上了那些在党的宣传中早已用于意识形态斗争的标签，但目的却完全不同——是针对“外部敌人”的。他们指责戏剧评论家们存在美学主义和形式主义。而在过去的五年里，“世界主义”这个词一直是这些问题的必然特征，尽管当时还没有公开使用这个词，但只是暂时没有公开而已。

战场变成了苏联作家协会理事会第 12 次全体会议，起初人们预计在这次会议上讨论一些更中立的问题——自联共（布）中央对《星》和《列宁格勒》杂志做出决议以来，亚美尼亚、拉脱维亚、哈萨克文学的发展情况，只是顺便、纯粹形式上地“为了走个过场”，提及一下戏剧创作的问题。而真正的戏剧冲突始于 12 月 17 日星期五。在当晚的会议上，索菲罗诺夫做了关于苏联戏剧创作现实问题的报告。

当然，为了避免被指责为片面、偏袒本团体，他也批评了 А.加利奇和 К.伊萨耶夫、Л.列维纳和 И.梅特 т е р、В.波利亚科夫、К.芬恩、И.芬克、Н.波戈金的最新作品。在索菲罗诺夫看来，这些剧作家“他们的剧本脱离生活，思想艺术水平低下”。但他的主要攻击目标是评论家们。他指责他们“对艺术现象采用美学主义的方法，常常以原则性的方法来处理问题，而不是以友好的态度来对待，在戏剧创作和评论中，对布尔什维克党性的斗争远远不够”。这样一来，他迫使在这方面被提及的博尔沙戈夫斯基、瓦尔沙夫斯基、克鲁季、马柳金、鲁德尼茨基、古尔维奇、博亚季耶夫、尤佐夫斯基不再进攻，而是为自己辩护，以保全自己。

第二天，这场抨击仍在继续。艺术事务委员会主席列别杰夫批评了他所负责的出版物——报纸《苏联艺术》和杂志《剧院》。他指责它们“在一些问题上，以纯粹的形式主义立场误导读者、剧院和艺术工作者”。而作家协会的领导人则转而抨击那些“从美学主义和形式主义立场看待苏联生活在戏剧作品中反映的现象”的评论家们。[663]

这样一来，那些本应处于最严厉批评之下的人，却团结起来，以抵御共同的敌人——宣传鼓动部艺术部门的压力。然而，他们自然担心公开反对党的一个机关会带来的后果，所以在发言中既没有提到留里科夫，也没有提到普罗科菲耶夫。他们一起攻击那些参与准备不受欢迎文件的人。在全体会议的一项决议中，他们对这些人的指责如下：

“在全俄罗斯戏剧协会戏剧评论小组和作家协会戏剧创作委员会中，聚集着一些评论家，他们站在被党谴责的艺术无党性的立场上，以或多或少公开或隐晦的形式维护这些立场。这些评论家（古尔维奇、尤佐夫斯基、马柳金等人）在出版物的页面上不太公开地、而在全苏戏剧协会和中央文学家之家的各种会议上更公开地，从形式主义和美学主义立场出发，试图诋毁苏联戏剧创作中的积极现象……他们想从艺术无党性的立场出发，动摇剧院对当代苏联主题的信任，他们错误地引导苏联观众，阻碍了许多关注当代主题的剧作家发挥创作才华。在这些评论家中，存在着对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的盲目崇拜（我加粗强调。——Ю.Ж.），忽视俄罗斯经典戏剧创作的丰富遗产，对苏联戏剧创作的大量经验持虚无主义态度……

部分苏联戏剧评论家（博尔沙戈夫斯基、博亚季耶夫、瓦尔沙夫斯基）实际上追随形式主义、美学主义评论家的观点；其他一些人（阿尔特曼、霍洛多夫）则对这些与戏剧创作和戏剧艺术相悖的观点采取妥协的态度。这样一来，那些站在无党性立场、‘纯艺术’、‘为艺术而艺术’立场上的评论家们过去和现在的作品，至今仍未被揭露和批判。”[664]

全体会议的工作于 12 月 20 日结束，但仅仅三天后，而且还是在索菲罗诺夫的再三请求下，他的报告才以《为了进一步提升苏联戏剧创作》为题，刊登在《真理报》的第三版上。

为了乘胜追击，索菲罗诺夫在 12 月 25 日与法捷耶夫一起，12 月 31 日又与吉洪诺夫一起，向马林科夫提出请求，希望他同意在《真理报》上发表苏联作家协会理事会第 12 次全体会议的决议。[665]

谢皮洛夫、伊利切夫和库兹涅佐夫收到了这些请求，他们敏锐地感觉到了自己处境的脆弱。他们非常清楚关于戏剧创作的决议实际上针对的是什么，因此想尽一切办法阻止该决议像其他决议一样公之于众。1 月 8 日，他们向马林科夫解释说："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在研究了关于戏剧创作问题的决议后，提请苏联作家协会书记处注意，该决议没有揭示艺术事务委员会、剧院以及苏联作家协会书记处自身的不足。此外，在该决议中，戏剧创作领域的不理想状况被片面地解释，主要归因于评论界的状况（我标注了重点。——Ю.Ж.）……考虑到这一点，我们认为在《文化与生活》报的下一期中刊登一篇正确（我标注了重点。——Ю.Ж.）评估戏剧创作领域状况的文章是合适的。"[666]

戏剧的第二幕开始了。

马林科夫花了四天时间来决定应该支持冲突中的哪一方。最终，他站在了苏联作家协会和艺术事务委员会这一边。很可能是因为，对他来说，这场争论并非沿着"评论家——剧作家"的路线展开，而是"党的机关——国家机构"之间的矛盾。因此，遵循着全面限制党权力的长期意图，1 月 13 日，他同意了索菲罗诺夫的请求，批准在《真理报》上发表苏联作家协会理事会第 12 次全体会议的决议。但这一决定迫使谢皮洛夫立即彻底改变了他之前对所发生事情的看法。1 月 23 日，他与负责艺术部门的库兹涅佐夫一起签署并向马林科夫提交了一份新的报告。他急忙在报告中阐述了与两周前自己所坚持的观点完全相反的内容。他在报告中加入了他认为领导所要求的内容：

"联共（布）中央在一系列文件和指示中强调了文学评论领域的严重问题。事实表明，戏剧评论领域的情况尤其糟糕。在这里形成了一个反爱国主义（我标注了重点。——Ю.Ж.）的资产阶级美学团体，他们的活动对苏联戏剧和戏剧创作的发展事业造成了严重损害。这个团体的成员包括评论家 Ю.尤佐夫斯基、А.古尔维奇、Л.马柳金、И.阿尔特曼、А.博尔沙戈夫斯基、Г.博亚季耶夫等人，他们占据了垄断地位，在一些出版机构以及全俄罗斯戏剧协会和苏联作家协会戏剧创作委员会等组织中主导着舆论。这个团体中的评论家们一贯诋毁苏联戏剧创作的优秀作品、苏联剧院以当代最重要主题为题材的优秀剧目。这个团体没有支持优秀的剧本，也没有在戏剧艺术发展的主要问题上为剧院和戏剧创作工作者明确方向，而是误导了剧作家和艺术工作者。"

谢皮洛夫和库兹涅佐夫在对第一段中所提到的"团体"的每个成员给予负面评价的同时，还大胆地写下了索菲罗诺夫一直不敢说的话。他们加入了关于全苏戏剧协会评论小组主席团每年改选的信息，只是为了强调："在选出的 9 个人中只有 1 个是俄罗斯人。应该指出的是，全苏戏剧协会评论小组的民族构成极其不理想；小组成员中只有 15%是俄罗斯人。"报告的作者们在结尾提出了在联共（布）中央审议该问题的建议，并且按照惯例，附上了一份决议草案——《关于戏剧评论中的资产阶级美学堕落现象》。当然，决议草案中几乎所有条款的开头都是"谴责"、"揭露"、"解除工作"等词。[667]

如果第二天马林科夫没有收到另一份报告——《关于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工作人员在戏剧评论反爱国主义团体活跃的情况下的错误立场》，那么这个决议草案经过一些修改和完善后很可能会被通过。这一次的报告来自《真理报》的主编 П.Н.波斯佩洛夫。在这份报告中，问题呈现出了完全不同的一面。彼得·尼古拉耶维奇指出：

"1.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的工作人员显然忽略了 1948 年 11 月 29 日至 30 日举行的所谓关于新剧本问题的'创作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博尔沙戈夫斯基作了一个报告，实

际上这个报告是针对当代苏联剧本的，特别是在他的总结发言中，对小剧院进行了粗鲁、嘲讽的攻击（见《文学报》的剪报以及博尔沙戈夫斯基总结发言和小剧院艺术指导 К．А.祖博夫发言的记录摘要）。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对《文学报》的不当立场没有做出任何反应，而《文学报》加入了博尔沙戈夫斯基和 К．А.祖博夫的诋毁和辱骂行列，祖博夫的发言是正确且具有爱国主义立场的。

2.宣传鼓动部的工作人员普罗科菲耶夫同志负责剧院相关问题，他接待了博尔沙戈夫斯基，而且据法捷耶夫说，他受到了博尔沙戈夫斯基的影响。很可能并非偶然的是，1948 年 9 月底，博尔沙戈夫斯基在《文化与生活》报上获得了一个专栏，在那里他发表了一篇关于乌克兰戏剧创作的长篇文章。

3.1948 年 12 月 2 日，《真理报》发表了 С.杜里林关于小剧院上演的《无辜者》的文章。《真理报》为剧院辩护，使其免受 Г.博亚季耶夫和 К.鲁德尼茨基文章中关于‘粗俗的社会学主义’的诽谤性指控。《文化与生活》报似乎在‘纠正’《真理报》，并支持摇摇欲坠的博亚季耶夫的‘权威’，于 12 月 11 日为他提供了一个专栏，刊登了博亚季耶夫的一篇长文。”[668]

就在同一天，1949 年 1 月 24 日，像往常一样在晚上，召开了一次预定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事实上，正是在这次会议上——虽然不在议程之内且没有记录在会议记录中，马林科夫不仅讨论了这场没有平息反而日益加剧、不断扩大的冲突，现在这场冲突还卷入了三家中央出版物——《真理报》、《文化与生活》报和《文学报》。中央政治局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审议了这个问题，由于多种原因，这个问题不能再拖延或搁置了。格奥尔基·马克西米利安诺维奇（马林科夫）没有放弃他已经形成的支持国家机构的观点，但他也不同意谢皮洛夫的最后一个建议——即通过联共（布）中央的一项特别决议。他可能有理由担心，这样的行动只会让本已矛盾重重的局势更加复杂。他选择了一个“温和”、妥协的方案：在《真理报》的一篇社论中谴责戏剧评论团体。这样做是为了避免明显的分裂，避免中央机关内部以及中央机关与相对弱小、缺乏独立性的机构——苏联作家协会和艺术事务委员会之间的公开对抗。

中央政治局达成一致意见，要求 П.Н.波斯佩洛夫准备所需的文章，并以索菲罗诺夫的报告、谢皮洛夫和库兹涅佐夫的报告为基础（这一点可以通过对上述三篇文本的简单对比得到证实）。波斯佩洛夫行动迅速。1 月 27 日，他已经能够做一个对自己很重要、实际上是为自己辩护的记录：“与马林科夫同志会面。3 点 55 分。对《关于一个戏剧评论反爱国主义团体》一文的修改。为了多样化，给出三种表述：第一种情况——在提到‘世界主义’这个词的地方——欢呼世界主义；第二种——赤裸裸的世界主义；第三种——无国籍的世界主义。在做出这一修改后，可以在明天的《真理报》上发表。”[669]

这篇文章确实在 1 月 28 日发表了。它成为了一场喧闹、混乱运动的基础，或者更确切地说，激发了这场运动，这场运动与 1937 至 1938 年发生的事情非常相似。它让人们最卑劣的本能得以展现，提供了开始新一轮“猎巫行动”的机会。人们开始寻找下一个敌人——世界主义者，而这变得更加容易，因为只需要从自己的圈子里挑选那些姓氏“非俄罗斯”的对手就行了。这场运动迅速席卷了所有的创作协会和组织、科研机构，并且呈现出公开的反犹主义特征。

在那些周里必须参加会议的人——全苏戏剧协会、小剧院、高尔基模范艺术剧院的与会者，处境最为轻松。在这些会议上发言的演员雅布洛奇金娜、奥泽罗夫、察列夫、安年科夫，导演凯德罗夫和祖博夫，戏剧学家莫罗佐夫，只需要表达对《真理报》文章内容的完全赞同。一致支持对那些被归入“反爱国主义团体”的人的谴责。而且他们可以问心无愧地这样做，因为正是这些评论家通过发表对大多数新剧目的负面评论，给莫斯科的剧院带来了很多麻烦。

苏联作家协会的情况则不同。在该协会党组织的两次会议上，真正导致冲突的原因——为争夺不同但必定是高级的、官职任命的公开斗争，仍在激烈地继续着。索菲罗诺夫，在全体会议上刚刚当选为协会理事会秘书，现在却保持沉默。而苏罗夫则陷入了疯狂。他利用剧院评论家之一瓦尔沙夫斯基写给他的一封信，在信中瓦尔沙夫斯基“证实”了他的一些同事存在某种“阴谋”，甚至声称他们已经开始“秘密地”在……“阿拉格维”餐厅聚会。这位年轻的剧作家不仅公开宣称，他已经将收到的信息交给了国家安全部长阿巴库莫夫。他还大声指责理事会秘书西蒙诺夫（《新世界》杂志主编）和苏联作家协会党组织秘书戈尔巴托夫也参与了这个“团体”。他显然想把这两人中的某一个“拉下马”，以便自己能占据空缺的职位。

苏联艺术学院的会议也同样热闹。学院院长格拉西莫夫，正式成员约甘松、卡西安、里亚日斯基等人，要求“彻底揭露”那些多年来一直困扰他们的真正意义上的批评家——艺术理论家叶夫罗斯、普宁、贝斯基、马茨、巴萨赫斯。在这方面，他们顺便提到了爱伦堡。他们提醒他曾对毕加索作品的赞扬，以及对列宾作品的不认可。他们认为，毫无疑问，这位著名的苏联记者的这种立场表明了他的“反爱国主义”。当然，在苏联作曲家协会的会议上，人们也支持《真理报》的文章。然而，作曲家扎哈罗夫、什托加连科，指挥家涅博利辛，编舞家梅塞尔，音乐学家沙韦尔江和凯尔迪什的发言却异常无力。显然，就在一年前积累起来的情绪，已经在他们对“形式主义者”，也就是那些“世界主义者”的批判中完全宣泄出来了。[670]

这场喧闹的意识形态运动，起初迅速蔓延，不久后，在 4 月初开始逐渐平息，失去了势头。它变成了一场闹剧——将“北方”牌香烟改名为“北方”（此处原文可能有误，推测是想表达更改名称相关，但表述重复），将“法国”面包改名为“城市”面包，以及人们不顾一切地在所有事情上都要确立本国优先权的普遍愿望。与此同时，对于绝大多数对“知识分子”中激烈情绪毫不关心的民众来说，政权上演了一场多年未见的奇观。与在会议讲台上发表的言论、充斥报纸和杂志的文章完全矛盾的是，在城市和乡村的电影院、俱乐部的屏幕上，突然出现了几乎将本国电影挤走的、早已被遗忘的西方电影。《印度陵墓》系列两部、《战火中的德兰士瓦》（《奥姆·克鲁格》）、《橡胶猎手》（《橡胶》）、《基督山伯爵》、《我是一个越狱的苦役犯》（《愤怒船长》）、《巴黎圣母院》、《自由军将军》（《维瓦·维利亚》）、《亚瑟港》（《神圣的标志》），还有许多其他的电影。在与世界主义斗争最激烈的时候，也就是 1949 年 3 月底，共有 37 部美国、德国、意大利的艺术电影上映。[671]这绝非偶然，也不是因为无知。这是应财政部长的要求。纯粹是出于经济原因，而经济原因被证明比意识形态更为重要。

1948 年 7 月，电影工业部长 Г.Ф.博尔沙科夫不得不承认一些对他来说非常不愉快的事实。由于苏联电影的产量持续下降，仅在七个月内，电影制作就使国家损失了 1.794 亿卢布，电影发行损失了 2180 万卢布。[672]博尔沙科夫认为，可以通过再举行一次官方活动——全苏会议来改善这种状况。他认为，这样就能大幅提高国内电影制片厂的生产效率。这位部长提出的这种纯粹官僚主义的解决方案，没有考虑到最明显的问题。即使会议取得成功且富有成效，能够吸引观众的新电影数量至少要在一两年后才会增加。而财政部需要钱——尤其是用于支付工资等方面，需要立即获得资金。为了切实保证下一年预算收入部分的资金来源。

苏联最高领导层认为博尔沙科夫的观点没有根据，1948 年 8 月 31 日，以政治局的名义决定，在全国“公开”影院上映 24 部真正的德国缴获电影，在“内部”影院，也就是俱乐部，上映 26 部美国、法国、意大利的电影。[673]从那时起，外国电影就一直出现在苏联的屏幕上，而与世界主义的斗争也像开始时一样突然，在 1949 年 4 月初结束了。那时，对这场斗争的需求已经完全消失了。所有需要“在喧嚣声中”完成的事情都已经完成了。

实际上，一些非常重要、意义重大的事件，相关信息却极其片面且极为稀少，几乎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这些事件没有像预期的那样，在人们的脑海中激起波澜。

在对戏剧评论家们来说是灾难性的一天，苏联最高领导层“九人小组”成员 А．А.库兹涅佐夫不仅突然失去了监督中央各部门、行政管理和机械制造部门工作的所有权力，而且实际上被排除在书记处之外。事实上，1949 年 1 月 28 日政治局关于他的问题的第一个决定措辞相当温和。决定指出“为了改善联共（布）中央与边远地区、边疆区和共和国党组织之间的联系”，成立联共（布）中央外高加索、中亚和远东局。决定批准“免去 А．А.库兹涅佐夫联共（布）中央书记的职务，任命他为联共（布）中央远东局书记”。[674]毫无疑问，这个决定草案是由党的、工会的和共青团的机关部门提出的，而且不仅是在知情的情况下，很可能是根据其负责人马林科夫的直接指示提出的。

即使在两周后，似乎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库兹涅佐夫的政治生涯会彻底、最终地失败。2 月 10 日，政治局批准了关于联共（布）中央新的地区机关的规定及其人员组成——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仍然担任远东局书记，同时确定了他下属工作人员的编制。[675]但仅仅过了五天，2 月 15 日，政治局又做出了另一个决定——《关于联共（布）中央委员 А．А.库兹涅佐夫、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 М.И.罗季奥诺夫和 П．С.波波夫的反党行为》：

“根据所进行的调查确定，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与列宁格勒的领导同志们在联共（布）中央委员 А．А.库兹涅佐夫同志的协助下，擅自且非法地组织了全苏批发商品交易会，并邀请了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各边疆区和州的贸易组织，包括最偏远的地区，直至萨哈林州，以及所有加盟共和国贸易组织的代表参加。在交易会上展示了价值约 90 亿卢布的商品以供销售，其中包括一些由联盟政府根据国家计划分配的商品，这导致了国家商品储备的混乱，并损害了一些边疆区、州和共和国的利益。此外，举办这次交易会给国家造成了损失，因为在组织交易会以及让与会者从偏远地区往返列宁格勒的过程中，花费了大量且不合理的国家资金。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认为，上述反国家行为的主要责任人是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罗季奥诺夫和波波夫同志以及联共（布）中央委员 А．А.库兹涅佐夫同志，他们违反了国家和党的纪律的基本准则，因为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部长会议和联共（布）列宁格勒州委都没有请求联共（布）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批准举办全苏批发商品交易会，而是绕过联共（布）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擅自在列宁格勒组织了这次交易会。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认为，上述反国家行为是由于 А．А.库兹涅佐夫、罗季奥诺夫、波波夫同志存在不健康的、非布尔什维克的倾向，表现为以蛊惑人心的方式利用列宁格勒党组织，抹黑联共（布）中央，声称中央似乎没有帮助列宁格勒党组织，试图将自己标榜为列宁格勒利益的特殊保护者，试图在联共（布）中央和列宁格勒党组织之间制造隔阂，从而使列宁格勒党组织与联共（布）中央疏远。”

在这些指责之后，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指控——试图将斯大林的另一位年轻战友、他的门生沃兹涅先斯基的名字与另一个“团体”联系起来：“从这个角度来看，联共（布）中央现在才知道的沃兹涅先斯基同志的提议，即 1948 年波波夫同志向 Н．А.沃兹涅先斯基同志提出的‘领导’列宁格勒的提议，也应该从这个角度来审视。”但最可怕的、后果无疑非常严重的是决议中确认部分的最后一段：“联共（布）中央提醒，季诺维也夫在试图将列宁格勒党组织变成他的反列宁派别据点时，也曾采用过类似的反党手段……”

在陈述了上述所有内容之后，顺理成章地出现了关于解除罗季奥诺夫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职务、解除波波夫列宁格勒州委和市委第一书记职务的条款，

但再次解除库兹涅佐夫中央书记的职务，且这一次还宣布对他进行警告处分，这一点让人难以理解。

然而，最高领导层的震动并未就此结束。3 月 4 日，在苏联最高苏维埃第四次会议召开前不久，政治局做出决定，解除莫洛托夫外交部长职务和米高扬对外贸易部长职务。并批准由 А．Я．维辛斯基和 М．А．缅希科夫分别接任这两个职务。[677]三天后，政治局就同一问题接连批准了三项决定：“解除 Н．А．沃兹涅先斯基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以及苏联部长会议金属和化学工业局主席的职务。”“批准其前往巴尔维哈休假疗养一个月。”“将政治局的以下决定提交联共（布）中央全会批准：鉴于苏联部长会议 3 月 5 日关于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决定，将 Н．А．沃兹涅先斯基从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中除名。”[678]

作为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沃兹涅先斯基被提出了以下指控：“……根据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团就苏联国家物资技术供应委员会（П．波马兹涅夫同志）关于 1949 年第一季度工业生产计划的报告所进行的检查，揭露了国家计划委员会欺骗政府的事实。已查明，国家计划委员会在计划制定和评估计划执行情况的问题上采取了不客观、不诚实的态度，这主要体现在为掩盖实际情况而准备数据上。还查明，国家计划委员会与个别部委和部门相互勾结，并且低估了各部委的生产能力和经济计划……

沃兹涅先斯基同志没有向政府报告，国家计划委员会的一组领导工作人员，即 С．С．苏哈列夫斯基、И．伊万诺夫和 Г．加利茨基同志早在 1948 年 12 月 15 日就向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沃兹涅先斯基同志提交了一份报告，报告中称，1948 年第四季度的工业生产国家计划将大幅超额完成，预计完成总额为 457 亿卢布……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沃兹涅先斯基同志在审议该报告和相关提议时采取了虚假的立场。一方面，他签署了决议，表明同意相关提议（将总产值增加 17 亿卢布。——Ю．Ж．），另一方面，他却口头向国民经济计划综合部门负责人 С．С．苏哈列夫斯基同志下达了相反的指示。实际上，由于苏哈列夫斯基、伊万诺夫和加利茨基同志的报告，1949 年第一季度的计划草案中并未做出任何修改……”[679]

基于如此严重的指控，苏联部长会议认为有必要做出解除沃兹涅先斯基所担任职务的决定，并任命 М．З．萨布罗夫为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

国家和党内权力结构中前所未有的大规模人事变动仍在继续。3 月 12 日，以将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改组为对外政策委员会为借口，М．А．苏斯洛夫所担任的这个特殊的、非常独特的党内机关负责人的职位，被《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报（共产国际情报局机关报）主编 В．Г．格里戈里扬所取代。[680]3 月 24 日，根据政治局的又一项决定，任命元帅 А．М．瓦西列夫斯基为武装力量部长，他在仅仅四个月前才从总参谋长的职位上调任第一副部长。前部长 Н．А．布尔加宁被指派监督苏联部长会议第二和第三委员会、航空工业部和武器部的工作——换句话说，除了仍由贝利亚全权掌控的第一委员会外，整个军事工业综合体都在他的监督之下。而武装力量部的负责人则变成了斯大林。然而，一个月后的 4 月 25 日，这个部又被转交给了布尔加宁。[681]在此稍早的 4 月 6 日，从事了三十年外交政策问题研究的莫洛托夫，仿佛是一种嘲讽，被指派领导苏联部长会议金属和地质局。[682]

仅仅三个月的时间，最高领导层就发生了重大变化。沃兹涅先斯基和库兹涅佐夫被排除在外。莫洛托夫和米高扬两人的地位被降低，他们失去了熟悉到细节的职责，甚至是职位。只有五个人的地位得以维持：斯大林、马林科夫、贝利亚、布尔加宁、柯西金。与此同时，布尔加宁的地位被大幅提升，被赋予了真正非常重要的职责。如果回想一下，沃兹涅先斯基和库兹涅佐夫、莫洛托夫和米高扬属于长期以来相互对立、相互竞争、时不时会陷入隐蔽斗争的派别，那么就应该承认：发生了一种独特的权力人物的重新洗牌。然而，这并不是平等的洗牌。

毫无疑问，斯大林被迫屈服于强大而有力的压力。他不得不拒绝给予他忠实的盟友沃兹涅先斯基和库兹涅佐夫任何进一步的支持，放弃对他们的任何形式的保护。此外，这一次他还不得不同意最不愉快的事情——将他们彻底从政治舞台上清除。永远清除。作为回报，他得到了一些东西。仅仅是解除了莫洛托夫和米高扬的部长职务，不过他们仍然留在了最高领导层。事实上，斯大林还是成功地完全使莫洛托夫失去了影响力。他以不久前很可能也是根据他的指示制造的“П.С.热姆丘任娜事件”来威胁莫洛托夫，暗示要让他完全退休，热姆丘任娜是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莫洛托夫）的妻子。

在新的 1949 年即将到来的前夕，12 月 29 日，政治局审议了一份由联共（布）中央党的监察委员会主席什基里亚托夫和国家安全部长阿巴库莫夫签署的报告。报告中称：“1.经党的监察委员会委员会调查确定，П.С.热姆丘任娜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与不值得政治信任且涉嫌间谍活动的犹太民族主义者保持联系并关系密切；她参加了犹太民族主义者领导人米霍埃尔斯的葬礼，并与犹太民族主义者祖斯金谈论了他的死亡情况，这给了敌对分子传播关于米霍埃尔斯死亡的反苏挑衅性谣言的借口；她于 1945 年 3 月 14 日参加了莫斯科犹太教堂的宗教仪式。

2.尽管 П.С.热姆丘任娜在 1939 年已就她对不值得政治信任的人表现出的不加区分的态度向联共（布）中央发出过警告，但她还是违反了党的这一决定，并且在之后继续在政治上表现得不得体。

鉴于上述情况——将 П.С.热姆丘任娜开除出联共（布）党籍。”[683]

也不能排除另一种情况。即斯大林不仅对“热姆丘任娜事件”感到满意，还试图将战后苏联外交失败的全部责任都推到莫洛托夫身上。尤其是——为强硬的外交政策结果负责。为代价高昂但最终失败的支持以色列的行动，以及对西柏林实施封锁的结果负责。

但无论幕后的阴谋是什么，1949 年 4 月，这些阴谋的结果如下。“九人小组”变成了“七人小组”。最高领导层由斯大林、马林科夫、贝利亚、布尔加宁、柯西金、莫洛托夫和米高扬组成。此时，权力平衡呈现出极为不寻常的状态。斯大林现在只能指望布尔加宁和柯西金的无条件支持，只能寄希望于莫洛托夫和米高扬的选票。但也只是寄希望而已。另外两个强有力的人物，马林科夫和贝利亚，摆脱了危险的竞争对手后，现在不太可能还需要为了实现共同的近期目标而结盟、联合。因此，出现了一种完全不确定的局面，这种局面由于其不确定性而充满了各种意想不到的可能性。迟早会以某种形式实现某种团结。任何形式的团结。可能是马林科夫和贝利亚联合，也可能是马林科夫与莫洛托夫、米高扬联合，或者是斯大林与贝利亚、莫洛托夫和米高扬联合。最不可能的情况是仅仅恢复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之间以前的关系。

当然，所有这些发生的变化背后，是不可避免的、由权力欲引发的个人竞争。这是一场毫无掩饰的权力斗争，以及对失败的毫无根据的恐惧。但最高领导层的这些变动首先表明了其他一些更根本的东西。它们反映了对所选择的路线越来越缺乏信心，而这条路线至今仍未带来成功。它们表达了对未来的担忧，在斯大林看来，对国家的主要威胁在未来清晰地显现出来——重新武装起来的德国，毫无疑问，它正试图与西方，包括美国，结成牢固的联盟。

这种担忧不能被称为是虚构的、幻想的，或是为了为最高领导层所选择的在国内外政策上的强硬路线进行辩护而编造的。甚至在 1948 年底，华盛顿和伦敦就出现了大幅扩大西方联盟并将其转变为纯粹军事组织的想法。1949 年 1 月 14 日，美国国务院，以及 1 月 20 日美国总统杜鲁门表示，美国准备加入这个新的联盟。

为了阻止不可避免的事情发生，斯大林于 1 月 27 日在回答美国国际新闻社欧洲部主任金斯伯里·史密斯的问题时，试图让华盛顿了解莫斯科的和平立场：

“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强调，苏联政府愿意考虑与美国政府共同发表一项声明，即《和平条约》，以确认两国政府都无意相互发动战争。”“斯大林继续说道，苏联政府可以与美国政府合作开展旨在实现《和平条约》并逐步实现裁军的活动。”他确认愿意与杜鲁门会面以签署这样的声明，甚至表示如果美国、英国和法国至少推迟建立一个单独的西德国家，苏联将解除对西柏林的封锁。[684]

然而，华盛顿没有给出回应。

在极其不利的情况下，克里姆林宫唯一能采取的对策，是于 1949 年 1 月 5 日至 8 日在莫斯科举行了一次会议。在会议上，苏联、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代表成立了经济互助委员会（经互会）。刚刚开始组织建设的东方集团的力量，一方面通过苏联军队在波兰、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的存在得到加强，另一方面通过政治镇压得以巩固，这些镇压旨在确保并巩固“新民主主义”国家（现在被称为“人民民主国家”）的政府对克里姆林宫的忠诚。

与此同时，西方继续实施其毫不掩饰的计划。3 月 18 日，《北大西洋公约》文本公布，4 月 4 日，包括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加拿大在内的 12 个国家的领导人签署了该公约，正式成立了北约组织。几乎与此同时，在 3 月底至 4 月初，华盛顿、伦敦和巴黎单方面改变了德国的西部边界，随后又在法律上确认了他们占领区的合并，并决定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西德国家。

欧洲的分裂，世界的分裂日益加剧，并且已经呈现出不可逆转的趋势。

第二十四章

斯大林对金斯伯里·史密斯所提问题的答复，起初并未引发任何回应，但最终还是产生了效果，尽管并非完全如预期的那样。华盛顿认为，仅关注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所提及的问题中的一个对自身而言是可行且必要的。几乎晚了一个月，即 2 月 15 日，美国驻联合国代表菲利普·杰塞普与在安理会中维护苏联利益的苏联同事雅科夫·亚历山德罗维奇·马利克取得联系。他请求对方解释克里姆林宫立场的转变实质——即在某些条件下，愿意在不再像以往那样强硬地将解除对西柏林的封锁与为这座前德国首都强制引入单一货币（即东德马克）紧密挂钩的情况下，解除对西柏林的封锁。马利克利用美国方面的主动举措，采取了回应行动。他提议在即将召开的外长会议（СМИД）正式会议上讨论这个问题。又过了一段时间，在随后的机密会谈中，由于已经得到了莫斯科的明确指示，他能够给出更确切的答复：“如果就外长会议的召开日期达成协议……那么在外长会议开始工作之前，就可以取消对交通和贸易的限制。”[685]

因此，通过施加压力迫使西方国家恢复关于德国问题的对话，进而引发对西柏林封锁的这一意图，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它成为了朝着那个日益模糊的目标前进的动力。即便没有解决问题，至少也恢复了对该问题的讨论。也许，另一个情况也起到了作用——莫洛托夫被免去外长职务，这仿佛是在向西方国家暗示，克里姆林宫以往的路线不排除会有所缓和。

华盛顿、伦敦和巴黎对所提提议的认可，于 5 月 4 日在纽约宣布，这使得莫斯科信守了承诺。5 月 6 日，四个相关国家的政府发布了一份公报，通报了达成的重要协议。从 5 月 12 日起，对西柏林的封锁解除，5 月 23 日，外长会议第六次会议应在巴黎召开。诚然，华盛顿先是在 4 月 2 日单独行动，随后在 5 月 31 日，即外长会议开幕前后，又与盟友伦敦和巴黎一起，试图试探克里姆林宫的让步程度。它宣称，保加利亚、匈牙利和罗马尼亚似乎违反了它们所签署的和平条约的条款。因此，为了解决有争议的问题，有必要召开英国、苏联和美国代表的会议，以讨论当前的局势。然而，尽管莫斯科对巴黎会议的积极成果非常感兴趣，但它坚决拒绝了这一最后通牒，认为这明显是干涉三个独立国家内政的意图。

在此之后，四大强国的外长会议工作失败就完全在情理之中了。在一个月的时间里，从 5 月 23 日到 6 月 20 日，他们未能就恢复德国的经济和政治统一达成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尽管对西柏林的封锁已经解除。诚然，外长们将他们活动的如此悲观的结果包装在了乐观的外衣之下。他们一致同意，“将继续努力以实现这一结果”。在即将召开的联合国会议、柏林的磋商会议以及外长会议的另一次会议上（不过，没有商定会议的召开时间）[686]。

在巴黎，只取得了一个成果——制定了与奥地利签订未来和平条约的原则性基本条件。恢复其完全独立，确定 1938 年 1 月 1 日的边界，以及苏联应获得的赔偿金额。

在艰难且每个月都在加剧的局势下，最高领导层仍然更多地不是指望国家的经济增长，而是寄希望于负责核项目的贝利亚的组织能力。因此，也不能完全将他排除在可能的阴谋、人事问题上的幕后交易的对象之外。在持续不断、未曾平息的权力斗争的各个环节中都不触动他。无论权力如何重新分配，都不削弱他的地位和作用。甚至允许他对格鲁吉亚进行种族清洗——在 1949 年 4 月至 10 月期间，将土耳其人、亚美尼亚人、希腊人和波斯人驱逐出格鲁吉亚。可以牺牲任何人，但绝不是他。同样，布尔加宁也获得了稳固的地位，由于机缘巧合，他手中掌握的不仅仅是重要权力，而是在冷战、两大阵营公开对抗的条件下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关于军事工业综合体的权力。

只有两个人，莫洛托夫和马林科夫，能够继续在最高领导层中争夺领导地位，而他们也没有错过这个机会。就在 6 月 12 日，也就是在经历了又一次失败仅仅三个半月后，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莫洛托夫）设法恢复了曾经失去的地位，尽管是以一种非常独特的形式。当天政治局做出的决定，任命冶金工业部部长伊·费·捷沃相为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冶金和地质局主席。也就是说，将莫洛托夫之前的职位交给了他。而根据同一决定，要求莫洛托夫“将工作重心集中在领导外交部和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委员会的事务上”[687]。这不仅使他凌驾于维辛斯基之上，还凌驾于弗·格·格里戈里扬之上。这使得苏斯洛夫现在只能局限于对联共（布）中央宣传部（Агитпроп）工作的监督，7 月 20 日，他被任命为宣传部负责人。而谢皮洛夫，因宣传沃兹涅先斯基的《苏联战时经济》一书而受到指责，被免去了职务，被送去休了一个半月的假，之后他的后续工作问题有待联共（布）中央书记处决定[688]。换句话说，由马林科夫决定。

与此同时，联共（布）中央宣传部系统也发生了其他重大变动。任命弗·斯·克鲁日科夫为苏斯洛夫在宣传部的副手。显然，为了让米哈伊尔·安德烈耶维奇（苏斯洛夫）不能分心于书记处的事务，还任命他为《真理报》主编，而列·费·伊利切夫和萨秋科夫为副主编，波斯佩洛夫则被派去担任马克思列宁主义学院院长，这算是一种体面的调任。与此同时，日丹诺夫一派的最后一人——帕·尼·费多谢耶夫·亚历山德罗夫，因“未能提供应有的领导以及在工作中采用了错误的方法”，被免去了《布尔什维克》杂志主编的职务[689]。

马林科夫通过其他方式弥补了对联共（布）中央宣传部失去的原有控制权。他加入了政治局于 4 月 25 日成立的雷达探测委员会，除了格奥尔基·马克西米利安诺维奇（马林科夫）之外，该委员会还包括布尔加宁、贝利亚、卡冈诺维奇、萨布罗夫以及通信工业部部长格·瓦·阿列克谢恩科[690]。此外，马林科夫还通过 4 月 29 日成立的联共（布）中央新机构——外交和外贸机关干部部，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对国外所有活动的控制。该部门有权监督不仅在外交部、对外贸易部的所有任命，还包括在由前国家安全部部长梅尔库洛夫领导的苏联国外财产总局的所有任命[691]。

最后，9 月 1 日，政治局发布了一项决定，确定了在最高领导层中争夺领导地位的某种阶段性结果——对苏联部长会议进行了又一次改组。其领导机构，即主席团（бюро），改组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团（ПСМССССР），并且将在其会议上的主持工作，换句话说，实际的政府总理职位，“轮流由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贝利亚、布尔加宁、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萨布罗夫同志担任”[692]。在新的结构中，拉扎尔·莫伊谢耶维奇（卡冈诺维奇），在 1947 年 12 月 15 日从基辅返回莫斯科后，获得了一个相对不太重要的苏联国家物资供应委员会主席职位，可以推测，他的主要任务与其说是参与工作，取代他的前任莫洛托夫，不如说是代表斯大林昔日的战友们，象征着某种老领导人的传承。而萨布罗夫则需要发挥作用，作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团所有成员中唯一的经济领域专业人士履行职责。他要将与电站部部长德·格·吉梅里扬、交通部部长鲍·帕·别舍夫以及设计科研院所小组负责人谢·亚·朱可夫共同制定并提交政治局审议的、政治局于 6 月 17 日通过的国家电气化十年计划付诸实践[693]。这个计划取代了沃兹涅先斯基未能制定出来、未被未能召开的党代表大会批准的、为期二十年的国家长期经济发展计划。

权力的重新分配以及国家最高执行机构中新的权力格局的形成，极大地巩固了斯大林的地位，而这一切都源于两天前发生的一件事。科学家和工程师们在苏联部长会议下属的特别设计局（ПГУ）工作了四年，在贝利亚毫不松懈的领导、无条件的支持下，同时也在他持续的严格监督下，终于取得了成果。

到 8 月初，很明显，苏联核武器的研制工作已成功完成。8 月 5 日，对已完成的核弹头进行了正式验收，五天后，进行了原子弹的试组装。8 月 21 日，拆解状态的原子弹被运送到塞米巴拉金斯克附近的试验场。五天后，贝利亚抵达那里，政府委员会的成员们已经在等他：委员会主席米·格·别尔乌辛，成员帕·米·泽尔诺夫、帕·亚·梅希克等人，还有科学家尤·鲍·哈里顿、亚·鲍·泽尔多维奇、格·尼·弗廖罗夫、伊·瓦·库尔恰托夫、阿·谢·亚历山德罗夫等。1949 年 8 月 29 日早上 7 点，第一枚苏联原子弹“РДС-1 产品”爆炸成功。

11 月 1 日（但记录日期为 10 月 29 日），政治局的决定如倾盆金雨般奖励了苏联核武器的创造者们。拉·帕·贝利亚立即被授予两枚列宁勋章，并被授予斯大林一等奖章获得者的称号。鲍·列·万尼科夫、鲍·格·穆兹鲁科夫、尼·列·杜霍夫、尤·鲍·哈里顿、康·伊·肖尔金、弗·伊·阿尔费罗夫、亚·鲍·泽尔多维奇被授予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另外 44 名核中心的工作人员被授予列宁勋章，28 人被授予斯大林奖[694]。

直到 9 月 23 日，杜鲁门才承认，根据他的政府的消息，苏联最近进行了一次原子弹爆炸。然而，最高领导层现在并不急于证实苏联已加入核国家俱乐部。由于没有足够数量的原子弹（其批量生产直到 1950 年才开始），这些原子弹还不能被视为真正装备了的最新式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苏联试图避免直接承认。9 月 25 日苏联媒体发布的“塔斯社公告”中指出，美国人记录的爆炸与……建筑工程有关。但与此同时，试图夸大苏联科学技术的成就，将其推到虽近但已过去的时间：“至于原子能的生产，塔斯社认为有必要提醒，1947 年 11 月 6 日，苏联外交部长维·米·莫洛托夫就原子弹的秘密发表声明，称‘这个秘密早已不存在’。这一声明意味着，苏联已经揭开了核武器的秘密，并且拥有了这种武器。”

很可能是由于在原子弹储备方面的严重落后，以及与美国缺乏那种势均力敌的状态，最高领导层认为有必要且及时地在同一份“塔斯社公告”中强调：“苏联政府尽管拥有核武器，但现在和将来都坚定地坚持其无条件禁止使用核武器的一贯立场。”为了实现这些目标，莫斯科继续积极支持与和平主义非常接近的世界和平拥护者运动的发展，并全力帮助它。该运动于 1949 年 4 月在巴黎的世界大会上诞生，被迫在布拉格结束其工作。在这个城市，通过了捍卫和平的宣言，选出了该运动的常设委员会，并宣布设立国际斯大林和平奖。

除了成功试验原子弹之外，另一件同样意义重大的事件，不仅对巩固极其强硬的外交政策路线，而且对切实执行这一路线，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一事件极大地改变了世界力量的对比，加强了东方集团。

1949 年 4 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所有方向、所有战线上同时展开了大规模进攻。仅仅四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对中国北方和中部地区以及大部分南方地区的完全控制。占领了南京、北平、汉口、武昌、上海等最大的城市。尽管国民党的军队和政府仍然存在于西藏、云南省的边境地区、台湾岛、海南岛，并且在广州旧政府仍在运作，但内战实际上已经结束。

强调这一长期武装斗争的最终结果，9 月 21 日，中国新成立的最高代表机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НПКСК）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9 月 31 日，会议一致宣布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КНР），10 月 1 日，迁往新首都北京后，组建了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央人民政府。

第二天，苏联就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10 月 5 日，《真理报》在社论《中国人民的历史性胜利》中急忙向所有人解释，对克里姆林宫及其长期计划来说，最重要、最有意义的是什么。社论引用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相当长的《共同纲领》中的一部分，其中表达了外交政策的方向和优先事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将联合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与自由的国家和

人民，首先是苏联、各人民民主国家……将站在国际和平与民主的阵营，共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重点为我所加。——Ю.Ж.），保卫世界和平。”未来的时间不会让任何人产生误解。从《共同纲领》的文本来看，两个伟大国家的纯粹法律形式的联盟，既是防御性的又是进攻性的联盟，应该很快就会到来。

在获得了强大的东方邻国的可靠支持后，最高领导层终于回应了前盟友们的挑战。他们明显忽视了苏联的利益，甚至对苏联的适度请求——不要急于建立西德国家——也置若罔闻。

就在为促进德国问题的集体快速解决而召开的外长会议（事实证明这是最后一次会议）开幕的当天，5 月 23 日，在美国、英国和法国的同意下，三个占领区所有土地的代表通过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宪法。8 月 14 日，在那里举行了联邦议院（新国家的议会）的选举。9 月 12 日，选出了总统海斯，三天后，康拉德·阿登纳当选为总理，并立即组建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即使在十六年后，阿登纳在他的《回忆录》中仍然以一种非常独特的方式为这些违反雅尔塔和波茨坦协议的行为进行辩护。“我认为，”这位前总理写道，“苏联俄罗斯与自由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矛盾将不断加剧。日益强大的西欧对美国来说也变得至关重要。没有德国，西欧是不可想象的。”[695]

现在，克里姆林宫可以放手行动了。它已经尽了一切努力来准备与德国签订和平条约，实现德国的统一，使其成为一个非军事化、中立和民主的国家。它可以心安理得地采取回应措施——同样在自己的支持下建立第二个德国国家。并且它确实这样做了。

10 月 7 日，在柏林，最初纯粹是咨询机构的德国人民议会在其第九次会议上宣布，它已转变为临时人民议院，与此同时宣布成立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议会。在通过的《宣言》中表达了其目标，这些目标甚至在细节上也与莫斯科的立场一致：通过“消除单独的西德国家、废除占领法规、取消萨尔的自治权以及组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全德政府”来恢复德国的统一。“尽快与德国签订公平的和平条约。将所有占领军撤出德国”[696]。同一天，奥托·格罗提渥（德国统一社会党）被委托组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10 月 10 日，苏联将之前属于苏联军事管理局的管辖区的管理职能移交给了他，苏联军事管理局立即改组为苏联监督委员会。10 月 11 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有了自己的总统——威廉·皮克。

然而，并非最高领导层的所有成员都认为继续坚持强硬的外交政策路线是唯一可能的解决方案。无论如何，“七人小组”中的一员，马林科夫，很快就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即现在是时候放弃对抗，开始缓和局势了。从他在纪念十月革命 32 周年的庄严会议上受政治局委托所作的报告版本中可以看出这一点。

在马林科夫的报告文本中，有这样一段被斯大林无情删除的内容：

“最近，在世界敌人的阵营中明显出现了焦虑和不安的迹象。他们看到，他们的军事冒险路线已经失败。在确信对原子弹的垄断已经结束后，他们表现出越来越多的紧张情绪。战争煽动者阵营中那些失意的政治家们对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进行的各种大大小小的挑衅，只能证明他们试图掩盖自己的焦虑和不安。也许，他们中的一些人准备放弃罪恶的军事冒险路线。但他们不想坦诚和直接地这样做。他们想在喧嚣声中退缩，害怕被指责为恐慌。如果情况确实如此，那么出于对这些政治家声誉的同情，我们声明，尽管他们制造了喧嚣，但我们准备欢迎任何一位经过思考并以任何形式在行动上放弃军事冒险路线的政治家（重点为我所加。——Ю.Ж.）。我们想要和平，我们将支持所有成为或正在成为和平的诚实拥护者的人。”

用更清晰的语言，尽管使用了独特的词汇、堆砌的形象来邀请西方进行谈判，放弃继续冷战是不可能的。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斯大林不仅不喜欢这段公然求和的内容。他还做了另外两处对于理解苏联不同外交政策观点同样重要的修改。

马林科夫的版本：“苏联政府最近提议，美国、英国、法国、中国和苏联这五个大国之间签订一项加强和平的条约（这里指的是斯大林对金斯伯里·史密斯问题的回答。——Ю.Ж.）。苏联将继续以更大的精力为和平而斗争。苏联人民将不遗余力，不辞辛劳，全力加强和扩大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拥护者队伍。”

斯大林的版本：“苏联政府最近提议，美国、英国、法国、中国和苏联这五个大国之间签订一项加强和平的条约。也许，战争煽动者会破坏这项提议。然而，苏联将继续以更大的精力为和平而斗争。苏联人民将不遗余力，不辞辛劳，全力加强和扩大和平的拥护者队伍，并挫败侵略者的罪恶图谋。”

最后，还有一段完全由斯大林添加的内容：“在过去的三十年里，德国两次以侵略力量的姿态登上世界舞台，并且两次挑起了血腥的战争；首先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然后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所以发生这种情况，是因为德国的政策由德国帝国主义者、侵略掠夺者所主导。如果现在随着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建立，德国的政权掌握在主张稳固和平的人民民主力量手中，而侵略掠夺者将被孤立，——那么这将意味着欧洲历史的根本性转折。毫无疑问，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奉行和平政策，以及苏联奉行和平政策并得到欧洲各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的情况下，欧洲的和平事业可以说是有保障的。”[697]

斯大林仅对报告草案中关于国际部分的修正表明，在那个时候，他最关心的是外交政策问题，并将其视为决定性的问题。与此同时，斯大林试图利用一切机会为自己的强硬路线辩护，证明这一路线是正确的。但马林科夫报告的这一部分也让人可以做出以下推测。这类文件通常都是集体创作的产物。必然会由最高领导层的其他成员审阅，以便做出必要的修正或补充。因此，不能排除莫洛托夫也读过报告文本，但没有提出原则性的意见。

马林科夫的这份报告引人注意的地方不仅在于此。它还包含了其他一些新的原则性内容。格奥尔基·马克西米利安诺维奇（马林科夫）指出，主要目标——确保苏联的国家安全——已经实现：“在我们祖国的整个历史上，从未有过像现在这样，我们的国家被如此多与我们友好的邻国所环绕。”马林科夫重新阐述了苏联未来的外交政策计划：“苏联政府在整个战后时期一直坚持一项计划，该计划的实施将有力地加强和平与国际安全。这项计划包括大国之间的合作、裁减军备以及无条件禁止核武器。该计划还规定严格执行波茨坦会议关于德国问题的决议，和平解决与日本的问题，扩大各国之间的贸易经济联系。”这样一来，除了其他所有内容之外，他用“严格执行波茨坦会议关于德国问题的决议”这六个字，很可能是斯大林没有注意到的，推翻了斯大林关于随着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建立，德国问题已经解决的说法。

当然，马林科夫也谈到了国内政策问题，不过，实际上，在报告的三个部分中，他只花了一个部分来阐述这个问题。但即便在这部分内容中，他也保持了自己的风格。他指出战后五年计划的成功实施，声称在建设、农业方面取得了积极的进展，工业生产有所增长。然而，他在对已取得成就的主要描述的结尾却表达了完全相反的意思。这是一个毫不含糊的暗示，从上下文可以理解，这是在说由于领导层的原因，情况远非如此顺利，这里指的是干部问题。他指出：

“人们往往会夸大其词。在我们的队伍中，也有一些同志患有这种毛病。这些人，如果开始对某件事情赞叹不已，那么他们肯定会做得过头。他们无法正确评估取得的成就，同时也看不到不足之处，以便加以改进。然而，我们的成就，我们向前发展的规模，在很大程度

上取决于我们在消除工作中的不足之处方面的坚决程度……为了事业的利益，难道现在不是应该承认，那些容易犯错、失意的领导干部是我们前进道路上的绊脚石吗……党之所以取得成就，其中一个原因是，它在工作中巧妙地运用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纠正了错误，并在此基础上培养了干部。”[698]

这份报告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马林科夫顺便提到了在布达佩斯对被指控为“托洛茨基分子”并“与美国情报机构有联系”的拉斯洛·拉伊克进行的审判，他揭开了即将发生的事情的帷幕。在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Информбюро）的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会议上，不仅要彻底与美国、英国和法国在德国问题上划清界限，而且要在东方集团内部彻底、不可挽回地与南斯拉夫决裂。

斯大林决定将南斯拉夫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分离出去，这一决定在 1949 年 1 月就已经开始明确具体化，当时没有邀请南斯拉夫代表到莫斯科参加经济互助委员会（СЭВ）的成立会议。从那时起，两国之间的关系不仅没有改善，反而不断恶化。苏联罕见地频繁向南斯拉夫发出的信号，显示出对这个巴尔干国家领导层的负面评价程度越来越高。2 月 11 日，措辞还比较“温和”——“南斯拉夫政府对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采取了敌对立场”。而三个半月后的 5 月 31 日，措辞就非常强硬了——“南斯拉夫存在一个‘反共产主义和反民主的恐怖主义政权’，它与苏联作斗争，将自己的‘印刷品变成了法西斯帝国主义代理人进行反苏煽动的喇叭’”。8 月 11 日——“南斯拉夫政府‘从社会主义和民主阵营跳到了外国资本主义和反动阵营’”。8 月 18 日——“在整个南斯拉夫，盖世太保式的统治方法盛行，南斯拉夫共产党变成了隶属于警察头子兰科维奇的政治警察部门”。9 月 29 日，在解释莫斯科宣布废除 1945 年 4 月 11 日的苏南友好、互助和战后合作条约时，对拉斯洛·拉伊克的审判证实，“南斯拉夫政府长期以来一直在对苏联进行深入的敌对破坏活动”[699]。

10 月 25 日，南斯拉夫大使被从莫斯科召回，11 月 6 日，马林科夫第一个提出了一项严厉的指控，这一指控立即成为了定论：“铁托-兰科维奇的民族主义、法西斯集团已被彻底揭露为帝国主义的间谍机构。”他提前十天就知道了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第三次会议决议草案的内容，毫无疑问，他对其内容感到非常高兴，这次会议将于 11 月 16 日在布达佩斯召开。

然而，这些表述的性质，以及反映莫斯科对贝尔格莱德态度转变的内容，与其说取决于克里姆林宫对南斯拉夫领导层评价的变化，不如说取决于完全不同的因素。这取决于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委员会（由弗·格·格里戈里扬领导）与匈牙利劳动人民党（ВПТ）总书记、副总理马蒂亚斯·拉科西之间展开的斗争。正是在 1949 年 5 月，最高领导层陆续收到了五份（!）由秘书斯·格·扎沃隆斯基准备、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秘书、此前担任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部门负责人的列·斯·巴拉诺夫签署的备忘录。在这些备忘录中，以非常尖锐的语气和绝对的形式，谈到了拉科西对某些“匈牙利托洛茨基分子”的“错误”立场[701]。实际上，问题在于是否应该将他从领导岗位上撤职。由于担心出现这种结果，拉科西急忙将他的老战友拉斯洛·拉伊克推到风口浪尖上——拉伊克是政治局委员、匈牙利劳动人民党总书记，自 1946 年起担任内阁成员，最初是内政部长，1948 年起担任外交部长。他指控拉伊克从事阴谋活动，与贝尔格莱德有直接联系，成功地将他逮捕并对他和“他的同谋者”进行了审判，审判于 9 月 16 日开始。

毫无疑问，米·阿·苏斯洛夫在重新评估克里姆林宫对拉科西的态度、将与南斯拉夫领导层的冲突加剧到极致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应该明白，如果匈牙利领导人被撤职，他将不得不为所发生的事情负责。他肯定会受到严重的影响，因为由于他所处的地位，他有责任关注东欧国家的情况，监督它们的共产党的工作，包括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因此，可以有把握地推测，为了挽救自己，维护自己在权力结构中的地位，苏斯洛夫急忙利用他所

知道的斯大林最近对铁托的厌恶。此外，米哈伊尔·安德烈耶维奇（苏斯洛夫）当时担任联共（布）中央宣传部部长，他比其他人更需要——按照他的理解，为了增强宣传的有效性——一个新的“稻草人”。一个不寻常的、鲜明的、对所有人来说都非常容易理解的外部敌人的形象。一个可以毫无顾忌、不考虑对国家的后果而不断进行猛烈攻击的敌人，而这些攻击也会间接地针对美国和整个西方阵营。很有可能，所有这些因素导致了这样一个事实，即苏斯洛夫成为了联共（布）在布达佩斯会议上的唯一代表（如果不算当时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常任工作人员帕·费·尤金的话）。

在只持续了四天的会议上，宣读了三份报告，这些报告没有引发讨论，几乎自动地成为了三份同名决议的基础。苏斯洛夫的《保卫和平与反对战争煽动者》、陶里亚蒂的《工人阶级的团结与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任务》、乔治乌-德治的《南斯拉夫共产党处于杀人犯和间谍的掌控之下》。其中两份报告完全是形式上的、例行公事的。只是为第三份报告提供了一种掩护，而实际上，九个党的代表聚集在一起就是为了通过第三份报告。

但在这三份报告和决议中，贯穿始终的是一个共同的思想，这个思想在评估国内和外交政策形势时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一种不同寻常的、极其危险的思想，因为它使苏联及其新盟友重新陷入自我孤立。它坚持不懈地强调世界被分为两个敌对的阵营：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这三份报告和决议中还贯穿了另一个思想。指出了对苏联、人民民主国家以及整个世界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的持续威胁，这种威胁不仅来自北约和西方阵营，还来自右翼社会主义者，尤其是“铁托-兰科维奇的分裂集团”，他们似乎几乎成了“帝国主义情报机构的代理人”的主要中心。

与马林科夫不同，马林科夫在他的报告中认为主要危险在于那些不愿意看到自身自然存在的不足、因而不与之作斗争、从而阻碍国家持续发展的糟糕领导人，而在布达佩斯，敌人被认定为其他人。那些被认为是“南斯拉夫分裂分子的代理人”、西方情报机构的雇佣兵，渗透到了人民民主国家的领导层中。这样的人不仅有拉伊克，还有科斯托夫——保加利亚共产党政治局委员、总书记，列布尔——捷克斯洛伐克对外贸易部副部长，诺瓦克——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机关报《红色权利报》主编。这种做法导致了不可避免、必然的结果。一连串没完没了的“反政府阴谋”的揭露和重大审判，成为了直到 1952 年底东欧生活中不可避免的特征。

1949 年秋天，苏联国内政策路线也发生了急剧转变，变得更加极端，但形式略有不同。表现为在评估任何现象和事件时，重新采用强制性的“阶级”方法。党在国家生活中的作用日益增强，党不仅持续干预经济领域。

在筹备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第三次会议的同时，斯大林还能抽出时间仔细阅读联共（布）中央宣传部科学处处长尤·阿·日丹诺夫关于生理学家伊·彼·巴甫洛夫诞辰一百周年的报告。“我在您信中提出的任何问题上，”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回复道，“都与您没有分歧……奥尔别利院士对巴甫洛夫院士的学说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奥尔别利被揭露得越快，他的垄断地位被更彻底地消除，那就越好。”

他还写信给马林科夫，要求他采取“措施”。他明确指出：“我给您寄去我给尤·日丹诺夫的信的副本，以及日丹诺夫关于巴甫洛夫院士及其理论问题的报告。我认为，中央委员会应该全力支持这件事（重点为我所加。——Ю.Ж.）。”[702]

马林科夫执行了这一任务。他组织了一次关于巴甫洛夫学说的现实问题的科学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心理学家和生理学家们一致谴责了列·阿·奥尔别利，同时也谴责了他的其他同事：伊·斯·贝里塔什维利和阿·德·斯佩兰斯基、帕·克·阿诺欣和阿·米·亚历山延科、康·米·贝科夫等人。不过，这次会议并没有马上召开。直到 1950 年夏天，在斯大林

亲自为另一门与马克思主义相距甚远、且与国家紧迫问题无关的科学——语言学“丰富”了内容之后，会议才得以举行。

同样在 1949 年秋天，诚然是在没有公开宣布、不为外人所注意的情况下，类似的事件也波及到了最高权力阶层。早已被遗忘的镇压浪潮席卷了那些失宠的最高领导层前成员，而且不止他们。

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沃兹涅先斯基成为了这一必然的受害者，不幸的是，是他自己引起了注意。8 月 17 日，他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

“我怀着极大的请求向您写信——请给我一份您认为合适的工作，以便我能为党和祖国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远离工作、党和同志们，我感到非常痛苦。从中央统计局在报纸上发布的消息中，我当然看到，我们党的巨大成就因为中央委员会和政府纠正了以前的计划并挖掘出了新的潜力而更加显著。我向您保证，我无疑从自己的事情中吸取了党性的教训，并请求您给我一个积极参与党的总体工作和生活的机会。请您给予我这份信任；无论您交给我什么工作，我都会全力以赴，努力工作，不辜负您的信任。忠诚于您的沃兹涅先斯基。”[703]

他没有等到期望中的回复，很快就收到了完全不同的回应。收到的这封信成为了出现相当有力的不利材料的借口。联共（布）中央驻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干部全权代表叶·叶·安德烈耶娃的报告。正是她让沃兹涅先斯基对在他被撤职后突然发现的、本不应公开的材料的丢失负全部责任。9 月 9 日，党的监察委员会主席米·费·什基里亚托夫准备了相应的提议，两天后，该提议被提交给政治局审议并获得通过：

“a)批准联共（布）中央党的监察委员会提交的关于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大量机密文件丢失事实的提议，b)将关于开除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沃兹涅先斯基出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成员的决定提交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批准。”[704]

三天后，中央委员会成员们没有召开全体会议，而是通过“征询意见”的方式，一致同意了政治局的意见。10 月 27 日，沃兹涅先斯基被捕。

紧接着，对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库兹涅佐夫也进行了毫无意义的残酷迫害。这标志着“列宁格勒案件”的形成，大约有一百人被卷入其中，而且这一案件具有纯粹的政治色彩。早在 6 月底，列宁格勒州委第一书记亚·费·卡普斯京就以“英国间谍”的罪名被捕。随后，在 8 月，库兹涅佐夫本人以及许多曾与他在不同时期在涅瓦河畔的城市共事的人也被捕了——彼得·谢苗诺维奇·波波夫、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罗季奥诺夫、彼得·格里戈里耶维奇·拉祖季娜，还有一些人也被解除职务，8 月 6 日，克里米亚州委第一书记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索洛维约夫被解职，8 月 27 日，列宁格勒州委书记彼得·伊万诺维奇·列维娜和第二书记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尼古拉耶夫被解职。一个月后，根据斯大林的要求，对列宁格勒军区的指挥层进行了清洗。司令员德米特里·尼古拉耶维奇·古谢夫上将、政治部副主任弗拉基米尔·尼古拉耶维奇·博加特金中将、政治部主任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茨韦塔耶夫少将被撤职[705]。

如今，所有这些事件仍然无法得到合理的解释。它们似乎仍然是没有动机、不合逻辑的。实际上，对于那些已经被打倒的人，不仅仅是被剥夺了权力，而且在可预见的未来也没有机会东山再起的沃兹涅先斯基和库兹涅佐夫，究竟是谁，又为什么要进一步迫害他们——直截了当地说，就是要从肉体上消灭他们呢？为什么要提出政治指控，而且不仅仅是针对他们两人，还有他们的“同谋者”，如果不利用审判来塑造一个新的内部敌人的形象，并将其植入大众意识中，从而展开一场全面的“猎巫行动”呢？对于“这对谁有利”这个古老的问题，目前，到今天为止，只有一个虽然只是传闻、但极具假设性的答案——只有米哈伊

尔·阿列克谢耶维奇·苏斯洛夫。对他来说，而且只有对他来说，他已经在布达佩斯揭露了“铁托-兰科维奇的分裂集团”，并将其与一个广泛的、似乎涉及所有人民民主国家的阴谋联系在一起。如果借助阿巴库莫夫和什基里亚托夫的帮助，能够让“列宁格勒案件”、对沃兹涅先斯基和库兹涅佐夫的审判达到所需的规模并进行公开宣传，那么它就可以与对拉斯洛·拉伊克的“审判”联系起来，“指向”贝尔格莱德。而苏斯洛夫将有机会利用这次审判作为一个跳板，实现自己的迅速崛起。他将掌握最有力的武器，使他能够像当年的叶若夫一样，通过要挟最高领导层的成员来操纵他们。

但无论“列宁格勒案件”的情况如何，到了 11 月，他们已经放弃了重启大规模政治审判的想法。这一点的证明是，另一位身居高位的人被撤职，整个过程却相当平静。甚至可以说完全正常、自然。

11 月 1 日，政治局成立了一个由马林科夫、贝利亚、卡冈诺维奇和苏斯洛夫组成的委员会，“从三位工程师来信中所指出的事实的角度，对格·米·波波夫同志的活动进行检查”[706]。这里指的是一封匿名信，它被送到了中央委员会，信中指控联共（布）中央书记、同时兼任莫斯科市委和市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莫斯科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的格奥尔基·米哈伊洛维奇·波波夫犯下了各种可能的罪行。委员会工作了将近一个半月（很有可能，正是在这段时间里，最高领导层在决定是否要进行新的政治审判），并准备了一份中央委员会决议草案，该草案于 12 月 12 日得到政治局的批准。这份文件中明显体现出的思想，最符合马林科夫的观点，而不是委员会其他成员的观点。文件中清晰地体现出一种方向，与“列宁格勒案件”的本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该决议为了让任何人都不会对其本质产生丝毫怀疑，特别是在当时的形势下，明确规定：“认为匿名信作者对波波夫同志提出的关于其政治上的不坚定、排挤莫斯科市委和莫斯科苏维埃的经过考验的干部，以及在党内重要岗位上安插自己人的指控是没有根据的，属于诽谤行为。”

与此同时，决议也不得不承认格奥尔基·米哈伊洛维奇的活动中存在相当严重的不足之处。结果发现，首先，“他没有在莫斯科党组织中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波波夫同志没有倾听这种批评，提高对个别工作人员的要求并改善我们的整体工作，也没有对那些无法改正错误的工作人员解除其工作，而是常常固执地试图保护他们，为他们辩护并使其免受批评。

在莫斯科党组织中存在着完全无法容忍的现象，即一些敢于批评莫斯科和莫斯科地区党组织、苏维埃和经济部门领导工作人员的共产党员，遭到了迫害和打压。个别共产党员关于某些莫斯科工作人员对他们不正确、冷漠的态度的反映，常常在莫斯科市委得不到处理，对相关责任人也没有进行惩罚。莫斯科党组织领导实践中普遍存在的这种官僚主义对待批评的态度，损害了党的事业，扼杀了党组织的积极性，削弱了领导层在党员群众中的权威，并在党组织的生活中确立了官僚主义者的反党作风，这些官僚主义者是党的死敌（重点为我所加。——Ю.Ж.）”。

决议的第二个结论是：“联共（布）莫斯科市委和市苏维埃主席团在工作实践中表现出反国家的倾向，系统地绕过政府，直接向企业和部委下达额外的生产任务（重点为我所加。——Ю.Ж.），这破坏了党的和国家的纪律。对于那些不同意这种越权行为的部长们，波波夫同志‘在党的积极分子会议、莫斯科市委和市苏维埃主席团全体会议以及党的代表会议上对他们进行思想工作’。波波夫同志认为自己可以为所欲为，他要求部长们在涉及位于莫斯科和莫斯科地区的联盟企业的问题上，无条件地服从莫斯科市委的指示，并且要求部委在未经莫斯科市委同意的情况下，不得与政府联系。对于那些不同意这些反国家要求的部长，波波夫同志威胁说，莫斯科市委好像有自己的‘官邸’，他可以把部长们叫到那里，并对他们进行训斥。所有这些都错误地培养了党的和苏维埃的干部，破坏了党的和国家的纪律。”

最后，决议还指出了可能是最主要的一点：“波波夫同志的不正当领导方法以及他在工作中表现出的自负和自满，导致联共（布）莫斯科市委和市苏维埃主席团主要忙于经济事务，而没有给予党的政治工作和党内工作应有的关注。”换句话说，在长时间的中断之后，这份指示性文件提醒所有人，任何级别的党委，即使是像莫斯科市委和市苏维埃主席团这样在地位上相当于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机构，也无权、不应该干涉国民经济中超出宣传、鼓动和党内事务范围的问题。决议的决定性部分进一步强化了这一文件的意义，格·米·波波夫被解除了所有职务，并于 12 月 30 日引人注目地被任命为专门为他设立的苏联城市建设部部长[707]。

而在这之前不久，12 月 13 日，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被紧急从基辅召回，“当选”为他在战前工作中就熟悉的联共（布）中央书记——合并后的莫斯科市委和市苏维埃主席团第一书记。与往年的做法不同，莫斯科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不是由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担任，而是由米·阿·亚斯诺夫担任。乌克兰共和国党组织的领导人则由列·格·梅尔尼科夫担任[708]。

然而，很快就发现，马林科夫的行动——他坚决反对党的官僚主义，再次试图大幅限制其权力和职责，不仅没有取得成功，反而适得其反。这导致了反对这些措施的势力联合起来，引发了新的、非常重大的权力重组，使斯大林在战后这些年的地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巩固。

和往常一样，这些变化是在暗中酝酿的，最初仅表现为最高领导层成员职责的重新分配。首先，米高扬重新获得了信任和以前的地位。1950 年 1 月 19 日，他被任命为政治局对外贸易委员会主席，1 月 26 日，又被任命为苏联部长会议贸易和食品工业局主席团成员。随后，也确定了莫洛托夫的新角色。2 月 13 日，他被任命为苏联部长会议交通和通信局主席团主席，这一方面使他能够参与政府工作，但另一方面，也严重限制了他处理外交政策问题的可能性。

变化不止于此，还波及到了下一级权力层。1 月 17 日，米·格·别尔乌辛被任命为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1 月 25 日，又被任命为苏联部长会议化学和电站局主席团主席。瓦·阿·马雷舍夫“从”机器制造工业部“调到”了完全属于国防领域的造船工业部。一个月后的 2 月 25 日，恢复了以海军上将伊·斯·尤马舍夫为首的苏联海军部[709]。

随后才发生了最关键的事情。4 月 7 日，政治局，更确切地说是“七人小组”，讨论了“苏联部长会议的问题”，决定“接受斯大林同志的以下提议：

1.任命尼·阿·布尔加宁同志为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

2.成立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团委员会，委托其审议当前的紧急问题以及机密问题。

3.批准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团委员会的组成如下：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约·维·斯大林，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尼·阿·布尔加宁，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拉·帕·贝利亚、列·米·卡冈诺维奇、阿·伊·米高扬、维·米·莫洛托夫。

4.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团委员会会议每周举行两次，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团会议每十天举行一次。

5.在斯大林同志缺席的情况下，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团委员会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团会议的主持工作由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尼·阿·布尔加宁同志担任。”[710]

这次改组不仅表明斯大林公开干预最高领导层内部的斗争。它还显示出更重要的一点——政府核心的形成，成员包括明显拥护强硬路线的人，以及那些直接负责军队和军事工业综

合体的人。正因为如此，布尔加宁成为了新的实际内阁首脑，而且，和沃兹涅先斯基一样，他只是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观点的执行者。在布尔加宁的四位副主席中，和战争时期一样，有贝利亚，他继续负责监督核项目和火箭项目；莫洛托夫和米高扬则负责外交政策和物资供应问题。而卡冈诺维奇，就像在战时国防委员会（ГКО）中伏罗希洛夫的角色一样，他的存在和投票只是为了全力支持斯大林的领导地位，在出现严重意见分歧时为斯大林提供保障。

将马林科夫和他的盟友萨布罗夫排除在政府核心之外，很可能是斯大林对格奥尔基·马克西米利安诺维奇（马林科夫）过于明显地坚持自己对所发生事情的看法、试图将温和路线强加给最高领导层——从对抗转向缓和、在保持加盟共和国独立性的同时打击党官僚主义——的反应。然而，事实证明，斯大林已经没有了以前的力量，无法坚持要求无条件执行他的意志。

仅仅一周后的 4 月 15 日，同样是这个“七人小组”，被迫同意马林科夫非常坚持的愿望（或要求），让他加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团委员会，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他不能满足于仅仅在党内处于第二号人物的地位。政治局实际上修正了之前的决定，又通过了一项决议：“将格·米·马林科夫同志纳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团委员会成员。”[711]

马林科夫通过对联共（布）中央机关最重要职能部门负责人的又一次更换，巩固了自己现在更加稳固的地位。在短时间内——从 5 月 30 日到 6 月 13 日，他任命了以下部门的负责人：外交和外贸机关干部部——费·伊·巴拉年科夫，重工业部——瓦·伊·阿列克谢耶夫，机器制造部——伊·德·谢尔宾，计划、财政和贸易机关干部部——尼·尼·沙塔林，党的、工会和共青团机关干部部——格·帕·格罗莫夫，行政部——瓦·叶·马卡罗夫[712]。不久前，联共（布）中央机关还拥有了自己的、不再依赖于苏联国家安全部（МГБ）的封闭通信系统。苏联国家安全部（МГБ）于 1949 年 10 月 19 日成立的联共（布）中央特别事务管理总局负责密码的编制和解密、文件的传递和秘密材料的递送[713]。

作为负责农业问题的书记，马林科夫的下一步行动是准备并批准了联共（布）中央的五项决议：5 月 30 日的《关于加强小型集体农庄》、6 月 19 日的《关于开展宣传并推广科学成就和先进经验的工作》、6 月 29 日的《关于立即采取措施确保集体农庄拥有自己的高质量良种》、7 月 9 日的《关于进一步加强集体农庄主席和其他领导工作人员队伍建设》、7 月 14 日的《关于瓦·罗·威廉斯关于草田轮作制学说中的某些错误观点以及在实际应用中存在的不足》。总的来说，这些决议旨在将农业从多年来一直处于的危机状态中解救出来。这些决议设想广泛使用终于出现的技术——拖拉机、联合收割机。为了最优化地使用机器设备，需要通过合并规模较小、长期处于“落后”状态、未能摆脱贫困的集体农庄，大幅扩大耕地面积。这些决议并不局限于这些措施，还要求彻底重组农业部门的所有工作。只提拔具有高等或中等专业教育背景的人担任领导职务。依靠农业技术科学的成就，实现所有农作物，尤其是粮食作物的大幅增产，以及牲畜数量的显著增加。

与此同时，在萨布罗夫的总体领导下制定的国家电气化十年计划也开始呈现出具体的轮廓。7 月 15 日，政治局批准了关于建设斯大林格勒水电站和乌拉尔水电站的决议；8 月，苏联部长会议批准了关于建设古比雪夫水电站的决议，这在第三个五年计划中就已经有所提及；9 月，批准了关于建设卡霍夫卡水电站的决议。与此同时，还出台了一系列政府决议，旨在发展该国干旱地区的灌溉事业：7 月，关于开始建设土库曼大运河的决议；9 月，关于建设南乌克兰运河和北克里米亚运河的决议；12 月，关于建设伏尔加-顿河运河的决议。

这些工程的建设旨在同时解决两个问题。首先，要可靠地保护最重要的农业地区免受任何自然灾害的影响，主要是干旱。完成 1948 年开始的营造防护林带的工作。与此同时，要以巨大的规模为整个国家的经济提供电力能源。除其他方面外，还要满足核工业的需求。

对所有这些决议的宣传，总体上被称为“共产主义的伟大建设工程”。就像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一样，这些工程应该激发民众无限的热情，让民众认识到，他们距离美好的光明未来已经不远了。而且，如果能够实现这些计划，不仅能够赶上，而且能够超过西方发达国家，不是在总体的、总的指标上，而是在更重要的方面——人均产量上。然而，这些计划和承诺再一次只能成为美好的愿望。

就在那时，1950 年夏天，冷战出人意料地进入了最危险的阶段。这再次迫使苏联将所有力量投入到新一轮的军备竞赛中。

第二十五章

苏联部长会议的新核心，也就是实际上几乎全员参与的小范围领导层（仅科兹洛夫除外），开始改变其对外政策的空间导向。将重心从西欧转移到远东。在那里，似乎中国革命的胜利为积极广泛的渗透创造了机会，得以在世界广阔地区站稳脚跟。很多事情似乎都证实了这种看法。不久前，印度、巴基斯坦和缅甸获得了独立。1949 年 12 月，印度尼西亚人民战胜了荷兰军队以及支持荷兰的英国。1950 年 1 月，经过与法国殖民者四年的斗争，越南宣布独立。菲律宾和马来亚也爆发了内战。

1950 年 1 月 12 日，刚刚接替马歇尔出任美国国务卿的迪安·艾奇逊，在华盛顿的全国新闻俱乐部发表讲话，宣布日本以及琉球群岛和菲律宾为美国的“防御线”。他表示，杜鲁门政府准备向亚洲各国人民提供他们所需的帮助。但他还说了别的内容。他称，完全符合俄罗斯的传统政策，苏联试图将中国北方领土分离出去并吞并。就像它对蒙古已经做过的那样，还打算对满洲和新疆也这么做。

毫无疑问，2 月 14 日在莫斯科签署的苏中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加剧了美国人的怀疑。该条约具有明显的反日倾向。因为在条约中明确指出：“一旦缔约国任何一方受到日本或与日本同盟的国家之侵袭因而处于战争状态时，缔约国另一方即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及其他援助（着重号为我所加。——Ю.Ж.）。”这样一来，虽然没有直接提及，但也不排除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

但对于评估亚洲出现的实际局势，以及评估莫斯科与北京之间的新关系而言，同一天签署的关于中长铁路（现在称为中国长春铁路）、关于旅顺和大连的协议也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实际上，这涉及到苏联的军事基地以及连接这些基地与苏联领土的交通线。这些应该在与日本签署和平条约后移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但不得迟于 1952 年底。在此之前，它们处于苏中共管之下[714]。

小范围领导层的成员对当时世界局势的评估相当相似。在朝鲜战争爆发前仅三个月——3 月 9 日，马林科夫在选民面前发言时说：“苏联政府忠于世界和平事业，将继续不懈努力，全面维护世界和平，并准备积极参与所有旨在防止新战争、维护世界和平的真诚计划、举措和行动。”第二天，莫洛托夫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只是语气更加强硬和严厉。“我们，”他非常谨慎地表达了自己对问题的看法，“完全坚持列宁-斯大林关于两种制度和平共处的原则，以及它们之间和平的经济竞争。

但我们深知这样一个真理，只要帝国主义存在，就存在新的侵略危险……”[715]。只有斯大林在 1950 年的春天和夏天保持着异乎寻常的沉默。他从未就对外政策问题发表过意见。甚至没有以最普通的形式——接受采访。因此，没有任何迹象预示着 6 月 25 日发生的事情。朝鲜北方军队对韩国领土的进攻。

朝鲜战争为什么会爆发呢？直到现在，尽管进行了坚持不懈的寻找，但仍然没有发现任何文件能够证实克里姆林宫事先批准了这场战争。没有斯大林或莫洛托夫的同意，也没有小范围领导层中其他人的同意，甚至没有口头的但必须有正式会议记录记载的同意。也没有 1950 年 4 月 10 日金日成与斯大林、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和维辛斯基会面时签署的任何苏朝秘密协议。如今可以认为，这样的约定根本就不存在。很可能，朝鲜半岛战争的发起者是平壤——而且得到了北京的默许，北京为了在发生直接冲突时确保得到莫斯科的支持，为自己提供了保障。苏联及其小范围领导层，从各方面来看，只是被告知即将发生的事情。因此，不得不只做一件事，即接受这一事实，并预计美国及其盟友不会干涉这场局部冲突，或者只是来不及干涉，会接受既成事实。

苏联驻平壤大使 Т.Ф.什特科夫收到的“指令”就是直接证明，该指令由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和葛罗米柯于 1949 年 9 月 24 日批准，也就是在朝鲜战争爆发前整整九个月。这份文件极其坦率地表达了苏联领导层的真实立场：

“兹委托什特科夫同志会见金日成和朴宪永，并严格按照以下文本传达以下内容：

鉴于您在 8 月 12 日与我谈话中提出的问题，我接到指示，向您转达莫斯科对您所提问题的意见。

您关于朝鲜人民军开始向南方进攻的提议，需要对这个问题的军事和政治两方面进行准确评估。

从军事角度来看，不能认为朝鲜人民军已经为这样的进攻做好了准备。准备不充分的进攻可能会演变成旷日持久的军事行动，这不仅不会导致敌人的失败，反而会给朝鲜北方带来重大的政治和经济困难，当然，这是不能允许的（着重号为我所加。——Ю.Ж.）。由于目前朝鲜北方与朝鲜南方相比，在武装力量方面没有必要的优势，必须承认，目前向南方的军事进攻是完全没有准备好的，因此从军事角度来看是不可行的（着重号为我所加。——Ю.Ж.）。

从政治角度来看，您提出的向南方的军事进攻也没有准备好。当然，我们同意您的观点，人民渴望国家的统一，而且在南方，人民还渴望摆脱反动政权的压迫。然而，到目前为止，为了发动朝鲜南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积极斗争、在整个朝鲜南方开展游击运动、在那里建立解放区并组织力量进行全民起义，所做的工作还很少。同时，只有在已经开始并真正展开的人民起义的条件下，即动摇反动政权基础的情况下，向南方的军事进攻才能在推翻朝鲜南方反动派和实现将整个朝鲜统一为一个民主国家的任务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由于目前在朝鲜南方开展游击运动和准备全民起义方面所做的工作还很少，必须承认，从政治角度来看，您提出的向南方的进攻也没有准备好（着重号为我所加。——Ю.Ж.）。

至于夺取瓮津半岛和开城地区的局部行动，其结果将使朝鲜北方的边界几乎推进到首尔，不能将这次行动视为其他任何情况，而只能视为朝鲜北方和南方之间战争的开始，而朝鲜北方在军事和政治方面都没有为此做好准备，正如上面所指出的。

此外，必须考虑到，如果军事行动由北方发起并具有持久战的性质，那么这可能会给美国人以各种理由干涉朝鲜事务（着重号为我所加。——Ю.Ж.）。

鉴于上述情况，应该承认，目前争取朝鲜统一的斗争任务需要最大限度地集中力量，首先是在朝鲜南方开展游击运动、建立解放区并准备全民武装起义，以推翻反动政权并成功解决整个朝鲜的统一问题；其次是进一步全面加强朝鲜人民军。”[716]

苏联领导层正是以这种极其坦率和明确的方式，试图向平壤解释并证明，他们所设想的战争根本不可能发生，因此如果战争爆发，它会立即变成一场轻率的冒险。此外，该指令还对半岛上可能发生的事件发展做出了惊人准确、无误的预测。军事行动必然会旷日持久，会给美国直接干涉的理由，必然会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引发政治和经济危机。很难想象，在接下来的九个月里，对局势如此周全的评估会发生重大变化。毕竟，平壤未能解决莫斯科提出的任何一项必要任务，尽管这些任务只是初步的。

苏联驻安理会代表 Я.А.马利克的奇怪且无法解释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这一假设。更确切地说，他在 6 月 27 日的会议上故意缺席，而不是利用否决权否决一项决议，该决议建议联合国成员国向“朝鲜共和国提供必要的援助，以击退武装进攻并恢复该地区的国际和平与安全”[717]。然后，7 月 7 日，又有一项决议——关于在美国领导下在朝鲜组建联合国部队联合司令部的决议。与此同时，苏联政府在给联合国秘书长特里格韦·赖伊的正

式回复中，以及外交部在对美国和英国的声明和照会中，都以各种方式回避对直接提出的问题“苏联是否承认对所发生的事情负有责任”给出明确答案。同时，不知为何，他们将自己和对手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另一件事上——联合国和安理会中没有代表北京而非台北的合法中国代表，以及杜鲁门命令第七舰队转移到台湾海岸“是对中国的直接侵略”[718]。这难道不是小范围领导层试图暗示，到底谁才是真正的责任人吗？……

毫无疑问，华盛顿将朝鲜半岛上发生的事件视为苏中条约隐藏目标得以实现的开始。视为“共产主义”在亚洲公开进攻的开始。因此，6 月 27 日，杜鲁门就命令美国武装部队向韩国军队提供一切必要的支持，三天后，又下令向朝鲜派遣美军。

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小范围领导层很可能试图找到一个对自己来说可以接受的办法，摆脱所陷入的困境。然而，北方军队的胜利，迅速推进几乎占领了整个半岛，这使得当时难以采取一个足够坚定、明确的立场。8 月 1 日，突然恢复履行职责的 Я．А.马利克试图按照莫斯科的指令，利用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有利的局势。他提议邀请平壤和首尔的代表参加安理会会议，以便在他们的参与下实现停止战斗行动。与此同时，苏联政府通过交给美国驻莫斯科大使的两份照会，似乎与冲突保持了距离。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划定了其境外的区域：9 月 4 日——因在旅顺地区苏联飞机遭到炮击，10 月 8 日——记录下美国飞机在符拉迪沃斯托克附近侵犯苏联领空的事件。

与此同时，以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为首的美国-联合国部队在战争进程中取得了重大转折。9 月 16 日，在仁川地区空降了 5 万名伞兵，不仅迫使朝鲜北方部队从南方撤退，还为未来的反攻创造了强大的桥头堡。

苏联领导层意识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面临的严重威胁，试图通过外交手段挽救金日成政权，使其免于可能的崩溃。9 月 20 日，А.Я.维辛斯基在联合国大会会议上发言，再次呼吁四大强国“联合它们的和平力量，相互之间签订加强和平的条约”，并补充说，应在 1950 年当年就开始将各自武装力量的数量削减三分之一。10 月 2 日，他如承诺的那样，在第一次发言中就具体的、威胁到世界稳定的事件发表了看法，提议将朝鲜事件定性为“两个政府阵营之间的内部斗争，内部内战”，因此建议解散联合国朝鲜委员会，“该委员会的行动……助长了朝鲜内战的爆发”[719]。当然，他没有得到支持。

与此同时，美国，也就是联合国部队，早已开始准备反攻。10 月 19 日，他们占领了平壤，到月底几乎推进到了分隔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鸭绿江。在这种情况下，北京早在 8 月 20 日就通过电报向联合国提醒大家，中国与朝鲜接壤，因此将支持其邻国，并以“志愿军”的身份将武装力量派往朝鲜北方领土（中央情报局于 10 月 20 日记录了这一情况）。11 月 4 日，中国各民主党派发表了联合声明。声明中公开指出：“中国人民不仅在道义上有责任帮助朝鲜人民进行反对美国的斗争。援助朝鲜也符合全体中国人民的利益，是出于自卫的需要。拯救我们的邻国就是拯救我们自己。为了保卫我们的祖国，我们必须帮助朝鲜人民。”[720]

中国“志愿军”的出现不仅非常迅速且极大地改变了半岛上的力量对比，使其有利于北方军队，而且也决定了此后战斗行动的整个进程。

然而，莫斯科不排除事件发展的最糟糕情况，采取了它认为紧迫的所有必要措施。8 月 16 日，政治局批准了苏联部长会议特别委员会科学技术委员会的组成，以加速创建最新的防空火箭系统“金雕”。9 月 8 日，为了尽可能协调整个东方集团的经济力量，米高扬被批准为苏联驻经济互助委员会代表，实际上成为了该组织的负责人。9 月 25 日，同样是米高扬被委托，与交通部长韦谢夫和副外长葛罗米柯一起，“在一天内”向政治局提交关于修建从苏联边境到满洲里车站的铁路的建议，这条铁路旨在为中国和朝鲜提供必要的武器、燃料

和粮食的额外运输线路。最后，10 月 24 日，在美国进攻正酣之际，政治局通过了一项极其严肃的、针对极端情况的决定——“关于保存和创建军事技术生产的动员能力”[721]。直到 11 月，小范围领导层才认为应及时直接介入冲突，当然，这一行动严格保密。为了从空中保护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派出了“洛博夫军团”，如政治局会议记录中所称呼的那样——苏联空军第 64 歼击航空军[722]。

然而，莫斯科仍然无法下定决心。没有选择最终的行动路线：是寄希望于和平解决冲突，还是进行到底的对抗，直至以第三次世界大战结束的逻辑结局。如此长时间（持续了四个多月）寻找解决方案的原因，是发生了一件成为苏联最重要国家机密的事件。斯大林再次身患重病。这场疾病迫使他从 8 月 2 日至 12 月 21 日的四个半月时间里，无法参与小范围领导层的工作，无法做出任何决定，甚至无法就最重要的、原则性的内外政策问题发表意见。在世界处于核战争边缘的那个时刻，他离开了对国家的领导。

克里姆林宫观点的双重性和不确定性，在布尔加宁 11 月 6 日的报告中得到了相当清晰的体现。按照传统，在对国际形势进行评估时，他首先提出了一种只有和平的理念才起决定性作用的观点。他重复并稍微扩展了斯大林两年前的提议——“尽快与德国签订和平条约，撤出占领军，并建立一个全德政府”，提出了“尽快与日本签订和平条约，从日本撤出占领军”的要求。但同时，他展示了小范围领导层在解决朝鲜问题上存在两种相互排斥的方法。他首先表示：“苏联政府忠于其不变的和平政策，从朝鲜事件一开始就坚持通过和平手段解决冲突……提议立即停止朝鲜的军事行动，并同时撤出所有外国军队，从而让朝鲜人民能够在没有外国干涉的情况下解决自己的内部事务。”但在报告的结尾，他又大胆地发出了直接威胁，不排除苏联可能公开介入朝鲜战争的可能性。“历史经验表明，”布尔加宁说，“我们的和平政策并不是软弱的表现。这些先生们（‘战争煽动者’。——Ю.Ж.）早就应该明白，我们的人民有能力为自己辩护，为自己祖国的利益而战，如果有必要的话——拿起武器（着重号为我所加。——Ю.Ж.）。”[723]

类似的、极具战斗性的情绪在美国也开始显现。在 11 月 24 日发起的、被宣传为必将在“圣诞节”前结束战争的进攻失败，以及美军撤回三八线之后，联合国军在朝鲜的总司令麦克阿瑟建议杜鲁门开始轰炸中国领土，如果有必要，甚至包括苏联，并且使用核武器。11 月 30 日，在回答记者关于朝鲜进一步军事行动的问题时，美国总统突然表示：“我们将采取军事形势所需的一切必要措施。”当被要求澄清“甚至使用原子弹吗？”时，他补充道：“包括我们所拥有的所有武器。”[724]这样一来，杜鲁门就面临着一个选择——不惜一切代价取得胜利，甚至对中国、苏联进行原子弹轰炸，从而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或者接受的不是失败，而是仅仅恢复到 6 月 25 日之前的状态。

1951 年 1 月 13 日，杜鲁门做出了选择。他表示不希望进一步扩大战斗行动的规模和性质。四个月后，在再次提议轰炸中国之后，他解除了麦克阿瑟将军的职务[725]。克里姆林宫听到了这个明确的、尽管非常谨慎的回到战争爆发前状态的提议。此外，他们理解并认为这是一个很有可能且理想的摆脱困境的方式。在冲突发展到这样的阶段结束冲突，而无需向苏联人民做出解释，这可以借助苏联宣传的特点来实现，苏联宣传明确地将朝鲜战争视为美国和首尔政权毫无掩饰的侵略。因此，恢复三八线边界很容易被宣传为和平力量的又一次“令人信服的胜利”。但为此，首先必须放弃强硬的外交政策路线，摆脱那些推行这一路线并使苏联陷入极其危险境地的小范围领导层成员。

一个很可能发生变革的第一个迹象是 2 月 17 日《真理报》发表的对斯大林的采访。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按照“记者”精心设计的问题顺序，构建了新的外交政策理念：“……任何一个国家，包括苏联国家，都不可能在全力发展民用工业、启动像伏尔加河、第聂伯河、阿姆河上的水电站这样需要数十亿预算支出的大型建设项目、继续实施系统降低大

众消费品价格（这同样需要数十亿预算支出）的政策、投入数百亿资金恢复被德国占领者破坏的国民经济的同时，还能同时增加武装力量、发展军事工业。不难理解，这样轻率的政策会导致国家破产。”

然后，斯大林提醒人们苏联方面曾提议立即签署五大国和平条约、开始裁军、禁止核武器。然后，他以自己惯常的教义问答形式，谈到了朝鲜战争：“您如何看待对朝鲜的干涉，它可能会如何结束？如果英国和美国最终拒绝中国人民政府的和平提议，那么朝鲜战争只能以干涉者的失败而告终。为什么呢？难道美国和英国的将军和军官比中国和朝鲜的差吗？不，并不差……很难让士兵相信，美国有权在朝鲜领土和中国边境保护自己的安全，而中国和朝鲜也无权保卫其在本国领土或国家边界的安全。因此，这场战争在英美士兵中不受欢迎。最后，他说了最主要的事情：“你认为新的世界大战是不可避免的吗？不。至少在目前，它不能被认为是不可避免的.....至于苏联，它将继续坚定不移地奉行防止战争和维护和平的政策。

前一天，即 1951 年 2 月 16 日，由斯大林、布尔加宁、贝利亚、马林科夫、莫洛托夫、米高扬、赫鲁晓夫组成的人民党在萨布罗夫的参与下，做出了三个相互关联的决定，并决定了国家两年多来的命运。根据第一项规定，N.A.布尔加宁被解除了协调委员会主席的职务，换句话说，“鉴于他的日程繁忙”，他在和平时期担任该国武装部队的最高指挥官。战争部长 A.M.华西列夫斯基被批准为委员会主席，总参谋长 S.M.史特缅科被批准为副参谋长。到第二幕时，布尔加宁又回到了他原来的军工联合体负责人的位置，随着朝鲜战争的开始而被夺走：

“关于成立军事工业和军事问题局。苏联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和苏联部长会议决定：1.在苏联部长会议下成立军事工业和军事问题局。将以下工作委托给军事工业和军事问题局领导：ａ）航空工业部；б）武器装备部；в）国防部；г）海军部。3.任命 Н．А．布尔加宁同志为军事工业和军事问题局主席，任命 М．В.赫鲁尼切夫、Д.Ф.乌斯季诺夫、А.М.华西列夫斯基、И．С.尤马舍夫同志为该局成员。”

第三项决定从根本上改变了国家安全领域的权力体系本身。

“关于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团的问题。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团会议以及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团事务局会议的主持工作，将依次委托给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布尔加宁、贝利亚和马林科夫同志，同时委托他们审议和解决当前问题。苏联部长会议的决议和指令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И．В.斯大林同志的名义发布（着重号为我所加。——Ю.Ж.）。”[726]

最后这句话，无论是在此之前还是在此之后，在类似文件中都再也没有出现过，它非常奇怪，无论是解读、理解还是解释起来都很困难。

如果这句话是在斯大林知情并同意的情况下被写入文本的，那么它传达出以下含义。由于某些明确且实际的、非常严重的原因，这些原因可能是他被其他更重要的工作缠身，或者是在重病之后工作能力严重下降，斯大林将自己的高级权力委托了出去。他允许，而且不是允许其他人，正是布尔加宁、贝利亚和马林科夫在一段不确定的时间内以他的名义主宰国家的命运。

当然，对这份文件也可以有另一种解读。如果文件的最后一句话，实际上就像整个决定一样，是违背斯大林的意愿出现的，或者是他个人在强大压力下被迫接受的，那么它的含义就恰恰相反。也就是说，在那一天，苏联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实际上（但绝非在法律意义上）被排除在了领导地位之外。但无论如何，不管是出于自愿还是被迫，斯大林实际上都不得不远离权力，仅作为国家名义上的首脑存在。

目前所有已知的数据都让人倾向于接受对 1951 年 2 月 16 日政治局决定最后一句话的第二种解读方式，直到最终有机会研究斯大林的个人档案（该档案至今仍在俄罗斯总统档案馆中处于保密状态）为止。当然，这样的说法与所有现存的概念都绝对矛盾，需要有确凿的证据。那么有这样的证据吗？

首先应该考虑一个众所周知、无可争议的事实作为第一个论据。斯大林文集的出版在他去世前……两年时突然停止了，至今也没有人能解释其中的原因。

1951 年 3 月 24 日，斯大林完成了对新一册，即第十三册（不祥的预兆！）文集的工作，又额外收录了八篇文章。4 月 11 日，他审阅了书籍的排版并签字付印，第二天又签署了序言。两周后，这本书开始发行。然后，根据政治局为庆祝领袖七十岁诞辰而做出的决定出版的“主要著作”文集，在没有任何解释的情况下就停止出版了。

所有人都忘记了斯大林文集这件事。负责编纂文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的工作人员，以及负责文集出版的宣传鼓动部门的领导们都对此保持沉默。小范围领导层的成员、政治局成员，甚至斯大林本人都不再提及斯大林文集的出版。文集出版工作停止的原因不太可能是编纂下一册，即第十四册时遇到了困难。因为这一册本应收录斯大林在 1934 年至 1940 年间的文章、演讲和采访，这些内容已经多次在报纸上、单独的小册子中以及《列宁主义问题》文集中发表过。

对于这一异常事件的原因，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来解释。这是小范围领导层试图以此表达他们对那个表面上仍被尊崇为在世神明的人的新的冷漠态度。但这种情况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才会发生——那就是斯大林被剥夺了权力。

还有一个令人惊讶的类似论据。几乎就在同一时间，《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 И．В．斯大林与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和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在伟大卫国战争期间的通信集》毫无解释地突然决定不出版了。在莫洛托夫的领导下，外交部的工作人员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了这本书的筹备工作。从 1950 年 4 月 15 日开始，到 1951 年 3 月 31 日结束。然而，就在排版工作进行时（1951 年 9 月 22 日完成了全部校对工作）[727]，某个或某些身份不明的人做出了一个决定（目前在档案中尚未发现该决定的痕迹）：不出版该通信集。直到六年后的 1957 年，在苏共二十大和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之后，这本书才得以出版。

当然，关于停止出版这本书的决定可以用纯粹的形势因素来解释。在冷战加剧、朝鲜正式的局部冲突达到高潮（这场冲突随时可能演变成全球核灾难）的时期，小范围领导层或斯大林本人坚定地决定不再回忆、不再提及与美国和英国过去的联盟关系，以及三大强国之间的战斗合作。如果这一行为是个孤例，那么这样解释是说得通的。但如果同时斯大林文集的出版也停止了，那就不能单纯这样解释了。

还有另一个同样不寻常的论据支持上述假设。1949 年，莫斯科开始建造高层建筑，其中包括位于列宁山的莫斯科大学新校区。该建筑由建筑师 Л．В．鲁德涅夫、С．Е．切尔尼舍夫、П．В．阿勃罗西莫夫、А．Ф．赫里亚科夫以及工程师 В．Н．纳索尼夫设计。该设计方案预计，莫斯科大学新校区的中央最高建筑将矗立一座巨大的斯大林雕像。这个设计方案多次展示和重现。甚至一张相关照片还被收录进了《苏联大百科全书》第二版的第三卷中，作为第 221 页前插页上“建筑”词条的配图。这一版百科全书于 1950 年 5 月 17 日签字付印。但一年半后，在 1951 年 12 月 3 日签字付印的第九卷中，刊登了一篇名为“高层建筑”的文章。同样作为插页配图，放入了一张莫斯科大学建筑的照片，照片上精确标注了拍摄日期——1951 年 11 月（这在百科全书中是不常见的）。但此时，原本预计将俯瞰首都的宏伟斯大林雕像的位置，现在只有一个尖顶了。

支持第二种解读的数据还不止这些。更有分量的论据应该是斯大林昔日同僚们的证词，而且这些证词不是在几十年后（那时记忆可能会受到公众舆论的影响而出现偏差）给出的，而是在斯大林去世仅仅四个月后，基于当时的清晰记忆做出的。

1953 年 7 月，在苏共中央全会上，与会者最后一致通过将贝利亚从他所担任的所有职务上撤职，并将他送交法庭审判，罪名是“企图发动国家政变”。新领导层的成员们在无意中明确证实了，在我们所讨论的这段时期，斯大林确实不再参与任何问题的决策。

赫鲁晓夫说：“最近，斯大林同志不看文件，也不见人，因为他的身体很虚弱。”

卡冈诺维奇说：“斯大林同志最近无法像以前那样积极工作并参与政治局的工作。”

赫鲁晓夫和卡冈诺维奇都使用了“最近”这个不确定的表述，这既可以指斯大林生命的最后几周，也可以指最后几个月或几年。但全会的另外两位同样消息灵通的参与者，指出了更明确、具体的时间段。

伏罗希洛夫说：“由于过去几年（着重号为我所加。——Ю.Ж.）的高强度工作，斯大林开始变得行动不便。”米高扬在谈到斯大林对经济互助委员会、军事协调委员会和情报局秘书处（这些机构在当时对确定和调节苏联与东方集团国家的关系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的活动的态度时，明确指出：斯大林“在过去两年（着重号为我所加。——Ю.Ж.）不再对它们感兴趣”[728]。

就这样，四位多年来一直身处小范围领导层、知晓克里姆林宫许多秘密的人，在一次非公开会议上（并非为了公开报道或广泛传播信息），谈及完全不同的话题时，无意中直接证实了，斯大林确实在去世前大约两年就已远离了事务的管理。

实际上，斯大林的私人秘书 А.Н.波斯克列贝舍夫在 1954 年 7 月 19 日向苏共中央主席团提交的报告中也谈到了类似的情况，当时他对 7 月全会上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我还想谈一下，”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写道，“关于处理提交给斯大林同志的文件的问题。

处理文件的程序是由斯大林同志制定的，具体如下。所有提交给斯大林同志的文件，除了国家安全部的高度机密文件外，都由我和我的副手亲自审阅，然后口头向斯大林同志汇报，或者根据他的所在地将文件送给他。斯大林同志审阅过的文件，部分会带着相应的批示返回以便执行，或者直接转交给政治局的某位成员，其余的则留在他那里（着重号为我所加。——Ю.Ж.）。随着文件的积累，他会叫我来整理这些文件，同时给出指示，哪些文件留在他那里，哪些文件送到党中央的特别部门。返回的文件会进入档案库，并在那里进行登记。部分需要做出决定的文件，会再次送交或汇报给斯大林同志，或者根据问题的性质，送交政治局成员、党中央书记们进行相应的审议。国家安全部标注有部长批示‘仅限本人拆阅’的高度机密文件，会直接送交斯大林同志，不在党中央特别部门拆阅。”[729]

波斯克列贝舍夫在描述斯大林处理提交给他审议、批准的文件的工作特点时，只遗漏了一个细节——他没有指出这种工作方式具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然而，从文本和上下文可以很清楚地看出这一点。提到“国家安全部部长们”，这只能指的是 1951 年至 1952 年。此外，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在上面的两个段落中还描述了弗拉西克与他自己以及斯大林之间的关系，这与 1952 年春天弗拉西克被卷入的财务丑闻有关。

还有更确凿的论据支持第二种解读。首先，是斯大林在 1950 年 12 月 13 日写给马林科夫的信，也就是在做出如此关键的决定前不久。“我回来晚了，”斯大林写道，“因为莫斯科的天气不好，而且担心感染流感。等天气转冷，我会立即回到岗位。”[730]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在国家面临最关键的时刻，当核战争是否爆发的问题悬而未决时，国家领导人唯一担心的事情是害怕感染流感。他把恢复履行职责的时间取决于天气情况。然而，如果不是第

二年 2 月 16 日发生的事情，对于这样一份鲜明的、完全体现人性的文件，也许可以不必给予太多关注。

其次，更具说服力的是“斯大林克里姆林宫办公室访客日志”，波斯克列贝舍夫在其中不仅一丝不苟地记录了访客的姓氏，还精确记录了他们到达和离开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办公室的时间——小时和分钟。这使得我们能够发现一些非常值得注意的情况。斯大林的工作能力下降始于 1950 年 2 月，并在 1951 年 5 月达到了最低点并趋于稳定。如果 1950 年，考虑到 18 周的休假（生病？），他在克里姆林宫办公室接待访客的纯工作天数为 73 天，那么第二年只有 48 天，而在 1952 年，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根本没有休假（没生病？），这一数字为 45 天。为了进行比较，可以参考之前时期的类似数据。1947 年，斯大林这样的工作天数为 136 天，1948 年为 122 天，1949 年为 113 天。而且这些年份他都有为期三个月的常规休假。

斯大林每月的工作天数同样具有说服力。1951 年 1 月，他的工作天数为 10 天，2 月为 6 天，3 月为 7 天，4 月为 8 天，5 月为 5 天，6 月为 3 天，7 月为 5 天，8 月为 4 天。在 1951 年 8 月 10 日至 1952 年 2 月 11 日的又一次（这次是为期半年的休假（生病？））休假之后，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在克里姆林宫办公室的工作更少了。2 月为 3 天，3 月为 5 天，4 月为 4 天，5 月为 2 天，6 月为 5 天，7 月为 5 天，8 月为 3 天，9 月为 4 天，10 月（在党的第十九次代表大会召开的那个月）为 7 天，11 月为 9 天，12 月为 4 天[731]。

当然，这里还应该考虑到，斯大林不仅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会议、会见小范围领导层成员、接见下属和外国客人，还在“近郊别墅”——莫斯科郊区的“沃伦斯科耶”，以及在“绿色丛林”、“冷溪”、“穆谢拉”（他在黑海沿岸索契地区的度假住所）等地进行这些活动。然而，即使不参考他那尚未公开的“病史”，也可以很容易地得出唯一可能的结论。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如果是因为身体不适而被迫像以前那样减少高强度的日常工作，那么无论他是自愿还是被迫这样做的，都不是在生命的最后几周或几个月，而是要早得多。

但无论 1951 年 2 月 16 日的决定是由什么原因引起的，从那天起，苏联的权力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新变化。在权力金字塔的顶端，在某种虚幻的高位上，是身体虚弱的斯大林，他无论如何都保留了自己所有的官方职位和头衔。而实际的权力操纵杆，即对国家最重要问题做出最终决定的唯一和垄断权力，却掌握在新的三人执政团手中。就像以前斯大林本人作为战争时期国防委员会的核心一样，这个三人执政团将真正权力的两个分支连接在一起：由布尔加宁和贝利亚代表的国家行政分支，以及由马林科夫代表的党内分支。与此同时，三人执政团虽然将不同的力量联合起来，但却是被迫的，因为他们代表了关于苏联未来发展道路、其内外政策的不同观点。

布尔加宁，仅因为他是军事工业和军事问题局的主席，而贝利亚作为指导核武器和火箭制造领域所有工作的人，代表了“鹰派”的利益。他们是统治精英、广大领导层中的一部分人，这些人认为：国家首先应该发展重工业，将其作为国防的主要基础。应该在对外政策上保持强硬路线。在西方的压力面前不退缩，在任何事情上都不让步，以实力为基础与西方对话，并且为了巩固苏联的地位，用强大的武装力量来支持外交官的要求。

从许多间接数据来看，马林科夫仍然坚持较为温和的路线，反映了广大领导层中一个可以被称为“鸽派”的群体的观点。他们认为，苏联拥有自己的核武器就足以与美国保持均势。这使得苏联可以放弃对抗，与西方平等对话，因此应该结束冷战，转向缓和局势。同时，放弃军备竞赛，因为现在军备竞赛已经毫无意义，毫无成果，并且放弃优先发展重工业。现在应该将精力集中在振兴农业上，农业的危机状况每个月都在加剧，还要合理发展轻工业，以便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布尔加宁很可能并没有发挥独立的、实质性的作用，这对三人执政团中实际的权力平衡产生了影响，而这种权力平衡本应决定两种可能路线中哪一种会获胜。他传达斯大林的观点，同时支持贝利亚，实际上是在加强贝利亚的地位。此外，第三个权力层级（尽管是间接的）也应该对权力平衡产生影响。在 2 月 16 日之后，曾经存在的“七人小组”的成员处于这个权力层级，在三人执政团出现后，这个小组仅仅在形式上保留下来，失去了以前的重要性。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团成员：莫洛托夫、米高扬、柯西金、卡冈诺维奇。为了保住他们仍然拥有的权力，他们都必须要么以布尔加宁和贝利亚为导向，要么以马林科夫为导向。但在那之前，为了不失去一切，他们必须极其谨慎地行事。不明确表态。无论如何，在明确的胜利者出现之前都要保持谨慎，以便在最后、最关键的时刻再投靠胜利者。

结果，权力层级的变动使得第四个权力层级比过去几年具有了更大的意义，这个层级包括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党中央书记、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即那些处于权力核心之外的人。在经济中扮演关键角色的马雷舍夫、别尔乌辛、萨布罗夫、捷沃相；控制党的机构的波诺马连科、苏斯洛夫、赫鲁晓夫；仅仅拥有投票权、在会议上可能起决定性作用的伏罗希洛夫和什维尔尼克。最后，广大领导层中下一个层级的作用也大大增强。州委成员：列宁格勒州委第一书记 В.М.安德列阿诺夫、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 В.В.库兹涅佐夫、国家监察部长 Л.З.梅赫利斯、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 Н.А.米哈伊洛夫、白俄罗斯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 Н.С.帕托利切夫、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 Б.Н.切尔诺乌索夫。还有国家安全部长 В.С.阿巴库莫夫和（由于正式主席 А.А.安德烈耶夫长期重病）实际上的党中央委员会书记 М.Ф.什基里亚托夫。

为争取将他们拉为盟友，为增强或削弱他们的实际地位，以及对事件发展施加影响的斗争，早在 2 月 16 日之前就已开始。

1950 年 10 月 27 日，斯大林的坚定支持者梅赫利斯，因“鉴于其健康状况”，“难以履行职责”而被免去国家监察部长一职。取而代之的是曾任国家安全部长、长期以来（甚至在格鲁吉亚时期）就是贝利亚的同事和战友的 В.Н.梅尔库洛夫。

两个月后的 12 月 31 日，对国家安全部的领导班子进行了改组，让只听命于斯大林的阿巴库莫夫周围充斥着贝利亚和马林科夫的人。当天政治局做出的决定内容如下：

“鉴于苏联国家安全部的工作规模因从内务部接管边防部队和内卫部队、警察，以及组建新的行动管理部门而大幅增加，同时为了以集体方式审议国家安全工作中最重要的问题（着重号为我所加。——Ю.Ж.），苏联共产党（布）中央政治局决定：

1.将苏联国家安全部副部长的人数增至 7 人。

2.任命以下同志为苏联国家安全部副部长：免去 Е.П.皮托夫拉诺夫苏联国家安全部第二总局局长职务，任命其为副部长；免去 А.Н.阿波罗诺夫苏联部长会议下属全苏体育运动委员会主席职务，任命其为副部长；免去 Н.А.科罗廖夫苏联国家安全部第三总局局长职务，任命其为副部长。

3.任命 В.Е.马卡罗夫同志为苏联国家安全部负责干部工作的副部长，并委托马卡罗夫同志同时负责监督国家安全部各机关党组织的工作。免去 М.Г.斯维涅卢波夫苏联国家安全部负责干部工作的副部长职务，安排其在国家安全部系统内承担重要工作。”

同一决定还批准了国家安全部各总局的新领导：第二总局——Ф.Г.舒布尼科夫，第三总局——Я.А.叶杜诺夫，第四总局——П.С.梅尚尼诺夫，负责铁路和水上运输安全的部门——С.А.戈格利泽，部长下属监察局局长——П.П.康达科夫[733]。

几乎与此同时，12 月 30 日，对宣传鼓动部进行了改组。将其拆分，极大地削弱了苏斯洛夫的权力，拆分为四个独立部门：宣传鼓动部，负责人为 М．А.苏斯洛夫；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门，负责人为 Ю．А.日丹诺夫；文艺文学和艺术部门，负责人为 В．С.克鲁日科夫；学校部门，负责人为 П．В.济米宁。同一天，Г.П.格罗莫夫被任命为行政部门负责人——这一职位是在 В．Е.马卡罗夫调任国家安全部副部长后空缺出来的，而代替格罗莫夫担任党的、工会的和共青团机关部门负责人的是此前担任苏共中央驻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全权代表的 С.Д.伊格纳季耶夫。不久之后，1951 年 1 月 20 日，赫鲁晓夫的作用大幅增强。除了领导莫斯科市委和莫斯科州委之外，还委托他“监督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的工作”。对党的机关的调整以又一次针对苏斯洛夫的打击而告终。3 月 8 日，政治局决定停办宣传鼓动部的机关报《文化与生活》报，以及实际上也是该部门喉舌的《党的教育》杂志[734]。

在认为这样的准备工作已经完成之后，小范围领导层果断地对已经存在了近四年的苏联部长会议结构进行了改组。3 月 15 日，撤销了九个部门局中的五个——燃料工业局、农业和采购局、交通和通讯局、冶金和地质局、文化局。撤销这些部门局是为了掩盖贝利亚、马林科夫和莫洛托夫摆脱那些现在对他们来说多余且极其繁重的额外职责。实际上，将政府工作的大部分重担交给了马雷舍夫、别尔乌辛、萨布罗夫和捷沃相。该决定顺便还规定：“以前属于上述部门局的各部和各机关的问题，应直接在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团和事务局中进行审议。”同时，还非常巧妙地“排挤”了伏罗希洛夫。只委托他监督三个支援性的志愿协会：支援苏联陆军协会（DOSAAF，简称“杜萨夫”）、支援苏联海军协会（ДОСФЛОТ，简称“多斯弗洛特”）和支援苏联空军协会（ДОСАВ，简称“多萨夫”）（不久后这些协会将合并为一个组织——支援陆海空军志愿协会，即 ДОСААФ）。

以马林科夫为核心对苏联部长会议结构的改组几乎没有对他产生影响。他对农业部门的所有控制权早已掌握在苏联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书记波诺马连科手中。1950 年 10 月 27 日，波诺马连科被同时任命为苏联采购部长。但对三人执政团另一位成员的职责有特别规定。“贝利亚同志必须将其工作时间的一半用于第 1、第 2 和第 3 号事务”——也就是说，用于领导苏联部长会议下属的第一和第二总局，这些总局负责核武器计划，以及负责研发和制造火箭武器的特别委员会的相关部分[735]。

随后发生了在苏联通常意味着政治路线即将发生迅速而根本性转变的事情。6 月 23 日，苏斯洛夫被免去《真理报》主编职务，空缺职位由 Л.Ф.伊利切夫担任[736]。

第二十六章

同一天，根据从莫斯科收到的指示，苏联常驻联合国及安理会代表雅科夫·亚历山德罗维奇·马利克在联合国的广播节目中提出了一个轰动性的提议——立即开始关于结束朝鲜战争的谈判。

“苏联人民，”马利克说，“相信捍卫和平事业的可能性。苏联人民也相信，目前最尖锐的问题——朝鲜的军事冲突，是可以得到解决的。为此，需要各方有意愿走上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道路。苏联人民相信，作为第一步，交战双方应该开始就停火、休战以及双方军队从三八线后撤进行谈判。能否迈出这样的一步呢？我认为，如果真心希望结束朝鲜的血腥冲突，是可以做到的。我认为，为了实现朝鲜的和平，这并不是一个多么高昂的代价。”[737]

6 月 30 日，朝鲜半岛的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将军宣布接受马利克的提议。7 月 1 日，金日成和中国“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将军也表示同意。7 月 10 日，在朝鲜城市开城附近，交战双方开始了谈判。这样，就朝着局势缓和迈出了第一步。一个月后，第二步也随之而来。8 月 4 日，根据莫洛托夫的提议，政治局批准了一项决定，即今后不再坚持重新审议《蒙特勒海峡制度公约》，该公约的又一个五年期限已经届满[738]。

这样一来，小范围领导层最终放弃了自 1945 年以来对土耳其施加的外交压力，也放弃了对土耳其的领土要求。

最后，8 月 20 日，政治局成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负责筹备在莫斯科召开一次国际经济会议。莫洛托夫作为主席，米高扬、维辛斯基、苏斯洛夫、格里戈良、缅希科夫以及其他一些人作为成员，必须在五天内提出建议，这些建议不仅要确保会议能够召开，让除经济互助委员会成员国外尽可能多的国家代表参加会议，还要使苏联摆脱孤立状态，恢复在冷战时期的过去几年中失去的贸易联系。

然而，制定所需文件的工作出乎意料地拖延了下来。首先，这暴露出对外贸易部工作中存在的严重缺陷。正如 11 月 4 日政治局的决定所指出的，这些缺陷表现为“对外贸易部在与资本主义国家进行贸易活动时，没有对保障国家的对外贸易利益给予应有的关注，对对外贸易计划的执行情况监管不力，结果导致从国外为苏联采购和运送所需商品的工作延误，并且在某些情况下还允许进口质量低劣的商品，从而给国家造成了损害”。结论是传统的：“这些缺陷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对外贸易部部长缅希科夫同志无法胜任其职责所导致的。”同一决定解除了他的职务，并任命原第一副部长 И. Н. 库米金为新部长[739]。

直到会议召开前不久——1952 年 2 月中旬，而且还是新组成的委员会（成员包括莫洛托夫、米高扬、库米金、格里戈良、波诺马廖夫（来自宣传鼓动部）和扎哈罗夫（来自对外贸易部））才成功明确了会议的任务。一份特殊的指令规定：“苏联的主要目标是协助打破贸易封锁，以及美国政府近年来以越来越大的压力对苏联、人民民主国家和中国实施的经济歧视措施体系……会议应该找出恢复和发展国家间贸易和经济关系正常条件的可能积极方面。”因此，建议“为尽可能多的会议参与者提供发言机会，不要求他们提交特殊文件，以免为个别国家的代表设置特殊条件”[740]。换句话说，决定将国际经济会议完全去政治化，这次放弃了在这种情况下通常会发表的声明，因为那样做会导致会议计划失败。这是为了首先在国际贸易领域摆脱孤立状态，为苏联产品和原材料找到新的销售市场，以及在东方集团以外找到进口业务的合作伙伴。

另外两件不同寻常的事件同样是局势开始发生变化的显著证明。1951 年 7 月 20 日，海军元帅 Н. Г. 库兹涅佐夫重新担任了海军部长的职务[741]。这样一个看似平常，甚至是普

通的人事调动，在这种情况下却显得非常引人注目。要知道就在不久前，仅仅三年多以前，尼古拉·格拉西莫维奇不仅被免去职务，还站在了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面前，被指控叛国。而坚持以这种镇压性方式决定这位元帅命运的不是别人，正是当时“仅仅”担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武装力量部长的布尔加宁。

“在克里姆林宫的一个小房间里，”库兹涅佐夫回忆道，“那里通常会举行一些出席人数不多的高级领导人会议，在斯大林的主持下召开了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斯大林坐在一旁，听着海军将领们的发言。会议由马林科夫主持。他让所有舰队司令就海军部的事务发表意见……斯大林一句话也没说，只是在纸上写着什么……然后我们就被打发走了。斯大林只说尤马舍夫（海军部长。——Ю.Ж.）酗酒，建议考虑换人。大家都在等待上级的指示。第二天，我们在另一个房间里集合（好像是在马林科夫的办公室），当被问到我们考虑得怎么样了时，自然没有人回答。然后会议主席发言说，他们在政治局交换了意见，决定‘恢复’库兹涅佐夫的职务。”[742]

就这样，当布尔加宁成为三人执政团成员并领导军事工业和军事问题局时，他的私人敌人被恢复了原职。不久之后，另一位伟大卫国战争时期的指挥官开始了一种非常特殊的平反。7 月 24 日，《真理报》不仅刊登了一则消息，称在苏联政府代表团参加波兰复国日庆祝活动的成员中，除了莫洛托夫之外，还包括格奥尔基·康斯坦丁诺维奇·朱可夫元帅，而且还发表了他在华沙的演讲全文。

但三人执政团内部为争夺领导权、为自己的内外政策理念争取主导地位而进行的暗中斗争，尽管在 2 月 16 日之后也从未停止，最有力的表现却在其他方面。表现在铲除效忠于斯大林的、权势极大的国家安全部长阿巴库莫夫这件事上，新的小范围领导层的所有成员都对此同样感兴趣，但马林科夫的兴趣尤其大。因为对于巩固他所获得的地位来说，仅仅依靠党的机构是不够的。他非常希望得到国家安全部的支持，因为第二大强力部门——武装力量部由布尔加宁掌控，贝利亚也间接对其有一定影响力。

7 月初，一封来自国家安全部一名普通工作人员——中校、高级侦查员 М.Л.柳明的报告送到了党中央（毫无疑问，这离不开行政部门或党的、工会的和共青团机关部门的积极协助，也就是说，得到了马林科夫方面的必然支持）。在报告中，阿巴库莫夫被指控犯有许多罪行。其中包括雅科夫·格里戈里耶维奇·艾廷格尔离奇的死亡——艾廷格尔于 1950 年 11 月中旬被捕，在侦查结束前就死了。艾廷格尔是一名心脏病专家，莫斯科第二医学院某教研室主任，克里姆林宫医疗管理局的顾问，实际上也是贝利亚一家的医生，他已经“承认”参与了 А.С.舍尔巴科夫的死亡事件。国家安全部部长被指责没有向党中央汇报关于“艾廷格尔案件”的情况，以及另外两起“案件”的侦查进展：一起是“维斯穆特”股份公司总经理试图逃往联邦德国的案件，该公司在民主德国从事铀矿开采；另一起是在莫斯科“破获”的犹太民族主义青年恐怖组织案件。

7 月 4 日，政治局委托“由马林科夫同志（主席）、贝利亚、什基里亚托夫和伊格纳季耶夫同志组成的委员会，在三到四天内核实柳明报告中所述的事实，并向苏联共产党（布）中央政治局汇报结果”。委员会有足够的时间完成任务，而且仅过了两天，政治局就通过了《关于苏联国家安全部不良状况的决定》。一个月后的 8 月 9 日，阿巴库莫夫被撤职，取而代之的是侦查委员会成员、担任党的、工会的和共青团机关部门负责人的 С.Д.伊格纳季耶夫，他被任命为部长[743]。

从这一刻起，马林科夫和贝利亚试图从出现的局势中为自己谋取最大利益。他们利用自己制造的完全更换国家安全部领导层的必要性（8 月 9 日决定的第二项要求伊格纳季耶夫“向党中央提交关于国家安全部新的第一副部长和其他副部长的建议”），试图让自己的人担任这些职位。即使不能取得明显优势，至少也要达成某种平衡。

如果存在幕后交易的话，这场交易持续了两周多。直到 8 月 26 日才达成妥协。作为部长——党内干部的伊格纳季耶夫，他的第一副部长被任命为两位专业人士——С.И.奥戈尔佐夫和 С.А.戈格利泽。按照惯例，负责干部工作的副部长由党的工作人员 А.А.叶皮舍夫担任，他之前担任敖德萨州委第一书记和苏共中央监察员。而副部长的职位则进行了分配，但远非平均分配。四个职位给了专业人士，Е.П.皮托夫拉诺夫、Н.П.斯塔汉诺夫、П.Н.米罗年科、П.П.康达科夫。两个职位给了“外部人员”，即苏共中央监察员 С.Р.萨文科和苏联部长会议事务管理局副局长 С.В.叶夫斯塔菲耶夫。

通过人事调动争夺对国家安全部控制权的斗争并未就此结束。10 月 19 日，表现特别突出的柳明被任命为副部长兼特别重要案件侦查部门负责人。随后，两周后，萨文科被任命为第一副部长，取代了戈格利泽，戈格利泽被突然派往边远地区——乌兹别克斯坦。不过，贝利亚的另一位老同事 Л.Ф.察纳夫从明斯克被调过来，并被任命为第二总局（反间谍总局）局长。几乎与此同时，О.М.格里巴诺夫被任命为他的副手[744]。

三人执政团内部为争夺领导权而持续不断、虽然隐蔽但依然激烈的斗争，以及他们成员在关键问题上截然不同的观点——应该采取强硬还是温和的路线，导致了不可避免的结果。这使得国家的内外政策变得难以预测，在两个极端之间急剧摇摆。

克里姆林宫在夏季为实现与西方的和解、巩固已取得的成果所做的努力，由于冲突双方都缺乏决心而未能成功。双方都缺乏将已开始的事情进行到底的意愿，缺乏实现局势缓和的坚定决心。美国及其盟友没有充分利用出现的结束朝鲜战争的机会。战斗虽然减弱了，失去了最初的激烈程度，但并未平息。尽管战斗变得无力，但仍在三八线一带持续着。1951 年 9 月 8 日在旧金山签署的与日本的单独和平条约，使该地区的局势更加恶化。只有美国、英国、法国及其盟友在签署条约时公然无视苏联和中国的利益与权利。当然，莫斯科将这种行为视为公开的挑衅。

11 月 6 日，贝利亚在作报告时（这是一种特殊的“小范围领导层给国家的年度报告”），其报告的反美基调比布尔加宁去年的报告更为尖锐和强硬。“美国，”他说，“公然在西方的德国地区和东方的日本地区恢复了两个战争策源地。”“美国在朝鲜的军事干预清楚地揭露了美国集团的侵略政策。美国代表撕毁了苏联和其他爱好和平国家提出的所有关于结束美国在朝鲜侵略的建议，现在又千方百计地拖延在开城已经开始的谈判……帝国主义者不需要协议。他们害怕与苏联达成协议，因为这样的协议可能会破坏他们的侵略计划，使军备竞赛变得不必要，而军备竞赛给他们带来了数十亿美元的超额利润。帝国主义者需要战争。”

贝利亚并不满足于如此明显的对抗立场，他多次重复了那些含义相当模糊的话，称苏联准备与西方集团开战。“我们的对外政策建立在苏联国家的强大基础之上。只有天真的政治家才会把我们政策的和平性质看作是我们对自己力量缺乏信心。苏联人民已经多次向世界展示了他们如何保卫自己的祖国……如果帝国主义掠夺者把我们人民的爱好和平视为软弱，那么他们将面临比他们的前辈在对苏军事冒险中所遭受的更加可耻的失败。”

但贝利亚觉得仅仅这样挥舞武器还不够。他加强了报告中的好战语气，实际上是在迎合美国的宣传，美国宣传以乔治·凯南的“长电报”为依据，指责苏联有狡猾的阴谋，企图摧毁资本主义并将其社会经济制度强加给世界。“如果说有人应该害怕新的世界大战的后果，”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继续说道，“那么首先应该害怕的是美国和其他资产阶级国家的资本家，因为新的战争将使各国人民面临资本主义制度的危害性问题，这个制度离开战争就无法生存，还将面临用另一种社会主义制度取代这个制度的必要性问题……无论是在道德政治方面还是在经济方面，民主和社会主义阵营都代表着一股不可战胜的力量。这个阵营的

力量还因为它捍卫了人民的自由和独立权利而不断增强。这意味着，如果帝国主义阵营的狂人真的冒险发动战争，那么毫无疑问，战争将以帝国主义本身的崩溃而告终。”[745]

贝利亚对自己的力量过于自信，认为在他作完报告后，强硬路线肯定会占上风，但结果却出乎他的意料。这对他的威望是一个打击，而且是以他最痛苦的形式出现的——毫无疑问是由马林科夫发起的“明格列尔案件”。起初，这主要是一个刑事问题——关于受贿，其次才是政治问题。

“对该案件的初步了解，”11 月 9 日政治局的决定指出，“表明格鲁吉亚的受贿现象很严重，尽管格鲁吉亚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采取了一些打击措施，但受贿现象并未减少。同时还发现，格鲁吉亚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与受贿现象的斗争没有取得应有的效果，因为在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内部，就像在党中央委员会机关和政府内部一样，存在着一群人，他们庇护受贿者，并试图用各种手段为他们开脱。事实表明，这个团体的头目是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二书记巴拉米亚同志。这个团体由明格列尔民族主义者组成。除了巴拉米亚之外，其成员还包括司法部长拉帕瓦、格鲁吉亚检察长绍尼亚、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行政部门负责人库恰瓦、党的干部部门负责人奇恰纳泽以及其他许多人。他们的主要目的首先是帮助明格列尔人中的违法者，他们庇护明格列尔人中的罪犯，教导他们规避法律，并采取一切手段，甚至包括欺骗中央政权代表，以释放‘自己人’。”

该决定非常坚持——三次强调了犯罪组织成员的民族身份，随后进一步阐述并强化了这一指控要点：“巴拉米亚的明格列尔民族主义团体并不局限于庇护明格列尔人中的受贿者这一目标。他们还有另一个目标——夺取格鲁吉亚党和国家机关中的最重要职位（着重号为我所加。——Ю.Ж.），并将明格列尔人安插到这些职位上，而且他们这样做不是出于工作考虑，而完全是出于明格列尔人的身份考虑。”

这样，该决定对贝利亚（从民族角度来说他是明格列尔人）进行了一次致命打击，同时也明确暗示了对他所谓的企图的怀疑，同时还迎合了斯大林作为格鲁吉亚人的个人情感。随后，决定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且大胆的转折。它指出了任何政治民族团体带来的威胁，以及对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苏联结构构成的致命危险：“毫无疑问，如果巴拉米亚同志所奉行的反党明格列尔统治原则得不到应有的抵制，那么格鲁吉亚其他省份（如卡尔特里亚、卡赫季亚、伊梅列季亚、古里亚、拉恰）将会出现新的‘头目’，他们也会想要统治自己的省份，并庇护那里的犯罪分子，以通过这种方式巩固自己在‘群众’中的权威。如果发生这种情况，格鲁吉亚共产党将分裂成一系列拥有‘实际’权力的省级公国，而格鲁吉亚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及其领导机构将只剩下一个空壳。”

最后，为了使“案件”万无一失，决定还提到了巴拉米亚团体与反苏格鲁吉亚流亡组织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当然，目前这还只是理论上的可能性），“美国情报部门利用这个组织提供的关于格鲁吉亚局势的间谍情报”。也就是说，“格鲁吉亚的间谍情报组织完全由明格列尔人组成”。

“明格列尔案件”的处理结果相当严厉。巴拉米亚、拉帕瓦、绍尼亚、库恰瓦（不过一个月后，他恢复了党籍和职务）、奇恰纳泽被撤职。此外，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被建议“谴责巴拉米亚同志及其民族主义团体的反党和反国家活动”，“开展长期的宣传鼓动工作，反对受贿现象，加强苏联的法制建设”[746]。

一个月后，马林科夫想必确信贝利亚已被削弱，所受打击有效，尽管与他的本意相悖，但党的机构仍然发挥着作用，他的决定也产生了实际效果。于是，他做了六年前日丹诺夫、沃兹涅先斯基和库兹涅佐夫未能做到的事情：12 月 7 日，他促使政治局通过了一项决定，宣布于次年，即 1952 年 10 月 20 日召开苏联共产党（布）第十九次代表大会，同时确保自

己在其中发挥主导作用。根据安排，马林科夫将作工作报告，萨布罗夫将准备关于第五个五年计划的提纲草案，赫鲁晓夫将作关于党章修改的报告[747]——那时他们还是同一阵营的成员。

为了在筹备党代会期间确保自己对党的机构的控制权，格奥尔基·马克西米利安诺维奇认为有必要在政治局批准后，为党中央特别事务总局组建部队。这样一来，他就保证了总局的完全自主性，使其免受来自党的秘密通信线路方面极有可能的影响。诚然，作为一种补偿，他不得不批准在 1952 年 1 月，在国家安全部内重新设立第一总局——对外情报总局。这一举措剥夺了莫洛托夫和外交部在制定政治决策时对最重要信息的垄断权，因为现在马林科夫和贝利亚都可以同样地利用这些信息。此外，格奥尔基·马克西米利安诺维奇还不得不同意让 С．А.戈格利泽从塔什干回到莫斯科，并再次任命他为伊格纳季耶夫的副手[748]。

然而，三人执政团内部幕后斗争的主要结果是温和的外交政策路线取得了胜利。3 月，小范围领导层最终放弃了贝利亚报告中明显体现的强硬路线，批准了莫洛托夫提出的关于与德国签订和平条约的新构想。和以前一样，这个构想包含了对苏联来说不可动摇的条件——立即实现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的统一；在达成协议一年后撤出所有占领军，包括拆除所有外国基地；保持中立。但与此同时，苏联方面现在还提出了其他内容：德国可以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生产其所需的军事技术。尽管这一构想，最清晰地体现在 3 月 10 日致美国、英国和法国政府的照会中[749]，几乎立刻就淹没在了华盛顿的琐碎保留意见以及对这些意见长达近两年的讨论中，但温和路线仍然占据了上风。

不久，这一路线在斯大林对众多未具名的“美国报纸”的“编辑小组”所提问题的又一次答复中得到了有力的证实。这些答复虽然没有什么新内容，言辞谨慎，但在基调和内容上相当爱好和平，并于 4 月 2 日被所有苏联报纸刊登：

“——现在第三次世界大战比两三年前更有可能爆发吗？——不，不是的。

——大国首脑会晤会有好处吗？——可能会有好处。

——您认为现在是实现德国统一的合适时机吗？——是的，我认为是。

——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在什么基础上可以共存？——在有相互合作的意愿、愿意履行所承担的义务、遵守平等和不干涉他国内政原则的情况下，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完全可以和平共处。”[750]

温和路线在 4 月于莫斯科举行的国际经济会议上也得到了同样不容置疑的体现。对于苏联组织的这类论坛来说，这是第一次，参会人员不是根据他们的政治观点挑选的，也没有要求他们口头或书面赞同任何具有公开意识形态性质的宣言或声明。这种做法几乎立刻就对苏联的对外贸易产生了明显的推动作用，通过建立新的、平等互利的联系，对外贸易明显活跃起来，这些联系不仅在国家间层面，而且在纯粹的商业层面，与各个公司和企业建立起来。

苏联大众媒体很快进一步展示了外交政策路线的缓和。根据小范围领导层的要求，他们几乎是在匆忙中大幅改变了报道国外情况的材料的性质。《真理报》编辑对驻资本主义国家记者的“指示”阐述了这类材料的新发布原则。这份文件几乎是在 П．Н.波斯佩洛夫被任命为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第一副总编后立即由他起草的，7 月 9 日政治局批准了该文件，使其对所有报纸和杂志无一例外都具有指令性。

“许多报道，”“指示”指出，“具有表面化的特点，以生硬的鼓动风格写成，缺乏关于一个国家经济和政治状况及其对外政策的实际数据。同时，记者们经常对所在国家的政府和官员发表粗鲁和冒犯性的言论……报道往往具有这样的特点，即在所在国家的公众中造成了对苏联对外政策的错误印象，特别是对苏联针对该国的政策的错误印象。”

对关于西方国家生活的材料的这种公然负面评价，长期以来由苏斯洛夫强行灌输，体现了冷战精神，现在被坚决摒弃。“指示”要求国际新闻记者“不得发表可能被解读为煽动和反对政府、侮辱民族尊严或干涉内政的言论……不得对政府成员、公众和政治人物发表冒犯性言论”。此外，该文件还明确禁止苏联记者“参加各种具有反政府性质的集会、示威游行和其他活动”[751]。

为苏联实现如此必要的局势缓和所做的努力并不仅限于此。这还体现在外交部的重大人事变动上。雅科夫·亚历山德罗维奇·马利克被从纽约召回，格奥尔基·米哈伊洛维奇·普希金被从柏林召回，他们被任命为外交部副部长。В.А.佐林，信息委员会的负责人之一，获得了苏联常驻联合国代表的职位，А.А.葛罗米柯被任命为驻英国大使。А.С.潘友新被从华盛顿召回，并也被派往北京担任大使，而 Г.Н.扎鲁宾则在保留原级别不变的情况下，从伦敦被调往华盛顿[752]。这种复杂的人事调动，正如实践多次证明的那样，只能意味着一件事。即将到来的，在不久的将来，А.Я.维辛斯基的退休，他已经变得过于声名狼藉，太过于体现现在被摒弃的冷战精神。

与此同时，在权力的巅峰开始发生一些事情，除了将其视为对贝利亚的又一次严重攻击之外，无法用其他方式来形容。“明格列尔案件”突然重新开始，但已经不再是一个狭隘的民族问题，而是变成了一个全联盟的问题。它变成了“格鲁吉亚案件”。当然，正如后来的事件所表明的，除了马林科夫之外，没有人能做到这一点。

3 月 27 日，在主持党的监察委员会的 М.Ф.什基里亚托夫和直接受马林科夫领导的党的、工会的和共青团机关部门新负责人 Н.М.佩戈夫的倡议下，政治局审议并批准了《格鲁吉亚共产党的情况》的决定。其中指出：“纠正格鲁吉亚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工作中的错误和不足的工作进展缓慢，磕磕绊绊，不尽如人意，格鲁吉亚的党组织和非党群众对格鲁吉亚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在消除巴拉米亚集团敌对活动后果方面行动迟缓表示不满……在侦查过程中发现……该集团……意图夺取格鲁吉亚共产党的政权，并准备推翻格鲁吉亚的苏维埃政权。”

因此，在关于“明格列尔案件”的决定中所包含的三项可能的指控（腐败、夺取政权、与美国情报部门合作）中，选择了第二项，而且显然不是偶然的，有着长远的目标。基于这一点，根据 3 月 27 日的同一决定，解除了 К.Н.恰尔瓦尼格鲁吉亚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的职务，并推荐库塔伊西州委第一书记 А.И.姆格拉泽接替他的职位。正式的领导层更换预计在 4 月的党中央全会上进行，贝利亚将作为政治局代表前往该会议[753]。正是他不得不宣布恰尔瓦尼为敌人，而恰尔瓦尼在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领导共和国党组织时担任第三书记，并且在 1938 年 8 月底正是他被推荐担任第一书记的职位，当时这一推荐得到了政治局的充分理解和支持。

“格鲁吉亚案件”无疑不仅会打击贝利亚，还会间接地打击斯大林。当然，这是从道德层面来说，因为斯大林一直密切关注着家乡的情况。这种推测得到了当时发生的一件前所未有的事情的证实。在此之前，这是难以想象的，完全不可能的。4 月 29 日，几乎就在第比利斯全会结束后，Н.С.弗拉西克被开除出党（什基里亚托夫的行动）并被解除所担任的职务（伊格纳季耶夫的行动）。这个人自 1927 年以来一直不间断地待在斯大林身边，自 1930 年以来一直负责斯大林的个人安保工作，从 1938 年底开始还负责党和国家所有高级官员的安保工作。弗拉西克被指控犯有重大浪费罪，同时这看起来也像是一起财务丑闻。

夏天，同样通过一些普通的人事任命，开始了对武装力量部长 А.М.华西列夫斯基的一种特殊的大规模攻击，华西列夫斯基在整个战争期间一直与斯大林并肩作战，现在直接受布尔加宁领导。起初，早在 1 月中旬，任命 М.И.涅杰林为负责军备的副部长，任命 В.И.卡扎科夫为炮兵司令，任命 С.С.瓦连佐夫为炮兵总局局长。7 月 7 日，高层指挥职

位的调动再次开始。政治局又批准了两名副部长：负责战斗准备的——Л．А．戈沃罗夫，负责装甲坦克和工程部队、汽车技术的——Б．Г．韦尔希宁；苏联军队总监察长——М．В．扎哈罗夫，总参谋部主要作战局局长——Н．О．帕夫洛夫斯基，总参谋部作战局局长——А．А．格里佐夫[754]。这种人事变动，就像在外交部一样，预示着 А．М．华西列夫斯基极有可能被撤职。

所有这些行动，太像在决定性战斗前的力量重新部署了，使马林科夫能够将自己的地位提升到可能的极限。7 月 9 日，他领导了政治局负责筹备党章修改的委员会，成员包括赫鲁晓夫、苏斯洛夫、什基里亚托夫、佩戈夫和格罗莫夫。7 月 15 日，马林科夫又成为了制定第五个五年计划委员会的成员（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萨布罗夫、贝内迪克托夫、贝利亚、赫鲁晓夫）[755]。从这一刻起，格奥尔基·马克西米利安诺维奇几乎将党代会前的所有筹备工作都集中在了自己身上，获得了完全控制和指导这些工作的能力。

作为重大变革的一种特殊结局，是将别尔乌辛纳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团[756]，这显然预示着他的作用将提升——成为小范围领导层的成员。

政策路线的转变不仅体现在外交政策倡议和人事变动上，还体现在当时开始的“解冻”上，尽管这种“解冻”还非常微弱、脆弱。女作家薇拉·潘诺娃开启了这一进程。在 1952 年 1 月 1 日发表在《文学报》上的一篇简短随笔《祝酒词》中，她向所有同行祝愿：“愿不再有沉闷、灰暗、无力、彼此相似的作品问世。”并且她提出了一个绝非修辞性的问题——“为什么我们没有，比如说，关于形式问题的讨论呢？”

潘诺娃不太引人注意的呼吁似乎得到了《真理报》的支持。1 月 8 日，《真理报》发表了 А．维什尼亚科夫的一篇篇幅巨大、占了三栏的理论文章，表面上是关于纯粹哲学主题的——《论新旧斗争》。然而，这篇文章除了其他内容外，还包含这样的论断：“新旧斗争体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它不仅发生在经济领域，也发生在意识形态、科学、文学和艺术领域。”3 月 4 日，在果戈理逝世一百周年之际，《真理报》的社论宣称：“苏联文学的职责在于全面展现生活的多样性，在发展变化中毫不留情地揭露一切丑恶、一切落后、一切与人民为敌的事物，这些事物极其害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新鲜空气，要根除人们意识中资本主义的残余，将讽刺的火焰对准这些残余的承载者。我们需要苏联的果戈理和谢德林！”

文学和艺术领域中新旧之间的特殊斗争最初表现为对一些戏剧的无情批判，这些戏剧的作者在剧院批评家（“世界主义者”）被击败后，感觉自己成了局势的主宰。因此，莫斯科市党委宣传鼓动部负责人 Б．罗季奥诺夫在《文学报》上的发言让他们完全始料未及。他对以前“碰不得”的索菲罗诺夫、科热夫尼科夫、米哈尔科夫的戏剧作品，以及同时期的克罗恩、芬的作品给予了负面评价，认为它们“沉闷”。此外，М．别拉霍娃也加入进来，她对苏罗夫的新剧《莫斯科上空的黎明》发起了类似的抨击。随后，《真理报》上出现了一篇总结性的文章，毫不含糊地命名为《克服苏联戏剧创作的落后状况》，首次使用了“无冲突论”这一术语，并宣布其为错误理论。

当时还未占据主导地位的批判立场在许多出版物中都有体现。Л．卡西尔严厉批评了儿童文学中的“粉饰”现象。А．阿纳斯塔西耶夫在《论导演的创作勇气》一文中，谴责了小剧院、瓦赫坦戈夫剧院和交通剧院，因为它们根据维尔蒂的剧作《死囚的阴谋》排演的剧目“彼此之间没有什么区别，无论如何，它们没有体现出这三个剧院的审美立场”。后来，前宣传鼓动部艺术部门负责人 Б．С．留里科夫的文章谈到了更严重的问题。在“世界主义者案件”后，他被降职并被派往《文学报》工作。留里科夫写道：“对表面上的幸福安宁的追求也渗透到了文学中。那些看不到（或者装作看不到）旧事物影响的现实，不能真实反映生活冲突的作家，把生活描绘成一片美好、田园诗般的景象，他们违背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严峻真理——一个充满艰辛但又美好而英雄的时代……官僚主义的伪装当然不是国家先进人物的

典型特征，但如果据此得出结论，认为官僚形象中根本没有典型内涵，那就意味着否认现实生活中消极现象的存在和本质。”[757]

在这样一种非常特殊和不同寻常的背景下，1952 年 10 月 5 日，苏联共产党（布）第十九次代表大会开幕。距离上次代表大会已经过去了十三年，这公然违反了党章规定。这次大会必须解决两个主要问题。首先，又一次几乎推迟了两年，要批准下一个五年计划。这个计划不同寻常，因为它预计生产资料生产（甲类）和消费资料生产（乙类）的增长速度几乎相同——分别为 13%和 11%。这从而否定了通常对重工业的绝对优先地位。其次，大会必须为此提供依据。描述国家的状况，以及国家未来发展最可能和最必要的前景。

所有这些工作过去总是在党中央的工作报告中完成，在第十六、十七、十八次代表大会上，作为第一书记的斯大林会作这个报告。这一次，传统在没有任何解释的情况下被打破了。最重要的，甚至是纯粹仪式性的角色第一次被委托给了马林科夫，这极大地改变了他在党的等级结构中的地位。实际上，在斯大林还在世的时候，这使他成为了新的第一书记，甚至可能成为小范围领导层中的唯一领袖。

马林科夫和以前的斯大林一样，将他的报告分为三个部分：苏联的国际地位；国内状况；党。前两部分内容极端充实，充斥着大家熟悉的、反复出现过多次、已经成为陈词滥调的评价和描述，这些都是基于与现实相差甚远的指标和比较数据得出的。因此，他能够把美国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描绘成处于停滞状态，只有军事工业在增长。与此同时，他试图展示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以及中国的国民经济是蓬勃发展、不可阻挡、充满活力的。总之，他重复了前三届代表大会上所说的一切，只不过这次只针对苏联。马林科夫不得不做的事情，正如报告的名称“党中央的报告”所要求的那样，表达政治局所有成员、三人执政团的综合意见。

然而，马林科夫还是能够在报告中加入完全属于他自己的内容。他认为这是极其重要的原则性内容，因此在小范围领导层审核报告文本草案时也坚持了这一点。首先，他在对国际形势的评估中表达了这种新的、属于马林科夫个人的观点，而这是他在 1949 年 11 月 6 日未能做到的。“现在，”格奥尔基·马克西米利安诺维奇强调说，“欧洲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中那些更加清醒和进步的政治家，没有被反苏敌意蒙蔽双眼，他们清楚地看到，那些疯狂的美国冒险家正把他们拖入深渊，于是开始反对战争。可以相信，在那些注定要成为美国独裁者的顺从棋子的国家里，会出现真正爱好和平的民主力量，他们将推行自己独立的、和平的政策，并找到摆脱美国独裁者把他们逼入的困境的出路。欧洲和其他国家走上这条新道路，将会得到所有爱好和平国家的充分理解。”

考虑到布尔加宁和贝利亚之前说过的话，马林科夫试图安抚西方集团的领导人及公众。在谈到苏联支持的和平运动时，他指出：“这一运动并不追求消灭资本主义的目标，因为它是民主的，而不是社会主义的。”只有以这种极力强调的形式，他才能让人明白苏联在国际舞台上的最终目标。并且他立刻急忙表达了对和平共处政策必然胜利的乐观信心。“苏联对美国、英国、法国和其他资产阶级国家的立场是明确的，我们已经多次表明了这一立场。苏联现在仍然准备与这些国家合作，前提是遵守和平的国际准则，确保持久和稳固的和平……苏联的和平与人民安全政策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即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和平共处与合作是完全可能的。”（着重号为我所加。——Ю.Ж.）同时他指出，这种关系的基础应该是发展互利的贸易和合作。

此外，马林科夫明确指出，布尔加宁和贝利亚曾如此肯定地宣称不可避免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只是事件发展的两种可能性之一。“但是，”格奥尔基·马克西米利安诺维奇解释说，“还有另一种前景，即维护和平的前景，各国人民之间实现和平的前景。”而这种前景对所有人，尤其是对苏联来说更可取，因为“这将结束在军备和准备毁灭性战争方面难以想

象的物质资源浪费，并使这些资源能够为人民所用”。他正是以这种方式，将国家的对外政策目标与国内政策任务联系了起来，国内政策的任务“在于在发展整个国民经济的基础上，确保苏联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持续不断地提高”。

马林科夫对文化问题的提及也很能说明问题。他指出，“在文学和艺术领域，仍然出现了许多平庸、灰暗，有时甚至是完全粗制滥造的作品，这些作品歪曲了苏联的现实”。他直接表示：“我们的作家和艺术家在他们的作品中应该批判社会上普遍存在的弊病、缺点和病态现象……认为我们的苏联现实没有为讽刺提供素材是错误的。我们需要苏联的果戈理和谢德林……”随后，在报告的最后一部分，即关于党的部分，他实际上也指出了应该成为尖锐批判对象的内容。

“党不可能没有注意到，”马林科夫指出，“党员队伍的迅速增长也有其弊端，导致党员队伍的政治觉悟水平有所下降，党的质量构成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恶化。”格奥尔基·马克西米利安诺维奇还在党内看到了其他问题：“出现了一种危险，即党的机关与群众脱节，党的机关从政治领导机关、战斗和自主组织变成了某种行政指挥机构（着重号为我所加。——Ю.Ж.），无法抵御各种地方主义、本位主义和其他反国家的倾向。”因此，由于工作报告赋予了他权力，他要求加强“自下而上的批评”——“群众对组织和机构活动的监督”，“坚持不懈地与那些阻碍对我们的缺点进行批评的人作斗争，把他们当作党的最凶恶的敌人”。马林科夫再次强调，党不需要“那些腐败和冷漠的官员”，他们认为“自己可以为所欲为”。“在工业和农业的领导岗位上，在党的和国家的机关中，”格奥尔基·马克西米利安诺维奇继续说道，“应该由有文化、精通业务的人来担任……”[758]

10 月 7 日，三人执政团的第二位成员贝利亚只作了一个发言。他谈论的是不同的内容，并且立场也不同。他继续坚持认为，美国“更害怕和平而不是战争，尽管毫无疑问，如果他们发动战争，只会加速自己的灭亡和毁灭”。他呼吁所有人提高警惕，因为美国人“向我们国家和其他爱好和平的国家派遣间谍和破坏分子”。但他发言的主要内容，甚至从篇幅上看也是重点，还是关于“先进的社会主义民族”。更确切地说，是“苏联的各民族共和国”，但只是那些加盟共和国，据说它们靠自己达到了非常高的发展水平，在经济、科学、文化发展方面已经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当然，这里强调的是“民族的”发展。

第二天，显然是遵循三人执政团的等级顺序，布尔加宁也发表了讲话。他不得不跟随马林科夫之后，承认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是“持续提高劳动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但他还是忍不住表达了“鹰派”的典型观点。他说，美国和北约正在准备对苏联发动战争。“如果他们发动战争，这将引发所有爱好和平的人民的强烈抵抗，他们将不惜一切力量，永远消灭资本主义。”布尔加宁还说，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应该全面加强我们的陆军、空军和海军。我们武装力量以及整个民主阵营武装力量的持续战斗准备，是应对任何意外情况的最可靠保障”[760]。

而斯大林在党代会召开之前以及会议期间都保持着低调。夏天，当小范围领导层因争夺领导权、确定苏联在国际舞台上的行为路线以及确定国内政策路线而发生激烈斗争时，他突然专注于纯粹的理论、完全抽象的问题。从 1950 年 4 月开始，他参与了关于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草案的讨论，与列昂季耶夫、奥斯特罗维季扬诺夫、谢皮洛夫、尤季纳、拉普捷夫、帕什科夫以及其他经济学家会面，深入研究了与当前紧迫问题相距甚远的问题。他认为这些问题对他来说是首要的。然而，起初他反对公开自己参与这项工作。1952 年 2 月 15 日他指出：

“不应该在报纸上发表《意见》。关于政治经济学问题的讨论是不公开的，人民对此并不知晓。讨论参与者的发言也没有公开。如果我在报纸上发表我的《意见》，会让人难以理解。在报纸上发表《意见》不符合你们的利益。人们会认为教科书中的所有内容都是斯大林

事先确定好的。我关心的是教科书的权威性。教科书应该具有无可争议的权威性。如果人们第一次从教科书中了解到《意见》中的内容，那就更好了。不应该在报纸上引用《意见》。怎么能引用一份未发表的文件呢？如果你们喜欢我的《意见》，可以在教科书中使用它们。可以在讲座、教研室、政治学习小组中使用《意见》，但不要提及作者。”

随后，斯大林以同样的热情关注政治经济学问题，回复了写给他的信件：4 月 21 日回复了 А.И.诺特金的信，5 月 22 日回复了 Л.Д.亚罗申科的信，9 月 28 日回复了 А.В.萨宁娜和 В.Г.温格罗夫的信。然后，也许是应教科书作者团队负责人 Д.Т.谢皮洛夫的一再请求，或者是前任负责人 М.А.苏斯洛夫的请求，也可能是马林科夫的请求，他突然改变了最初不发表《意见》的想法。就在党代会召开前夕，这些《意见》连同三封回信，先是出现在《真理报》上，然后又以《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为总标题单独出版了小册子。这使斯大林从因长期沉默而陷入的默默无闻中走了出来。几乎所有在党代会上发言的人都被迫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对他的这部作品表示赞赏。但这样一来，也让所有人不自觉地为马林科夫助力，因为在《意见》中，斯大林阐述了他所称的“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通过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不断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生产，来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他还确认，在苏联仍然存在商品生产，价值规律、生产的盈利原则仍然起作用，并且“资本主义国家为争夺市场和消灭竞争对手的斗争，实际上比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矛盾更加强烈”[762]。不管斯大林愿不愿意，他加强的是马林科夫的地位，而不是贝利亚和布尔加宁的地位。

10 月 14 日，在党代会工作的最后一天，斯大林的讲话同样与当前的紧迫问题、国家的实际状况以及小范围领导层的斗争相去甚远。按理说，在所有人发言之后，他的讲话可以对这场不明显的、隐蔽的讨论进行总结，就成为大家关注焦点的主要问题表达自己的意见。但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没有利用这个机会。他泛泛而谈，与党代会上发生的事情毫无关联。他谈到了支持“我们的党”的必要性，“兄弟党和国外兄弟民族对党的信任和同情”。他说，“我们的党”不会辜负期望，反过来应该“支持他们，以及他们的人民在为维护和平而进行的斗争中”。然后他猛烈抨击了资产阶级。这样一来，他回避了亲自参与小范围领导层的领导权之争，也没有利用自己的权威支持两个对立团体中的任何一方。

党代会上发生的一切都明确表明：进行幕后交易的可能性已经完全耗尽。为争夺权力、为确定苏联的发展路线而进行的斗争必然会、不可避免地且很快就会公开化，变得明显起来。

第二十七章

10 月 16 日召开的新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匆忙组建了一个连刚刚修订的党章都未曾预料到的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这个名称与国家最高行政机关名称的重复绝非偶然，但它并未对当时已形成的权力平衡带来实质性的改变。它也没有决定性地影响到一年半前那些掌权者所坚持的两种立场中的任何一种的优先地位，而他们至今尚未明显取得成功。在这个常务委员会，即新的核心领导机构——首次合法成立的“九人小组”中，成员包括斯大林、马林科夫、贝利亚、布尔加宁、赫鲁晓夫、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别尔乌辛和萨布罗夫[763]。

在这样的构成下，如果按照正常的投票程序来解决问题，常务委员会可能会分裂成几个没有明显优势的团体：马林科夫、别尔乌辛、萨布罗夫；贝利亚、布尔加宁；斯大林、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因此，权力的平衡取决于赫鲁晓夫，取决于他会支持谁。当然，在分析这种权力布局时，还需要考虑其他因素。从斯大林在党代会上的表现来看，无论是他本人，还是“过去的影子”伏罗希洛夫和卡冈诺维奇，在即将到来的争斗中很可能都不会参与。他们只会接受争斗的结果，无论结果如何。

而中央委员会书记处的情况则有所不同，这次书记处的人员数量异常庞大。首先，成员包括车里雅宾斯克州委第一书记阿列克谢·鲍里索维奇·阿里斯托夫、摩尔达维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委第一书记尼基塔·格里戈里耶维奇·伊格纳托夫——这些都是在中央舞台上的新人。其次，有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米哈伊洛夫，他曾领导共青团长达 14 年；还有尼基塔·米哈伊洛维奇·佩戈夫，他在担任党的、工会的和共青团机关部门负责人的短暂经历中积累了一定经验。第三，有格奥尔基·马克西米利安诺维奇·马林科夫、帕维尔·康斯坦丁诺维奇·波诺马连科、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此处疑为误写，应为斯大林的相关人员，因斯大林不可能同时在书记处任职）、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苏斯洛夫、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这些经验丰富的机关工作人员，未来将在这里处理所有事务。

最后，在权力的下一个层级，即仅作为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成员的，有谢苗·德米特里耶维奇·伊格纳季耶夫——国家安全部部长，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库兹涅佐夫——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维亚切斯拉夫·亚历山德罗维奇·马雷舍夫、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米高扬、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莫洛托夫、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切斯诺科夫——新成立的哲学和法律科学部门负责人，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什维尔尼克、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什基里亚托夫（他现在才正式成为党的监察委员会主席），以及一些最重要的党组织的领导人——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安德烈亚诺夫（列宁格勒州）、列夫·格里戈里耶维奇·梅利尼科夫（乌克兰）；还有一些加盟共和国国家机构的领导人——德米特里·斯捷潘诺维奇·科罗琴科，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奥托·威廉莫维奇·库西宁，卡累利阿-芬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

然而，这个新的、极其复杂的权力架构并没有维持多久。几周后，就不得不对其进行调整，以便它能更准确地符合实际形成的权力平衡，更明确地划分出现在两位无可争议的领导人马林科夫和贝利亚的活动范围。他们两人是真正觊觎全面、绝对权力的人，是领袖地位的继承者。

斯大林再也无法、也没有能力，而且显然也只是不想再对那些经常与他接触的人维持他昔日威严的表象，这一点变得越来越明显。因此，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不得不采用 1951 年 2 月 16 日就已制定的方法来解决出现的问题。只是这一次，范围不再局

限于部长会议，而是扩展到了党的最高机构。11 月 10 日的决议规定：主席团会议的主持工作轮流进行：在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上由马林科夫、赫鲁晓夫、布尔加宁主持；在书记处会议上由马林科夫、佩戈夫、苏斯洛夫主持；在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团会议上由贝利亚、别尔乌辛、萨布罗夫主持。诚然，这些任命不得不伴随着一个完全合理的附加条件：“在斯大林同志缺席的情况下”。

这样的决定本身就排除了出现新的核心领导机构的可能性。它分割了最高权力，这再次证明了权力的不确定性已达到了顶峰。与此同时，这个决定意义重大。只有马林科夫同时处于两个“三人小组”之中。而且，这两个小组都是党的机构，这使得格奥尔基·马克西米利安诺维奇实际上成为了第一书记（顺便说一句，1955 年 1 月的中央全会上，赫鲁晓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正是这样定义马林科夫当时的职位的）。作为交换，贝利亚获得了全面监督部长会议整体工作以及各个部委工作的机会。

当然，两位争夺唯一领导权的竞争者都竭尽全力，在新的权力结构中最大限度地保护自己。他们设法让对手的“自己人”加入每个“三人小组”，作为一种制衡。因此，应该把赫鲁晓夫和苏斯洛夫视为贝利亚的支持者，这是由于当时重大的政治博弈；而萨布罗夫无疑是在维护马林科夫的利益。目前很难明确布尔加宁、佩戈夫和别尔乌辛的立场倾向。

布尔加宁很可能仍然是一个相对中立、独立的人物，而且也许他就像 1951 年“三人执政团”时那样，是斯大林的另一个化身。从佩戈夫纯粹的党内和机关工作经历来看，他在更大程度上应该是维护马林科夫的立场；而别尔乌辛多年来的工作主要与贝利亚相关，那时他可能被视为前任领导的支持者。

正是这样的权力结构及其人员构成，本应至少带来暂时的稳定，但实际上却使局势更加复杂。它加剧了围绕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这一关键职位的隐蔽幕后斗争。贝利亚几乎已经得到了这个职位，他努力保住它，而马林科夫也同样有充分的理由觊觎这个职位。马林科夫觊觎这个职位有几个原因。首先，他不仅是改变党的职能及其机关作用的支持者，而且是主要的推动者——尽可能地降低党在国家生活中的作用，限制党对国家机构的影响。其次，和贝利亚一样，他很清楚，政府首脑这个职位能让人掌控外交部、国家安全部、国防部、内务部等部门，没有这些部门的控制权，就无法推行任何独立的政策。第三，和贝利亚一样，他遵循着已经形成了十年的传统，即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这个职位标志着真正的全面权力。毕竟，从 1941 年 5 月开始，斯大林签署文件时只以政府首脑的身份，而不是以党中央第一书记的身份。并且作为政府首脑，他在政治局会议上主持会议。

在形成的某种类似“二人执政”的局面中，对马林科夫来说，虽然妥协的条件似乎并不有利——同意只担任党的第一书记这一职位，但这还是带来了一点优势。党的“领导作用”得以保留，因此党的机关也得以保留，这让格奥尔基·马克西米利安诺维奇希望，在必要的时候，他能够实现自己的愿望。党的职位将创造一种潜在的可能性，使他能够正式、公开地担任政府首脑的职位，同时还能保留对党的机关的控制权。大概是为了保证在自己的计划中取得成功，他同意让布尔加宁加入他的一个“三人小组”，布尔加宁作为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成员，继续监管国防部。这样就排除了贝利亚与布尔加宁之间的频繁接触和勾结。可以推测，马林科夫希望将来能把军队作为争夺权力的决定性工具。但目前还不是时候，当下需要的是其他的手段。

可以推测，马林科夫和贝利亚都没有特别指望新进入党的两个工作机构的人会支持他们中的任何一方。他们都非常重视国家安全部，试图用各种手段让国家安全部的机关只服从于自己。早在 1951 年夏天，在阿巴库莫夫被免职时，马林科夫就试图用唯一可行的方法完全控制国家安全部。这不仅体现在任命伊格纳季耶夫为部长这件事上，伊格纳季耶夫是一名长

期以来与格奥尔基·马克西米利安诺维奇关系密切的党内干部，更重要的是体现在 1951 年 7 月 3 日《联共（布）中央绝密信》中关于“国家安全部状况不佳”的表述上：

“联共（布）中央希望，在国家安全部机关工作的共产党员们将不遗余力，以充分意识到自己对苏联人民、党和政府的责任，在布尔什维克批评的基础上，在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州（边疆区）和市党委的帮助和领导下（着重号为我所加。——Ю. Ж.），迅速消除国家安全部机关工作中的不足，在其中建立起布尔什维克秩序，提高契卡人员工作中的党性，确保国家安全部机关坚定不移、准确无误地执行我国的法律、党的指示和政府的命令。”[764]

还有一些看似非常奇怪的事件，也更能说明这一点。这些事件与国家高级官员的旧有、早已形成的保卫部门有关，这个保卫部门实际上是国家安全部内部的一个独立机构。4 月 22 日，政治局决定成立一个由马林科夫领导的委员会，以调查国家安全部保卫总局（ГУО）的状况。1952 年 4 月 29 日，在该委员会的工作尚未结束时，保卫总局局长尼古拉·斯捷潘诺维奇·弗拉西克就被撤职。十一天后，他的第一副手弗拉基米尔·斯捷潘诺维奇·利尼科上校被逮捕。5 月 19 日，政治局批准了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一项决议文本。中将弗拉西克被任命为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阿斯别斯特市“巴热诺夫斯基”小型劳改营的副营长，该劳改营是为流放人员设立的——这不仅仅是降职，更是一种惩罚。保卫总局被改组为一个管理部门，同时人员编制从 1.4 万人削减到 3000 人。与此同时，撤销了保卫管理部门的所有后勤机构，包括汽车运输部门（仅保留一个特殊用途的车库）和弹药供应部门，以及负责保卫联共（布）中央、苏联部长会议、总参谋部、外交部、火车站的政府大厅、领导核心成员经常行驶的莫斯科街道和郊区公路的安全的部门，还有负责保卫黑海沿岸的国家别墅的部门。顺便说一下，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斯大林在 1952 年底自战争结束后首次在莫斯科附近的“近处别墅”度假。

6 月 28 日，乌克兰利沃夫州国家安全部管理部门负责人斯特罗卡奇向中央委员会行政部门提交了一份报告。他在报告中告知，他在共和国国家安全部的同事们试图对当地党组织的工作进行监视。这份文件本应成为有力的证据，证明贝利亚在遭受“明格列尔案件”和“格鲁吉亚案件”的打击后，已经发起了反击。马林科夫巧妙地利用了斯特罗卡奇的这份报告。

7 月 11 日，政治局批准了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国家安全部状况不佳》的决议文本。该决议要求部长伊格纳季耶夫立即“揭露医生中存在的一个进行破坏活动、反对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团体”。确定这个“团体”的成员构成和近期目标，据说阿巴库莫夫在逮捕叶廷格教授时就已经盯上了这个团体。一个被遗忘已久的“旧案”又被重新提起，利用了从档案中调出的医生莉季娅·费奥多罗夫娜·季马舒克的报告。

1948 年 8 月 28 日，当时担任克里姆林宫门诊部心脏病科主任的季马舒克乘飞机前往瓦尔代，安德烈·亚历山德罗维奇·日丹诺夫正在那里度假。经过检查，季马舒克确定安德烈·亚历山德罗维奇患有心肌梗死。然而，与她一同到达的克里姆林宫医疗管理局局长彼得·伊万诺维奇·叶戈罗夫、弗拉基米尔·尼古拉耶维奇·维诺格拉多夫教授和弗拉基米尔·哈伊罗夫·瓦西连科教授，以及一直陪伴在日丹诺夫身边的主治医生格里戈里·伊万诺维奇·马约罗夫给出了不同的诊断——高血压病。8 月 29 日，季马舒克再次给日丹诺夫做了心电图，坚持自己原来的诊断，但根据叶戈罗夫和马约罗夫的要求，她不得不书面确认不是自己的诊断，而是他们的诊断。就在这时，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威，她写了一份报告给弗拉西克，并将其交给了日丹诺夫的保卫负责人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别洛夫少校。别洛夫立即将报告送往莫斯科，并交给了弗拉基米尔·斯捷潘诺维奇·利尼科。随后，就发生了后来引发“克里姆林宫医生案件”的一系列事情。

利尼科向阿巴库莫夫报告了此事，但已经太晚了。8 月 30 日，日丹诺夫去世。尽管如此，9 月初医疗管理局的领导们还是不得不召开了一次大型会诊，彼得·伊万诺维奇·叶戈罗夫、弗拉基米尔·尼古拉耶维奇·维诺格拉多夫、弗拉基米尔·哈伊罗夫·瓦西连科、格里戈里·伊万诺维奇·马约罗夫、阿纳托利·尼古拉耶维奇·费多罗夫等人参加了会诊。为了维护自己的声誉，他们再次确认，安德烈·亚历山德罗维奇·日丹诺夫的死亡正是高血压病导致的。第二天，名誉受损的季马舒克被医疗管理局解雇。9 月 22 日，弗拉西克做出了对自己和其他许多人来说都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举动。在会诊记录的第一页上，他做了如下记录：“已向部长报告，波斯克列贝舍夫同志已阅读并认为诊断是正确的，而季马舒克同志是错误的。”就这样，他确定了那些四年后因“克里姆林宫医生案件”而被指控的人的范围。

……1952 年 9 月 1 日，彼得·伊万诺维奇·叶戈罗夫被免去克里姆林宫医疗管理局局长的职务，根据马林科夫和什基里亚托夫的提议，任命苏联医学勤务少将伊万·伊万诺维奇·克鲁皮纳接替他的职位，在此之前，克鲁皮纳一直领导着苏联国家安全部总务局的医疗卫生部门。10 月 4 日，利尼科因“滥用职权”被判处 10 年徒刑。10 月 18 日，叶戈罗夫被捕，不久后，他的前任、医疗管理局局长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布萨洛夫，以及四位医生——弗拉基米尔·尼古拉耶维奇·维诺格拉多夫、弗拉基米尔·哈伊罗夫·瓦西连科、米哈伊尔·谢苗诺维奇·沃夫西和鲍里斯·鲍里索维奇·科甘也被逮捕。

尽管不久后，即 11 月 14 日，贝利亚不仅成功地将柳明从“克里姆林宫医生案件”的调查工作中调离，还将他逐出了国家安全部，但新的调查负责人、副部长中将谢苗·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格利泽起初不得不坚持最初的调查方向。11 月 21 日，他将弗拉西克召回莫斯科并开始审讯，12 月 15 日，他签署了逮捕弗拉西克的命令，指控内容如下：“弗拉西克在担任保卫总局局长期间，滥用了党和苏联政府的信任，对收到的警报采取了犯罪性的忽视态度，从而损害了苏联国家的利益。”他还为弗拉西克和利尼科在即将到来的审判中安排了主要角色，在这场审判中，保卫总局和克里姆林宫医疗管理局的领导们将被指控导致了舍尔巴科夫和日丹诺夫的死亡，以及策划谋杀其他核心领导成员，其中包括斯大林。

为了全面加强既定的调查方向，马林科夫通过政治局批准了两份文件。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医疗领域的破坏活动》的决议，该决议主要关注保卫总局领导层的责任。还有一份《关于国家安全部状况》的报告，这份报告使得对国家安全部机关的清洗得以继续甚至加强，将所有在某种程度上曾与贝利亚或阿巴库莫夫有过关联的人都驱逐出去。在这份简短的两页文本中，反复强调了同一个观点：

“党过于信任并对国家安全部及其机关的工作监督和检查不力。各地区党委、边疆区党委以及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错误地认为自己无需对国家安全部机关的工作进行监督，也没有深入了解这些机关工作的本质。许多基层党组织以及国家安全部机关中的党组织书记，无论是在中央还是在地方，往往不揭露国家安全部机关工作中的不足，反而常常对其领导歌功颂德……

党、党的领导机关和党组织应将对国家安全部机关工作的监督视为最重要、最紧迫的任务。必须坚决消除国家安全部机关活动中的无监督状态，使中央和地方的国家安全部机关工作置于党、党的领导机关和党组织的系统且持续的监督之下（着重号为我所加。——Ю. Ж.）……

为实现这些目标：……要求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边疆区党委和地区党委系统地监督国家安全部机关的活动，每天深入了解其工作实质，定期听取国家安全部机关的汇报并审议其工作计划，以党性、高度警惕性、勇气和对祖国的绝对忠诚的精神培养契卡工作人员。各地区党委、边疆区党委和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的第一书记有义务关注国家安全部机关的情报工作，并且必须知晓所有特工的名单（着重号为我所加。——Ю. Ж.）”[765]。

与此同时，“案件”迅速扩大。越来越多的高级官员被撤职，几乎随即就被逮捕。其中包括国家安全部第二总局（反间谍总局）局长、中将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皮托夫拉诺夫，他在 1951 年夏天与阿纳托利·尼古拉耶维奇·波斯克列贝舍夫一起参与了对“叶廷格案件”和阿巴库莫夫的调查；政府疗养院“巴尔维哈”的副院长拉扎尔·伊萨耶维奇·雷日科夫，以及其他许多人。

直到最后一刻，谢苗·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格利泽才成功地将对国家安全部工作人员和医疗管理局的调查分开。他批准逮捕了另外 22 名医生，让他们与已经被关押在卢比扬卡的教授们一起成为了“阴谋”的发起者。弗拉西克似乎如释重负，他承认：“我和阿巴库莫夫没有对季马舒克的报告进行调查，现在我明白，我们实际上是把她交给了叶戈罗夫处置。”布萨洛夫也附和他，对调查人员说：“我是医疗管理局中敌对团体的帮凶。”

贝利亚急于巩固既成的局面，在 1953 年 1 月 9 日，他促使政治局（很显然，这次会议没有偶然地没有召集国家安全部部长伊格纳季耶夫）同意立即在全国所有报纸上公布“纪事”——《逮捕破坏分子医生团体》。在审判之前很久，自 1938 年以来首次让臭名昭著的“克里姆林宫医生案件”广为人知。

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米哈伊洛夫作为中央委员会书记，从 1952 年 10 月下旬开始负责所有的意识形态工作，包括大众媒体信息方面的工作，他有意或无意地立即犯了一个极其严重的错误。他没有考虑到这个“案件”的双重含义。毕竟，贝利亚和马林科夫都有可能为了自身利益而利用这个案件。贝利亚这样做是为了以玩忽职守的重要理由除掉显然对他构成阻碍的国家安全部部长、马林科夫的人伊格纳季耶夫，而贝利亚在党代会上的讲话中就已经提醒过这一点。马林科夫则是为了将克里姆林宫医生针对核心领导层的“阴谋”——通过已经去世的叶廷格（这非常方便）——与……贝利亚联系起来。从而给最强大的竞争对手贝利亚以致命一击。但无论是贝利亚还是马林科夫，在调查“案件”时都完全不需要，甚至这个案件的反犹倾向还对他们造成了阻碍。因为这甚至产生了负面影响，使调查偏离了真正的目标。

由于某种未知的原因，米哈伊洛夫认为没有必要弄清楚别人对他的期望是什么，或者他决定按照自己的规则行事。为了自己的利益。他允许报纸、杂志在得到这个从新闻角度来看非常轰动的主题后，在没有任何超出“纪事”范围的额外事实的情况下，自由发挥。这导致所有读者的评论和回应都明显带有日常生活中的反犹主义色彩。所有发表的材料都将重点放在了“纪事”中提到的九名医生中六名的“外国”姓氏上。不断渲染他们与犹太慈善组织“联合分配委员会（Joint）”、犹太反法西斯委员会的联系，而对希姆利维奇和米霍埃尔斯的提及就暗示了这一点。与此同时，完全忽视了 1 月 13 日《真理报》的社论，这篇社论在那个悲惨的日子明确指出：“除了这些敌人，还有另一个敌人——我们队伍中的诽谤行为。可以毫不怀疑，只要我们队伍中存在诽谤行为，就会有破坏活动。因此，为了消除破坏活动，就必须消除我们队伍中的诽谤行为。”

宣传方向上出乎意料的转变很快迫使米哈伊洛夫本人以及中央宣传部的领导迅速介入。1 月 31 日，《真理报》发表了一篇标题含义丰富的文章《诽谤者——敌人的帮凶》。在这篇文章中，它试图以一种非常独特的方式纠正“纪事”引发的暴乱情绪。现在，对警惕性的呼吁完全只与“诽谤者”联系在一起，重要的是，不再将他们与间谍活动、破坏活动或恐怖主义联系起来。此外，它还非常谨慎地选择了新一批“诽谤者”的姓氏——扎斯拉夫斯基、鲍里索维奇、奥尔洛夫、彼得罗夫、阿尔图佐夫、莫罗佐夫、卡日拉耶夫，试图以此降低仇恨情绪的热度。《真理报》的另一篇文章，2 月 6 日的《论革命警惕性》也追求同样的目标。它宣布所有“持有资产阶级观点的人”都是敌人，并以托洛茨基分子古列维奇、他的帮凶塔拉图塔、罪犯罗曼诺夫、逃兵萨西亚为例。

与此同时，中央宣传部越来越频繁地拒绝中央各报主编们急于发表的关于“锡安主义者”、“联合分配委员会”以及以色列与美国情报机构勾结的文章的请求。它要求所有这类材料必须事先与外交部进行协调。例如，1 月 30 日，报纸部门负责人弗拉基米尔·列别杰夫阅读了《红星报》主编弗拉基米尔·莫斯科夫斯基送来的文章手稿《锡安主义——美帝国主义的工具》后，拒绝了发表该文章。他总结道：“我们认为在中央军事报纸上发表这篇文章不合适，因为没有必要这样做，而且在《红星报》上发表这样一篇文章的事实可能会被错误解读。”2 月 16 日，《文学报》主编康斯坦丁·西蒙诺夫也遭到了实际的拒绝。在与中央宣传部交谈后，他不得不承认：“关于‘联合分配委员会’和以色列的长篇文章，编辑部打算再次讨论，与苏联外交部进行协商，然后，如果问题得到肯定的解决（着重号为我所加。——Ю.Ж.），再在报纸上发表。”[766]。

在围绕“医生案件”的喧嚣声中，一些更为重要的事件却未被注意到。领导人——贝利亚、布尔加宁、马林科夫，以及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别尔乌辛、萨布罗夫、赫鲁晓夫——奇怪的沉默。斯大林的活动突然变得活跃起来：12 月 26 日，他接受了《纽约时报》记者詹姆斯·赖斯顿的采访，没有说出任何新内容；2 月 7 日，他接见了阿根廷大使路易斯·布拉沃，2 月 17 日，接见了印度大使克里希纳·梅农。11 月 30 日《真理报》不同寻常的社论也没有引起应有的反响，这篇社论果断地总结了关于文学和艺术问题的报纸讨论：“书写真理！这应该成为散文家、诗人、剧作家和文学评论家的指导原则。”

然而，国家安全部高级官员持续数月的轮换，可能只会让极少数能够获得关于权力事件相对全面信息的人感到担忧。各加盟共和国部长的更替：6 月在格鲁吉亚；8 月至 9 月在亚美尼亚、乌克兰；2 月在拉脱维亚。9 月，莫斯科州国家安全部管理部门负责人更替[767]。12 月 15 日，曾经权势极大的尼古拉·斯捷潘诺维奇·弗拉西克被捕。最后，发生了一件以前根本不可能的事情——1952 年 2 月，斯大林的私人秘书、中央委员会特别部门负责人阿纳托利·尼古拉耶维奇·波斯克列贝舍夫被撤职。只有一件事是清楚的。所有这些都是在党代会后新成立的中央委员会干部选拔和分配部门负责人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沙塔林的直接参与下进行的，沙塔林从很久以前就是马林科夫的战友，并且得到了马林科夫本人的直接批准。

而这一切都预示着不可避免且即将到来的冲突爆发。冲突确实到来了，但并非像所有争夺权力、争夺唯一领导权的参与者可能预期的那样。

1953 年 3 月 4 日清晨，莫斯科广播电台像往常一样开始广播——克里姆林宫斯巴斯克塔的钟声、国歌、最新消息。然而，二十分钟后，广播中断了，播音员尤里·列维坦宣布，很快将播出一则重要消息。七点半整，他宣读了《关于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和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同志病情的政府公告》。公告称：“3 月 2 日夜间，斯大林同志在莫斯科的公寓中时，发生了脑出血，出血部位涉及大脑中对生命至关重要的区域。斯大林同志失去了意识。右手和右腿出现瘫痪。语言功能丧失……”[768]。

随后宣读的关于领袖健康状况的简报也提到了同样的情况，只是内容更简略，主要使用了医学术语。两个小时后，莫斯科和全国各大城市的居民再次了解到了这个令他们完全意想不到的消息，他们拿到了最新出版的中央、加盟共和国或地区报纸，这些报纸按照几十年来固定不变的时间出版。

从这一刻起，苏联的所有注意力都集中在了一件事情上。在苏联人民看来，这件事情是最重要、最关键的。斯大林能否活下来。关于这一悲剧性事件的思考，以及从 15 点 18 分开始，在短暂的停顿后，莫斯科广播电台开始只播放古典小调音乐，每隔半小时才中断一次，重复政府公告和简报的内容，这些都促使人们产生这样的思考。这一切都不可避免地加剧了人们的悲痛和不断增长的焦虑情绪。

与此同时，“公告”中还包含了另一条同样重要，如果不是更重要的信息，当时却很少有人给予应有的关注。公告中说：“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苏联部长会议深知，斯大林同志的重病将导致他或多或少地长时间无法参与领导工作这一事实的全部意义。中央委员会和部长会议在领导党和国家时，将极其严肃地考虑与斯大林同志暂时离开国家和党的领导工作相关的所有情况……”[769]。

这是两年来一直困扰着苏联核心领导层的最重要的事情首次被完全公开表达出来。此外，同样毫不含糊的是，人们明白，无论斯大林能否活下来，权力问题已经成为了讨论的话题，如果尚未解决，那么也将在不久的将来得到解决。

正是政府公告的这一方面，成为了美国总统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以及当天按原计划访问纽约的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在白宫紧急会议的主要议题[770]。世界主要国家的其他首都，如伦敦、巴黎、罗马、波恩，对莫斯科发生的事件也做出了同样的反应。

如今，在仔细对比和分析所有已知的关于斯大林病情开始和发展的目击者证词（遗憾的是，更客观的数据，例如病史，研究人员仍然无法获取）时，暂时不得不认同这些证词。必须承认，领袖的中风并非如官方所宣布的那样发生在 3 月 2 日夜间，而是在 12 个小时之前，即 3 月 1 日晚上，但这一点在原则上并不重要。然而，与此同时，另一个更重要、更有意义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答，也无法解释。那么，中央委员会和部长会议，或者更确切地说，它们的最高机构成员——主席团常务委员会成员，是什么时候开始“考虑与斯大林同志暂时离开领导工作相关的所有情况”的呢？

除了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莫洛托夫和拉扎尔·莫伊谢耶维奇·卡冈诺维奇之外，所有见证了这一事件的人都回避了与诗人费利克斯·丘耶夫讨论这个话题，他们非常坚持并且完全一致地声称：“文件交接”发生在 3 月 5 日深夜的“沃伦别墅”，当时斯大林已经去世。

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前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斯大林一去世，贝利亚立即坐进他的汽车，从‘近处别墅’疾驰回莫斯科。我们决定召集常务委员会的所有成员，或者如果可能的话，召集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所有成员……大家都到齐了。我们也看到了，斯大林已经去世。斯韦特兰娜也来了。我迎接了她。迎接她的时候，我非常激动，哭了出来，无法控制自己。我真的为斯大林和他的孩子们感到难过，我从心底为他的去世而悲痛，为党的未来、为整个国家感到担忧。我感觉到，现在贝利亚会开始欺负所有人。这个屠夫、这个杀人犯所准备的末日即将来临。然后就开始了‘职务分配’……”[771]。

阿列克谢·季莫费耶维奇·雷宾，前保卫管理部门工作人员：“有人给斯大林注射了一剂强效药物。他的身体抽搐了一下，瞳孔放大。五分钟后，他就去世了。结果发现，这样的一针，能够让病人好转或者彻底丧命，按照规定应该在得到病人近亲同意后才能注射。但他们没有询问斯韦特兰娜和瓦西里的意见。一切都是贝利亚决定的。然后，他、马林科夫、赫鲁晓夫和莫洛托夫上了二楼。立刻就开始了国家职务的分配……”[772]。

斯韦特兰娜·伊万诺夫娜·阿利卢耶娃，斯大林的女儿。她的回忆录，作为一个完全不感兴趣、因此在形式上没有偏见的人的回忆，证实了赫鲁晓夫和雷宾所讲述的一些细节。因此，无论有意还是无意，她都支持了他们的说法。阿利卢耶娃写道：“在最后的时刻，当一切都结束的时候，贝利亚突然看到了我，然后下令：‘把斯韦特兰娜带走！’周围的人都看了他一眼，但没有人想动。当一切都结束后，他第一个冲进走廊，在大厅里一片寂静中，大家都默默地站在床边，这时可以听到他响亮的声音，毫不掩饰他的得意：‘赫鲁斯塔廖夫！

把车开过来！……’然后政府成员们冲向出口——他们必须赶回莫斯科的中央委员会，那里所有人都在等着消息。他们去传达那个大家都在秘密期待的消息……”[773]。

当然，阿利卢耶娃和雷宾并不了解权力斗争幕后发生的所有曲折和细节。当时，他们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例如，在 3 月 5 日晚上，在斯大林去世前一个半小时，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苏联部长会议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召开的联席会议。但政府公告的真正含义可能只有阿利卢耶娃没有注意到，而雷宾，尤其是赫鲁晓夫不可能没有注意到。在讲述那些日子发生的事情时，他们肯定应该考虑到这一点。此外，赫鲁晓夫出于完全可以理解的原因，对联席会议只字未提（毫无疑问，他认为自己有责任不泄露国家机密），但不知为何，他对 3 月 4 日所有人都知道的政府公告也采取了同样的态度。

关于促使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如此坦率地忽略这个众所周知的事实的动机，只能进行猜测。然而，他如此坚持地构建自己对那些戏剧性事件的描述——无论是 1955 年 1 月 31 日他在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会上担任党的领导人时讲述这些事件[774]，还是多年后他退休时在磁带上口述自己的《回忆录》，都让人不得不认真考虑他故意隐瞒的唯一原因。赫鲁晓夫显然不愿意揭露权力斗争的秘密，而他在这场斗争中扮演了非常直接和积极的角色。他试图不惜一切代价转移人们对核心领导层中真正权力布局的注意力，以及对他在其中必然占据的位置的确定。

但在真正探讨克里姆林宫的权力竞争之前，首先需要确定另一件事。政府公告是什么时候准备的？或者，在这种情况下，同样的问题是，核心领导层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寻求就权力分配达成协议的？

如前所述，刊登政府公告的报纸于 3 月 4 日清晨出版，没有丝毫延误。因此，它们是在规定的时间内——不迟于 3 月 3 日 24 点付印的。为了撰写公告和简报的文本，排版第一栏，大约需要两个小时。将文本发送到所有主要报纸的编辑部——通过莫斯科的有线通信、电传打字机或传真机发送到全国各地——至少还需要半小时。最后，还需要时间来准备这两份文件，与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团和中央委员会的所有成员，或者至少与他们的常务委员会成员协商，然后复印所需数量的文件。总之，当根据同一天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的决定，发出召集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的邀请时（最初计划于 3 月 4 日召开[775]），不迟于晚上 9 点半，政府公告的文本已经存在了。这清楚地表明，对于核心领导层来说，不可避免地需要立即通知国家和世界，国家和党的最高职位即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然而，在 3 月 3 日结束时，关于权力的协议尚未全面且最终确定。目前，仅限于改变已经存在了近两年的几乎无所不能的“三人执政团”的组成，这个“三人执政团”自行做出所有决定，并且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签署”的名义公布这些决定，而没有与领袖进行协商。“三人执政团”中仍然有格奥尔基·马克西米利安诺维奇·马林科夫和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贝利亚，但“监管”军事和军事工业部委的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布尔加宁的位置，出人意料地被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莫洛托夫占据，莫洛托夫在 1949 年 2 月曾遭受挫折，同时被免去外交部长的职务。

为什么在权力的最顶层会发生这样的人事变动，是什么迫使或允许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从政治默默无闻中回归，我们绝对无法确切知晓了。因此，我们只能去寻找那些唯一能够解释所发生事情的动机。

这些事件显然让格奥尔基·马克西米利安诺维奇·马林科夫措手不及。两年来，由于他的官方职位——同时担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三位第一副主席之一，并且实际上是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这使得所有人都不得不把他当作斯大林的实际接班人，并认可这一点。然而，马林科夫似乎并没有完全准备好，能够轻松地、在没有来自任何一方的严重抵

抗的情况下，正式继承这位即将离世的领袖的全部权力。格奥尔基·马克西米利安诺维奇很可能只是还缺少一点时间，来利用“明格列尔案件”、“格鲁吉亚案件”、“医生案件”给他带来的优势，彻底铲除他最强大、最危险的竞争对手——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贝利亚。而这正是迫使马林科夫迅速找到一个解决方案的原因，这个方案即使不能让局势向有利于他的方向转变，至少也能延长目前权力结构中那种不稳定但对他仍然有利的平衡状态。为他争取到极其必要的喘息时间。

而唯一能做到这一点的办法就是：让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莫洛托夫重新进入核心领导层。莫洛托夫是唯一一个不仅一直是贝利亚的反对者，而且在民众中以及相当一部分党内机关人员中都颇具声望的人。毕竟，尽管历经种种，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仍然保有斯大林“最亲密战友”的昔日光环，正因如此，他绝非偶然地被认为是党和国家的第二号人物，还曾领导苏联人民委员会长达十年之久。

但正是这样一个在“机关博弈”中非常专业且巧妙的举措，不可避免地导致核心领导层扩大为“五人小组”，尽管“三人执政团”并没有因此消失，也没有失去其真正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布尔加宁不得不退居次要角色，他当时的政治倾向至今仍是个谜，还有拉扎尔·莫伊谢耶维奇·卡冈诺维奇，他很可能会支持莫洛托夫，同时也会再次强调新政权的不可动摇的继承性。

所有这些推测性的、相当复杂和微妙的组合，最终导致了一种在苏联几乎被遗忘的权力结构的出现，十天后，这种结构被称为“集体领导”。然而，这种“集体性”并非基于共同的目标、选定目标的一致性以及同志们在实现这些目标时的协调性，而是基于完全相反的因素。这种“集体性”是由——而且直接取决于、维持并得以保存——原则上截然不同的因素所决定的：“三人执政团”成员之间经过巨大努力才平衡好的矛盾、不同的观点和利益，以及他们对传统意义上的唯一领导权的公开且并非毫无根据的要求。尽管目前达成的权力平衡尚未获得持久的稳定性，也尚未成为常态，因此应该被视为一种被迫的、纯粹暂时的现象，但它不仅是激烈权力斗争的第一轮，而且使得能够开始赫鲁晓夫所称的“职务分配”。

这一切花了两天时间——3 月 2 日和 3 日。

3 月 4 日上午，大约在中午时分，中央委员会的书记们显然小心翼翼地隐瞒了之前谈判的结果，开始了他们日常的例行工作。他们审议了，或者更确切地说，只是匆匆浏览了一下，并表示同意三个极其普通的决议草案：关于鲍里斯·谢苗诺维奇·阿加福诺夫提出的科学组织问题的申请；关于尼古拉·格里戈里耶维奇·帕尔古诺夫提出的在塔斯社成立国际评论员小组的报告；以及关于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学校工作的问题[776]。然后，他们突然像接到警报一样，放下了日常职责和办公室事务，去处理更重要的事情——参加甚至对他们来说都很意外的、紧急召开的实际上是最后一次的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会议。他们见证了那些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的通过，这些决议决定了苏联在接下来两年的生活。

首先，人们认识到有必要对权力结构进行重组，简化并精简它们。“在苏联部长会议中，不应有两个机构——主席团和主席团常务委员会，而应只有一个机构——主席团”，其成员应包括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及其第一副主席，这些人同时也是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成员。最高党的机构也进行了类似的重组，在那里，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也合并了。

第二组问题自然确定了新权力机构的人员构成。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除了已解散的常务委员会成员——格奥尔基·马克西米利安诺维奇·马林科夫、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贝利亚、克利缅特·叶夫列莫维奇·伏罗希洛夫、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

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布尔加宁、拉扎尔·莫伊谢耶维奇·卡冈诺维奇、米哈伊尔·扎哈罗维奇·萨布罗夫、米哈伊尔·格里戈里耶维奇·别尔乌辛之外，还包括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莫洛托夫和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米高扬。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团的规模则小了一半：马林科夫被确认为主席，他的第一副主席是贝利亚、莫洛托夫、布尔加宁和卡冈诺维奇。

最后，为了从法律上确定并正式巩固这次重组，决定不是在 3 月 4 日，而是在 3 月 5 日晚上 8 点，召开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苏联部长会议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联席会议。

所发生事情的重要性是如此明显，以至于关于此事的信息，尽管是以极其隐晦的形式，几乎立即就被公布了。3 月 5 日的《真理报》在头版文章《党和人民的伟大团结》中，在传统的篇幅里，填满了值班人员撰写的、实际上毫无意义的宣传套话，只提到了三个名字。当然，是列宁、斯大林和……马林科夫。只有他们。这样一来，这不仅像是在预示着联席会议将毫无条件、一致地批准领导层的更替。而且对于会议的参与者以及所有其他中低级领导人来说，这明确指出了从现在起应该无条件执行谁的命令和指示，在文章和演讲中首先且必须引用谁的话。

然而，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的会议，在斯大林去世前就宣布了他的接班人，确定了现在处于权力等级顶端的人，但这并没有解决所有紧迫的日常问题。还需要在不迟于 3 月 5 日晚上——联席会议召开的时刻——之前，不仅就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新主席团所有成员的国家职务达成一致，而且还要组建政府。

在这种特殊情况下，解决如此复杂问题的原则性方法在前一天就已经形成。当时，秘密谈判的参与者们，无论如何都想强调并让所有人清楚他们完全特殊的地位，拒绝重新组建庞大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团。他们用以前的小型常务委员会取代了它，只是给它改了个名字。这种方法的逻辑发展是，也拒绝恢复曾经协调和指导各部门的苏联部长会议下属的部委和主管部门常务委员会，其主席们以前组成了多达 12 人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团。取而代之的是，将部委的数量减少了一半。这样，实际权力有意地分散在 25 位部长之间，其中只有少数几位属于被选中的人——政府首脑的第一副主席。剩下的就是“小事”了——就新的最高管理机构的原则性结构以及人事任命达成一致。

然而，即使有一天半的时间，要完全做到这一点也是不可能的。第一次严重失败的原因很简单。“三人执政团”的每个成员都固执而坚定地试图保住自己的位置。既不允许自己刚刚占据的职位被削弱，也不允许其他人的职位得到加强。坚持让他们——马林科夫、贝利亚和莫洛托夫——认为或多或少可能是自己盟友和同志的人担任部长职位。到 3 月 5 日结束时，才成功地就苏联部长会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关键职位分配达成了一致，并对中央委员会书记处进行了重大改组。

事实证明，马林科夫选择的策略完全是正确的。与其说是出其不意的效果，不如说是对手没有时间相互勾结并采取反制措施，这使他得到了他所追求的一切。他得以将对国家和党的机关的最大可能控制集中在自己手中。

作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马林科夫有责任监督各加盟共和国部长会议的工作。但作为部长会议会议的主持者——他实际上还有可能影响国家内外政策基本方针的形成，根据自己的判断将某些问题提交讨论或作为“准备不充分”而予以否决。同时，根据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的决定，格奥尔基·马克西米利安诺维奇还主持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会议。换句话说，他确定会议的日期和议程。最后，他还保留了中央委员会书记的职位，继续指导党

的机关工作。如果有必要，他可以直接影响书记处做出的决定的性质，或者将书记处做出的决定提交给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批准或讨论。

贝利亚虽然成为了国家的二号人物，但在地位和权力方面远远落后于马林科夫。他甚至无法与马林科夫在权力上相提并论，尽管他也设法争取到了很多东西。首先，他重新获得了1946年被剥夺的两个强力部委——国家安全部和内务部，从那时起，这两个部门合并为一个：苏联内务部。不仅如此，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还保留了对三个对国家军事力量的创建和增强最为重要、因而也是最机密的机构的控制权：苏联部长会议下属的第一、第二、第三总局——核计划……

〈原文此处缺失部分文本。——作者注 fb2.〉

……而且，国防部也在他的影响范围内，此外，他还与一些工业部委保持着直接联系，这些部委必须无条件地执行他的命令，甚至不惜违反五年计划或年度计划。

对于莫洛托夫来说，作为权力斗争中不太活跃的参与者，他不得不局限于担任外交部长的职位，以及从职位上来说，担任三个外交政策情报机构之一——信息委员会主席的职位。与以前的权力相比，布尔加宁再次担任国防部长所获得的权力也受到了很大限制。但他们地位的降低还不止于此。这还体现在其他方面。“五人小组”的这两位成员不得不接受由他们自己绝不会选择的人作为自己的第一副手。莫洛托夫的副手是雅科夫·亚历山德罗维奇·马利克和安德烈·雅科夫列维奇·维辛斯基，布尔加宁的副手是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瓦西里耶夫斯基和格奥尔基·康斯坦丁诺维奇·朱可夫。也就是说，作为前一天还领导着同一个部委的人的最亲近助手，这些人被强制安排在部委中，他们有着既定的关系和影响力。

然而，即使是这些被削减到极致、非常有限的权力，反映了莫洛托夫和布尔加宁在“五人小组”中的真实地位，与卡冈诺维奇所得到的相比，仍然显得无比巨大。卡冈诺维奇是政府首脑的第一副主席中唯一一个没有获得“职务”的人。在这种情况下，最重要的——如果不是决定性的——是担任任何一个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部委的领导职务的机会。

权力的第三层级是由五个人组成的，他们成为了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副手，由于匆忙，在决议草案中忘记了对这一点进行明确规定。首先，由于作为政治局长期成员的身份，米高扬被任命为国内和对外贸易部长——这个职位他从20世纪20年代中期开始就断断续续地担任着。然后是那些被确认为在经济管理关键职位上的人，更确切地说，是在经济领域中，有机地构成军事工业综合体基础并是其重要生产部分的那个领域的人。他们是那些领导着最重要的大型部委的人，这些部委取代了苏联部长会议下属的主要部门常务委员会。

萨布罗夫——机械制造部（以前的汽车和拖拉机工业部；机械和仪器制造部；农业机械制造部，除其他产品外还继续生产弹药；机床制造部）。维亚切斯拉夫·亚历山德罗维奇·马雷舍夫——运输和重型机械制造部（已解散的运输机械制造部；造船工业部；重型机械制造部；建筑和道路机械制造部）。别尔乌辛——发电站和电力工业部（以前的发电站部；电力工业部；通信设备工业部）。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连同并入其中的国家物资技术供应委员会和国家食品及工业产品供应委员会[777]被交给了格里戈里·康斯坦丁诺维奇·科西奥，他多年来一直担任该委员会的第一副主席，其重要性不亚于主要部委。

伏罗希洛夫虽然被保留为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成员，但他获得的只是一个纯粹名义上的、显然是装饰性的职位，这个职位从来没有任何独立的意义。他被任命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取代了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什维尔尼克，什维尔尼克被“调往”苏联最高苏维埃联盟院。

最后，在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也进行了人事变动，反映了新的权力布局。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尼基塔·米哈伊洛维奇·佩戈夫、尼基塔·格里戈里耶维奇·伊格纳托夫和帕维尔·康斯坦丁诺维奇·波诺马连科被调出书记处，他们的工作安排明显被降职，这一点没有人怀疑。前两人分别被任命为国防部总政治部副主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书记。其他人则被承诺在苏联部长会议中“担任领导工作”。

取而代之进入书记处的是马林科夫的明显支持者，他们推行马林科夫的观点和政治路线。谢苗·德米特里耶维奇·伊格纳季耶夫失去了国家安全部部长的职位，但并没有失去对它的一定控制，因为他除了负责中央委员会的其他部门外，还负责监管“监督”国防部、内务部、司法部、检察院、最高法院的行政机构部门。彼得·尼基季奇·波斯佩洛夫取代了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米哈伊洛夫，成为党的主要意识形态家，“监督”中央委员会的宣传鼓动、文艺文学和艺术、哲学和法律科学、经济和历史科学、科学和高等教育机构、学校等部门的工作。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沙塔林，从现在起被赋予了一项重要任务，即对当时党最重要的三项职能之一——在全国所有国家机构和社会组织、所有企业中选拔和安排干部——进行不懈而严格的控制。

与此同时，赫鲁晓夫的地位也发生了变化，得到了显著提升。他从莫斯科地区党组织第一书记的职位上被调走，当时这个职位高于莫斯科市委。“认为有必要”让他“集中精力在中央委员会工作”[778]。换句话说，在马林科夫所担任的职位的基础上，他被确认为中央委员会第二书记。然而，在书记处人员构成发生重大变化、处于新的环境中——在那些必然会首先与格奥尔基·马克西米利安诺维奇协调所有决定的人中间，赫鲁晓夫实际上失去了发挥自主性的机会，被迫主要处理纯粹的组织性事务，也就是文书工作。

此时，核心领导层给自己用来组建最高权力机构的时间已经用完了。在 25 个部长职位中，有 17 个仍然空缺。阿列克谢·费奥多罗维奇·戈尔金还不知道他已经不再是书记，而是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副主席，他认为这个问题一两天内很容易解决。因此，3 月 5 日，他向马林科夫提出建议，于 3 月 8 日召开苏联议会会议[779]。然而，政府首脑拒绝了这个建议，并不是因为他怀疑能否及时填补空缺的部长职位。对他来说，问题在于其他方面。因为除了批准完整的政府班子外，在议会上还需要通过财政部长阿列克谢·格里戈里耶维奇·兹韦列夫早就编制好、甚至已经协调好的当年国家预算。而这正是马林科夫需要克服的障碍。

比最初规定的时间晚了一天，即 3 月 5 日 20 点，在克里姆林宫大会堂的斯维尔德洛夫大厅，召开了一次名称不同寻常的“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苏联部长会议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联席会议”。几乎所有被邀请的人都设法赶到了会议现场。在 236 人中，只有 14 人缺席，主要是那些在国外的人：当时仍然担任外交部长的安德烈·雅科夫列维奇·维辛斯基、驻英国大使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葛罗米柯、驻美国大使乔治·尼古拉耶维奇·扎鲁宾、驻中国大使安德烈·谢尔盖耶维奇·潘友新、在布加勒斯特出版的新闻局报纸《为了持久和平，为了人民民主》的主编米哈伊尔·雅科夫列维奇·米丁、苏联驻德国占领军总司令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崔可夫，以及其他一些人，还有当时在沃伦别墅“近处别墅”值班的布尔加宁[780]。

首先发言的是卫生部长阿列克谢·费奥多罗维奇·特列季亚科夫。他关于斯大林健康状况持续恶化的信息，让聚集在大厅里的、作为高级机关人员的、已经习惯完全服从和盲目顺从的人群做好了准备——他们只需要做一件事。那就是对马林科夫随后在极其简短的讲话中阐述的所有内容表示完全和一致的支持。

“大家都明白，”他说，“现在领导国家的巨大责任落在了我们所有人身上。大家都清楚，国家不能忍受领导工作出现哪怕一个小时的中断。这就是为什么党的中央委员会主席团

常务委员会召开了这次联席会议……委托我向大家报告一系列关于组织党和国家领导工作的措施。”然后，他再次以常务委员会的委托为由，非常不寻常首先发言的是卫生部长阿·费·特列季亚科夫。他带来的关于斯大林健康状况持续恶化的消息，让聚集在大厅里的、习惯于绝对服从和盲目顺从的、作为高级官员群体的众人做好了准备，而对他们的要求也仅此而已：对马林科夫随后在极其简短的讲话中所阐述的一切，表示完全一致的支持。

“大家都明白，”他说，“现在领导国家的巨大责任落在了我们所有人的肩上。大家都清楚，国家不能忍受领导工作出现哪怕一个小时的中断。正因如此，党中央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召开了本次联席会议……委托我向大家报告一系列关于党组织和国家领导工作的措施。”接着，他再次以主席团常务委员会的委托为由，非常不寻常地阐述了所提议的改革和人事变动的必要性：“确保对国家生活的方方面面进行不间断且正确的领导……需要领导集体达到最高程度的团结，杜绝任何混乱或恐慌”[781]。

那么，马林科夫这种与日常党内修辞风格截然不同的逻辑推理背后隐藏着什么呢？

其中传达的主旨不会引起任何人哪怕一丝一毫的异议。在任何一个国家，无论其政治体制如何，在类似的紧急情况下，首先必须确保管理体系的持续运转。权力的自然继承权利应当依据古老且不容置疑的规则自动生效：“国王驾崩，新王万岁！”而且，这种权力交接进行得越快，国家和人民就会越安宁，因而也就越好。然而，更让人难以理解的是他得出的结论，确切地说，是他对“最高程度的团结”的要求，这里所要求的团结绝非是整个党、人民与党之间的团结（这是人们习以为常、无需解释的情况），而恰恰是“领导集体”的团结。会议的参与者只能这样理解这一呼吁，即这表明掌权者们尚未达到这种至关重要的“团结”，尚未严格遵守等级服从秩序，尚未达成对最高层利益（同时被他们每个人视为自身利益）的共同认可。

这一要求的第二部分“杜绝任何混乱或恐慌”更应该让大厅里的人感到警惕。这让人不禁猜测，这里所说的领导集体中具体的“混乱”指的是什么，它的表现形式以及可能导致的后果是什么。而且还让人想起，“恐慌”这个词，显然并非偶然地已经出现在政府公告中，此前在党和国家的声明中只出现过一次。那是在斯大林于 1941 年 7 月 3 日发表的具有纪念意义的演讲中。如今我们知道，这个词反映了在战争初期，这位领袖本人的慌乱。他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即他的忠诚战友、最亲近的圈子——同样是莫洛托夫、贝利亚和马林科夫这些人——主动成立了国防委员会，承担起全部权力以及对国家命运的全部责任。这个委员会取代了政治局和苏联部长会议。

但听众们还没来得及理解马林科夫所说的话，领会正在发生之事的意义，就有人宣读并要求他们批准一项决议草案，该草案是高层领导经过艰难协商才达成的协议的成果。大家要支持实际上只是简单更名的改革，以及没有出现任何新面孔的人事变动。甚至在决议草案的 17 条内容中，关于党的内容并非出现在开头，而是在结尾的最后五条，这一点也没有引起任何人的异议，甚至没有让人感到惊讶。大家平静地接受了这种强调共产党在权力机构中处于次要地位的情况。长期养成的、近乎本能的职业性盲从心态起了作用，正是这种心态让人得以保住职位，并沿着被称为干部任命制的官僚等级阶梯一级一级地向上攀升。

第二十八章

会议召开得非常及时。会议结束仅仅一个多小时后，从“沃伦别墅”传来消息：斯大林去世了。但恰恰是这一预料之中的消息，使得随后的所有行动都不得不做出调整。暂时不向民众通报已经做出的决定，而是相反，紧急准备一份“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苏联部长会议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致全体党员、致苏联全体劳动人民的呼吁书”，并将其用于双重目的。当然，是要按照这类情况的传统，列举逝者的所有功绩，来通报这位领袖的逝世，但这部分内容只占了文本的前三分之一。而呼吁书的大部分内容则成为了新的核心领导层的首份纲领性声明。

这份呼吁书基于一个早已成为必要条件的原则，即苏联人民“毫无保留地信任”党，“满怀热爱之情”地拥护党，“坚定不移地追随”党所制定的政策。接着，明确地、分点阐述了那些应被视为政府路线基本原则的内容。

最受强调且被置于首位的是宣布“进一步改善全体人民各阶层的物质生活状况……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随后指出了关注国家国防能力的必要性，确认“党全面加强苏联军队、海军和情报机构”。接着谈到了外交政策，该政策应继续是“维护和加强和平、反对准备和发动新战争……与所有国家开展合作并发展商业关系”的政策。呼吁书的纲领部分以确认对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忠诚而结束，这种忠诚体现在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各人民民主国家人民的兄弟情谊中，以及与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国家劳动人民的友好关系中[782]。

乍一看，这份纲领可能像是一套常规的、被反复提及的宣传套话。但其中仍有一些新的、不同寻常的东西。文中没有提到发展重工业的必要性——而重工业是苏联经济的基础，通常所有类似内容的文件都是以此为开端的。第一次，被置于首位的不是实现目标的行动，而是目标本身——提高物质生活水平，尽管并没有说明：将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在多长时间内实现，以及依靠什么实现，也没有说明与现有生活水平的关系。最后，尽管提到了准备“对任何侵略者给予毁灭性的回击”，但没有提到那个永恒的敌人——帝国主义，也没有提及美国、英国或北约组织。

这份呼吁书于 3 月 6 日早上 6 点整通过广播播出，而就在同一天晚上 9 点 30 分，播音员尤里·列维坦终于宣读了联席会议的决议（报纸直到 3 月 7 日才公布该决议，且未注明通过日期）。决议的实质内容仅做了最小限度的修改：在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和书记的名单中不再提及斯大林。然而，决议的前言部分保持了原样。的确，在 3 月 5 日晚上，当斯大林还在世时，如果不解释为何任命马林科夫为部长会议主席，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但现在，当这种解释已经不再必要时，重复这些内容就显得刻意为之，让人不禁去寻找其中隐藏的深意。毕竟，听到或读到这份呼吁书的每一个人，肯定都会对“领导层”提出的“最高程度的团结”、“杜绝任何混乱和恐慌”的要求感到警惕。

当然，在公开版本的决议中保留这句话，可以用匆忙和由此导致的简单疏忽来解释。然而，删除斯大林的名字却与此相矛盾，这表明了相反的情况：对文本进行了再次编辑。因此，他们是有意识地保留了这句含义丰富且不祥的话，故意泄露了核心领导层内部存在相当严重分歧的信息。而 3 月 9 日在红场举行葬礼时发表的讲话，则让人对此毫无疑问。因为在这些讲话中，“三人执政团”成员之间的原则性分歧完全清晰地显现出来，他们的竞争从纯粹的个人层面公开转向了政治层面。

根据克里姆林宫的传统，葬礼仪式除了其实际功能外，还应该展示最隐秘的东西——发言者在苏联等级制度中的真实地位。其他一切都是无关紧要的，因此也不是必须的。演讲本

身及其内容可能会成为毫无意义的陈词滥调，成为普通的空话。然而，3 月 9 日明显违反了以往的游戏规则。

马林科夫、贝利亚和莫洛托夫在他们的演讲中都完全遵守了礼仪，对逝者给予了应有的尊重，但他们并未就此止步。他们急于利用这个机会，表达自己对国家未来发展道路的看法。他们在阐述自己此前隐藏的立场时，与其说是向人民呼吁，不如说是向官僚机构呼吁，因为官僚机构可能成为所出现冲突的唯一仲裁者。这个仲裁者绝非中立，而是公开偏袒的，并且个人对最终选择两种未来政策构想中的哪一种有着切身的利益关系。按照职位顺序，马林科夫第一个发言。他把演讲的悼念部分构建成了一种誓言：斯大林遗愿如此——我们将继承并发扬光大。他承诺，国家将继续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将加强社会主义国家，维护苏联各民族的团结和友谊，增强武装力量的威力，发展社会主义工业、集体农庄制度，巩固工人和集体农庄农民的联盟。总之，他确认了对这一学说的忠诚，但紧接着指出：“这些成就”本身并非有价值，而只是进一步推动国内外政策持续进步的前提条件。

在阐述了第一个要点后，他几乎逐字重复了呼吁书中已有的内容。他宣布新领导层的主要目标是“坚定不移地争取进一步改善工人、集体农庄庄员、知识分子以及所有苏联人民的物质生活状况”，“毫不松懈地关注人民的福祉，最大限度地满足他们的物质和文化需求”。然后他又回到了之前使用过的修辞手法“遗愿如此——我们将继承”，这次是针对加强苏联共产党的问题。他宣称：“我们党的力量和不可战胜性在于它与人民群众的紧密联系”，而这种联系的基础是“党始终如一地为人民利益服务”。至于人民的利益应该如何理解，此时应该已经很清楚了。

在外交政策部分，马林科夫也重复了呼吁书中的相关表述。他提到有必要“加强与各人民民主国家人民永恒且牢不可破的兄弟情谊”，推行“维护和加强和平”、“国际合作以及与所有国家发展商业关系”的政策。但与此同时，正是在这里，格奥尔基·马克西米利安诺维奇做了一个重要补充。他指出，这样的外交政策应该基于并依靠“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不同制度能够长期共存与和平竞争”的立场。

马林科夫认为仅仅提及如此重要的思想显然是不够的，在演讲结尾他又回到了他认为的关键问题上。他不仅仅是重复，而是几乎是在向国家和世界呼吁，恳求并劝说所有人：“我们的主要任务在于……与所有国家和平共处。”马林科夫解释说，只有这样的外交政策才是“最正确、最必要和最公正的”，“唯一正确的”。而且它应该“基于相互信任”，不能仅仅停留在宣传声明上，而要转化为具体的决定、协议，成为“实际的”，并由事实来检验，且只能由事实来检验。

贝利亚展示了对国家未来的截然不同的看法，他在演讲中赋予了解决国内问题首要的重要性。他并不拒绝广泛使用宣传套话，但赋予了它们特殊的意义和价值。例如，他不仅仅提到了苏联各民族的友谊，而是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就像在苏联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讲那样，阐述了这一论点。他故意将重点从普遍的——团结，转移到了独特的、特殊的——民族性上，并两次强调了这一点。“我们的国内政策，”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说，“基于……所有民族共和国在一个伟大的多民族国家体系中的紧密联合。”

在描述未来的总体政策时，他公开以论战的口吻勾勒出了自己的优先事项体系：这项政策将“旨在进一步加强我们国家的经济和军事力量，进一步发展国民经济，并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苏联社会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接着他抛出了一句含义丰富的话，其意义直到一个月后才变得清晰起来：“苏联政府将悉心保护他们（公民。——Ю.Ж.）在斯大林宪法中所规定的权利。”

贝利亚也没有放弃对马林科夫外交政策路线的修正，他采用了默认的手法。他重复了关于维护和加强和平、发展商业关系的必要性的一般性观点，但只字未提两种制度的和平长期共存。然后，他大概认为对苏联外交政策基本方针的这种阐述还不够，呼吁不仅要“不懈地提高和磨炼党和人民对苏联敌人的阴谋和诡计的警惕性”，而且要“进一步加强这种警惕性”。他还顺便解释说，武装力量就是为此而存在的，因为“武装力量配备了各种现代武器”。

在演讲结束时，贝利亚认为有必要回到领导层的团结和统一问题上。他表示相信，正是这种团结和统一将成为“成功实施党和国家内外政策的保障”。接着他又做了一个令人费解的暗示。他向全国“人民”保证“共产党和苏联政府将不遗余力、不惜牺牲生命，以维护领导层的钢铁般的团结”。至于这位内务部长所说的是谁的生命，人们只能猜测。

莫洛托夫在最后发言，他在对当前形势的评估以及对苏联未来发展道路的展望、对亟待解决的任务的确定等方面，表达了与贝利亚类似的观点。

首先，他强调了“关注加强苏联武装力量……以防侵略者的挑衅”的必要性，以及“在与帝国主义侵略国家的所有敌人、间谍的斗争中表现出应有的警惕和坚定”的必要性。只是在以可怕的当前和未来图景吓唬了听众，对间谍活动表示了谴责之后，莫洛托夫才相当简略地谈到了国际形势。作为外交部长，他确认苏联将推行和平、合作和发展商业关系的政策。然而，这种政策不应该针对所有国家，而应该只在“各国人民之间”推行，并且只与“那些同样有此意愿的国家”建立关系。

莫洛托夫认为有必要阐述的第三个问题是“多民族的”苏联各民族之间的“友好关系”。在这里，他不仅完全赞同贝利亚的观点，而且在对民族问题的解释上更进一步。他强调，民族问题的解决已经超出了苏联的范围，因为“这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尤其是考虑到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建立以及殖民地和附属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但和贝利亚一样，莫洛托夫没有进一步阐述这种可能有两种解读的意外关联，就中断了话题[783]。

因此，1953 年 3 月 9 日，对于那些能够读懂字里行间的意思、理解通过对比产生的隐含意义的人来说，终于揭示了领导层内部“混乱”的真正含义。他们提出的不是一个，而是两个政府纲领，两条截然不同的预想路线。第一条，由马林科夫阐述，基于必须立即实现国际关系缓和的必要性，利用由此释放的力量和资源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第二条，由贝利亚和莫洛托夫在演讲中提出，则基于另一种观点。基于坚定、毫不动摇的信念，即近期内紧张局势不仅必然会持续存在，而且迟早会演变成两个阵营、两种制度之间的武装冲突。因此，应该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国防工业，只有在有剩余资源的情况下，才将其用于和平目的。当然，如果真的有剩余资源的话。

自然，“三人执政团”成员如此不同的立场不可能不影响他们之间的关系，甚至连表面上协调一致的行动也难以维持。这表明，让莫洛托夫加入三人执政团，对贝利亚的影响力起到了一定的制衡作用，但对马林科夫的影响力制衡作用更大，而且并没有取得明显的优势。这不可避免地使权力斗争的逻辑结局——争夺权力的决定性冲突、对权力分配协议的重新审视——更近了一步。

事实上，仅仅四天后，不可避免的事情就发生了。

从表面上看，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即将发生任何重大而紧迫的变化。事件的发展完全符合现有的协议，并进一步巩固了它。

3 月 8 日，从北京召回了 A．C.潘友新，预计由 B．B.库兹涅佐夫接替他的职位，而库兹涅佐夫则“让位”给了苏联工会主席什维尔尼克。3 月 10 日，莫斯科州党委主席团召

开会议，“按照要求”选举 Н．А.米哈伊洛夫为第一书记，因为赫鲁晓夫的调动。3 月 11 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团正式解散了其仍保留的三个行业主席团：化学和发电站主席团、机械制造和电力工业主席团、食品工业主席团[784]。3 月 12 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选举什维尔尼克为主席。而在第二天，之前提到的人事变动进程中断了。

所有报纸都刊登了、并多次通过广播宣读的联席会议决议，规定于 3 月 14 日召开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然而，前一天召开的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第一次会议决定将会议推迟一天，并在当天晚上 9 点召开另一次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特别全会。从形式上看，是为了筹备这次会议，讨论提交会议审议的问题[785]。但实际上，是为了大幅削减马林科夫的权力。

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大多数成员，毫无疑问包括贝利亚、莫洛托夫、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赫鲁晓夫和米高扬，成功地做到了——首先在他们的小型会议上，然后在全会上，将两种真正的权力分支：国家权力和党的权力，完全分开。不再将最高职位集中在一个人手中，在这种具体情况下，就是不再集中在马林科夫手中。决议内容为：“满足格·马·马林科夫同志关于解除他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职务的请求，考虑到同时担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和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的职能是不合适的。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会议的主持工作交由格·马·马林科夫同志负责。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处的领导工作和书记处会议的主持工作交由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尼·谢·赫鲁晓夫同志负责。”这样的表述本身就立即改变了党内机构中的权力格局。提高了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的“地位”，使他实际上成为了中央委员会的第一书记，尽管只是事实上的。他获得了实际权力。

同样的目标也促使在几天前刚刚更新的书记处中又免去了另外两人的职务。А．Б.阿里斯托夫，在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后“负责监督”各加盟共和国、边疆区和州党委的党组织工作，被派往哈巴罗夫斯克担任边疆区执行委员会主席，“鉴于加强远东地区领导工作的特殊重要性”。Н．А.米哈伊洛夫，为了让他“专注于莫斯科州党委的工作”，被免去了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宣传鼓动部部长和中央委员会书记的职务。最后，另外两项决定也对政治舞台上的局势产生了重大影响。Н．Н.沙塔林从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转为正式委员，而 А．И.米高扬则进入了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团[786]。这大概是对他们支持的一种回报。

然而，不应将这些打破先前协议的人事变动视为马林科夫的失败。更确切地说，应该将其评估为对他来说虽然是被迫的，但仍然是与核心领导层中出现的相当强大的团体达成的妥协，这个团体公开且一致地反对他这个被推举并被认可的领导人。毕竟，格奥尔基·马克西米利安诺维奇不仅有所失去，也有所获得，尽管他无法完全弥补失去的东西。在现在仅由赫鲁晓夫、波斯佩洛夫、苏斯洛夫和沙塔林四人组成的书记处中，他保留了两名支持者。此外，他利用权力分支分离的原则，说服全会同意准备一项关于扩大苏联部长权力的决议[787]，这应该能最大程度地使部长们以及他自己摆脱赫鲁晓夫和中央委员会各部门过于繁琐的监督。诚然，在很大程度上，马林科夫的对手——贝利亚、莫洛托夫、布尔加宁、米高扬，在加强自己的地位和独立性方面有着更大的利益，这对他起到了帮助作用。

但无论从官僚政治博弈的角度来看，这一切显得多么重要，对马林科夫来说，全会更重要、最主要的成果，无疑的胜利是另一件事——推迟讨论当年的国家预算。更确切地说，是批准了对现有预算草案进行彻底修改的必要性，该草案预计在国防方面有巨大的开支。正是那些开支，尽管战争已经结束，却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在六年内几乎翻了一番：从 1947 年的 15.8%增加到 1952 年的 23.7%[788]。而且这还是根据公开的、官方的数据，这些数据肯定是被低估了的。不包括（军事机密!）不仅是关于核武器、火箭研发和生产的开支，甚至包括常规武器的开支信息。这反映了维持世界上最庞大军队的成本，在预计的作战区域有两个强大的突击集团：在德国和远东，靠近与朝鲜的边界。

据当时的财政部长兹韦列夫回忆，1953 年，即使维持国防开支在原有水平，预算赤字也至少应该达到 500 亿卢布，即预算的十分之一[789]。为了兑现他关于优先发展和平经济、提高生活水平的承诺，马林科夫必须得到核心领导层的同意，对已经制定好的国民经济计划及其财政等价物——预算，进行全面审查。迫使贝利亚、布尔加宁做出牺牲自己利益的让步。而他做到了这一点。因此，他成为了闪电会议上唯一的报告人，会议只持续了两个小时。3 月 15 日，他进行了第三次发言，在发言中简短地总结了全会的成果，而大多数代表直到一周后的 3 月 21 日才从报纸上得知这次全会的情况。

马林科夫试图解释，所提议的改革绝不是由最近的事件引起的，而是由来已久的、纯粹的实际必要性。“目前对现有各部进行合并的措施，”他说，“将国民经济、文化中相关行业的管理合并到一个部的措施，并不是今天才出现的。在斯大林同志在世时，我们党和政府就已经与他一起，长时间地酝酿这些措施了。而现在，鉴于我们国家遭受的重大损失，我们只是加快了实施这些已经成熟的组织措施的步伐……”

他也顺带提到了“集体领导”的问题，这个问题可以说就是在前一天，作为又一轮权力斗争的结果而出现的：“我们领导的力量在于其集体性、团结性和整体性。我们认为，最严格地遵守这一最高原则是正确领导国家的保障，是我们沿着在我国建设共产主义的道路继续前进的最重要条件。”这样的表述，而且还是由马林科夫说出的，应该意味着一件事。他不仅接受了已经发生的事情——权力的重新分配，对自己权力的限制，而且还警告对手，他不会允许他们中的任何人在未来试图成为唯一的领导者。然后他特意强调了自己的首要地位——尽管是在平等者之中：“政府在其所有活动中，都将严格执行党制定的内外政策。我们已经就苏联政府的这一立场发表过声明。我指的是我的发言，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贝利亚同志的发言，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莫洛托夫同志在 3 月 9 日葬礼仪式上的发言。”但他只是用几句话，简略地重复了自己的纲领[790]。

只是在全会之后，在这次会议上首次确定了新的权力核心，这次是“四人组”——马林科夫、贝利亚、莫洛托夫、赫鲁晓夫，在确认了由 28 人组成的政府的会议之后，才有可能完成“三人执政团”开始的事情。组建合并后的各部的委员会，创建它们的内部结构，确认中央机关以及地方——各加盟共和国、边疆区和州的部门负责人的职位。从 3 月 15 日起，根据苏联部长会议的决议开始实施这一切，而从 3 月 17 日起，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和当天恢复工作的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也开始实施。

随着每一周的过去，随着每一项任命和决定的做出，“四人组”成员的立场和利益分歧越来越大。他们唯一的共同点是：渴望结束朝鲜战争。这是马林科夫、贝利亚和布尔加宁早在 1951 年春天就提出的目标，现在莫洛托夫和赫鲁晓夫也不反对这个目标。

对于“四人组”中的三个人来说，远东的和平能让两个阵营摆脱他们所处的困境。而对于马林科夫来说，意义要大得多：这是他在实施自己的路线时，众多中间任务中的第一个得以解决。就是他在苏联议会会议上以更新、更具体的形式阐述的那个路线。“目前，”格奥尔基·马克西米利安诺维奇说，“没有任何一个有争议或未解决的问题，是不能在相关各方相互协议的基础上以和平方式解决的。这适用于我们与所有国家的关系，包括我们与美国的关系。”[791]

不可能更明确地呼吁美国进行谈判了。而马林科夫坚信，缓和不仅对所有人来说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这一信念源于刚刚发生的事件。3 月 12 日，英国驻莫斯科大使 A.盖斯科恩主动拜访了莫洛托夫，在仅仅五分钟的谈话中，他成功传达了极其重要的信息。他表达的绝非自己的意见，而是外交大臣艾登的意见，甚至可能是首相温斯顿·丘吉尔的意见，他说，“他能够在缓和两国关系的事情上提供帮助”[792]。

然而，由于担心美国可能的负面反应，苏联政府拒绝了从宣传角度来看非常有利的和平进程发起者的角色。采取第一步的权利交给了盟友，而且是在朝鲜北方军队和中国“志愿军”指挥官的层面上。

3 月 28 日，金日成和彭德怀出人意料地认为有必要最终同意联合国军在朝鲜的总司令马克·克拉克将军一个月前向他们提出的建议。就是那个建议，其中提议进行一个简单、纯粹人道主义且不附带任何义务的行动——交换伤病战俘。似乎，做到这一步就可以了，不用急于推动事态发展。然而，为了让任何人都对共产主义阵营的最终目标没有疑虑，军事指挥官之间的通信立即得到了加强，而且是在完全官方的、国家层面上。

3 月 30 日，中国外交部长周恩来呼吁交战双方“开始寻求全面解决战俘问题的办法”。同一天，金日成，这次是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的身份，进一步推动了这一倡议。他提议在板门店恢复半年前中断的谈判，但不要局限于这个重要但局部的问题，而是要将注意力集中在主要问题上——“立即结束朝鲜战争”[793]。

当莫斯科得知克拉克同意派代表团前往板门店的消息后，莫洛托夫发表了具有深远意义的声明。他不仅对双方即将举行的会面表示欢迎——“苏联政府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这一高尚的行动表示完全支持，并且毫不怀疑这一行动将得到全世界人民的热烈支持”。他还认为现在可以宣布关键的一点：“苏联政府坚信，这一建议将被美国政府正确理解。苏联政府一贯支持所有旨在实现和平以及结束朝鲜战争的步骤。”[794]

苏联在最尖锐的国际问题之一（尽管只是众多未解决的国际问题之一）上如此明确表达的立场，西方在考虑时不能不参考马林科夫 3 月 9 日和 15 日的讲话。西方不得不承认，两大阵营之间的关系确实出现了一个新的时代。为了最终确定这一点，检验克里姆林宫在谈判道路上愿意走多远，西方采用了古老的、经过多次检验的外交试探策略。

首先行动的是英国外交大臣艾登。他利用看似有利的形势，请求莫洛托夫协助释放几名英国公民，这些公民在战争初期偶然身处交战区域，被拘留在朝鲜北方。克里姆林宫领导层理解他的请求，不久后所有英国人（有趣的是，其中包括未来著名的苏联间谍查尔斯·布莱克）都到了莫斯科。4 月 11 日，大使盖斯科恩再次拜访了莫洛托夫。这次访问的正式原因是需要转交艾登的一封私人信件，他刚从伦敦带来这封信。与此同时，盖斯科恩口头传达了外交大臣对事态发展的评估。“艾登多次强调，”大使指出，“他希望改善与苏联的关系，他认为从你们这边也能看到同样的意愿。艾登认为实现这一目标的方法是首先解决我们关系中的一些小问题。”他在信中提到的那些完全可以接受的、需要解决的问题之外，又增加了一个问题。请求用英国皇家空军的飞机接走之前被拘押的人。换句话说，允许英国军用飞机在苏联首都降落和起飞。莫洛托夫立即同意了这一请求[795]。

德怀特·艾森豪威尔也采取了类似的观望立场。4 月 16 日，在华盛顿的“斯塔特勒”酒店，在传统的美国报纸编辑协会会议上，他发表了题为《和平的机会》的演讲。在演讲中，这可以说是对马林科夫的回应，美国总统表达了他对最近发生的变化的看法，以及与此相关的期望。

“现在，苏联的新领导层掌权了，”艾森豪威尔特别指出，“无论他们与过去的联系多么紧密，都不能完全束缚他们。他们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自己。苏联新领导层现在有一个宝贵的机会，与世界其他国家一起认识到所肩负的责任，并帮助扭转历史的进程。

他们会这样做吗？我们还不知道。苏联领导人最近的声明和姿态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他们可能认识到了这个时刻的可能性。

我们欢迎每一个真诚的和平行动。我们不只是对言辞感兴趣。我们只对以行动为支撑的和平目标的真诚感兴趣。这样的行动机会很多……”

艾森豪威尔和艾登的立场在这之后就没有任何相似之处了，也没有了共同之处。与艾登不同，美国总统认为自己可以提出一个不可或缺的先决条件，即苏联政府解决的不是双边关系中的个别问题，而是全球性问题，以此作为苏联政府和平意愿的无可争议的证明，而这些问题不仅取决于克里姆林宫的意愿和目标。

在“具体行动”中，艾森豪威尔提到了莫斯科（而不是华盛顿）早就努力促成的一些事情：准备与奥地利和统一的德国签订和平条约；与之有机相关的是释放仍留在苏联的德国战俘；在朝鲜签订“光荣的停战协定”。与此同时，不知为何，美国总统还要求苏联领导层做一件克里姆林宫当时还完全没有涉及的事情——“停止对印度支那和马来西亚安全的直接和间接侵犯”。最后，他甚至超越了国际关系的可接受范围，希望苏联确保“东欧人民的完全独立”。

作为对苏联在这些方面做出让步的交换，艾森豪威尔准备签订关于限制军备和控制核能生产的协议，以确保“禁止核武器”[796]。

看到这样的文本，即使是对国际关系问题不太熟悉的人也明白：这仍然是从实力的角度出发的对话。美国总统的方案更像是对被击败的对手的最后通牒，而不是建设性的、平等的对话。然而，决心不惜一切代价实现缓和的苏联领导层，不仅没有放弃和平路线，而且继续确认对这一路线的忠诚。

4 月 20 日，在向美国新任驻莫斯科大使查尔斯·E.波伦递交国书时，伏罗希洛夫意味深长地强调：“苏联的外交政策是和平政策，建立在严格遵守苏联与其他国家签订的条约和协议的基础上”；他表示相信，“美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之间所有需要解决的问题都可以通过友好的方式解决”[797]。

4 月 22 日，所有苏联报纸都刊登了一周前中央委员会主席团通过的《五一节号召书》。其中第一个是传统的、作为开头必不可少的，向劳动人民庆祝节日的问候。第二个位置是马林科夫表述的号召：“没有任何一个有争议或未解决的问题，是不能在相关各方相互协议的基础上以和平方式解决的。”

5 月 1 日，在军事阅兵开始前发表演讲时，布尔加宁也重复了同样的观点：“至于外交政策，众所周知，从我国政府的官方声明中可以看出，我国政府认为，只要有良好的意愿和明智的态度，所有国际分歧都可以通过和平方式解决。”[798]

最后，纯粹的宣传措施也表明了克里姆林宫领导层无论如何都坚持所选路线的坚定决心。

4 月 25 日，《真理报》在第三版刊登了艾森豪威尔演讲的全文，没有任何删减。它敢于这样做，不怕演讲中包含的公然反苏言论。在演讲前刊登的编辑文章，更确切地说是官方评论《对艾森豪威尔总统演讲的回应》，占据了整个第一版，逐点回应了演讲中包含的所有提议和指责。它能够向苏联公众，甚至不仅仅是苏联公众，展示美国政府首脑立场的荒谬、观点的偏见和评估的错误。但《真理报》的文章结尾并不是对无法进行平等对话的遗憾，而是相反的内容：

“众所周知，苏联领导人呼吁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问题，并不附带对美国或其他加入或未加入英美集团的国家的任何先决条件。这是否意味着苏联方面没有任何要求呢？当然不是。尽管如此，苏联领导人将欢迎美国政府或任何其他国家政府的任何步骤，如果这一步骤

旨在友好地解决有争议的问题。这表明苏联方面准备以认真务实的态度讨论相关问题，既可以通过直接谈判的方式，也可以在必要时在联合国的框架内进行讨论。”

丘吉尔 5 月 11 日在下议院的演讲可以说是对关于实现缓和的可能性和途径的首次意见交流的某种总结。与艾森豪威尔不同，英国首相避免了宣传性的言辞，没有提出对苏联明显不可接受的要求。同时，他立即明确了可能谈判的范围和主题。他把在朝鲜达成和平协议作为主要目标，同时指出，“目前，我甚至对停战或停火都会感到非常满意”。在评估解决欧洲问题的前景时，他也保持了同样现实的立场。

“无论我们多么渴望与苏维埃俄罗斯达成友好解决方案，”丘吉尔坚定地说，“甚至是更好的休战状态，我们绝不打算放弃我们对西德所承担的义务。”但同时，他也展示了即使在这个问题上也有妥协的可能性：“我不相信，俄罗斯的安全与西欧的自由和安全相结合的重大问题是无法解决的。”

英国首相在寻求与苏联接近的问题上也采取了同样务实的态度。“试图制定过于详细的计划，并期望那些使共产主义世界和非共产主义世界产生分歧的重大根本性问题能够通过一个全面的和平协议一下子得到解决，这将是一个错误……不应该忽视逐个解决个别问题。”“我非常希望，”丘吉尔补充说，“北约国家外交政策的阐述中没有任何内容会阻碍或削弱可能是俄罗斯人情感的深刻变化。我们都希望俄罗斯人民在国际事务中占据与其相称的显著地位，而不必担心自己的安全。”作为实现共同目标的第一个实际步骤，他提议“毫不拖延地”召开“主要国家最高层之间的会议”[799]。

几天后，丘吉尔这一出乎意料但又充满希望的提议在法国得到了支持——在国民议会的外交事务委员会中。

美国的首次反应要晚得多，在 5 月 21 日。艾森豪威尔不无道理地担心“欧洲的反抗”加剧——北约一些成员国对美国武装西德计划的抵制，他表示，在这样的问题上不能操之过急。首先，应该只召开三个西方国家领导人的会议，以便在即将与苏联领导人举行的会议之前协调他们的立场。

现在很明显，尽管困难重重，苏联呼吁谈判的主张——首次在 1952 年 12 月于维也纳世界和平大会的报告和呼吁书中阐述——正在缓慢但确实地得到理解和回应。其总体表述，后来被马林科夫逐字重复——“国家之间没有不能通过谈判解决的分歧”，以及具体提议——关于结束朝鲜战争，关于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内的五大国领导人会面。因此，即使在艾森豪威尔相当克制的声明之后，5 月 24 日的《真理报》还是在第一版刊登了另一篇篇幅较长的编辑文章《关于当前国际形势》。这篇文章公开表达了克里姆林宫的观点，其核心内容可以归结为一句明确的话：“苏联始终准备以完全认真和真诚的态度考虑任何旨在确保和平以及可能更广泛的国家间经济和文化联系的提议。”

这是对丘吉尔、艾森豪威尔的演讲以及三位领导人（他们还只是计划在 12 月在百慕大群岛会面）可能做出的任何决定的明确回应。

与此同时，没有任何拖延或犹豫，解决了对国际社会来说最尖锐、最痛苦的问题——朝鲜问题。4 月 26 日，板门店谈判恢复。仅仅一个月后，双方立场就最大限度地接近了，因此在 6 月 8 日签署了战俘交换协议，7 月 27 日签署了停战协议。

在峰会召开之前，苏联领导层开始推动解决另一个同样重要的国际问题——德国问题。他们丝毫没有偏离最初的立场——建立一个统一、民主、武装但中立的德国，在签署和平条约后，所有占领军将立即从德国撤出，同时开始从根本上改变苏联在德国的存在形式。5 月 29 日，苏联管制委员会解散，最高指挥官不再需要处理民政事务。这些问题交给了 B．C．

谢苗诺夫负责，从那时起，他的职位不再是苏联管制委员会的政治顾问，而是高级专员。不久之后，6 月 5 日，在奥地利也采取了类似措施，不过，仅仅一周后，最高专员 И. И. 伊里切夫被提升为大使。最后，6 月 26 日，苏联正式宣布提前释放并遣返德国战俘回国[802]。

随着新的外交政策学说逐步实施，莫洛托夫感觉自己越来越有信心，因此在 4 月中旬开始恢复他在外交部的地位。维辛斯基前往纽约，他将在那里代表苏联出席联合国会议，这对莫洛托夫来说意义重大——主要竞争对手不再构成威胁。在两周内，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取得了很多成果。他成功让马利克被任命为驻伦敦大使，让回到莫斯科的葛罗米柯被确认为外交部第一副部长，而一直没有前往北京的 В. В. 库兹涅佐夫则成为第二副部长。摆脱了突然变得多余的 В. Н. 帕夫洛夫，他曾是斯大林的翻译，被外国语出版社的主编“解雇”。将驻巴黎大使 А. П. 帕夫洛夫替换为 С. А. 维诺格拉多夫，后者曾与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一起失宠。在外交部的关键职位上任命了他以前在工作中熟悉的部门负责人，如 А. А. 索博列夫（负责美洲国家事务）、Н. Т. 费多连科（负责远东国家事务）、Г. М. 普希金（最初负责中东和近东国家事务，不久后负责第三欧洲司）、Г. Т. 扎伊采夫（负责中东和近东国家事务）[803]。

与此同时，意识形态领域开始出现重大转变，并且这些转变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

从 1953 年 3 月 6 日起，国内所有大众媒体的材料都在不同程度上与斯大林有关。它们报道了他的病情，随后是他的去世。以及他在苏联、苏联人民、进步人类乃至全世界生活中的重大意义。共产主义政党和工人政党的领导人——哥特瓦尔德和贝鲁特、拉科西和格罗查、毛泽东和金日成等人，都表达了对斯大林真诚的爱戴之情。爱伦堡和特瓦尔多夫斯基、法捷耶夫和西蒙诺夫等许多人，都深情地撰写了关于这位已故领袖的文章。

在那些日子里，全国所有电影院几乎不间断地播放着记录全民悲痛的纪录片。展示了成千上万的人前往工会大厦，向斯大林致以最后的敬意。展示了在葬礼期间，全国所有城市和村庄举行的成千上万场集会。每次都记录下了真切的悲痛和人们眼中的泪水……

然后，突然，就像被魔法棒一挥，一切都变了。从 3 月 19 日起，报纸和杂志都不再提及斯大林。这种反差如此强烈，以至于中央委员会收到了大量来自学生、工人、退休人员、军人、共产党员和无党派人士的信件，他们要求中央委员会解释这种奇怪的转变，消除他们的疑惑，甚至是不满。但中央委员会保持沉默。更确切地说，它继续默默地、积极地行动着，丝毫不透露自己的动机和目标。甚至对党内官僚也隐瞒这些。对于那些完全陷入困惑、只能猜测风向的人来说，情况就是如此。

А. Н. 谢列平是最早感受到形势变化的人之一。当时他是共青团的领导人，后来成为了克格勃的负责人。他急于“表现自己”，于 3 月 26 日向党的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提议，将他所领导的青年联盟更名。从列宁主义共青团（列宁共青团）改为列宁-斯大林主义共青团（列宁斯大林共青团），同时将《共青团真理报》更名为《斯大林接班报》[804]。但谢列平没有收到对他的报告的回复。很可能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才明白，由 П. Н. 波斯佩洛夫取代 Н. А. 米哈伊洛夫担任中央委员会意识形态书记这一职位，绝不是一个形式上的举动。

四天后，自 1944 年起担任塔斯社负责人的 Н. Г. 帕尔古诺夫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他将一份准备分发给全国所有报纸发表的材料提交给波斯佩洛夫审批。这份材料看似无害，纯粹是“日历性质”的，是为了纪念斯大林创建外高加索社会民主工党联盟 50 周年而准备的。第二天，他收到了一个奇怪的回复——不建议发表这篇文章[805]。

4 月 11 日，一个与意识形态问题相距甚远的人——苏联财政部长 А. Г. 兹韦列夫也陷入了类似的境地。他完全按照现有的规定，向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提交了他关于 1953 年预算

的报告草案，他需要在即将召开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做这个报告。这位部长预计会收到关于报告实质内容的意见：关于预算支出和收入部分的规模，关于各部门之间资金的分配。他也确实收到了这些意见。他必须坚决改变为经济提供资金的原则本身。从重工业和国防工业中抽出大部分资金，将其投入到农业和轻工业中[806]。此外，根据这些意见，他还必须解释，由于另一个原因，他不得不重写这份报告。在报告中，不应该再引用斯大林的话，也不应该以他在不到一年前出版的“划时代”著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为依据。

在那几个三月到四月的日子里，在权力的中层，类似的问题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形势越来越迫切地需要明确性，需要清晰、明确的指示，无论是对所有人，还是至少对一小部分党内官员。于是，马林科夫决定采取极端措施。他提议立即在 4 月召开另一次中央委员会特别全会。在这次全会上，讨论他认为最重要的问题——关于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问题。

他准备了自己的发言草案。草案极其简短，几乎是提纲式的，以便根据讨论的进展情况展开阐述：

“同志们！根据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委托，我认为有必要关注一个重要的原则性问题，这个问题对于进一步加强和团结我们党和苏联政府的领导工作具有重大意义。

我指的是对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的错误、非马克思主义的理解问题，必须坦率地说，这种理解在我们这里得到了非常广泛的传播，其结果是进行了有害的个人崇拜宣传。无需证明，这种个人崇拜与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处，它本身只不过是一种蛊惑人心的手段。

我们党的力量、正确领导的保障、进一步前进的最重要条件、进一步加强我国经济和国防实力的关键，在于领导的集体性和整体性。”

马林科夫还起草了全会最终文件的草案：

“基于这些原则性考虑，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将以下决议草案提交给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会审议：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认为，在我们的书面和口头宣传中存在一些不正常现象，表现为我们的宣传人员陷入了对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的非马克思主义理解，陷入了对个人崇拜的宣传。

鉴于此，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认为有必要谴责并坚决消除我们宣传中的非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蛊惑人心的倾向，这些倾向沿着宣传个人崇拜和贬低团结、整体、统一的集体领导和政府的意义和作用的路线发展。’”

格奥尔基·马克西米利安诺维奇还打算用以下的话来结束他的发言：“可以自信地说，这种杜绝个人崇拜的路线以及始终如一地贯彻集体领导原则，将使我们的党、我们的领导更加稳固和团结，并完成我们所面临的历史任务。”

然而，随后，显然是受到了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某一位成员的第一反应（而且显然不是友好的反应）的影响，马林科夫对这两个文件都做了相当含糊的修改。他为对个人崇拜的批评进行了辩护，虽然当时没有直接提到斯大林的名字，但毫无疑问，他引用的是……斯大林本人的话。他在发言文本第二段的结尾处补充道：“在座的许多人都知道，斯大林同志曾多次以这种精神发表意见，并坚决谴责对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的非马克思主义、蛊惑人心的理解。”格奥尔基·马克西米利安诺维奇以稍有不同但意思明确的表述，在决议草案的第一段中添加了类似的话[807]。

1953 年 4 月，以斯大林的名义提出这个问题时的所有复杂性，甚至是微妙性，现在都可以理解了。从人们毫无节制地颂扬这位领袖到现在，时间过去得太少了。在两个极端之间

需要有一个缓冲的空间，需要有适应的可能性。还有一个细节也应该引起对这两个文件的注意。为什么马林科夫在谈到个人崇拜时，对 20 世纪 30 年代的大规模镇压只字未提呢？然而，在那些日子里，对于最高领导层来说，对这个问题的这种解释并不需要额外的说明。

为什么要回忆镇压事件呢？因为至少那些直接威胁到权力高层的镇压事件，在 1938 年底就已经结束了。而且马林科夫本人还直接参与了此事，很多人都知道这一点。人们记得，正是格奥尔基·马克西米利安诺维奇准备了 1938 年 9 月 20 日被政治局批准的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决议《关于登记、审查和批准苏联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负责工作人员在人民内务委员部和其他强力人民委员部的任职》。正是这个文件恢复了党对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内务人民委员部）失去的控制。在很大程度上使得能够更换其领导干部，当然，首先是从叶若夫开始。与此同时，这极大地扩大了马林科夫和他所领导的党的领导机关部门的权力。将所有加盟共和国和共和国人民委员部的重要职位的任命权都交给了他。这样一来，格奥尔基·马克西米利安诺维奇就成为了某种意义上的国家干部部门负责人。

马林科夫也是那几个构思并准备了更重要决议的人之一，这个决议使得国家恢复了稳定，带来了安宁。这就是 1938 年 11 月 18 日苏联人民委员会和苏联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的联合决议《关于逮捕、检察监督和侦查工作》。正是这个决议首次正式承认了大规模镇压的巨大规模、非法性以及许多“案件”的捏造性质。最高领导层也知道，马林科夫是另一个联合决议的起草者之一。即 1938 年 12 月 1 日的《关于逮捕批准程序的决议》，这个决议最终使得政府所有成员、州委、边疆区委书记及以上级别的党内官员完全摆脱了达摩克利斯之剑的威胁。

很可能，马林科夫根本就不想再一次提及所有这些事情。而且，他大概也担心自己行动的后果。担心在为“克里姆林宫医生案件”、“明格列尔案件”、“格鲁吉亚案件”的被指控者平反的背景下，最终获得胜利者桂冠的不是他，而是贝利亚。而且直接提及镇压事件必然会导致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内部的激烈对抗，核心领导层的其他成员会公开反对他的倡议，因为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参与了“大清洗”。

也有可能，还有其他原因促使马林科夫不涉及镇压问题。他首先希望确定对个人崇拜现象总体上的责任，然后才是对其具体表现的责任。其中包括对 20 世纪 30 年代罪行的责任。马林科夫对党本身、党在国家、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看法，早在战争之前就已经形成，这一事实支持了这种解释。

马林科夫恰恰在 4 月开始行动绝非偶然。可以相当肯定地说，是看似有利的形势促使他这样做。核心领导层的其他成员首先关注的是巩固自己在权力顶峰的地位。马林科夫提议他们同意召开全会并以极其温和的形式谴责个人崇拜，他指望的是相互性。指望他们对他为了自身利益而做出的让步给予友好的回应。对贝利亚来说，是为了结束“克里姆林宫医生案件”、“明格列尔案件”和“格鲁吉亚案件”，而且这些案件是以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决议的形式结案的。对赫鲁晓夫来说，是为了同意将中央委员会书记处的领导权交给他，从而将整个党的机构交给他。对他们两人来说，是为了默许他公开努力通过扩大加盟共和国的权力来打破国家开始形成的单一性。

如果马林科夫有这样的打算，那么他的期望落空了。他们没有让他召开全会来谴责个人崇拜。究竟是谁阻止了他——现在已经无法确定。目前只能进行推测。在马林科夫的支持者中，几乎可以肯定有 П. Н. 波斯佩洛夫、Н. Н. 沙塔林、М. З. 萨布罗夫、М. Г. 别尔乌辛。而反对者可能是 М. А. 苏斯洛夫、Л. П. 贝利亚、В. М. 莫洛托夫、К. Е. 伏罗希洛夫、Л. М. 卡冈诺维奇、А. И. 米高扬、Н. А. 布尔加宁、Н. С. 赫鲁晓夫——他们全部或者大多数人。

虽然马林科夫的提议被拒绝了，但拒绝得不够坚决。因此，他能够继续进行“无声的”、“渐进的”去斯大林化。4 月 22 日，《真理报》刊登了传统的、常见的、对外行来说意义不大的《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五一节号召书》。总的来说，这是一份普通的宣传文件，而这一次，对于党内官员来说，其中包含了一些意想不到的内容。斯大林的名字在其中再次没有被提及。两周后，新的意识形态路线有了更明显的表达。在 5 月 9 日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秘密决议《关于游行队伍和建筑物的布置……》中。它要求做到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在节日期间完全停止使用任何人的肖像，无论是在世的领导人还是已故的领袖。两个月后，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因为害怕造成的后果，取消了这个决议。

第二十九章

马林科夫准备实施其经济计划的第二个组成部分——将生产从军工生产转向民用生产，方式却截然不同。起初，他小心翼翼，外人难以察觉。

几乎没有人知道即将到来的转产及其规模，除了那些参与各行业和工厂初步核算、将其纳入国民经济计划和预算的人。这种保密性，甚至在广播和报纸的报道中、在“负责同志”的讲话里都没有丝毫暗示，绝非源于传统上对保守秘密的追求，也不是因为害怕过早透露那些尚未具体实施的事情，而是另有原因。

在解决一个并非外交政策，而是纯粹经济问题时，马林科夫在核心领导层中不可能有盟友。贝利亚和布尔加宁都不希望、也不能允许国防工业（已经包括核工业和火箭工业）的作用被削弱，不能允许对武器和军队的拨款（向来不受限制）减少。兹韦列夫也公开支持他们。兹韦列夫在 4 月 11 日提交了预算的第二个版本，其中仅公开的军事开支就占了 24.8%[808]。

即使在这样的规模下继续军备竞赛，实际上只能意味着一件事——有意识地拒绝完成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而无论是在当前还是下一个五年计划中，早就该进行的现代化改造也将被搁置。而且还必须考虑到其他秘密的预算项目。维持国内和边防部队的开支、制造氢弹、R-5 和 R-11 弹道导弹计划的开支，这些开支也占了年度拨款总额的近三分之一。对于这个国家来说，如此明显难以承受的负担，即使不会导致彻底的崩溃，至少也会使人民对改善生活的期望长期推迟。

然而，在两大阵营公开对抗的情况下，无论是中央主席团还是中央全会，都不可能支持、甚至只是认可国内政策的转向、改革和转产。对于核心领导层的成员们——这些深受 1941 年综合征困扰、患有严重仇外心理（表现为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斗争的粗俗理解）的人来说，首先必须拿出无可辩驳的缓和证据。例如，朝鲜实现和平。要证明和平已经不可逆转。只有在那之后，才能开始讨论削减军事开支的问题。

因此，马林科夫起初不得不采用一种毫无新意的、古老的、在克里姆林宫的权谋斗争中屡试不爽的策略。表面上看，这只是又一次普通的、微不足道的管理系统重组。而实际上，这意味着军工综合体的权力下放。

早在 3 月上半月，马林科夫坚持解散苏联部长会议下属的各部门管理局，成功地将对军工综合体的控制权在“鹰派”贝利亚和“鸽派”别尔乌辛、萨布罗夫、马雷舍夫以及当时尚未发挥独立作用的德米特里·费多罗维奇·乌斯季诺夫之间进行了分配。向转产迈出的下一步是 4 月 11 日苏联部长会议通过的《关于扩大苏联部长权力的决议》。核心领导层的成员们很可能在 3 月的中央全会上同意了这项决议的准备工作，因为他们认为——这项决议将适用于他们自己以及他们所领导的部门。然而，这项决议和许多类似的规范性文件一样，是保密的，不对外公布，实际上适用范围非常有限。它赋予了并非所有苏联部长相当大的自主权，而只是那些直接领导工业、建筑和交通的部长。换句话说，主要是萨布罗夫、马雷舍夫、别尔乌辛、乌斯季诺夫以及其他少数几个人。正是这些人无需在最高层（即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团，也就是贝利亚、莫洛托夫、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那里；在中央委员会，则是通过不仅负责干部工作、还负责监督企业生产计划执行情况的相关部门，经过赫鲁晓夫）批准或确认大量日常问题。

4 月 11 日的决议赋予了苏联部长以下权力：1.批准各部委以及下属企业和建设项目的行政管理机构的结构和编制；2.调整工资标准和工资等级表，在必要时实行累进或按时奖励工资制度，将企业划入工资更高的类别；3.批准或修改单个建设项目的设计任务书、预算财

务计算、资本投资，以及设备投入使用或维修的年度计划；4.在企业之间重新分配自由流动资金或其盈余，调整年度拨款，将信贷从一个项目转至另一个项目；5.调整产品目录。

然而，如果该决议仅限于这些问题，它将丝毫不会改变陈旧过时、早已失去效用的国民经济管理体系。这种体系是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形成的，起初适用于领导那些只有两三个工厂或联合企业、五六个建设项目的行业。最重要的是，一切都没有改变——所有问题无一例外地都不是在问题产生的地方解决，而是只能在中心，在莫斯科解决，尽管是在相对较低的层面上。实际上，该决议会使保守的官僚机制得以恢复元气，而这种机制正变得越来越具有破坏性。此外，它还会加剧企业对十几位部长（他们的知识和经验并非毫无争议）的完全依赖。它会加剧那种已经持续了四分之一世纪的、糟糕的领导风格，这种风格归结为一点："不惜一切代价完成计划！而且必须提前完成！"

幸运的是，事情并没有这样发展。4 月 11 日的决议还包含了一些条款，这些条款赋予了工厂管理层一些权力。它允许他们做以前不仅被禁止、而且会被追究刑事责任的事情：出售、购买或无偿转让、接收非定额物资的剩余部分、已拆卸的设备、甚至是固定资产[809]。事实证明，即使是这样看似微不足道的放松，也解放了企业管理者的手脚，迟早会动摇旧管理体系的根基。人们满怀希望，认为改革不会就此止步。当国家经济结构的基础不再是各部委和部门负责人，而是企业或托拉斯时，改革才会结束。

5 月开始的新一轮重组也证实了这些乐观的预测。仅仅两个月前才进行了重组的各部委，这次又需要进行新的调整。这次要求简化各部委中央机关的组织结构，并大幅削减编制——从财政部的 12%到国家监察部的 41%[810]。各共和国的改革也证明了变革的根本性。早在 3 月底，阿塞拜疆就开始了部委合并。从 5 月 4 日起，这一举措扩展到了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联邦、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拉脱维亚，并在 6 月中旬结束。

与此同时，从 4 月 22 日到 5 月 28 日，在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格鲁吉亚、鞑靼斯坦和巴什基尔等面积较小的地区，废除了两年前设立的州一级行政区划。

改革如同滚雪球般逐月推进，越来越明显地呈现出与官僚主义进行有针对性斗争的特征。在改革的第一阶段，也就是初始阶段，它就使管理机构释放出了十多万人，预计其中大部分人将被派往生产领域——工厂、作坊、建筑工地、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它对官员的地位和威望也造成了沉重打击。毕竟，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被降职，同时失去了高额的工资、各种特权。政府通讯电话（"旋转式电话"）、私人汽车、专门的诊所和"食堂"（他们在那里以所谓的成本价，也就是几乎免费的价格购买最高质量的紧俏食品）。最后，还有一笔相当可观的、不公开的额外收入——临时现金补贴，或者用通俗的话说，"信封"。

"信封"的失去感受尤其明显。昨天还是共和国的部长们，即使极少数人成为了副部长，每个月也会损失两千多卢布。更多的人被安排担任部门负责人的职位，因此他们的收入从五千五百卢布降到了一千七百卢布。

但与此同时，马林科夫也并非毫无根据地担心过早地让过于庞大的官僚机构重新与自己作对，于是他采取了迂回策略。他试图分化官员，把那些他将来必然要依靠的人争取到自己这边来。

根据 5 月 26 日和 6 月 13 日苏联部长会议的绝密决议，大幅提高了"信封"的金额，但远非所有职位都能享受。只有联盟各部委的领导以及州、市、区执行委员会的领导才能享受。现在他们的月收入如下：部长的工资是五千卢布，"信封"是九千卢布；副部长是四千和五千卢布；部委委员会成员是三千和三千卢布；部门负责人是三千和两千五百卢布；州执行委员会主席是四千和五千卢布；副主席是一千六百和五千卢布；部门或小组负责人是一千

四百和两千五百卢布；州行政中心市执行委员会主席是一千九百和两千五百卢布；区执行委员会主席是一千八百和两千一百卢布[811]。

通过简单的比较就能看出这种待遇的实际水平。1953 年，工人的月平均工资是 928 卢布，职员是 652 卢布，工程师是 1230 卢布，部委工作人员是 1100 卢布。

……仅对两类官僚提高个人待遇，这首次表明了马林科夫对各共和国政府及其部委的态度，他认为这些机构对于经济管理结构来说是多余的、虚构的。这也显示了另一个不太明显但非常明确的情况。毫无疑问，马林科夫试图，尽管方式非常复杂，逐步实现废除仅存在于宪法中的联盟各共和国的虚幻主权。他对这些共和国近年来，尤其是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加入联合国后，对更大自主权的异常强烈的要求持否定态度。简而言之，格奥尔基·马克西米利安诺维奇不仅在实质上，而且在形式上都是单一制国家的拥护者。他虽然隐晦，但还是反对斯大林解决民族问题的方案，而这一方案的唯一体现就是苏联的行政区划。

与此同时，关于调整个人待遇的决议也对苏联共产党造成了沉重打击。打击了党的威望，打击了人们对党在社会和国家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传统观念。

在 5 月 25 日之前，“信封”制度使国家和党的机构能够严格对应，形成了稳固的二元等级结构。在联盟层面，副部长和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部门负责人的职位相当，部委部门负责人和中央委员会书记相当。在共和国层面，部长会议主席和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相当，部长和地方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部门负责人相当，副部长和中央委员会部门副部长相当。在州层面，州执行委员会主席和州党委第一书记相当。从 5 月 26 日起，整个这种体系、这种已经形成的平衡被打破了。党的工作人员，如果根据他们的月收入来定义他们的形象，突然发现自己比行政机构的工作人员低一级，甚至两级[812]。

在他们看来，这种极其不公正的待遇迫使他们与同样感到委屈、被忽视的各共和国政府成员团结起来。他们一致、齐心协力地为维护自己纯粹的个人物质利益而行动，向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赫鲁晓夫发出可怜的请求，要求也为他们提高“信封”金额，同时要求恢复那些被降职的人失去的特权[813]。

三个月来，沙塔林一直能够抑制党和国家机构工作人员的无尽贪婪。在马林科夫的坚决支持下，他拒绝了所有类似的要求，宣布这些要求毫无根据。

……贝利亚和核心领导层的其他成员一样，在得到合并后的部委后，起初只专注于干部问题。和所有人一样，他这样做与其说是因为重组的实际需要，不如说是因为他有充分的理由希望身边围绕着那些在必要时他可以依靠的人。

3 月 4 日，刚刚（非官方地）上任的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就在新的内务部高层进行了人员调整。他通过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办公室批准了任命自己的第一副手：自 1945 年 12 月起担任苏联内务部长的谢苗·尼基季奇·克鲁格洛夫；近几年担任克鲁格洛夫副手的伊万·亚历山德罗维奇·谢洛夫；从柏林召回的鲍里斯·扎哈罗维奇·科布洛夫，他在柏林担任苏联监察委员会副主席；以及内务部队的伊万·伊万诺维奇·马斯连尼科夫为副手。

两周后，贝利亚批准了内务部主要结构部门的负责人。第一总局（对外情报）局长是彼得·弗拉基米罗维奇·费多托夫，他长期以来实际上领导着苏联外交部下属的信息委员会；第二总局（反间谍）局长是弗拉基米尔·斯捷潘诺维奇·里亚斯诺伊；第三总局（军事反间谍）局长是谢尔盖·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格利泽；第四总局（意识形态监督）局长是尼古拉·斯捷潘诺维奇·萨济金；特别重要案件侦查部门负责人是列夫·叶夫根尼耶维奇·弗洛德日米尔斯基；政府保卫局局长是谢尔盖·费奥多罗维奇·库兹米奇耶夫；监察局局长是列夫·费奥多罗维奇·赖希曼。在这一组人中，还有被降职的原国家安全部副部长：被任命为

干部管理局局长的鲍里斯·彼得罗维奇·奥布鲁奇科夫，以及领导民警总局的尼古拉·彼得罗维奇·斯塔汉诺夫。

在推荐担任高级职位的人选时，贝利亚颇为大胆，因为其中两人，库兹米奇耶夫和赖希曼，几乎是在前一天才从监狱中获释，他们在监狱里因被认为是阿巴库莫夫的同谋而服刑两年。然而，同样引人注目的是，阿巴库莫夫最亲近的助手——列夫·费奥多罗维奇·察纳瓦和伊格纳季耶夫的追随者阿列克谢·阿列克谢耶维奇·叶皮舍夫被疏远。这表明，他对下属的评价是公正的，与他们对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的前任们的态度无关。

然后，贝利亚对他所负责的部门进行了重组。3 月 15 日，根据他的提议，苏联部长会议批准将以前独立的机构——大地测量和制图总局、印刷领域国家和军事秘密保护专员管理局（即总管理局，或简单地说，审查机构）纳入新内务部的结构中[814]。同时，为了避免内务部的膨胀，他将古拉格群岛移交给了司法部，将 18 个使用强制劳动的大型经济管理部门移交给了工业和建筑部门，其中包括远北建设总局、特种建设总局、主要特种石油建设总局、水利工程设计院[815]。

这样，贝利亚完全摆脱了旧内务部所从事的工作，卸下了对他来说沉重且不必要的负担，即对木材采伐、煤炭和矿石开采计划的执行、工业项目按时交付、大型运河设计等方面的责任。

然而，直到 3 月 19 日，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才得以解决这些紧迫的、尽管是日常的问题。当时，根据他的提议，书记处批准了，更确切地说，重新确认了各加盟共和国（除了俄罗斯联邦，那里没有这个职位）原国家安全部长担任内务部长的职务，以及俄罗斯联邦各自治共和国、边疆区和州的内务部管理局局长由相应的国家安全部管理局局长担任。他几乎没有改变伊格纳季耶夫时期形成的地方机构的管理结构，只做了四个例外。在书记处主席赫鲁晓夫的同意下，他任命了原苏联部长会议第一总局副局长彼得·雅科夫列维奇·梅什科为乌克兰内务部长，弗拉基米尔·阿列克谢耶维奇·卡库恰为格鲁吉亚内务部长；任命帕维尔·彼得罗维奇·马卡罗夫为莫斯科州内务部管理局局长，尼古拉·康斯坦丁诺维奇·博格达诺夫为列宁格勒州内务部管理局局长[816]。

现在，贝利亚终于有机会专注于最重要的事情了。为权力而斗争，同时，尽管是秘密地，推行自己的政治路线。

贝利亚继续执行 3 月开始的停止调查和释放原国家安全部工作人员的政策，同时对昨天的囚犯进行全面平反，恢复他们原来的官职和军衔。他有选择地采取行动，显然有着长远的计划。他释放了尼基塔·亚历山德罗维奇·艾廷贡、列夫·费奥多罗维奇·赖希曼、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谢利瓦诺夫斯基、谢尔盖·费奥多罗维奇·库兹米奇耶夫、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别尔金以及其他一些人，并让他们在卢比扬卡任职。他只释放了那些他通过共同工作非常了解的人，那些他可以放心地指望得到他们全力和无条件支持的人。然而，他把阿巴库莫夫、弗拉西克留在了列福尔托沃监狱，3 月 16 日，他又把马特维·达维多维奇·柳明送到了那里[817]。柳明就是那个在 1951 年夏天帮助看似不可一世的阿巴库莫夫倒台的人，阿巴库莫夫曾宣称只服从斯大林。柳明虽然并非自愿，但他成为了制造“克里姆林宫医疗卫生局医生案件”的发起人。1951 年底，他因此被提升为苏联国家安全部副部长，而仅仅一年后，当他变得不再需要时，他被调到国家监察部担任高级监察员。

这三个非常不寻常、重要的囚犯，他们深知幕后的阴谋诡计，并且在其中扮演着绝非次要的角色，这让贝利亚得以实现很多目标。首先，他恢复了自己的声誉，消除了人们对他参与“医生案件”（其中一名医生，雅科夫·格里戈里耶维奇·艾廷格尔与他有私人关系）以及“明格列尔案件”的沉重怀疑。然而，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并没有直接着手此事。

4 月 2 日，他给马林科夫写了一份报告，在报告中，他指控曾是阿巴库莫夫副手的谢苗·伊万诺维奇·奥戈尔佐夫和战后曾任白俄罗斯国家安全部长的列夫·费奥多罗维奇·察纳瓦预谋杀害了著名导演和演员米霍埃尔斯。他请求批准逮捕并追究罪犯的刑事责任。同一天，他又向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提交了另一个类似的问题，这次不是基于重新调查，而是基于柳明的“供词”。柳明在卢比扬卡接受审讯后表示：“28 名医生案件”——克里姆林宫医疗卫生局的工作人员和顾问，以及他们 9 名家属，包括俄罗斯人、犹太人和乌克兰人，被他指控犯有破坏、间谍和恐怖活动罪，这起案件完全是伪造的。是人为编造的，基于明显虚假、完全捏造的事实和自供[818]。

4 月 3 日，对国家安全部的工作方法相当熟悉的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不得不批准了关于终止“医生案件”、释放并平反因该案件被起诉人员的决议草案。但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成功避开了通常不可避免的一点——即规定撤销之前就该问题做出的决定，也就是 1932 年 12 月 4 日和 1953 年 1 月 9 日做出的决定[819]。

核心领导层同意接受贝利亚提出的游戏规则，根据这些规则，替罪羊只有柳明，他被宣布为违法的主要责任人。而对于伊格纳季耶夫，作为对下属所有行为负责的部长，处理方式却异常温和，因为他是贝利亚的人。同一决议的第三点只要求他“就国家安全部所犯下的严重违反苏联法律以及伪造调查材料的行为做出解释”[820]。确实，就在同一天，还没等他做出辩解或承认有罪，另一项决定就免去了他中央委员会书记的职务[821]。

贝利亚从同事们那里争取到了这样的决议，同时实现了两个目标。他最终摆脱了主要对手马林科夫通过伊格纳季耶夫施加的哪怕是最虚幻、纯粹名义上的控制。与此同时，他在惊讶的公众面前展现出自己是正义的捍卫者、无辜受害者的保护者。而且还让这个声名狼藉的部门有了一个体面、有吸引力的形象。

最后一点能够实现，要归功于一个巧妙的、此前从未使用过的策略。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决议被分成了三个看似独立的部分公布。第一部分是 4 月 4 日刊登在全国所有报纸上、并多次在广播中播出的“苏联内务部公告”，内容是关于终止“医生案件”、释放被逮捕人员并为他们平反。第二部分是 4 月 6 日《真理报》的社论《苏联社会主义法制不容侵犯》（第二天，大多数报纸都转载了这篇社论）。在社论中特别提到，“诚实的社会活动家、苏联人民艺术家米霍埃尔斯”“遭到了诽谤”。社论指出，对这起罪行以及“医生案件”的责任都归咎于“现已被捕的”柳明，他“作为我们国家和人民的隐藏敌人”行事。而伊格纳季耶夫的过错仅仅在于他“表现出了政治上的盲目和懦弱”，因此“被”“犯罪的冒险家”柳明“利用”。精心策划的宣传活动的第三部分是一则低调的消息《在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刊登在报纸的第二版，因此并不引人注目。这则消息告知所有人伊格纳季耶夫已被解除中央委员会书记职务。这一消息于 4 月 7 日发布。

贝利亚继续推动这一倡议，因此得以掌控局势。4 月 10 日，他促使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批准了另一项他非常感兴趣的决议。这次是关于撤销两项关于所谓“明格列尔案件”和“格鲁吉亚案件”的党内决议[822]。但由于这个问题具有地区性，范围非常有限，中央委员会的又一项平反决议没有在中央媒体上公布。只是在格鲁吉亚的党内秘密会议上宣布了这一决议。对贝利亚来说，这已经完全足够了。

正是从这个时候起，领导小组成员们意识到，他们完全被贝利亚牵着鼻子走，消除了对他的所有怀疑，但却让他有机会现在指责他们犯下了所有不可饶恕的罪行。他们明白，阿巴库莫夫和柳明在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手中成了达摩克利斯之剑，随时可能落在他们每个人头上。这两人构成了持续的、不可预测的危险，可能会有新的揭露和指控以及相应的“结论”。最好的情况，就像伊格纳季耶夫那样，只是被剥夺权力。最坏的情况……让人想起 1937 年的恐怖。

但当时最可怕的还另有原因。贝利亚并不急于动用他因不受限制地领导内务部而获得的“武器”。他甚至没有暗示谁会成为下一个受害者。他在等待。而且，他突然采取行动，好像想推翻人们对他的看法，即认为他是一个记仇且无情的权力斗争对手。

两个月后，5 月 26 日，他出人意料地对马林科夫表现出了感人的友好情谊，关心他的声誉。他给马林科夫写了一份报告，称前航空工业部长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沙胡林、空军司令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诺维科夫元帅、中央委员会部门负责人亚历山大·弗拉基米罗维奇·布德尼科夫和格里戈里·米哈伊洛维奇·格里戈里扬的旧案，是同一个阿巴库莫夫的又一起冤案。因此，格奥尔基·马克西米利安诺维奇因这起案件而短暂的声誉受损也是毫无根据的。他作为航空工业负责人，曾被暂时排除在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之外。

现在，马林科夫个人对恢复被公正对待的事情很感兴趣，他采取了一切措施来加速对又一批受害者的平反。5 月 29 日，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因缺乏犯罪构成而终止了沙胡林等人的案件。6 月 12 日，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则撤销了 1946 年 5 月 16 日政治局的相应决议[824]。

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如此生动地向对手们证明，他们完全依赖于他，因为现在除了他贝利亚，没有人能成为他们过去行为的审判者。之后，他并没有加速事情的发展。在 5 月至 6 月期间，他认为另一件事更为重要。这件事应该能让他完全无懈可击。让他处于一个独特的位置，确定他被所有人认可的、无可争议的唯一领导地位，因此，也确定他有权决定国家的内外政策。他把所有注意力都集中在为国家建立火箭核盾牌上。集中在两个绝密靶场的情况上——在斯大林格勒附近的卡普斯京亚尔靶场和塞米巴拉金斯克附近的靶场，只有他了解那里最细微的细节、最不重要的情况。

在第一个靶场，由弗拉基米尔·尼古拉耶维奇·切洛梅设计局研制的防空火箭 PVO10-X 在被接受服役前的最终测试已经完成。谢尔盖·帕夫洛维奇·科罗廖夫的另一个设计局研制的战略弹道导弹 R-5 和 R-11 的测试进展时好时坏。在第二个靶场，正在为第一颗氢弹的首次爆炸做准备，氢弹是当时最可怕、最具破坏力的武器。这两个项目的实施不仅像当时所有军人和大多数政治家认为的那样，使苏联无懈可击，而且还让这个国家重新获得了曾经的超级大国地位。能够再次与美国平等对话，甚至可能以强者的姿态对话。

这正是莫洛托夫（强硬路线的公开支持者，贝利亚的坚定盟友）解决所有国际问题的关键。把布尔加宁（正成为世界上最令人生畏的国防部长）变成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的顺从卫星。把核心领导层五名成员中的两人（他们不觊觎领导地位）拉到自己这边。只是五人中的两人。所以，为了确保行动成功，至少还需要另一票的支持。当然，不是卡冈诺维奇，也不是米高扬，他们除了过去的经历之外一无所有。需要的是赫鲁晓夫的一票，因为他能确保得到 12.5 万名党的职能人员大军和强大的、无所不包的宣传机器的支持。

……赫鲁晓夫进入了四人领导核心，起初他行事低调。他肯定能感觉到自己地位的不稳——他只是中央委员会六名书记之一，尽管他已负责党的机构当前的日常工作。也许在那些日子里，赫鲁晓夫仍然害怕，似乎不可避免地要为 3 月 7 日夜间发生在莫斯科特鲁布纳亚广场的悲剧承担责任。毕竟，除了他，也只有他——斯大林葬礼组织委员会主席，有责任尽一切可能避免、防止那场可怕的拥挤踩踏造成的无谓牺牲……

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只有在中央全会之后，当他完全合法地成为书记处会议主席时，才开始感觉更自信。但即使在那时，他仍然避免支持两位争夺完全、不可分割权力的竞争者中的任何一方，哪怕是间接地支持。他也避免表达自己对国家外交政策、苏联经济未来发展道路的看法。很可能，他甚至还觉得自己不够强大，无法做到这些。为了赢得表达自己意见

的权利，对当时仅在莫斯科和乌克兰闻名的他来说，首先应该加强自己在党内的影响力，好在现在有一个绝佳的机会。

书记人数的急剧减少——从 1952 年 10 月的 10 人在仅仅五个月后减少到 4 人，打破了他们监督中央委员会 17 个部门工作的惯例。这极大地增强了书记们的作用，他们现在指挥的执行人员不再是一两个部门，而是四五个部门。而这些部门的重要性相应降低了，尽管它们仍然是中央委员会的“缰绳”，同时也是反馈渠道，是党内组织、个别党员提出抱怨、建议和思考的最后机构。对于热衷于“机构游戏”的赫鲁晓夫来说，这种情况不可能不被他察觉。这为他提供了选择的机会。

书记处内部充满了不稳定和不确定性，这反映了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成员之间日益激烈的斗争。在这种情况下，依赖任何一位书记意味着一件事：无条件地站在马林科夫或贝利亚的一边。可能会赢得很多，也可能会输掉一切。依赖各部门则意味着另一种可能——几乎百分之百的可能性，无论谁占上风，不久后都能将庞大的党组织置于自己的意志之下，成为党的领导核心。

事实无可争辩地表明，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选择了第二种方案。

他没有深入研究苏联共产党国际关系中那些复杂、棘手的事务，没有去了解国外共产党和工人党的情况，没有评估它们的真实倾向以及对苏联的态度。他把这些都留给了苏斯洛夫去处理。他也没有关注波斯佩洛夫在 3 月中旬就已经开始的去斯大林化运动，起初这场运动非常不明显，因此看起来很微弱、不重要。和以前一样，他也没有注意到波斯佩洛夫对文学和艺术领域“解冻”的支持，这种“解冻”每天都在蔓延，占据着越来越多的阵地。

他把所有的注意力、以及他在四分之一世纪里积累的经验，都投入到了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问题上。对中央委员会机构的一小部分进行重组，他为这一举措辩护的理由绝不是自己的立场，而是一种普遍的、占主导地位的简化和削减管理机构的趋势。

3 月 17 日，在斯大林去世后的第一次书记处会议上，他帮助苏斯洛夫将与国外共产党联系的委员会改组为一个标准部门。当然，他把这个部门“交给”了同一个米哈伊尔·安德烈耶维奇“监督”[825]。3 月 25 日，他将四个部门——艺术文学和艺术部门、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门、哲学和法律科学部门、经济和历史科学部门合并为一个科学和文化部门，并投出了决定性的一票，批准由他在乌克兰党务工作中熟悉的经济学家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鲁缅采夫担任该部门负责人。在这过程中，他还展现了自己作为宫廷权谋者的一面。弗拉基米尔·斯捷潘诺维奇·克鲁日科夫，这位曾担任艺术文学和艺术部门负责人的人，他没有像，比如说，尤里·亚历山德罗维奇·日丹诺夫那样将其撤职，也没有降低他的职位。相反，他把克鲁日科夫调到了在党的等级体系中更重要的部门——宣传鼓动部门[826]。这个职位自战争以来一直由格奥尔基·费奥多罗维奇·亚历山德罗夫、德米特里·季莫费耶维奇·谢皮洛夫、苏斯洛夫担任，在第十九次党代会后由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米哈伊洛夫担任。

赫鲁晓夫在随后的日子里也没有放弃中立立场。4 月 8 日，就在伊格纳季耶夫被解除中央委员会书记职务（他在书记处一次都没出现过）后，负责为包括内务部在内的强力部门选拔干部的行政部门，与……计划财务机构部门合并了。但在决定该部门负责人时，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尽一切可能让人们不会怀疑他倒向了贝利亚一边。他批准了阿列克谢·列昂尼多维奇·杰多夫担任新职位[827]，杰多夫是由尼古拉·尼基季奇·沙塔林推荐的人，因此与马林科夫关系密切。

直到 4 月 16 日，在贝利亚进行平反行动之后，赫鲁晓夫才采取了一个行动，这个行动暴露了他的倾向。他支持了关于撤销中央委员会一个关键结构部门的提议，这个部门实际上

凌驾于其他所有部门之上——干部选拔和安置部门，沙塔林绝非形式上“监督”着这个部门的工作。同一天，他还做出了其他在“机构游戏”中同样重要的决定。他批准了叶夫根尼·伊万诺维奇·格罗莫夫担任这个部门（自 1952 年 10 月以来，格罗莫夫领导着对苏联共产党运作来说第二重要的部门——党的、工会的和共青团的机构部门，后来该部门更名为组织部门）的负责人，同时将这个部门置于自己的直接控制之下。他还帮助苏斯洛夫第三次亲自领导与国外共产党联系的部门，为此解除了原部门负责人弗拉基米尔·格里戈里耶维奇·格里戈里扬的职务，并把他调到外交部工作[828]。

赫鲁晓夫采取的这些果断措施，明确表明他倒向了贝利亚阵营，这首先可以用他担心听到阿巴库莫夫新的“供词”来解释，而这次供词可能会涉及到他自己。担心自己在 1944 年至 1949 年期间试图消灭当时广泛存在的分离主义武装地下组织（如奥努夫里耶夫分子、乌克兰起义军）时所扮演的不太光彩的角色被揭露。担心自己公开的冒险主义、与基本专业素养相去甚远、因此注定失败的“对地方国家安全部部门的领导指示”以及对他们行动的不恰当干涉被曝光。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也不希望人们想起，他曾是苏联最高苏维埃那项不幸命令的发起者之一，根据该命令，所有拒绝加入集体农庄的乌克兰人，随后还有波罗的海地区的农民，都被流放到东部或被判处在西伯利亚服苦役。

但那年春天，还有其他事情让赫鲁晓夫与贝利亚走到了一起。有些事情不可能毫无痕迹地过去，迟早会被人们想起。他们两人都曾长期担任共和国党组织的第一书记。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从 1931 年起担任格鲁吉亚第一书记，从 1932 年起担任外高加索第一书记；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从 1938 年起担任乌克兰第一书记。在人民眼中，他们是至高无上的，但实际上，他们的一切都取决于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意志。没有政治局的同意，他们甚至不能批准“选举”州党委，更不用说州党委书记了。他们不能、也没有权利干涉工业企业的工作，主要只能忙于追捕集体农庄主席。他们有责任关注自己负责区域内发生的一切，并向莫斯科汇报所有情况。等待莫斯科的指示。

这就是他们能力不足的根源，以及他们长期以来、一直被压抑到现在的弥补这种不足的渴望。他们要尽一切可能改变这种状况。将宪法中写的内容变为现实。这正是 3 月 9 日贝利亚在斯大林葬礼上的讲话中所暗示的。

贝利亚选择白俄罗斯西部、乌克兰和波罗的海地区的局势作为又一次行动的正式借口。在那里，战争期间形成了民族主义武装组织，起初他们与占领者合作，希望从他们那里获得“独立”和权力。解放后，那些未能跟随撤退的德国军队逃走的分离主义分子，转入了地下，并开始进行恐怖活动。他们杀害共产党员、苏联工作人员、集体农庄运动的积极分子。并且他们相信西方广播告诉他们的，期待美国和西方国家尽快对苏联发动战争。

阿巴库莫夫长期以来一直未能成功消灭隐藏在森林和偏远村庄的武装组织。地方当局的行动，尤其是第一书记们（如爱沙尼亚的尼古拉·格里戈里耶维奇·卡罗塔姆，1950 年起是伊戈尔·格里戈里耶维奇·凯宾；拉脱维亚的雅尼斯·埃曼努伊洛维奇·卡尔恩别尔津；立陶宛的安塔纳斯·尤奥扎斯·斯涅奇库斯；乌克兰的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的行动，只是使情况更加复杂和恶化。根据他们的倡议或在他们的批准下进行的大规模驱逐反苏情绪的农民和职员的行动，产生了相反的效果。这些行动有助于保持分离主义的精神，加剧了该地区全体人民的反俄情绪。

直到 1951 年改变了与恐怖分子作斗争的策略——放弃纯粹的军事行动和示范性处决，以及停止没有农业机械化支持的强制集体化，才首先带来了明显的转变，不久后，莫斯科在这场未宣战的内战中取得了全面胜利。

1952 年 5 月底，西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OUN）在西乌克兰的协调员瓦西里·库克（绰号“莱米什”）向他的上级瓦西里·奥赫里莫维奇汇报说：

“组织的总体情况极其糟糕。地下地区已经不存在了。西乌克兰地区（‘П З У З’——西北乌克兰地区。——Ю. Ж.）和利沃夫地区处于崩溃的边缘。那里还有一些单独的小组，但没有联系。领导干部被消灭了。剩下的人几乎不进行任何严格意义上的组织工作。他们的所有工作都只是为了自给自足，并为更好的时代做准备……据我所知，喀尔巴阡地区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总的来说，我们的地下组织和机构正走向瓦解。如今，一旦发生战争，我们根本无法采取任何行动，再过两三年就更不用说了……”[829]

1952 年下半年，波罗的海地区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而在白俄罗斯西部地区，战后不久就消灭了波兰军队的地下组织。似乎现在应该为使这个庞大的地区实现苏维埃化制定一项全新的政策，要以终于到来的和平时期的条件为出发点。然而，贝利亚却提出了另一个解决方案。他利用了有关武装分离主义的所有信息都处于保密状态，甚至连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高级官员对此都一无所知这一点，决定将“平定”西部土地的功劳归于自己，归于他领导的新内务部。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夸大了那里局势的危险性。但这一次他不再单打独斗，而是与赫鲁晓夫以及现在毫不犹豫执行赫鲁晓夫指令的叶夫根尼·伊万诺维奇·格罗莫夫一起行动。

从 4 月下旬开始，党的、工会的和共青团的机构部门与内务部一起，开始收集关于立陶宛和乌克兰西部地区局势的明显负面信息。但这些信息不是关于 1953 年春天的，而是关于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的——从 1944 年到 1952 年。包括被恐怖分子杀害、逮捕、流放九年的人数，“富农”（即个体农户）及其“帮凶”的人数。此外，还收集并汇总了在审查过程中地方居民的言论，这些言论对立陶宛和乌克兰西部地区当局的行动给予了负面评价。最后，还有关于地区、州、共和国机构和组织的领导工作人员的民族信息。

贝利亚将这些材料（以两份报告的形式）提交给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审议：5 月 8 日关于立陶宛的报告，5 月 16 日关于乌克兰西部地区的报告。由于赫鲁晓夫和莫洛托夫的支持，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的提议被认为是及时且非常重要的，中央委员会主席团责成书记处在三天内准备好相应决议的草案。5 月 20 日，他们再次讨论了这两份文件的新版本，做了一些无关紧要的修改，并于 5 月 26 日批准了它们[830]。

这两项决议的表述都很标准：“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认为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西部地区）的政治局势不佳……民族主义地下组织仍然存在并积极活动，它拥有广泛的网络，并在部分民众中得到支持。敌对地下组织的领导中心及其头目至今仍未被揭露，他们继续肆无忌惮地进行破坏活动，恐吓和威胁民众，抢劫集体农庄、商店、仓库，进行广泛的反苏宣传，在民众中传播非法报纸、小册子和传单……”

从如此严峻的局势评估中得出了相应的结论：“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西部地区）局势不佳的主要原因是，党和苏维埃机关在政治和组织工作以及领导集体农庄建设方面犯了错误和偏差”，这些错误和偏差表现为“过度使用惩罚措施和镇压手段”。共和国权力机关还受到指责，因为它们“在培养民族干部方面采取了错误的做法……中央、州和地区组织的领导职位大多由非本地民族的工作人员担任，这些人不懂立陶宛语（乌克兰语）……诉讼程序通常使用俄语进行”。

在决议的决定性部分，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要求“在近期内消灭反苏民族主义地下组织”，“停止对民众的行政压迫”，“尽快纠正选拔和提拔干部方面的错误和偏差，大胆提拔立陶宛（乌克兰）干部担任领导工作”……两项决议的区别仅在于一点。对于乌克兰西部

地区，来自东部地区的乌克兰人被等同于俄罗斯人，并被禁止被派往这个所谓的“异乡”工作[831]。

随后，在 6 月上半月，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又批准了另外两项完全相同、像是按照模板撰写的决议：《关于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问题》和《关于拉脱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问题》。但这次对这两项决议进行最终编辑并提交审议的已经不是贝利亚，而是赫鲁晓夫本人。与此同时，他还在准备另外两项类似的文件——关于爱沙尼亚和摩尔达维亚的文件[832]。

中央委员会通过的四项决议和准备中的两项决议预示着危险。它们向那些能够阅读这些“绝密”文件的特定人群表明，自 3 月以来，权力高层的力量对比发生了非常严重的变化。表明长期以来隐藏的旧矛盾已经公开化。导致形成了两个现在公开相互敌对、准备采取最果断行动的团体。一个团体是马林科夫、别尔乌辛、萨布罗夫；另一个团体是贝利亚、莫洛托夫、赫鲁晓夫、布尔加宁。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其他成员——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米高扬——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但毫无疑问，他们准备投靠……胜利者。

过去十周发生的事情，让人不再怀疑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以及如何发生。

按照传统（因为这是由政治体制的特点决定的），克里姆林宫的剧本是，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应在近期召开会议。在会议上，贝利亚或者可能是赫鲁晓夫、莫洛托夫、布尔加宁会发言。他们会对马林科夫提出指控。将波罗的海地区、白俄罗斯西部地区和乌克兰的局势责任全部推到他一个人身上。同时，还会指责他应对战后所有的镇压行为负责，指责他与阿巴库莫夫、柳明同流合污。指责他试图修正马克思列宁主义、斯大林关于重工业在经济中优先地位的学说。指责他试图削弱国家的国防力量。指责他为美国和英国的帝国主义者效力……

其他人也会发言，加重马林科夫的罪责，列举他严重政治错误的新“事实”。然后，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可能会以七票，甚至可能是九票的多数票，解除格奥尔基·马克西米利安诺维奇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并将他从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中除名。再过几天，将会召开中央全会，在全会上除其他事项外，还会讨论关于马林科夫的组织问题。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代表们会同意对政府首脑的合理解职。会支持任命贝利亚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提议。

很可能事情就会这样发生。在 6 月底到 7 月初。不会再晚了，因为由于 1953 年的预算仍未通过，已经无法再推迟召开最高苏维埃会议了。如果不发生意外情况（尽管这是完全可以预见的），事情就会这样发展。

6 月 17 日，柏林建筑工人的罢工瞬间演变成了一场自发的抗议活动，席卷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几个城市。局势变得极其危险，为了恢复德国的秩序与平静，贝利亚被派往那里。他勇敢、果断且明智。他成功地证明了这一点——仅仅用了三天时间，他就在整个苏联占领区恢复了秩序。而且没有流血。

然而，在莫斯科，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并没有被当作胜利者迎接。他的使命被沉默对待。他的功绩被隐瞒。更有甚者，两天后，作为官方等级中的第二号人物、实际上是国家最有权势的人，他遭到了逮捕。权力的第一次、也是最激烈的争夺就这样结束了。权力，就像我们历史上一贯的那样，是独裁的、不受任何人控制的权力。

根据自 1953 年 7 月以来从未有过丝毫改变的官方版本，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自己给了别人逮捕他的理由。“他拼凑了一个反苏叛国集团，企图夺取政权，”塔斯社的消息这样写道[833]。但直到现在，对于这样的指控，没有提供任何证据。没有任何哪怕是间接的线

索。留下了太多无法解释的事情。除了贝利亚和与他一起被处决的人之外，还有谁是阴谋者？他们具体采取了哪些行动来夺取政权？他们依靠的是哪些人、哪些作战部队？

只有问题，没有答案。

但还有另一种目前仍然是假设的版本。

马林科夫有意识地利用了贝利亚前往柏林的机会。他派贝利亚去那里，以便赢得时间。他成功地争取到了贝利亚在内务部的两位副手——谢洛夫和克鲁格洛夫的支持。还有布尔加宁的副手——朱可夫的支持。以及将军莫斯卡连科的支持。

在确保得到军队和部分内务部力量的支持后，他召见了赫鲁晓夫、布尔加宁、米高扬。他公开表示，他有证据证明他们参与了阴谋，参与了反党活动。他提出了最后通牒：要么他们在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上支持逮捕贝利亚的提议，要么他们自己将在他的办公室里当场被捕。

对于赫鲁晓夫、布尔加宁、米高扬来说，他们别无选择。他们无条件地接受了他提出的条件。保证会给予支持。并且信守了诺言。

6 月 26 日，贝利亚在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办公室里，在斯大林的克里姆林宫官邸中被捕。

就在这时，塔曼师的坦克开进了莫斯科。沿着基辅公路、多罗戈米洛夫斯卡亚街，穿过博罗季诺桥。在斯摩棱斯克广场向左转，驶向花园环路。然后——向市中心驶去。驶向城市的战略要地。

第三十章

然而，主要事件还是稍晚才发生。贝利亚被清除，同时伴随着史无前例地将军队调入莫斯科，这迫使核心领导层不得不对所发生的事情作出解释。为此，于 7 月 2 日至 7 日召开了中央全会。在全会上，自然一开始谈论的完全是前国家安全部门首脑的种种罪行，有真实的，也有莫须有的。毕竟，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不仅要成为邪恶的又一个化身，而且要为政权在过去和现在的所有失败、错误承担责任，只要这些能算到他头上的。

发言者们丝毫不顾及事实真相，对贝利亚进行了他们能想到的所有指责。比如，米高扬指出：“在斯大林同志去世后的最初几天，他（贝利亚。——尤里·日丹诺夫注）大肆抨击个人崇拜。我们知道，在这个问题上，即使在斯大林同志生前也存在一些极端情况。斯大林同志曾严厉批评过我们。斯大林同志说，是那些‘阴谋家’在围绕我制造个人崇拜。”

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重复了前中央政治局委员 A.A.安德烈耶夫的话。“他（贝利亚。——尤里·日丹诺夫注）……开始诋毁斯大林同志的名声，给列宁之后最伟大的人抹黑……我毫不怀疑，在他（贝利亚。——尤里·日丹诺夫注）的压力下，斯大林同志去世后不久，斯大林同志的名字就会突然从报刊上消失……不知从哪里冒出来了关于个人崇拜的问题。”

米高扬和安德烈耶夫这样做，明知除了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之外，恰恰是其他人与去斯大林化运动有关，他们或许是想在未来避免马林科夫试图做的事情。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成员的米高扬肯定对此心知肚明。他明知、记得这些事，却故意诋毁这个理念，把它归到又一个“地狱使者”、“党和国家的敌人”头上。然而，马林科夫并没有被所发生的事情扰乱。在总结发言中，他从贝利亚的罪行说起，出乎所有在场者的意料，话题突然转向了完全不同的方面。他说出了早在 4 月就想说的话：

“首先，我们必须公开承认，并且我们提议将这一点写入中央全会的决议中，在过去几年里，我们的宣传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对个人在历史中作用的理解。这不是什么秘密，党的宣传没有正确阐释共产党作为我国建设共产主义的领导力量的作用，反而偏离到了个人崇拜上……同志们，你们应该知道，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在日常领导实践中已经到了病态的程度，集体工作的方法被摒弃，我们最高领导层完全没有批评和自我批评。我们无权向你们隐瞒，这种丑恶的个人崇拜导致了独断专行的决策具有不可上诉性，并且在最近几年里，对党的领导和国家的事业造成了严重损害。”

马林科夫并不局限于理论探讨。他对 1952 年 10 月斯大林对莫洛托夫和米高扬的指责进行了不客气的批评。他对 1953 年 2 月斯大林在讨论农业问题时表达的观点给予了负面评价。他同样严厉地评估了斯大林关于修建土库曼大运河的提议，并且很有根据地批评了斯大林著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的一系列观点。最后，他发泄了 4 月以来积压的情绪，说出了一些很有分量的话：

“在这次全会上，有人不小心且明显错误地提到了斯大林同志的接班人问题。我认为自己有责任回应这一发言，并说以下几点。我们当中没有人敢、没有人能、没有人应该、也没有人想觊觎接班人的角色。”

紧接着，就在同一天，马林科夫发言之后，全会一致通过了一项决议，其中还包括这样的内容：“……应该承认，在过去几年里，我们党的宣传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对个人在历史中作用的理解，这是不正常的。这表现在……党的宣传常常偏离到个人崇拜上，这导致了党的作用及其领导核心的作用被贬低，党员群众和广大苏联人民的创造性活动也受到了削弱。”

对于这个听众群体来说，这种惯用的修辞——对党的颂扬，口头上承认党在国家生活中不可动摇的作用，在这里被用于实现主要目的。马林科夫准备了这项决议，他无论如何都想争取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谴责。然而，他终究没能让广大领导层完全追随他。他对党的官僚体制的冲击太大了，他在 5 月取消了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特权——“信封”（指特殊待遇）。而且，在组织个人崇拜的问题上，他指责的不是某一个人，而是整个党的宣传，换句话说，是党及其领导整体。一开始，中央委员会的成员们像往常一样听话，对马林科夫提出的决议投了赞成票，但他们很快就意识到自己做了什么。他们坚持让对斯大林的负面评价不超出他们这个非常小的圈子。在三天后发布的关于全会的信息通报中，对个人崇拜只字未提。

这种事态的转变迫使马林科夫，借助 P.N.波斯佩洛夫的支持以及宣传鼓动部负责人 V.S.克鲁日科夫的帮助，采取了一种独特的迂回策略。他要寻找另一种形式，以便让所有人都清楚“个人崇拜”这个概念本身，以及它与斯大林的内在联系。他利用了一个绝佳的借口——即将到来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 50 周年纪念。他要把这个具有纪念意义的日子变成一个契机，为准备相应的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决议草案提供信息依据。这个草案内容详尽，长达二十页打字纸。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相比，它对党的历史给出了全新的诠释。在这个草案中，只三次提到斯大林的名字。两次是作为赞颂列宁伟大的话语的作者，以及作为领导苏联人民在伟大卫国战争期间进行斗争并使其取得胜利的人。还有一次是为了指出在 20 世纪 20 至 30 年代组织粉碎反对派的人。此外，在最后一部分中，明确提出了“根除”唯心主义个人崇拜的要求。

但是，马林科夫和波斯佩洛夫的提议再次遭到了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成员的反对。而且，这次反对又以一种非常独特的方式被克服了。文件最终还是被公布了。7 月 26 日发表在《真理报》上，几天后又以政治宣传小册子的形式发行。然而，它不再是作为中央委员会的决议，而仅仅是“宣传鼓动部”的一份文件，这大大降低了它在党的干部眼中的重要性。但它的文本没有丝毫改动，而且标题更加醒目——《苏联共产党五十周年》。

在接下来的一个半月里，马林科夫和波斯佩洛夫利用这个成果来巩固胜利。7 月 24 日，又做出了一项决议，取消在普希金造型艺术博物馆展厅举办的斯大林礼品展览，从 1953 年 9 月 1 日起恢复这个艺术博物馆的正常工作。7 月 30 日，《真理报》用两个版面刊登了波斯佩洛夫的文章《苏联共产党五十周年》，实际上重复了同名文件的内容。8 月 4 日，同样用两个版面刊登了克鲁日科夫的文章《反对宣传中的教条主义和学究气》。这篇文章包含了五个负面例子，其中三个取自那些……引用斯大林的话、依据他的著作的党的工作人员的实践。

贝利亚的倒台，以及苏联氢弹的研制成功和与西方国家达成的恢复外长会议以讨论德国问题的协议，让马林科夫得以放手一搏。他利用 8 月 5 日召开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这次会议要批准经过修正的年度预算——这是他们早在 4 月就打算做的事情，以便公开宣布新的经济路线。

财政部长 A.G.兹韦列夫坚守自己的老原则。作为一名忠诚的党员和官员，他完成了任务。他按照要求编制了预算，但在会议上的发言中，他对预算的描述尽量简略。他没有强调、突出对重工业和国防的资本投入大幅减少。只是简要列举了主要指标。在支出总额 5305 亿卢布中，他提议拿出 1925 亿卢布用于国民经济发展，其中包括 826 亿卢布用于重工业，399 亿卢布用于农业。用于国防，更确切地说，只是维持包括内卫部队在内的所有武装力量，以及两个强力部门的实际机构的费用为 1102 亿卢布，也就是说几乎比上一年减少了一半。而用于教育、医疗、科学、文化和社会保障的费用为 1298 亿卢布。

马林科夫不得不为预算的这些不寻常特点做出解释。他在报告一开始就非常明确、简单地阐述了“我们的主要任务是进一步改善工人、集体农庄庄员、知识分子以及所有苏联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然后，他指出了经济中存在的严重且危险的不平衡，以及明显的短缺问题。“在过去的 28 年里，”格奥尔基·马克西米利安诺维奇指出，“我国生产资料的生产总体上增长了大约 55 倍，而同期消费品的生产只增长了大约 12 倍”，这“无法让我们满意”。因此，他提议大幅“增加对轻工业、食品工业，特别是渔业的投资，以及对农业的投资……以便在两三年内提高居民的工业和食品供应水平（着重号为我所加。——尤里·日丹诺夫注）”。他系统地阐述了这个问题，同时表示有必要同时提高产品质量，大幅扩大商业网络，包括集体农庄市场。马林科夫认为，推动轻工业发展的关键不仅仅是增加对该行业的资本投入，首先是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采用新技术、合理组织生产来降低成本，这除了其他方面，还应该能消除亏损企业。

马林科夫同样具体地谈到了新路线的第二个组成部分——农业问题。他承认：农业水平“与技术装备的提高不相适应”。他认为战争期间引入的根据“单位面积产量”而非实际收获量来评估工作成果的制度是有缺陷的。“我们不能忘记，”格奥尔基·马克西米利安诺维奇强调，“很明显，我们的国家，我们的集体农庄，收获进仓库的粮食才是真正的财富，而不是地里的庄稼。”接着，他提议完全通过集约化的方式来发展农业。通过提高所有农作物的产量、牲畜的生产率，实现机械化和电气化，广泛使用化肥，依靠农业技术和畜牧技术的成果。但与此同时，还要大幅提高国家的收购价格。

谈到农业问题时，马林科夫不仅仅局限于与集体农庄未来相关的问题。他比兹韦列夫更详细地阐述了提交给代表们讨论的农业税法案的实质。他不怕在集体化完成三十年后，再次提及农村居民的个人副业问题。他呼吁支持实行固定的农业税，不再像以前那样取决于集体农庄庄员的收入，取消过去所有年份的欠款，并且规定个体农户的税额比合作社成员应缴纳的税额高出 100%。

然后，政府首脑解释了是什么使得能够推行这样不寻常的经济路线。他宣布苏联在最新武器领域再次取得了与美国的对等地位——苏联成功研制出了氢弹。他这样描述了世界局势：“近年来，国际气氛首次出现了某种缓和。数以百万计的人越来越相信，有可能找到解决有争议和未解决问题的途径……这也适用于美国和苏联之间存在的那些有争议的问题。我们过去和现在都主张两种制度和平共处。我们认为，美国和苏联之间没有发生冲突的客观基础。”

报告的结尾部分，也是最短且最空洞的部分，马林科夫用来谈论苏联共产党。他使用了所有那些早已为人熟知、陈词滥调、被所有人几乎只是为了纯粹的仪式目的而反复提及的意识形态套话。他这样做很可能只是为了一个目的——让任何人都不能怀疑他有“反党”的意图。但即便如此，他巧妙地将颂词转化为呼吁全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只是这一次，他将其作为共产党的主要目标呈现给听众。

8 月 9 日，会议结束，一致批准了经过修正的预算，这是整个五年计划历史上第一个这样的预算。随后，自 6 月 29 日起担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的 M.Z.萨布罗夫立即开始将其具体化，与各个部委挂钩。他要明确：国防企业今后应该生产哪些大众消费品，数量是多少，以及在什么期限内生产。他很快与 D.F.乌斯季诺夫、V.A.马雷舍夫、I.I.诺森科达成一致，即国防工业部将立即开始生产手表、冰箱、吸尘器、摩托车、自行车；运输和重型机械制造部门将生产冰箱、吸尘器、洗衣机；发电站和电力工业部门将生产电视机、收音机、电唱机、吸尘器、电话。

与此同时，在秋天，基辅、巴库和第比利斯造价高昂的地铁建设项目被暂停。表面上的理由是资金不足，“不符合国民经济的利益”，而实际上只是因为在国际形势变化后，这些

项目现在成了不必要的，就像防空洞一样。与此同时，由于腾出了资金，开始在莫斯科重建古姆商场、“布拉格”餐厅，建造“儿童世界”百货大楼。同样明显的是，1953 年 9 月 1 日苏联部长会议的一项决议规定了严格固定的工作日，这对全国所有居民，而不仅仅是首都居民都产生了影响。中央机构的工作时间是从上午 9 点到下午 6 点，地方机构是从上午 10 点到下午 7 点。同时，要求部长们、各部门负责人遵守工作时间，严禁在非工作时间召集员工工作和延长工作日。但也许，真正标志着深刻变革的是 1953 年 12 月 23 日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的开放，所有人都可以自由进入，并且在不久前还封闭的宫殿里为儿童和学生举办了圣诞树活动。

与此同时，新经济路线在立法层面也在继续巩固。9 月初，中央委员会又一次全会制定了提高农业水平的具体措施，发展了马林科夫提出的理念，这些措施很快以苏联部长会议和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决议的形式出台：9 月 26 日的决议涉及发展畜牧业、增加土豆和蔬菜生产、改善机器拖拉机站的工作。同一天，还出台了一系列仅由苏联部长会议发布的决议，确定了增加大众消费品生产的具体行动。为了实现同样的目标，还召开了三次全联盟会议——商业、轻工业和食品工业的工作人员会议。然而，很快就发现，这一切都只是新路线的短暂尝试。它的终结。

在同一次 9 月全会上，明显表现出了党的官僚体制不愿意接受马林科夫提出的政策。这首先体现在主要报告人从马林科夫换成了赫鲁晓夫，同时也体现在放弃了党的集体领导，从而让政府保留主导作用。很可能，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是什么让格奥尔基·马克西米利安诺维奇不战而降，亲自为赫鲁晓夫，而不是其他人，戴上胜利的桂冠。很可能，这是因为 8 月中旬，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利用他所掌控的党的资金，大幅提高了中央委员会机关负责人员的现金津贴，还补发了他们三个月的欠款。很有可能，正是这些人在恢复了以往的物质待遇后，积极筹备了 9 月全会。

在全会上，所有与会者，包括书记们和主席团成员，不知为何突然、同时、莫名其妙地忘记了仅仅六个月前他们还一致支持的集体领导原则。他们实际上在 7 月还再次承诺要遵循这个原则。就在会议的最后几分钟，没有经过任何讨论，顺便地，一致选举 N.S.赫鲁晓夫为党的第一书记。会议记录是这样记载的：

9 月 7 日，下午 6 点。会议主席——马林科夫。

“马林科夫：那么，同志们，我们结束了。议程已经讨论完毕，但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有一个提议。

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提议，同志们，批准赫鲁晓夫同志为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对于这件事还需要解释吗？

众人：不需要。

马林科夫：不需要。现在进行表决。谁赞成批准赫鲁晓夫同志为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请举手。请放下手。有没有反对的？

众人：没有。

马林科夫：那么，全会的工作结束了。我宣布会议闭幕。”

至此，新经济路线的推行以及去斯大林化的第一阶段都结束了。赫鲁晓夫当选为第一书记，使得广大领导层中最保守的圈子重新掌权。他们重新获得了春天时被剥夺的所有特权。书记处重新获得了不受限制的权力，现在它可以对所有问题发表明显不专业但却起决定性作用的意见。例如，M.A.苏斯洛夫和 N.S.赫鲁晓夫对不久前制造的土豆种植机的结构缺陷发

表的意见。这也导致了对整个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在非正式的情况下从波斯佩洛夫转移到了苏斯洛夫手中，即使领导层的组成没有改变，这也立即对核心领导层的权力平衡产生了影响。

尽管在 1953 年底，权力结构的重心不可避免地从国家机构向党组织转移，但 12 月 7 日，苏联部长会议还是批准了一项在当时形势下非常奇怪的决议：“为了更好地组织对政府决议执行情况的检查，并为苏联部长会议准备关于农业和农产品收购最重要问题的决议草案……1.在苏联部长会议下设立农业和农产品收购部门委员会……2.批准赫鲁晓夫同志为苏联部长会议农业和农产品收购部门委员会主席。将赫鲁晓夫同志纳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团成员。”

从 12 月 7 日这一天起，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不仅担任了党内的最高职位，还在政府中担任了几个次高级职位之一，成为了政府首脑的副手。对于这样一个非常不寻常、绝非偶然且从未公开宣布过的、作为国家机密的人事任命，目前只有一个解释。它的发起者肯定只能是马林科夫，这对他来说确实是有利的。毕竟，这使得赫鲁晓夫在法律上要对农业计划的继续制定和实施负责，而这绝不能排除，从潜在可能性来看，这个计划很快就会彻底失败。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即需要找出应该为战争结束十年后苏联人民仍然面临粮食短缺负责的人。因此，正是马林科夫不仅应该支持，而且应该亲自发起这样的任命提议。他不仅要满足赫鲁晓夫表现出的、永不满足的权力欲，还要通过这个新任命“陷害”他。但如果马林科夫是这样想并这样做的，那么他在结果和后果上犯了错误。

核心领导层中的保守派圈子，被迫在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的方案之间不断做出选择，他们再次支持了赫鲁晓夫。他们利用成立农业委员会这一最初看似自发且偶然的事件，作为正式借口，来限制格奥尔基·马克西米利安诺维奇的权力，削弱他作为政府首脑的权力。在旧年的最后一周，他们坚持恢复斯大林时期就存在的、因斯大林的过重负担或疾病而被认为合理的苏联部长会议结构——实际上是将其经济部门在几个行业委员会之间进行划分。由 I.F.捷沃相担任主席的负责冶金（从 1954 年 2 月起，负责冶金、煤炭工业和地质学）的委员会；由 A.N.柯西金负责的负责食品和大众消费品工业的委员会；由 L.M.卡冈诺维奇负责的负责交通和通讯的委员会；由 V.A.马雷舍夫负责的负责机械制造的委员会；由 M.G.别尔乌辛负责的负责能源、化学和林业工业的委员会。而在 1954 年 2 月，又成立了由 A.I.米高扬负责的负责贸易的委员会。

保守派圈子的下一步行动实际上是废除了 4 月关于扩大苏联部长权力的决议，该决议像在战争期间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时期一样，将权力过度集中在了中央，即莫斯科手中。1954 年 1 月 25 日，中央委员会主席团通过了《关于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中严重不足的决议》。借助该决议，他们为大幅削减中央部委和部门的机构（而非全部机构）奠定了基础，这自动扩大了地方机构的权力。首先是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共和国部长会议。然后，他们对马林科夫宣布的经济路线给予了致命一击。他们巧妙地用一个全面的方案取代了马林科夫的路线，表面上以农业的首要问题为重点，实际上将这些问题简化为仅仅是提高粮食作物的产量，实际上主要是提高小麦的产量。不仅如此，他们放弃了集约化的发展方式，宣称最可接受且唯一可能的方式是粗放式发展。他们这样做，很可能有两个原因。首先，因为第一种方式需要深厚的专业知识、丰富的经验——而这些正是他们，党的干部所不具备的。此外，也是为了腾出原本用于轻工业和食品工业的资金，再次将其主要投向重工业和国防工业。

1954 年 1 月 25 日，中央委员会主席团通过了关于开垦荒地和熟荒地作为大幅提高粮食产量的主要手段的决议。但对于所有这些变革，发起者是苏联农业部。就在同一天，苏联农业部似乎是自主地提出了一个基于科学依据的建议，即必须充分利用荒地和熟荒地，而这原本只是作为提高农业部门产量的众多方法之一被提出的。随后，这个想法在 1 月底至 2 月初

由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苏联部长会议，也就是由赫鲁晓夫召开的另外三次会议上被采纳并进一步发展——参会人员包括机器拖拉机站工作人员、国营农场工作人员以及农业先进工作者。在每次会议上，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都做了“重要”报告。他试验并推广了这个不同寻常的想法，坚持不懈地将其灌输到所有与农业部门相关人员的脑海中。很快，这个想法就广为人知。2 月 11 日，报纸刊登了传统的、2 月 6 日已被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批准的《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致选民的信》，内容涉及即将在一个月后举行的苏联最高苏维埃选举。在这封信中，除了阐述马林科夫在 8 月会议上所说的所有内容外，还出现了这样一段话：“我们在机器拖拉机站、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工作中仍然存在很多不足，还有很多未被利用的潜力。例如，仅通过开垦我国东部、东南部和其他地区的荒地和熟荒地——而党和政府已经开始这项工作——我们就有机会将粮食作物的播种面积增加数百万公顷。”

不到两周后的 2 月 23 日，中央委员会召开了半年内的第二次全会，专门讨论农业问题。这次全会，而不是 9 月的那次全会，成为了新经济路线命运的转折点。这次全会采纳并认可了对国家来说最可接受的粗放式发展道路。全会提出——以强制且不容置疑的方式——用最简单的方法解决所有农业问题：不惜一切代价扩大北哈萨克斯坦和南西伯利亚的播种面积。这次全会彻底埋葬了使农业部门摆脱严重危机的希望，系统且全面地否定了这一希望。全会将这一切作为行动纲领表达出来，该纲领没有考虑到基础设施的发展、住房建设，就像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一样，仅仅依靠热情。只是这一次——不是全体苏联人民，而是其中最具流动性的部分——年轻人。

随后，所有的宣传力量，广泛利用散文、诗歌、戏剧、电影艺术的可能性，开始大力向人们灌输开发新土地的浪漫精神，先驱者的精神，而这应该能够弥补那些明显的、而且在未来很多年都将存在的不便，以及物资的短缺，这一点想必全会的所有参与者都清楚。

然而，新路线还没有被完全彻底地否定。克里姆林宫在国际舞台上取得的成就，让人觉得不能完全否定新路线，因为在冷战的这些年里，人们已经快要忘记这些成就了。

早在 1953 年夏天，就成功实现了巴尔干地区和黑海地区局势的正常化。6 月，与南斯拉夫恢复了正常的外交关系——双方互派大使；7 月，与希腊恢复了外交关系，同时还宣布停止对土耳其持续了近十年的强硬施压。“苏联亚美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和格鲁吉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苏联外交部的声明中写道，“认为可以放弃对土耳其的领土要求。至于海峡问题，苏联政府重新审视了此前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关于海峡问题的最后一句话意味着，莫斯科从此不再要求重新审视《蒙特勒公约》的条件。同样明显表达善意的举动还有，在伊丽莎白二世加冕之际，派“斯维尔德洛夫”号巡洋舰正式访问英国。

1953 年底，克里姆林宫终于得到了回应，它一直坚持不懈地呼吁西方三大国的领导人举行峰会，以解决所有积累的尖锐问题。艾森豪威尔、丘吉尔和拉尼埃于 12 月初在百慕大会面，以制定对苏联倡议的共同立场。他们首先讨论了自己的问题：欧洲防御共同体与北约的互动问题、因埃及革命而产生的苏伊士运河的命运问题、朝鲜的局势问题。12 月 8 日，在会议闭幕当天，艾森豪威尔代表所有与会者发表了声明。他特别宣布，美国、英国、法国同意在柏林举行四国外长会议，作为可能举行的四国最高级别会议的预备会议。此外，艾森豪威尔还宣布了另一个同样重要的消息——美国和英国准备与苏联讨论限制核武器的问题。

计划中的柏林会议于 1954 年 1 月 25 日至 2 月 18 日举行。会议讨论了莫洛托夫提出的关于确保欧洲安全、与德国和奥地利签订国家条约、召开包括中国在内的五国会议以解决朝鲜和印度支那局势的提议。由于阿登纳和皮杜尔的积极支持，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虽然会议没有解决任何一个正在讨论的问题，但还是做出了一个坚定的决定，即两个月后在日内瓦举行四国主要外交部门负责人的新会议。

为了巩固所取得的成果，莫斯科试图推动事件发展，预先确定日内瓦会议的结果。3 月 26 日，发布了关于给予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主权的声明。做出这一决定的理由如下：“尽管苏联在最近举行的四国外长柏林会议上做出了努力，但在恢复德国的民族统一和签订和平条约方面没有采取任何措施。”这样，西方就被迫面临一个两难选择：要么实现德国的统一，要么在法律上承认两个德国国家存在的事实。3 月 31 日，莫洛托夫接见了美国大使 C.波伦、英国大使 W.海特、法国大使 L.若克斯，并向他们递交了内容类似的照会，其中包含了克里姆林宫一个真正具有轰动效应的提议。“显然，”文件中写道，“如果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所有成员国都成为反希特勒联盟中的大国，那么在相应条件下，北约组织就有可能失去其侵略性。基于此，苏联政府秉持其一贯的和平政策原则，为了缓和国际关系中的紧张局势，表达了与相关政府共同讨论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问题的意愿（着重号为我所加。——尤里·日丹诺夫注）。”

当然，如果西方三大国同意苏联的这一提议，并且还能就限制核武器和停止军备竞赛达成一致，那么新路线肯定会取得胜利。而核心领导层中的“鹰派”就不得不退出政治舞台。在国家的国内政策方面，马林科夫在 3 月 12 日的选举前会议上再次阐述的路线就会得以确立。

他再次坚定地强调了经济中的优先事项：“我们的国家现在拥有强大的重工业，我们将继续不懈地发展它，把它作为确保整个国民经济持续增长和发展的基础，作为国家可靠的防御堡垒。但现在，利用工业化的成果，我们的党提出了一个任务：在两三年内实现消费品生产的大幅增长。”

随后，马林科夫公开以论战的口吻表达了他此前从未表达过的原则性分歧，反对刚刚结束的全会的决议。“我们所有人，”格奥尔基·马克西米利安诺维奇说，“苏联人民，我们整个民族都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进一步提高和全面发展国民经济的主要、决定性条件是全面提高劳动生产率——在工业、交通和农业中（着重号为我所加。——尤里·日丹诺夫注）……劳动组织问题，即有计划、最合理地利用企业内部以及整个国家范围内的社会劳动，随着我们在加强国家物质技术基础和提高生产力的道路上不断前进，将变得越来越重要。”

马林科夫还前所未有地明确阐述了他对国际问题的理解。“说人类只剩下两种选择是不正确的：要么是新的世界大战，要么是所谓的冷战……苏联政府……坚决反对冷战政策，因为这种政策是为新的世界大战做准备的政策，在现代战争手段下，这意味着世界文明的毁灭。”

最后，尽管为时已晚，苏联总理还是表达了他对自己在 9 月全会上所做事情的态度：“毫无疑问，党和国家领导的集体性是正确、成功解决我们面前的重要现实问题，正确、成功解决涉及苏联人民命运的根本问题的必要保障。”

这样的发言成为了马林科夫向核心领导层和广大领导层发出的公开挑战。这是一个明确的提议，要求就所涉及的问题表明立场。同时，这也是与赫鲁晓夫的明显争论，赫鲁晓夫也在选民面前发表了讲话，但稍早一些，在 3 月 5 日。他发表了传统的讲话：“……在不放松对作为苏联经济基础的重工业进一步发展的关注的同时，以加速的速度发展轻工业和食品工业，确保农业的大幅提升。”

赫鲁晓夫对与国内政策相关联的对外政策的描述同样平淡无奇，没有带来任何新内容。“在引导人民努力完成和平建设计划的同时，”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说，“共产党和苏联政府不能不考虑到，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存在着反动势力，他们试图通过准备新的战争来摆脱经济困境和帝国主义阵营日益尖锐的矛盾。这就是为什么党和政府在坚持不懈地推行和平政

策的同时，不断完善和加强苏联国家的武装力量，警惕地守护着苏联人民的和平劳动和我们祖国的安全。”

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之间突然出现且公开化的争论，关于国家发展的两种方案之间的争论，很快就得到了解决。在 4 月 20 日召开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这实际上成为了对唯一一个紧迫问题的一种公投：应该选择两条道路中的哪一条，应该遵循哪一条路线——旧的还是新的。

确实，一些代表利用这一难得的机会，试图引起莫斯科对他们自身困难和问题的关注。例如，马尔贝科夫说，在卡巴尔达-巴尔卡尔自治共和国的首府纳尔奇克，至今仍然没有供水和排水系统。

在从德国占领下解放十年后，政府大楼、电话局以及其他一些同样重要的公共建筑仍未从废墟中重建起来。那里只有一所高等院校，有害物质仍在不断排入巴克桑河。来自里加的代表莱西斯谈到了拉脱维亚首都城市管理的混乱以及住房的严重短缺。乌兹别克斯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三书记阿卜杜拉扎科夫生动地描绘了塔什干的生活条件同样悲惨的画面。几天后面临着接替被派往哈萨克斯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担任第一书记的波诺马连科成为苏联文化部长的前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部长亚历山德罗夫，讲述了其他的困境。他说，人们对教育和文化的渴望要求将书籍的印刷量增加一倍，但却没有足够的纸张来满足这一需求……

但所有这些都只是为一个更严肃的主题提供了背景，用鲜明的细节加以衬托。实际上，几乎所有代表在发言时都认为有必要按照他们认为的重要程度依次列举出国家面临的三个紧迫任务。绝大多数代表将第一位留给了重工业，第二位是农业，只有第三位才是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爱沙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凯宾、森林和造纸工业部长奥尔洛夫、亚美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科奇尼扬、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团成员和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成员卡冈诺维奇、煤炭工业部长扎西亚德科以及许多其他人都采取了这样的立场，毫无疑问地支持赫鲁晓夫的方案。发言者中较少的一部分人，主要来自那些农业在当地经济中发挥重要作用、构成该地区经济基础的共和国、边疆区和州，自然地将农业问题放在了未解决问题的首位。拉脱维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卡尔恩别尔津、国营农场部长科兹洛夫、乌兹别克斯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三书记阿卜杜拉扎科夫就是这样做的。而且没有人提到轻工业的优先地位，也没有人强调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绝对重要性。

核心领导层的两名成员米高扬和别尔乌辛的发言最具代表性且显然不是偶然的。

苏联部长会议贸易委员会主席兼苏联贸易部长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在发言结束时对提议的预算做出了如下评价：“确保了我们经济实力基础——重工业的适当增长，农业的大力提升，消费品生产的快速增加；大幅增加了用于满足人民社会和文化需求的拨款，与此同时，为苏联军队配备了最新的武器装备……我们不威胁任何人，但我们用最新的武器装备我们的军队，以便能够体面地回应任何侵略者。”

苏联部长会议能源、化学和林业工业委员会主席米哈伊尔·格奥尔基耶维奇表达得更简单：“代表们——人民的代表和全体苏联人民热烈赞同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苏联政府的政策，该政策旨在进一步加强我们亲爱的祖国的实力，增强国家的防御能力，进一步发展工业和农业，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水平。”

经过这样的讨论，以及代表们明确表达的观点，批准与去年实质不同的预算也就不足为奇了。在支出总额 5628 亿卢布中，用于发展重工业的拨款为 796 亿卢布，而用于轻工业（包括贸易）的拨款仅为 142 亿卢布。用于建设的总拨款为 140 亿卢布，用于农业的拨款为 620 亿卢布，用于社会文化领域的拨款为 1413 亿卢布。其余的资金用于维持强力部门、武装力量和国家机构的运转。

放弃最近采取的路线得到了预先策划的宣传攻势的支持。这场宣传攻势的高潮是斯大林的突然平反。甚至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召开之前，1954 年 2 月 4 日，苏斯洛夫就说服赫鲁晓夫同意向全国所有报纸和杂志发出指示，要求在 3 月 5 日发表重要文章，纪念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逝世一周年。在这些文章中，必须将斯大林展示为“伟大的列宁事业的继承者，阐明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在与共产党和苏联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活动紧密相关中的作用，反映党和人民的坚定团结”。所有编辑部都被要求在其出版物中刊登斯大林的肖像，地方当局要悬挂哀悼旗帜，邮电部要发行纪念这一重要日子的邮票。

不久之后，文学和艺术领域也参与进来。《真理报》《文学报》《苏联艺术》展开了一场公开的运动，谴责那些及时反映了新路线的作品。V.帕诺娃的小说《一年四季》、L.佐林的戏剧《客人》、A.马里恩戈夫的《世袭王子》、A.苏罗夫的《正派人》、N.维尔蒂的《庞贝的毁灭》、I.戈罗德茨基的《活动家》、Yu.亚诺夫斯基的《检察官的女儿》，V.波梅兰采夫、F.阿布拉莫夫、M.利夫希茨、M.施切格洛夫的文章，I.爱伦堡的小说《解冻》都受到了批判。评论界将它们评价为“意识形态上的新经济政策”，背离了党的总路线，是“肮脏”和“污秽”的“解冻”。

这场运动在 1954 年 7 月 23 日结束。当天，在赫鲁晓夫主持下召开的中央书记处会议做出了一项意义深远的决定。决议谴责了《新世界》杂志编辑部“严重的政治错误”，以及“特瓦尔多夫斯基的诗歌《瓦西里·焦尔金游地府》中包含的对苏联社会的诽谤性言论”。这是第一部尚未在任何地方发表、只是作者读给亲密朋友听过的反斯大林主义作品。考虑到一系列的过错，中央书记处的同一决议解除了 A.特瓦尔多夫斯基《新世界》杂志主编的职务。并批准 K.西蒙诺夫接替他的职位。西蒙诺夫曾在 1953 年 3 月《文学报》上发表的文章《作家的神圣职责》中，呼吁所有作家、诗人和剧作家将他们的所有作品都献给“伟大的斯大林”。

……1954 年 4 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的结果，以及斯大林“美好”名声的突然平反，令人信服地向马林科夫表明，他是新路线的唯一支持者。更有甚者，从那时起，他不仅失去了做出决策的可能性，甚至无法对决策的筹备产生影响。他必须接受最终的失败，做好辞去政府首脑职位的准备。而实际上，他的下台只是时间和具体情况的问题。这取决于一个因素：出现足够严重的困难，尽管这些困难是由已确立的政策本质所导致的，但责任却会被推到马林科夫身上。这些责任会算在他头上。他们会把他，而不是新的核心领导层成员，变成那些明显且不可避免的失算的罪魁祸首，而格奥尔基·马克西米利安诺维奇提出自己的路线，实际上就是为了预防这些失算。

就这样，苏联历史上又一个持续了不到二十年的时期结束了。这是一个极其戏剧化、极为复杂、充满矛盾且远非单一和简单的时期。在这个时期，首先必须付出难以想象的巨大代价，来捍卫国家的自由、独立和领土完整。与盟友们一起在浴血奋战中击败纳粹德国。同时，要尽一切可能确保 1941 年那个可怕的夏天和秋天不再重演。保障苏联的国家利益，确保其安全。在几乎整个陆地边界沿线建立起一圈友好国家，然后，在冷战的最初几年里，还要捍卫与这些国家签订互助条约的权利。此外，还要在最短的时间内，以牺牲恢复国民经济更紧迫、更现实的任务为代价，实现与美国在核武器方面的对等。

正是这些因素将 20 世纪 30 年代中期就已出现的现实问题推到了次要位置。首先是党在国家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受到了实质性的限制，其他官方权力机构的实际权力得到了增强。起初是行政权力机构，后来，从长远来看，还有立法权力机构；逐渐将以前属于党的官僚机构的权力转移给了它们。另一个同样重要的改革也没有成功——将形式上的联邦制国家转变为官方的单一制国家。通过提升苏联所有民族的文化水平，创建公民社会，而根据设想，公民社会应该成为 1936 年通过的宪法所宣布的那种民主的基础。

党的官僚机构与各加盟共和国官僚机构中的民族团体联合起来，力量过于强大，不可能不战而降。它们首先能够坚守阵地，然后在残酷的斗争中捍卫自己、自己的地位和特权。通过赫鲁晓夫，并将他推上权力巅峰，使自己的权力绝对化，确立了对国家生活各个领域的控制。但是，在经历了这一切之后，为了不失去已获得的主导地位，它们不得不不放弃两种制度和平共处的口号，不放弃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目标。与此同时，不断转移民众对解决这些问题、对国内问题的注意力，维持与西方的意识形态对抗。依靠“鹰派”，追随军备竞赛，在新的形势下维持已经不再必要的武装力量规模。将力量和资源投入到最昂贵的项目上——核武器和火箭武器。同时依靠民族官僚机构，不断扩大各加盟共和国的权力，这损害的与其说是“中央”，不如说是整个国家。因为这样做而冒着极大的风险，不断加剧严格的垂直权力结构的紧张局势……

1954 年 4 月，苏联历史的这个时期开始了。这就是赫鲁晓夫的十年。